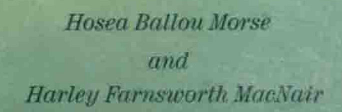
远东国际关系史

〔美〕马士、宓亨利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Hosea Ballou Morse

and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1

远东国际关系史

〔美〕马士 宓亨利 著

姚曾廙等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远东国际关系史

著　　者 □ [美]马士　宓亨利
译　　者 □ 姚曾廙等
责任编辑 □ 徐力励
封面设计 □ 程　钢
技术编辑 □ 吴　放
出　　版 □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 上海中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印　　张 □ 26
字　　数 □ 580千字
印　　数 □ 0001-3000
出版日期 □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22-412-2/K·94
定　　价 □ 45.00元

前　　言

《远东国际关系史》是二、三十年代问世的一部研究远东国际关系的名著。全书三十章，首三章介绍远东的地理要素、古代西方与远东的关系、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与远东的关系，其余依次叙述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西方列强（主要是英、美、法、俄）与远东各国的关系，以及远东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全书除了三章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其余都是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的，涉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以及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及中国近代史。

《远东国际关系史》的作者马士、宓亨利都是西方著名的中国通，都有在中国多年工作、生活的经历。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3），原籍美国，后入籍英国，但一辈子事业都在中国。他 1874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来华，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1877 年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北京总税务司任职，兼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87 年任上海副税务司，以后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1896 年升税务司，1903 年至 1907 年任海关总税务司的统计秘书，1909 年退休，定居英国。他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多年，是总税务司赫德的主要助手，曾直接参加过多项外交活动，包括有关中法战争的交涉、云南对外通商交涉等。他的工作颇受有关部门好评，多次获得中国

政府的嘉奖。1885 年获御赐双龙三等宝星，1903 年获御赐双龙一等宝星，1916 年获中华民国三级嘉禾章。马士因工作之便，接触到许多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和档案，加之他本身又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这就为他后来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这本《远东国际关系史》之外，他还著有《中国泉币考》、《中朝制度考》、《中国公行考》、《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中译本于六十年代由三联书店出版，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将重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中译本于 1991 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太平天国纪事》等。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1891～1947），原籍美国，1912 年来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历史学、政治学教授，兼任《密勒氏评论报》特约编辑和《教务杂志》编辑部执行委员，1926 年回国，历任华盛顿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远东史教授。他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近代史选读》、《华侨志》、《中国赈灾纪实》、《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等（详见本书所附录的"宓亨利著作目录"）。

就像那个时代大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作者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将西方列强向东方的侵略与渗透视为自然与合理，把东方各族人民的反抗视为不合历史潮流。这些在本书中在在可见，读者自然能加以鉴别。但是，这本《远东国际关系史》是学者的独立著作，不是官书，作者对许多事件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对于殖民主义者的许多罪恶行径并不回护。比如，对于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情况，对于额尔金下令焚烧圆明园的罪行，对于英国商人采取欺骗手段在上海建造吴淞铁路的事件，对于殖民主义者掠卖、虐待华工事件，书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揭露。两位作者都是西

方人，又都熟谙中国历史，对曾经身处其间的中国社会有比较真切的了解，因此，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许多看法，并非隔靴搔痒的浮泛之论，常能高屋建瓴，洞幽发微。比如，对传教士为何既不受中国官方欢迎、也为老百姓所厌恶的问题，分别从行政、民情、伦理、文化态势等方面分析，很有说服力(见本书第十五章第3节《对传教士的仇视》)；对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原因和影响的论述(见本书第十九章第3节《中日战争：日本对欧洲的第一次挑战》)，在国际大背景下看清政府的所作所为，症结毕现。书中写道：

>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唯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的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第391－392页)

所言句句属实，分析在在中肯。唯其属实中肯，每让后之中国读者走目至此而发竖眦裂，拔剑起舞，或扼腕长叹，掩卷三思。

也像那个时代许多西方的中国著作一样，此书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既注意大的文化背景介绍，也注意过程的陈述和细节的描写，注重分析外交与内政的有机联系，大处着眼，细处落

墨。对于历次战争的起因、过程，条约的签订，对战争双方背景、谈判要求等均有比较清晰的描述。在不到六十万字的篇幅内，将一个世纪中纷纭多变的远东国际关系，作了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综合叙述。这样程度的叙述，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准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者，都是非常必需的。至于资料方面，由于马士有厚厚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基础，因此本书资料相当扎实，虽然不像《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那样大段征引原文，但言必有据，落墨审慎。尽管在今天看来，有些资料的使用有些问题，如关于义和团一段，书中不止一处使用《景善日记》，而这部日记经研究是伪造的(见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载《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但从总体上说，全书资料翔实可靠。这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著作，书中不少资料和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参考意义。从学术史角度来看，此书亦已成为研究的对象。

《远东国际关系史》的原版为英文，1928 年在上海出了第一版，1931 年在波士顿和纽约出了修订版，在西方学术界曾被视为研究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经典著作。1949 年以前，此书曾被中国一些教会大学选为教材，有比较广泛的影响。197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姚曾廙等据修订版翻译的中译本，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只是作为内部出版物，现在研究者要找到这个本子已很不容易，上海书店出版社有鉴于此，征得原译者的同意，予以重印，以满足学界之需。这次重印的本子，一如该社前此不久重印的《英使谒见乾隆记实》一样，遵从中译本初版的版式，以便读者查检。在重印过程中，还纠正了若干中译初版的手民之误(如“李泰国”误为“李国泰”)。《远东国际关系史》的写作与出版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作为该书论述重点的中国，现在已经

起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我们自己的学者还没有能写出像《远东国际关系史》那样程度和规模的著作，这是需要我们今后加倍努力的。

熊月之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九八年十月

目　　录

第一章　远东的地理要素

1

1. 主要的势力范围

远东问题的地理基础

要了解远东历史和东亚各国相互间以及同西方各国间的关系，多少知道一些地理背景是有必要的。各洲之中最大的亚洲占有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一大块陆地可以分成四个主要势力范围。这些主要势力范围是：(1) 西亚，它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只是晚近才受到充分的重视；(2) 北亚，包括西伯利亚在内，因为是由俄国勘查和拓殖的，所以一向主要是从那个欧洲国家的观点加以研究的；(3) 自成为一个大陆和一种文明的印度，其影响是那样远被四方，以致在很早的年代就同 (4) 中国以及在中国直接影响下的各地区发生了虽则有限然而意义深远的接触。中国，一如印度，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自成为一个大陆和一种文明，而现在正慢慢地溶合成为一个国家。东部西伯利亚、中国及其现在和过去的附属国，以及日本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合而构成为“远东”这个名词通常所包括的区域。

2. 西伯利亚

亚洲俄罗斯的面积

中国的总面积，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在内，共计四百二十五万多方哩，人口大概有四亿五千万。东部西伯利亚在其中仅仅占一小部分的亚洲俄罗斯，约为中国及其附属国面积的一倍半，但是它的人口大概不超过一千二百万。

4

直到十六世纪下半叶，探险家耶尔麻克才为沙皇将西部西

伯利亚永久地征服下来，并将他的征服地献给伊凡第四。不到六十年的工夫，俄罗斯人就到达了太平洋；在 1649—1650 年间，哈巴罗夫占领了黑龙江两岸。但是，中国人堵截住哥萨克人，而且迫使后者退出他们的堡垒。

俄国的迅速进展

整个西伯利亚，特别是黑龙江口附近地方，是富于林业、农业和矿业资源的。沿海的渔场需用山东运来的大量食盐。后来建成海参崴、大连和旅顺口的那几处海港，都为俄国所垂涎，因为俄国异乎寻常地贪求土地，也渴求一个冬季完全不冻的港口。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并将远东同欧洲连接起来，俄国建造了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而这条铁路的一个支线却横贯中国领土。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东方政治局势大为复杂起来。

3. 远东诸海

东部诸海的影响

从亚洲大陆伸入太平洋的有两个大半岛，南面是马来半岛，北面是堪察加。位于这两个半岛之间的，是扼大陆北部、中部和南部海路之要冲的日本和菲律宾那两个群岛。从大陆上伸出来的一个比较小的半岛，象匕首似地指着日本的心脏。朝鲜位于西伯利亚和满洲之南。同东亚海岸平行的是太平洋的几个内海。在北部是鄂霍次克海，西伯利亚、人所垂涎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千岛群岛和虾夷岛等的海岸，都是它的波涛之所及。往南就是西伯利亚的滨海省、朝鲜、南萨哈林岛和日本各大岛所滨临的日本海。因为海的进出口是在日本控制之下，所以这个海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海。滨海省和海参崴港都象朝鲜一样地为它所控制。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以及在 1918 年同盟远征军进入西伯利亚时，这些都是重要因素。

朝鲜海峡起于日本海，迄于黄海。伸入黄海的有辽东和山

东两个半岛，大连和旅顺口、威海卫和青岛各城市，就分别位于这两个半岛之上。在日本的九州岛及琉球群岛和中国的江苏、浙江及福建各省之间的，是东海。极南是中国海，面临着它的是中国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群岛、婆罗洲和马来半岛。 5

4. 日本帝国

日本帝国包括若干群岛，其中有虾夷、本州、四国、九州和台湾①五大岛；以及萨哈林岛南半和朝鲜半岛。日本本土占有经度37度14分和纬度29度11分；由北到南约二千五百哩。这并不包括赤道以北原属于德国的各岛在内，那些岛屿是从1919年起日本受国际联盟的委托而代管的。在过去半个世纪期间，日本帝国已经取得了下述各岛的控制权：琉球群岛、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萨哈林岛南部、台湾、澎湖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帛琉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现在除去阿留申群岛、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北婆罗洲以及少数分散的小岛之外，日本统治了太平洋中赤道以北的所有岛屿②。

日本帝国的构成

因为南北绵长，日本具有各种不同的气候，自萨哈林岛和虾夷岛的酷寒以至于台湾和南海各岛的热带性温暖。日本本土则气候温和，正如文明和国势已经有了发展的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带有水蒸汽的西北风，冬季从西伯利亚吹过日本群岛西部各县，经过比较温暖的日本海而温度增高，结果使这些县份每

日本的气候

① 原书是Formosa（福摩萨），以下同。——编者

② 根据1943年12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他小岛。日本在战前侵略和非法占领的地方必须退还；使朝鲜自由独立。现在台湾、澎湖列岛已由中国收复；朝鲜北部已获解放，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南部尚在美国军事占领之下；萨哈林岛南部已归还苏联；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帛琉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为美国占领或托管。——译者

年有大量的降雪。日本时常发生通称台风的那种可怕的风暴，主要季节是6至10月，但在其他月份也会发生。其中约有半数是对生命财产具有高度破坏性的。台风大抵来自中国海，特别6 是从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吕宋岛附近一带而来的。风速是每小时七十五哩，平均大约一年十二次。尽管风暴造成损害，它们却不是没有补偿作用的：风暴对气候以及温度上的虽不悬殊过甚但异常迅速的变化所起的刺激作用，使日本具备了高度的活动能力，日本之所以善于吸收新思想，发扬文明上的种种变化，而避免停滞之弊，这种刺激作用很可能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而这些因素已经使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在另一方面，中国却不具备高度而只有中等的活动能力。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所以受北亚和中亚寒流的影响，这种寒流是具有一种麻痹作用的，而且足以抵销中国所滨临各海的调节作用。

地震的为害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象日本那样苦于地震的为害了。日本的太平洋沿岸是陡削的。日本群岛中本州岛东北角附近的一个地点，据测量，水深达四千六百五十五㖊①。通称为德斯加罗拉深海的这个地点（这是因进行测量的美国战舰的船名而命名的）是全世界第二个最深的海床。在这里的海洋下面，显然有一个大火山口，日本的许多地震似乎都是来自这一带的，并且有时还伴有海啸。日本的太平洋海岸是渐渐高起的，而日本海海岸则是渐渐低陷的；大多数的地震灾害就是起因于这种现象。虽然很多次震动都是非用地震仪不能察觉到，但是自从八世纪以来，纪录有案的较大的灾害已大大超过二千次。震动的次数大大概平均每天三、四次，其中很多是感觉不到的。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地震发生于1923年9月1日，那次，日本最大的港口横

① 一㖊等于六呎。——编者

滨和首都东京的大部分，连同许多较小的城市和乡村遭到了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几乎不可胜数。

日本大部分是山地，而沿海又是那样作深锯齿状，这种地形在较早的年代里就助长了封建时期地方观念的发展。甚至直到今天，在海陆军行政上还可以看得出的那种藩阀观念，大部分是起因于山川梗阻和交通不便，这种情况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克服过来。

日本向海外移民的原因 7

全国总面积约仅六分之一是可耕地。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九分之一是可以开垦的，但是结果能否偿还成本，则殊可怀疑。人们向海外移殖的风气所以向来炽烈，正是地窄人稠的结果之一。在这方面遭到了加拿大、澳洲和美国政府的打击，于是近年来，很多人已经前往满洲、朝鲜、中国和南美。如要研究远东国际关系，了解日本向海外移民的各项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向海外移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原料的需要，因为某些原料是日本所缺乏的。一个正处于工业革命诞生阶段的国家，非有煤、油和铁，制造业所需的原料以及一个推销成品的市场不可。日本有煤和油，但铁的蕴藏量不丰富。可是附近就是亚洲大陆，大陆上的很多地区不但能吸收日本移民，而且能供应日本以制造业所需的原料，并至少在几十年之内可为日本的制成品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日本所据的形势，扼大陆中部和北部的海上要冲，所以日本只要能保持一个海军强国的地位，则形势之胜，对日本的称霸东亚是非常有利的。日本能否雄踞一方，首先要看它能否控制海权以及能否不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或沦入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

日本和中国的地位

日本何以能在半个世纪之内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这始终是许多历史学者惊异之所由来。事实是:

就潜势而论，日本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这意思是说，它地理上的位置在很多方面是同英国相似的——而它的人民也是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精于航海的。然而，直到一代之前还比日本强大并且在潜势上迄仍雄厚的一个国家，却端踞于迎面的大陆上。在面积、资源和人力方面，中国都远超过日本，而这三者都是实力的基础。在蒸汽时代之前，日本是没有外患之忧的 8 ——甚至忽必烈汗以其全部能力和资源，尚且未能征服这个岛国。可是，反过来，日本却也不足为其邻国的大患，并且在国际事务上也是无足轻重的。早在十一世纪中叶，据说有一个日本冒险家陆奥的安倍赖时的儿子，曾经率领一支小舰队溯黑龙江而上，想在大陆上寻求一个定居的地方——这是早于俄国人六百年的一次进犯。在十六世纪时，不但发生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的这桩事，而且日本船还袭击过中国沿海，成群结队地驶往暹罗、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甚至横渡太平洋而远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所有这类海上活动最后会造成怎样的结果，现在是无法忆度了：因为在十七世纪时，政府封锁了日本的对外交通，并禁造航海船舶。此后三百年间，日本再没有进行过任何重要的海上活动。

5. 菲律宾群岛

亚洲的南方进出路

菲律宾群岛位于日本之南，距台湾不过几小时的汽船航程，在广东东南约五百哩。菲律宾群岛，连同向东南方延伸的马来半岛，形成自印度洋和南太平洋至亚洲沿岸的南方门户。菲律宾群岛包括有三千多个岛屿，其中很多面积不到一方哩。十一万五千方哩的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九以上是在十一个岛上面，其中最大的是吕宋岛。

菲律宾群岛多山，在这个群岛中有十二个活动性的火山。象日本一样，地震频仍，往往很剧烈，并且有时伴以海啸。在1862和1909年间，有六十次激烈的地震是波及整个群岛的。气候则自吕宋高山地区的温带气候直到低地的热带气候，因地而不同。

象菲律宾群岛这样逼近亚洲沿岸和日本群岛，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十六世纪时日本船的周游菲律宾，上文已经提及。中国人在菲律宾登陆通商还要远早于日本。不需三天的工夫，中国沙船就可以从大陆驶到吕宋岛，而现在一艘海洋轮船从马尼拉到香港则只需二十四小时。中国人初到菲律宾大半是在唐（公元618—906年）、宋（公元960—1127年）期间，但很可能还要再早几百年。在元（公元1280—1367年）、明（公元1368—1644年）两朝，通商关系已颇重要。正如朝鲜人和日本人一样，菲律宾人的早期文明也是从中国吸取的。

9

菲律宾群岛邻近中国和日本

1521年，麦哲伦发现菲律宾，并且在那里丧失掉自己的生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竞争国的争吵中，菲律宾群岛的地位自始就具有重要意义。西班牙人称呼这个群岛为Islas de Poniente——西岛，因为他们是从东面而来的，所以认为它是在西班牙帝国的西境上。相反地，葡萄牙人却名之为Islas de Oriente——东岛，并且认为这个群岛构成葡萄牙领域的东界。

6. 中国及其邻邦

现在转而谈到那个现在可能是而过去却始终是东亚最重要的国家体制，我们不妨这样说：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为地理因素支配的。中国内地和中国边省，或者说中国本部（即十八行省）和它的藩属（即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形成为一个大三角形，

中国受地理因素的支配

顶端位于中亚细亚的帕米尔高原，底边则自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一直延伸到东南的海南岛。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是海，两侧则以山脉为标志。北有天山、阿尔泰山和雅布洛诺夫山脉；南有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云南省的崎岖高原，和形成中国第三大河流的西江的分水岭的那些峰峦起伏的丘陵。这个大三角形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边，并且如上文所述，缓缓地倾斜以至于海。

除去事实上地力取之不尽的两个大平原之外，中国大陆是一片高原。其中大部分是不但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沃。两个平原中的较大的一个，宽袤约三百哩，位于中国的东部，自浙江省的杭州一直伸展到北京以北几哩的地方。几乎是专为联络这两个城的那条长约一千二百哩的大运河，以及晚近所建造的几百哩的铁路，形成这个平原的主要交通线。较小的那个平原，宽约二百哩，位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下游之间。这个平原以长江和东部相沟通，而以京汉铁路和北方相联接。

水道对公路

中国人既遍布于十八行省，他们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就克服了高原所呈现的各种困难，但却不象罗马人那样靠建筑公路，而是靠利用全国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开凿大大小小的运河将中国的若干地区变成了同荷兰相似的地方。中国有三条大航路——黄河、长江和西江——这三条航路，连同运河，不但足以把全国联成一气，而且还有助于在人民当中产生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为它的三大航路和延伸到北部及西部的大平原所左右的。中国人始终在很大程度上仰赖水路交通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何以中国大部分地区是那样缺乏车辆、汽车路和铁路。中国的男工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从事于运输工作的。这是中国生产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方各国，百分之五的男工就足能掌握运输工作了。航路，连同山脉，对各省的省界也有决定性

影响。在中国的历史和国际关系上起着那样大的作用的地方观念，溯本穷源，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这些因素而来的。

在东亚内地，气压是夏低而冬高。所以，在夏季，整个东南亚都受到来自南、东南和西南各方面的海洋风。在冬季则有来自北、东北和西北各方面的大陆风。通称为季候风的这一类的风，不但对中国的温度和雨量，而且对于它早期在南亚和西亚的探险和商业航行以及后来同其他亚洲人和欧洲人的贸易关系，都一直是有重要影响的。夏季从海上吹来的西南季候风，在11月1日左右转变风向的这个时节以前，把取道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望加锡海峡的帆船带到广州。然后再由东北季候风在春季月份把这些船只沿中国海送上归程。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美国帆船并不是乘季候风之便而按时来去的，它们往往利用太平洋航线。

季候风

11

中国人在沿岸各海开始进行探险工作，至迟是在一千五百年以前，虽然就目前所能证实的来说，大洋本身乃是一道久久不能越过的鸿沟。尽管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而论，并不以航海见称，然而他们却不曾为海所禁锢，一如根据某些著作可以推断出来的那样。至少早于公元五世纪之初，同印度的交通就不是不得而知了。在六世纪时，印度曾经几次遣使来到中国，七、八两世纪的唐史上就对中国沙船从广州去幼发拉底河的海路已有记述。迟至十五世纪，中国船舶还前往印度、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岸各地。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势力多自南方经海道而渐及于中国。然而俄国却不但威胁到了西北和东北的陆路交通线，而且还威胁到了北直隶湾附近的海道。在十九世纪时，南方各口不但有了商业上的重要意义，而且有了一种新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迄今多少年来，海洋一直是在中国历史上发

早期的中国航海者

挥着一种显著作用的。

中国的陆上边界

谈到中国本部的陆上边界，应当指出它们历来对于远东历史和国际关系影响的深远。中国曾一再遭到北方和西方半干燥高原上的人的侵扰。为防患起见，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之初建筑了长城。长城是由以前的一些城墙连接而成的，全长一千五百哩，起自甘肃，迄于辽东海湾。

12

在西部，中国以几乎无路可通的西藏和行旅为艰的新疆作为屏障。前者是一片二至三哩高的高原；后者虽海拔较低，但半系沙漠，并且大部分干燥而多石。西藏的首府拉萨，是中印两国通商要道之所趋。由于地位的关系，近代以来西藏不但为中国所关切，而且也成为英、俄两国注意的目标。横跨西藏而进入印度或中国的军队是自古罕见的。但是这些高原人却沿着渭水和黄河流域而节节逼临。汉朝的统治者决意以攻为守，曾于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和公元一世纪派兵征服这些中亚细亚的高原人。这正是张骞、班超和甘英永垂千古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中古时期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入侵，是中国受北方势力影响的后期形势。虽则月氏、匈奴、鞑靼人和蒙古人时常进犯，并且统辖了中国的一些地方，虽则中国曾远扬国威于四方，然而依旧不失其为真实的情况是：中国是被陆上的壁障包围起来的，而那些壁障直到晚近为止，一直在很大的程度上隔绝了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主要文明的任何重要知识和文化的交流。结果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文明为期三千多年的发展，其间虽历经兴衰变化，但一直绵延至于今日。西藏、蒙古、满洲、朝鲜、日本、菲律宾、东印度群岛、马来亚、印度支那、暹罗和缅甸，都曾经受到过中国文明的直接影响。这些地方的许多最优秀的文化，显然是渊源于中国文明的。

象中国这样富于矿产和其他原料的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一定会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煤的蕴藏为滨临西太平洋的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所以，一旦运输问题解决，中国势必要左右远东的煤市场。中国铁的蕴藏量虽不那样大，然而却是太平洋沿岸各国之中首屈一指的。据估计，铁的蕴藏足供中国本身工业发展之用，但不能供日本的需要。两国龃龉的根源正在于此。中国的铜、锡、锑和盐也都具有重要性。

中国的资源

13

中国早期的制造品久已为世所争购。在明代时，中外船舶运往海外的货物，计有生丝、丝绸、锦锻、素缎、瓷器、麝香、大黄、铁、硝石、银、珍珠、木刻和纸扇。

这个远东文化的创始者，既被隔绝了同其他各大文明中心的畅通无阻的交流，而所有东方其他各地又都求取它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这就无怪后来欧洲人也从海道而来谋求同中国进行交往时，中国要把他们看作是劣等人和野蛮人了。如果再想到有不少欧洲人侵扰中国海岸的情形正同十六世纪时日本人剽掠中国沿岸的海盗行径如出一辙，那就更无怪他们要抱这种看法了。过去以他们的地理位置为屏障的中国人，直到晚近还不能认识西方各国凭以征服自然和克服地理上的不利条件的那些方法的重要意义。这些现象的一些结果当在本书中加以讨论。

第二章　西方和远东的早期关系

14

1. 中国同西亚人和欧洲人的早期关系

中国不是一个僻居的国家

著名的法国汉学者阿伯尔·雷穆萨指出，谁要以为中国的历史是僻居于亚洲一隅的一个国家的历史，以为那个国家除与左右邻邦有过关系之外，始终禁止与外国人交往，那他就错了。姑不论《以赛亚书》中所提到的锡安(Sinim)是否指中国而言，毫无疑义的是，奥古斯都时代的贺拉西和其他几位诗人以及普林尼和托勒密所用的锡国、秦国、秦尼国和赛里斯国人等名称，都是指中国和中国人而言的。在古代的中国杂记中，都提到了丝织品、皮毛和铁；在罗马，丝是按纯金计重出售的，中国铁尤为普林尼所赞扬，可是普林尼不赞成以丝绸作为奢侈品使用。在公元530和550年之间，希腊僧人科斯马斯·英迪科普娄斯泰斯首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到了中国。在下一世纪初，一个名叫狄奥菲拉克托·西摩卡塔的拜占廷学者，以通古斯人这样一个名称提到了中国人。

汉代的张骞

早在公元前138年，中郎将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跨中亚细亚至斐加那①和巴克特里亚②。十二年后，张骞带了查克萨提河③和奥克萨斯河④沿岸各国的第一手知识回到中国。由于这次的

① 斐加那(Fergana)在今苏联乌兹别克东部，我国史称大宛。——译者

② 巴克特里亚(Bactria)在今阿富汗境内，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我国史称大夏。——译者

③ 查克萨提河(Jaxartes)，流经苏联中亚细亚，即今锡尔河(Syr Darga)。——译者

④ 奥克萨斯河(Oxus)，流经中亚细亚，即今阿姆河(Amu Darga)。——译者

旅行，中国得以通过土耳其人和西藏人的地界而开辟一条西方的通商路线。七十年后，中国的威权已经伸张到现在的新疆一带。苜蓿和葡萄藤经张骞本人带入中国，其他许多植物，诸如麻、胡桃等则是由于他的西游而后传入的。

当张骞在巴克特里亚的时候，他看到经由印度和阿富汗而来的邛杖和蜀布。张骞由此断定，从中国经印度西去的道路一定不象他所走的北路那样艰难，所以建议武帝利用那一条西去的路线。武帝颇思张威异域，因而听从张骞的献计，作过多次的尝试，但终未成功。可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军司马班超率军几乎到达了罗马帝国的边境，并且在喀什噶尔或叶尔羌附近击败了印度某贵霜翎侯的军队，或许就是迦腻色迦王的军队也未可知。结果是印度在和帝（公元 89—105 年）和桓帝（公元 147—167 年）时遣使来中国纳贡。

15

班超

同中国人通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东部的贸易，在这以前早已开始。蚕丝经朔漠，越崇山峻岭而运到西亚细亚，并辗转抵于罗马帝国，然而制丝的技术，中国人却秘而不宣，以防外人仿制。自最初使用蚕丝之后，五百多年没有一个西方人知道丝的来源及其制造方法。可是在公元 419 年，一位中国公主教忽炭（即和阗）人以制丝的方法，一百二十五年后，有两个基督教僧侣以一些蚕子献给查士丁尼大帝，这些蚕子是装在竹筒里从中国带出来的。皮革和皮毛、朱砂、油漆、麻布和呢绒、兽骨和象牙制品、某几种木箭和竹箭、以及毛毡等都是这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商品。由于中国在耶稣诞生之前一世纪和后一世纪同西方通商之结果，桃和杏也传入了西方，玻璃和玻璃制造术、宝石、珐琅、钢、陶器、纺织材料、和火浣布以及良马等，则从西方输入中国；此外，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的艺术影响已见诸远东，并在近代

中国古代的蚕丝贸易

一直有线索可寻。

唐代的对外关系

从三世纪后半叶起到七世纪中叶时止，中国和遥远的西亚之间很少直接交通，或者根本没有。在七世纪和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君士坦丁堡（拂菻）曾数度遣使来中国。亚述耶稣教（即景16教）在唐太宗（627—650年）的奖掖之下，得盛行于中国。可是伊斯兰教势力在西亚的滋长，却成为中国和拜占廷帝国往来交通的一道障碍，所以自八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后半叶，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遣使的记载。

通中国的海路

在二世纪初期，中国和罗马帝国的海上交通就已经开始。早在公元120年，有音乐家和魔术家自大秦来到缅甸。几年之前缅甸已经成为中国的朝贡国，于是缅甸王将这几个艺人送到安帝的朝廷。一代之后，在公元166年，一个自称由大秦国王或皇帝安敦（即奥理略·安托奈那）派来的使节，抵达桓帝的朝廷。这个使节不见得是罗马皇帝本人派来的；而倒很象是由安提阿城①和亚历山大城的商人组成的，因为这两地的陆路丝绸贸易已经被帕提阿人和罗马人的战争所阻断。前者在这期间已掌握了海运业的大部分，并且很想阻断罗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直接交通。当公元97年前后，中国军官甘英由陆路抵达波斯湾头时，帕提阿人力劝他不要作去红海的尝试，于是他没有接触到埃及人或地中海就返国了。在二世纪，同南亚和西亚打开了海上贸易之后，货物似乎是先从安南运到锡兰和南印度各口，然后再转运到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城。大约在公元222年，一个中国人称之为秦伦的罗马人抵达南京；之后约六十年，据现在推定是由加勒斯或戴克里先派来的第三次使节自罗马帝国抵达中国。至于这个使节究从陆路还是从海路而来，则不得而知。

① 一译安都。——译者

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的海路通商至少在五世纪之初已经存在,因为佛教僧法显在414年就是从印度航海归国的。在四世纪末以前,锡兰的一个使节大约从陆路来到中国。在五、六两世纪中,其他使节则由海道而来;后来锡兰的统治者列为中国的藩属。在整个中世纪,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因素实足以维持中国、西藏和印度间的关系。佛教僧法显、惠生、玄奘和义净分别在五、六、七、十各世纪所著的旅行记,可列于任何最著名的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

17

阿拉伯人在中国

据说早在五世纪,中国船舶就远航到波斯湾,并溯幼发拉底河而上,直至巴比伦古城西南的希拉城①,这就是后来同阿拉伯人进行贸易之所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唐史对于中国船员去幼发拉底河的路线都作了记述。到了八世纪中叶,从海道而来的阿拉伯人,为数之多,已足以对广州本身实行袭击和洗劫。在这个时期,杭州大概也有阿拉伯人的踪迹了。在这同一世纪的初期,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东渐和北渐,阿拉伯同中国的北路陆上贸易也已经开始。到七世纪,在唐代勃兴的前夕,中国在中亚细亚已经声威复振,堪与汉代相比拟。国势之盛,已威震波斯四境;然以伊斯兰教势力崛起于西亚和中亚,以致为期不久。据闻,由于阿拉伯人的势力及其威胁性的态度,在713年派赴玄宗朝廷的使臣十二人,一律免行叩头礼,即藩属表示臣服的大礼。

大约在公元787年时,西藏人已使德宗皇帝深感棘手,不得不试图与维吾尔人、一些印度王公以及伊斯兰教哈里发结盟,以为抵御之计。十一年后,哈隆·阿尔·拉希德②遣使来中国,使

① 一译于罗。——译者

② 哈隆·阿尔·拉希德(Harun-al-Rashid),中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译者

臣都行了叩头礼。此外，在宋代时，哈里发派来的其他使节则先后在 974 和 1011 年抵达中国。

2.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

宗教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宗教的动机对文化交流和新思想的输入东方，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如在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情形一样。过去二千年间佛 18 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布对中国、朝鲜和日本文化上的影响，还没有加以充分的评价。上文已经提到中国佛教徒的陆路和海路的旅行，现在应该谈论一下另一种东方宗教的传入中国。

景教在中国的流行

1625 年陕西西安城附近景教碑的发现，给唐代基督教在中国传布的情形一个新的说明。碑文中提到一个叫作阿罗本的僧侣在 635 年太宗朝代抵达中国，旋奉钦准，开始传教。二百年间，其教盛行于一百个城市，继而则遭到长期的查禁，至公元 1000 年，殆已泯没无存了。

然而在中亚的游牧鞑靼人中间，景教传布得很快，当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汗入主中国时，景教徒重又人多势盛了。忽必烈对于基督教的友好，一如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且在 1289 年专设一政府机关①，掌理基督教事务。这时在大都——即北京——和黄河边上的宁夏地方都设有主教区。证诸中国的一个蒙古人雅巴拉哈三世②（1281—1317 年）在巴格达任教务大总管达三十六年之久一事，可知景教的昌盛和势力的广被。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景教由于迁就其他宗教和哲学体系，在精神上已大为削弱。结果当天主教教士在元代开始来华时，发现景

① 即宣政院。——译者

② 雅巴拉哈三世（Mar Jabalaha Ⅲ），系维吾尔人，原名麻可斯（Marcos），任契丹大主教，后改此名。——译者

教教义及其代表人有很多可批评的地方，而后者对他们也表示反对。

当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的前夕，正树声威于中亚细亚的时候，天主教传教士几度试图由陆路至中国而未果。其中有季奥旺尼·德·皮阿诺·卡皮尼和基洛姆·鲁布鲁基二人，这两个人都是圣芳济会僧人，曾在十三世纪中叶到达喀拉和林或其附近的蒙古朝廷，但未能抵达中国。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兄弟是这两个旅行家的同代人，他们大约在1265年抵达忽必烈汗的朝廷。忽必烈汗因欢喜他们的人品并很想借西方文明来教化他的粗野的追随者，于是派他们返回欧洲，赍信教皇，要求他派来大批能传授宗教和科学真理的教士。不幸，教皇格列高里十世无法选派一百人，而只派了两名僧侣，但是这两个多密尼克会教士又复畏惧旅途的艰险，甫登征程就缩回去了。这样，使中国基督教化和传布西方知识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竟失之交臂。随同这两兄弟回到中国去的，是尼科洛的儿子马可，当他在1275年到达时，年方二十一岁。忽必烈汗对这个青年的印象之佳，正无异于过去对马可波罗的父叔，而马可娴习朝廷语言的敏捷，使他能很快地得到忽必烈汗的欢心。他曾多次奉派出差，因而获得了安南、交趾、缅甸、西藏、蒙古和中国各地的知识，关于这类的知识，至今知者仍属寥寥。他有一个时期曾经治理扬州那个重要城市。侨居十七年之后，波罗氏父子叔侄离华归返威尼斯。几年后，构成中世纪东方知识的主要的和最饶兴趣的资料之一的《马可波罗行纪》，笔录竣事。其影响的深远，是无法估计的。

波罗氏在中国

19

《马可波罗行纪》

在波罗氏离华后的五十年之间，由于蒙古人的武功，往中国的道路畅通无阻。十三世纪时，在底格里斯河两岸可以看到中

佩加洛蒂

国工程师;在大不里士也有中国星相家和医生的足迹。马可波罗本人曾经提到一个受雇于忽必烈汗帮同制造机械火器的日耳曼工程师。佛罗伦萨市巴尔底公司经理弗朗切斯科·巴耳杜契·佩加洛蒂在1340年著书写道,“由塔那至契丹,无论昼夜,行旅绝对平安。”佩加洛蒂是编纂近代东方商业与旅行指南的先驱。他记述了自亚速海取道阿斯特拉罕、基发、查克萨提河畔的20 斡脱罗儿①、伊犁的固尔札旧城②和甘肃的甘州一直到杭州和北京的那一条路线。在十四世纪时,传教士、工匠和商人在这条通往中国的道路上,往来络绎不绝。

总主教约翰·芒特·科维诺

除陆路之外,尚有海道可通。波罗氏三人在1295年由海道返抵威尼斯;刚刚在这之前,另一名圣芳济会僧人约翰·芒特·科维诺由南路海道至中国,转往北京。这个坚韧不拔的传教士在中国京城传教约三十五年之久,建了两个大教堂,受洗者达数千人。1307年修道僧约翰任第一任北京总主教,后来他又有了几位副主教和修道僧襄助他的这项伟大事业。他辛勤努力的结果也不仅限于北京一地:在福建的泉州、在扬州以及在其他各地也建立了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在总主教约翰逝世时(大约在1328—1329年之间),据估计,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已不下十万。十年之后,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曾遣使至意大利阿维尼翁城的教廷。教皇则派佛罗伦萨市的一个圣芳济会教徒马里格诺利赴北京报聘。马里格诺利于1342—1346年以教皇专使的身分驻留于北京。他是中世纪到达中国的最后一个具有重要性的欧洲人士。

① 沿用《元史·太祖本纪》旧译,《地理志》作兀提剌耳。——译者

② 固尔札新城,汉名宁远,新旧两城均在伊犁河畔,相距二十六至二十八哩。——译者

到十四世纪中叶，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已经衰微了。随着成吉思汗的胸襟开阔的后裔的失势，中亚细亚的伊斯兰教徒又复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障壁。传教士和商人的陆海孔道一并被封禁。明初的汉籍统治者并不奖励外国人的来华，然而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以及外交关系却始终未完全断绝，而且在明代（1368—1644 年）后期更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三章　近代欧洲人的来到远东

1.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中国

十六世纪的远东

十六世纪通常被认作是欧洲史上近代的开端；因为差不多同样的理由，十六世纪也可以作为东亚的一个新的近代时期的开始。在欧洲，查理五世、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东方，明朝的统治者正德和万历，日本领袖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以及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也都是一时的人杰。正如新通商航线和新土地的发现对欧洲具有影响作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前来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也在远东各重要国家内政外交上开一新纪元。

葡萄牙人的初到中国

西方海洋国之中第一个同中华帝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是葡萄牙。1511 年，阿耳布凯尔克攻灭了当时成为国际贸易重要据点的马六甲；五年之后佩雷斯特雷洛搭乘一艘本地造的船只驶往中国，作试探性的远征。1517 年，啡瑙·佩雷兹·德·安得雷德①率葡萄牙船和马来船各四艘驶至现在称为圣约翰岛的那个上川岛②，遂在港内下碇。安得雷德获准率船两艘溯河至广州，同行的有奉果阿总督之命往聘中国皇帝的使臣皮来资。安得雷德待人接物尚称谦和；1518 年他的兄弟西芒·德·安得雷德率帆船一艘沙船三艘抵上川岛，此人经营贸易的作风，却把自己的

① 胡宗宪《筹海图编》作甲必丹 (Capitao)。——译者

② 陈伯陶《东莞县志》第 31 卷，第 10—11 页，作屯门；葡萄牙文学家巴罗斯所著《亚细亚》一书，亦作屯门 (Tamang)，上川岛疑误。——译者

贪婪、对中国人的偏见和专恣暴戾的性格表露无遗。他建筑了一座堡垒，并且擅自行使刑事管辖权；这样就迫使中国当局不能不对他采取敌对行动。他被围困在港内，但于1521年逃出重围。在这期间，他的兄弟啡瑙早被驱逐出境，至于那位堂堂的使臣皮来资，则已锒铛入狱，并于1523年死于狱中了。1522年，奉派往聘中国皇帝的使臣阿耳芳索·马丁·德·梅洛到达圣约翰岛，但遭到袭击，船上所有的人几乎完全被消灭；少数劫遗逃到浪白滘，他们在那儿建立的一个葡萄牙贸易站一直维持了半世纪之久。大约在1517年前后，马斯卡林纳绕道圣约翰岛而到达福建沿海一带；他和后来其他的人们相继开辟了泉州、福州和宁波三地的贸易。葡萄牙人在宁波已经建立了一个侨居区，建立的年月虽不能肯定，但在1533年时就据说是已经非常繁荣了。几年之后，宁波和泉州两地的贸易都渐趋没落。

22

1552年，果阿总督遣使往聘北京朝廷，但是中途为马六甲总督所阻，拒不允许前进。1667年果阿方面又派出第四次使节，拟对中国皇帝直接下令封禁澳门贸易一事，表示抗议，但是不得要领而归。麦德乐领导的第五次使节在1727年来华；这个使节虽同中国皇帝交换了礼物，但是在开辟商务问题上却不比1753年的第六次使节有更多的成就。在中国人看来，使臣原是来朝贺进贡的，他的责任是恭聆圣训，而不是擅请议约。这位使臣依照欧洲习惯，跪领了皇帝的赏赐。

澳门的葡萄牙居留地

1557年，葡萄牙人靠了惯常的行贿办法，获准在阿妈港的"荒岛"上搭盖篷舍，晒藏商货①。这个"岛"实际上是一个半岛，

① 以上是根据品托 (F.M.Pinto) 的记述；但是马礼逊的《中国大观》一书中却说1537年欧洲人已经在那里有了临时的篷舍；并且苏札 (Manoel Faria e Souza) 在他所著《葡属亚洲》(Asia Portuguezu) 一书中也说：这个贮藏所是1558年重新 (de novo) 在澳门建立起来的。

1573年中国当局以绑架拐骗之风甚炽为由，横贯这个狭窄的地峡修筑了一道城垣，并设了一个关闸以作为进口。葡萄牙人只是靠了经常行贿，才能在澳门立足的。

葡萄牙人曾要求将澳门划出中国管辖之外，但是直到1887 23 年为止，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允准。自最初时起直到1849年哑吗嘞理事官事件时止，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县完纳地租，这正是对主权的完全承认。关于管辖权问题，据记载，在1587年以前中国向来派有一名官吏，奉皇帝之命，治理该城。这个官吏驻扎在澳门，凡事涉中国人的诉案，一概归他处断。迟至1690年，香山县还是亲自审理澳门境内的案件。1744年，香山县设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专理澳门事务，1800年这个海防同知移驻澳门，行使其管辖权。1749年，葡萄牙人签署了一项协定，其中规定，凡有凶杀案件，应由中国官员于相验之时，讯明确切，检证转报广州作最后裁决；又规定，非持有香山县县丞凭缴费收据所发给的许可执照，一律不得在澳门营建或修缮房舍、码头或炮台①。但是后一项规定，在1843年被耆英取消了。

澳门港口的财政管辖权，也同样操在中国手里。葡萄牙的贸易虽已衰落，但澳门却繁荣起来了，在中国的监督下，渐渐成

① 1749年，同知张汝霖与香山县令暴煜详筹善后事宜条议以上。葡使庇利那(Anthony Pereira e Sylva)以为便，台府敕沥诸石，汉番文各一具。其第五条规定："夷犯分别解询。嗣后澳夷除犯命盗罪，应绞斩者，照乾隆九年定例，于相验时讯供确切，将夷犯就近饬交县丞，协同夷目，于该地严密处所，加谨看守，取县丞钤记，收管备案，免其交禁解勘。一面申详大宪，详加复核，情罪允当，当即饬地方官跟同夷目，依法办理；其犯该军流徒罪人犯，止将夷犯解交承审衙门，在澳就近讯供，交夷目分别羁禁保，听候律议，详奉批回，督同夷目发落。如止杖笞人犯，檄行该夷目讯供，呈复该管衙门，核明罪名，饬令夷目照拟发落。"又第七条规定："禁擅兴土木。澳夷房屋庙宇，除将现在分别勘查，造册存案外，嗣后止许修葺坏烂，不得于旧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违者以违制律论罪。"见《澳门记略》，第40—42页；《香山县志》，第4卷，第99—100页；《粤海关志》，第6卷，第5—9页。——译者

为所有各国对广州通商的根据地。一切进口船只都在澳门雇用引水和买办,也都在那儿办理出口手续。贸易商在每一季度之末,都从广州商馆回到澳门,就在澳门等待下一季度的到来,以便再进入广州。

直到葡萄牙人在东方出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交往方才开始。当葡萄牙人不断在东半球扩张势力的时候,西班牙人正在探索新大陆。教皇的分界线是他们在东方扩张的一道鸿沟。虽然在1521年麦哲伦远征队已经到过菲律宾群岛的南部,可是直到1543年西班牙人才占领了这个群岛。1565年腓力浦二世派去了一支舰队,1569年累加斯佩海军上将发现了吕宋岛,而这却是中国人早已知道,并且是通商很久的一个地方。两年之后,马尼拉建成。过去中国人同葡萄牙人最初的接触是在马六甲;现在同西班牙人最初的接触则是在菲律宾。

西班牙人的到达

1574年,逃避中国水师提督追击的中国沿海巨寇林凤,进犯马尼拉,但被击退。追踪海盗的中国官员①随即到达马尼拉,在他得知经过情形之后,就请菲律宾总督派遣使者二人访聘中国。1575年7月,有两名西班牙僧侣亟想得到这个在大陆上宣教的机会,于是应邀前来,一名是不惜身为奴隶而来到中国的那瓦人②赫拉达,一名是墨西哥人马林。他们很受礼遇,并且被送到水兴谒见总督,他们对总督行了跪见礼,但一无所获而被遣回马尼拉。葡萄牙人反对西班牙人与中国人通商,然而不到几年的工夫,西班牙人在广州所得到的通商权益就使葡萄牙人大为恼怒了。

24

① 即福建把总王望高。——译者

② 那瓦(Navarre),西班牙北部古国。——译者

中国人在菲律宾及其所受待遇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两国人民间的重要关系最初是在菲律宾而不是在中国本部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和菲律宾人之间早期贸易向在海上进行，当地人出海来直接从沙船上购买中国货物。直到1588年，中国人才在西班牙人的保护下开始在岸上定居。到了十六世纪末叶，中国人在菲律宾的人数之多以及在马尼拉方面贸易上的成就，使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同样地起了猜忌和畏惧之心。从墨西哥带到菲律宾的大部分财富都流入了中国，而并没有使西班牙人得到多大好处，加之，在马尼拉对中国人的贸易，似乎已经使西方人无须再去大陆，而这却是他们所不情愿的。马尼拉的贸易大部分掌握在福建人手里。他们的地位和策略引起了当地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恐慌和猜忌，以致1603年菲律宾有普遍屠杀中国人的情事发生；丧失性命的约二万人。可是中国人的人数又复增加起来，而1639年的另一次大屠杀竟杀掉了当时旅居菲律宾的三万三千中国人的三分之二；但是他们的人数仍旧有增无减。人们都认为，后来到广州进行贸易的一切外国人所以会受到那样的待遇，这两次和后来的几次屠杀以及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中国人实行的严格限制是主要原因。西班牙人本身同中华帝国进行的贸易虽微不足道，但是1803年牛痘接种法输入中国之功，却是非他们莫属的。

25

2. 耶稣会教士的来华

关于中世纪景教徒和圣芳济会教士的一番事业，上文已加叙述，关于1575年抵达中国的两名西班牙僧侣所具的浓厚兴趣也刚刚提及。二十几年前，在1552年，曾经在印度和日本工作过而以开辟中国的基督教工作为宏愿的圣·弗朗西斯·克萨维埃尔，在上川岛或圣约翰岛，也就是啡瑙·德·安得雷德最初进

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的兴趣

入其港口的那个岛登陆。因为葡萄牙人反对，这位僧侣被阻不得登上大陆，而终于死在这个岛上。四年之后，葡萄牙修道士克鲁兹到达中国，但是随即被驱逐出境。亚历山大·瓦林纳尼在去日本的途中(1579年他以耶稣会总视察的身分在日本登陆)，路过澳门，勾留了十个月。他亟盼能在中国开始基督教工作，并且致函印度，请求至少派一名僧侣来担任这件事。翌年，罗明坚抵澳门，1581年伟大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到达。利玛窦决意以文学和科学为桥梁以投朝廷和公卿显贵之所好。1599年初，离南京而前往北京，但是中日两国正作战于朝鲜，因而未能觐见万历帝。于是回到南方，直至1601年方得呈献贡物，深蒙皇帝嘉纳，因而准许欧洲教士赁屋居住，各献其所长。尽管礼部叠上弹章，而利玛窦仍在京师勤劳了九年之久。他以西方风土人情、科学和宗教的知识介绍给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他绘制了一幅《万国舆图》，即世界地图，以期约略说明中国和世界其余各地的真正关系，但是在这幅地图上，他还是把中国放在正中。利玛窦及其追随者的风采娴雅、博学多文，加之他们的那些精深的写作，使朝廷印象之深，殆为其他任何人物所未曾有，以致不到四年的工夫，信教者已达二百人，其中还有著名学者三人。他们和利玛窦共同从事翻译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书籍，并且出版了数学、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新著。1611年，西班牙籍耶稣会教士庞迪我曾奉派偕同另一个僧人熊三拔修订历法。利玛窦死于1610年，多由于庞迪我之力，皇上在阜城门外赐以墓地；这个墓地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传教士在中国取得的第一座教产。

1581年—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

26

利玛窦死后二十年，一名德籍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甚至比他的伟大先驱还更加有影响力。在这期间，由于礼部的仇视，传教

士和教徒曾经遭过一次迫害。靠了因利玛窦而信教的某些士大夫的友情，连同教士本身所表现的科学方面的知识，他们的事业才得以保全，到1622年，禁教的上谕也撤销了。1630年前后，在北京实行统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派汤若望和罗雅谷任职钦天监①，鉴于十三省之中约有传教站三十处之多，这个时期耶稣会教士的劳绩和他们的成就，当可想见一斑。

汤若望

久以精通制炮术知名的汤若望，在崇祯皇帝登极之后不久，就奉上命帮同铸炮，用以抵抗鞑靼人。这位教士并不认为这种作法是同他的传教事业没有矛盾的，但是，因为不愿以耶稣会教士在朝廷中的地位为孤注，他终于建立了一所铸造厂，并且铸造了二十门大炮，其中大多数能放射四十磅的炮弹。1644年，汤若望在抵抗侵略者的明朝军队中任幕僚；可是在满洲人夺到皇位之后，他颇得清朝的欢心，并奉派为钦天监监正。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对于他的宗教事业颇多帮助，据说他不久就有了一万二千名信徒。后来他遭迫害下狱，1666年困顿以死。

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尽之后，因为满洲人在广东和广西两省一时尚未能得逞，皇室人员逃到了南方。据说在明朝瓦解之前，皇族中已有一百四十人受了洗礼，崇祯的先皇的寡后也是受洗者之一。这时在南方有两名耶稣会教士帮助明室的那位孑遗，一是奥地利人瞿妙微，一是波兰人卜弥格。最后一位志在复明的皇裔永历的母亲、妻子和儿子都受了洗礼，他们决定遣使往见教皇和欧洲各天主教国王，请求援助。卜弥格经水陆跋涉，在1652年年底抵达威尼斯。这时耶稣会教士在威尼斯大受排斥，所以这位大使奉上级之命申请驻威尼斯的法国公使保护。

27

耶稣会教士和明室的孑遗

① 钦天监(Astronomical Board)，明清时代官署名。职掌天文、历数等事。——译者

后来法国所以援其对伊斯兰教东方的基督教徒行使保护权之例，而要求对远东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团体行使保护权，就是以此为嚆矢的。1655 年，卜弥格和后来赶到的一位中国官员曾蒙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和参议会接见。于是他们继续向罗马进发。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虽优予接待，然而却无法给以任何物质上的援助。倘使澳门的葡萄牙人或者欧洲的教皇和各天主教国王能助明室一臂之力，则中国俗界史和宗教史之迥然不同于今日，是大有可能的。

法国要求对东方天主教传教团体实行保护的由来

在北京，继汤若望而起的是比利时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南氏颇得康熙 (1662—1722 年) 的欢心。康熙先是对他的数学知识加以严格的考验，继而授以钦天监监正的职务。南怀仁著《康熙永年历法》，呈献给皇上，并且著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和汤若望一样，他也曾为他的主上制造大炮。葡萄牙人在中国势力的衰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劝请路易十四选派法国教士到清廷。路易十四正汲汲于想从对华关系的发展中得到实惠，因而鼓动组织一东方贸易公司，以与荷英两国的公司相竞争。1685 年，他派了六名教士到远东，其中有五名到达北京，并在北京建立了著名的法国耶稣会。从这时起，法国人一直是列名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林的。虽则有时遭到严重的灾祸，然而历经乾隆一朝 (1736—1795 年)，耶稣会教士多少总还保持住一点皇上的眷顾，迟至 1822 年，他们还是和钦天监相提并论的。

南怀仁

28

早在 1631 年，多密尼克会教士即进入中国，在福建省开始工作，但是几年之后他们一度被逐出福建。耶稣会教士所行的策略，引起了多密尼克会教士和踵随多密尼克会教士而来到福建的圣芳济会教士的严厉批评。关于“上帝”一词的中文译名是

教仪之争

否正确，以及耶稣会应否容许教徒祭祖祭孔的著名的教仪之争（大约在1635—1742年之间），因此而产生。双方诉请教皇裁决，教皇克力门十一世不直耶稣会教士。这项裁决使康熙皇帝大为震怒，因为他所表示的意见恰恰和教皇的意见相反。可是这些聪明而虔诚的教士又渐渐地博得了康熙的欢心，准许他们继续进行俗界和宗教的工作。当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开始大规模发展时，中国士大夫阶级中所传布的那一点关于西洋各国及其民情风俗的知识，大部分是那些在中国朝廷经年累月孜孜不倦的耶稣会教士的劳绩。康熙的继位者雍正，排斥并查禁基督教。1724年，下令驱逐基督教教士，没收教堂，但尽管如此，教士并没有扫数离开京师。1773年，耶稣会本身奉教皇之命解散，会产由拉撒路会教士接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切断了经济上的接济；后来，耶稣会虽于1814年重新成立，而嘉庆皇帝（1796—1820年）的查禁，实际上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中断达半个世纪之久，此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则开创了晚近的新局面，在这期间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双方的努力，是并驾齐驱的。

3. 日本和欧洲人的早期关系，1542—1593年

导致日本同西方发生接触的三个有关人物，上文已经提及。那三个人就是马可波罗、弗朗西斯·克萨维埃尔和亚历山大·瓦林纳尼。世所共知的最早的关于日本的报告，是由马可波罗寄到欧洲的。虽则他本人从未游历过日本，但中国使臣早在五世纪就到过该国，而且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至少进行过五百年的贸易，所以他常常听说到日本。加之忽必烈激于雄心大志，并愤于日本海员对中国沿海的海盗式袭击，曾在1274和1281年之间两次派大军远征日本，企图收日本为朝贡国，然而两次都遭

29

欧洲对日本发生兴趣的由来

到可悲的失败。哥伦布虽未能发现去日本的航路，但是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却在抵达中国之后不到一代的工夫就来到了日本。在1542或1543年(准确的日期现在已不能肯定)，载有三个葡萄牙人的一艘沙船，在从暹罗驶往中国的途中，被暴风吹到日本西南部的种子岛。船上有一个中国人替本地人和欧洲人充作翻译。这些欧洲人颇受日本人的优待，这时日本人第一次认识了火药和火器。他们所得到的那两支铳枪就变成了制造新战争武器的模型。

被咒骂的义满织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首都是京都，为帝国名义上的元首天皇的驻在地。天皇尽管象系出神明的统治者那样的受人尊敬，然而却没有什么实权。国家组织和行政机构是七世纪时取法于中国的；国家本身则是由若干地方豪族在封建的基础上进行统治，其中藤原氏、源氏、平氏、北条氏和足利氏自七世纪起直至十六世纪相继当权。1192年，源赖朝接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这个称号，连同其实际上的帝王特权，这时已变成为世袭的了，并且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方才罢废。在十六世纪欧洲人出现于日本的时候，名义上是足利氏的将军们统治全国。在日本，足利氏第三代将军义满(1368—1393年明朝开国皇帝洪武的一个同时代人)的名字至今还被人咒骂，因为在忽必烈的军队战败约七十五年之后，他竟向中国纳贡称臣，接受王的封号，并听任日本列为中国的朝贡国。这种作法虽然带来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段友好关系，却助长了中国对一切外国所抱的倨傲态度。

30

织田信长　丰臣秀吉　德川家康

从十六世纪后半叶日本的混乱状况之中，日本历史上三位最伟大的人物起而当权了；那就是源氏的织田信长，农民的儿子丰臣秀吉和平氏的苗裔德川家康。在这里只能叙述一下这三个人的生平之中与日本国际关系有关的事项。所有这三个人都是

扶植对欧洲人的贸易的，并且有时还准许他们传教，因为宗教活动和商业活动是相互纠结而不能分开的。

圣·弗朗西斯·克萨维埃尔

在紧接着葡萄牙人发现日本之后的几年中，葡萄牙商人在日本群岛最西端的九州岛上所经营的贸易，颇极一时之盛，甚至一直深入到当时规模之宏大为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所不及的京都。1549 年 8 月，弗朗西斯·克萨维埃尔抵达鹿儿乌，他是应某藩主和一个前往果阿的名叫弥二郎的日本旅行家之邀而进入该国的。萨摩、平户和丰后的藩主，既想发展海外贸易，又看到葡萄牙商人对克萨维埃尔的尊敬，所以给克萨维埃尔一行人等以热诚的接待，并且任由他们在各自的藩内布道。克萨维埃尔在日本逗留了二十七个月；他在同伴们的帮助下收了几个信徒。

长崎这个小小的渔村在 1567 年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据点，结果一日千里地发展起来。藩主一旦信教，他们的臣民往往跟着就有很多人受洗，其中且颇不乏佛教僧。到 1581 年年底，即克萨维埃尔初抵日本的一代之后，教徒的人数据说已有十五万，其中五分之四则是在九州。教堂共计不下二百所。

十六世纪日本赴欧洲的使节

1579 年，因访问澳门而对中国发生了兴趣的亚历山大·瓦林纳尼，以总视察的身分抵达日本。三年之后，他组织了一个由四名贵族青年组成的使节团，分访里斯本、马德里和罗马，他们在每一个城受到了优礼的接待，并且对十六世纪欧洲的光辉灿烂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31

在这个时候，日本的佛教僧侣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已经堕落到不堪的地步，虽则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在设防的寺院内的力量还很强大，足能给 1568 年已成为日本最有势力人物的织田信长以种种牵制。佛教徒自己在宗教见解的问题上既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所以对包括克萨维埃尔本人在内的耶稣会教士所取的

不容异己的态度大为震怒。1565 和 1568 年的反基督教的谕令，大都是受他们的影响而颁发的。可是信长乐于将强大的佛教徒的一切敌人扶植起来，给基督教教士及教徒以援助和保护，为期达十四年之久。1582 年信长去世，秀吉和家康始大露头角：前者一直有日本拿破仑之称，后者则是统治日本达二百六、七十年 (1600—1867 年) 的德川系将军的创始人。

秀吉和耶稣会教士

秀吉照顾耶稣会教士约有五年之久，继而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奠定了势力之后，就在 1587 年发布了一项布告，加给教士以宣传"违背日本法的法律"和毁坏庙宇的罪名，限令他们在二十天之内离境，违者处以死刑。他显然是怕耶稣会的宣传影响到帝国的安全。少数耶稣会教士前往中国，但是大多数还是留在幕后半秘密地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翌年，葡萄牙使节明告秀吉说，传教事业的中断必会破坏对外贸易；因而教士重又准许入境。到 1595 年，日本计有耶稣会教士一百三十七人，教徒三十万，其中还有几位藩主。

十六世纪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

菲律宾的圣芳济会教士和多密尼克会教士对日本只让葡萄牙人和耶稣会教士入境，久已心存嫉妒。然而格于格里高里十三世的敕书①和西葡协定的双重限制，却不得涉足于这大有可为的地方。得悉秀吉 1587 年的布告之后，他们就格外想把他们的事业扩充到这个北方的群岛。终于机会来到了。秀吉既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力量单薄，在 1591 年就致函西班牙的总督，要求他承认日本作为宗主国。两年之后，敝里系膀总督遣使报聘，使节中有圣芳济会教士四人。这几名教士瞒过了教皇以及

32

① 1600 年，克力门八世在圣芳济会教士的怂恿下，发布了一项文书，准一切取道澳门进入日本的教派，在该国传教。参阅史蒂芬斯、包尔顿编《历史上的太平洋》，第 476 页所载村上的论文。

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使节的身分踏进日本。西班牙总督的答复，对日本在菲律宾的宗主权问题未置可否，但表示愿发展这两个群岛之间的通商关系。

这几名西班牙教士随即获准往访京都、伏见和大阪，他们既不顾秀吉的布告和其他明文命令，也不理睬耶稣会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善意劝告，竟在那里以一种公开的甚至招摇的态度，开始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在京都建了一座教堂，等到另外三名修道士从菲律宾来到之后，又在大阪建了一所修道院；此外，他们还在长崎夺去了一所耶稣会的教堂。正如下一个世纪在中国的情形一样，这时他们在日本也是对耶稣会教士大加指责，并对他们的工作肆行阻挠。但是，在1593—1596年间，秀吉正聚精会神于更加重要的事项，无暇顾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日本帝国所处地位的各项有关问题，因而耶稣会教士和圣芳济会教士暂时都未受到日方的干扰。

4. 十六世纪日本的侵略朝鲜

日本和朝鲜的早期关系

依照中国和朝鲜的传统说法，在公元前1122年，即周朝在中国奠基的那一年，中国的一位贤者箕子，率同几千个中国人进入了这个朝鲜的蛮荒之地。他在这里奠定了秩序，传入了中国文化，并且被拥立为王，于是名这个国家为朝鲜。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治理国家之功是非他的这个朝代莫属的。在此后的十四个世纪中，国家常常为内忧外患所煎迫。据日本传统的说法，有一次外国侵略就是公元200年日本神功皇后的进犯；结果是朝33鲜应允每年向日本纳贡。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和文明，包括中国的书法和伦理学，通过贡使而传入日本。四世纪末，佛教传入朝鲜，至六世纪则又从朝鲜传至日本。

元朝的统治中国，给朝鲜带来了严重的苦难，因为朝鲜曾应元人之邀，助忽必烈征伐日本。自 1392 至 1910 年统治朝鲜的那个朝代的创立者李成桂是向明朝第一位皇帝进贡的义满的同时代人。和这位足利氏第三代将军一样，李成桂也向洪武(1368—1398 年) 进贡，同时奉到了中国的册封和中国的历书及历法。罢佛家之说而立儒教为国教，并从中国传入了明朝的衣冠。随着十四世纪末叶全国的统一和向明朝皇帝纳贡称臣，朝鲜就视中国为宗主国并赖中国以为保护了。他们不再向日本进贡，虽则偶尔还互派使节并且时常还有日本人驻留在朝鲜南部。

朝鲜，去中国的"道路"

两个世纪之后，秀吉强朝鲜恢复贡使。1590 年，即要求菲律宾承认其宗主权的前一年，他接见了一个朝鲜使节，备加凌辱；又致函朝鲜王，声明有征服中国之意，要求朝鲜出兵相助。朝鲜人不无幽默地答复说，以他而欲征服中国，无异是欲"以蚌壳量海，以蜂虿而欲穿龟甲"。对于日本所说只欲进攻中国，如肯假道，则绝不为害朝鲜云云一节，朝鲜人只答称，中国是母国，不能这样背弃。日本所面临的问题同 1914 年德国对比利时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区别。原打算借用两艘葡萄牙的重武装船舰连同其官员水手以为臂助，但未能实现。这对于船上没有大炮的 34 日本，诚属不幸。虽然有火器的日本人在陆上比较善战，但是仅以弓矢为武器的朝鲜人却能在海上称强。外交谈判正在继续进行的时候，秀吉就集结了三十万人的一支军队，其中有二十多万在朝鲜登陆，这是南非战争中的英国远征军以前历史上最大的一支海外远征军。秀吉以年老力衰没有能亲自领导远征。于 1592 年 5 月 24 日在釜山登陆后不到三个星期的工夫，侵略军已经占领了首都汉城；国王和他的朝廷仓皇北遁。派往援朝的一支五千人的中国军队，终于无能为力，匆匆撤退。

为了掩护后路和向前挺进，日人不但须控制陆路，而且非控制海上不可。当看上去仿佛强弱之势已定，朝鲜已陷于无可挽救的时候，一个新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在他所擅长的那一方面，也就是在海上的威风，正如秀吉部将在陆上的那样不可侮。这个人就是水师提督李舜臣，他以他的英勇、发明的天才、韬略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而跻身于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统帅之列。这位天才立志要发明一种战船，既能抵御敌人的夺取，又能抵御敌人的火攻，既能保护船上人员不受弓矢或火器的攻击，而同时又能采取攻势。在6月发生于巨文岛附近的一次战役中，李提督在"龟船"上出现，船所以这样命名，因为是仿龟的形状而建造的。"船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下面的战士和划手完全掩蔽起来的一个和龟背相似的铁板制的弓形甲板。一个峥嵘可怖的龙头昂然竖在船首，龙口大张，弓矢弹丸就从这个龙口中发射。船尾也有一处豁口，两侧各有六处，以供发射弓矢之用。在弓形的甲板顶上，筑有一条自船首至船尾的狭长走道和一条自一侧至另一侧横穿船腹的走道，但是在船背部的其他各处则钉满铁钉，所以敌人如胆敢登船，就立刻会被许多尖钉刺穿。因为这种甲板是铁[35]制的，船可以不怕火箭，这样船上人员作战的安全就无异于以一艘现代战舰同一百年前的木制战船交战的情形了。加之，这种船也是为取其快速而建造的，它能毫不费力地追赶任何船舶。这就使它加倍地可怕，因为敌人甚至欲逃跑而不可得了。"①

伟大的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

李提督的龟船

不到六个星期的工夫，李提督不但击败了而且实际上歼灭了秀吉原计划用来保护和接济其陆军的一切大大小小舰队。这位朝鲜提督切断了日方的交通线，破坏了它的护航队，并使它的

① 赫尔伯特：《朝鲜史》，第1卷，第376页；关于使用铁板一节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上文是征得原著者的同意而引用的。

侵略中国的计划完全归于破灭。深入朝鲜最远的一支日本军队，就是进抵平壤的小西行长将军所部的那支队伍。援军既无法从日本运出，随着冬季的到来，朝鲜已渐能采取攻势，因而侵略者被迫撤退到汉城。中国人帮同朝鲜人坚持游击战；日人因给养切断而被迫接受了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条件，终于在登陆一年之后，退出汉城而登船返国了。中国人没有监视协议切实履行，就引兵而去，但是日本人没有完全照中国人的办法行事，他们虽撤退了不少，可是秀吉的部下却仍坚守南海岸上的营寨不去。

中国册封秀吉的企图

1594年，日本使臣到达中国朝廷，同意应以中国皇帝册封秀吉、日人全部撤离朝鲜且永不再犯等项原则为基础，而缔结三国和约。耽延了很久之后，1596年10月秀吉在大阪接见中国使臣；中国使臣随身带来金印一颗、王冠一顶、蟒袍一袭和册封状一轴。当这种荣典的意义——也就是说他将列为中国的藩属——向他解释清楚之后，秀吉大怒。中国使臣被毫无礼貌地逐出国境，重新发动战争的准备随即开始。到1597年3月，朝鲜已有日人十四万多名。从上一次战役的惨败吸取了教训，这些岛国人已使他们的海军能发挥高度的效率。在另一方面，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却由于一次宫廷阴谋而被夺去了统帅权，朝鲜海军已陷于瓦解，以致这时就轻而易举地被击败了。虽然如此，中国人还是以陆海军来支援他们的藩属，继而李提督也重新起用了，他竭诚同中国提督合作。中日双方都源源不断地向朝鲜增援，但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取得一举而结束战争的胜利。然而在1598年10月30日，日人在尉山之役中斩馘三万八千七百人，并将他们的耳鼻割下送往日本，埋葬在京都的一个墓冢中。

36

在这次战役的六个星期之前，即9月16日，秀吉去世，他由于为国事积劳和生活上的荒淫无度，原已筋疲力尽，加之战事绵

秀吉侵朝之役的结果

延，不但没有带来光荣，而且终于折损兵员数千名之众，船舰数百艘之多，虚靡国帑巨万，这就使他更加焦头烂额了。他在临死之前曾嘱咐他的朋友和最终继位者德川家康说，不要让他的士兵"成为异域之鬼"。这样就结束了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徒然激起朝鲜人的仇恨，以致直到今天他们仍称日本为"天谴之国"，而并没有带给日本任何物质上的酬报。然而这却不是一场毫无教育意义的战争。在忽必烈征服日本的企图以及日本征服朝鲜和中国的企图之中，海洋始终是左右全局的因素。当三百年后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再度卷入纠纷的时候，日本人已不但具有控制陆路的准备，而且具有控制海洋的准备了。

5. 查禁基督教和日本的封锁
对外关系，1593—1641 年

据解释，秀吉所以有征服朝鲜和中国的企图，其动机之一就是这个打破封建制度、统一了全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为怕基督教徒及其葡萄牙和西班牙籍领袖们的势力日益滋长，而打算把基督教逐出境外，并为那些基督教大名①或藩主以及他们的藩士或武士在朝鲜寻求封地。小西行长是大名中之矫矫者，他在这次战争中以陆海将才而显扬于世；他所部的舰队曾掩护日人从朝鲜作最后的撤退。在最后一次海战中，也就是在李提督和行长第一次直接对垒交锋的海战中，李提督在酣战之中阵亡。这里对秀吉的动机所提出的解释或许是夸张其词的说法，然而不失为事实的是，秀吉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势力的日益滋长原不欢迎，而对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更大为震怒。

37

1596 年下半年，即第二次侵朝的前夕，发生了一桩意外，这

① 日本幕府时代的封建领主。——译者

桩意外不仅带来了法律上对基督徒的查禁，而且带来了事实上的迫害。船身既大而又满载货物的西班牙大帆船“圣腓力浦”号，在从马尼拉赴阿卡普尔科的途中，遭到台风的严重损害，并被吹到日本海岸，土佐藩主强迫船长驶入浦户港，船故意地冲上沙堤，致损伤背部。于是藩主很客气地把货物夺去，据称，依照日本国法，凡搁浅的船只应一律没收充公。他的这项措施得到了秀吉的支持，因为秀吉在8、9月间一连串的剧烈地震中，损失惨重，所以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牺牲西班牙人来弥补一部分损失。这时秀吉得悉西班牙教士目无法纪的行为，就下令将他们立刻逮捕。“圣腓力浦”号的领港，想吓唬一下日本人以图挽救自己的船货，便在一幅世界地图上指出腓力浦二世的广阔领域。于是有人问到怎样能建立起如此广袤的一个帝国。他回答说：“我国历代国王总是先派教士到他们想要征服的国家，劝人信奉我们的宗教，一俟取得相当的进展，就派军队去同这些新基督教徒里应外合，然后我国国王不须吹灰之力就可以竟其全功了。”这种轻率的、不正确的说法直接呈报到了秀吉那里，秀吉乃下令将六名圣芳济会教士、三名日本耶稣会教士和十七名本地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处死①；1597年2月5日他们殉道于长崎。

事关成败的“圣腓力浦”号

日本查禁基督教徒的原因

38

秀吉这时决意执行1587年的驱逐令并拆毁教堂了。1598年初，九州方面为数达一百三十七所的教堂一齐被拆毁，神学校和住宅也未能幸免。所有耶稣会教士都被集中在长崎，以待翌年押解到澳门。但是9月间秀吉逝世，使查禁工作暂陷于停顿。1600年，德川家康起而当政。起初他颇有遵循前任的计划之意，打算将凡是在帝国各地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圣芳济会教士、

1600年德川家康的崛起

① 所谓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就是将人绑在十字架上，用尖矛从两胁刺穿心脏”。人立刻气绝身死。

多密尼克会教士和奥古斯丁会教士一并驱逐出境。然而自始他就不想激怒散居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设若没有一个新的矛盾因素夹杂其间,事情未始不会长此以往勉勉强强地顺利发展下去。

1600年荷兰人的初来日本

1580年,葡萄牙在腓力浦二世的联合统治下和西班牙联结起来,这个联合一直持续到1640年。当时,里斯本是欧洲东方商货的主要集散地;葡萄牙人把东方贸易的收获物送到里斯本,然后荷兰人再从里斯本分运欧洲各地。天主教的腓力浦二世对荷兰的新教叛徒发动了海陆战争。同葡萄牙的联合给了腓力浦一个封锁荷兰船对里斯本港的贸易以危害荷兰人的机会;这项措施已于1594年付诸实行。既在欧洲被切断了供应,荷兰人很快地就决定在原产地打开东方的贸易。1600年荷兰船"德·利甫德"号抵达日本,船上的领港是一个英国人维尔·亚当斯。耶稣会教士一经发现这艘船的国籍,立刻斥为海盗船。可是家康却命令把亚当斯带到朝廷,随即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德川政府的造船官。直到十六年后家康去世时止,亚当斯一直同家康保持着友谊。他不仅造船,而且教授数学和天文,并充作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桥梁,在1613和1623年之间,英国人一直在平户①进行着贸易。

39

西徂秦的报告

1603年恢复了将军的称号,由德川家康担任,而德川氏则继续统治日本直到十九世纪帝权恢复时为止。家康很想鼓励对外贸易和对外交通,尤其是在业务上和外国宗教宣传毫无瓜葛的荷兰人和英国人的通商往来。他自认是一个佛教信徒;虽则在1602年他下了一道保护驶入港口的外国商船的命令,可是他在结尾说:"我们严禁他们(商船上的外国人)宣传他们的信仰。"

① 长崎北面的一个岛。——译者

他原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传布，而他派往欧洲考察宗教状况的代表西徂秦所提出的报告则更使他变本加厉。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那种学术和宗教方面不容异说的精神，连同偕以俱来的宗教审判和炮烙刑罚的因素，是不能不给来自当时象日本那样一个兼容并蓄的国家的人以不良印象的。

但是将军所以满腹狐疑也还有其他原因：他素来信任的官员之一，一个出身微贱的基督徒，被控有策划借用外国军队，推翻家康，阴谋不轨的举动。家康的一个儿子也牵连在这个阴谋之内。继而西班牙人又两次力劝将军驱逐荷兰人，并愿以船只相助；加之，一名西班牙船员和一名教士在获准测量沿海之后，又是那样迫不及待地急于进行他们的规划，致使家康大为诧异，于是向英人亚当斯探询其所以这样迫不及待的原因。亚当斯答复说，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这种举动在欧洲会认作是敌对行动的，并且补充说："罗马教士已经在德国的许多地方以及在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和英国被驱逐出境，虽则英国保全住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背叛的那种纯真的基督教，然而英国和荷兰人并不认为这种情况能给他们以任何理由，使他们得仅仅以某些国家是非基督教国为借口，而对那些非基督教国进行征伐或兼并。"后来在一个姓荒木的日本耶稣会教士访聘西班牙朝廷时，听说征服日本的计划正在讨论之中。诸如此类的意想不到的事不免使家康暗忖道："既然欧洲的君主们不宽容这些教士，那么我纵然拒绝给以宽容，也不算对他们处置不当。"1611年，基督徒被逐出幕府，两年之后有几名日本信徒被处死刑。1614年1月，下令所有日籍和欧籍的教士一体离境；教堂扫数被毁，教徒一律勒令退教。然而，将军本人在1616年去世之前，却不曾把任何一个欧洲人处以死刑。

维尔·亚当斯

40

十七世纪日本派赴西班牙和罗马的使节团

当欧洲教士和最著名的本地教徒正在由几艘设备简陋的中国沙船送往马尼拉和澳门的时候，家康的最大藩主之一伊达正宗派往访聘西班牙王的一个有六十个人的使节团却正在欧洲受着盛宴的款待。使节团曾经横渡太平洋到阿卡普尔科，历访墨西哥和哈瓦那，然后从那里渡海到西班牙。这个使节团一路前往罗马，在1615年10月到达。据公开声明，伊达正宗意在敦睦日本和西方各基督教国家的邦交。家康的1614年法令的公布，却使他的这位忠心耿耿的藩主一变而和基督徒势不两立了，在向教皇保罗五世呈递他的书信的五个月之前，伊达本身为表示对将军忠心起见，曾拒绝帮助一个在困难中的耶稣会教士，理由是这个人是基督徒。本节所提到的这些事故的错列杂陈，很象是下文所要读到的一百五十多年后蒲安臣使节的种种有关情形的一个蓝本。

十七世纪时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

当1620年伊达使节团回到日本的时候，对基督教的查禁正在雷厉风行之中。在1616—1637年之间，家康的儿子秀忠和孙子家光颁布了五道查禁基督教的法令。荷兰因为怀恨奉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并且希望取代他们的商务，遇有机会就设法置他们于嫌疑的地位，甚至不惜伪造信件，诡称是来自那些企图使日本沦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属国而阴谋杀害将军的日本基督教徒方面的。1624年，秀忠拒绝召见一个菲律宾使节团，并且下令将所有西班牙人一律押解到菲律宾群岛。禁止一切日本基督教徒出海经商，不许任何日本人游历菲律宾。西班41牙和日本之间已经持续了三十二年之久的往来关系，就这样被切断了。六年之后，有两名日本官员为帝国安全一劳永逸之计，曾计划征服菲律宾群岛；他们曾派遣间谍到马尼拉，而西班牙人却使这些已经为他们所怀疑的间谍，对他们的军事力量获得一

深刻印象。然而这时当政者已不复是秀吉或家康这类人物了，壮志宏图终成泡影。

在这些年份中，欧籍和日籍教士以及他们的信徒一直遭到最可怕的迫害；斩首、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倒吊在黑洞里以及浸在滚沸的硫磺池里等等，都是用以残害成千上万的信徒或是使意志薄弱的人背弃信仰的方法。1635 年 12 月颁布的一道法令，饬将西班牙人，包括教士在内，一体监禁，但是当局“不须对于中国人或葡萄牙人过分严厉”。翌年年中，家光的幕府五大臣发布了几道命令，严禁一切日本船只驶往海外，偷渡者处以死罪，凡从海外返国者立即处以死刑。荷兰人的图谋伤害葡萄牙人，是无所顾忌、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向平户的大名报告澳门举行十日公祭，追悼在日本殉道的耶稣会副大主教维耶拉时，他们徒自讨了一场没趣，所得到的答复是：“来函并不足以增加葡萄牙人之丑恶，而所谈的宗教仪式也不能给荷兰人以丝毫可乘之机。”然而，在 1637 年 10 月就有了另一道法令，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帝国内旅行，以防葡萄牙人冒用荷兰姓名的护照，混入内地”。

家光的锁国

两个月之后，九州岛发生岛原之乱。岛原和天草两处的封地受基督教感化向来比帝国境内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彻底，结果这里所受的迫害也最烈。既苦于这种迫害，又苦于无法忍受的捐税和封建领主的暴政，于是有二万名左右的男子和一万七千名妇女和儿童揭竿而起了，最后他们据守原城旧址。在那里，他们从 1638 年 1 月 27 日一直被围到 4 月 12 日。过去秀吉没有能得到他未始不能凭以征服朝鲜人的葡萄牙船只和大炮；一代之后，家光却比较幸运地得到了平户荷兰商馆主持人柯凯伯克尔的援助。此人曾奉命“不惜以任何代价来保全对日贸

岛原之乱

42

柯凯伯克尔

易”;所以他就把荷兰人的参加平乱引为己任了。他将装有大炮的船只停泊在没有危险的地带,在十五天之间,对被围困的基督徒投了四百二十六枚炮弹,当岛原在被围两个半月之后陷落时,少数的劫遗一并遭到屠戮。

这次叛乱是此后二百多年日本人彼此兵戎相见的最后一次。这也是此后二百多年公开信奉基督教的终结。被斥为制造叛乱的葡萄牙人终于被驱逐出境;在1640年从澳门派出的四名年高而有身分的葡萄牙使节和七十名随员中,只有十三个最低级的人得返回澳门,其他的人都被处死了。这些劫遗带回来一道命令:“今后,只要太阳照耀世界一天,就一天不准擅自前来日本,纵令以使节的身分,也决不宽恕,其永遵勿违,否则处以死刑。”

荷兰人在出岛

荷兰人这时奉命把他们商馆从平户迁移到长崎港内小小的出岛。他们——和少数中国人——在被切断了同日本本土及其居民的一切交通,在含垢忍辱和囚犯一样的待遇下,自1641年起获准在出岛进行通商,先是每年得驶来船舶七至十艘,但后来则只准一艘。

日本,一个遁世的民族,1640—1853年

在此后二百十三年之间,日本人民在德川历代将军的统治下,被切断了同外国的一切交通,防范惟恐不周:一度甚至外国书籍都不得携带入境。过去日本曾经鼓励学术和宗教的兼容并蓄和贸易的宽大自由,曾经派遣使节团横渡太平洋远赴墨西哥并转道至西班牙和罗马,其贸易商曾自由地前往中国、交趾、暹罗、东京和柬埔寨,其统治者曾抱有君临朝鲜和菲律宾的大志,43 这样一个国家竟一变而为一个遁世的民族了。倘使日本人民横渡太平洋继续其航程而至南北美海岸,越马来半岛而往南驶行,他们未尝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囊括美洲西部以及澳洲和太平洋各

岛的帝国。然而，自1640年起直到1853年潘理海军准将来临时止，就对外交通而言，日本一直是酣睡未醒。在另一方面，中国虽从不欢迎欧洲人，正如日本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情形一样，然而却不能也不愿切断这种交通。现在我们就必须转而谈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了。

6. 西欧人、北欧人和美国人的初抵中国 中国第一次对欧洲人的战争

荷兰人因1594年里斯本对他们船只实行封禁而无法间接取得中国的产品，于是在1604年派了一艘船径往广州——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在两年之前成立——但是由于澳门葡当局的影响，中国拒不准许通商。1607年的另一次试探，也是毫无结果。1622年，列也尔森率船只十五艘出现于澳门海面，以八百人登陆，以图发动进攻，但被击退，伤亡达三分之一，这位海军上将也在伤亡之列。荷兰军于是转往攻占澎湖。经过两年的或攻或守之后，他们撤往台湾。当时台湾是一个处于真空状态的岛屿，所以荷兰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盘踞了台湾府、淡水和鸡笼①，安营筑寨，作久居之计。1653年，他们再度试图打开对广州的贸易，但是葡萄牙人又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1655年，由杯突高啯和惹诺皆色所领导的一个使节团奉派前往北京。这两位使节是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而并不是代表荷兰政府的，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方面的种种要求，无一不予照办。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准八年遣"使"一次，每次得偕同商船四艘而已。

荷兰人初抵中国

台湾

十七和十八世纪荷兰派赴中国的使节

南明诸帝的坚决拥护者而尤以国姓爷知名的郑成功，由于在厦门他的大陆根据地上受到清朝的压迫，因此于1661年率领

44

① 今称基隆。——译者

国姓爷二万五千人的一支军队渡海往台湾。他所遇到的唯一抵抗就是来自荷兰人方面的，但是他把他们一举而围困在台湾府。经过九个月的围攻之后，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宣告结束。巴达维亚的参议会于是派了十二艘船到福州，会同清军进攻国姓爷；厦门为这支联合武力所攻占，这样大陆就尽归入清朝的控制之下，但对台湾，却未奏肤功。两年之后，即1664年，荷兰人以为那一番象对宗主国一样地忠心耿耿的宣勤效力是靠得住可以得到酬报的，于是派范和伦所领导的另一个使节团前往北京；使节团在一年之后到达。这位使臣虽然负着那种为清朝的利益——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立下的未竟事功的英勇战绩的威望而来，可是心里却盘算着自己同胞的商业利益，所以他对清朝种种要求的唯命是从，同十年前杯突高啮和惹诺皆色的情形，初无二致；然而，进贡和赏赐、跪拜和叩首——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取得特权的恩赐，而只落得将荷兰列进大皇帝的朝贡国名单而已。1683年，康熙皇帝渡海亲征台湾，将台湾收入版图之内。他曾经檄调他的忠顺的荷兰人派船相助；荷兰人虽然遵命照办，但是来迟了一步，船到之后才发现皇帝并没有等候他们的船只。此后一个世纪，他们每有机会在福建沿海各口贿买许可，就进行走私贸易。在1762年以前，荷兰人并没有在广州建立商馆，到了那一年，公行制度已经规模具备，少数外国人也就不足为害了。

1795年，荷兰又派遣了一个使节团，以德胜（又作余拣第生）和范罢览为正副使。他们注意避免重蹈英使马戛尔尼勋爵的覆辙。英使曾拒绝行叩头礼；而他们则甚至还准备就荷兰历次使节的所作所为再加以改进，无论中国方面要求对其宗主权怎样表示承认，也不惜一应照办。他们的这番出使，除去使中国人更加相信自己的文明是万民所应向化的文明，自己的帝国是

万国所应臣服的帝国而外，是毫无结果的。

45

早于1613年，英国人就已经和日本通商，在平户开办了嗣后于1623年关闭掉的那个商馆，但是他们对中国直接通商的第一次努力却是在16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持凭葡萄牙果阿总督所发的许可证，派"伦敦"号自果阿驶至澳门。由于葡萄牙澳门理事官的阻挠，这次贩运结果归于失败。翌年英国科尔亭会社①装备了一支远征队，由威忒船长率领，威忒于1637年6月27日率同帆船三艘、军用大艇一艘驶抵澳门海面。澳门当局生怕英国方面的竞争，对威忒多方阻挠。经过了若干时日的耐心等待之后，他就派了几艘小船自行探寻进入广州的航路，继而率船径驶虎门。在虎门他接到通知说，因为必须向广州当局请示，要求他等候六日；可是中国方面却利用这段时间来加强炮台。威忒因请准通商的要求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就启碇闯入省河，但遭到了炮台的轰击。他发炮还击，既平息了对方的炮火，就放船直驶广州，售出了自己的货物，并且装上了糖和生姜。中国方面把这件事说成是由于葡萄牙人贪图专利，妄进谗言而造成的，所以宽恕了英国的敌对态度。1664年的再一次尝试也归于失败。但是，到了1670年，英国人已经在厦门和台湾两地开始通商，在台湾方面的一切办法则是同岛上的主人国姓爷商定的。在这两处地方之中，以厦门的贸易为比较成功。1681年厦门商馆停闭，但于1685年又重新开馆；1683年清军的占领台湾则使英国对该岛的贸易宣告结束。

英国人出现于日本和中国

1681年，英国人又作了另一次开辟广州贸易的尝试，但是中国方面已经许葡萄牙人以专利，所以葡萄牙人不许英国人和其他一切外国人在贸易上略加染指。1685年，奉上谕大开海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

① 1649年该会社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译者

禁，准各口对外通商，就是在这个时候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而取得了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可是第一艘船却是在1689年派来的。1701年东印度公司试图开辟宁波的贸易；然而由于宁波所抽征的漫无限制的苛捐杂税甚至比广州还重，这次尝试未获成功。

46 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他们的对华贸易奠定在一个正常的基础上，要在广州建立一个具备常设人员的商馆，并且要定期遣派船只；但是从开始一直到1770年止，所谓常设人员不过是由按季随船前来的船大班构成的集体组织而已。从这时起，英国贸易史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史实际上就无异是广州商馆的历史了。

1793年马戛尔尼的奉使

马戛尔尼子爵的出使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决定；的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于这项决定是有顾虑的，它生怕对于纠正所受不公平对待一事求之过急或时机尚未成熟而坚请进一步的特权，反而会使中国政府心存戒惧，将对外贸易完全封闭，当时这项贸易固然是在极端艰苦和勒索不堪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却绝不想放弃。东印度公司虽然考虑到了要求补救未始不会因小失大，可是也并没有表示反对；于是这个使节团就在1792年9月26日自朴次茅斯启航来华，于1793年8月5日抵达天津河口的大沽。这个使节团所受接待的殷勤隆重，同葡萄牙或荷兰使节的情形恰成一鲜明的对照。

但是，中国朝廷下定决心对主要各点——也就是商务、进贡和跪拜——丝毫不能放松。护送使节团人员的车船都插着旗帜，上面写着“英吉利贡使”的字样。关于跪拜礼一节，中国方面起初非常坚持；最后商定，在觐见皇帝时，得止屈一膝——也就是他对本国君主致敬的礼节。至于商务问题，则自该使节8

月进京直到10月7日离京，没有一点得到解决，甚或根本没有讨论过。自离开北京之日起至离开广州时止的那段期间，也没有得到任何进一步的解决。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减轻广州贸易上的限制和苛征；但是这些限制和苛征一直继续到由战争予以消除而后已。另一个目的是要争取在广州以外各地——也就是在天津、宁波、舟山和其他各地——的贸易自由；但被断然拒绝①。英使此行，除去优蒙礼遇、备承款待、严受监视和殷勤遣送出境而外，一点真正的好处也没有得到。

47

1816年阿美士德的出使

虽然马戛尔尼的出使毫无成就，英国政府仍决定派遣第二个专使前来北京，其目的是要设法消除种种显著的不满并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个安全的基础上面，能托庇于皇帝的保护，不受地方当局的侵害。阿美士德勋爵奉派为正使，于1816年2月8日从朴次茅斯启航来华。新皇帝治下的中国朝廷，对于接待马戛尔尼勋爵的优礼已有后悔之意。阿美士德勋爵（他的船上悬着标明"贡使"字样的照例的旗帜）在从沿海到北京去的这段路上，不得不对于为叩头问题，也就是为规定向皇帝所行致敬礼问题的经常不断的争吵，安之若素。关于这个问题，这位大使所得到的指示是两歧的：英国政府曾授以便宜行事权，对于清廷所提要求，果能借此而完成使命，则不妨照办；但是公司的董事们却劝他在仪节和觐见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以免贬损国家的威望。阿美士德勋爵倒是始终保持一贯的态度，拒绝在这个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在8月28日抵达通州之后，这个使节团就不分昼夜地一路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兼程赶赴圆明

① 关于敕谕，参阅宓亨利：《中国近代史文选》(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 第1—11页（以后简称《文选》）。另参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第2卷，第213—254页。

园，于29日晨5时赶到。这位大使发现很多身着朝服的王公大臣们正在等待他，他们坚持要立刻带他去觐见，甚至于连拖带推。但是他将他极度疲惫的情形以及既没有备妥礼服，而尤其是没有携带国书的实情说明之后，不顾而去。这是一种大不敬，使节团中的每一个人立刻就接到了中国当局责令他们立即启程返国的决定。

阿美士德勋爵回到了广州。他已经为要求改良广州当局所惯用的办法而去过北京。他已经失败了。这时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英国只剩下三种选择：要么诉诸武力，强迫中国方面按合理的条件整顿贸易，要么绝对服从中国方面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要么放弃贸易。为了英国贸易的利益，但实则为了争取其他各国必然会一体均沾的利益，纵令立即诉诸武力，本来也是师出有名的，但是这一着却推延了差不多二、三十年。

48

法国贸易商在广州

自1660年起，法国人就派船前来广州，不过每次都间隔很久。1728年法国商馆成立，但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中，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小。法国领事旗是在1802年亚眠和约之后初次悬起的，但在1803年对英战争再起之后，又复扯去，直到1832年为止，没有再行悬起，虽则在1829年已经有一位领事获得承认。

美国人的插足远东贸易

在1784年，即凡尔赛条约缔结之后一年，美国人派了一艘船直接驶到广州，以前他们却一直是靠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照顾通过波士顿港而同茶叶贸易发生联系的。因为贸易成绩良好，美国船络绎而来。既得利于美国商人和海员所固有的冒险精神以及美国的不受特权垄断公司的种种限制，更得利于当时在西方国家中几乎只有美国人所享受到的那种为期达二、三十年之久的中立地位，美国贸易得到了飞跃的发展，随即在广州的商业界中占据了第二位。

其他在广州进行贸易的海洋国家先后有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汉堡人、不来梅人、奥地利人即比利时人、意大利人、秘鲁人、墨西哥人和智利人，但是他们的贸易始终是无足轻重的，并且在早期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论述的事件。

俄国人由陆路至中国

俄国在政治上和商业上所以同中国发生接触，是由于两国边壤相接的关系。第一次见于记载的俄国使节是在1567年抵达北京的，但是因为使臣彼得罗甫和雅里舍甫没有携带礼品（即贡品），所以没有能觐见皇帝，而只是由理藩院的低级员司给以非正式的接待。1619年宜完匹特灵到达北京，但是也以同样的理由，未蒙召见。1581年，耶尔麻克所组织的横跨西伯利亚的运动，造成1636年俄国人到达太平洋岸的结果。1653年派遣的第三次使节是由巴伊阔夫领导的，他在北京的时候，恰好荷兰使节杯突高啮和惹诺皆色也在北京。中国方面对于贡品和仪节向两个使节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荷兰人虽立即全部答应照办，俄国使臣却断然拒绝遵行任何有损国威的仪节，因此未蒙召见。在1658、1672和1677年都有俄国商队先后来到北京，但是以费多罗·额礼克谢·果罗文和维拉索幅为大使的下一个使节团却是沙皇在1689年派出的。

49

中国同一个欧洲国家进行的第一次战争

扩张中的俄国一直在向前推进，并且已经在两国之间未划定的边界上同中国人发生了接触。俄国军队在该世纪中叶进抵阿穆尔河[1]流域之后，就修筑堡垒（其中以雅克萨和卡马尔斯开—阿斯托罗格为最著名），开拓殖民地。1680年边界战争开始。汉人和满人围攻卡马尔斯开—阿斯托罗格，但被击退；于是攻雅克萨，克复了这个城，生擒俘虏很多。俄国人重建雅克萨城，旋又遭中国方面七千人的进攻，但是无功而还。于是两国在尼

① 中国人称之为黑龙江，东三省中的一省就是以这个江名命名的。

布楚，也就是涅尔琴斯克举行会议，中国钦使率同步兵一万，骆驼队三千、骑兵一万五千前来。中国和一个欧洲国家的第一项条约，就是在这支兵力的影响下谈判，并于1689年8月27日[①]签字的。条约中规定了俄国应将沿边哨站一律撤除，撤往额尔古纳河以北和黑龙江的分水线以外；设定了越境互市的条款，并且采纳了领事裁判权原则的最重要因素：如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人有越界犯法情事，应即送往其本国境内，解交其本国官员，"依罪处以死刑"。这个确乎含有与约双方君主和国家地位平等原则的条约形式，是意义深长的。条约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上都列出了两国君主及其使臣的全衔，并且厘定了"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这项条约结束了中国同一个欧洲国家进行的第一次战争。

50

十八世纪的中俄关系

1693年，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以大使的身分抵达北京。他受到了优厚的款待，但是在叩头问题上，据信他是遵命照办的。1720年伊兹玛依洛夫使节团来华。伊兹玛依洛夫同意遵从中国的礼节，条件是当中国皇帝派使臣到俄国时，使臣须奉旨遵从俄国朝廷所行的一切礼节；所请立即应允。1727年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伯爵奉派为正使，但是关于他到达北京一节却没有记载。8月，他签订了一项厘定恰克图附近中俄边境的条约[②]，10月又签订了分别厘定恰克图东界和恰克图西界的两项议定书。

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

在同一个月份，务拉的斯拉维赤伯爵在尼布楚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条约是因贝加尔湖以南恰克图这个地方而得名的，1728年6月，即在恰克图交换批准书。这项条约规定了恰克图附近两国边境的分界、越界互市贸易的进行、公文来往和使节的派

① 这些日期都是俄国旧历。

② 即布连斯奇界约，又称布拉条约。——译者

遣以及依照领事裁判权精神处理的罪犯的引渡(一如1689年条约所规定);并且在第五条中规定:俄国得在北京建一使馆,由俄国正教教士四人、青年四人及成年人二人常川居住,"学习语文"①。这同一条中也有"俄人照伊规矩传道和做礼拜,不得阻止"的规定。清廷曾于1724年令罗马天主教教士离境,这时对罗马天主教的压迫正在高潮,因此雍正皇帝也许很想寻求一种制衡的力量来对付耶稣会教士的纠葛,并另置几个通译人员在身边以应付他的国际需要了。

中国派往俄国的使节—1733年

1733年从北京派了一个包括三位钦使和很多随员的使节团到圣彼得堡,双方交换了礼物,这是同治朝(1861—1874年)以前清廷派往外国朝廷的唯一使节团。

51

俄国商队已经不再到北京了,大约在1730和1768年之间,在恰克图地方中国买卖城对面的俄国境内建立了一个互市场。1768年,俄女皇派使臣克洛扑夫来华。他并不是在北京而是10月18日在恰克图被接待的,他签订了1727年条约的一项补充协定,更加缜密地规定了引渡和处罚罪犯的应行办法。1792年,伊尔库斯克总督和中国库伦大臣签订了一项规定恰克图互市事宜的条约。在这项互市中,银两和其他钱币的交换是严格楚止的。俄国人从下诺夫哥罗德带来大呢,从亚洲俄罗斯带来羊、羔皮和细毛皮货,以便在那儿交换中国商人所带来的茶叶、砖茶、丝绸和棉布。

1806年有两艘俄国船赴广州进行贸易。他们获准售出载来的货物和装满一船回程货;但是船刚刚驶去,就奉到了北京的

① 恰克图条约汉文本第五条原文为"在京之俄馆,嗣后仅止来京之俄人居住。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云云,与上文所述不同。——译者

不准俄国人参加广州贸易

命令，以俄国既享有陆路互市的权益，不能再利用海路通商，着所有俄国船只一律不准参加广州商馆贸易，可是已经来不及扣留俄国的船只了。

第四章　1842年以前广州中外交往的条件

52

1. 中国政府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专制政体和官僚机构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专制政体，它通过一套官僚机构来推行政令，这套官僚机构，固然也受到上面的一些薄弱无力的制约，对于人民，就集体来说，也只有很小的一点强制力量，然而却仍旧操有一种广泛的权力，并且对它本身行为所须负的责任也极其有限。专制政体和官僚机构合而统治着全国人民，这一国的人民，正如在行会生活和农村生活中所表现的那样，是具有民主政治的种种要素的。在民国成立以前的一千年间，其中除去大约三个世纪的时间（公元1368—1644年）是受明朝统治之外，中国总是全部或局部地为来自北方的征服者所统治。这些野蛮的没有文化的善战部落，竟发现他们自己担负起管理一个既富饶而又有高度文明的社会的政府的责任，这个工作实在是他们所不能胜任的；尽管他们能靠武力控制一切，也能强征贡赋，但是要去做建设性的行政上的具体工作，他们却不合格了。具有高度文明和行政能力的中国人，总是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并且逐渐地促成统治者的更换，1911—1912年所发生的情形，正是最近的一个事例。

征服中国的结果

不管征服者接受同化还是拒绝同化，结果总是一样：人民的日常生活照旧不变，政府组织和行政方法也不过每逢改朝换

代略有变动而已。人民继续遵行古老的习俗，按照他们祖先惯用的办法来处理农业生活和商业生活中的琐屑事务；而那套盛行于东方各国的官僚制度，也就是官吏不受法律制约而且在自54己管辖范围内具有最高权力的那套制度，也始终并且继续通行于中国。在政府方面，正如在一般文化方面一样，中国同两三世纪以前的欧洲要比同今天的欧洲还更为相似。

中国的皇帝

按照最严格的字义来说，皇帝是受天命而实行统治的。他本人就是天的儿子，一旦死去，就是"龙驭上宾"。不论在生前和死后，不论在文字上或精神上，他都是被他的臣民敬若神明的。除去用武力篡位之外，他总是由上一代皇帝或是由皇室所选立。通常他总是上一代皇帝的儿子，但很少是长子，因为就合格的近支王公之中立贤的亚洲惯行办法，一直是在奉行着的。对他的人民来说，君主是"皇帝"、"圣上"、"万岁爷"和"天子"；即位以后，他个人的名字就永不被人提起了，甚至名字中的每一个字眼也要永远避讳，而另用同义字或变体字来替代。每个皇帝都用一个年号或纪元，来表示他御宇的年份；外国人常常将这种年号当作君主个人的名字使用。皇帝一旦死去，就立谥名，上庙号，也就是朝代称号，从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就以这个庙号作为通称了①。

皇帝是要受帝国不成文宪法的约束的，所谓不成文宪法就是自远古以来历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相沿下来的习惯，再加上他的列祖列宗以至于历朝皇帝在诏令中所建的先例。其次他也受到他的大臣们的主张和议论的约束，这些大臣们的地位

---

① 例如，满清第二代皇帝(1662—1722年)的个人名字是"玄烨"；他的年号是"康熙"；他的庙号是"圣祖"，"谥为仁皇帝"。照理说，应当称他为"圣祖皇帝"；事实上，他却通常被人叫做"康熙皇帝"。

和力量所不同于君主立宪国家的只是在选官授职和维持职位的方法上而已。最后,因为皇帝深居九重,他比西方国家的君主更易于受到左右内侍对他经常所起的作用。一位强有力的皇帝是可以贯彻自己的主张并打破宪法的,但是,一位平凡的统治者倘若也想一试,结果就是1898年发生的情形了。

清朝的两个中枢机关

在皇帝本人之下而在其他一切政府机构之上的,是两个最高的中枢机构。在明代,内阁是帝国的最高中枢机关;但是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就降为内廷拟案机关了,员额以六名为限,是中国官吏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衔。军机处,是君主的真正枢密机关,军机大臣通常不超过五员,经常在御前讨论和解决帝国政策中的各项问题。军机大臣照例还兼任其他高级职务,通常是兼一个部的尚书。

55

六部

在1834—1860年期间,帝国国务的实际行政工作,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六部都照同一体制组成。每部设尚书二人,依法满、汉各一人。各省总督都当然加尚书衔,通常是加兵部尚书衔。每部设侍郎四人,满、汉各二人。各省巡抚都当然加侍郎衔,通常是加兵部侍郎衔。

直省行政

各直省对于中央政府过去是,而现在依然是居于一种半自治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古波斯的州,在另一些方面又象一个联邦国家中的邦。若就各直省只要能按期上缴贡赋和应解款项,并遵奉中枢一般政令,即可对本省具体行政事务自行其是的这种情形而论,各直省无异是古波斯的州。各直省的自治已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帝国政府在1834年以前和以后的若干年间,力图回避同外交事务的一切接触,而要求将这类事务的讨论和决定完全交给各省当局去办理。尽管各省行使职权的范围极其广泛,可是官吏个人却受到许许多多的限制。

所有各省知县以上的官员都是由北京任命的，各省当局固然也能保荐低级官吏，但任命仍出自北京，并且升迁革黜也完全操之于中央政府。这就使直省官员，从最高级到最低级，都维持了一定的纪纲。官职照例是三年一任。这项规定，对于低级官吏几乎是普遍施行的，他们也可能被委连任一次，但是在第二次三年任满的时候，就必须在新环境中去另打基础了，而且，连带着又要对他们上司的用度再作一番报效。对于某些特优的官缺，任期通常只有一年。此外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有的、从不宽假的限制：那就是文官的任命向来回避原籍。武职是一种例外，但是他们发生的影响却很有限。在1907年以前，满洲向由满洲人治理；否则，这项规定倒是一成不变的。

各省的行政组织都是大同小异。总督，通称制台，是省行政机构文官中品秩最高的官员，而且还赋有节制辖区内满洲驻防军以外一切军队的权力。有时候，他虽具有总督的权力和品级，实际上却是仅仅管辖一省的巡抚；也有时候，他管辖两三个省份，而各省还有各省的巡抚；还有一些省份，各有一个巡抚，可是并不受任何总督的节制①。巡抚是一省的最高的首长，除非和

① 督抚设置情形见下表：
畿辅省：
直隶………不设巡抚；置直隶（驻天津）总督。
近畿三省：
山东………设巡抚 ⎫
山西………设巡抚 ⎬ 不置总督。
河南………设巡抚 ⎭
外省：
江苏………设巡抚 ⎫
安徽………设巡抚 ⎬ 置两江（驻南京）总督。
江西………设巡抚 ⎭
陕西………设巡抚 ⎫
甘肃………设巡抚 ⎭ 置陕甘总督。

总督同驻一处，他的措施是不受限制的。1905年，凡督抚同城的省份，巡抚一职一律裁撤。布政使司，具有一些巡抚副手的职权，名义上是各省文官的首脑，所有授职放缺等事，都是用他的名义实施，甚至由巡抚直接委派的官职也是如此。他又是省库的主管官，而就以这个身分为帝国政府对他名义上的上司巡抚发挥一种制约作用。按察使司负有监督执行刑法的责任；凡刑事案件，都以他作为省级最高上诉机构。对于官吏违法案件，他也具有管辖权。此外他还对于帝国的驿传工作实行一般监督。盐运使司或盐道，掌管一切归本省课税的食盐生产运销事宜，以及从食盐征得的税款。粮道掌管漕粮的征收，在十八个直省中有十二个省份设有这种官职。

57

钦差大臣和粤海关部

因为影响到帝国对外关系的缘故，另外两种在省内执行职务的高级官员必须一提，一是钦差大臣，一是广州的河泊（按即粤海关部）。当督抚办事颟顸或不能执行中朝政令的时候，皇帝就直接派遣钦差去执行他的旨意；当一省或数省发生的事故无法控制，并认定常设官吏无力处理的时候，皇帝也派钦差去查办。钦差赋有特殊的权力，而以上谕所指定的范围为限制，一到任所，就在一般行政或指定的任务上代替督抚行使职权。河泊，即粤海关部，是皇帝的直接代表，完全不在直省额设官员范围以

福建………设巡抚｝置浙闽（驻福州）总督。
浙江………设巡抚｝

湖北………设巡抚｝置湖广（驻武昌）总督。
湖南………设巡抚｝

广东………设巡抚｝置两广（驻广州）总督。
广西………设巡抚｝

云南………设巡抚｝置云贵总督。
贵州………设巡抚｝

四川………不设巡抚；置四川总督。

内，可是，为了重其权位，将他的官阶列为与总督平行，不过班次略后。他的聚敛所得，一部分直接献纳宫廷，从至尊到妃嫔太监没有人不分润。这个官缺在不复成为肥缺之后，经于1904年裁撤，职掌则交由总督接管。

2. 广州商馆和公行①

广州的对外贸易

到了十七世纪末叶，由于其他口岸（主要是宁波和厦门）所征捐税的苛重和漫无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被吸引到广州一口。即令在广州，苛捐杂税也是一个怨谤丛生的问题，但是这类苛杂还没有成为定制，在官吏和外商之间还有一种经常讨价还价的办法可行。前者司掌管的大权——也就是对准许进

① 通货——“两”是中国重量单位，重自525至585克令(grains)不等；作为通货的银两，其重量和成色都是以有关城市银钱业的习惯为转移的。在1860年以前，广州银两值6先令8便士(1英镑=3两)。上海银两的价值约低一成。在1860年以前所谓的银元($)，是指西班牙(加罗拉Carolus)银元而言，这种银元实值4先令2便士，然而在中国的交换价值却在4先令6便士以上；后来所谓的银元则是指墨西哥银元和重量成色相同的中国银元而言。这类银元的交换价值一直是0.65海关两。

重量——每担平均合$133\frac{1}{3}$磅或60.453公斤。

每斤平均合$1\frac{1}{3}$磅，或60.453克令。

每两平均合$1\frac{1}{3}$盎司，或37.783克令。

每担=$1\frac{1}{5}$英担，=$1\frac{1}{3}$美担。

16.8担=1长吨。

15.0担=1短吨。

16.54担=1公吨。

长度——里合$\frac{1}{3}$哩或$\frac{1}{2}$公里。

尺合14.1吋。

丈合141吋。

口通商索取代价的权力；可是，如果诛求无餍，外商也会拒绝贸易，将船只停泊在虎门口外，等船大班将各该船只应缴各费的总数在广州洽商停当之后再行进口，而且这种办法已经成为通例。1702年在整顿贸易而不是整顿规费方面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指派“御商”作为唯一的贸易经纪人，凡外国人购办茶丝和出售当时有需要的少数外国货物，都非由他经手不可。两年以后，这个御商感到不能不让别的商人分润他的专利权了，但作为这项让步的代价，他向每一艘来船索取五千两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是直接取偿于外商的。

1720年的公行

在1720年，广州商人组织了一个行会，即公行，以便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调整价格。这种结合据说是一种商人的组织；然而它却有官方支持。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曾提出抗议，表示非至总督答应取销这种垄断，决不开仓贸易。结果，公行解散，但不久又重新成立了。苛捐杂税逐年增加，1728年凡售与外国人的货物一律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1736年，乾隆登极的恩诏废止了百分之十的附加税，但是为了报答这项恩施，据说曾向总督馈送了价值三万两的礼物。船只在进口时所征的船钞正项及额外的种种规礼规银，尽管外商一再抗议，然而已经日积月累，形成一项为数达一千九百五十两银子的固定课征。

59

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

在1755年，奉命建立“保商”制度，所有外洋船只的交易统限行商经办，并严禁一切小商小店因循旧习，私下贸易。广州方面感觉到本身有一个弱点需待加强，于是1757年就颁布了一道上谕，饬以广州为中国的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在1760年正式奉准设立公行时，广州的官员和商人收到了胜利的果实。然而，公行会员却遭到残酷的剥削；1771年，行商破产的情事已经出现多起，此外还拖欠了官方的税款；于是公行又被解散。十一年之

后，一个先是由“十二个”后来由“十三个行商”或“洋商”组织的团体成立了，通常则仍用那个老名称称它为公行。他们须担负管理对外贸易的完全责任，保证外商服从政府法令，并且充作政府与外商交往的唯一桥梁。他们还受权管理“行用”，所谓行用就是名义上为供清偿拖欠、罚金、亏折等款之用，而在对外贸易中直接抽征百分之三的一笔金额。

广州的商人行会就这样完全建成了，不但有了一个组织，而且有了直到1842年始终没有变动过的种种特权。它还赋有政府的全权，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作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作为源源而来的财路，那笔财富正是官吏们为之垂涎三尺，指望从中大捞一笔的。粤海关部在他正式呈报的税收以外，非弄到一笔巨款不可，要是拘泥于法定税则，那就会使他作官的主要目的落空。公行无异是他的一种工具，凭以榨取对外贸易并从中勒索一笔自罗马帝国鼎盛时代以来举世无双的私人收入。同样，自总督以下各级官员，也都摊分一部分赃款。

管理外商章程

章程是为了管理外国人、外国船和外国贸易而制订的，并且随时加以增补。现行章程不时由通事拿到商馆去大声宣读，以表示章程并非具文。其中比较重要的可以概述如下：

60

1. 兵船必须停泊省河口外，不得进入虎门。——这条规定从不放松。

2. 洋妇不许带进商馆；枪炮和其他武器也不许携入。——这条规定过去是严厉执行的。迟至1830年，有几名妇女从澳门来参观商馆，中国人为迫使她们立即离省，还两度以停止通商相威胁。

3. 行商不得向外国人拖欠。——这条规定是不能实行的。诱惑太大了；外国人既不肯停止放账，中国人又不肯停止借债，而且大家又都不记往来账。

4. 外商不得雇用华籍仆役。——这一条照例很马虎，但是常常被用来作恫吓的武器，如1814、1834和1839年的情形那样。

5. 外国人不得坐轿。—— 步行是唯一合乎外商这类人身分的行动方法，可是步行也不能太多。

6. 外国人不得在省河内划船游乐。—— 每月有三天准他们在通事陪同下结伴到花地那个对江的花园游散，通事无论就文字或就个人来说，都要对他们的一切越轨行动直接负完全责任 —— 这一条通常是马虎的，但也不时加强限制的举动。可是，对于街上的散步，即使是在商馆附近，也毫不通融。

7. 外国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诉，必须交由行商转呈。—— 这无异是要他们通过经手非法事情的人去控诉一切非法行为。这条规定是公行管理权的基础，从不放松。1831年，章程稍有变通，如果行商扣留文件，不予转呈，准两三个外国人携带禀帖卑躬屈膝地前往城门口（但不能进城），递交守城门的官员收转。这项变通方法通常仍是具文。

8. "至夷商寓歇行商馆内，向系责成行商管束。其置买货物，必令行商经手；原以防范奸民引诱教唆。嗣后夷商居住行商馆内，不准夷商擅自出入，致与奸民交易营私。"①

9. 外国人不得在广州逗留过冬，一俟货物销出，船舶装妥之后，应即回国或前往澳门。—— 在广州，买通有关人物之后，可以借故请准限在每一个商馆留下两三人逾期逗留不去。虽然每年的离境是强制性的，但是离境也同入境一样，必须花钱。通常离境许可证的费用是三百两银子。

61

外国商人在广州的生活

留在广州过冬的外商是住在商馆 —— 即国外经理人或代理商的住所兼办公室，商馆是行商的产业，而以全部或一部分房屋租赁给外国人的。商馆共有十三个，同行商名义上的数目相符纯是一种巧合，其中有九个用外国国名来称呼；但是除了英国人和荷兰人的两家东印度公司以及来华较迟的美国人的商馆之外，后来所起的商馆名字已经同租用商馆人的国籍完全不相干了。每一个商馆都有横列的几排房屋，从纵穿底层的一条长廊通入。底层一般都是作库房、华籍雇员办公室、仆役室、厨房和

商馆

① 译文录自李鸿宾原奏，见《粤海关志》第29卷，"夷商"，第20页。—— 译者

仓库等等之用。二楼则有帐房间、客厅和餐厅，再上面一层就是卧室。各商馆所占的空地都有限，包括花园和运动场在内，长约一千一百呎，一般宽约七百呎，但是每个商馆的房屋都很宽敞，一个商馆普通进深有四百多呎，房屋正面平均约长八十五呎。一家商号的库房里往往藏有一百万元以上的银元。在1832年元旦英国商馆宽敞的餐厅里举行的一次宴会中，席面上坐的来宾有一百人。这些商馆给外国旅客、帝国贵宾都布置了华丽的房舍，但是这些房舍实际上却是一个镀金的鸟笼。能供较多的人运动的唯一场所，就是六家商馆前面正中长宽约五百呎和三百呎的一片场地。

在商馆里，外国行号都是任由各该保商摆布的房客，保商负62责为他们雇用仆役和助手。他保证这些人的雇主不会在他们手里吃亏，也为他们对政府负责，当然也要在他们那份差使的油水当中分润一笔。事实上，他是他所承保行号的主人、经纪人、房东、买办和管事。

澳门广州之间的往来

外商持凭在澳门缴费后领得的许可证而来到商馆。他们是要按时而来的，因为他们要靠西南季候风将他们的船货安全而迅速地从巽他海峡或马六甲海峡送到广州，以便在这个风季过去之前——也就是10月底以前——可以办妥一切。到达广州后的第一桩事就是选择和洽妥他们的保商，或恢复过去同保商的关系，保商必须是“十三行”中的一家，他要对外商以及外商的船舶、水手等的一切行动，从买一篮水果起直到人命重案为止，负完全责任。当他们的船只装好了货物，并且东北季候风还63有力量送它们顺中国海而下的时候，外商必须缴清费用，请领前往澳门的许可证，在那里等候下一个季度的到来。

来船都是先驶澳门，船主抵澳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聘用一

广州做生意的办法

位引水。同时，他还要在那里雇妥一位通事和一位船买办，买办有为船只和水手包办食物和其他各种用品的采购权，价钱则漫无限制。然后船只是准许驶往虎门了，在那里经过丈量并缴清各项费用之后再开到黄埔。船舶通常在这码头要停泊三个月。来船的广州收货人于是将开列载货详情的舱单取去，转交给他的保商。这样外商对于这批进口货就可以不必再操心了：除去照缴行用的义务外，他既不用缴税，也受不到官吏的直接需索。现在他唯一挂念的就是出售自己的货物。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受什么强制，他有将运来的货物原船带回的自由，不过，如果他要出售，那就只能售给他的保商。保商是根据他所能卖的价钱，扣除本人的利息和开支，政府额定的各项捐税以及官吏需索的各种陋规之外，再加上一笔起码的利润，而任便给价的。1820年东印度公司声称，他们在从英国运到广州的英国货物上面，二十三年来，已经净亏了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一百零三镑，据公司声明，这是由于"强使贸易超过需求"的缘故，但是从保商具有决定价钱的绝对权力而不受自由竞争的任何制约这一点来看，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

中国的出口货

进口货脱手以后，外商其次一件挂念的事，就是如何将所得价款以及非英籍各船所必须带来的硬币，去采办各船的回程货物。依照法令，装运丝货，每船不得超过一百七十五包。除茶以外，对于中国的其他货物并没有多大需要，因此运出的货物以茶为大宗。出口货也只能从保商那里购买，或者由保商经手买进。在出口货上，公行也同样被迫不得不在买价和卖价之间保持一个很大的差额。此外，任何一只来船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一个中间人手中，实际上除了现金购货以外，贸易已陷于物物交换状态了；倘使用拒绝采购的方法来压低茶价，那么保商尽可降低进口

64

货价来保持原来的平衡。

广州对外贸易上的需索

在1840年，一只九百吨的船，所征船钞等项共达"八千多元"(六千两)。另一只四百二十吨的船计缴纳税款二千六百六十六点六六七两，约合当时八百八十九镑；这个吨位约等于三百七十五注册吨。照这个标准依据1842年条约规定，只须付一百八十七点五两，而依据1858年条约规定，只须付一百五十两，按现在汇价计算，约合二十镑。如果不到黄埔而只赴澳门贸易，则所缴船钞规礼等费约为黄埔所征的半数；但是却必须从节省下来的这笔钱中付二千五百二十两的行捐，这是外商为取得在公行范围以外营业的自由所必须付的代价。

一艘第一等的船所缴纳的这笔将近一千五百镑的款项，是什么也换取不到的，诸如照明设备、码头设备等件件俱无。商人在进出口货物上面所受的勒索是无从计算，甚至是无法估计的。这些勒索是完全看不见的，一起被掩蔽在买价和卖价之中，买价和卖价都是由中国垄断商决定，不但他们不受自由竞争的制约，而且外商甚至没有权利到街上去看一看哪些外国货有销路、哪些中国货已经上市，或是去调查一下行市涨落的情形。美国船和来自欧洲大陆的船，所能供应中国人需要的货物寥寥无几，主要是靠了运进西班牙银元之类的铸币来进行贸易。英国船中，东印度公司的船所进口的有销路的商品，在数量上是受限制的，而只有港脚船①能用鸦片和原棉这两种货物来满足那种要货不要钱的无穷无尽的商业需要。在鸦片上面，外国商人受不到直接的勒索；鸦片是从船上售出的，粤海关监督、总督、巡抚、提督

① "港脚船(Country ships)系指航行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英国船只而言，不属东印度公司，但用该公司执照并在其总监督下航行。"(《中国百科全书》，第135页。)

和其他无数的官吏们的一切要求，都由中国买主去应付。除去鸦片之外，原棉约占所有普通进口货价值的一半，茶叶则占所有出口货价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65

对外贸易的繁荣

尽管有种种勒索，外商还是兴旺起来了。中国象是一个久旱不雨的地方——所应注意的是，它要的是贸易，还不是货物——外国人恰好给它带来了它所渴望的甘霖。1789年，停泊在黄埔的有英国船六十一艘（其中公司船二十一艘和港脚船四十艘），美国船十五艘，荷兰船五艘，法国船一艘，丹麦船一艘、葡萄牙船三艘，共计八十六艘。英法战争期间，在中国海面上最活跃的只有英国和美国这两种旗号——英国旗号所以活跃，因为英国是海上的霸主，美国旗号则因为中立的美国和所有国家都是友邦，并且除去1812到1814年这段短短期间外，没有任何敌人，所以能在别的国家不能去的地方进行通商。在1818—1833这十六年当中，输入中国的英美货物共值三亿三千九百七十五万八千四百八十八元；输入的"财宝"或白银共达六千二百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九十七元；共计四亿零二百零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五元，平均每年二千五百一十二万五千七百七十四元。同时期内，中国的出口共计货物三亿一千二百四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七元，现金五千六百一十万零二千七百五十三元；共计三亿六千八百五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元，平均每年二千三百零三万三千零四十六元。

广州的英国贸易

英国贸易的规模，靠了鸦片的滋养，正在与日俱增，在十六年当中，鸦片的比重从初期的六分之一上升到后期的一半以上。印度的原棉在重要性上仅次于鸦片，约占全部进口货的四分之一。英国产品，主要是呢绒，约占总数的八分之一；鸦片和原棉以外的印度产品以及出产香料的南洋各岛的产品，合在一起，在

后期已经缩减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出口货方面，茶叶几乎占全部出口货的五分之三，丝货约占五分之一；而棉布（紫花布）在当时还是从中国输往西方的一种货物，轧棉机、纺织机和电力织机还没有来得及扭转这个流转的趋势。在英国贸易方面——就对英和对印两项贸易来说——中国输出的货物并不足以抵付进口货，在1818—1833年这个期间，现银计占出口的五分之一，后半期的比重比前半期的比重更大，这是随着自1826 66 年起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的显著增加而增加的。一般地说，英国贸易是在一种三角贸易的基础上经营的：英国将产品运到印度，而仅以一小部分直接运到中国；然后从印度将鸦片、原棉以及其他印度产品装运到中国；中国以茶叶和其他运往英国的产品来抵付这些进口货的一部分，差额则用运往印度的硬币偿清。除上述的这种贸易外，还要加上同广州贸易的来船船主、大班和其他船员等人得以进行的私人贸易。单是东印度公司船只所作的这种广州出口贸易，平均价值每年就达一百三十五万元之数，这个数目也完全是由私人的输入贸易抵付的。

广州的美国贸易

美国贸易，进出两项每年共计六百多万元，此外还必须加上来船每年约二十六万元的开支和美商机构差不多同样数目的一笔开销。这种贸易主要是建立在现金基础上的。随着时间的进展，从周转上可以赚到一笔钱的孳生利润的进口货所占的比重已越来越大，而银币进口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小；但货物却主要是鸦片和亚洲国家的其他产品，很少是船舶出发地的产品，回程货则是中国的茶、丝和紫花布。出口的茶叶和其他中国产品，有五分之三是用硬币支付的；以致美国商人损失掉了从以货易货的双重流转中所赚到的那笔利润，但是他们却据有了用现款购货的有力地位，并且是那样有力，以致不须依赖于为英商所不得

不屈从的中国垄断。美国贸易也是在一种三角贸易基础上经营的：美国产品运到欧洲出售；将所得西班牙银元的货款运往美国，然后再转运中国，再不然就是在欧洲各口岸之间做一段时间的转运生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中立国商人做这种生意是很赚钱的），等这艘船将所赚西班牙银元积到另一笔成数，然后再载同前往广州；这个三角的第三条边，就是将茶叶、丝织品和紫花布等从广州运往美国。这种迂回的经营过程是必需的，因为当时除去商人本身的业务经营所提供的以外，没有任何银行的便利，因此，每一个旗号都不得不自行供备贸易资金，每一个行号都不得不自行供备营运资金。就经济方面来说，这是浪费的，但是直到1827年以后，美国人用货物甚至用非美国产的货物来替代银币的种种努力，都未能收效。从1829年起，美国船只大量地装运委托美商代办的鸦片；从1831年起，以银币支付的基础事实上就放弃了。据现在有纪录可查的而论，1832年广州美商所得到的伦敦汇票为数达到二百四十八万零八百七十一元，1833年为数已达四百七十七万二千五百一十六元。这些供美国船购办出口货之用的汇票，自然要由英国船进口货物所得的价款来抵付；在这个范围内，伦敦无异是对广州的美国贸易征了一道税。

67

公行制度的优点

整个说来，贸易并没有什么开展。尽管事实如此，商馆中的外商对他们的处境并非完全不满。公行制度固然是垄断性的，可是大体说来，却不是什么扞格难行的制度。外商由于同本国市场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的缘故，稳居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至于操有对英贸易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则后期付给股东的红利完全出自他们的中国贸易的利润，外商除去对船舶的课征和所负担的行用以外，并不直接输捐纳税，所以也看不到什么勒索。

何况，他们被软禁在租赁的商馆寓所里的那种生活上的不舒服，同积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的希望比起来也算不了什么。中国人也同样满意：行商虽然上百万的巨款被榨取而去，却能加好多倍地赚回来；官吏们更是完全满意于现状。从中国人和外商这两个友好的对手的私人关系上，可以找到实际情况的最好说明。他们双方都有一种商业道德和诚实无欺的声誉，至今还是人所望尘莫及的。生意完全是一言为定，从不需要书面契约，彼此帮忙、彼此体谅的情形不胜枚举。可是他们相互关系上的这68种轻松愉快都是以对外贸易为代价的。这种制度能使外国人不仅可以营生，而且可以挣下一份适当的资产，遇有外商陷于经济困境，公行行商就会将他的债务一笔勾销，这都很能表明中国商人的慷慨和深谋远虑，但是这也着重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非能赚大钱，就不能有这样大的手面；同时中国人的经常处于负债状态也证明了外国人具有同样程度的友好精神，以及行商经常苦累不堪的窘状。

公行是对外贸易的挤乳人，恣意挤榨，非至挤干不止；但是取得这项特权，行商要付出很重的代价。请准入行，一笔就要付出二十万两之多，而且时常为了公益事项，一捐就是五万两、十万两。在1831年奉旨清偿中国人拖欠外商的款项时，有一家行商捐了一百万元，其他行商也按比例分担；1841年为了赎回广州城，这同一家行商又捐助了一百万元。可是，尽管有这种经常的漏卮，一位名叫〔伍〕浩官①的行商本人在1834年说他估计自己的财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这确是那个年月的一笔很大的财产，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财产；而这却是他在商业生活中，

① 浩官(即伍怡和或伍敦元，1769—1843)。参阅吉尔斯：《中国人名辞典》，第884—886页；克莱门提：《中国人在英属圭亚那》，第100页。

应付了制定法令和解释这样制定的法令的无数官吏的诛求之后的剩余。

广州外国人不满意的理由

中国人是满意的;但是在外国商馆中,在满足于贸易成绩的同时,对于那些压在外商头上并使他们感到自己地位受到贬损的若干特殊事项,却也有许多怨言。这类怨言可撮述如下:

1. 在贸易上所征的重税。
2. 公行的垄断制度。
3. 向中国商人收债毫无把握。
4. 管理商馆生活章程的严厉以及不准常年居留广州的禁令。
5. 其中最重要的是,非通过外商唯一有业务往来关系的行商,不得向任何官吏有所陈述的禁令。

69

英国港脚商人的愤懑

上述五点再加上限于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都是外商对中国人抱怨的主要项目,但是当时,没有一个政府与闻其事,也并没有一个政府向中国当局提出过改善的要求。然而商馆中的一部分商人,即英国港脚商,却对一件事情深感不平。港脚商不但是只许持凭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证进行贸易,而且是完全不许从事对本国的贸易的,他们总是拿自己的这种处境同美国人享有较大自由的那种处境相比较。美国人参加角逐虽然很晚,但是靠了美国在长期的拿破仑战争中所处的中立地位,美国商人的精明强干,以及美国海员的吃苦耐劳和进取心等有利条件,他们在广州商馆之中很快地就取得了仅次于英国人的地位。美国商人是按当时所理解的那种意义来讲的"自由商人";在他们的国家里没有行使任何垄断权的特许公司,贸易是在平等基础上公开给一切人的,波士顿、塞勒姆、普罗维登斯,费拉德尔非亚(费城)以及纽约的商人和海员们所要求的只是平等的机会而不是特殊的优惠。这正是英国商人所要求的一切。也正是广州的港

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取消

脚商人和英国的制造商所需要的;他们以自己和美国人所处地位的对比作为他们的主要论据。激昂的议论终于使东印度公司长久以来所享有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宣告废止了。1834年4月22日公司结束。

中国人的顾虑

这个结果是早就可以看出的,中国当局颇以为虑。他们的主要顾虑是,没有一个负责的夷目如何可使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就范的问题。全部英国贸易,包括英国本土和印度贸易在内,一向都是由一个夷目所主持的在广州经营业务的公司管理的。中国方面不但可以对这个夷目施加压力,甚至可以通过他把停止通商这个最后手段付诸实行。倘使商馆中充满了一群无人约束的商人,那就不能责成某一个人对违法行为负责了。于是总70督在1831年1月令饬行商转谕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以下列事项:"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这项谕令究应如何解释,以及中国人和英国人各自对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主任同英王陛下所派管理进出中国皇帝疆域的商务总监督间的区别,究竟作怎样的看法,关系殊非浅鲜。

3. 管辖权问题

中华帝国的外来侵略

在对外贸易的早期,即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时,中华帝国经常不断地遭到侵略者的袭击,接着就为1644年在北京建立的那个满洲新皇朝逐步征服。中央政府已经紊乱不堪,简直无力顾及一两艘商船开到帝国边缘口岸这类的小事了。

中国地方当局的权力

在这段混乱时期,很多事情自非交给地方当局承办不可,从地方官为保全澳门境内司法权和征税权力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来看,似乎他们并未玩忽职守。征税的具体办法总是交在省当局手里的,只要能依照北京当权者所指望的比额,将一部分税收上

缴，就从不加以过问。但是刑法的执行却受到严密的监督，因而对于犯伤害罪或杀人罪的外国人如何适用法律一节，就成了一个极饶兴趣的问题。如何对付西方来的人，是中国所要对付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问题；中国是用对自己最省事的办法来予以解决的。

民事诉讼案件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外国人同中国人涉讼的案件是很容易就得到解决的，因为规定贸易条件的权力是握在中国商人手里，而外商只能同他们进行交易，也只有那些交易才会引起诉讼 —— 只有常常酿成纠纷的那种对中国人的贷款问题，是又当别论的。外国人之间的商务纠纷，从来不让中国人知道，这正和中国人的那种通过行会或调解 —— 而决不向法庭控告 —— 以解决民事诉讼的办法，如出一辙。在领事裁判权建立之前，所有的刑事诉讼都是对于船上水手提起的。但是，在叙述这些诉案的性质及其处理办法之前，最好还是先讨论一下中国对外国的国家船只所主张的管辖权问题。 71

中国对外国船只的管辖权

中国当局的态度，虽然不正确，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国家以地位或权利 —— 事实上，他们并不承认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独立主权国。在中国的外国商船和水手，一方面交由保商管理，另一方面则责成各国商业社团的负责首脑约束。以这种制度实施于外国的国家船只自是一种当然的步骤，而且如果没有遭到抗议，也会提供一种解决困难的圆满办法。因为在1820年11月美国巡洋帆舰"国会"号到来以前，所有前来中国的兵船都是英国船只，所以问题的解决就落在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手里，然而面临着中国停止通商的这个武器，他们的双手无异是被束缚起来的。

对杀人罪和伤害罪的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事例不多 ——

刑事管辖权的行使

这个事实很可以说明船上水手管理的严格。渡过海洋上最长的一条航线之后，岸上种种诱惑所呈现出来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中国方面制定的禁售烈酒的章程，全成具文。然而，在一百年的历史当中，酿成国际纠纷的杀人案件，在广州和黄埔两地却总共不到十二件。

在澳门，中国人很早就采取措施，将刑事管辖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至少在一两个世纪中，他们决不许葡萄牙人行使管辖权，即令是欧洲人杀害欧洲人的案件，也不许葡人插手。据记载，1827年有过一桩值得注意的事件，即葡萄牙方面曾经因杀害中国人案，将一个葡萄牙人的黑奴处死，这就表示出当时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对本国臣民实施本国法律的权利①；但是迟至1826年，澳门伤害英国人的事件还是由中国当局处理的。

72

在论证广州水上的犯罪行为时，当时和后来的评论家们都一致认为中国司法行政是野蛮的，并且对于负责将被控有罪的外国人交由中国审判的那些人的作法，也一致加以指摘。然而，过去的行为决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和惯例来衡量。东印度公司的正式编史人曾经说过，中国人犯罪，他们本国当局决无意徇情袒庇，但是审讯却必须按照他们本国的惯例进行。这个但书确是实在的，就在中国人控告外国水手的时候也无通融余地。

美国人的立场

美国人又有另外一种立场。他们是闯进一个垄断世界的自

① 据《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2卷，第18—19页所载，道光六年(1826年)有葡人地们(Timoy)黑奴殴毙华人严亚照一案，据两广总督阮元、广东巡抚成格奏称："今夷人吗嘧喱吥致伤民人严亚照身死，讯认明确，照例拟绞，情罪相符。随行司饬广州府知府高廷瑶前往澳门，会同香山协副将曹耀清，署前山营游击马成玉，率同代理澳门同知冯晋恩，香山县知县蔡梦龄，饬令夷目，提出该凶夷吗嘧喱吥审明，于本年二月初五日，照例绞决，用彰国宪"云云。上文所称"这就表示出当时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对本国臣民实施本国法律的权利"云云一节，与事实不符。——译者

由贸易者，为了贸易，他们事事迁就。因为是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新兴国家，他们自己的刑法是比东方或西方其他各国要宽大一些；但是到了中国，他们却采取了1821年爹剌那非丫案审讯时所作声明中体现的那种立场①。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1844年。

中国的刑法

英国人表示愿服从中国的法律，但是在经验的驱使下，他们对于究竟什么是法律以及怎样执行法律不得不有所争论。法律本身是明确的，现在不妨就切合本题的内容，概述如下：

1. 故杀或谋杀罪处斩。

2. 纵非蓄意杀人，但斗殴致人死命，或疑人为盗而杀人，或系谋杀案从犯，罪均处绞。

3. 纯过失杀人或伤人(即在事先不能提出充分警告的情况下)，得付给死者家属或伤者本人一笔罚款，而免予刑事处分(罚款的法定金额是十二点四二两银子)。

4. 依法自卫而杀人系正当行为，不予惩处。

73

这种法律，如果公正地执行，英国人可能是会甘愿服从的。英国法律同中国法律相差并不太大，只是中国法律显得比较重视伤害行为的结果，而英国法律则比较重视动机。要想评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是非，就必须记住这种观点上的异同。在每一桩同中国官方发生纠纷的案件上，英国人总是主张罪名应属于第三条——即过失杀人条，或第四条——即自卫杀人条；可是中国人却坚持以所有案件都归于第二条——即殴斗致人死

① 1821年9月23日停泊黄埔的美国船"急呢仑"号上的水手爹剌那非丫将一个瓦罐跌落或投掷到船外，据说击中了一个小船上的妇女，因而致死。中国人要求将他交出，先被拒绝，但最后同意照办。他经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审讯之后即被绞决，尸体送返"急呢仑"号。美国商人所抱的态度是："我们一旦置身于你们的海面上，我们就不得不服从你们的法律，不管那些法律是怎样的不公平，我们决不抗拒。"

命条，而不论故意或非故意杀人，一律罪拟处绞。

法律的执行

然而考虑一种法律的效果，简单顾到它的理论方面是不够的。法律的执行，以及法律条文在解释和援用上所作的限制，也非一并计及不可。中国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需待解决。以往中国一直是只同藩属国往来，而且，除了日本人曾经剽掠中国沿海地区、侵略中国藩属国领土以外，凡同中国贸易的民族都是谨遵中国法令的。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看法，由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半海盗行为、十七世纪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以及荷兰人的胡作非为所形成；而英国人却是1637年用大炮打开通商门径的人，他们的第一艘商船在1689年依法停泊在广州的时候，就发生过人命案，而且他们还因不同帮口的外夷之间的一些小小纠纷，竟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行为的情形下，在1802年1808年两度占领中国的领土澳门。在理论上中国人向来对于"理"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对于不可"理"喻的化外之人，他们主张用不同于对本国人民实施的原则来治理。

中国县官和法官的腐败

中国法律的精神同实施所以脱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县官和司法官的出名的腐败。他们口头上讲"理"然而却利欲熏心，所以官司的赢输是要看荷包而定的，不过却受一种固有信念的支配，那就是他们本国人既属于一个文明种族，因而同那些野蛮的、不开化的人如有纠葛，对的方面一定是他们。

74

刑讯的使用

除去腐败之外，还必须加上一条，即任何人在中国法庭中受审都肯定不能免于受刑。犯人的刑讯并不是中国法律所直接许可的；但是在中国的审判程序中，正如在早期英国的例行办法中一样，刑讯所以能有存在的余地，正是因为有一项旨在保护被告人的法律规定。在民国成立以前的中国，一个被控犯罪的人，仅仅凭他被控的这个事实就可以认定为有罪：犯人不许延聘律师

辩护，审判的目的是为了宣布罪状和判刑，而并不是为了确定事实。然而，据认为却有一种保障是可以给犯人以保护的。除非本人招供，没有一个被告可以被判为有罪；不论有罪或无罪，犯人都必须诉请伸冤，然而事实上却非认罪不可。站在商馆时代的中国法律观点来看，正如站在前几世纪的英国法律观点来看一样，容许一个犯人"拒不答辩"会被认为是阻挠审判的。所以成为定案前的必要条件的招供，一定是迟早所不免的①。

中国人的官方责任原则

但是，最有力的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每一个臣民对于不论关系多么间接的事都要负责。儿子犯罪，父亲要负责。一个店员打了人躲起来，店东就有责任叫他出首。某一省遭到叛民的骚扰，该省巡抚就要负责。结果是在理论上有罪就必须有罚；倘使罪犯不能缉拿归案，领罪和受刑，那么负责方面就一定要承担后果——所谓负责方面就是父亲、家属、店东、乡邻、知县或总督。皇帝本人也要为国家的祸福对"天"负责。

在外国人案件上的应用

现在让我们将这个原则应用到广州海面所不能不发生的那类案件上。倘若一个外国水手在岸上因殴斗而毙命，犯罪的中国人一定会缉拿到案，判处绞刑的。受刑的人未见得就是行凶的本人，然而这样做却履行了不成文责任法上的义务。倘使一个中国人从表面上看，在外国水手手里送命，那么中国当局自然会情不由己地要应用这同一项责任原则。英国法律所要求的是须认明实际行凶者的正身；但是当英国当局为保护本国人民而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后者所应用的是他们的责任原则，并依次将罪名转嫁到船

75

① 民国成立以后，律师已经允许正式出庭。1912年9月16日司法部颁布律师开业章程。关于未享有领事裁判权各国的律师得于各该国人民涉讼时出庭辩护一节，也颁布了章程。

大班、船长或关系国的负责头目身上，倘若涉诉的是英国人，那就是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的主任。监理委员会抗议要它的主任为别人行为负责这种荒谬举动，以及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停止全部贸易的措施。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唯一合“理”的行径和维持秩序的适当办法。对于“理”的这样一种解释，英国人是不能同意的。他们本国对谋杀规定之严，比中国法律有过之无不及，但至少他们总期望能给被告一次公平审判。处于那样一种环境中的中国官员，对于这一点是不能答应的。这种看法上的分歧，渐渐发展成了一个非诉诸战争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五章　第一次中英战争的原因——平等权的主张

1. 律劳卑事件

1833 年12 月英国枢密院令

根据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和管理权并将中印贸易公开于所有人民的中印贸易管理法的授权，英国政府在 1833 年 12 月颁布了三道枢密院令。第一道院令饬将原授与东印度公司大班对贸易和商人所行使的一切管理权和管辖权，自 1834 年 4 月 21 日起，暂交由即将依照该法任命的大班施行。第二道院令饬即设置一个具有刑事和海事法权的法庭，开庭地点应在广州，或停泊于广州的任何一只英国船上，其裁判长暂由总监督充任。第三道院令授权监督在广州征收吨税和进出口税，但这道院令嗣经 1834 年 3 月 5 日的另一道枢密院令废止。

任命律劳卑勋爵为商务总监督

1833 年 12 月 10 日，英国枢密院发表了一项奉钦准的任命①，以律劳卑勋爵为管理英国臣民对华贸易总监督。

巴麦尊勋爵对律劳卑勋爵的训令

英王于 1833 年 12 月 31 日的敕书中指示极其周详，但总的精神却是事事迁就中国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在 1834 年 1 月 25 日所颁布的特别训令中，指示律劳卑勋爵在未经缜密考虑之前，不得即行根据枢密院令组织法庭。英国船舰应遵守中国定章，不得擅入虎门，且除非事出非常而确有此必要，这项禁令也同样适用于律劳卑勋爵搭乘前往广州的那艘巡

① 《文选》，第 66、67 页。

78 洋帆舰。训令中又叮嘱律劳卑勋爵应研究扩大英国贸易的可能，并随时留意同清廷发生直接关系是否相宜；但是在未呈明本国政府并奉到具体的批复之前(这样一来就要费去大半年的时间)不得为此采取任何措施，甚至提出任何建议。就以上各点而论，倒都是为消弭中国方面对英国将贸易管理权从一个商业公司转到英王政府方面所持的反对意见而作的一些指示。只是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巴麦尊勋爵埋下了势必引起爆炸的导火线："阁下抵粤之后，应即以公函通知总督。"依照这项命令，律劳卑勋爵就必须采取步骤，将本人由一个纯商务监督——即中国人所认为的"大班"，变成一个钦命使节，并须打破中国的一切成规，触犯中国人的一切成见。在北京那样含垢忍辱、在广州又那样狼狈不堪的阿美士德出使的结果，英国外交部应该是记忆犹新的。现在看来它唯一的借口，就是广州距离太远，那里的一般情况只有通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才能了解。董事们的方针是，要红利而又不赞成威逼；要继续不断的贸易而又坚持协调和缓和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旦成为律劳卑勋爵所奉到的具体指示，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律劳卑勋爵到达广州

律劳卑勋爵于 1834 年 7 月 15 日抵澳门，25 日晨到达广州。他立即写了一封致总督的公函，通知他已经到粤。正当将这封信译成中文的时候，有两个行商到商馆来传达总督札饬他们传谕律劳卑勋爵的要旨。律劳卑以他只能同总督行文往来之意婉辞予以谢绝。

递送律劳卑信件的尝试结局

监督处秘书阿斯迭在 26 日奉派将那封译成中文的信件带往城门投递。他所奉到的指示是，应将致总督的密封信件交给任何一个同意接信的官员，但不得交由行商转递。他在城门等了三个多小时，将信向一个个低级官员投递，而人人都拒绝接

受。他们向他表示，信既是从商务监督方面来的，交由行商转递才是正路，但是"当他们查明这项文书是用'函'而不用'禀'的款式时，这层障碍在他们看来倒是次要的了"。28日，浩官通知律劳卑说，如果不在文书上标明禀帖字样，总督是绝不接收的。这就是律劳卑勋爵为了执行他所奉到的训令而采取的行动。现在谈一谈中国方面对于这个破天荒的平等主张所抱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了。 79

律劳卑勋爵初抵澳门，总督就接到了报告，因而在7月21日就有札谕颁给行商。饬行商等立即前往澳门，问明这个夷目究竟为什么来中国，他是否因为东印度公司专利权撤销，拟请改变贸易方式，另订贸易章程。应即晓谕该夷目，须恪遵中国法律，并且除大班和其他外商等人外，在未奏准以前，一律不得擅自前往广州。该夷目准住澳门办事；但如欲来省，则必须告知行商转禀；以凭具奏，恭候奉到谕旨饬遵。

两广总督的观点

前往澳门转谕律劳卑的总商浩官和茂官[①]抵澳之后，方知律劳卑先已去广州。因而总督又于7月27日札饬行商，转谕律劳卑懔遵。总督从当时例行办法说起。英国人在广州通商，已历百有余年，向来恪守定章，章程均经奉旨批准，因此已成为帝国法律；只有遵守法度方能安稳贸易。旧例英人只准在澳门居住，如欲来省贸易，则非持有粤海关红牌不可，今律劳卑不在澳门静候总督传谕，不领红牌，擅自来省，实属目无法纪。凡海关有关官员将一体问以失职之罪，至律劳卑本人，则姑念不谙中国法律，从宽免予追究。兹特准其查办商情，惟事竣即须返回澳门，嗣后非领得红牌，不得再擅自到省。 80

颁给行商的这项札谕发出三天之后，总督又下了几道新的、

① 即卢文蔚。——译者

更严厉的札谕。他指出，这次夷目擅自来省，实向来所未有。因为该目擅自前来既已酿成一个新的问题，则留候澳门，以待奏请定夺，实有必要。夷目“不遵守天朝法度”，情尚可原，行商却责无旁贷。因此行商必须实心调查，详实禀复。同时，该行商等应饬该夷目立即离省。姑准暂住澳门，恭候请旨饬遵。此外又重申了行商的责任。

次日即7月31日，总督关于粤海关部以行商听凭律劳卑未经禀明即擅自来省，拟正式究问一节，谕知行商。总督又用更严厉的口气，重申前一日给他们的札谕[①]。8月4日，行商奉到粤海关部的札谕，其中叙明，接准总督来咨，特将现行对外贸易管理章程各主要项目重行厘定，饬切实遵行。章程重新以特谕发布，凡与外国商馆有关的中国人，莫不人心惶惶。不到几天的工夫，凡附属于商馆的本地舢板[②]上的船夫已逃得干干净净，许多职员也都不知去向了。

行商的立场和英商的立场

81

8月10日行商邀请英国商人在11日到公所出席一个会议，商议当前局势的问题。律劳卑勋爵不赞成这种举动，英国商人也一致决定不参加拟行召集的会议——从而也就决定了他们将不脱离总监督而采取任何独立的政策和行动。

为了保全自己，行商于8月16日自动与英商断绝交易。现在明白，这原是行商揣摩官宪的意思而作的一种知趣的举动，因为两天之后，总督就颁给行商另一道札谕，并依式转给了英商。总督说，由于一个人的过错而令多数人的生意受害，未免有失公平；但是他指出哆罗呢、羽缎等物对中国虽无关紧要，可是“内地

① 8月1日，律劳卑勋爵和他的监督处遭受到一个严重的损失，监督处的翻译官马礼逊博士在这一天逝世，他是来到中国的最早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并且是一个渊博的汉学家。

② 有一两支桨的小划子。

所产茶叶、大黄、生丝等项，却为该国人民〔即英国人〕生活养命之资"。他勗勉律劳卑勋爵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径；倘仍顽固不化，则显然是不想为其本国获得一个开放的市场；自当立即封仓，永远断绝贸易。

席次之争

律劳卑勋爵一直靠这样一些希望来勉强打起精神，他指望总督终有一天会迫于形势而同他直接往来，因为非这样作就不能了解他的使命的目的，并且也深信通商对于中国人是必要的，正如中国人深信通商对于英国人是必要的一样。他接到了23日有三位官员（即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东协台①）即将来访的消息。会谈之前有一段插曲，最足以表明当时整个情况的特点，现在最好用图解来加以说明（图略去。——编者）。中国人最初将英国商馆客厅里的会议席位布置成这样：将北面的上座完全留给三位中国官吏；行商坐在东首，即旁座的上席；英国监督包括律劳卑勋爵在内的席次都安置在西首旁座上，这不但是下席，而且是背朝他们本国君主肖像的。律劳卑勋爵将座次重新布置了一番。他采用了一张会议桌，将自己放在主位，三个上宾席位留给中国官员，第四位宾位留给监督处的一位同僚，并将秘书的席位放在长桌的末端；行商席位照旧不动，监督处员司席位仍放在边座下首，只将席位移到不是背对英王肖像的方向。律劳卑勋爵的这种布置确是唯一可能的或合理的布置；但是这种布置太强调了平等，行商们费了两个小时试图说服他将座次恢复原来的布置。中国官员因为要等候这场席位争执的成败的消息，迟到了两个小时，律劳卑勋爵认为他们未能准时到场，是对"英王陛下的一种侮辱"，因而严加指责。官员们声称，他们奉总督之命前来，要问明下列三点：(1) 律劳卑勋爵前来广州的原

82

① 统率广州境内地方军队的武将，但将军部下的满洲驻防军不受他的节制。

因，(2) 他的职务的性质，以及 (3) 返回澳门的日期。在答复第一个问题时，律劳卑勋爵请他们查阅 1831 年总督给行商的札谕，并将他被任为英国商务总监督的任命状交给他们审阅。他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这一点已经在他致总督的公函中提到，他们如果同意代递，尽可听便自行拆阅。关于第三点，他告诉他们说，返回澳门的日期要看他自己的方便决定。这个会谈除了照例的礼节之外就这样结束。次日广州知府被褫职。

总督下令停止英国贸易

8 月 25 日，英国商人为保证行动上的一致，正式组织了一个商会；26 日，律劳卑勋爵发布了一项石印的中文公告，提出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总督的札谕这时候也不胜其频繁：8 月 27 日，札饬行商传谕律劳卑恪遵法度；30 日，为行商听任律劳卑前来广州，严令申斥；31 日，又重加申斥并饬传谕律劳卑勋爵立即返回澳门；9 月 2 日，颁布了停止英国贸易的告示。在这项由总督和巡抚会衔发布的告示中，他们再度列举了对律劳卑勋爵行为的种种指责，并以最猛烈的东方式浮夸的辞句，说到他的"愚顽"，将他和一切外夷看作是大皇帝钦命官宪脚下的尘埃草芥。

84

这个告示实际上是在 4 日公布的，公布之后，广州一时情势汹汹。兵勇派到商馆去监视告示的执行；仆役挑伕等一律撤出英国商馆——时值盛暑，这确实是令人狼狈不堪的一种处置；本地人民一律不准以食物售给英国人，违者处以死刑；其他外国人也接到了不得以食物接济英国人的警告，违者则施以同样的禁令。

在 9 月 5 日，律劳卑勋爵令巡洋帆舰"依莫禁"号和"安德娄默基"号开进省河，两舰冒着炮火分别在 7 日和 9 日闯过虎门，于 11 日抵达黄埔；6 日，又有一小队水兵开到商馆。8 日，律劳卑勋爵以一封致英侨商会秘书函的格式发出一项布告，驳斥了

总督和巡抚在2日会衔发出的告示中对他的一切指责，警告说他们已经"挑起战衅"，扬言将以总督的"奸诈悖逆"行为直接向北京皇帝控诉，并强调他本国君主的主权和权力。11日总督在颁给行商的一道札谕中答复说，英国方面既可任意以夷目替代大班，则中国方面自更可继续执行旧章，限一切文书交由行商转禀；声明除遇若干礼节上的拜访和贡使朝贺外，帝国官宪从不同外国人直接往来；埋怨英国政府此次任命律劳卑勋爵既无正式通知，律劳卑也无任何凭证，而且他不容总督请旨，竟提出了一些全然破例的问题；又指责总监督将军队和武器运进商馆，轰击炮台，闯进省河等违犯帝国法律（而且还应该加上违背国际公法一项）的罪名，并且警告英国人说，以他所节制的数千大军是不难将他们荡平的。

广州的危局 85

情势已经险恶万状。9月4日英国商馆已被军队包围，另武装船只多艘，则停泊在商馆前的省河中；所有仆役都奉命撤去，新鲜食物已无法取得，即往河中取水也困难异常；英商在种种威胁之下，生命已陷于严重危险之中；同时交通完全断绝，甚至同黄埔和那两艘巡洋帆舰也完全阻断。双方都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凡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中国人，总督则直接施以压力。保商、通事以及查明曾将律劳卑勋爵从黄埔送到广州的那只船上的引水人等，一律被捕下狱；其实他们对于律劳卑勋爵的到达是全不知情，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消息的，然而他们却不能逃避负责的原则。

律劳卑勋爵逝世

律劳卑勋爵从9月初起就一直患病，9日，疟疾的寒热很高。但是，他还能处理公务，并且亲自主持了几天关于中国方面坚持要英国巡洋帆舰撤出黄埔的那项谈判。14日，他通知英国商人说，为了贸易的缘故他愿意离开广州，巡洋帆舰也将同时离

去。一星期之后律劳卑一行人等离开了广州；他们在八艘武装船只的护送下启程前进，一路遭到许多麻烦和种种耽搁，于9月26日抵达澳门。律劳卑勋爵在10月11日逝世。9月29日封仓禁令撤消。

律劳卑事件综评

英国政府在律劳卑事件上的过失是显然的。1831年，他们接到命令或请求，嘱另派大班"来粤总理贸易事务"。他们于是就任命了一个由三名英国商务监督组成的监督处，其中以地位很高的律劳卑勋爵为首，第二和第三监督则都是当时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的人员。这个监督处仅仅赋有监理委员会过去所掌有的权力。他们所奉到的特别训令事实上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历年给予该会驻广州代理人的训令是一样的。前不久，英国两位钦命大使既已毫无成就而归，公司方面又经常接到关于中国人所加种种阻挠和限制的报告；现在英国政府显然还指望在公司代理人已经失败的路线上取得成功。他们指示律劳卑勋爵不要有任何触犯中国人的举动，却忘记了一件明显的事实，即凡有利于英国贸易的事就非触犯中国人不可。他们禁止他先发制人或使用武力；他们并没有颁发他呈递中国君主或其官宪查验的任何凭证；甚至连任命律劳卑为商务监督一事也没有通知北京政府或广州当局。现在不难看出，而且当时旅粤英商就已经能够看出，广州方面的国际关系需要一种根本的改变，而欲求其实现，就非一改旧日的方针不可，其结果不免发生摩擦。只有训令律劳卑采取妥协政策的那个英国政府，才看不到这种作法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1816年阿美士德使节所必有的结果，而且绝没有另外一种结果的可能。这种作法，纵然不是放弃政府的职权，也意味着这样遥远地处理事务就是听任政府选用的代理人去权宜行事。

律劳卑勋爵的过错

律劳卑勋爵做了一件僭越的事情。他所奉的委派是商务总监督；但因为他是一位贵族，他自以为他只能被选任为英王的特使，因而也就以此自况。除去这一点之外，他为人处事均以温和、果断和坦率而著称。倘若当时总督同意接受他的文书，律劳卑勋爵是无法提出证件的。他心中经常考量着他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同僚所提的建议，所以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唯一可采行的步骤。早在8月14日他就指出，谈判除为本国训令所禁外，只能拖延时日，这样也就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还指出，中国政府是外强中干，假若用一支适当的兵力施以压力，一定会比外交更能收效。他在8月21日写道："我感到满意的是，阁下将看到同这样一个政府交涉，采取胁迫手段，实有迫切需要，否则谈判徒费时日。"在这几句话中，他奠定了自1839年迄今同中国不断发生冲突的每一个外国政府一贯奉行的政策。但是在1834到1839年这段时间，英国政府还是昏昏沉沉的。

87

总督的立场

总督的立场很明确。广州贸易在某些一般条件之下进行，曾经有一百多年之久，可是自1782年以来，就一直是在严密规定的程序下进行的。律劳卑勋爵无视这一套成规。他不待许可，就径往广州；他拒不承认行商为传递公文的桥梁；他又不愿说出他是否要提出什么改革的建议。最糟糕的是，他既没有让总督有时间阻止他前进，也不让总督来得及防范他本人遭受物议。总督出乎本能拒绝了他的每一项提议，认定只有恪守定章，才能保全自己。尽管如此，总督还是因为没有做到那件原本做不到的事——即阻止律劳卑来省——而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总督在言论和行动上都丝毫不差地体现出中国方面的观点。英国政府却一直是举棋不定。但是，当英国政府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人民却看到他们的意见已经在律劳卑勋爵的公文

中充分表达了出来。五年以后，当武装冲突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只有参照那些公文来判断他们应该怎样想和应该怎样做了。

2. 沉默政策

"一种绝对寂静和沉默的状态"

律劳卑勋爵死后，德庇时先生继任总监督，义律大佐充任监督处秘书。德庇时先生向巴麦尊勋爵报告律劳卑勋爵逝世时，指出监督处所应采取的政策说："在中国人方面毫无改进的情形之下，我方维持绝对沉默状态，以待本国进一步的训令，似乎是最适当的办法。"德庇时先生曾在中国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多年。在律劳卑勋爵到达时，他是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的主任。他所表示的意见的主旨，就是要在接奉律劳卑勋爵所恳求颁发的进一步训令以前保持沉默态度。因为训令既迄未颁下，沉默的监督处也就昏昏入睡了。

88

总督谕令指派大班

在10月19日和20日，总督传谕行商称，按照旧例，谕帖向由首席行商传递有关国商人领袖——即大班，而现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取消，英商已无人统摄，漫无约束。因此饬行商传谕广州英商写信回国，要求派"一晓事商人，无须再派夷目，致生扰累"。

英国商人对沉默政策的态度

广州英商并不甘心在监督所采取的沉默政策之下，坐观成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已经撤销，他们急于乘此机会大发其财。在12月9日，他们给枢密院上了一件呈文，其中他们提出了他们认为应该推行的政策。他们指出"含垢忍辱以及对于侮蔑和怠慢逆来顺受"的极端失策，"因为这样会有损国家尊严，而且会引起对我国威力的怀疑"。他们建议授权一位全权公使，偕同一支适当而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径往北方去同中央政府交涉；他们辩称，这样显示武力，"不但不至于惹起比较严重的战

事，反而会是避免这样一种冲突的最可靠的途径”。

德庇时先生却认为这件公文不屑一顾。他仍抱着东印度公司的看法，认为没有理由要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并且料定这种新制度必有不幸的后果。1835年1月19日他辞职而去，罗治臣爵士升任总监督；同一年的下半年义律大佐升任第二监督。

东印度公司的观点

“阿柔”号船上的几名水手被上川岛（即圣约翰岛）土著绑架勒赎一案，似乎提供了一个重新同中国官宪开始文书往来的机会。1月30日，三位监督共同签署了一件措辞温和的事实陈述书。这项陈述书是用备忘录而不是用公函形式写成的。备忘录译成中文以后，在2月1日由义律大佐直接送到油栏门（又作幽兰门）。他身着皇家海军大佐的全套制服。到达城门时，义律大佐被人推倒地上，受到极大的侮辱。请随便哪一位官员收下文书，想尽办法，都毫无结果；在场官员中最高级的一位声称：“我们只接受禀帖。”这样的主张平等和过去律劳卑勋爵所主张的，同样无济于事。虽说如此，当局究竟采取了营救那几名被绑水手的措施，于2月19日将水手送还原船。

同官宪重开谈判的企图

89

1836年12月14日，义律大佐继罗治臣爵士任商务总监督。尽管面前有他所奉到的一切训令和以往的种种情形，他却采取了一些意在得寸进尺逐步楔入的直接措施。他立即断然地放弃了沉默政策，送给总督①一件文书，一则通知他的任命，一则请发赴广州的红牌。他将这件公文写成了禀帖式样，敞着口交由英商领袖送首席行商转呈总督。总督给行商而并不是给监督的札谕说，他从禀帖中微察具禀人似系“夷目”而并非“大班”，这一点须向他禀明究竟；又说义律大佐须停留在澳门，以待奉旨

义律大佐的政策

① 新任总督邓廷桢系于1836年2月12日接前任总督卢坤的遗缺，卢氏死于上年9月。

饬遵。总督随即具奏；请准义律依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至省照料。所请一节经奉上谕准行，义律大佐于是在1837年4月12日到达广州。

巴麦尊勋爵的政策

义律大佐在逗留广州的三个星期中，叠函巴麦尊勋爵，将他争取直接文书往来的手法如何高明，大事铺陈，虽然在这些文书往返中，总督对他本人无异是长官对待下属，而且总督对于这类文书往来的任何必要性都蛮横地拒绝理会。巴麦尊勋爵对于局势实质的认识，比义律大佐要深入得多。他一再指示，务必要同总督直接文书往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由行商经手传送，尤不可用禀帖形式。第一个训令是义律大佐在11月21日即正在广州的时候收到的，他也曾几次三番试图找到一种符合于本人所奉训令的交往形式，但是总督始终不为所动，于是监督只得下旗撤回澳门。他向巴麦尊表示说，他抱有一种信念，"认为子爵阁下，倘能奉女王陛下之命，致北京内阁一函，派一兵舰送往白河口，则可立即从中国皇帝处取得一项对此点让步的谕旨"。

义律在1837年2月间的几次呈文中，都指出有因鸦片问题而发生纠纷的可能。结果，巴麦尊勋爵就建议派遣东印度防区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爵士访问中国；并令今后不时派一两艘兵舰前往。这是一个新转变，以往的一切决定毋宁是幕后表示希望炫耀武力而已；现在这个新转变则几乎可以表示出政府已面临制订政策的关头了。

马他仑海军少将在1838年7月13日抵达中国。义律立刻请领赴广州的红牌，凭证由澳门的一位小军官送到，但另附一件标明"谕帖"的加封公文。甚至义律大佐也觉得要从这样一个小军官手里接受"谕帖"，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于是他立刻退回公文，要求改正。7月29日他在去广州时，致函总督，请他派遣官

员同马他仑海军少将联络。他在信上没有标明"禀帖"字样,但却敞着口,希望这样也许会被接受。信是由协台带给总督的,但旋由行商退回,并且口头传话说,除非标明禀帖字样,总督决不接受这项文书。在这期间,定期航行的"孟买"号客船于7月28日在虎门被命令停下来。先是被亚娘鞋炮台轰了几炮,后来又有人上船检查,追问"马他仑海军少将和他的任何兵丁、女眷或水手在不在船上;如果在,就不许他们前往虎门";检查官还明白否认他有搜查鸦片的意思。在虎门岛的内炮台地方又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总督口头否认这事件是禀明办理的,但并无书面表示;8月4日马他仑海军少将将三艘兵舰调到穿鼻,并且要求解释。马他仑海军少将受到负责广州各口防务的水师提督关天培最坦率的接待;经过以书面表示完全不知其事并相互作礼节上的往来之后,英国兵舰在8月6日撤往铜鼓湾①。

91

行欠问题

在这时候,鸦片显然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但是在探讨这个题目之前,最好先讨论一下另一个将中英两国带到冲突边缘的问题——即行欠问题。行商拖欠外国商人的债务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是产生于通常贸易过程中货物买卖关系,另一种是产生于外商贪图高利而作的放款。

在1836年年底,兴泰行已无力还欠。外国人追索的欠款共达二百七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八元,其中有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三十九元是经联合调查委员会认可的。1837年4月21日,有关外国商人敦促公行禀请总督,令兴泰行了清债务。12

① 中国当局有一项特别侮辱人的措施,应该在这里提一下。总督和粤海关部每年都要将一项会衔告示重新颁布一次,谕令行商通事向外国人宣布教化,以"制其骄淫"。参阅《文选》,第52、53页。商人、通事,凡引诱外国人嫖娼和其他淫行者,一律捉拿法办,从重治罪。这种告示,每年重颁一次,张贴在公所、即行会会所的大门外面。

月中旬，经商定勒令经官的行号①停业清理，他所欠外商约一百万元的债款着与兴泰行所欠债款一并厘清。最后在1838年3月21日，债权人一面将清理毫无进展的情况提请总督注意；一面将他们的案件以呈报巴麦尊勋爵的呈文的形式报告本国政府。最后商定债款分年摊还。在1838和1839年两年中，共摊还了十九万八千三百元。此外就没有再归还分文，这个问题最后是根据《南京条约》第五款解决的。

垄断与自由竞争

92

1834年以前，英国方面的垄断一直和中国方面的垄断相颉颃。虽则规定贸易条件的是中国公司，然而英国公司仍旧能以单一的阵容来对抗法定课征以外的一切勒索。现在中国的垄断依然如故，但是英国人的垄断却已经取消。英国商人沦为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方面是密切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是完全自由竞争，在这种情形下外国商人大量增加了茶、丝和其他中国产品的外运，以致不得不付出高涨的货价，涨价的幅度从丝价的上涨25%到茶价的上涨55%。至于他们大量增加的进口货，则所得货价锐减，计鸦片降低了15%，棉花降低9%，英国制造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外国商人在行商掌握之中一筹莫展。随着对于本身商业地位的削弱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对于本身政治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屈辱也就更加敏感了。

① 即天宝行。——译者

第六章　第一次中英战争的原因——鸦片问题

1. 鸦片的流入和走私"制度"

制鸦片的罂粟早在唐代(公元618到906年)的中国文献中就提到过;973年编纂的《开宝本草》中提到罂粟子的医药功用。十二世纪的一位医学著者曾经提到用罂粟壳制烟膏之法。首先提到如何就地割破新鲜罂粟壳提取纯浆、俟凝炼后即成鸦片的,就是王玺的著作(大约是1488年),王氏曾任甘肃巡抚达二十年,在那里必与回民有过接触,因而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这种阿拉伯的工艺。

鸦片的早期历史

用现在的方法制造鸦片,在中国已有四个多世纪之久。吸食鸦片的方法是通过吸食烟草的方法而传入中国的。西班牙人经西方而进入东方,把美洲烟草带到了菲律宾,在1620年左右,烟草流入福建,再由福建流入台湾。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们如同时代的英王詹姆斯一世一样,对于吸食烟草是极端厌恶的;晚明和清初的历代皇帝都一再降旨严禁,但是全被视为具文。

吸食鸦片的来由

台湾是个丛林密布、疟疾流行的地方,凡是疟疾流行的地方,鸦片总是一个天然的治疗方法。为了以毒攻毒,早期的殖民者把鸦片和砒霜混在烟草里吸食。在1624到1662年间,荷兰人统治着台湾,因而爪哇流行的那种鸦片同烟草混制法,传入台湾。这种习惯又经由厦门传布到中国大陆。在1800年以前,单

94 食鸦片的办法即使有，大概也不多见。1729 年雍正皇帝颁降第一道查禁鸦片的上谕，对违禁贩卖鸦片和开设烟馆的人，制定严刑，但是对于吸食者却没有规定具体的罚则。

外国鸦片流入中国

外国鸦片首先是由葡萄牙人从果阿和达曼运入中国的。1729 年，也就是雍正皇帝颁发禁烟上谕的那一年，输入的数量一年不超过两百箱①；直到 1773 年，鸦片的进口还操在他们手里，可是进口的数量已增到 1767 年的一千箱。旨在禁烟的上谕，绝不会是为了区区两百箱之数而颁发的；显然，在十八世纪时，鸦片是准许作药品进口的。在 1589 年，对于列有鸦片在内的那一类商品业已课征进口关税；1615、1687 和 1733 年（即颁发禁烟上谕之后四年）所制定的税则，也都同样地列有鸦片一项；1753 年的"关册"载每担鸦片纳税三两。1773 年是英国商人把鸦片从加尔各答输入广州最早的一年；鸦片的贩运听由私商经营了几年，但在 178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行鸦片专卖，把这种贸易全部抓到自己手里。到 1793 年，广州的进口已达一千零七十箱，于是皇帝据两广总督的奏请，重申 1729 年以来历次颁降的禁烟上谕，并加重罚则。1800 年嘉庆皇帝降旨，除严禁输入鸦片外，并禁止在国内种植罂粟。

鸦片对于白银准备的关系

直至 1800 年为止，在广州的贸易中，鸦片是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一种商品。它和英国哆罗呢及印度棉花同样地构成进口船只的一部分货载，同样地在商馆里公开处理，也同样地由来船的保商经手出售。对于这种鸦片的需求是欢迎之不暇的，因

① 旧的统计表从不注明重量，而只计箱数。拉杰普塔纳的各邦出产的马尔瓦鸦片和波斯鸦片每箱约装一百斤（$133\frac{1}{3}$ 磅）；英属印度政府专卖局的孟加拉鸦片（产自巴特那和贝拿勒斯）每箱装一百二十斤；但在熬成烟膏时，每箱马尔瓦鸦片净收七十斤，而每箱孟加拉鸦片，约收六十二斤。

为这种需求可以作为减少西方国家白银准备大量外流的一种手段，这种准备原是为使购买茶叶所需的现银不致缺少，而供随时提取和留作不时之需的。自禁烟上谕颁发以后，鸦片贸易就不能再照这种办法进行了；于是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储存站，澳门的中国当局可以比较放心地闭眼不管。但是事实上，由于葡萄牙方面所加的种种限制和市政捐税，载运鸦片的船只通常还是把它放在船上，一路带到黄埔，俟成交后在船边交货。在1821年以前的这一段时期中，任何一年的进口最大数量也不过五千箱挂零。 96

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贸易的政策

1800年的上谕公布后，公行和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垄断组织在广州就不再经营鸦片了。自1809年起，公行即须具结保证：凡承保来黄埔的船只，并无夹带鸦片情事；甘结尽管经常提供，但是来船还是照旧携带鸦片。东印度公司曾试图禁止从英国或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但是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它终于以限令本公司的船只不装载鸦片来聊以自慰。可是，它对印度方面的行政、财政或商务上的各项办法并未作任何变更。所以鸦片继续向中国贩运是不足为奇的。

禁烟的效果

在禁止鸦片进口的前二十年之中，对于上谕不过是阳奉阴违而已。经营方法作了上述的一些改变；以旨在贿买官厅方面庇护的派款替代了关税。这种派款是由那些不属于公行的中国买主交纳的。外国进口商售货收现之后，其他概不闻问。同官厅方面一切的交涉都是由中国买主办理，一俟交涉停当，各方面的眼睛就立时都闭起来了，甚至停泊在进口船只旁边的缉私巡艇上的人们也不例外。

1821年9月间，在澳门收受鸦片贿款的官吏们和总督左右的官吏们之间发生了争执。禁烟现在有点认真起来了，澳门和

黄埔两处既被封锁，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所有在中国辖区以外的鸦片都卸到停泊在领海外的船只上，第二个步骤是设置经常性的驳船，冬季停泊在伶仃岛，当西南季候风到来时则移泊金星门、急水门和香港，以策安全。

97

在伶仃岛的鸦片贸易

在伶仃岛进行鸦片贸易的办法，和以前在黄埔所采取的办法一样，但是却更加便利、更少风险，因而兴隆起来。载有鸦片的船只一到伶仃岛就把鸦片卸到趸船上，然后载同合法的货物前往黄埔。在趸船上，把鸦片从箱中取出，改装成大小合适的席包，然后放进由五十到七十名水手驾驶的武装快艇里。这些事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而且往往不避巡艇的耳目。直到1836年为止，从未有过任何认真禁止、甚至限制鸦片贸易的举动。由于是一个公开市场上的现款交易，鸦片贸易不但比非以赊帐方式售给保商不可的那些英、美产品的推销所遇到的困难要少得多，而且还为备办回程货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手段。结果是鸦片贸易大为扩张，其进口额从1811—1821年期间平均每年四千四百九十四箱增加到1821—1828年期间平均每年九千七百零八箱。

1821年—1839年的伶仃岛时代

1821—1839年的伶仃岛时代，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上述1821—1828年间的简单办法阶段。1828年，总督曾颁布告示，痛斥吸食鸦片的害处，并通饬厉行禁令；此后，贩运鸦片的船只便沿海往东、往北去进行交易。不久，趸船便停泊在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南澳以及更北的一些地方，作为与伶仃岛联系的双帆船和纵帆船的存货站[①]。

和东路销售鸦片偕以俱来的有三个结果。在广州，凡走私行贿的事都交由中国买主去料理，但是在这个地方，为交货便利

① 关于在南澳的“制度”的叙述，请参阅《文选》，第86—88页。

起见，外国卖主开始干一些贿买政府官吏的卑鄙勾当。第二个结果是，在广州以货易货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将鸦片所售的现款全数带回。例如，曾经有一艘船将它和另外三艘船出售鸦片所得的四十三万元的黄金、白银一并装运而去。这些款项一带到广州，便投入贸易或购买茶叶或装运出洋，和在广州进行贸易没有丝毫不同；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显然是东路一带地方巨额现金银的外流；而这种外流之所以格外引人注意，乃是由于广州官吏的外快和广州商人的特权都因这种越过广州的贸易而蒙受到损失。第三个结果是对于外国产的鸦片消费的大量增加。从1821—1828年伶仃岛时代第一阶段的平均每年九千七百零八箱增加到1828—1835年伶仃岛时代第二阶段的平均每年一万八千七百十二箱，几达一倍之多。面对着东海岸贸易的这三种结果，官吏们当即随时具折奏闻、出示晓谕并严饬行商懔遵；但是除了舞文弄墨之外，认真查禁的措施却无丝毫迹象可寻，因而鸦片贸易仍然有增无已。

98

伶仃岛时代第三阶段，1835—1839年，是以外国鸦片贩子的更趋活跃、中国官吏的更加宽纵、鸦片弛禁问题的讨论和从而引起的希望以及帝国政府不惜任何代价肃清贩烟和吸烟的决策为特征的。其直接结果是鸦片进口在1835—1839年四年间增加到每年平均量至少三万箱。外国进口商们已经真正尝到了滋味。他们一度是没有插手的，但是现在却开始从伶仃岛趸船上走私鸦片，将货交给岸上的买主——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作，也许这样作的并不多；但是旧日的垄断组织和该组织所行使的管理权已告结束，而对于后来的“自由”商人却迄未建立起任何适当的管理机关。不久大批外国人所有的或是受外国人控制的船只就象“客船”一样的往来航行了。鸦片的交货，常常伴随着

走私船和政府缉私艇间的武装冲突。

这类不正常的手段改变了鸦片贸易过去所凭以进行的条99件。尽管皇帝降旨查禁，三令五申；尽管总督恪遵上谕，布告晓示；尽管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严饬行商懔遵禁令；但是上自总督、粤海关监督、巡抚、提督、知县以至于和衙门稍有瓜葛的小人物，只要看到其中有利可图，对于违令犯禁是向不问闻的。可是，现在外国走私者们竟把那张从非法贸易中捞取非法使费的网给撇掉了，官吏们体会到他们得不偿失的那一点所得都被剥夺殆尽，于是在1836—1838年之间，奏折、降旨、布告、下令和弹压，扰扰攘攘，展开了一场斗争。局势非常混乱。前途不可预卜，广州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已紧张达于极点。

在禁烟问题上理论与实际的距离

对中国烟贩的惩处

当局根据十八世纪的历次上谕，开始对开设烟馆，也就是零售鸦片供人吸食的中国人采取了措施：逮捕了许多人，或加以监禁，或没收财产，或发配边疆，或判处极刑——即绞立决。1838年12月12日，有一名官员到商馆那里，着手在瑞典行前面靠近美国旗杆的地方放置绞架和其他用具，准备处决一个被判绞刑的鸦片烟贩。外国人被这种噪闹声招引出来，聚拢在周围。美国领事首先降下美国国旗，作为对把商馆园地变成刑场的一种抗议。随后，在场的外国人便强行阻止在那里架设帐篷和其他装置；在这种坚决反对之下，这位官员退出商馆地界而在界外把犯人处决。这种事是在午前发生的，到中午时商馆前面就聚拢了一大批中国人，但是并没有什么敌对的恶意表示。假使当时所有的外国人全部回到他们的屋子里去，那么也许不致于有什么重大的事故发生了；但是其中有些人开始清除这个广场，于是惹出乱子来了。情势一度极为严重。中国人有八千到一万人之数，少数几个任性的外国人竟向他们冲过去，遇人就用木棍乱打。在一点半钟的时

阻止处绞犯人

候，群众占据了广场，朝商馆的窗子上掷石块，拆毁栏杆，气势汹汹。大约在四点钟的时候，南海县带着一、二十名兵勇到场了，上来就抓了三、四个为首的人，并且用藤条乱抽乱打，立时就把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商馆的广场上赶光了①。

100

因为发现有向广州商馆私运鸦片的情事，于是在12月初下令封仓。其英国商务监督的地位已于1837年9月29日为总督所承认的义律大佐，在1838年12月12日傍晚到达广州。他得以暂时地解决了走私的纠纷，1839年1月1日恢复了贸易。

造成第一次中英战争的因素

局势现已发展到险恶阶段，在外国政府、外国人民和外国商人的心目中，除鸦片贸易问题之外，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更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政府看来，鸦片贸易却是唯一争执的问题。至于民事和刑事的司法问题、人身的限制问题、贸易的垄断问题、不定期的而又无一定标准的需索问题、人身和财产的保障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随即发生的战争所解决的——在中国人看来都是根本谈不上争执的；这些问题是早已由自然法则和天命决定了的，对于上天的决断是不容提什么申诉的。但是，鸦片问题是一个立待解决的问题。他们根除吸烟和贩毒的决心是建筑在两个有力的论点上的。道德方面的理由，也就是他们想把人民从堕落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志愿，在今天也是不容置辩的；即令在九十年前，当西方国家开始向那个成为十九世纪特征的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进军时，否认其他国家有老老实实去提高其道德地位的权利的，也寥寥无几。对于洞察

鸦片问题的两个方面——道德方面和经济方面

① 1839年2月26日饬将烟犯一名绑至商馆前广场处绞的命令，虽经义律大佐抗议，并经英、美、法、荷等国下旗反对，还是成功地执行了。

英国政府对于12月12日事件的态度可以从巴麦尊勋爵1839年4月15日的公文中看出，他骂道："我也愿意知道，那些人究竟凭什么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对于中国司法官员在一个中国城镇执行上级命令进行干涉。"

101 鸦片的毒害而除恶务尽的少数中国政治家和历代皇帝的举动，自不能不完全赞同。至于他们的行动的第二个理由，即白银外流，却有商榷的余地了。

在整个十八世纪，输入广州的主要是金银，一面用以补进口之不足，一面供进行贸易所必需的底款之用。直到 1826 年，美国船还是运现银以作为购买回程货资金的主要部分——整整占四分之三；但是自 1830 年起，美国商人发现他们无须再输入铸币了，因为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可以供给他们以伦敦汇票，以代替调用西方国家白银储备那种不经济的方法。荷兰、法国等其他国家的贸易也需要输入白银。直到 1817 年止，白银源源流入中国，而且就存留在那里。自 1818 至 1830 年，所知道的金银进口之数（主要是由美国船输入的），即达六千万元，所知道的出口之数（全部是由英国船运往印度的）约达四千万元。自 1831 年起，趋势转变了；进口减到了很小的数量，非增加现金银的装运，不能使贸易平衡。

中国对棉花和鸦片的需要

在任何一种经常只向一方面运送金银以支付经常贸易逆差的贸易中，人们总会出乎本能地力求用一种孳生利润的商品流转去代替不产生利润的现金银的移动。中国方面大量需要的商品只有两种，即棉花和鸦片。在我们所谈论的时期中，从印度输入广州的棉花数量很大而且日益增长，其价值只是从 1826 年前后起才为鸦片所超过。在 1830 年以前，鸦片进口价值的增加不过仅足以平衡进出口的差额而已；但是从 1830 年起则不但平衡了英国的汇票，而且还足供抵付美国贸易所赖以资助的汇票。

中国官吏们很快就注意到白银从内流变成外流的这种转变。他们在大惊之余，清楚地认识到现在中国势必要丧失掉近一百多年来从对外贸易所获得的白银了。

就商业而论，且撇开社会和道德方面不谈，真正补救的办法就是扩大贸易，以货物代替现金银出口。这一点现在已经作到了①。可是，当时中国人不拘官商所同样抱着的那个基本观念，就是垄断和限制，中国当局就是根据这种原则而决定采用绝对禁止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的办法来挽救商业上财富的外流的。但是禁烟上谕被视同具文，鸦片进口仍旧有增无已。随着鸦片禁止进口。关税的征收停止了；但是代替关税的不法课征的数目却三倍于关税。用不着说，帝国官吏是贪污的；在违禁品的征课上，他们所干的正是自从有人懂得那一套以来中国官场上就一直干着的那套勾当，也就是能向商人榨取一文便榨取一文。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以备不时之需，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实惠的。他们在 1838 年夏季受到了严厉的申斥；钦差大臣的即将到省，无异是给了他们一个警告，表示就要来考查他们推行禁令的情况了。他们想以严刑峻法在六个月之内挽回三十八年来的废弛。

102

中国官吏与鸦片

各外国政府对于鸦片问题迄未宣布它们的政策。在因鸦片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事件使东西方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急转直下时，美国政府并未与闻其事。事实上，在 1839 年所缴出的鸦片，不论是来自英国人、袄教徒或美国人手里，全都是属于英国人所有的；美国人所有的那一批五十箱土耳其鸦片显然不在呈缴之列。在 1837 年 11 月 19 日的一件火急公文中，曾经迫切陈词，

西方国家政府对于鸦片问题缺乏政策

① 1837 年鸦片占进口总额 53%，原棉占 22%；1907 年鸦片占外商进口贸易额 7%，原棉占 0.4%。1837 年茶占出口总额 63%，丝及丝制品占 32%；1907 年茶占全部出口额 12%，丝及丝制品占 34%。

力请英国政府对于鸦片问题必需有所决定一节,予以注意;但未奉到特别训令。商人们被警告说,英国政府不能为了使英国臣民得以破坏他们所与通商国家的法律而进行干涉;凡由中国厉行鸦片禁令而受到的损失,应由自取其咎者自行负担。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位监督却一再受到警告,叮嘱不得对英国臣民的事业加以干涉,不得施行无法强制执行的权力,也无权递解英国侨民回国。从律劳卑死后直到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广州时为止,英国政府颁发的另外一些训令,所涉及的只不过是同中国当局交往的方法和公文往来的形式而已。

103

2. 林钦差和鸦片缴官

在 1838 年,达官显宦诚心要禁止鸦片贸易的实寥寥无几;但是集帝国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的道光皇帝却是其中之一。他在禁烟问题上是毫不迟疑的。倘若一个人只要有诚意就能把一个不情愿改良的民族加以改良的话,那么道光皇帝早已作到了。不过靠了严刑峻罚的政策,在能物色到一位真心诚意奉行皇上意旨的官员的地方,禁烟是可以在一时一地令出必行的。

道光皇帝

原籍福建的林则徐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员。在五十五岁那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奉派为钦差大臣,去处理在广州发生的事件。钦差大臣是在奉派的任务内代表皇帝办事的。林钦差所奉委的权力是清朝历代皇帝所很少委付的。他是具有立即禁绝贩卖和吸食鸦片的决心的皇帝的替身,他是奉命“前往查办”的。

钦差大臣林则徐

林氏于 12 月受命,1839 年 3 月 10 日到达广州。八天之后,他传谕行商,历数他们的罪过,并宣称倘外商所存鸦片不即缴出,必将正法一、二人。

104

林钦差对洋人的谕帖

同一天，他直接对洋商颁发了另一道谕帖，饬令外商"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共缴若干箱，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一面出具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久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本大臣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①限令到三日内办竣并取具甘结。次日，即3月19日，粤海关监督谕令在钦差大臣驻粤彻查外商与内地民人结果未定之际，禁止一切外侨前往澳门。

林氏的谕帖对洋人所发生的效力

从这时起，所有外商都被软禁商馆之内，不准离开广州，禁止与他们船只往来；船上小艇也只准前往广州，而不准返回黄埔。这时，军队已向四郊集结：21日，满载武装人员的炮艇已在商馆前江面集齐。三天的限期在3月21日届满；第二天宣布，外商所愿呈缴的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是绝不足数的。

义律大佐已去澳门，以为钦差大臣会驻节于该地。他在22日接到3月18日的各项谕帖的抄本之后，立即通告所有停泊在洋面的英船开往香港，准备抵抗；并置它们于当时停泊中国海面的英舰的调派和保护之下。同时，他致函总督，抗议广州方面的作战准备，并声明：一俟接奉通知，拟随时与粤省当局会晤，竭诚努力，以慰大皇帝的圣心。他写信给巴麦尊勋爵说：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可以抑制广东省地方当局的轻举妄动，这是无可置疑的。3月23日他发出一份通告，其中历述在商馆前的行刑、种种作战准备、不准外商离粤的禁令以及钦差大臣的恫吓语句等等之后，警告所有在广州的英人说，他拟为他们立即申请离境的红牌，要求他们准备采取这个步骤。3月23日，他离开澳门，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在24日下午6时到达商馆。

105

① 录自林则徐《谕夷商》原文，见《信及录》，第21页。——译者

义律大佐刚一登岸，警报就迅速地传布开了，警岗一个个地把封锁商馆周围一切通路的命令传达过去。不到几分钟的工夫，广场上的中国人都走光了，广场的进口被关闭和把守起来，各商馆门口都排满了持长矛的兵勇，钦差大臣更下令着所有买办和仆役一律撤离商行。到晚上 9 时左右，各商馆里只剩下二、三百名外国人了。翌日，即 3 月 25 日，中国方面主要从事于完成其布置软禁外商的工作，并用尽种种方法以防范他们与中国人往来。

包围商馆

义律大佐查觉到，在目前的情势下，他以前向巴麦尊勋爵所陈作为适当对策的那种"坚决的语调和态度"是不可能的了。3 月 25 日，他正式向总督申请在三天内将护照发给在广州的所有英船和英人。总督把这项申请咨送钦差大臣察核；钦差大臣咨复说，须先遵谕将鸦片呈缴，然后自会发给护照。

规避是不可能了。中国方面早在上年 12 月，就已经发觉在压力之下可以迫使英国商务监督制止在内河进行鸦片走私；现在则发觉也可以迫使他对以前所称不属于他管辖范围以内的外海走私加以管制了。3 月 27 日，义律感到他不得不通知中国当局，他愿将"英国人等经手之鸦片悉数清缴"①；并为付诸实行起见，他在上午 6 时布告英国人民遵照，将现有鸦片悉数缴给他本人。

义律应允呈缴英人所有鸦片

106

钦差大臣也注意到美、法、荷等国商人，说这些商人的鸦片贸易并不少于英商；但是当他获悉这些商人手中的鸦片都是英国人名下的，并且已列入义律大佐呈报的数字以内，也就不再追问了。据说，澳门的葡萄牙人已将他们的三千箱鸦片运往马尼拉。

---

① 录自义律具禀原文，见《林文忠公政书》乙集。——译者

出具嗣后永不贩运鸦片的甘结问题，困难重重，因而暂时未能解决。4月13日，有少数中国仆役回到商馆，六天之后正式准许所有买办和仆役回去。呈缴鸦片进行得很慢，甚至曾到虎门和澳门视察过的钦差大臣也看出延缓是无可避免了。5月4日，钦差大臣恢复了交通，撤除了贸易封锁，次日将六个星期以来严密监视外商的岗警也撤消了。可是，十六个著名的大鸦片进口商不在恢复自由之列，仍不准离开广州。

允缴的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鸦片到5月21日方呈缴完毕。第二天，义律大佐发布一项通告，其中对"无理拘禁广州全体外侨，漫无限制地拘留不放，并强迫外侨以财产缴官"等，加以谴责。他重申前令要全体英侨先他或同他一齐离开广州，并着英国船只目前不得驶进广州港口。他最后还为英国政府保留了批驳或修正他所下命令或所承认的任何赔款要求的充分权力。

107 英侨离开广州；美侨仍留在广州

义律大佐在5月24日偕同所有尚未离去的英侨从广州启程前往澳门。到6月1日，留在广州的外商共约二十五人，全都是美国人。证诸由省去澳沿途中国官员的友好态度，可见钦差大臣以前所说缴烟之后一切照常云云是具有诚意的。缴官的鸦片不久就用石灰、盐浸化后注入海中。为酬答他这次的大功，林钦差由湖广总督调充为更重要的两江总督。

鸦片继续走私

鸦片走私在这期间被制止了，但并未消灭。在6月间，英人离省之后不久，据报沿海一带的贸易船又开始经营鸦片。7月间，义律大佐曾报告说："目前鸦片贸易在广州东约二百哩的几个地方颇形活跃。"9月11日，义律大佐下令所有在香港的船主向他宣誓船上没有装载鸦片，并命令所有从事鸦片贸易的英船立即离口。烟价因缺货而暴涨；缴烟之后，在广州交货的鸦片价格由通常的每箱五百元立刻涨到三千元；10月间，沿海各地的

烟价每箱在一千至一千六百元之间，年底降到七百至一千二百元之间。可是，经营鸦片的条件和经销商现在已全盘改变了。"主要烟贩不再驻在中国，他们的船只，不论大小，都备有武装人员和火器，俾能抗拒水师船；此外，有不少当地私贩也武装起来，以与他们本国政府的官吏相对抗。"结果是，"鸦片贸易活跃一如往昔，安全和利润也不减当年"①。

3. 战争爆发前夕的事件

英国人企图把澳门变为贸易中心

108

钦差大臣在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已下令恢复贸易；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英国人对于获取天朝的茶叶和大黄并不急切。义律大佐已经以5月19日的通告，命令英船一律不得驶入粤江。6月5日，他通知钦差大臣说，该商务监督和英商既已常驻澳门，嗣后到埠英船即在澳门装卸货物。这样一来却招出了一道命令，除当地贸易之外，其他一切贸易禁止在澳门进行，并限所有船只一律开进黄埔。英商支持义律大佐的立场，拒绝让英船和英货进至虎门以内。中国方面当然不满，于6月14日颁发一项布告，指明当局业已恩准恢复贸易；并论到两艘美船的进口，然后责问为何他国船只不进口贸易。义律大佐以一项宣言对此予以答复，在宣言中，他将争执的问题综述如下："英船和英商之所以不去广州和黄埔，是因为……少数无法自卫的商人在广州政府当局掌握中毫无安全之可言；是因为在所受的侮辱和冤屈未获雪除以前，就一并忘记，会有损英国国家主权之威严……"

英货由美船运进广州

美、丹、德、西班牙等国船只均已开进黄埔。中立国家的机会来了，它们自不愿放过这个机会。美国船载着英国货物往来于香港和黄埔之间。在美国的旗帜下，贸易十分活跃，这使英国

①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或译《澳门月报》)，1840年1月份。

人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和利润。一家美国公司后来收买了九百吨的“剑桥”号载着堆满甲板、高达船栏、价值十五万英镑的英国货物，在 1840 年 6 月 22 日宣布封港前的最后一刻开往黄埔。

虽则胜利但以未能获得胜利果实而愤怒的这位钦差大臣，现在激于 7 月 7 日所发生的不幸事件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那天，有一群水手在香港对岸的九龙地方被卷入一场骚动。一个叫林维喜的人在第二天因伤毙命。义律大佐曾悬出赏格，征求行凶证据，以便定案；他又愚蠢地由他个人垫付一千五百元给死者家属作为赔偿，另付四百元以防他们被勒索，又以一百元付给这次骚动中受到损害的村民。他所得到的报答就是承认林维喜之死纯系事出偶然。中国当局自然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教唆捏造伪证；钦差大臣立即派员查办。义律大佐拿到调查结果之后，就定期开审，并且备文通知中国当局。8 月 12 日在一艘英国船上开庭。义律大佐没有能查出凶犯，这个审讯的结果于 8 月 16 日照会中国当局。

1839 年 7 月 7 日林维喜事件

109

中国当局不愿承认英国人对这个案件有审判权；在 8 月 2 日由钦差大臣、总督和巡抚会衔颁发的告示中，扼要地叙述了中国方面调查的结果，着重指出了义律大佐所付的“买口钱”；声明该案只涉及英国水手，对于美国领事的声辩可无异议接受；历述中国对命案的外国人犯行使管辖权的先例；凡对停泊香港船只接济食物，除由中国通事和特许的买办照章办理外，一律在禁止之列。钦差大臣和总督在颁布这道告示之后，就率领大军移节广州澳门之间的香山；8 月 15 日奉他们的命令在澳门发布了两道告示。一道是只对在澳门和船上的英人断绝一切接济。另一道是限所有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人三日内一律离去，违者即捉拿严办。这些命令都立即遵行了。

义律大佐于8月23日离澳门去香港。第二天，澳门葡官奉命驱逐所有英商及其眷属出境。葡官通知英商说，他已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于是他们决定立即离澳。登船的那一天是8月26日，男子和妇孺都匆匆离开住处逃往船上，以求安全。

英人被逐出澳门

8月31日又发布了一道告示，这道告示在别的国家里，无异是一个宣战书。据说英人"冥顽成性"，应予挞伐，并号召沿海居民购办兵器，准备自卫。另一道布告是禁止为英船领港。

110

在这恼人的夏季中，英人没有一艘兵船可予以保护；直到8月31日"窝拉疑"号才到达那里。这时义律大佐就以如准英商及其眷属回住澳门，愿负责保护一节，商诸澳门葡官；但是这位谦恭有礼的葡萄牙人一再表示歉意，婉言谢绝。2日，义律在香港通告当地人民不得在井内投毒，因在岸上业已见到此种恫吓语句的揭贴；4日，因停泊香港的英船苦于缺乏新鲜食物的接济，向九龙中国官员递送一份抗议书。抗议书是由义律亲自带去的，在九龙耽搁了数小时之后，义律便下令向中国兵船开火，因为它们强迫当地老百姓非把英人事实上已经买妥而且已经付过钱的食物拿回去不可。这种举动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说不过去的；但是，从那时起，却可以按照略高于平时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食物了。

9月12日，往来于马尼拉和澳门之间的西班牙贸易班船"比尔拜诺"号在澳门港内被中国人捕获后焚毁。林钦差认定这艘船就是那艘以经营鸦片贸易著名的英船"弗及尼埃"号；后来他放弃了这种论调，但又辩称，该船虽悬西班牙国旗，却是为英人运载鸦片的。这段穿插可以作为中国人如何确认一个被控的船或人为查有犯罪实据的良好事例。事实上"弗及尼埃"号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就离开中国领海了。1841年6月，中国方面偿付

"比尔拜诺"号事件

了为数达二万五千元的赔款，西班牙官员表示满意。

中国方面的主要要求始终就是要将殴毙林维喜的凶手交出。起初的要求是这样的："义律大佐倘不能于滋事殴打各犯中查出凶手，何以不将各犯交由中国当局，'审一正犯抵命'耶？"义律大佐所采的方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把被控犯有杀人罪的英人交由中国司法当局审判是五十多年来英国政策的既定原则。在目前的情形下，他还没有到非拒绝将一名查有实据的凶犯交出不可的时候；他所要应付的要求，乃是要交出一个替罪羊——也就是"审一正犯抵命"①。他对这点是不能同意的。

111

但是在10月中旬达到了一个妥协阶段；10月20日义律大佐布告英商可不具结而将船开往穿鼻贸易，至于缴税验货，则一如黄埔之例。可是，在这个当口，10月13日抵达澳门的英船"担麻士葛"号已于15日向中国当局请牌进口贸易，该船船主所以这样作法，是因为在加尔各答时曾征询过法律专家的意见，以为义律大佐限制英商进行贸易是越权行为。这位船主领到红牌之后，即将该船直驶黄埔，并遵式签具了"如带鸦片，愿受人即正法、船货充公处分"的甘结。一般人都认为：钦差大臣所以重起战端，实由于"担麻士葛"号这种有损英国商务监督威权的行为所致。

担麻士葛号

10月25日钦差大臣颁下札谕，词意决绝，命义律大佐交出林维喜命案凶手，并限令各船在三日内进口，不然即须开行，违

① 查林则徐等会批称："……至谓伊国律例，亦应诛死，可见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违抗此例乎？……又云'该罪犯不发觉'，更属欺人之语。查义律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再违抗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见《信及录》，第115页），可见上文所称责令交一替罪羊，以一命抵一命之说，全系著者捏造之词。——译者

者一律焚毁。27日又谕称："担麻士葛"号以及美人所收购的"码米"号俱已进口，并皆遵式具结，何以其他船只不愿照此办理？而且，英人并未打算制止沿海一带的鸦片贸易以及从而引起的杀人行为，应将外国船上窝藏的汉奸一律交出。

义律大佐简短地答复说：英国政府决不包庇"犯罪和为非作歹"的人们，但在沿海一带所发生的事件并不在他管辖之内。在收到上述两项文书的前一项之后，义律大佐即要求英舰"窝拉疑"号采取步骤，防止英船进入中国政府控制的范围以内。士密舰长率英舰"窝拉疑"号及"海阿新"号于28日离澳门，11月2日到达穿鼻。他立即将致钦差大臣和总督的文书送到岸上，要求他们撤消要焚毁英船的前令，准许英商及其眷属在岸上居住并准许雇用中国仆役和购买食物。第二天上午，有二十九艘中国兵船向英舰驶来，显然准备开仗。士密舰长断然要求所有来船立即开回沙角以北的停泊所。中国水师提督答复道：他所要求的就是交出殴毙林维喜的夷犯——并且补充说，只要保证在限定期间内交出人犯，他就可立即撤回师船。当时在"窝拉疑"号船上的义律答复说："义律业已一再郑重声明他不知道殴毙林维喜的凶手；如已查出，当早已惩办，一旦捕获，亦必惩办。"士密舰长随即向中国舰队开火迫其撤退。结果，英方损失轻微，而中国舰队则有四船被炸毁或炸沉，其余也负重创而去。这就是战争爆发的经过；现在检讨一下双方的动机和行动是有必要的。

112

4. 中英两方的动机

林钦差的动机

林钦差的整个方针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的唯一动机就是要取缔鸦片进口和吸食鸦片。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依照中国人的责任观念，将全体外国人，不分良莠，一体加以圈禁，以使

每个人过去或将来的任何行动都由全体负责。他所以这样做是要获得当时在中国海面而尚未售出的鸦片，并取得不再继续贩运的保证。鸦片是作为赎身钱而呈缴的。中国当局固然有权将这些鸦片查获销毁，但是并没有这样作，而要求外国人自己送去。关于具结问题，林钦差不是那样成功。外商愿意签具一份各该具签人不再贩运鸦片的声明，这却远不能达到中国方面所要求的目标，他们是要当时在林钦差掌握之中的那些外商的签字，不仅对具结人本人有拘束力，而且对将来来华的外商也同样有拘束力，不仅对本国人有拘束力，而且对中国人以外的一切国家的人民也同样有拘束力。钦差大臣对林维喜案的干预，按照中国法律是正当的，就中国人的观点而论，也是必要的；然而却仍是战术上的一个错误，因为这使西方国家注意到，除鸦片问题之外还另有其他争执问题这一事实。

113

义律大佐的观点

义律大佐的所作所为是否在他的权限以内，当时在中国和英国都引起过争论；但是，既然英国政府继续执行他的行动所必然导致的那个政策，对于权限问题也就毋需置辩了。今天只须谈一谈他的方针是否必要和明智就够了。当钦差大臣剑拔弩张的时候，这位英国商务监督开始是采取"坚决的语调和态度"，而当时英国的舆论则早已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补救广州方面国际关系上的种种缺点；但是不到四十八小时的工夫，他就看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向占优势的力量屈服，并遵照中国当局所颁给他的命令办理。各方面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指出，要想为广州方面的英国贸易所受的痛苦谋求补偿，终必诉诸武力。义律大佐无疑早有先见之明。但是他从广州撤退以后所采取的方针并没含有任何不必要的战争挑衅；他在自行厘定的政策路线许可的情况下是忍让而迁就的，他的政策就是在本国政府未

制定政策之前，维持现状。若不是钦差大臣因"担麻士葛"号进口贸易，重新活跃起来，致使他不能不动手的话，在未接到英国政府训令之前，他未始不会继续执行那个既定的方针。

外商的态度

旅粤侨商之间，自然是意见分歧的。在美、英商人中，有些是凭良心不作鸦片生意的，但是也和他们的同行一样，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需要调整。美商对于钦差大臣的各种要求，一般都是接受的。只要英国为西方利益打头阵，美国人就可以放心去这样作。顺从中国的要求，可以给他们以中立者的地位，这在国际关系纷纭扰攘之际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位。而且，这种中立对于英国人也是方便的，正如对美国人有利一样——虽然义律大佐直到英国人从广州撤出后才认清这一点。

114

英国政府所决定的政策

英国政府对于政策的制定一直尽可能地拖延，并拖延到了不应该有的程度。1833年，英国政府已使广州方面英国贸易的情况完全改观，事实上是使纯粹无政府状态代替了以前的专制管理办法。在五年多的期间，这位英国商务监督从没有奉到任何微露英国政府的看法的训令。除已下令派遣军舰和动员驻印度的一个小支远征部队以外，只是在获悉林维喜事件并接到11月3日穿鼻军事行动的报告后，英国政府才决定了将来应采取的措施。然而，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宣战。1840年4月3日的英国枢密院令也只一般地述及中国方面的那些"危害行动"和英国有获致"赔偿及赔款"的必要，并且抱着这个目的宣布说："最好是扣留中国的船只和货运并加以监管。"英国政府只打算进行报复，而无意于战争，除非中国政府拒绝赔款和让步。

中英斗争的平等观

在中国看来，鸦片问题是开战的唯一理由；既有此正当理由，他们就满心指望西方国家的支持。在一般外国人看来，鸦片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至于需要解救的其他种种疾苦，

则胪列了一大串，总结起来可以用“国际平等”四字概括一切。从律劳卑勋爵提出抗议之日起，即已战云密布。确是因为中国方面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使危机急转直下，战争才在它确实爆发的时候爆发；然而这场战争并不是为维持鸦片贸易而战的，它只不过是为求解决东西方之间的国际和商务关系而持续达二十年之久的一场斗争的开端而已。

115

第七章　中国第二次对欧洲人的战争：鸦片战争

1. 第一阶段：自1839年11月至1841年1月

林氏的大胆决定

林钦差完全了解他是面对着战争的，但是提到这个问题，他的唯一答复就是："我们不怕战争。"在这期间，禁烟运动还在他的本国人民中间继续进行。1840年1月5日，他"永远"断绝了英船、英货及英属地船舶在广州的贸易。然而，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范英国货物继续由中立国船舶输入。2月12日广州方面公布一道上谕，简派林钦差为两广总督，钦准永断英国贸易的决策，并着严查假手中立国人民续行蒙混贸易等情弊。上谕虽经公布，但事实上仍形同具文。

美国和其他外国贸易未受影响

除去英国之外，其他国家也是多年来就一直在广州派有领事驻扎，虽然他们代表本国政府的官员身分没有得到承认，可是他们本人既是商人，对他们本国商人却具有大班的地位和责任。1839年8月，美国领事已获准回广州办事，但是当他在1840年4月从广州赴海口时，遭到中国低级官员很大的凌辱。然而，美国人为他们自己和为他国商人经营的贸易却仍旧继续进行无阻。

封锁广州

因为靠了士密船长所能调度的一点兵力实无法保护香港停泊所，所以在冬春两季，英国船一直载同大部分英商和他们的眷属停泊在铜鼓洋面。在驶离香港以前，它们曾于11月13日遭

到九龙方面的炮击；2 月 28 日又在铜鼓遭到火筏的进攻，但未受损失。4 月底它们移泊金星门，5 月 9 日在那里遭到十艘火船的攻击。这时英国兵船和运输舰已陆续开到，6 月 22 日，海军准将伯麦爵士发布两项通告：第一项规定自本月 28 日起封锁广州江面和海口；第二项指定急水门和澳门水路作为准许商船停泊的地点。在这期间，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到达，带来了指派他本人和他的侄子查理·义律分别为英王陛下的正副委员、代表和全权公使的训令①。懿律海军少将是陆海军最高司令官。 116

大约在这个时候，奉林钦差之命发布的那道悬赏捕毁英船、擒杀英官的告示出现了，这道告示可以看作是中国照例的一道宣战书②。这类告示是依遵古法的，而且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还照常使用。这类告示是既野蛮而又残忍的，原不应出诸自命其文明优越于其他一切国家的一个政府的官员之口或形诸笔墨，但是中国人并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连白旗这类基本信号的使用还有待领教；他们拘泥不化地死守着杀敌是战争的主要目标那个道理。

中国的“宣战书”

发自英国的训令则限令到北方去作战，因而这两位全权公使在 7 月 6 日抵达舟山群岛的定海。定海早在中国方面毫无抵抗准备之下为伯麦海军准将所攻占；县官自杀，这是使英国人且惊且敬而又掺杂着轻蔑感的一长串插曲中的第一件。

在这期间，英军曾试图执行本国训令，设法将巴麦尊勋爵检讨两国当前问题的一封公函交由中国官厅转致北京政府。有一艘巡洋舰曾奉派前往厦门投递这封公函；舰上放下一只悬白旗 117

① 这时驻扎中国海面的英国兵力如下：兵船十六艘，载炮五百四十门；武装轮船四艘，运兵舰一艘，运输舰二十七艘；各兵种部队四千人，其中包括两个英国联队。

② 关于 1840—1841 年所悬的赏格，请参阅《文选》第 129、130 页。

双方的“欺诈”行为

的小艇向岸边驶去，中国方面立刻开火，巡洋舰于是发炮还击，但却找不出投递公函的方法。英国人对他们所认为的欺诈行为的愤怒，同中国人对他们不从武装起来的正面而从侧翼攻打炮台的那种欺诈行为的愤怒，是不相上下的。7月10日，英军又在宁波进行了一次同样的尝试；这次白旗受到了尊重，投书人也受到礼遇，但是中国当局虽誊录了一份副本，却拒收原函。两位全权公使既封锁了宁波和扬子江口之后，就扬帆直驶白河口。8月15日，在这里有一位军官，代表奉派谈判的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将公函接去。公函须递往北京，所以船舰就出海巡弋。最后商定到广州去举行谈判，以便彻底查明争执中的事实真相。英国全权公使以人不犯我，我决不再犯人的意思，通知中国方面之后，即驶离白河，于11月20日抵达澳门。他们答应由办理浙江事务钦差大臣伊里布转递给业已奉派为办理广东事务钦差大臣琦善①。

11月29日，查理·义律大佐通告英商说，懿律海军少将因突患重病辞职，舰队司令一职已交由海军准将伯麦爵士接充。因此，义律大佐成为唯一的全权公使。

琦善钦差的方针

林则徐的方针一直是要压服英国人，把他的要求公布出来，迫使他们默从。琦善则是作为钦差大臣到南方来采行抚绥政策的——当然，只能以通过外交途径获得中国向逆夷所索取的一切为前提——同时以拖延的办法使对方厌倦，从而使他们接受起初原会拒绝的那些条件。历经12月一个月，他一直抱着这个目的从事谈判。他在广州不但要对付英国人，而且要对付中国人当中的主战派，誓不两立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就是其中之一，而琦善所推翻的正是林氏的政策。在义律大佐那一方面，虽则

118

① 林则徐已于2月接替邓廷桢为两广总督，不再担任钦差大臣之职。

始终如一地倾向于导致和平解决的种种措施，却坚持无可再减的最低条件毫不让步，因而在割让香港的问题上谈判破裂。由于过去的苦痛经验，义律不能不为英国人坚持要求一个经营的根据地，然而琦善则深知割让国家领土是皇帝决不会宽恕的。1841 年 1 月 7 日，英军进攻虎门外两旁的穿鼻和大角头炮台，平定炮台之后立即加以占领。次日，英军正准备进攻亚娘鞋洋面虎门要塞之际，双方同意休战，谈判重新开始。

2. 穿鼻草约

1 月 20 日，义律大佐发布了下述公告：

英国钦命全权公使为本人与中国钦差大臣缔结初步协定，议定各事，兹特公告如下：

(1) 以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大清帝国对香港商业得按黄埔贸易之例，征收一切正当捐税。

(2) 赔偿英国六百万元，先付一百万，余款按年平均支付，至 1846 年付清。

(3) 建立基于平等地位的直接正式交往。

(4) 应于中国新年以后十日内开放广州口岸，并于新居留地所行办法进一步议定之前，先在黄埔进行贸易。

继而公告对于巴麦尊在 1840 年 2 月 20 日致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所制定的、成为自当时迄今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的那项原则，作了首次的公开声明：

专有的利权并非英国的目的

“本全权公使特趁此最早的机会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并没有为英船和英商的利益在中国谋求特权，而只是为求给予一切往来于女王陛下领地的外国臣民、公民和船舶以英国国旗的保护，而履行其职责。”

英国全权公使的举动立刻为英国政府所批驳，英国政府认为 119

必须要求更大数目的赔偿和对将来贸易的更大保障；必须重新占领舟山，必须召还义律，并另派亨利·璞鼎查爵士前往接充。

义律大佐及其政策的批判

义律大佐的举动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在1839年危机已经充分发展之后，英国政府已终于断然采取了1840年2月20日训令中所明定的政策。依照训令，两位全权公使应首先对于中国方面不问有罪无罪而将广州的英国商务监督和臣民一体非法扣留，以及用断绝食物供应的方法威逼交出事实上既不在他们手中又不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内的鸦片各节，要求赔偿；并应要求退还鸦片或偿付价款。其次，他们应对凌辱英王代表致冒犯英王之处，要求赔偿，并要求嗣后对英王代表优加礼遇。第三，他们应要求保证英商，今后经营合法商业，不致再受强暴和侵害；并为使英商免于中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之苦，应要求割让岛屿一处或数处。第四，行商的债务应予清偿；垄断制度应予取消。英国政府已决定派遣一支足够的兵力前往封锁中国各主要港口；至于这笔远征经费则应要求由中国偿付。中国政府的答复应在白河口外索取，但嗣后应于何处进行谈判得由全权公使权宜行事。舟山既自始就被占领，应仍由英军驻守，俟议定的赔偿悉数付清后，再行撤兵。

巴麦尊是以女王和政府的名义说话的。一位全权公使只是在遵照政府训令的条件下才有使本国政府担负义务的全权。固然商务监督被丢在那里一连六年没有接奉任何训令；但是当义律最后奉到明确训令时，他却犯了错误，没有看出他的处境已经变更，他作为政府的代表，捐弃一己的见解而恪遵训令行事乃是应有的责任。他的后任仍旧步趋义律大佐所摘示的办法行事，而且他所签订的条约里载列的条款，也并不比他本人以及懿律和义律所奉训令中开示的约稿原列各款增加了多少。经过了三

义律的大错

120

年自行其是的办法之后，当情势不复许可的时候，义律大佐依然我行我素，因而，他本来可以享有签订南京条约的荣誉，竟被召回国。

中国斥责穿鼻草约

在议约时，双方也曾经议定，一面由英军交还穿鼻炮台，撤出舟山，一面由中国释放战俘。琦善当即将草约各款付诸实施，并以1841年1月23日的一项盖有钦差大臣关防的告示，将香港已由英国正式占用一节布告周知。贸易原应于2月1日全部恢复，但是因为中国方面对草约的不满正和英国一样，并未采取任何开放贸易的措施。他们曾经答应付一笔现款，但这笔现款却要出之于对外贸易；他们曾经允许平等待遇，但这却降低了他们的身分；他们曾经允准恢复贸易，但却没有订明取缔非法的鸦片贸易；而且他们曾经割让了国家的领土。道光皇帝本来就不想姑息：2月11日广州奉到的一道上谕中说，他已委派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并另派蒙古人隆文和杨芳为参赞大臣，前赴广州剿办。他还添派兵力前往增援。

琦善革职

这时琦善已革职，并于3月12日锁拏离粤。他的家产已查抄入官；本人则押解进京，交部议处，并拟成死罪。在同一年稍晚的时候，他奉派再去一试他试夷的本领，但毫无所获；1842年5月，他的处分减为遣戍黑龙江。南京条约的条款是他的真正答辩，所以在缔约以后他又重被起用了。

3. 第二阶段：自1841年2月至1842年8月

121

2月20日，伯麦海军准将率船舰移泊虎门，三天之后，又恢复了积极的敌对行动。25日的一项告示悬赏擒杀英人。次日，义律大佐宣布虎门炮台已攻陷，掳获战俘数百名，敌军溃败，据报英方无任何损失。27日，黄埔南面的一座炮台被毁，“剑桥”

1841年2月战争再起

号轮船被击沉，四十艘师船逃散。

在三位钦差之中，这时已到达广州的只有七十多岁高龄的杨芳一人。在绅民的压力下，他授权广州府和行商领袖于3月3日往访英国全权公使，请重开谈判。谈判毫无结果，3月6日，陆军上将郭富爵士占领了保卫广州城的一座炮台。在随后几天之中，英军分兵去破坏邻近的要塞。由于中国方面对休战旗开火，于是英国船舰溯江而上，在18日占领了商馆。20日，义律大佐和钦差大臣杨芳协议停战。广州贸易重新恢复；船舶迅即卸下货载，也同样迅速地装上了茶叶。但4月14日另两位钦差大臣——奕山和隆文的到达，给广州当局注入了一种比较好战的精神，破坏停战协定的军事准备，触目皆是。义律大佐一俟贸易进行完毕之后，就行文中国当局，要求立即停止作战准备。当5月21日英军离广州城不到十哩时，他命令所有外侨撤离广州。当晚11时中国方面向停泊商馆江面的船舰开火，并放下火筏，顺流向英船冲去。在这次继续了几天之久的全面战事中，计击毁师船七十一艘，攻陷并拆卸装有六十多门大炮的沿岸炮台若干座。5月27日，英国步炮兵正准备发动进攻之际，因中国当局和义律缔结了一项草约而中止了前进。草约计有下列五款：

义律和杨芳

广州草约

122

1. 三位钦差大臣①和所有外省军队，限六日内退出广州城六十哩以外。

2. 限一星期内交出六百万元备英方使用；限于27日日落之前先交付一百万元。

3. 赔款付清后，英军即退出虎门；横档和所有沿江各要塞一律交还，但在两国交涉事宜未解决以前，不得重新予以武装。

4. 赔偿5月24日拆毁的商馆和西班牙帆船"比尔拜诺"号的损失。

① 三位钦差大臣指奕山、隆文和杨芳。——译者

5. 议和代表广州知府应提出盖有三位钦差大臣以及总督、将军和巡抚印信的全权证书。

六百万元付讫，英军于5月31日撤退。

在这期间，香港政府正在进行组织中。4月30日，英国进口船舶管理条例已经公布。6月7日，义律大佐发出一项告示，布告"广州及中国各地商民周知，准中国商民及其船舶自由往来香港贸易，并给以英国长官的充分保护；因为香港位于中华帝国的沿海，英国政府对进出口货将一概免征捐税"。

香港政府

作为唯一全权公使的陆军上校亨利·璞鼎查爵士偕同前来统率驻华舰队的英国东印度海军总司令、海军少将维廉·巴尔克爵士于1841年8月10日到达①。

璞鼎查爵士的到达和查理·义律爵士的去职

1841年5月31日巴麦尊勋爵给璞鼎查爵士的训令告诉他说，第一步应该是将依照穿鼻草约规定撤出的舟山群岛重加占领。谈判可以在舟山群岛附近或白河口举行，而最好是在白河口，因为它靠近北京。有一点应予指明，即查禁鸦片贸易将永远是一个摩擦的根源，中国不能指望英国方面担任缉私工作，而且鸦片贸易解禁是对中国有利的；但是"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个问题并不作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无权这样作。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的输入，如果它愿意的话；而且从事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自行承担其后果"。最后，全权公使应该抵制中国议和代表采取他们那种"妄自尊大的口气"。在璞鼎查爵士离伦敦的前夕，即1841年6月5日，他奉到训令说：香港必须保留；九龙岬必须占领或中立化，条约由皇帝正式批准一节必须坚持作到。

巴麦尊给璞鼎查的训令

123

① 以往从广州发出的公文需要四到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寄到伦敦。这时蒸汽已见诸实用，从苏伊士到亚历山大港的"陆路"联运，已搭运邮件和旅客。璞鼎查爵士于6月5日离伦敦，7月7日到达孟买，7月17日离孟买，8月10日抵达澳门，需时共六十七天，其中有五十七天在航程中。

璞鼎查爵士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示意英商，以国家利益服从商业利益的时代已成过去；8月12日他声明说：他不能"容许任何有关商业或其他利益的考虑，妨害他为促成一光荣而持久的和平计划，认为必须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制定和采取的强硬措施"。第二步就是将他的任命函知广州省当局。中国方面当即派广州府前往澳门向他表示敬意。璞鼎查因在印度服务有年，深知亚洲人的性格；他拒绝接见一个官阶比他低得多的官员，委派使节团秘书麻恭少校代为延见①。

英国国家利益不再服从商业利益

璞鼎查爵士酌派少数军队和五艘兵船留驻香港，于8月21日率同兵船十艘、轮船四艘和官兵共二千五百十九人的一支军队北上。五天之后攻陷厦门；酌留了一支军队驻守，大军就在9月5日继续北进。定海自3月间英军撤退之后，已筑有坚强的防御工事，然而仍于10月1日被攻陷。镇海在守军作过坚决抵抗之后，于10日被攻陷，13日，英军未遇抵抗就开进了宁波。犯过几次残忍的非法谋杀罪的浙江巡抚裕谦于是自杀。英军从宁波分兵攻打内地，12月底暂时占领了余姚和慈溪两个县城，1月10日占领奉化。1842年3月10日破晓，中国军队对宁波和镇海发动进攻，但被击退；3月15日，英军采取攻势，在慈溪击败了八千到一万人的一支中国军队。1月底，璞鼎查爵士南旋。2月27日，他将商务监督处的全体员司从澳门迁到香港，事前则已宣布香港和定海为自由港。6月13日，他回到北方。

全权公使北上

124

法国和美国国旗自1839年2月降落之后，于1842年3月

① 在这些月份中，人们可以看到十五年之后也看到过的那种景象；虽然英国人和中国人在帝国的某些地方进行公开的敌对行动，而在另一些地方，贸易却仍照常进行，中国的一般关税以至于公认的陋规，英商也都照常缴纳。从对外贸易获得的税款，在1841年5月曾被用来支付广州的赎城费，在这一年和下一年以及在1857—1860年期间，这种税款还曾被用来作为对英作战的费用。

又首次在广州升起。3月31日，美国海军准将加尼通知美国领事说，美国政府不准私运鸦片，如果因鸦片问题而发生任何纠纷，他决不过问。在广州，贸易差不多照常进行，只是捐税加重了一些；但政治局势却不能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已完全不顾1841年5月27日草约的条件，而重新组织了广州的防务。但璞鼎查爵士却聚精会神于北方，不容分心及此，对于这里的所作所为，一概视若无睹。

1841年—1842年广州的情况

1841年9月底，英国政府决定以一支较大的兵力交由这位全权公使调度。所以，印度政府奉命派遣陆海军前往，俾对镇江施加压力，镇江是南北行的大运河和贯串东西的那条大水道长江的交叉点。封锁镇江那里的运河以及扬子江口，就会使运往北方的漕粮和同北方各省的商品交换完全陷于停顿，而京城就位于北方。增援之后，英国海军的实力已达到了拥有兵船二十五艘，共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五十六门以及医院船、测量船和其他船只共九艘，另约六十艘的运输舰尚不在此数。

英国决定把仗打到底

125

1842年5月7日，英军开始从宁波前进。18日，乍浦被攻陷，中国军队约为八千人，其中有一千七百人是驻防旗的满洲兵。这是第一次英国人和满洲人兵戎相见；他们对于那种向来没有遭遇过的坚强抵抗和一旦战败就男女老幼一体自戕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大为惊异。英军的损失计阵亡九人，伤五十五人；中国方面则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尸体是由他们的敌人掩埋的。在英军手里的中国伤员和俘虏所受的宽厚待遇，曾使伊里布专函致谢，并且使被俘于舟山群岛的英国和印度俘虏十六人获得释放。

1842年5月18日攻陷乍浦

6月13日，乍浦的英军和舰队一起抵达吴淞口外。三天之

六月攻陷吴淞和上海

后，兵船和炮台交火；“诡诈地”攻打炮台的侧翼，平息了炮台上所有二百五十三门大炮的炮火；英军随即占领上海县城，进城后才发现它早已被委弃了。这时增援部队已经到达，于是海陆联军向镇江进发，7月20日到达后，即准备立刻发动进攻。镇江是由距城五哩扎营而始终没有接仗的汉兵约九千人，以及城里的满洲驻防军一千六百人和汉兵八百人防守的。这个堂堂帝国竟不能调遣一支再大一点的兵力来防守境内最关紧要的战略地点，足以见其腐朽透顶的政府的失政情形。但是满洲驻防军誓死应战，5月间在乍浦见到的那种百折不挠的勇气、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和残酷地手刃妻子儿女的情景，7月间又更进一步地重演于镇江。满洲驻防军大约残留无几，副都统海龄在他的寓所里从容地烧死在临时准备的火葬台上。这是从战无不克的满洲弓箭手的昔日英武精神中发出的最后一道瞬息消逝的闪光；他们已经威望扫地，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能取胜疆场。但是，既没有明智的领导，而且人数不过敌人的三分之一，武器又只是一些陈旧的火绳枪和弓矛，他们却也使敌人遭受死三十七人、伤一百二十九人的损失。

七月攻陷镇江

126

在镇江派由一支驻屯军据守，主力随即向南京推进。在这期间，镇江对岸的瓜州城请降，以五十万元作赎城费，以图消弭一场战祸；于是扬子江和运河上的一切往来商货完全断绝。8月14日，英军下令进攻南京，但是就在那一天，南京城上挂出了白旗，并且在三天之内英国的条件就获得了原则上的承认。8月29日，璞鼎查爵士代表英国，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以及行为所在地的主管官两江总督牛鉴代表中国，在英国“康华里士”号兵船上签订了事实上载有三十个月以前巴麦尊勋爵所开各款的南京条约。批准书于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交换。

1842年8月29日的南京条约

第八章　和平与国际关系的调整

1. 第二次定约①

这次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中国和列强在大约两年之内签订了四项条约：1842 年 8 月 29 日同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和 1843 年 10 月 8 日签订的虎门条约；1844 年 7 月 3 日同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 年 10 月 24 日同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这些条约确立了一些广泛的原则，这些原则为中国和二十多个一般缔约国间的外交和商务等上层建筑奠定了基础。在 1839 年以前，以非遵办则不许国际关系存在的条件强加于西方各国的，是中国；自从 1860 年以后通常以共同往来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则是西方各国；其间二十年的一段期间是一个摩擦时期，在西方各国既已以种种条件强加于中国之后，中国则力图减轻和抗拒。但是，不管在摩擦时期或者在关系断然调整时期，人们都把 1842—1844 年签订的各约中所体现出来的巴麦尊勋爵和顾盛先生的办法奉为解决问题的圭臬。在谈史实之前，把这四项条约作为构成解决中西之间关系的一个办法来谈一下是合适的。

四项重要条约

在南京条约这个序幕中所决定的各点如下：(1) 割让香港；(2) 开辟五口通商；(3) 在各口任便派领事驻扎；(4) 赔偿损失及战费；(5) 取消垄断制度；(6) 制定划一适度的进出口税则；(7) 两国官阶相当的官员平等往来。

留待以后各条约解决的更重要的几点是：(1) 最惠国待遇；

1　参阅本书第 49—51 页。

128 (2) 同海关的关系;(3) 中外商人之间的商务关系;(4) 对外国人的审判权;(5) 外国军舰的自由活动权;(6) 对外国货抽征子口税口限制。

留待日后解决的仅涉及英国方面的各点有: (1) 中国对香港贸易的章程;(2) 舟山和鼓浪屿的撤兵问题。

约开口岸

南京条约为外商所提供的保障只是:"……准带同所属家眷寄居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拟秉公制定关税则例;不仅取消广州的公行垄断制,而且取消英商嗣后所居住各口岸的公行垄断制并准自由进行交易。在望厦条约中除提到居住问题外,还提到"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等问题;应由中国地方官会同美国领事等官"择定"地基,但须"体察民情"。英国人主要是靠军舰为保护;美国人则规定中国政府应"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并查禁匪徒,不得欺凌骚扰"。这些条文预示美国政府的那种维持中国领土完整、承认中国完全主权但要求要有与主权相符合的负责的政策,由于这项政策而终于产生了门户开放政策。责成中国官吏保护美商的办法,在实施时往往造成许多困难,因而美商有时也迫不得已而恃英国军舰的保护。

外国领事

由律劳卑勋爵和他的继任者所受的待遇而引起的种种麻烦,已根据下述条款予以调整:"英国君主派设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两国官员互相行文应按照官阶平行往来。这两项规定,因有英国军舰和军队经常作为后盾,已足使各129 领事获得应有的权威和体面。派往其他国家的领事只不过是政府的商务代理人而已;但是在一个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里,他却赋有如此重要的外交和司法权力,以致使他们成为另一类人物了。

在中、英条约中,领事在某一方面却担负起一项为后来各条

约中所未列的责任。经议定，领事应"令英人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且"进口货船即由英官担保"。美国缔约使节顾盛先生，鉴于英国官员随后所遭到的困难，特在望厦条约中列进了中国官员应自行负责稽查一款。美、英两国在实践上的这种分歧，正是十年之后导致建立海关税务司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①。

赔款

南京条约规定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于三年半之内分期摊付。关于所定应付商欠三百万元之数，双方并无争执。战费赔偿定为一千二百万元。

要求赔偿呈缴给林钦差的鸦片

巴麦尊勋爵曾训令英国全权代表"坚持须由中国十足赔偿1839年强迫英商交出的鸦片"。该项鸦片原约值一千一百万元；但是巴麦尊勋爵初步估计为六百万元，条约中即按此额予以规定。关于鸦片问题本身，英国政府只对一点提出抗议，那就是中国当局强迫英人将鸦片当作财产而并不当作毒品缴官以作为英国商务监督和英商的赎身费。

英国对鸦片问题抗议的基础

取消垄断制度

130

公行垄断的种种弊端是众所周知的。英国决心要取消这个制度；只要能以条约达到这个目的，也不管它纯是内政问题了。外商现在可以同他所愿意往来的人按照互相议定的价格自由进行买卖，也可自行雇用买办和仆役而不受任何束缚。另一方面，外商出外散步或游历的旧有限制虽已放宽，但外商的行动仍限令不得超过距各约开口岸的一定距离以外，其具体办法则留待领事同中国当局商决。

① 参阅美国史学家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167页中所作的述评："为久远计，中国不推诿，或不得推诿理应属于这作为一个主权国的帝国在执行其本国法律方面的责任，也许是比较好的，但是这项规定的直接效果却是使美国规避了对它本国公民进行走私所应负的责任。顾盛条约实际上是使走私贩子皆大欢喜，在这一方面所给予他们的特权，甚至于比香港的占有还要更广泛得多。"（中译本，第147页。）

关税税则

璞鼎查爵士看出税则问题是局势的关键，所以把它列入在南京向中国所提出的要求之中。这项经稍加修正也为美法两国采用的税则，是以进出口货一律按5%的低微从价税率为基础的，惟茶叶一项是例外，因为当时它是中国一种天然的独占物资，所以允准征收10%左右的出口税。

国家地位平等

国家地位平等是用条约形式肯定下来的。中国和西方各国一律平等地互称为“大”。在条约原文中，两国君主列于同样尊崇的地位①；两国全权代表共同在条约上签名盖章，在英文本中，英国代表署名在前，在中文本中，中国代表署名在前。两国高级官员直接并且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来往行文。

最惠国待遇

获得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中并没有列入最惠国条款，但是在1843年以后直到今天所签定的各条约中都载有这项规定。这种特权多少是和英国所采取的不求独占的特权或权益的立场有连带关系的。同时，它也不想在获取凡可给予其他外国人的任何权益上占先一步。

与海关的关系

在各项条约签订之前，外商除完纳船钞外，与海关并无直接往来。南京条约中并没有作变更这种手续的规定；但是在以后的各项条约中却使外商与海关发生了直接关系，并对每一步手续都予以保障。

131

对外国人的审判权

英国坚守不将英国人交由中国刑事法庭审判的原则已有三十年之久。两国谈判代表虽然对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实施已显然取得谅解，可是，南京条约中并没有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在1843年根据该条约所颁行的五口通商章程的十三款中曾规定，英国领事得适用英国法律判处在中国的英国罪犯。望厦条约明确规定了民事和刑事案件中的领事裁判权。这是对于“不必猎取香

① 意指西方国家元首不需低两格书写。——编者

港那样一个海陆军基地而获得真正最惠国待遇"①的一个保证。

军舰调动

关于军舰调动一节，英国方面虽要求保护其人民和贸易的权利，但表示愿尽量照顾到中国方面。在通商五口将各派驻军舰一艘。美、法两国却更进一步要求：凡为保护商务而巡查的军舰驶至中国各港口时应以礼相待；这项权利，在最惠国条款的规定下，已为所有有约国所共享。

内地转口

南京条约规定：外国货物于完纳进口关税后，即可遍运各埠，所征子口税"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②。至实征若干，并未载明。根据1843年6月26日签订的子口税声明，双方议定："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增加……"，此项规定并没有收到良好结果；但在中国因平定叛乱，军用浩繁，而不得不加重征收内地税的时候，问题就变得迫切了。

中国与香港的贸易

中国与香港间的贸易，根据规定，应按下述规章办理：

1. 中国船只前往香港贸易，每次均须向中国海关请领执照或结关证，一如往外国港口之例。

2. 香港须派英国官员一人，稽查这类贸易；凡无执照的民船，即视为走私或违法贸易的船只。

3. 如中国欠债人逃出香港，或外国欠债人逃至香港，其债务应行追还。　132

4. 关于民船及其货载之统计报表，香港当局与中国当局应每月交换一次。

鸦片问题

战争没有解决鸦片问题，南京条约也没有予以解决。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两国全权代表曾经就鸦片以及其他一些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过磋商和换文。当耆英和他的同僚声明他们不敢向北京提出这项问题的时候，璞鼎查爵士告诉他们，他所奉到的

① 参阅丹涅特前引书，第165页(中译本，第116页)。

② 录自南京条约第10条，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2页。——译者

训令是建议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不是查禁。1843年8月1日，璞鼎查爵士通知英商说：鸦片并不在未列入税则而须按值百抽五缴纳关税的品目之内；鸦片贸易仍是违法的和查禁的；英国官员对于从事这项贸易的英商将不会予以支持和保护。7月，他通知驻广州钦差大臣说，他已“受权不准将鸦片带进香港，甚或带至香港海面”，但是他又补充说，这样做的结果会驱使鸦片贸易走上秘密途径。钦差大臣还被警告说，他不能希望英国当局对中国法律查禁的任何贸易作强制执行，而且英国臣民的人身也不得受任何侵害，中国只能在船只和它的货载上求补偿。在中美条约中，鸦片贸易明文禁止，但美国政府却将这项条文的执行委之于中国方面——这样一来，就使这项理论完全成了空话，并且还鼓励了走私。在中法条约所附税则中列明鸦片为“违禁品”。俄国也颁发了一道敕令禁止从该国领土向中国输出鸦片。

1842年以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在南京的中国谈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接受英方所提出的任何条件；所以没有什么磋商，也没有作什么争取修改的尝试；而且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决定。但是，对全国人民来说，这种必要性并不那么明显。撇开亚洲人本来就不承认任何决定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不谈，当时确也看不出有什么非要中国屈膝不可的情由。133 虽然乍浦和镇江的满军被歼灭，别处的挫败并不足以影响全局。唯一和这些不速之客的外国人有过直接接触的广州城，曾亲眼看到律劳卑勋爵的被逐出境和义律大佐的被辱；并且在一年之内避过了不下五次的战争危机；所以广州人民感到，不管中国其余各地表现得如何懦弱，至少他们总是击退了进攻。中国政府已经议和，但是全国各地却仍认为有权不理或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限制。所以1842—1844年的各项条约所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条件是否能在至少一个世纪的大部期间中成为

约束东西方国际关系的法律，尚有待证明。

2. 顾盛条约和拉萼尼条约

璞鼎查爵士于1842年12月2日到达香港；五天之后，广州就爆发了成为此后若干年划时代大事的一长串风潮的第一次。英国大部分兵力在12月20日离开香港；据记载，该年除夕广州百姓已安静下来，贸易也已照常进行。满人耆英于1843年奉派为专办夷务的钦差大臣，一直做到1848年。他关心中国所接受的义务，丝毫不苟①。他要操舵驶船，安然渡过那些因条约所建立的新制度而危及个人利益的人们的反对和广州百姓敌忾同仇的界标，确是十分困难的。

广州发生的种种事件

除中俄边界条约外②，南京条约的签订首次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自然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激起了各国的染指之心。首先采取行动的就是美国，美国本来是和英国分享中国的海上贸易的，所以也很想让美船和美商分享英人从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便利和保护。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应该用外交而不应该用战争和炫示武力的方法加以调整的③。美国商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完全平等却是必须坚持的。

美国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的愿望 134

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先生奉派为美国驻华委员、特使兼全权公使，1844年2月24日到达澳门。因为耆英当时在北京，顾盛先生于是通知署理总督程矞采说，他奉派前来谈判签约事

顾盛的出使中国

① 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曾对他赞扬备至地说，“耆英在欧洲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所接触过的人物中，不但品级最高，人品也最值得尊敬。”

② 参阅本书第49—51页。

③ 参阅《文选》，第183—185页，1843年7月12日美国总统泰勒致中国皇帝书。

宜，并奉命亲往北京呈递美国总统致中国皇帝书。总督答复说，顾盛先生须候旨遵行。其实，顾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依照1842年10月美国海军准将加尼从耆英那里所得到的美国将享有最惠国待遇的保证，而"为美国船货获得按照英商所享受的同样优惠条件驶进中国各口〔即根据南京条约开放的各口〕的待遇"。要求觐见皇帝一节，显然是次要的目的。果真顾盛到达了北京，为了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理由，他也奉有严正的命令不得行跪拜礼。

顾盛先生的主要目的

签订望厦条约的谈判

耆英在5月底到达广州后，就移驻澳门界栅外中国领土上的望厦村，6月21日条约谈判就在那里开始。在耆英致美国代表的最初几封公函中，美国国名抬高了一格，而中国和皇帝的称呼则抬高两格。顾盛先生当将来文退还更正。

广州的纠纷

耆英刚刚离开广州，马上就发生了一桩事件，险些使林维喜命案后的那种局面再度发生而使谈判陷于中断。在广州商馆的美国花园里美国领事馆前面最近树立了一个旗杆，上面装有一个指示风向的箭头。广东人把这个箭头认作是时疫流行的起因。美国领事一听到这种消息，立刻命令将风信标去掉。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群暴徒在这同一天，即5月6日，冲进了花园，而且其势汹汹。6月15日，有几名暴徒向正在英国花园散步的英国人进行殴打，把他们赶进水里；第二天，在美国花园散步的美国人也遭到了攻击，并且不得不用火器自卫，以防暴徒危害他们的生命。在这乱成一片的时候，一个名叫徐阿满的中国人被击毙。美国人并未受到中国兵勇的保护。顾盛先生吁请耆英防止嗣后再有这类暴行的发生，并拒绝把这个案件交由中国方面审理。7月11日美国领事召集的由六名广州美侨所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认为此次杀害行为是正当的自卫行为"。顾盛先生批准了陪审团的裁定，对于凶悍的广东人也抱批评态度的耆英默

135

认了这个决定。顾盛先生竟不期而然地擅自行使了政府训令所未授予他的审判权，去推翻爹剌那非丫案件中所树立的先例，并宣布他所认为在中国被控犯罪的美国人应该适用的领事裁判权原则①。

望厦条约的基本原则

谈判一开始，耆英就请顾盛先生"提出一个美国认为满意的条约方案"。在提出条约草案时，顾盛先生曾声明该草案是依据下列原则拟定的：

1. "美国将以真诚友好及牢固和平为基础对待中国。"

2. "美国并不希冀任何部分的中国领土，也不希冀任何对中美两国不公正和不荣誉的条件。"

3. 美国政府本来愿在一切商务关系上完全互惠，包括免收出口税在内；但却接受中国和英国所商定的方案，因而只拟"提出为美国公民在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各口岸中获得自由而安全的贸易的那一类条款"。

4. 条约草案中所以列有与中英条约不同的条款，据说这是因为英国占有香港。

5. 最后，他"还列进了许多为中国打算和对中国有利的条款"。

136

谈判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1844 年 7 月 3 日，望厦条约正式签字②。

顾盛条约的签订

中美条约的签订对于双方都是有价值的。美国从英国人的经验中得益，而中国则得到了一个本身不愿也不愿其他国家夺取中国领土的友邦。在签订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西方代表中，美国代表确比较聪明；望厦条约具有这样的优点，以致成为

① 关于顾盛先生为此事致美国领事函，请参阅《文选》，第 60、61 页。

② 在这里指出下述情形是饶有趣味的：在签约之后，"顾盛赠给耆英几座炮的模型和一些有关海陆军战术及防御工事的书籍，并婉转表示，象这类的知识将来对于中国会是有价值的。"（见丹涅特前引书，第 156 页）〔中译本，第 138 页〕。可是耆英表示中国业已获得和平保障，很客气地辞谢了这些礼物。日本在十六世纪就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现在亦复如此。这种不同政策的不同结果是值得考虑的。

条约的条文

对法条约和对挪、瑞等条约的蓝本的是望厦条约而不是南京条约。直到 1858 年为止，望厦条约仍是一个关键性的条约。除去有关缴纳关税的几项好处之外，条约还载有准许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和聘用中文教师的规定。从这项规定可以看出担任翻译兼顾问的巴驾博士和裨治文牧师那两位传教士的影响力；这对于以往在语文上一直感到很大困难的传教士是特别有价值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定是，"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得于十二年后酌改。后来也列进中法条约的这项条款，根据最惠国条款的规定，也成为英国人的权利；中国官吏对于这项条款的忽视乃是引起第二次中英战争的主要原因。条约中还订明不仅得通过驻广州钦差大臣而且得通过两广和两江总督和北京文书往来。这一点在十年之后，当钦差大臣叶名琛拒绝会见外国代表时，成为有价值的规定。

137

拉萼尼与中法条约谈判

法国政府派拉萼尼同中国谈判订约。拉萼尼于 1844 年 8 月 14 日到达澳门，于 10 月 24 日在停泊黄埔的法国"阿希默特"号巡洋舰上签订了中法条约。条约中只有两款值得特别注意。一款规定，遇有法国领事不在口岸时，法国商人及船主可托与国领事代为照料，这样就强调了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在规定对刑事案件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另一条款中，据称其所依据的原则是：如法国人在五口地方犯大小罪行，即按法国法律治罪。

1844 年降旨弛禁天主教

拉萼尼在广州期间，为法国政府几世纪以来所特别关怀的一个方面，即罗马天主教会，从中国取得了重要的让步。雍正皇帝曾于 1724 年降旨驱逐基督教传教士并拆毁或没收其教堂。拉萼尼要求撤销这项命令；先是，1844 年 12 月 28 日耆英奏准天主教弛禁，继而在 1846 年 2 月 20 日降旨发还教产。当耆英接到基督教其他教派的请求时，他在 1845 年 12 月 22 日发布了

一道告示，内称：西方各国在布教方面均立于同等地位[①]。

这时比利时很想同中国商订条约，但是中国却于1845年7月25日抄寄比利时专使上谕一道，准比利时按现行各条约的规定办法进行通商。继而瑞典、挪威国王派遣专使前来中国；1847年3月20日，这位公使和耆英在广州签订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几乎完全以中美条约为蓝本。直到1860年以后，除俄国而外，中国没有同其他国家签订过条约，而在这段时期内，其他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业国的船只和商人都和比利时一样，无形中享受到中英、中美和中法等条约中所允准的权利了。

3. 澳门的丧失

138

葡萄牙人的野心

1843年，澳门葡萄牙当局与耆英开始谈判澳门的地位问题，希望能得到香港所享有的那种完全自由。他要求免纳年租，但被拒绝；可是对于修建房屋向须申请牌照和交纳规费的办法，恩准予以废除。对国家平等的要求也提出来了，中国在一定限度内准予照办，但不许其进一步接近中国地方官和省官吏。澳门事实上已取得了类似一个通商口岸的地位，但中国当局在该地所控制的财政和司法权只是稍稍放松而已。

葡萄牙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香港连同它的自由港政策显然是在劫夺着澳门的利润。结果，葡萄牙政府决定也要将澳门作成为一个自由港；1849年3月5日，澳门葡萄牙官员亚吗嘞发布一道告示，声明在澳门不得征收任何关税，并下令封闭粤海关监督驻澳办事处。3月8日，亚吗嘞以同样的精神致函总督徐广缙，并建议签订一项澳门与中国口岸的通商协定。

---

① 参阅《文选》，第24节。天主教是罗马教派的专称；基督教新教称为耶稣教。

中国人迁离澳门

中国海关撤离澳门而改设于黄埔。于是,中国商人也携同眷属和职工由澳门迁到黄埔,因而使澳门街道荒凉、港口空无一船。亚吗嘞因而在4月25日布告澳门及其附近四乡的中国居民说,如无许可而擅离澳门,其财产将"作为放弃论,立即由政府接收"。这个举动并未能阻止殷实商人的离去,反而激起当地居民和地主的愤慨。他们遂合力图谋非常的报复手段了。

亚吗嘞遇害

8月22日,当亚吗嘞骑马走近界栅的时候,被八名中国人用竹棍欧打,他们随即从袖口里抽出短刀。亚吗嘞既没有武器,又没有右手,他被拖下马来,身体被砍成许多段,头和仅有的那只手都被砍下来带走了。澳门葡萄牙当局立即向中国方面要求将亚吗嘞的头送还,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25日,澳门葡萄

139

牙当局派出一百二十名的一队葡萄牙兵,占领了界栅和防守该处的中国炮台。前一天,香港总督文翰曾派遣英舰两艘驶往澳门,以表示英国政府对于葡萄牙的同情。文翰又会同美国委员和法国专使对于这次暴行向两广总督提出抗议。这时,亚吗嘞的遗体还停放在他的官邸里等待头和手缝接上再行安葬①。尽管抗议,这位遇害葡萄牙官员的头和手还是到来年一月中旬才和他的尸体一同入殓。

中国由于战争失利而丧失了香港;现在又由于一次暴行而断送了澳门的主权,不管这次暴行究竟是由中国官吏唆使的(正如一般人所猜测的那样),抑或是人民自发的行为,总归是因而失去了那些已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同情。当时中国并不承认澳门主权的被篡夺,甚至多年以后还是不承认,只是在1887年签订的条约中才最后加以允准。

① 因迷信而引起恐惧的中国人声言,在薄暮时候常见亚吗嘞的阴魂在这个地峡上骑马往来寻找他的头颅,因而一到晚间无人敢经过界栅回家。

4. 约开口岸——上海

上海是在1843年11月17日由英国领事巴富尔海军大佐通告对外开放的；美国第一任领事是1843年原在上海的华尔考脱先生；第一任专职领事是1854年到上海的麦菲先生；法国第一任领事是1847年奉派的敏体尼先生。其他各国则直到1860年以后还都是以商人领事为代表。在城墙与河之间有一片郊野，不过其间并没有房屋设备；后来外国租界所占的地区原就是这一片没有住户的荒地。在广州曾变得那样严重的进城权问题，在上海却并未发生，外国领事、商人和传教士在城里都赁有房屋。中国人既不坚持把外国人赶出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非住城里不可了，而且经由英国领事取得了在城外租地筑屋的权利。英国领事首先租了二十三亩的一块地皮供作建筑领事馆之用，另根据1845年他和道台①所签订的一项协议，划定了一个地区，北以苏州河为界，南以洋泾浜为界，东以黄浦江为界，而西界未定，在这个地界内准英国臣民以私人契约向中国土地所有人商租土地。根据翌年一项协议，西界划定，圈进了大约一百八十亩的一片地区。根据继任领事阿利国先生在1848年签订的一项协议，面积扩充到四百七十亩，增加的地面原意主要是供作休息场所之用的。虽然不要求排他性特权是英国人的一项既定原则，但是这项原则是否适用于上海"英租界"，却曾一度引起怀疑。在1848年12月美国领事葛列司活先生在他那所作为领事官邸的房屋上面升起美国国旗。英国领事为其他外国人民在界内悬挂其本国国旗一事，向道台提出抗议；道台和英国领事双方

上海辟埠通商

140

① 即巡察地方的长官，他的辖区包括两个以上的府；每府又包括两个到六个县；县是一省的行政单位。

都向美国领事提出正式抗议。但是升旗权被认为是对"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一体均沾，用示平允"①的原则的一项抗议；变通办法不外是为每一个可能同中国发生关系的国家划定一个租界；从那一天起，上海的特殊的国际地位就成为定局了。

法租界的开辟

根据1849年法国领事和道台签订的一项协议在英国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划定一片地区作为法国居留区。由于一再以保卫上海抵御叛乱为借口而不断进行侵占，这个地区的总面积扩张到了将近二百啢之广。这个居留区始终没有被认为是"法国永久居留区"(établissement français)，只被认为是"法国租界"(concession française)；打算把它放在1858—1863年间那种"租界"(concessions)②的相同基础上的种种尝试，是自始就有的。

141

1845年的第一次地皮章程

凡租界内的土地均须向中国政府完纳年租，以代替地税。土地不是购买而是永租的，不纳租金，但须一次付出一笔押手(按即保证金)。虽然至少为了维持道路和码头，也需要征收一些税捐，但是立刻发觉到英国领事没有向别国人民强制征税的权力；1845年道台与英国领事议定了第一项租地章程，据规定：由分别代表土地所属国当局和纳税人的治外法权当局的各该官员授予外侨以若干明确的权力。这项章程规定了取得土地使用收益权的方法，指明了修筑道路、设立码头的必要，确定了中国政府的年租等等，并在第十二条中承认了外国租地人负有"修筑木石桥梁，整理街路……雇用更夫"的义务③。这就是上海国际

① 录自《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八款原文。——译者

② 不同于居留区的这种意义的租界也在牛庄、天津、汉口、九江、镇江和广州出现了。

③ 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公布的第一次地皮章程已不可考，以上系录《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一年第60页的译文。——译者

共和体制的一个适度的开端。依据这项章程，租地人得互选三人组织“道路码头委员会”，并得在英国领事主持下，每年召开年会一次。

1854年的第二次地皮章程

建立一个更有力的行政机构不久即显然有了迫切的需要。管理外国社会的“新租地章程”就是因这种需要以及小刀会占领上海城（从1853年9月7日到1855年2月17日）所造成的新情况而采纳施行的。这项章程经道台和英、美、法三个有约国领事双方依式校准后，于1854年7月5日由该三国领事公告周知。此次据明白规定，凡欲取得和登记土地，则租地人“须……禀报该国领事官，设无该国领事官，即托别国领事官”①。其中有一条规定，经过后来的增补扩充，为上海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奠定了基础②。根据这项章程第十条规定，对土地有管辖权的中国政府和对外国人人身财产有管辖权的各外国政府，将所有向各该外国社团征税和实行警卫的权力一并委由各该国人行使，从而奠定了他们处理本身事务的权力的基础。他们对于住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所行使的权力是由于迫切的需要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1845年章程禁止“界内居民”③把土地和房屋出售或出租给其他中国人，并且禁止外国人“建筑房屋租与华民或供华民使用”。这些限制在1854年章程中一并取消；事实上，原已无法实行。在太平天国期间，成千累万的难民涌进这个避难所以求保护。1855年2月24日，即小刀会撤出上海的一个星期之后，道台和各有约国领事议定：中国人得在租界内租地赁房，但必须保证：“遵照新定章程，并按例纳税。”外国人一直凭借这项

142

① 录自《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第二条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80页。——译者

② 参阅《文选》，第211、212页。

③ 章程原用语，按指租界内的中国人。——译者

条件向中国居民课征捐税，但是一直到七十三年后才在工部局给他们以代表权。

上海的生活条件

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适意得多。占地既广，又没有商馆所受的限制，而且还有到乡间去的充分自由。关于外国人只准在近地行走一节的条约规定，在上海是作广义解释的。出外游历的范围规定以一天内可以往返的路程为限。后来路程的远近经条约规定为三十哩。这项措施在外国人和地方官民之间建立了很大的友情，历经叛乱年月而不衰。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繁盛起来了，西方国家的商人终于进入了他们久已期待作为取消垄断之结果的那个遍地黄金的乐园。1844 年，进口的外国船共四十四艘。1855 年共四百三十七艘，其中计英国船二百四十九艘，美国船九十六艘。上海立即成为中国的蚕丝市场，不久之后便几乎供应了全部西方需要①。

143

5. 约开口岸——宁波、福州、厦门、广州

根据葡萄牙的宁波商馆史和英国早期贸易的情况来看，当时对于宁波是寄以很大希望的，然而这些希望却注定要落空。这个口岸是在 1843 年 12 月英国领事到达时正式开放的；假如贸易能发展起来，无疑也会象在上海一样，划出一个专供外国商民侨居的地区，然而除去指定一个外国商民得居住的地区外，什么都没有作到。宁波成为一个"外港"的典型例子，全部贸易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并且对其商业中心的上海起着辅助作用。

1843年宁波的开放

福州的对外贸易发展得很慢。它是在 1844 年 6 月开放的。

① 在东印度公司的时代，中国丝输出每年不到六千包；在自由贸易后的早期，每年平均约为一万二千五百包；上海开埠后，输出逐年增至一万五千、三万、六万包；到 1857 年增到八万包以上。

1844年福州的开放

迟至1853年5月，这个口岸的保留与否，还在郑重考虑。可是在这一年，因为武夷茶运往上海的路线已被初发端的叛乱所切断，所以有一家美国商行就径派采购员前往内地收购1854年度的茶叶。他们颇为成功，第二年别家也纷纷从事这种业务，因而福州才有了生气①。

进福州城

进城问题是首先在福州获得胜利解决的。英国领事李太郭先生采取了一种事事敦睦中国官民感情的政策，甚至在他的领事馆都不悬挂国旗，生怕引起反感；即使挂旗，也是照中国式样，仿佛象挂半旗一样。这种政策并未获得应有的成功。总督刘韵珂颇不以清廷的新和平政策为然，而且自福州开埠之日起，就处处表示敌意。加之，福建人的那种生来强横的脾气仅次于广东人。这位领事被安置在城外地点很坏的一所简陋的房子里。10月，全权公使德庇时先生访问福州；他拒绝在这所领事住宅接见中国官员，而迫使他们到他这次旅行所搭乘的那艘巡洋帆舰上去会见。由于他的强硬抗议，他才能在1845年2月底提出问题已获圆满解决的报告。领事馆在城内得到了一所空气流通、屋宇轩畅而又富丽堂皇的房屋；但住在这里的领馆人员，实际上无异是囚犯，不冒着被推来挤去，横遭侮辱的危险，就不能出大门一步，然而贸易却必须在离江边三哩的地方进行。外商都住在闽江南岸的南台地方，情形和宁波大同小异。第二次战争的结果使进城权的意义顿形减小，领事馆马上就设在这里了。

144

1844年厦门开放贸易

厦门座落在荒芜的厦门岛上，它的兴衰完全以对台湾、菲律宾和南洋群岛的贸易为转移；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时，它曾经是荷兰贸易和英国贸易的一个据点。这个口岸是在1844年6月英

① 在1855年有15,739,700磅茶叶由五家经营茶叶的英美商行运往国外市场；在1856年其数量增到40,972,600磅；此后三年的平均数是35,476,900磅。

国领事到达后开放的，在那里也象在福州一样地发生过为领事馆准备适当馆址的问题，两处的问题是同时解决的。领事的住宅设在鼓浪屿；因为厦门没有高级地方官，进城权似乎不太重要，所以领事的办公处所设在城外的商业区。商人的写字间也都设在此地，但是住宅却多在鼓浪屿，这样未经特许，鼓浪屿就成为外国人的住宅区了。贸易是在健全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且不是靠茶叶之力，出口主要是糖；但是进口数额——鸦片不包括在统计数字之内——始终是超过出口①。厦门用以平衡这种

苦力贸易

贸易逆差的主要出口始终是劳工。几世纪以来，劳工一直运往菲律宾和马来群岛，可是近两世纪台湾已经变成了厦门及其附近地方的殖民区②。

作为约开口岸的广州

广州在1843年进入约开口岸的阶段，英、法、美等国都派有领事代表。广州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于经商都是同样地精神勃勃。虽然上海夺去了广州的不少生意，但是剩下的还很多，尤其是湖南和湖北的茶叶方面的贸易。在进口方面，需求继续不衰，

145

新的口岸只是创造新的市场，并没有造成广州贸易的减退③。

在这个口岸经商的外侨人数日见增加，从1845年的二百五十六人增加到1855年的三百二十四人，在后一个数字中只包括有十一名传教士（四名是英国人，七名是美国人）。这些人都继

---

① 在1844年，即开埠的第一年，英国船经营的贸易是：进口372,272美元，出口58,209美元；在1852年，其价值是：进口1,933,500美元，出口268,500美元。

② 参阅本书第15章。

③ 1846年各国船只的广州贸易是进口为13,294,898美元，计原棉5,095,407美元，匹头货2,678,189美元；出口为22,917,406美元，计茶17,199,374美元，生丝1,412,550美元，丝织品1,353,640美元。1845年7月"伦诺克斯"号装载的第一批波士顿冰到达香港。这就开始了从塞勒姆运温汉冰和从波士顿运小塘冰和考其吞冰到香港冰房街仓库的那一种有利的贸易。这种贸易一直继续到在香港用机器造冰时为止。

续住在老商馆里，那里除了原有的十三个行之外又新增了三个行；当领事、商人和传教士被拒不得进广州城的时候，拥挤在这些行里的人们受了许多侮辱和不少的损害。

146

第九章　动乱时期

1. 广州进城问题

外国人在广州居住的限制

帝国政府已经签订了一件和约，但是广州人民却仍然抱着不调和的仇视态度，坚持要把外商继续限制在旧商馆的范围以内。迟至 1848 年，先驱的英国医务传教士合信医师在郊区他那所为中国人免费医病的医院附近租了一所房子；他的房东被迫驱逐他，但是他拒绝迁居；于是他被关进监牢，关了六年之久，直到 1854 年由于香港总督包呤爵士的紧急建议才被释放。

1842年12月7日广州的骚动

在 1842 年 12 月 7 日有一百七十名左右的一批印度水手从停泊在黄埔的船上登陆到商馆去。早晨一次口角引起了街上一次骚动，水手们不得不躲进义和馆避难。一群中国暴民向极东端的各商馆攻击，到了半夜，义和馆、集义馆和保和馆都被烧毁。第二天开始将被火烧毁的各商馆加以洗劫，直抢到中午有二百名中国兵勇开到时才住手——这已是中国暴民占据商馆前广场的二十四小时之后。为此，总督曾采取措施：拨款二十六万七千元作为赔偿被毁财产之用，并将十名祸首枭首示众。英国商人向璞鼎查爵士呈递一份抗议书，并请求保护，说明这次骚动是预谋的，此次同印度水手的纠纷不过是总爆发的导火线而已，一切材料都早在事前准备妥当。这位全权代表在批示中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加到外商本人身上。他指责外国公众忽视了他147 们和他协力消除愤懑原因的明显责任。

预谋的证据

在这个具体的争执问题上——在中国人怀有预谋的这点

上——商人是对的，而这位全权代表是错的。在前几个星期中，排外的情绪已经激动起来，煽动性的揭贴早已贴出来了；在骚动发生的前一天，总督和巡抚曾会衔布告，严禁聚众滋事和张贴煽动性揭贴。

在中国的多数外商，对于这个国家，也就是对于中国人的心理是没有什么深刻认识的，他们的那点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买办或贴身仆人那里得到的。外商们既要求中国负责原则中的全部实惠，又要求领事裁判权中的各种特权，他们已经为自己的事业从中国政府得到那样一种保障，其有效的程度同可以指望得之于一个近代西方国家政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外国政府和它们的代表在这敌对的双方之间所处的地位是困难的，并且由于世界其他各地也常有纠纷，它们难以或不可能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中国问题上。

广州进城权

1844 年 6 月广州由于有美国人牵连进徐阿满的命案而发生了骚动。在这一年以及以后几年中，又发生了其他种种骚动，其中大多数是与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的问题有关的。进城权是根据上海福州两处对南京条约下述一款所作的解释："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等城邑），通商无阻。"只要所要求的权利不被否认，象在上海那样，这种权利就会立刻被放弃；但是，一旦象在广州那样，这种权利被完全拒绝，那些负责指导英国在华事务的人们就会以"进城权"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成败关键这种武断意见，奉为圭臬了。

美国人对这种"权利"的看法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丛报》的美国编辑裨治文和卫三畏这两位先生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那位签署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其实并没有同意外国人进入广州城门或五个口岸中任何其他口岸的城门，而且无论在这个条约，或在虎门、望厦、黄埔各

148

约中，也都没有任何条款甚至可以解释为默允这种权利的。一个中国人阅读这四件条约所会得到的概念是：外国人准许在五处港口居住通商，而'港口'一辞①是指商人从船只卸货和进行交换货物的岸上地点。这些地点不一定有城墙围起来，也向来不称为'城'，要想引用港口这个名词作为进城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条约中没有包括进城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②。在1843年7月，耆英写信给璞鼎查道，其他各口既可进城，广州自无例外之理，但是"困难在于广东民情与浙江、江南〔江苏〕不同"。现在他正积极消除他们不合理的疑虑，请稍事忍耐。在1844—1845年期间，这个问题仍未解决；1846年1月13日，钦差大臣兼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才会衔布告明白承认此项权利。第二天就有了"广东全体绅民"以各种揭贴的形式所作的回答，痛斥中国官吏的懦弱无能和英夷的悖逆凶残，并警告一切关系人等，"此等蛮夷"胆敢有人进城，誓即"先歼此丑类，再焚其巢穴"。第二天，当知府以全副执事经过城里时，他和他的扈从遭到了攻击——一个中国官吏在本人衙门所在地遭到这种事是极少见的——并且追到他的衙门，全部捣毁后，付之一炬。于是钦差大臣和巡抚会衔发布了一道告示，声明绝不准外国人进城。耆英失掉了一切支持以后，不得不一反过去所为。他本来未始不能凭他的政治才干挽救帝国，但是他深感无能为力。

149 1846年4月4日的协定

当时英国政府看出了耆英的困难，阿伯丁勋爵当即训令德庇时爵士在处理开放广州城的问题上，对任何足以损害耆英地位的事，都要慎重考虑。于是，他提出了不妨同耆英议定将进城

① 原文作"the term kiang kau, or river's mouth"，查中英、中美、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各款，或作"五港口"或作"五口"，而并无"江口"字样，兹照条约原用语改译"港口"。——译者

② 参阅《中国丛报》，第18卷，第276页。

权延缓两年的意见。德庇时已经按照同样的总的看法行事。1846年4月4日在虎门签订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中，双方同意此项权利的实施无限延期，但并不取消。这项条约奉到了钦准。

归还舟山对中国人心理上的影响

据南京条约规定，在赔款全数付清而各口岸均已对英人开放通商之前，舟山将继续由英国女王陛下的军队驻守。德庇时爵士希望在最末一笔赔款付清后——1846年1月22日——仍继续留在该岛，直到开放广州城的一切安排完成时为止。可是，璞鼎查爵士却已经同意一俟在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各项赔款付清，就立刻撤出舟山和鼓浪屿的驻军。阿伯丁勋爵曾以这一点提醒德庇时爵士并训令他说："严守条约和处事公平的名誉，比任何区区战术上的一点便利要有价值得多。"和平归还舟山，其真正目的无疑地是想把关系搞好。香港是丧失以后不能收回的了，舟山却仍可被赎回去；显然必须让舟山赎回去以限制排外派的作用，这些排外分子由于舟山的交还而又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行动。从骚动日益频繁和日益激烈（而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是正在舟山撤兵之际发生的）的情形看来，德庇时爵士的忧虑似乎是不无理由的。

1846年7月康吞-丘奇事件

在1846年7月4日，一个名叫康吞的英国商人，被一个水果贩的吆喝声所打扰，于是从他的住所中冲出去，将水果摊踢翻，并将这个小贩赶出这条街。四天之后，另一个名叫丘奇的外国人同样为另一个水果贩的吆喝声所惊扰，于是用木棒去殴打他。康吞也持棒冲出殴打。这两个外国人将那个吆喝的小贩捉住，拖进商行，捆绑起来，而据这个中国人控称，还用木棒打他。这就惹起了一场严重的风波。英国领事曾派人往中国官厅请求保护，美国代办也跟着提出同样的申请。中和行的大门和围墙都被冲破。英国商馆已有被毁之虞。因此外侨就自行武装起

150

来，聚集在各商馆的前面。经英国领事和美国代办磋商后，他们就向暴民进攻了。在投石猛攻的极端危险中，他们便开枪了，中国人被打死了三个、被打伤了六个。在下午九点钟刚过的时候，中国当局带着军队来援救外国人；此后，就再没有过什么激烈的行动。

对康吞先生采取的行动

德庇时爵士要求耆英严办肇事人等，认为中国政府应负责维持治安并保护在中国领土上的生命、财产；但是警告钦差大臣说：倘若中国不能维持治安，则英国臣民就要进行自卫。在另一方面，即在广州对于这次骚动进行调查，康吞被领事法庭判以破坏条约之罪。9月24日，领事奉到德庇时爵士的特令判处康吞二百元罚款。康吞向香港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经最高法院推翻原判。这种结果殊使伦敦外交部、香港总督以及驻广州领事失望，他们都切盼能对在中国行凶的外国人加以管束，以免给中国人之不能维持治安以任何借口①。巴麦尊声称他将把全案的审判经过，特别是香港最高法院审判长的判决咨送伦敦皇家法官审理，并且说他完全同意罚款。“英国臣民以他们在国内绝不敢加诸最低贱的人的那种蛮横轻侮的行为，妄肆施诸中国人，这是不能容许的。”

151

在这次骚动发生的两天之后，即7月10日，广州英商向英国领事呈递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派遣一艘兵船停泊在商馆面前，

① “最近由于我下令处罚康吞以二百元罚款而引起的广州英商的激动，或许不致使阁下感到多大的惊奇……阁下大概已听到另一商人英格利士先生的证词，据他说：‘我们对我所知道的任何中国法律都向不介意……’对付在广州的本国同胞实在比对付中国政府还难，被迫下这样一个断语的，我并不是第一个；我可举出下述事实作为这种说法最好的证明：责令康吞付二百元罚款，比为我国商人部分地因其本身的过失而造成的损害向中国政府索取四万六千元的赔偿，对我不知要麻烦多少。”（德庇时爵士致巴麦尊勋爵函，1846年11月12日，《广州骚动有关文件汇编》，第74页。）

以资保护。7 月 22 日又向英国外交部呈递了一份同样的请求。英国领事反对这种措施；但是巴麦尊勋爵却训令德庇时爵士要求中国当局惩办肇事的中国人犯，并且以英国政府已命令一艘兵船经常停泊商馆前面一节通知中国当局①。在第二年 1 月，即 1847 年 1 月，巴麦尊勋爵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外国政府对中国方面所应采取的态度：

巴麦尊对中国的政策

"我们若采用一种谦卑的语气，我们将会丧失我们在对中国胜利中所得到的一切优越地位，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要从这种相对的优越地位上降下来。倘若我能靠道义力量，以交往的语气维持住我们的地位，我们就无需用武力来图恢复；但是我们若听任中国方面在广州或其他各地又拿出以往的那一套妄自尊大的语调，一如他们确实始终想拿出来的那样，那我们不久就要被迫同他们重起冲突了。自然我们——我所说的我们是指在中国的所有英国人而言——应当避免给中国人以任何控诉的理由；尤不应惹事生非或无理干犯；但是对于任何不以平等地位待我的举动，都必须一开始就予以制止，我们虽则在措词上要极有礼貌，但必须使他们全体清楚了解我们的条约权利是非受到尊重不可的。中国人必须明白和认清，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人民和商馆，他们就会被击毙。如果他们虐待那些安安静静地行使条约权利，在广州街上走路的无辜英国人，他们将受到惩罚……深信使任何一些人安静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认清你是有力量并且有决心以武力对付武力的；在这方面，中国人同其他人类并没有丝毫两样。"

1847 年 3 月 12 日，有六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到佛山游览，被向导引到驻在该地的一位主管那里。他们在一个小官护送之下，一再遭到石块的夹击。德庇时爵士同耆英就这次和其他事件所进行的公文往来都不能令人满意。4 月 1 日，英国军队没有提出警告，就登上兵船，开往广州，在三十六小时后，达格拉将军通知德庇时爵士他业已占据了广州的商馆；并且已经"夺

1847 年 3 月外国人在佛山遭到石击

1847 年 4 月出征广州

152

① 关于当时巴麦尊勋爵对中国的政策，请参阅《文选》，第 221、222 页。

取了所有虎门和粤江要塞的各重要炮台……”。这种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不管对它的政治智慧和道义方面的判断是怎样，却受到了外国公众的普遍称赞，包括美国代办巴驾博士和美国领事在内。

在德庇时爵士和耆英会见之后，于4月6日双方同意了一项协定：由耆英以公函的形式承认以下各项条件：

1. “欲来省城同拜，用意甚好；但尚须从缓。兹同意，自即日起两年之后，英国官民得自由进城。”

2. “英人不拘何时上岸散步，如遭凌辱，地方官应即查办；在广州准如上海之例，在不出一日之路程内游览。”

3. 10月和3月两次肇事之徒，当予严惩。

4. “在临河河南一面拟划出一处宽敞地面，供英国商民等作修筑住宅和仓库之用。”

5. 划给一处地方作教堂和公墓之用。

6. 拟在新荳栏巷建一过桥。

7. 商馆前河面禁止停泊船只。

耆英除去要应付在广州的局面外，还要对付所辖两广境内不久即将达到一场有组织叛乱的规模的骚动，同时沿海的海盗也日见猖獗。他对付这种局势是用一种彻底而有效的东方的方法。处决的事屡见不鲜。德庇时爵士在巴麦尊勋爵的督促和在外国公众的全力支持下，就选择了这个时机把阿伯丁勋爵以前指示他非经慎重考虑不要轻易损害耆英地位的那道训令一起置之度外，断然发动了他的突击；他固然是达到了眼前的目标，他的行动也完全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核准，但是结果却是加深了广153 州及其附近的人民的仇恨，并减损了耆英在对外以及纯属对内事务上维持秩序的力量。

12 月 5 日有六名英国青年乘船到广州上游三哩的黄竹岐去郊游，从此未能生还。被切成许多块的尸体经缝好之后，又过了几天，才送到广州。耆英决意同英国人和平相处，处理得迅速而有效。他马上派兵占据了这个村庄，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很重的惩罚。在被判的十五名罪犯中，有四名在 12 月 21 日立即处斩。其余十一名，一名拟斩，一名拟绞，三名拟终身充边，六名拟笞杖并流放三年，统候刑部作最后决定。两个月后，耆英解除广州职务，调回北京。汉人徐广缙继任两广总督，署钦差大臣。3 月间文翰先生接替了德庇时爵士的职务。

1847年12月黄竹岐的谋杀案

经过文翰和徐广缙对 1849 年 4 月开放广州城问题的长期公文来往之后，徐广缙抄送了一道上谕，其中谕称，皇上不能拂广州人民的公意，而强行进城之议。无法可想了，不得不放弃进城权的行使了。中国人兴高采烈，皇帝以该督抚"安民抚夷有功"于 5 月 7 日降旨特颁爵赏。

在抗议下暂时放弃进城权

巴麦尊勋爵殊不肯不提抗议就甘认失败。他训令英国全权公使向钦差大臣递送一份转致北京帝国政府的抗议书，在这份抗议书中，他提醒中国政府应注意"他们的前任在 1839 年所造成的错误"，以及英国因此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在这同一天，即 1849 年 8 月 18 日，巴麦尊勋爵寄给文翰先生"一封致北京外交大臣的加封函件"，另致钦差大臣抗议书两份，加封寄交。文翰先生把巴麦尊勋爵这封加封的信派英国兵船"雷纳德"号直接送到白河口，而在那里却遭到无理拒绝，皇帝颁降上谕说：

154

致北京的抗议被拒绝

"迩者夷人在天津之行径，实属桀骜侮慢已极，乃竟恬不知耻，径自投函枢臣。爰经叠降谕旨，饬勿庸予以复文，着该军机大臣等，即勿予以置复，以免轻启该夷僭越无理之渐。粤督徐广缙，向来办事可靠，亦洞悉夷人

之鬼蜮伎俩，且粤省为夷人首到之地，故今后凡此类事件，一体交由徐广缙查办。"

2. 海盗、护航和航行证

海盗的重起

当广州因进城问题正同仇敌忾、余愤未息的时候，中英双方却对取缔整个沿海一带的海盗方面，根据互助条件进行合作了。在中国水面上，海盗与其说是一种专业，毋宁说是副业。海上的渔夫或内河的船民，甚至农民，当他们日常的职业上的收入低于往常的报酬时，他们立即就去抢劫别人，作为供应自己需要的手段；当政府衰弱、维持治安的力量减低的时候，这种水路抢劫便成为有组织的海盗行为，而杀人越货的勾当也就随之俱来了。所以海盗行为原是一个多年不断的问题，其所以在这个时候变本加厉，乃是遍及全境的不满情绪和叛乱的反映。从东京(Tongking)边界起到扬子江口，甚至直到山东一带的海面止，海盗船比比皆是，它们都是在对英作战时期凭由中国当局所发的护照而得到充分的武装配备的。

中国商船颇为所苦；每逢他们对外国船可以攻其不备或发现外国人没有作有效保护的时候，也同样加以损害。1843 年，香港周围海面备受海盗的骚扰，而他们的供应基地，就设在这个殖民地界内；1847 年，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整个海岸线，事实上已处于海盗黑帮控制之下，商船和渔船都向他们缴纳定额的黑费。1848 年，扬子江口的海盗非常猖獗，那一年年底有数艘海盗船在扬子江口外被捕获。情况非常严重；中国方面既已表现出没有准备或没有能力履行其有关责任，各国为了本身利益，就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来保护他们自己的贸易和恢复海面上的宁静俾使船只得以驶行。在中国海上只有英国有足够的武力来保护它本

155

英国海军所采取的镇压

身的利益，它并且还担负起保护所有国家利益的这个艰巨任务。1847 年 3 月 23 日，英国双桅兵船“侦察”号押解了三艘海盗船到厦门；经过初步审讯之后，即将海盗们解交中国当局。英国海军在出征广州的前三天就将这件事报告了耆英。在 1849 年 9 月 28 日到 10 月 3 日这段期间，也就是最后拒绝广州进城之议的六个月之后，舰队司令海氏率领英国兵船三艘在广东海面上消灭了二十三艘海盗船，每艘海盗船上装有大炮十二至十八门，共配备有战斗水手一千八百名；在这月下旬，他又将载有大炮一千二百二十四门、水手三千一百五十名的一支海盗舰队中的六十四艘船，消灭了五十八艘；1850 年 3 月在香港码头附近的大鹏湾，他以一艘兵船消灭了一支由十三艘船只组成的海盗舰队。这三次出击都是循中国当局之请而进行的，并且是在中国水师有名无实的合作下进行的①。直到 1860 年以后很久，海盗还是横行整个沿海一带，扫荡海盗的工作也一直在继续进行，甚至在两国公开作战期间这些军事行动都没有中辍，1858 年 5 月英国兵船“袭击”号在伶仃洋面消灭大海盗舰队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私人船只组成护航队的弊端

海盗横行所引起的弊端之一，就是外国商船、双桅帆船、双桅纵帆船和快船②凭借当时欧洲人在纪律上和威望上优越于亚洲人而组织的护航制度。申请保护须纳护航费，这是作为酬劳而索取的。例如，1850 年 8 月，双桅纵帆船“阿尔法”号和五只快船在护送沙船时曾与一支海盗舰队有过一场苦战，捕获了五只海盗船，并押送到宁波。可是，在那些冒险者当中，以不法之徒占据势力；为提供保护而索取护航费，和向所有和平商船勒索

156

① 应该注意的是：1849 年 8 月 22 日发生的亚吗嘞总督的暗杀事件，以及 1850 年 6 月“雷纳德”号被毫无礼貌地押送出白河。

② 快船是用外国式的船身和中国沙船的桅和帆所制成的一种双桅帆船。

黑费实相去无几,因而这种护航制度随即带来了极端惊人的祸害。

葡萄牙人在宁波护航

在这些年中,葡萄牙人负起了对宁波中国航运的保护责任。他们对所有进出宁波口岸和航行附近海面的贩运的沙船颁发保护证并征收保护捐。从各类船舶征收的保护捐,为数每年不下五十万元。葡萄牙虽然不是一个有约国,可是葡萄牙领事却漫无限制地行使领事裁判权;葡萄牙领事在其判决上总是给葡萄牙人的荷包里能装进多少钱就装进多少钱,而对犯法的葡萄牙人则决不过分压榨,这在宁波已是人言啧啧。宁波的官吏和商人于是采取了一个聪明措施,以黑费为条件来收买当时骚扰宁波一带海面的一个广东海盗的强有力的头目;这帮海盗变得相当的忠实,开始在护航和保护事业上同葡萄牙人展开竞争。摩擦随之而来,经过三年竞争之后,在 1857 年 6 月间局势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这些广东人打了一场胜仗,把望风而逃的葡萄牙快船一直溯河追赶到宁波;6 月 26 日又在那里展开战斗,葡萄牙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护航制度甚至在宁波也还继续实行,不过在 1859 年当地英法两国领事有阻止各该国人民继续参加护航贸易的举动。

中国船只在殖民地注册

海盗死灰复燃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以颁发"航行证"或许可证的办法,创立一种给私人船舶以外国国旗保护的制度,凭证有效期一年,但得申请换发,在有效期内,准悬挂该外国国旗并要求保护。香港英国殖民地的注册办法是可以由该殖民地以通过条例的办法予以核准的;其他各国的登记法和航行法当时却比较严格,但需要既如此迫切,登记费和航行费的引诱又如此之大,以致所有各国领事都擅自行使了依法原不属于他们的权力,

157 他们也对中国人所购置的船舶发放航行证,给以悬挂该国国旗

的保护①。在香港方面采用这种保护贸易的办法甚至更有迫切需要。那里，除去外海方面有组织的海盗的经常活动外，还要加上来自珠江三角洲方面的叛军②的危险。早在1854年这些叛军横扫广东全省，几薄广州城下。清军毫无人性的残暴军事行动迫使叛军的浪潮退减到足以给广州一个喘息的时间；但是从广州城到虎门那一段水路，却长期为叛军所骚扰。在1854年9、10月间，帝国军队同叛军在香港码头北岸的九龙城进行着拉锯战，香港的贸易因此濒于瓦解。在包呤爵士的总督任内，香港通过了两项条例以应付这种局面，准予颁发殖民地船舶登记证，并准在香港殖民地界内登记为皇家土地租地人的华籍居民所购置的船舶悬挂英国国旗。

殖民地注册的效果

从它的正当的方面来看，这种制度使一些分配进口货和收购中国出口产品的对外贸易，在负责政府无力予以保护的时候，可以得到保护。保护是确确实实的。不仅叛军和同样恣意掠夺的清军对于外国国旗表示敬畏，就是海盗们也不大愿意同一个不动手则已、动手就狠打的力量为敌，尽管这个力量一时还未显露出来；此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在每一只船上，不管是快船或是沙船，至少要有一个人——外籍船长——来供给勇敢的东方人在行动时所缺少的那种西方人的纪律和热忱。这类悬挂外国国旗的船舶绝无假冒为外国人所有的意思，但是却为了促进外国人的利益而取得了悬挂外国国旗的权利；并且明文规定，只要它们遵守一定的章程，就会象外国人所拥有的船舶一样，得到同样的保护。

① 迟至1861年，据海关报告所载，在截至12月31日为止的六个月中，仅从上海一口结关出口的宁波帆船和汉口沙船悬英国国旗的即达一百九十三艘，悬美国国旗的达一百二十九艘，悬其他各国国旗的达五十艘。

② 指起义军。——译者

158

3. 与中国官吏的交往;修改条约的企图

对外国代表的不理睬政策

1852年8月,叶名琛奉派为两广总督和专办洋务的钦差大臣。从那时起直到1856年止,对外国代表不理睬的办法已成为中国政府既定政策的一部分。在广州,没有一个外国代表获得接见,而试求通过两江总督同北京谈判的各次努力,都被婉言劝阻。

1854年第一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

依照中美条约和中法条约的规定,这两项国际协定得于十二年届满后,即1856年,提出修改;英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也获得了这项权利,因而使他们得在1854年提出修约的要求;三国代表一致同意在他们同中国的关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变更。因而,这三位外交使节奉命采取一致行动,并同中国政府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所有这三位使节也都得到警告,切勿陷各该国政府于非使用武力不可的局面——英、法两国是因为当时正从事于克里米亚战争,而美国,除其他原因外,则是因为宣战权操于政府的立法部门,而不是操于政府的行政部门手里。在修约的交涉中,对于以下各点特别重视:

(1) 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内地及各沿海城市;如果作不到,则
(1甲) 争取在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开放镇江、南京"以及浙江沿海的人烟稠密的各大城市〔即杭州和温州〕"。
(2) 使鸦片贸易解禁。
(3) 废除内地子口税。
(4) 采取有效措施以镇压中国沿海海盗。
(5) 对中国劳工出境制定管理办法。
(6) 规定外国公使驻节北京;这点如作不到,则
(6甲) 规定外国使节与"中国政府枢要"之间的公文来往办法。
(7) 争取外国使节与总督直接来往。
(8) 规定条约的解释应以外文本为准。

这些指示是颁给英国代表的，而美法两国公使则奉命予以支持和合作。这三位公使首先照会叶钦差大臣，叶氏在他的复文中通知他们：不幸他不能抽暇同他们亲自会见；但是他派了两位代表去会谈，并且通过他们声明说："对于现存的各条约他只有权作些枝节上的修改"，而事实上，也并没有作重大修改的必要。三国公使遂于9月间前往上海，旋与江苏巡抚满人吉尔杭阿举行了会谈。他们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双方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了一次坦率的交谈。可是，那位巡抚通知公使们说：他无权谈判，而全权证书已寄交叶名琛。他举出种种理由劝他们不要北上，但是公使们却坚持他们的决定不变。

159

公使们在广州和上海所作的努力

包岭爵士和美国委员麦莲先生都各自准备了一艘本国兵船，既壮声势，又无示威之嫌，布尔布隆因无法国兵船备用，于是就派了一名使馆职员携带他的公函前往。这一行人在10月15日到达白河口，等了几天之后，才受到极不令人满意的接待。公使们于是南返，深信除非有武装示威的支持和要挟，修约是无法办到的。

白河交涉毫无结果

第二次修约的尝试是在中美和中法条约中所规定的1856年进行的。当时，以为帝国政府在叛乱四起的情况下，显然毫无力量，也许会比较愿意争取各国的中立或支持。以前的一位传教士巴驾博士在1855年奉派为驻中国公使。在修约问题上，他抱着一些很激烈的看法，其中有些是健全的，可是也有些是空想，但这些看法，却征得了美国政府同意并一并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在路过伦敦和巴黎的时候，他取得了克勒拉得恩勋爵和华留斯基伯爵的支持，他们训令各该国驻中国代表根据自己的判断，尽量与巴驾博士合作。巴驾博士的建议如下：

1856年美国提议修约

160

1. 准三国公使驻节北京，中国派遣代表分别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

2. 准三国贸易得无限制推广至帝国各地。

3. 准中国所有人民享有信教自由。

4. 改良中国法院。

包吟爵士的意见

包吟爵士对于第一、二两项并不反对，但认为第三、四两项则完全是空想。他给巴驾博士以外交上的充分支持，但是，因为这位美国公使只能有两艘兵船护送北上，他就拒绝偕同去执行一项料定不会有结果的任务了。法国代办顾忌伯爵奉到训令太迟，已来不及授权他对修约一节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然而他已准备采取和包吟爵士同样的行动，并给以善意的外交上的支持。

巴驾博士出使的失败

于是，巴驾博士在1856年7月1日离香港独自北上。他先因兵船未到，后又因得到中国当局的允许就地开始谈判，而在上海耽搁下来。一次会议跟着一次会议，一直拖延到来不及去白河时为止。希望既已破灭，他在11月返回香港，抵港之后即发现英国人已经对中国当局再忍耐不下去了，并且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

第十章　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

1. 快艇“亚罗”号

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外国代表们对于中国政府只准他们同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办交涉的决定，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坚决拒绝接见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多少考虑一下他们奉命提出的修改条约问题，都感到愤懑。叶钦差对于使节们坚持要求商谈，并以他和他的政府认为既非其时又无必要的修约问题苦苦相逼，深感忿怒。广州人民表现的情绪则同七年前和十五年前并无二致。在这样一堆易燃物中，这时却投进了一个即将成为战争的直接原因的事件。在叙述这个事件之前，先将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同样事件详细说明一下，是有益处的。

上海的国旗事件

1854 年 3 月 6 日，当一艘悬着美国国旗的领港船正在驶入上海港口的时候，道台的武装船“乡民”号对它开了一炮，勒令它停航，扯下了美国国旗，并强迫外国船主或领港，以及六名中国水手离船，把他们带上中国战船“康东”号。外国人被释放了，但是水手们却被拘留捆绑，引起这个举动的理由是该领港船装有一批炮弹作为压舱物，而惟恐这批炮弹可能售与当时占领县城的叛乱分子①。美国领事罗柏特·麦菲先生抗议称：“任凭用什么借口，凡在美国国旗保护下的财产或人员都不容中国当局干扰而不加追究；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对美国国旗下的人员或财产有任何权利主张，那么，控诉也只应向他提出，因为他是条约

① 指小刀会。——译者

订明的唯一有解决权力的人。"最后结果是，为了取得补偿，美国

162 巡洋舰"普里穆"号在3月20日将炮装好了实弹，靠着"康东"号的舱侧顺流行驶，21日中午，美国国旗就悬挂在"康东"号船前的最上桅，并发炮二十一响致敬。

"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在香港注册的快艇"亚罗"号悬着英国国旗停泊在广州城外。在上午八点到八点半之间，有四位中国官员率同六十名左右的兵勇上船；国旗被扯下，有十二名中国水手被捆绑并从船上带到巡船。船主托马斯·甘纳迪当时正在访问邻近的另一艘快艇，在兵勇还没有带走人犯之前就回到了船上；他立刻重悬英国旗，并对逮捕和带走他的水手提出抗议。当人犯还被拘留在船上的时候，领事巴夏礼先生亲自上了巡船，要求将他们带到领事馆审讯；要求被拒绝。于是他行文叶钦差，指出"这样一种当众施加的侮辱，必须同样地当众予以补偿"。要求在他到场之下将水手送回"亚罗"号，并且声明，如果他们被控犯有任何罪行，也应随即将他们"解往英国领事馆，我准备在那里会同阁下为此目的所派的适当官员审理这个案件"。

叶钦差对于这次行动的辩护

叶钦差声称：他派人到"亚罗"号船上去是为了缉捕一名罪恶昭彰的海盗，这人的确与9月6日上川岛上发生的一桩海盗案件有关，船上其余的水手也涉有嫌疑；英国国旗当时并未悬挂；快艇为一个中国臣民所有，也无权向英国注册或使用英国旗。

给予快艇以旗帜保护的根据

中国政府本可对中国人的船只在香港政府注册一节提出抗议，但并没有提出过，而且事实上还认为这是既无需自己出钱，又无需自己费力的一种保持商业渠道畅通的方法。但是任何抗议都一定要向英国当局提出，并且要用外交方式处理。所有权属于中国人；这一点是公认的，但是依照注册条例，这样方符合

规定。在 1855 年的第四号条例通过后，包呤爵士将它咨送给殖民地大臣时，曾经提到它是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不得不然的，但是促请注意该条例的执行机关所易犯的流弊。香港政府接奉训令，略谓以中国人所有的船舶在殖民地注册是否可认为是"商船法"所明文许可，尚属可疑，似应另行通过条例，订明"以中国侨民名义注册的船舶使用英国旗的合法性"。这样一项条例通过了，于是香港政府，并通过香港政府而上至英国政府，对于保护这样注册的船只以及要求将一切有关这类船舶的法律地位问题提交英国法庭而不是提交中国法庭裁决一节，都责无旁贷了。 163

护照的效力

旗帜正悬挂在快艇上时被扯了下来；这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证实这件事的，有快艇"亚罗"号船主和停泊在距离只有五十码地方的快艇"达尔特"号船主的证词；否认这件事的，有中国兵勇和捕快的陈述，他们的证明当他们作为关系方面时是出名地不可靠的。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至于是七点半钟还是八点半钟登上快艇的，关系也不大。

在英国船上逮捕中国人的问题

所犯最严重的侵害行为是没有领事的拘捕证就去逮捕水手。在中国海面上的一艘英国船是英国的领土，所有船上的生命财产，都在英国保护之下。在 1856 年，领事裁判权已经根据 1843 年的虎门条约予以实施。"亚罗"号船上的水手是中国人。倘若认为他们是逍遥法外的中国臣民，就应引用虎门条约第九款："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潜往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倘华官或探问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国尚未查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已经罪人供认，或查有证据，知其人实系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在领事裁判权原则下的所有外国船只都适用这同样的规定，1854 年 3 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采取的态度正和 1856 年 10 月英国驻广州领事所采取的态 164

度相同，他们都认为从一艘有权悬挂该国旗帜的船中，没有领事的拘捕证，就擅自将人带走，是一种破坏条约的和无理的侵犯行为，对于此种行为必须加以适当的赔偿。

规避道歉和补偿的要求

在香港的包呤爵士，对于一反1840—1852年间比较强有力的政策而成为前此四年间英国政府特有的那种小心谨慎政策所加于他的束缚，很是愤慨。驻广州的英国领事具有最优秀官吏的头脑清楚和行动果断的特色①。遵照香港总督训令，他要求对所发生的事件作书面道歉，并保证今后必予英国国旗以尊重，以及在他到场之下将非法逮捕的人送还快艇。他所给予的保证是，"一俟向适当官宪提出申请，将不许中国罪犯窝藏于英国船舶，但是一切法律程序均须依照条约规定办理。"叶钦差被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即在十四日以前作出决定。到那天，叶钦差答复说，在所捕的十二人之中，有九人即送回快艇，但有"三人尚待进一步严讯"；他坚持该船不应享受英国旗帜的保护，而所以在该船捕人则因该船并未悬挂足以表明快艇国籍的旗帜，领事拒绝接受用这种办法送回的九个人。

英国政府支持要求

克勒拉得恩勋爵训令包呤爵士说，关于注册证的发给、有效期限、旗帜的悬挂、或船主的不在场等，纵有违章问题，均属"英国国内规章问题，应由英国当局处理"；在船上逮捕任何人员，必须依照条约规定办理；"本案所牵涉的原则至关重要，巴夏礼领事所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还是非常温和的"；"在押三人的重新交出，应该作为不可缺少的条件来加以坚持"；并且说他赞成用报复行动来取得补偿。凡所采取的步骤都得到伦敦政府的完全认可。由于两院都提出不信任案，政府的行动于2

165

① 在1856年巴夏礼先生二十八岁，但他从1842年十四岁起就居留中国，参与官场生活，并开始学习中文。

月底提请议会决定。在上院，政府于1857年2月26日以一百四十六票对一百一十票获得支持，但是在下院却于3月3日以二百四十七票对二百六十三票遭到失败。首相巴麦尊勋爵因而解散了议会而诉诸民意，大选结果，他取得八十五票的多数。

2. 陷入对外战争

送致叶钦差的最后通牒

英方既不满意于叶钦差的答复，于是为了要达到强行索偿的目的，就在10月14日掳获了一艘中国政府的师船，对于这事叶钦差并不加以注意。一星期后，巴夏礼先生要求这位钦差在二十四小时内接受以前提出的要求。叶氏立即答复，对“亚罗”号快艇的法律地位仍坚持他的论点，但表示愿送回水手十人。巴夏礼先生则是不将十二个一齐交出就不肯接受。而且必须正式地交出。叶氏于是将十二个人送回，但是“并未照所要求的方式”，而且还要求巴夏礼立刻送还其中的两人，也没有派出任何适当的官员来会同他进行必要的审讯。因此，领事拒不接受这十二个人；又因没有道歉，于是问题就移到海军当局的手里了。

英国海军的报复行动和叶氏提出英国人头的赏格

在10月23至25日之间，西马縻各厘海军上将占领了广州城下游四哩远近的江口各炮台；沿澳门航线的各炮台；广州城前外国人称做“荷兰傻事”的一个小岛上的炮台；同时又占领和据守住商馆。27日，向钦差大臣衙门开炮，每隔十分钟一发；第二天，又用炮火攻破衙门前面的城墙。29日，海军上将以军队开进钦差大臣的衙门并在里面列队穿行，来给他以轻蔑和侮辱。166 在炮台被占领的时候，叶钦差每天发出抗议的通牒，声称他已经允从前所要求的一切；可是对于轰击他的衙门一事，他却发出一项告示予以反击，号召军民人等“同心协力，灭此跳梁英奴”，并且悬出赏格，作为忠心报国的鼓励，同时，他通知美国和其他各

国领事说，英国妄肆开炮轰击，已擅启战端，因而他不复能负责保护中立国人。

11月初，疏落的炮火还继续不断，炮火的疏密仅以保持使钦差大臣的衙门暴露出来的那一段城墙缺口为度，而小心地避免造成生命或私人财产的不必要的损失。6日，靠近城东南角的"法国傻事"炮台被占领，一支停泊在炮台外的由二十三艘师船组成的船队被毁灭；除此以外，为了便于防守商馆，在后面有相当数目的中国房屋被拆毁。在12和13日，西马縻各厘海军上将攻占了横档炮台和亚娘鞋炮台，这两个炮台一共架有大炮约四百尊。

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态度

在这些军事行动期间，美国人和法国人都竭力保持中立态度，虽说六年以来美国代表们——马沙利、麦莲和巴驾——都认为除使用武力以外不可能从中国方面获得西方国家要求的满意解决。然而华盛顿政府并不接受他们所主张的这种政策，因而命令它的每一代表不得有任何举动使该国陷入战争。在10月29日西马縻各厘海军上将所作的一次攻城战中，美国驻香港领事齐南先生带了一面美国旗和军队同行；这个行动立刻被美国驻广州高级海军军官安德鲁·佛特中校所非议；并且也为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所反对。美国和法国对中国都有不满；两国都要求过修改条约，并且法国还有马奥斯丁神甫被害事件没有获得补偿。两国使节顶多也只会要求同英国的同僚积极合作，但是没有一国曾经授权作任何侵略行动，所以它们的代表都保持中立态度。根据叶钦差的请求，美法两国卫队分别在11月16日和11月22日撤离广州，两国领事馆也分别在那两天降下了旗帜。

167

在美国人撤出广州以后，发生了一个事件，迫使美国当局不

得不采取断然行动。在佛特中校于11月15日前往广州途中，船上高悬着美国旗，竟遭到中国人重新装备起来的江口各炮台的炮击；船上竭力摇旗，却招来更多的炮火。海军准将奄师大郎就同他所率领的三艘船舰平息了那五座犯了侵害罪的炮台的炮火，并在16和22日之间将它们拆除。叶钦差在一度发出不能令人满意的公文以后，送出了一个圆满的道歉书，当被满意地接受了，从此没有再发生过事故。

美军平息了江口各炮台的炮火

11月25日，发布了一项告示，对擒获英夷和斩级缴献者，提出从优给奖的赏格。12月5日，有一个水兵被杀，他的首级被南宾乡的非战斗乡民带走，因此该乡被焚，作为对其他地方的一个警告。在广州附近活动的叛军统帅不时有书信送来，表示他们愿意合作，并要求准许他们在香港取得沙船和供应，以便对共同敌人作战；但是建议未被接受，叛军仍被隔离在战场之外。

中国人既无法抵抗英王的武装部队，现在就着手去进攻商馆。12月14日晚间十一点钟，商馆后面中国房屋废墟中有几处地方起火，在15日午后五点钟光景，商馆房屋除了一处之外，都变成一堆灰烬。12月22日有一艘往来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的非战斗的邮递汽船“西斯尔”号，遭到两大队师船的袭击，但是损失轻微，终于逃去。八天以后，在该船经过二道滩前往香港的航程中，船上突有一群外穿长衫里面着兵勇制服的中国乘客，取出预藏的武器，劫夺了这艘船。船上十一名外国人都被杀害，内有西班牙驻黄埔副领事；他们的首级被割下，船则搁浅焚毁。

1856年12月14日外国商馆的破坏

168

在这样复杂和敌对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住有中国人七万以上、其中有很多公开的乱党和海盗、还有广东烂仔的香港，发生一些骚动，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1857年1月14日，社会上因发现有一个中国面包师在当天供应的面包里搀有大量砒霜而大

1857年1月14日香港面包下毒事件

为震骇;毒药的分量很重,可是幸赖及时发现和消息迅速传播,所以中毒的人虽多,却没有死亡。根据文件上的证据,发现某些中国官吏同这次行动有关,而在当时的外侨心目中,共谋乃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委员、法国使节以及葡萄牙的澳门理事官,都在1月16日向叶钦差发出照会,强烈抗议这种从事战争的野蛮方法。在2月底,发出了告示,号召所有旅居香港的中国人返回大陆,违则照汉奸罪处理,并将全部财产抄没。

广州对敌别处中立

当这种野蛮的战争正在广州进行的时候,帝国的其余部分却保持中立,漠不关心;对外关系,连同对英国的关系在内,都依然未受干扰。虽说在上海有一个人数众多、势力甚大的广东人团体,从家乡得到消息以后,很是愤慨,可是当地的官民情绪可用“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俗语来形容。包呤爵士草成一份指责中国政府罪状的说帖,分送南京的两江总督和福州的闽浙总督,要求他们转呈皇上。他们都以友好的态度作了答复,并且请这位英国全权公使同广州的叶钦差接洽,因为叶钦差是唯一受权办理外交事务的人。在12月和1月颁发的两道上谕说,叶钦差办理洋务,历练有素,对目前危局,堪任重寄;并传谕两江和闽浙总督,倘若英人北进,应对所辖海疆严加防范,以免侵扰。

169

两国已经陷入了战争。在中国人看来,对于镇压海盗,中英两国一向是切实合作的,而只由于缉拿海盗时,手续稍有不合,竟酿成一场战争,似属悖乎常情。在英国人看来,对于公然侮辱英国国旗的事情要求补偿,竟遭到断然的拒绝,也是悖乎常情的。事实上,从1842年起,战争就在酝酿中;过去的每一年,都增加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3. 太平天国(1850—1864年)及其兴起

太平造反与外交的关系

通常,国内叛乱,特别是一次终于被镇压下去的叛乱,只关系于一国的国内历史而已。但是太平造反在帝国境内蔓延得那样广;它的镇压由于帝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摩擦而受到的干扰又那样多;叛军有时候竟那样接近于获得外国人的积极支持;而国家的糜烂和政府的解体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又那样深远——因而对于这次大叛变作一些叙述,在正确理解太平天国进展期中的中国对外关系上,是有必要的。

叛变爆发于广西

道光帝试图扫除政府积弊的计划并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他在1850年逝世时留给他的儿子咸丰帝一份贿赂盛行、朝政腐败、民情不满和叛乱频仍的遗产。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广西的谋反运动,尤其是广西、广东和湖南三省交界地方的山区中的谋反运动。这里,年年都发生乱事,也屡次以荡平奏闻,但是在荡平以后,却总是发现它们还在充分地活动。在1850至1851年间,反乱在广西省蔓延得很快,甚至于扩展到了广东和贵州。在1851年8月27日,洪秀全攻占了广西的永安州城。

在北京是很容易看出局势的严重性的,一个个的官员奉派去镇压反乱,却一个个地都丧师辱命,身败名裂。最后,大学士赛尚阿奉派为钦差大臣,于1851年12月抵达永安州城下,在他指挥下的军队有三万人。直到洪秀全兴起时为止,在乱党的首领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显示出有将涣散的群众结合起来的能力,也没有一个人能在热火朝天之中跻身于领袖地位,但只有一个可能的例外①。 170

① 早在1851年,在攻占永安州以前,就听到有号称天德并擅用皇帝表徽的一位领袖。1852年2月在永安州被俘的洪大全,于"凌迟"处死之前声称他自己是天德。参阅海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3章。

洪秀全的早期历史

洪秀全在1813年生于广州北面三十哩的花县。他是一个超过中人之资的勤奋的书生,但是应考始终不中,因而成为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中的一个失望之余满腹牢骚的人。当1833年在广州赶考的时候,他接触到基督教教义,当时他还不肯接受。1837年,他在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中再度落第,失望之余又得了病,病中他生出了预示他未来尊荣的第一次幻象。1847年,他在三年一次的考试中又一次落第之后,重又被吸引到基督教教义的研究上去;他曾向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牧师请教,表示准备接受所传教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他并没受过洗礼。于是他和冯云山就组织了上帝会。他们的信从者不久就数以千计了,特别是广西的山区,到1850年夏季,他们已经成了由虔诚与守诫的信徒所组成的一个很大团体的首脑。洪氏一经走上这条成功的道路,就宣布他自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天父为第一位,耶稣基督为天兄,而他这位太平王自己就僭称为天弟。他自始在吸引人们信教,以及鼓舞他们的热忱和教育他们遵守戒律上所取得的成就,表现出他在运动初期的天赋才能。但是证以他拥有八十八个圣妻和无数姬妾,他后来的确是堕落了。

太平军从永安州向南京进军 171

洪秀全(为便利计,可用他后来的称号天王)于1851年8月攻占永安州城。他在这里被赛尚阿围攻,陷入极大的困境,于1852年4月率领着一支传说人数从三千到一万不等的军队突围而出。他进入湖南;在攻占过无数城镇以后,他的军队在9月18日到达了长沙。因为有城墙的阻碍,他们于是进行攻城;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领袖采用了皇帝的徽号。11月底解围后,他们在益阳掠夺了几千只船舶,就乘用这些船舶向岳州进发。这个城市已被守军放弃,他们在12月13日进城。12月23日攻占汉阳;于是江南岸的湖北省城武昌被封锁,旋于1853年1

月12日被攻占。备好了船只，太平军就沿扬子江而下。九江、安庆、芜湖和太平①相继陷落，3月8日兵临南京。19日，这个帝国的旧都被攻占。在五千名满州驻防军中——还有男女和儿童两万人——幸存者不过百人，其余则全被杀戮，沿着扬子江漂浮到大洋中去了②。

镇江是在3月31日被攻占的，满洲驻防军未发一弹就逃走了，所以只有几百人被俘虏和杀戮。太平军于4月1日占领了扬州和瓜州，这就使得他们控制了运河的两个出入口。天王没有再行东进，他忽略了同海洋和航行海上的人们接触的机会，而从海洋和那些人们方面他是会取得船只、军火和军需品的供应的。他的注意力却转向北方，而以攻克帝国的京城为目标。他派出了两支军队：第一支军队曾经达到距离天津十二哩运河边上的独流镇；第二支军队曾经一度占据山东临清州。两支军队都被迫向南撤退。

太平军北伐

当太平军横扫六省，直达他们的首都南京的战无不胜、坚无不摧的进军以及他们的北路进军几乎直捣天津，将帝国弄得四分五裂的时候，这些和其他省份——例如福建，浙江和四川——都成了动乱的场所，这些反乱在组织上虽然较弱，却在他们活动的地区里造成同样的灾害，并且使抵抗他们的帝国官员和军队受到更大的损失。到1854年，叛军已经蔓延到广东全省；7月间，他们离广州只不过几哩的路程，广州城中许多富商都逃到香港避难。武装叛党的活动已经伸张到香港对面的九龙和广州城省河对岸的河南。帝国权力一连两年不能越出广州城。1855

172

① 系今安徽省当涂县。——编者

② 到1858年年终时，估计太平军编制内的军队有五、六十万男子，和五十多万妇女。后者编成连，单独成军；有极严格的纪律，通常军营中的苟且之事尚无所闻。

年1月，香港政府不得不通过一个中立法案，并命令帝国军队和叛军的武装船只都撤出香港海面。1856年10月，在"亚罗"号战事爆发的同时，叛军某一舰队的统帅，还致函包呤爵士，建议在他们的军事行动上建立一种同盟和合作关系。

在这些年份当中，事实上在帝国阵营以外的中国内地各省都已经摆脱了帝国的控制，并且毁坏了现存的政府组织，而并未建立一种民政制度以资代替。英国海军舰队的从事于镇压沿海的海盗，以及三个有约国家的全权代表的力图取得条约的修改，都在这同一个时期。

太平天国政权以掠夺为基础

要说太平天国政府曾经组成过任何形式的民政机构，这并无所闻。为了维持宫廷和军队而实行的征税手续简单之至——凡是看到的东西就拿去。他们在1853到1859年这些年份中，遍历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和江苏省西部，将富有人家的可以带走的财物都集中起来运往南京和太平军据守的其他城市；太平军不曾拿走的东西，又被帝国军队席卷一空。国家弄得田野荒芜，财富荡尽，元气大丧。

173

4. 对外关系方面的危机——海关税务司署的设置

英美法等国对于太平军的态度

这次反乱颇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英国和美国最初都特别对于据说有几百万人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新教的报告，以及这几百万人所宣称的要推翻腐败专横的满清政府而代之以纯粹中国人政权的意向，感到兴趣。法国对于那种据称已经采行的基督新教感到厌恶，但也有意倾听一下太平军领袖们的表白。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并期待所发生的这些变动会带来更大和更无限制的中西交往的机会。在1853年4月，乔治·文翰爵士到南京去调查。他觉得更应采取那个步骤，因为上海的中国当局

认为外国海军理当合力支援帝国官员去阻止叛军的前进；而且事实上，上海官吏在3月中旬已经向三国驻沪领事发出一份正式的请求书，要求他们立刻派兵舰去解救南京。在5月初上海官员又请求潘理准将助攻叛党。文翰根据在南京观察的结果，曾经得出结论说，能够代替满清政府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似乎尚未建立；英国政府应该遵循的正确政策是在对抗的军队之间严守中立，但在英国利益直接受到攻击时有直接加以保卫的必要。

1853年的重要性

在中国对外关系上，1853年是1898年以前的最紧要的关头。虽说文翰在南京所得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仍持一种观望态度；他的翻译官后来又访问叛党的都城，而且表现出对太平军同情的态度。美国代表马沙利先生在5月底将他的意见报告华盛顿说："英国可能从南京的新皇帝那里取得中国西部的一个口岸〔内地〕的开放，以及扬子江的航行权……"他还表示他担心英国或许会将太平天国置于他的保护之下。据说帝国政府正在要求俄国提供援助的这类谣言，引起人们担心俄国可能造出一个南以黄河或扬子江为界的保护国。马沙利说道："中国象是剪羊毛者面前的一头羔羊，其征服的容易，正同印度各邦不相上下。一旦英国或俄国的贪婪或野心驱使他们肆行攫夺，亚洲的命运也就注定了，除非美国现在就采取一种健全的政策来遏止这种不幸的结果，将来中美关系的长期断绝是可以想象的。"他最后提出的意见成为直到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同门户开放主义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我认为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保全中国——维持这里的秩序，在这衰朽的躯干上，逐渐嫁接出新的原则，给政府以生命和健康，而不是坐视中国变成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场所，终于沦为欧洲人野心的牺牲品。"

马沙利政策

174

为保卫外国租界而采取的措施

1853年3月间南京和镇江陷落的消息,在上海商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安。4月12日,在驻这个口岸的领事们的领导下,全体外侨举行了一次群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通过以前两次分别召开的会议上的决议,在那两次会议上曾经决定召募一支英国人和一支美国人的义勇队;设立一个由四位英国人和一位美国人组成的联防委员会;并在英国租界西面开掘一条濠沟——护界河——从而将租界四面都用堑濠围绕起来。义勇队如期募集,接受了军事训练。

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上海

9月7日,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小刀会是三合会的一个支派,大体上是由惯于滋事的广东人和福建人组成,它所得到的主要支持则在广东和广西。上海知县被杀;但是道台却能躲藏起来,随后得到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的援救,把他从城墙上缒出去,逃往外国租界的一位传教士住宅中避难。外滩的海关被劫掠,但是外国侨民并没有受到骚扰。城内居民都被关在城门以内;由于有供应居民以食物的必要,叛党这才取得了供应品。叛党曾经宣称他们同南京的太平军有联系;但是天王经过调查之后,拒不承认他们是他的信徒。

176

马沙利对于缴付关税所抱的态度

既然上海县城已经在叛党手里,海关房屋已经被焚,海关主管已经成为外国租界里的一位难民,而政府又到处无法行使权力,于是外国商人就觉察到只有他们才能提供解救的办法了。为了确立外国租界的完全中立地位,领事们拒绝帝国官员在租界以内或在外国船只碇泊所范围以内行使职权,直到关务在海关房屋内得到完全恢复时为止。商人们都想拒不缴付所有关税。美国委员马沙利,运用他职权范围内的全部力量反对这种态度;他的主张是,根据条约,帝国政府应对外国人所遭受的损失负责,但是倘若外国人拒绝缴付关税,他们就不能使中国政府

对他们的损失负责。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英国领事阿利国和美国副领事克宁汉，订定了一个对英美侨民适用的暂行办法，而上海十分之九以上的贸易和航运都是在英美人控制之下的。他们同意由他们自己来征收关税。但如何将这项原则实施于各该国侨民，则彼此意见分歧。英国人只要求出具期票，而美国人却要求将应付税款用现金缴付领事馆。这样一来虽将美国人置于吃亏的地位，但是却使马沙利委员得以贯彻他的政策，支持帝国当局并防止可能踵随太平天国的成功而来的帝国的瓦解。他担心着他认为英国所抱的那种占据上海并"从而控制那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富饶区域的扬子江流域"的侵略阴谋，为了向本国政府辩护他的政策，他举出许多的例子来证明，尽管英国人声明中立，英国官员的行动却使人认为是替另外一种政策做好准备。就英国人方面来说，这种关税新办法的效果，无异是将上海变成一个自由港了。

177

无约国家的船只是自由进出的。这使英美商人都处于不利地位，而马沙利委员既然已经履行了他的条约规定，现在就决定利用最惠国条款，于 1854 年 1 月授权副领事克宁汉准许"美国船只不取得任何完税证件，不请领任何结关凭照，就可随时结关出口，在一切方面都把上海视同一个自由港"。马沙利的政策是不让美国商人遭受更多的麻烦，并强制英国人打破出具期票的制度。

普遍逃付关税

1853 年 10 月 28 日，海关人员开始在停泊于当时外国船只航行最远的浦东烂泥渡的两艘巡船上办公；在 2 月初，办公处又迁移到苏州河北岸，并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加以认可。在这几个月里，关税的交付多少是出于外国商人方面的自愿，有一个时期他们一般也都尽了缴税的义务。但是在 1854 年 2 月 10 日，英

国商人致函他们的领事，举出了船舶不缴付进口或出口关税就结关出口的许多事例。因此他们认为英国商业也可以免缴那种并没有向其他外洋国家的贸易一律征收的关税。

上海实际上成为一个自由港

中国方面为在这个中立口岸的范围内建立海关并争取外商和外船承认其主权而作出的一次又一次打算，都为贸易赖以进行的条件所阻梗；在5月初接着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放弃所有这类的打算而设立两个内地关卡，在进出内地的主要路线上各设一处。进口税和出口税都用不着再在船边征收，而是在口178岸和产销地之间的通路上征收。三位领事立即对这种办法联合提出抗议，说它违反了条约中明文规定的条款。从1854年5月起，中间政府就没有从对外贸易方面收到税款。一般商界人士、领事和中国政府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都诧愕不置。

在后来的谈判和解决中，美国委员麦莲和英国领事阿利国起了主导作用。他们要求中国人通过由各国领事提名，但由中国给薪、为中国人服务，并在中国主管官员节制下工作的外国人实行监督的办法，为海关机构吸收一些廉能精干的成分。依照美国委员麦莲提出的一项计划，三位领事和当时还在英国租界中当难民的苏松太道，在1854年6月29日签订了一个协定。当初只想设税务委员一人，至于人选，则英美两国领事一致推举法国领事馆的史亚实充任。但是法国领事伊担对于担负起这样一种混一的管理重责却有些迟疑，因而最后商定由三个领事馆各自提名一人，都予以任用。于是苏松太道就任命以下三人为上海口岸税务委员，而组成一个"单独和一致行动的税务司机构"，其名次则依年龄排列：史亚实，法国人；贾流意，美国人；威妥玛，英国人。

1854年6月29日任用外国税务司的协定

这个新的管理机构在7月12日创立。它由于结束了只能

使不大老实的商人特别占便宜的那种情况，而受到商界人士的欢迎。它使这个港口的税务长官苏松太道，得以获得舍此并无别法可以取得的一笔税款。但是这种精确的课征和公布帐目的制度，并不为高级官员和北京的中央政府和宫廷所喜悦；一年以后，同意创设这种制度的苏松太道被参劾，并被谪戍边疆。

新海关制度的创立

5. 1854—1859 年反乱时期中的上海

179

1854 年 4 月 4 日泥城战役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中国的帝国军队每占领了他们本国境内的一块地方，照例在军事行动期间把人民和人民的财产当作战利品一样看待。六个月来，他们在上海周围，多少总看到外国人在租界内自行采取的中立立场；但是后来却开始对外国人采取了他们惯常对待本国人的那种横行霸道的态度。1854 年 4 月 3 日，一小队闲荡的兵勇进入一所邻近英国领事馆的房屋，殴辱了两个英国人；随后在当天又有几伙武装队伍出现在租界边界的几处地方，殴辱了几群外国人；由于这些队伍人数越聚越多，外国兵舰上的水兵就上岸将他们赶走，并将驻扎在沪界河内的一个营盘里的兵勇悉数赶走，将营盘拆除。同时他们还查获了一支师船并予以扣押。次日，他们要求当时驻节上海的江苏省臬台吉尔杭阿将留在外国地段边界上的一切军队调走。臬台声明他无权照办。于是英美兵舰将所有能调集的兵力都调到岸上，他们同义勇队会合一起，组成一支约有四百人的队伍，在“泥城战役”中将帝国军队完全逐出租界边境。相继采取的这些步骤是由三个有约国的领事会商决定的。帝国军队除于 11 月 11 日向美国防区攻击过一次以外，没有再骚扰过租界的治安。

法国在上海的利益

法国在上海的利益不大。法国领事曾经一再被促请通令法侨迁入英国租界，但都被拒绝。然而在南门外有董家渡天主堂

一处，周围是许多本地教民的住所。这个天主教势力的中心显然是一个受到危险的利害关系所在，替外国人防护这个区域的工作，法国向来没有忽视过。加之，当时法国发展一个单独行政区（即法国租界）的意向已逐渐明朗，那么，出面保护弹痕累累的法国领事馆，自更理由正当，无懈可击了。法国领事和海军司令决定对城内叛党采取单独行动；1854 年 12 月 6 日，从法国兵舰调来的一支军队将小东门外的一个叛党的炮台拆除，而兵舰则用炮轰城。他们得到县城西面帝国军队的声援。经过许多努力，在城墙东北角上轰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然后，当帝国军队进攻西门的时候，法国海军陆战队就对这个缺口实行猛攻。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攻势被击退。此后，猛烈的轰击在继续中，城里的粮食供应又受到限制；县城无法维持，于是在 1855 年 2 月 17 日弃守。大队叛党从帝国军队的防线中冲出；约有三百人投降而被斩首，约有五十人窜越外国租界，经由海路南遁。于是帝国军队才进入他们围攻十七个月而不下的这个县城，并且奋不顾身地劫掠了一番——“叛党固然不好，但是这些兵勇更坏”，一位城里的居民这样说过。帝国军队斩杀了约一千五百名被指认的叛党，“甚至还开棺戮尸”。

180

法国人击退叛军

为了补偿他们的流血，法国人把县城和黄浦江之间直到小东门一带的郊区，连同上面的两幢法国房屋，都并入他们的租界。增加的地面固然不大，但是在原来的五百码沿江地段上，现在又新加了可作为上海最优良码头的一片七百码的沿江地段。

第十一章　中国第三次对欧洲人的战争

1. 俄国和中国

181

俄国向太平洋方面的进展

根据尼布楚(涅尔琴斯克)条约,目前在地图上所呈现的构成为满洲的那片土地,给中国保存了下来。条约要求俄国不得越过额尔古纳河和什耳喀河(又作石勒喀河)之间的地域以外,这两条河在现今斯特列洛契诺地方汇流而成为黑龙江;但是经过一个半世纪之后,俄国殖民主义者吞并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武力已经在太平洋上取得了一个立脚点。1850 年 8 月,黑龙江口的庙街建成为一个军备和贸易的场所。黑龙江以北的土地,满洲人向来没占据过,这片土地对于他们的价值,主要只是作为他们的猎户获取贵重皮毛的一个来源。

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

1727 年的划界条约规定把国界划定在恰克图地方,并且制定了在恰克图进行互市贸易的办法。除此之外,另一部分互市贸易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在中华帝国的极西端伊犁(固尔扎)和塔尔巴哈台两处地方发展起来。1851 年在伊犁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互市贸易的办法;这是俄国用来同 1842—1844 年所订各约保持平衡的一项条约。这项条约依照 1689 和 1727 年条约的先例,规定罪犯应移送本国当局惩办。在这两个市场上,任何一方都不抽税,不过每十只羊由中国政府取两只,每只给价棉布一匹。自 3 月 25 日(旧历)至 12 月 10 日(旧历)这段期间,准商

队前来并留驻该地；一般得自行防匪，但从一个中国军事哨站到另一个哨站，应由中国军队护送；并应于两处市场拨给土地，以供建筑商馆之用。双方商人得彼此自由来往，但是俄国人没有领事的许可证不得离开商馆，走进市街；任何一方的商人都不得赊卖；俄国人准自由举行其宗教礼拜，并给旷地营葬。公文来往是一方用"伊犁将军所属营务处"图记，一方用"管两边大臣所属营务处"图记。

182

1858年的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是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代表俄国，奕山将军代表中国在1858年5月签订的。十年来，反乱已经把中华帝国弄得支离破碎，十八个月前中国同英国发生了纠纷，五个月前广州已落英、法联军之手，十天前大沽炮台被攻占；也就是在那同一天，降旨授桂良和花沙纳以全权，去接受强加于中国的那些条件，商订天津条约。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在1848到1858年的活动中，究竟有什么实力作为他的后盾，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在1858年5月中国朝廷却无法拒绝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了，于是签订并批准了这项条约。根据条约，黑龙江左（北）岸，自额尔古纳河口到黑龙江口，承认属于俄国；右（南）岸，顺江至乌苏里江一带地方，承认属于中国；在乌苏里江与海之间的土地（1860年以后的俄国普里莫尔斯克省）由两帝国共管，直到两国间的边界问题解决时为止；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只对俄中两国船只开放通航；并准许互市贸易，但没有规定任何管理办法。这样，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中的失败就得到了补偿。

俄国联合三个海洋国家对华议约

这项条约是穆拉维约夫伯爵以什耳喀河以东地方的总督和行政长官的身分议订的，什耳喀河以东地方则是他在十年之间吞并进俄国领土的。在这之前，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曾奉派

议订商约，以期为俄国争取到经海路到各通商口岸贸易的权益，这类权益早经给予海洋国家，而明显地把俄国排斥在外。他由陆路前来议约，先是要求准许取道恰克图前往北京；既经中国朝廷拒绝，于是直抵白河口；在那里接到通知，不准他通过，但允将他的来文递往北京，复文则将在恰克图送交，嘱即折返该地。但是他终于在白河口接到一件拒不准许他前往北京的复文，并且通知他说，叩头礼无论如何是要他照办的，就象对他以前的历任使节所要求的一样。他于是在 1857 年 11 月径往香港，在那里同三个海洋条约国联合起来，并且从那个日期起，使用武力的虽只是其中两国，但在外交上四国代表却是采取共同行动的。象美国代表一样，俄国代表也奉有"明确指示，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严禁对中国政府采取任何胁迫手段"。

183

2. 法国、美国和英国

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

现在西方四个强国都在要求中国扩大并改善商务和外交关系。美国和俄国曾经严令他们的代表，只准使用道义上的劝告方式，绝不许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敌对措施。英国的代表和商人积怨重重，于是英国就借"亚罗"号快艇捕人事件作为一个开战的理由，但是用来支持赔偿要求的武力却嫌不足。法国则以愤于一个传教士的遇害来作为借口。中国的海路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操在英、美商人手里，而建议中的几项新条约所谋求的物质利益，受影响的也是以英、美两国为主。俄国同海路贸易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实际的利害关系。法国至当时为止，则以在伦敦购买中国丝或通过伦敦来通融资金的办法为心满意足，同中国简直没有什么直接贸易；法国官方在中国所主要关心的就是对天主教的保护。

184 1856年2月马奥斯丁神甫的司法谋杀事件

天主教传教士立即抓住了1844和1846年谕旨所提供的机会去传布他们的信仰，尽管没有条约权利，还是恢复了在内地的工作。1850年，广东省的大部分和广西全省被划为"使徒司教区"——这是给予异教地区中一个主教区的名称。1853年，马奥斯丁神甫被派到广西省最最西北角上的西林地方。起初受到了当地知县的款待，继而在1856年2月24日被继任的知县逮捕下狱；五天之后，经过了严刑拷打，被斩首，尸体则骇人听闻地加以脔割，然后丢给狗吃。这桩谋杀是皇帝在西林的代表的官方司法行为，为此政府不能不担负责任。而且在这次谋杀事件之前，西林的基督徒已经遭到迫害，家宅全被洗劫，二十五名教徒被囚禁，惨受酷刑，被夺去一切财产，还有两人被处死。

法国使节要求赔偿

事过五个月，确实的消息才传到广州。7月25日，法国代表行文钦差大臣，一面叙明所指控行为的详细细节，一面提请注意条约规定，根据条约，法国人不论由于任何原因在内地被捕，应一律解送驻在最近口岸的法国领事官收管，对于这样被捕的法国人，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或加以任何方式的虐待。他声称，马奥斯丁神甫所遭受的一切待遇，构成了令人憎恨的违约行为；呼吁钦差大臣对他所要求的赔偿提出具体条件。他进一步要求约定一个日期，当面商谈这个问题。叶钦差在复文中声称，根据条约，传教只以通商五口为限，并指出，广西匪乱频仍，骚扰滋甚，盗匪往往自称为基督徒，无疑这是捏造之词，但事实上却有许多自称基督徒而且有许多真正是基督徒的人，参加了造反，对于这些人自不能不严加惩办。但是，他还要作进一步的

185 调查，这样也就把会面一节无限期地延搁下去了。法国使节于是要求将西林知县革职充军，由钦差大臣以公函申明处罚一节业经照办，颁降谕旨布告知县革职，并宣布嗣后无论何人有违约

行为,均将受到同样处罚。

法国决定干涉中国事务

在巴黎方面,对于有机会干涉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和增进法国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所据有的道义地位,并不是不欢迎的。此外,干涉还可以使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继续它三年来所奉行的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的政策。英、法两国决定对马奥斯丁神甫被害之事共同提出赔偿要求,并且共同派遣兵船到白河口,迫使中国对于广州和其他各地的中国人的敌视行为提出道歉,同时进行修约。他们自信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委员巴驾已经奉准倡议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在有资格作判断的人看来,势必会导致战争,因为要将外国的地位提高到接近于平等的任何变革,中国朝廷肯定是要反对的。在远东方面既已酝酿成熟,英、法两国政府就向华盛顿方面提出请求,要求采取联合行动,以便使三国步伐一致,共同压迫中国对所提要求作出让步。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要诉诸战争,也不愿联合英、法两国去共同商订条约,但是打算指派一位全权公使。

美国驻华使节的任命

美国总统布嘉南刚刚就职,列卫廉就在 1857 年 4 月奉派为第一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他的历届前任则都是以委员的名义出使的。11 月,他抵达香港,开始执行职务。他所奉训令是要他迫使中国政府按照下述条件进行修约——

1. 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觐见皇帝,并同一个正式任命的外务部进行联系。

2. 扩大通商范围,改进外国进口货内地税章程。

3. 允许外国人的宗教自由。

186

4. 采取信守条约规定的措施。

他奉命尽量就一切和平措施同英、法两国使节合作。

列卫廉改变了看法

列卫廉要求叶钦差会见,但被很客气地谢绝了。至于会谈,

则毫无必要，因为现行条约是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无需任何更改。列卫廉公使所受的待遇和他对中国情况亲身调查的结果，使他信服了先前几位美国代表过去所持的、也就是他的英、法同僚当时所持的看法。他报告国务卿说，"西方文明列国必须坚持它们所了解的本身的权利，抛弃把中国当作一个可适用一切普通原则的国家来对待的梦想"。

英、法两国任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1857年春季，英、法两国政府决定把交涉的大权交到两位特命全权大使手里，这两位大使得越过常驻使节而调度一切事务。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伯爵为全权高级专使，法国政府任命葛历劳士男爵为全权特使。额尔金伯爵所奉的训令把将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陈述如下：

1. 赔偿英、法臣民所受的损害。
2. 在广州和其他各地彻底执行条约规定。
3. 赔偿最近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害。
4. 英国全权公使常驻北京，承认该公使享有与北京高级官员直接行文的权利。
5. 修改条约，以便取得通商方面更多的便利。

葛历劳士所奉训令实际上大同小异，虽则特别着重对马奥斯丁神甫遇害事件索取赔偿和为传教士日后安全要求更大的保障。

187

3. 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在广州

广州的军事行动因1857年印度兵变而延搁

但是法国并没有作好准备，它的海军到达中国海面已迟，而英国的注意力已经用到别处去了。英国人民被克里米亚战争拖得筋疲力尽，国库支用一空。曾经肩负1840—1842年军事重担的印度政府，自1856年11月至1857年3月则集中注意对波斯的战争，直到6月，兵变爆发以后，军队方才调回印度。1857年

5月13日爆发的印度兵变,正是使中国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延搁起来的最后一个原因。6月3日,额尔金伯爵刚刚到达新加坡就收到了印度总督的紧急公文,要求他把派往中国的军队调遣一部分到加尔各答。额尔金伯爵立即照办。前往中国途中的其他军队由好望角殖民地总督改调加尔各答。

1857年夏季是一个外交上的踌躇时期,但是海军却仍表现出活跃的迹象。在5、6两个月期间,广州和佛山镇周围的江面上曾经有过几场激烈的战斗。8月7日,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封锁了广州的港口和江面。12月12日,法国海军上将吉诺里也效法他的榜样实行了封锁。

在10月间葛历劳士到达香港时,他发现自己面临一件明显的事实——对于马奥斯丁神甫谋害事件的断然拒绝受理;为此他声明要叶钦差负完全责任,因为叶钦差是这桩谋害事件现场所在的总督辖区的最高负责人。额尔金和葛历劳士经过了几次会谈,结果认定局势的发展要求在广州采取直接的断然行动。两国陆、海军司令将采取一致行动,但进行的方式应尽量减轻一般平民所遭受的损害。没有部队自印度开来,但是在11月开到了补充水兵一千五百名;这一千五百名,连同香港驻军所节省出来的兵员,从英国舰队登陆的二千名水手以及从法国舰队登陆的一千名水手,到12月中旬有了总数五千六百七十九名的一支武装力量可供调用。早在11月20日,西马糜各里海军上将已经宣布他打算占领广州城前面江对面的河南岛西部地区,这并不是作为进攻广州的一个步骤,而只是用来完成封锁,并使他能够窥探全城。 188

额尔金和葛历劳士致叶钦差的照会

12月12日,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致照会给叶钦差。额尔金的照会评述了1842年条约的一般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广

东的情况构成这些结果的一个例外。继而，在提到以前为谋求和平解决所作的种种努力时，他声称，英、法两国政府"一致下定决心，要以有力的断然行动，为过去的损害求取赔偿，并为防止日后的损害谋求保证"。如果条约义务，包括进城权在内，在广州能彻底履行，如果因最近动乱而造成的损害得到赔偿，那么就可以中止对广州的进攻，并解除封锁；但条件限十日内接受，至于河南岛，则无论如何都要加以占领，作为一项物质保证。

葛历劳士的照会则特别着重马奥斯丁神甫的被害事件，在列举了现已过去了将近两年的这件司法谋害事件的有关事实之后，他再度声明原提要求是无法再减的最低要求。葛历劳士还为被害传教士的家属要求现金赔偿，为法国人民和被保护者所受损失要求赔款，并要求行使在广州的进城权。同时，两国大使发布了一项联合公告，警告广州居民，如十天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即将开始攻城，并且告诉他们说："只有自己试图干扰攻城军队的人们，才会受到干扰。"①叶名琛对于这两件照会的答复正如原可期待于一个拥有极其悬殊的优势兵力的人那样——一概拒不接受。

1857年12月29日攻占广州

12月15日，攻占河南角；24日两国同时照会钦差大臣，告诉他说，因为他的答复托词推诿，不能令人满意，事情已交由联军的陆海军当局处理。12月28日，星期一，晨6时，两支舰队开始从船上发炮轰击，晨7时攻城的军队——总数为五千六百七十九人——登陆。在那一天当中，凡是没有登陆部队隐蔽的地方，炮轰不断，而登陆部队则满足于攻占城东北角附近的一座孤立的要塞。29日，位于东线的城墙遭到攻击，城的北部仍牢

189

① 关于额尔金和叶名琛的往来函件，参阅《文选》，第253-261页。

牢地固守，而南线则已处于船舰的炮火之下了①。

叶名琛的被俘和逝世

联军现在占领了城的北部，而要求进入该城正是争执的主要原因。于是决定，为了问题得到解决，必须将叶名琛逮捕；1858年1月4日，这项任务完成了，找到了躲藏在将军衙门里的钦差大臣。叶钦差一连六年拒不同外国使节会面，也拒不同他们商谈与各自职司有关的事务，这时已陷于无法逃避见面的地位了；他在十五个月一直不肯面对事实之后，不得不将总督驻地的省会听凭军事占领了。从钦差大臣档案中找到的公文，已经清楚地证明，他对付外国使臣的行动都曾得到北京朝廷的允准。将叶钦差留在广州，是不在考虑之列的问题；因此决定将他送往加尔各答，其所以选择这个地点，乃是因为额尔金伯爵觉得将他安置在一个能斟酌他的品级予以适当照顾的地方是具有强烈的政策上的动机的。在加尔各答郊区，给他备好了一所房屋；一年以后，他在那里逝世了。他的遗体送回广州，而在没有任何明显的关切表示之下被接了过去。

叶钦差所以给他的本国造成大祸，是因为他对待外国使节，步步以总督卢坤对待律劳卑勋爵所创行的方针为依归。促使英法两国采取断然措施的那两个插曲，稍微运用一点政治手腕，未始不可得到解决；但是却任其养痈贻患，给敌对行动造成了一个真实的和不无理由的原因。然而，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叶钦

190

① 关于苦力运输队的行为品格，不能不提一下。这个运输队是英国人为了在一个没有拖车牲口的国家里使用而组织起来的。这批从香港召募来的中国人是由英国军官训练的。他们第一次随军出征就是进攻广州；在广州，以及后来在大沽，他们都作出了优异的贡献。广州及其附近的居民曾对英国人表示最不可调和的敌意将近二十年之久；但也正是这些人，虽则也许是其中最下层阶级的人，却受到了固定报酬和体恤待遇的充分吸引，被诱抛弃了一切种族上的维系，去同敌人并肩作战。这是时代的特征：广州作战，上海和平；广州人一般是极端排外的，然而某些广州人却给敌人以帮助和安慰。

差都是他的政府中占优势的那一派的一个忠实的附和者，并且得到了广州人民的热诚的敬仰。

柏贵在广州继任叶氏职务

叶氏既然去职，广东的挂名巡抚柏贵，就自然而然地当了总督和政府的首长。1858年1月9日，联军以大使和司令官们的名义分别向人民和柏贵发出布告，告诉他们说，广州城现仍在联军军队控制之下，但是已交柏贵负责管理。

所依据的条件

这种办法是依据下列条件而生效的：

1. 由联盟国任命一个委员会；其委员驻扎在巡抚衙门，协助巡抚维持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将由一支巡逻全城的军队予以支持。

2. 在联军占领区域以外，凡是只关涉中国人的案件，将由中国官宪处理；但是事涉外国人的案件则由委员会受理。联军占领区域内的违法行为，一律军法从事。

3. 未经委员会加盖印信，巡抚本人不得发布布告，或以其名义发布布告。

4. 所有武器和军械库应一律缴出。

广州的"委员会"政府

根据这种办法任命了由哈罗威上校、修莱海军大佐和巴夏礼等三名委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为了维持秩序起见，他们备有一支由一百名英国兵和三十名法国兵所组成的巡逻队，此外又组成一支中国人的警察队，城内用七百人，郊区用六百人，以维持治安。对于英法两国的劫犯，由委员会讯办不贷；但是中国人则由他们自己的官宪在外国委员会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审理，并且为了表示和解，封锁于2月10日解除。柏贵和他的下属偶尔也有倔强的地方，但是立即受到警告。委员会的主要责任落在巴夏礼身上，他熟悉中国语言和习惯，现在他实际上成了广州城的巡抚。

191

广州已被解除武装并被占领了，大使们可以自由地把他们

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出使的主要目的方面，去同北京朝廷进行谈判并争取修约。因此他们拟就了同时发出的照会。额尔金伯爵的照会声称，全权代表拟前往上海，如果中国全权代表能在3月底以前到达，他们极愿在那里进行谈判。照会接着提出几个建立较好关系所必需的项目：准使节常驻北京；准外国人在内地游历；增辟通商口岸；制定内地子口税章程；按期修订关税税则；剿办海盗；停止迫害基督教徒。倘若谈判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葛历劳士男爵的照会给额尔金伯爵所列举的要求以充分支持。照会原稿经抄送美俄两国公使，其精神完全为两国公使所接受；他们同意具拟同时发出的照会。

额尔金和葛历劳士的照会

美国的照会提到了列卫廉先生到达时就存在着的敌对状态，以及美国的中立地位；美国代表试图同中国经办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直接交往也不得要领；他曾经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以防止战祸，而他的提议竟遭到断然的拒绝。他声明说：他和他的政府完全赞同联盟国为达到它们的目标而作出的努力；美国将提出它自己对于所受损害和损失的赔偿要求。他将在上海等候中国的交涉人员，但是，倘若继续拖延或拒绝谈判，那么，他将前往更近北京的地方，并将遵照总统可能指示他的方针办理。

美国的照会

俄国的照会指出，如果各国能同北京的高级官员直接往来，那么过去发生的一切纠纷原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现在遭到的一切灾祸都是由这点而来；最近拒绝接受俄国使节一事，使他有会同其他国家共图终止这种状态的正当理由。普提雅廷伯爵于是和其他外国使节一道来勒逼他们所可共同享有的权利。他恳请中国政府在上海开始现在所提议的谈判。

俄国的照会

192

3月25日，四国公使在上海接到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会衔

北京对各国照会的复文

发出的照会所奉北京复文的公函。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接到通知说，叶钦差已经革职，并已改派黄宗汉接充；中国大臣依法不得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又说大使们应该返回广州去在那里同黄宗汉进行谈判。给列卫廉先生的复文内容相同，但是对于美国当局所采取的友好和中立态度，深表赞扬。普提雅廷伯爵所接到的通知是，俄国既从未享有在五口通商的权利，所以该国没有过问广州问题的理由；俄国公使所负的使命是勘定黑龙江一带的边界，中国既已派定钦差，俄国公使应即前往黑龙江，在那里领取北京政府给他前递照会的复文。

下一个步骤

尽管在广州受了打击，尽管反乱蔓延，尽管中国政府的无能已经被证实，清廷的傲慢态度却丝毫没有减轻。额尔金伯爵、列卫廉先生和普提雅廷伯爵将总督和巡抚对致宰相的照会所发来的复文退回，各使节都一致要求与帝国的大臣直接文书往来的权利。为了支持他的要求，额尔金伯爵引用了南京条约第十一款"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的规定"。葛历劳士男爵对于复文的形式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将原件退还。四国公使共同决定两位以公认不韪的交战国身分，另两位则以与争一方庇护下的中立国的微妙地位，前往白河。

193

4. 在北方的军事压力

在大沽的外国使节

白河口外外国使节的四人合奏团于 4 月 20 日葛历劳士男爵到达之后就完全到齐了。24 日，各使节将照会送达岸上，声明国际谈判不应再在广州进行，要求中国任命全权代表在北京或在天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限于六日之内给予圆满答复，逾期联盟国大使将咨请海军司令占领大沽炮台，以便保证进出天

津的安全。不久,他们就收到了长芦盐政和另外一位低级官员的复文。这两位官员旋接通知说,使节只能同官阶和他们本人相等并赋有便宜行事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4月28日,收到直隶总督谭廷襄的照会;照会上的称呼于款式不合,除了普提雅廷伯爵之外,其余各使节都将原件退回,普提雅廷曾经会晤总督并且劝告他发送一种款式比较妥当的照会。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要求谭总督须获有事实上与1842年耆英和伊里布所奉到的相同的权限。5月10日,总督答复说,他不能获得大于他现有的权限。现在很清楚,一场陆海军的示威是一定要发生了。

美国使节的单独行动

列卫廉先生在这以前,为了贯彻他所奉训令的精神,曾经脱离他的同僚而采取单独行动。5月3日,他在大沽岸上会见了中国代表,他同他们会谈以后,确信在这个阶段坚持要求提出全权证书是不明智的;现在的钦差大臣谭氏曾经声称,他并不想要在每一点上都向北京请示,只是说,经过谈判的最后形式的全部条约需要请示。列卫廉先生通知钦差大臣说,他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谈判,只要中国方面拿出他的2月照会的原文给他察看,并且明确地保证将在平等的基础上收受和承认总统的来文。他获得了这些条件将在五天之内履行的诺言。5月10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他的希望落空了。关于要求提出相当于耆英和伊里布所奉权限的证书一节,钦差大臣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关于外国使节驻扎北京、内河和内地商埠的开放以及所受损失的赔偿等问题,他甚至断然拒绝讨论。在其他各点上,钦差大臣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在盖有印信和平等基础上同内阁直接行文的权利;新增口岸的开辟,以及在关税税则方面作一些修改。对于适当地接受总统文书一节所给的保证,并不令人满意,于是美国公使取消了谈判,不过在次日他又致函钦差大臣,对于甚至拒

194

结果令人失望

绝讨论美国政府如此重视的特权，表示遗憾；声明他所恳切盼望的是持续保持友好关系；并否认对于可能接着发生的事件负任何责任。5月19日，即大沽炮台被攻占的前一日，总统的来文就以适当的仪式呈递了。

1858年5月20日大沽炮台被攻占

钦差大臣和联盟国大使之间又继续交换了一些照会，可是一无结果。经过两位大使和两位海军司令会商之后，20日向钦差大臣发出了照会。这些照会表示大使有进入白河前往天津之意，以便在那里同具有便宜行事权的全权大臣会面。在同一天，又在早晨八时向岸上送出一份会衔的最后通牒，要求各炮台在两小时内投降。由于没有允从的迹象，于是在上午十时发出作战信号。镇守炮台的部队既丝毫没有进行保卫，到了正午沿河两岸炮台就都陷入联军手中。

使节前往天津

在海军司令巡视和肃清了河面以后，四国使节于5月30日到达天津。他们这时接到通知说，有两位高级满洲官员桂良和花沙纳已奉派同他们谈判。6月1日上谕所颁给这两位官员的委任状，在词句上甚至比颁给耆英和伊里布的还具有更大的权

195

限。这个任命证明了北京终于认识了局势的严重性，并决心用谈判的方式来解除京师门户被武装占领的那种压力。全权大臣在6月2日到达，在4到7日之间轮流地向各使节进行会谈。所有的会谈，都在中立地带举行，也就是在城外西南隅的一个叫海光寺的庙宇内举行。在第一次相互拜会之后，谈判就完全交由秘书和翻译办理，在指定的签约日期以前，全权代表并没有再行会见。

耆英的参预

耆英现在出场露面了。在6月9日，他以他的到达告知两个联盟国大使，大使们分别回答他说：因为正忙于同正式派来的钦命全权大臣接洽，现在无暇和他见面。两天以后，耆英通知

大使们说：他已于当日奉到上谕，派为全权大臣，有与桂良和花沙纳会同使用钦差大臣关防的权限。但是这后两位却没有就这点发出通知。只有额尔金伯爵的两位翻译官威妥玛先生和李泰国先生①拜访过他。他所提出的和平解决纠纷的建议，是以从河面撤出所有外国船舰作为开始谈判的初步条件的。在力请答应这一点的时候，他提到他同英国人之间的老交情，并且声明他的友情并没有改变。他的这番陈述被李泰国突然取出当叶钦差被俘时在广州发现的他上皇帝的奏折的一个副本所打断。在这个奏折中，他向威胁着要贬黜他的皇上阐述了他所以同外国人维持貌似友好的关系的理由，以及他所希冀的"驾驭夷人"的方法。当着桂良和花沙纳的面突然将这个文件取出，使得这位七十二岁高龄的耆英狼狈不堪，于是他就退出了会议②。两天以后，他就返回北京。经过审讯的形式，他被判斩刑。因为他是宗室，被减处赐帛自缢。这位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由于厕身在中国首先看到旧制度已成过去，对于外国人必须力求维持友好关系的中国统治者之列而显出了政治家的风度的人物，结局就是如此。

196

① 福州领事李太郭的儿子。

② 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拒不接纳一位不速之客是对的，但是当他声明他有与两位高级全权大臣权限相等的全权证书的时候，就难以看出他们究竟凭什么权利对他拒不承认。只要官阶相当，用什么样的代理人最能代表中国，这应该由中国来决定。可是就关于中国和中国官民方面的知识而言，三个有约国的使节，都操在他们的翻译官手里——额尔金伯爵操在威妥玛和李泰国手里，葛历劳士男爵操在马开手里，列卫廉先生则操在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先生手里。在英国翻译官中，威妥玛完全为包吟爵士和巴夏礼先生的整个政策所熏染；但是这次率先这样作的是李泰国，他的举动显出不必要地粗暴，甚至野蛮。作为一个以种种条件强加于战败国的战胜国发言人，他就任性而为，专横跋扈，意在凭借凶狠而不是凭借说理的力量来压倒中国方面的异议。尽管中国代表提出抗议，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却总是用这种盛气凌人的语调的。

第十二章　第三次条约的订立

1. 条约的签订

第一件议定和签字的条约，就是6月13日在谈判人员第一次相互拜会后仅仅一个星期的那件中俄条约。普提雅廷伯爵的任务是轻而易举的。和列卫廉先生一样，他颇叨光于英法部队军事行动所产生的道义效果，加之，他的地位又因穆拉维约夫伯爵刚刚在十五天前签订的瑷珲条约而得到了加强。条约中，多少还有点重要性的规定不过下述几款：遇有要事，得派遣使臣进京商办，抵京后，应妥为招待；俄国商人得在五处通商口岸，以及福摩萨的台湾府和海南的琼州两处通商；中国政府同意不查禁中国的基督教民，并准一定数目的传教士往内地传教；应在北京与恰克图之间设立驿站；以及俄国得享有最惠国待遇等。批准书限于一年之内在北京互换。这个条约的正本是在四项条约均经签字之后由海路发送的，但副本则取道西伯利亚传送。条约在6月15日从天津送出，于8月7日送到圣彼得堡。英法使节大获成功的消息正是首先通过这个途径传到伦敦和巴黎的，这项消息也构成了泛大西洋海底电报最初发往华盛顿的少数电讯之一。

对俄谈判

中美条约的谈判从6月14日到6月17日共进行了四天。其中载有一项最惠国条款。关于中国方面最重视的问题，即使节驻扎北京的权利问题，列卫廉先生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他要求得到遇有要事得派遣使节进京商办的权利，但"若系小事，

对美谈判

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至于到京的使节，则应以平等的地位，以礼相待。但另据规定，如果嗣后无论何时允准任何其他国家以驻扎使节的权利，应立即准许美国代表同样办理。条约中也载有基督教弛禁一项条款。其措词应完全归功于卫三畏的筹划和丁韪良的赞助之力，这项条款大受中国代表的非议；列卫廉一心一意想在6月18日滑铁卢战争纪念日签约，并且宣称不论是否列进这一项条款他都要签字；但在最后片刻仅仅作了一些字句上的变动，也就使得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一项条款列入了。条约于是在6月18日签字，批准书限于一年内互换，但没有订明换约的地点。 198

中法条约是最后签订的一项条约。关于驻扎使节这项最重要的问题，中法条约规定：于使节有“要务办理”时，皆准进京；但如果允给其他任何有约国以常驻使节的权利，法国也立即享有同样的权益。中国方面想避免将北京列为换约的地点，但是力争无效。中法条约本可在24日签字；但葛历劳士男爵为了对额尔金伯爵表示敬意，将签约一直推延到中英条约签字的后一日，即6月27日。 对法谈判

在外交方面一如在军事压迫方面一样，1858年6月在天津的情形，一如过去二十五年中在广州的情形，关系成败得失最大的英国人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谈判于6月6日开始，一直继续到6月26日晨，条约方才签字。在所有这些天的会议上，讨论都很热烈；英国草案中所提出的许多条款遭到中国代表的竭力反对；而英方却坚持全部条款，几乎一条不肯放松。双方终于在6月24日对条约条款达成协议。可是在协议达成之后，中国全权大臣为了只有中英条约才载诸明文的两项规定，以谈判决裂相威胁。那两项规定都是自始就拒不应允的，一是外国使节 对英谈判

199 的驻扎北京，一是往内地①各处游历通商的权利。以往，中国同其他国家的交往，向由低于部的一个机关理藩院办理，对西方国家也不例外。与外国使节驻京的规定互相呼应的，是规定成立外交机关（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那一款。英方代表通知中国方面说，如果谈判决裂，“绝不会再在北京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签订任何条约”。中国方面屈服了，条约在6月26日傍晚签字，批准书限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

中国对于四项条约的批准

依照1842年在南京所创的先例，他们决定在条约未经北京朝廷批准之前，绝不放松联军的军事压力。6月30日中国全权大臣以所奉朱批“俱悉，知道了”等语照会两位大使。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额尔金伯爵爰于7月2日声言有将已经开到大沽口外的另一些分遣部队调来天津之意。中国方面于是力劝大使们折回上海等候批准。这项办法当被拒绝；于是在7月4日转来3日的一道上谕，其中明白提到了那四项条约，并批准各约的条款。这项批准经认为是满意的。美国使节没有等待这项批准就已经前往上海；其他三位外国使节则于7月6日才离开天津。税则和贸易章程的谈判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了和日本商定条约，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分别在7月31日和9月6日离开上海。

税则谈判在上海开始

从北京派来谈判税则和贸易章程的钦差大臣在10月3日抵达上海。在外国方面，谈判完全交由英国方面负责。普提雅廷伯爵已返俄；列卫廉先生于接到草案之后，即声明赞同所拟税

① 在有关中国的写作，以及为控制中国对外贸易而达成的条约和谈判中，“内地”(interior)一词是指并非专门辟为商埠或“约开口岸”的一切地方（即使是滨海的地方）而言。所以目前，溯扬子江而上一千六百哩的重庆处于一个约开口岸的地位，因而不是“内地”；可是在位于浙江沿海的舟山岛上的定海，由于不是一个约开口岸，就成为“内地”。

则之意；葛历劳士男爵则于签字之前已经和额尔金伯爵对草案取得协议。第一次会议是在10月12日举行的，一切议妥后，额尔金伯爵在11月8日签字，葛历劳士男爵在11月24日签字。在税则方面并没有什么困难；除鸦片、茶和丝三种进出口税而外，一律建立在从价值百抽五的基础上。关于鸦片，中国方面承认有在一定的条件下解禁的必要，并且建议每担税银三十两，这数目最后被接受作为税率。至于茶，中国方面要求保留旧关税税率，即每担二点五两。丝的旧关税，每担十两，远在平均价值5%以下；但这是法国所关切的唯一品目，凡是增加这项关税的提案，必遭到法国大使方面的强硬反对。凡税则中没有列举的商品，一律都从价征收5%；另一方面，凡是认作专供外国侨民消费之用的任何品目，则完全免税贩运[①]。军火交易是绝对禁止的——这是因有叛乱而更加必要的一项禁令；在中国作为官卖品的食盐的贩运，也在禁止之列；作为民食的大米和其他谷类，以及作为中国通货的铜钱，都禁止出口。对于当时作为军火原料之用的硫黄、硝石和亚铅，都加以特别限制。衡度订明了标准，旧征的银两倾熔费也取消了。北京经明文规定不在通商活动的范围之内。关于外国进口货和输往国外的中国产品的内地税抵代办法，都作了规定。最后，海关手续和征收的划一制度，将实施于所有的通商口岸。

200

鸦片的合法化

北京朝廷简派象桂良和花沙纳这样两位显贵和另两位品级只次于他们的人员，远涉险阻驰至上海，自然不是仅仅商谈一项税则，或是解决象这类的简单问题而已。关于外国使节驻扎北

重新提出外国使节驻扎北京问题

① 经过了若干年，中国人对于烟草、酒类、香料、肥皂、家常必需品、面粉、奶油和干酪等若干外国人惯用的物品有了爱好；并且由于四十四年来税则没有修订过，中国国库在这项让步上的损失不资。例如表列商品进口价值在1908年超过了二千一百万两。

201 京的权利一节，中国方面力图变更成议。10月22日中国代表团来文指称，条约事实上是"恃兵威要挟而成①，举凡于英国无利而于中国大有损害之处，中国交涉人员均不容置辩"；第三款给予英国以选择权，或是留一代表在北京长住，或是派遣一人随时往来。因为在北京随时有发生冲突和误解的可能，更因为中国叛乱四起，已危及大清的江山，他们请英国以慷慨和公正为怀，放弃对中国如此不利的一项权利。他们补充说，只是中英条约列有这一项条款，而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对该条中的两个"或"字从宽解释而已，同时并愿于条约中任何一项条款受到破坏时，即听由英国使节常驻京师。

额尔金伯爵的同意

额尔金伯爵是为了缔结和平条约而来到中国的，他所希望的是为持久和平留下一个有利的条件；何况自1853年美国委员作此主张以来，支持清廷已经成为列强的政策。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写了一封信，一面坚持所有条约权利的全部字句效力，但另一面却作了一项诺言，表示愿行文本国政府，并愿以"英国钦差于来年换约时倘能在北京受到适当接待，且天津所议条约的其他一切细节能获得充分实施，则允宜训令女王陛下驻中国代表在北京以外选择一驻扎地点，或按期访问京师，或仅视公务上的需要随时前往"之意，作为他本人的意见，敬请英国政府核夺。额尔金伯爵的方针经英国政府批准。

作为这项让步的一种特别酬谢，中国方面同意给额尔金伯爵以溯扬子江而上游历至汉口的种种便利，以便使他能够选定202 三个口岸，候沿江贼匪肃清时，辟埠通商。11月8日他从上海

① 额尔金伯爵本人把已经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条约说成是"对准咽喉的一支手枪"，但是他还自称，"在这一切方面，我是中国的朋友"。——华龙德：《信函集》，第253页。

启程，一个月后抵达汉口。由于这次旅行的结果，镇江、九江和汉口三城经选定为扬子江上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镇江立即开放，其他两处则等待沿江叛军肃清之后再办。

使节们离去

额尔金伯爵于1859年3月4日离香港；4月6日在加勒遇到了携有条约批准书的新任驻华使节——他的兄弟卜鲁斯。葛历劳士男爵在把使馆的档案移交给布尔布隆之后，于4月8日离开澳门。列卫廉在把美商的赔偿要求确定为五十万两的一项双方同意的总数之后①，在12月8日离上海，他为了健康的缘故已经辞去了他的职位；奉委继任他的遗缺的华若翰先生于1859年5月到达香港。

2. 鸦片，1842—1858年

秘密经营对于鸦片贸易的影响

鸦片贸易并不是导致英国政府从事于以南京条约为结束的第一次对华战争的原因，也不是构成以天津条约为结束的第二次战争的因素；在1839到1858年那段期间，鸦片贸易对于那些在中国事务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政治和外交行动，并没有什么影响作用。然而，在国际商务关系中，鸦片贸易却极其重要，并且是凭以作为所能得到的从中国输往西方市场数量不断增加的茶和丝的支付手段的主要商品。外商散布在沿海各地，占据了每一个商业上的战略要点；官吏们同他们勾结在一起；双方唯一明显的矛盾就是对每一次破坏帝国法律的行为所应付出的数目究是多少的问题，是十五元一箱还是二十元一箱的问题。

① 这笔款项等于七十三万五千二百八十八金元。在付清了1856至1857年的赔偿要求，并支付了十三万金元作为在1863年用来对付太平军的一艘轮船的使用费和损失赔偿费之后，在美国财政部剩有四十五万三千四百零一金元。美国国会于1885年授权总统把这笔款项归还中国。因此，将这笔款项交付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

鸦片趸船的停泊处所

鸦片进口商避免去到要受本国领事管辖和监督的五个约开口岸的界内，而选择那些只有中国法律和权力生效的地方①。停泊在约开口岸界外的鸦片趸船的名字及其负责人以及所属公司的名字，在1855年的各种行名录上面，却同约开口岸上的一般公司和居民的名字一样公开地登载着。

203

推销方法

香港已成为鸦片的主要集散地。随着这个殖民地上要求成为自由港情绪的发展，先前的鸦片禁令渐渐无效了，而且在1843年条约完全生效以后，香港也没有一个时期不是作为贮存鸦片和贮存其他货物一样的一个自由仓库。沿海一带推销鸦片的方法，上文已屡屡加以叙述——迅速的轮船带着抢先的消息从加尔各答开到新加坡和香港，再从香港开到上海，迅捷而又武装齐备的快艇带着鸦片沿海岸一处一处的运送；趸船也武装起来以保护船上的生命财产②。凡从事这项贸易的船只都武装起来，以保护他们的货物和用以换来的银两免遭那些骚扰沿海一带的海盗袭击。

1840年—1858年英国政府的政策

英国政府的态度从义律、懿律和璞鼎查时期起就没有改变过；这个态度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鸦片是由东印度公司以及一些独立王公（麻洼）和独立国家（土耳其、波斯）所生产的；固然，公司的产销未始不可加以禁止，但是世界一般舆论还没有进

① 可以注意的是，在1853年5月15日，当厦门行将被一支叛军攻占时，英国领事命令鸦片趸船开入内港，以便保护。

② 可以估计的是，全中国在1836到1839年这四年动乱期间的消费量是一直保持到1847年底而没有超过多少的，继而则从1848年的三万八千箱逐渐增加到1852年的四万八千六百箱，这显示出扬子江流域对鸦片贸易开放的结果。太平造反蔓延的影响，可以从鸦片进口在1853年骤增至五万四千五百七十四箱，1854年骤增至六万一千五百二十三箱，以及1855年骤增至六万五千三百五十四箱的情形中表现出来。为了单单供应上海一地1857年的需要，就需鸦片三万一千九百零七箱。

步到足以迫使采取这样一个坚决步骤的程度，而且其他方面的独立供应来源也还会是原封不动的。虽则往中国的运输主要是用英国船，但是禁运依旧是不会有效的，因为事实上悬挂例如美国和葡萄牙等其他外国国旗而从事这种贸易的船只也还不少，因对英国船施行禁令而造成的吨位需求，将会立即由那些来自外国口岸的悬挂其他国家国旗的船只所供应。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沿海推行其本国的税务法令和财政禁令，原本是该本国政府的职责；英国政府固然不会保护那些从事非法贸易的人员或船只，但也不愿负责执行中国的禁令。由于中国朝廷无法强制它的官吏厉行禁令，璞鼎查爵士所建议而德庇时爵士所力请实行的唯一聪明办法就是取消禁令，制订贸易章程，并对解禁的鸦片征税，以裕迄未从这项贸易中征得一文的库收。

中国的责任

204

英国并未乘战胜的机会强迫鸦片解禁，使得中国政府在它的鸦片政策上倒有点莫知所措了——因为，必须记住，中国官员意识不到引起这次战争的还有其他任何原因；在中国官员看来，国家平等和自由交换商品等问题，原是无关轻重的。但是，沿海各省的官吏却无意放弃他们利用职权，纵容走私，从中渔利的行径。1850 年 8 月，年轻的咸丰皇帝打算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政策，下了一道严旨，饬根绝国内吸食鸦片的恶习。这道谕旨始终没有实施。1853 年乱事的蔓延，对清廷起了支出增加和税源减少的双重影响，因而在那一年，开禁、宽禁和征税之议又一时并起。有人建议对进口鸦片每箱征税四十两。但当时还没有任何措施。

中国政府的政策

1850 年 8 月咸丰的禁烟谕旨

与此同时，在英国方面却又兴起了一种反对“在中国强行推销鸦片”政策的运动。甚至在 1833 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时期，就已经有了主张帮助中国政府厉行鸦片禁令的呼声；而且，

英国反对鸦片的情绪

大量的舆论已经增加了力量，并且得到了宗教和慈善事业领袖们对运动的支持。这种情绪受到了在中国布道的英美两国基督教传教士异口同声的言论的鼓励，他们认为吸食鸦片是一种很大的道德上的罪恶，严重地妨碍了他们使中国人认识基督教真理的努力，并且认为摆脱那种损害外国人名誉，即损害基督教名誉的贸易，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义不容辞的。205 当1855年8月沙士勃雷勋爵以一个"为促进英国人民和政府与鸦片贸易断绝一切关系而组成的委员会"的主席身分呈递备忘录的时候，这个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但是那些起草人却言不中肯，没有把主要根据放在攻击鸦片罪恶的高尚道德基础上，而把它放在一些夸大其词和没有事实证据的叙述上，以致铸成大错。这些错误被当时总督兼全权公使的包呤爵士统统抓住了，他在一份呈送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将意见书中的种种叙述驳斥得体无完肤，以致英国政府仍坚守其建议开禁而不事干涉的政策不变。额尔金伯爵所奉关于鸦片问题的训令，和璞鼎查爵士过去所奉到的训令，实质上并无任何不同①。

美国反对鸦片的情绪

美国的舆论显然是反对鸦片贸易的。在1834到1860年间，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当中，美国人大约是以二与一之比超过英国人；他们的报告对于美国人民的深厚宗教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何况那时美国人又正处于大规模禁酒运动的第一次

① 两国舆情上的分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沙士勃雷勋爵呈递备忘录的那个月份，即1855年8月，帝国海关首长上海道台一方面以没收未请领许可证而起岸的鸦片相威胁，另一方面却对已领得许可证而起岸的鸦片索取每箱二十五元的关税；中国鸦片商对没收和征税都不遵行。但是经过一年的争论，到了1856年10月，即"亚罗"号快艇插曲发生的月份，这问题在每箱付税二十元的基础上获得妥协。飘扬着官旗的小艇，停泊在吴淞的鸦片船附近，以便收取最后定为十二两银子的这项税款，可是趸船本身绝不比以前受到更多的干涉。在1857年4月，官方征收这项关税的办法扩展到宁波。

高潮之中。在旅居中国的美国商人中,有些是积极参加鸦片贸易的,但是大部分美国商人,却纯粹受着良心的驱使,积极加以反对,并支持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罪恶所作的谴责。至于美国政府的公开政策,则反映在1843年的条约上。

列卫廉和鸦片问题

美国政府在任命列卫廉先生为全权公使时,又重申了它反对鸦片贸易的政策,训令列卫廉支持中国的政策并重申望厦条约中所载的反对鸦片的条款。所以,列卫廉在到达中国时,由于本国政府的训令和本人的见解,已经预存反对鸦片贸易解禁之 206 心。但是,经过实地研究了这项贸易的一般情况以及在走私、违法、官吏贿纵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特殊贸易的种种弊端之后,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他与中国官吏的会议中,他发现他的建议竟引不起任何反应;因而他就得出了一项结论,认为中国人想从鸦片贸易中取得税收的愿望现在比查禁的愿望更加强烈。1858年6月在天津,他有意从他所签的条约中删除了望厦条约所订查禁鸦片的条款。9月间,在开始谈判贸易规章之前,他送了一件正式照会给额尔金伯爵,他在照会中提出了鸦片贸易问题。他说,鸦片贸易既无法切实查禁,现在他倒赞成解除禁令而加以管理。最后,他呼吁额尔金伯爵"试行诱导或迫使这个流弊百出的难题得到调整";又补充说,"在这样的尝试中,愿竭诚合作"。

为这种鸦片局势谋补救之道固然是不容延缓,但是由列卫廉先生来发动却是不妥当的。照他这样的作法,他也犯了义律大佐在签订穿鼻协定时所犯的同样错误。在作出一种与所奉训令相反的主张时,在他故意变更政府的明确政策之前,至少也应当采取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静待本国政府的进一步的指示。这就又可以看出,在同本国电讯未开办之前,驻远东的外交家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了。

1858年11月鸦片问题的解决办法

管理鸦片贸易问题是在10月13日举行的第二次关税和贸易规章会议上提出来的，中国代表并未表示反对。他们只是规定了一些例外的处理办法，因为在条约签订时，鸦片贸易还是依法查禁的，这一点也在同一会议上获得承认。在"向来洋药……等物，例皆不准通商"那一款中，订明"稍宽其禁"，议定鸦片每担征税三十两。进口商只准在口岸销售。一经离口，即为中国财产，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持照通商和子口税之例，不适用于鸦片，其如何抽征，听凭中国政府办理；嗣后如遇修改税则，也不适用于鸦片。于是这样重大的问题，就在一种妥协的条件上解决了，鉴于问题的非解决不可，如完全撇开了问题的道德方面不论，这种妥协条件应该认为是对双方公平的。事情已经很明显，中国政府没有力量防止外国进口商把鸦片输入中国；嗣后准外国进口商将鸦片运到约开口岸，只准在那里交税起岸，关税虽多少超过了值百抽五的一般税率，但是数额的适中，已足以将走私的引诱力降低到最小限度。有组织的走私或是在约开口岸以外各处的交货，立即绝迹了；此后，所有外国人手中的鸦片都运到准予通商的地点。五十年来没有再颁布过禁销鸦片的谕旨，而国库从这项贸易征得税收的期间则尚不止五十年。中国反对吸食鸦片的情绪依然存在，反对鸦片烟运动也不时兴起；但是直到1906年颁发谕旨时为止，当局并没有采取过什么有效的步骤。

207

3. 条约的分析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

在1842到1858年期间，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以英国人所占的份额为最大；他们作为进口商和出口商，直接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大约足有全数的三分之二，不过这是将他们替法国买主代办

并经伦敦转运的生丝一并计算在内的。其次便是美国人，尤其是就茶叶运商而论，此外他们还发展了另一项重要的运输贸易，主要是在中国与伦敦之间为别人运输货物，而以1850至1855年为最高峰。至于其他各国的利益，则仍然很小。在各约开口岸居住的外国商人中，以英国人占大多数，而美国人在重要性上则仅次于英国人。代表英国人利益的额尔金伯爵，在1858年谈判中经公推为领袖。

208

国家的地位

自1834年律劳卑勋爵来华时起，直到1860年联军从北京撤退时止的这段大事的陈述，乃是一篇实录，叙明西方国家如何先是单独由英国、随后又由美法两国在英国合作之下，努力从高傲的北京朝廷取得对于一项事实的承认，即西方列强并不是中国的藩属，而是应该享受平等待遇的主权国家。中国人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很多要求所以拒不接受，其基本原因是由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对于这项要求的反对却是由于民族自尊心的强烈因素。清廷的政策向来是把外交事务看作纯粹商务性质的，因而也就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将外交事务的管理一并委之于既是对外贸易集中的海口、又是离政府所在地最远的海口广州的省当局。额尔金伯爵决心要改变这种将外交事务交由一个省总督权宜办理的习惯。英国政府相信帝国政府和外国代表间的直接交往，必有助于消除误会和缓和普遍的排外偏见。因此，英国使节在这次条约中列进了英国使节得常驻北京的一项规定。1859和1860年的种种大事终于迫使非严格遵守这项条文的规定不可。于是，这项特权也就变成从事谈判的其他各国的权利了。中国人还不肯放弃叩头的主张，各国对于这一点又不肯同意，因而觐见权问题只好再拖延十五年再解决；但是同意使节常驻，事实上就已经是承认国家地位的平等了。

外交关系　在国际关系方面，显然需要改变的莫过于那些凭以规定对外国使节款待的性质的一切细节。最基本的礼节都审慎地规定在一件和平友好条约之中。不得责令外交使节行任何有碍国体的礼节，但是，使节对派往国的君主亦应恭敬；使节得租赁地基房屋作为公馆，并得雇用仆役；凡对使节有越礼欺藐情事，均一体从严惩处。使节得任便旅行，任便来往收发文件不受干涉；得209雇用送信专差；但一切费用均应自行支付。使节得在北京与一个内阁大臣直接往来；而中国驻外使节也享有相互的权利。往来文书的程式也作了规定；照会俱用外国语文，另附送汉文译本一份，但应以外国原文为正本。各省督抚不得再拒绝接见；各式公文中不得再称外国人为“夷”人。凡通商口岸均得派驻领事官员，中国官宪应优礼相待；领事官应与中国的道台平行，副领事与知府平行。

约开口岸　在第一次协定所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外，现在又增加了其他十一处：牛庄、登州、汉口、九江、镇江、台湾府、淡水、汕头、琼州、南京，以及1860年开放的天津。汉口和九江两处须俟长江一带平靖后再行开放；南京的开放也须延迟，事实上是在1899年才付诸实行的；琼州直到1876年方开埠通商；登州是以其东四十哩的芝罘港来代替的，口岸设在对岸的烟台。外国商人只准在这些口岸居住通商，外国船只也只准往来于这些口岸；凡往其他各口岸通商的船只一律没收充公。在这些口岸，外商得购买和租赁房屋居住，严禁掯勒抬价。

护照　根据条约规定，外国人持凭领事发给并经中国官员加盖印信的护照，得“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在内地无护照，或有违法情事，应就近送领事惩办，沿途不得凌虐。惟船上水手并不在凭照旅行之列。在各口岸一百里（三十三哩）内游历，无需请发

护照。

中英条约中对于缉捕海盗规定了协调的措施；就理论上说，在过去十五年中，在这方面一直是协调的，但是在实践上，中国和其他各国却都把这件缉捕海盗的工作，交英国人办理，因为英国人的航运利益，也就是受到危险的利益，比其他各国都大。所有四项条约都规定了凡从事保护商务的各国兵船应享受一切适当的便利；如果外国船只被劫，中国方面有惩办罪犯和追究赃物的责任；而外国侨民的财产亦应由中国方面加以保护，不使它们受到暴徒的侵害。中法条约并且明白规定了对外侨在岸上的财产损失，得向中国方面索赔；但根据中美条约，中国当局虽有责任尽力追还船上被抢的财物，但是除非有勾结海盗的情形，对于任何未能追回的赃物，不负赔偿的义务。

强暴行为

210

领事裁判权的原则比第一次协定中有了进一步的规定，虽然细则问题尚待1865年的章程以及1876和1880年的条约作进一步的规定，但是象今天现行的这些办法，在1858年条约中留待规定的，已寥寥无几了。关于同一国籍的外国人之间的一切权利问题，不论是属于财产的或人身的，一律由该国官员进行裁判。在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中间发生的同样问题，应由两个有关国家间的现行条约加以规定，中国方面不得过问。事实上，这一点意味着原告要从被告的该管法庭寻求补救。在一方是外国人而另一方是中国人的刑事案件中，被控犯罪的人应由本国官员依照本国法律予以审判和惩处。在同样情况的民事案件中，双方负保护责任的官员应尽力和解，如调解失败，则会同审理；事实上，这样的案件系向被告的该管法庭提出，但领事官对于在中国法庭所提出的那些案件，有实行监督的权利。对于逃往外国船只或住宅的中国罪犯或债务人、从外国船上私逃到中国境

刑事与民事裁判

内的人，以及对于香港和中国领土之间的同类犯人，都规定有引渡办法。

教会　211

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境内工作了三百年之久。最初的基督教传教士是1627年陪同荷兰人到台湾传布福音的那些人；1662年，他们有五人被斩首，其余则和他们的同胞一同被驱逐出境。近代的基督教运动是1807年马礼逊博士取道纽约并靠美国的帮助而到达广州之后开始的；他主要是专心于编著他的那一部很重要的字典和翻译工作，在182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博士来到中国之前，除去1813年的几个月之外，他一直是只身在广州。随着广州商馆制度的取消和1842年更多口岸的开辟，传教工作者充满了新的热忱，他们的人数也增加了[①]。这些人在翻译方面须作好极其必要的初步工作，但就其布道和个人影响来说，则限制在各约开口岸及其附近。对于这些狂热的工作者，不论是天主教的或是基督教的，1858年的条约都给了他们活动的自由，给了他们以不受干扰的自由。此后，根据中美条约的规定，凡安分传习基督教义的人们，都不应再因他们的信仰而受到困扰和迫害了。此外，又据中法条约规定，凡是和平地进入内地而携有合式护照的传教士，中国官厅应切实予以保护。1860年天主教传教士又进一步取得了内地置产的权利，基督教传教士也取得了在内地赁屋传教的权利；从那一年起，所有基督教各教派和各国的教会都发现中华帝国的广大领域，对他们的传教工作豁然开放了[②]。

① 在1845年1月，仅按成年男子计算，有十个英国人、二十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在1848年有十九个英国人、四十四个美国人、两个瑞士人和两个德国人；在1855年有二十四个英国人、四十六个美国人、两个瑞士人和三个德国人。

② 关于这些条约的经济各方面，包括征收关税的手续在内，请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下文简称《马士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卷，第638—642页。

西方各国在中国都有一般的共同利益，每个国家都声明没有取得专有让与权的欲望。同时，也没有一个国家情愿容许其他各国享有任何专有让与权；每一件条约都列进了一项规定，言明“嗣后中国如有特恩、旷典、优免、利益施及他国”，本政府及其臣民“亦得一体均沾”。这就是各个较小国家的特权的许可状，这类国家在1914年以前，已经总共有十八个，都分别同中国订立了载有这种特权许可状的条约。

最惠国条款

212

对于导致战争的原因所应付出的各项赔款，另以专条规定，但并不要求中国予以公布。按照1858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应付给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在1860年均增至八百万两）；并以某几处地方的占领作为偿付赔款的物质保证。这两项赔款都是由对外贸易的关税收入项下支付的。

赔款

第十三章 重启战端——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

1. 1859年大沽谈判的决裂

关于北京公使馆的计划

联盟国最初打算给他们派往北京朝廷的代表们以大使级。这个打算随即放弃了，两国决定只保持第二级的外交代表。法国政府留下布尔布潺来充任公使的职务；英国政府则任命了曾经担任过额尔金使团秘书的额尔金伯爵的兄弟卜鲁斯。

给卜鲁斯的各项训令

按照卜鲁斯奉到的训令，他要接任英国贸易总监督的职务（这样，就只把香港总督和总司令的职务留给包吟爵士），而把英国在华事务的总指导机构移到上海，直至这种机构在北京设立时为止。英国政府"料定中国人会以素所精通的手法劝阻你前往京城，即使是为了交换条约批准书"。但是卜鲁斯应无视所有这类企图，不容许任何借口，更须警告他们说，唯一的结果将是使英国政府"坚持条约的一字一句的履行，并在北京设常驻使节"。他须事先要求在大沽和天津获得适当的接待，并且为他由天津去北京沿途作好安排；在北上时，他必须率同一支"足够的海军"。他须坚持在北京给以体面的接待，绝不同意任何含有低人一等之意的礼节，并绝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交换批准书。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会同扑灭太平军的问题，不妨对这个问题仔细商量一下，但是，无论如何，英国政府未经事先商得它的联盟国的同意并取得合作的保证，决不采取任何行动。

卜鲁斯和布尔布濼在1859年6月初到达上海，发现美国公使华若翰早已在那里，中国的全权大臣们正等候他们到达。后者作出一副只是续办未了事宜的模样。他们同意在北京交换批准书，但是声明皇帝只授权他们承办这一件事，而且他们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北京。再者，他们指出一个事实，即在签订1858年条约时，从广州撤兵一节早经承允，但至今还未采取任何步骤来履行这项诺言。虽然华若翰和中国的全权大臣们相互拜会，英法两国公使却拒绝和他们见面，并通知他们说，在北京换约以前，必须谢绝商讨一切有关条约的问题。中国全权大臣们保证给予各国使节以友好的接待；不过他们请求，一俟各国使节到达大沽海面，即将军舰停泊在拦江沙以外，轻装简从，晋京换约。中美天津条约并未提到换约的地点，但是由于其他三个条约都指定了北京，华若翰先生也决定前往北京换约。因此，三国公使从上海启程，于6月20日抵达大沽口外。

214

盟国使节们拒绝在上海开谈

法国海军舰只除掉一艘巡洋帆舰和一艘炮艇供公使调用外，正从事对安南王国的军事行动①，不在中国海面。统率拥有战舰一艘、巡洋舰两艘和炮艇十三艘的一支英国舰队的海军司令何伯爵士，于6月18日抵达白河口外。接待公使的筹备工作一点没有做，而这位海军司令接到通知说，人民"为防范叛军，已将白河阻塞"。

英海军司令何伯为三国公使要求通行而遭拒绝

英法公使认定他们早已将北来之意通知了中国当局。因此，卜鲁斯于6月21日训令舰队司令何伯说，现在这事已经交在他的手中，应即清除河内障碍物，以便公使们前往天津；在这方面，他也是以布尔布濼的名义行事的。三天之后，华若翰先生通过他的翻译官卫三畏先生和丁韪良先生接到通知说，经由

英法公使决定强行通过

216

① 参阅本书第18章，第330页。

白河到达天津的路途已经阻塞，但是直隶总督恒福正在沿海岸北十哩的北塘等候接见这位公使。6月25日早晨，卜鲁斯先生接到这位总督23日发出的照会，略谓他本人正在北塘迎候，并将从该处引导这位公使前往北京换约。在这项照会中，英国女王的名字是比中国皇帝的名字低一格写的，这又直接表明中国皇帝高出一等的意思。丢开其他考虑不谈，这次照会收到太迟了，对于当时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不能发生影响。

1859年6月25日进攻大沽炮台损失惨重

何伯司令曾在6月24日将一封最后通谍送到岸上去，第二天早晨就开始进攻。经过相当的困难把障碍物打开以后，炮艇溯河而上，下午就组成了登陆部队。这些部队曾经企图登陆，但是由于潮水已经降落，既深又软的泥淖成为过于巨大的障碍，因而他们登陆失败。在这期间，炮台和炮艇猛烈互轰；出乎进攻部队意外的是，炮台占了优势，它们的发射术已臻上乘，足见对射程的计算颇为精确①。英军损失严重：炮艇中有六艘失去了作战能力，四艘被击沉，有八十九名水兵和陆战队阵亡，三百四十五名受伤——总数超过登陆部队的一半。在重伤之中有海军司令何伯。法国巡洋帆舰"杜谢拉"号的一小支兵力也参加了战斗。但是对攻打炮台，似乎没有起多大的作用，障碍依然完整如初；英国的兵威已经受到严重打击，因而联盟国的公使们除回到上海外，别无它法。

"血浓于水"

当时正在"道义丸"轮船上的美国巡洋舰"宝哈丹"号舰长达底拏准将，在战事进行中获悉海军司令何伯受伤的消息，立刻放

① 关于这些事实，丹涅特先生致宓亨利氏的一封信中的下述一段话颇饶趣味。"俄国人在1860年的战争中是和中国人搞在一起的。在《美国海军学院会报》中刊有一位目击者的叙述——大沽炮台的重建工作，至少是那些供防卫之用的武器，一部分是由俄国供给的。正如哈佛大学柯立治教授所告诉我的那样，俄国人的回忆录中有些颇可使人相信的话，指明俄国人是实际在大沽帮了中国人的忙的。"

下小艇，驶上前去，"并不是去帮他作战，而是去向一位眼见遭到最痛心和最出人意外的失败的受伤兄弟官员表示同情"。这样他就来到炮台的强烈炮火之下，并且在中途的时候，他的舵手竟被击毙在他的身旁。据说，他的艇员曾经替何伯司令当时所乘的炮艇发炮。后来，他命令"道义丸"把满载英国陆战队的几只小艇拖上前线，这些陆战队是为了援救数千名陷在白河泥滩中的伙伴而与狂潮搏斗的；他并且高喊"血浓于水"以激励他的行动。 217

华若翰先生在北京所受到的接待

华若翰先生既然被邀请在北塘而不是在大沽登陆，于是就前往北塘，他受到总督恒福的相当体面的接待。他同他的使馆人员于7月20日离开北塘，于28日抵达北京。在北京，他们见到俄国公使馆已经设立，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已经到达，并于5月底交换了批准书。在他们驻留期间，两个使馆的人员不准互相见面，也不准传递任何书信。华若翰先生和他的随从们，事实上是未就捕的囚徒，准许步行出外，但不准骑马，而且甚至步行外出也是经过美国公使的强硬抗议之后才准许的。为呈递总统的书信而觐见皇帝的仪式已经安排好了，并且华若翰先生得到保证，叩头是可以设法规避的；但是当他正要启程进宫去的时候，正如阿美士德勋爵所遭遇的情形那样，他接到了通知说，叩头是必要的，所以他放弃了朝见。次日，一道上谕传来，命令使节退出北京而与总督恒福去交换批准书。因此，华若翰先生于8月12日离开了北京，于16日在北塘交换了批准书。

对中国方面的行动的解释 218

如果认为中国是挑战的一方，那就必须承认英国是伸开两手去接受挑战的。而且对中国官员因这次行动而受到的背信弃义的指责也必须予以开脱。他们曾经有过通知说，溯白河而上是不允许的，至于封锁通路的障碍物，则都历历在目，又有武装炮台守卫着这些障碍物，那么武力抵抗应该是意料中的。当时

所发生的情况，是中外之间每一次争执结束时一向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付了政府之后，还须对付那个不妥协的和拒绝接受由战争裁决作为最终结果的主战派。每一次结束战争的条约都不过是走向最后解决的一个步骤——是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在中英条约中，有三项规定特别为北京朝廷所憎恶：准外国使节常驻京城、开放扬子江对外通商，以及在内地购买中国产品的权利。从大沽决裂以前的一切情形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决心在中英条约的批准书交换以前就这三点重开谈判。虽然英国公使拒绝在条约规定通过换约而生效以前再予以讨论，并不为错，但是中国方面在业已许诺的广州撤兵尚未见诸实行，或至少未采取具体步骤以前，意存观望，也同样是对的。就重开谈判来说，时机似乎有利。太平天国的事业在1859年正处于最低潮。曾于1854年统率蒙古骑兵击退太平军而保全了北京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正急于想把英夷赶到海里去。

英国公使的地位

卜鲁斯所处的地位极其困难。中国对条约的批准已经由额尔金伯爵取得；剩下来要作的事不过是取得英国的批准，至于两份批准书的交换，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了。既到达塘沽并发现水路已被堵塞之后，收到邀请他在北塘登陆，再从那里取道晋京的通知又已太迟，以致来不及更改强迫通行的决定。但是，他所奉到的训令却都不容许他取道北塘；他曾经奉有命令，着他前往白河口，转至天津，再从那里前往北京；他还进一步获得通知说，海军司令"已奉命派出一支足够的海军和你一同去白河口"，并奉劝告，嘱乘坐一艘英国军舰前往天津。英国内阁曾经预见到219 在大沽或其他地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曾训令他"坚决而温和地抵制"意在阻止他前往北京的"任何提议"。虽然指出了英国使节的两只手已被马姆斯柏利勋爵巧妙地束缚起来，但也必须

指出，决定使节晋京所取路线之权并不存在于派遣使节的政府，而存在于接待使节的政府。美国使节曾经明白地承认了这个原则，并且是遵照这个原则行事的。

不平等成为祸根

关于卜鲁斯公使本身的行为，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命令以战争行动执行他所奉训令中的条件，究竟是否正确。他似乎别无良策。他所能调度的兵力并不比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所能调度的小多少，而在并不更大的困难面前撤退，自非可以期望于任何国家公务人员的行径。假使卜鲁斯先生在威吓的面前撤退，他只会增加他的外交上的困难；丢开更加助长主战派的自信这一点不谈，条约规定也未必能贯彻执行。英国和中国都无意于和平行动。在能使中国了解局势以前，进一步的战争显然是有必要的；事实上，这将是为侮辱国旗、侮辱使节的问题而战，为条约、为全部条约、也只有为条约而战。如果没有大沽炮台的行动，问题将会缩小到中国人所特别反对的、至少可以据理讨论的那三项规定。但战争几乎肯定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两国没有一个老老实实地愿意平等对待另一个。

1860年3月最后通牒送往北京遭拒绝

英法两国政府决定在中国继续联合行动，并同意派遣一支相当大的军队偕同专使前往。布尔布潋先生奉到的训令与卜鲁斯先生所接到的相同，因而这两位使节于1860年3月8日照会大学士和军机处，对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加以评述，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下列四项条件：(1) 对大沽炮台的举动作圆满的道歉；(2) 在北京交换批准书，准使节为此各乘本国船只前往天津；(3) 将天津条约特别是对于赔款的支付完全付诸实施；(4)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件另行赔偿。这两项照会是经两江总督送达的。两江总督如期转来军机处的复文，这项复文并不是照复使节们而是咨复这位作为钦差大臣的总督的。这件复文对使节们所提

220

的最后通牒断然予以拒绝，并建议他们应当象华若翰先生那样不带兵船而轻车简从地晋京。但是它却附有一项训示，着该总督于使节们北上以前，就条约的某些规定进行协商，以便得到折衷或更改。

2. 1860年攻占大沽炮台和占领天津

1860年6月对华战争再起

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特命大使，派格兰特将军指挥地面部队，而舰队则仍由海军上将何伯统率。法国方面，葛历劳士男爵充任大使，孟德邦将军指挥地面部队，海军上将谢尔纳统率海军。葛历劳士男爵和额尔金伯爵于6月底到达上海。额尔金伯爵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召唤巴夏礼先生和威妥玛先生充任这远征团的翻译官。美理登男爵和德拉马神甫则任法国使团的翻译官。两位大使向北推进，并与各自的军队会合，这些军队于4月21日占领舟山以后，曾于6月间分别集中，英军集中于大连湾，法军集中于芝罘。英国在中国的地面部队总共有官兵一万八千二百十一人，可以用于向北京推进的军队数目约有精税一万零五百人，并有广东苦力运输队二千五百人随行。英国在大连湾的舰队计巡洋舰七艘和小型的精锐舰艇三十四艘，共装大炮三百六十一门，此外还有一百四十三艘运输船。法军可以用于向北京推进的计有精锐六千三百人。联军复于7月26日分别从大连湾和芝罘启航，在沙流甸岛会合，于30日从沙流甸向北塘进发。

221

1860年8月21日占领大沽炮台

联军于8月1日在北塘登陆，未遭抵抗。一支侦察队于3日首先向敌人发动进攻。在离北塘约六哩的新河地方的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营房，经过六、七千名蒙古骑兵对炮火非常英勇地进行抵抗之后，于12日被攻占。塘沽于14日被攻占；一星期

后，经过坚强的抵抗，大沽北部上面的炮台被攻占。北部下面的炮台从后路受到攻击，随即受炮轰不支而投降。当天下午，那些更加强劲的南炮台未发一弹，就连同二千守军一并投降了。英军死伤二百人，法军一百三十人；中国方面的损失则大得多。联军继续向前推进，在8月25日和9月5日之间进入天津。随即开始向通州进军，先锋部队于13日到达了河西务。

联军在北塘登陆后不久，中国政府的代表们就函信不绝了，但是并无结果。最后，当大使们于8月25日到达天津的时候，他们接到通知说，桂良和恒福已奉派为钦差大臣，并以恒祺作为他们的副手，请求他们在天津等候这些人到来。

占领天津巴夏礼所担任的角色

海军司令何伯于8月25日晨到达天津，随即实行军事占领。恒福总督奉召到何伯司令的坐舰上，他立即前往。深获英国大使信任的巴夏礼先生以额尔金伯爵的代表和代言人的资格列席。何伯海军司令和巴夏礼先生于8月25日通知总督说，天津已处于联军的军事占领之下，但是一切文官则仿照广州的办法仍留原任。何伯随后就请巴夏礼先生临时执行管理天津的职务。他发现中国人民平静无事，官员们无阻挠情事，各种供应也自由地运到市场。

在同桂良和恒福谈判失败之后，大使们便率同军队从天津向通州进发。9月11日，当他们在距离天津二十哩的杨村的时候，接到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的一件紧急公文，申明他们已经奉派为全权大臣。他们要求大使率同他们的武装部队撤退到天津，在那里商谈条约，以解决一切问题。大使们宣布了他们在抵达通州以前不听取任何建议的意思。经过继续来往照会以后，全权大臣于13日完全接受了所提各项条件。他们要求联军前进到河西务为止，大使们可以偕同一小队非武装的护卫人员

222

赴通州会商，以议定条约条款，然后就前往北京换约。

3. 通州的谈判和在张家湾的背信行为

额尔金伯爵急于接受新的提议

额尔金伯爵派遣巴夏礼先生和威妥玛先生在通州与钦差大臣举行会谈。他们于9月14日午间到达后，受到礼遇。对于条约草案，曾作考虑，结果全部接受。随后又讨论到额尔金伯爵关于13日各项提议所欲修正的各点：他意欲随带一千名武装卫队而不是一"小队非武装护卫"。葛历劳士男爵也携带同样数目的卫队，并且他提议他们将不越过张家湾以南约一哩半以外的地方，以代替联军在河西务停止前进的办法。张家湾是距河西务约十五哩的一个市镇，在通州以南四哩。钦差们对于这些修正提出了冗长而坚执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终于屈服了。应由钦差大臣们送出的另外一件信稿，当时也在会谈中拟好，于是这两位翻译官携带着这封信回报了额尔金伯爵。

在9月14日的信中，钦差大臣们答应提交一份赋予权宜行事的上谕；条约草案被接受了，1858年的各项条约的批准书将在北京交换。两位大使把这封信当作最后的决定而予以接受，并于9月16日写了回信。葛历劳士男爵的信交由使馆秘书巴士达递送，并由美理登陪同前往；他们于17日带回一件接受所提各项条件的复文。额尔金伯爵的信则由巴夏礼经手送达，而由额尔金伯爵的私人秘书洛奇、陆军方面的瓦克尔上校和汤姆逊、卜鲁斯的一个随员诺尔曼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包尔卑陪同前往；他的护卫是安德逊中尉率领的六名英国骑兵和十二名印度骑兵。巴夏礼发现钦差们很不友善，并且对提出的各项办法中的三点表示反对：撤退军队的日期未定，额尔金拟将他带往通州的卫队全数带往北京，并提出了觐见皇帝和面呈英国女王

223

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的要求。他们主要是坚持反对最后一点。

僧格林沁在张家湾的埋伏

巴夏礼偕同瓦克尔上校和洛奇，在奉派指定联军扎营地点的中国官员陪同下，于18日晨前往该地，当即发现该处已为大批兵勇所占据，其中许多人都是藏在用掩蔽的大炮暗中设下的埋伏里。瓦克尔上校留在那里进行察看；洛奇则径往格兰特将军处去回报，然后再由布拉巴宗海军大佐陪同到通州去和巴夏礼会齐。巴夏礼回去就对这件显然破坏信用的行为向怡亲王提出抗议。由于得不到任何具体的答复，巴夏礼遂会齐一行人等返回张家湾。

巴夏礼等的被囚禁和所受虐待

到了张家湾，他们发现已陷身于中国军队之中，由他们推来撞去。他们的休战旗全无人理会，他们已经成了俘虏，在种种粗暴的待遇之下被带到僧格林沁的面前，强按在地上受盘讯。随后他们又被带往通州，并在往北京的途中，被带到1858年时任直隶总督、现任大学士的瑞麟前面，被按在地上跪着受审；经过另一个大官的另一次审问之后，他们象是要被立予处决一样被拖了出去。

在这以后，巴夏礼和洛奇就被带往北京，打入刑部大牢。在这里他们又分别受审。他们被枷带锁，被迫跪在石板道上不准起来，并受到其他粗暴的待遇，但是中国人所谓的酷刑却未使用。历次讯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追究巴夏礼通过什么路子打听到中国当前政治的消息，并且想使他承认有权作外交上的让步和阻止军队前进。这都是在9月18日翻译官戴陆克神甫、戴斯克雷斯和其他十一个法国人也被扣押的那同一天发生的。巴夏礼天天受讯，被迫带着最重的锁链十天，忽而危言恫吓，忽而花言巧语骗诱，总想引他“提出一项解决当前两国纠纷的方法”。9月29日，这两个俘虏从刑部移到高庙（城北的一个小

224

庙),这是一个凶兆较少的地方,想让他们从这里寄出指望他们答应写的信件。

中国官员所犯侵害行为的性质

中国人曾经在他们的高级官员直接许可之下,破坏了休战旗;他们曾经拘捕一个正同他们进行谈判的使节本人,施以最大的侮辱。除此而外,他们还犯了杀害该使节一行人之中其他人员的罪状,那些人也都是在休战旗之下被捕的。加之,在议定了停止敌对行动的条约以后,他们还在张家港掩蔽炮位,暗藏军队,布置埋伏。破坏西方国家所行惯例的细枝末节的行为,情有可原,但是这些行为都是破坏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清楚了解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行为,那是不容宽恕的。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仅露出了一线光明:10月8日恒祺挽救了巴夏礼和洛奇两位先生的性命,在皇帝饬将他们和其他俘虏一体处决的紧急谕旨到达前不到一小时的功夫,他们走出了那个寺院监狱的大门。从宫中的朋友处听到了这项消息之后,恒祺就劝请恭亲王赶快把他们释放了。

张家湾和八里桥之战

9月18日的张家湾之战,是为了有利于攻打僧格林沁军队的两翼以迫使其撤退的联军而决定的行动。午夜,额尔金伯爵接到了谈判人员被俘的消息,立刻督促格兰特将军进兵。两支225大军一齐推进,21日发现敌军正在从通州去北京的路上三哩远近的八里桥地方等待接战。经过了一番鏖战,僧格林沁的军队又复被击退,于是打开了去北京的道路[①]。这两次会战使联军的军火储备减到了危险点,势非补充不可,于是决定将天津方面凡可用的兵员连同供应品一齐调动出来,为了这个缘故,这支军队暂在通州按兵不动。这段耽搁期间被利用去和一个新任的钦差大臣、皇上的弟弟恭亲王重开谈判,从而把非耽搁不可的情形

派恭亲王为全权大臣

① 法皇拿破仑三世为此一战而赐予孟德邦将军以八里桥伯爵的称号。

掩盖起来。

两位大使和恭亲王进行了两个星期的徒费唇舌的谈判——前者要求归还俘虏，后者则予以拒绝，而要求联军撤退。巴夏礼虽常常被访问，却当心不牵累他的上司，当心不让他个人的安危以能否从联军方面攫取让步为依归。在调到增援部队之后，联军于10月5日重新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

圆明园夏宫

司令官们听说皇帝正在北京西北约五哩的圆明园夏宫，于是这个地方就变成联军的目标。它很快就被孟德邦将军攻占，皇帝则已于9月21日逃往热河。园中殿阁里陈满了无价之宝——"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人以这样一种豪华印象，要让我在寥寥数行之中，描写那种特别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琳琅满目景象的光辉灿烂，是绝不可能的。"①这些宫殿在第一天就被法国军队和一小队英国骑兵洗劫一空；"这种洗劫行为一连继续了几天之久，我们的〔英国的〕军官之中很多人都弄到了不少东西，但是驻扎在几哩外的下士和士兵却没有攫取任何东西的机会。"②据说住在附近的中国人"从圆明园抢到的赃物比英法军队抢到的还要多"③。

226

1860年10月13日北京的占领

10月7日晚，恒祺接到一件照会，提出联军司令的最后通牒。条约既完全接受，联军司令就不能不要求立刻放还俘虏，如不照办，那就攻取北京城。但如归还俘虏，两国大使将同意签约并交换批准书。8日，有八名幸存者被送到联军军营。10日，联军将领用书面提出，限于13日正午以前将北面两个城门中最东的安定门交出，否则即攻破北京的城墙。在限定时刻的前几分

① 1860年10月8日孟德邦将军函，见高第：《1860年远征中国》，第353页。

② 吴士礼：《军人的生活》，第2卷，第78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84页。

钟，安定门开了，并发现早已为中国人放弃。这样一种和平解决的方式，正是联军的高级军官们所欢迎的，他们认识到以他们所能调度的兵力来说，要想攻破中国京城的宏伟城墙，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三十九名俘虏的命运

在 9 月 18 日捕去的二十六名英国人之中，有十三人生还，另十三名则被野蛮地杀害了，在捕去的十三名法国人之中，有五人（包括戴斯克雷在内）生还，另归还了六具尸体；留在那儿的戴陆克神甫和一名士兵还不在此数。对于这样一种彰明较著的侵害行为究应如何惩罚，现在就要取决于两国大使了。在这项决定中，时间是最主要的因素。

4. 最后的安排

联军间的摩擦

欧洲的那套政治已经搬到中国来，1858 年通过外交官和海军将领所实行的诚挚的联盟，一变而为 1860 年以陆军人员为主的关系紧张的联盟。两个营盘的军人当中一直就有不少的摩擦和不满，只是靠了那两位外交家的老成持重，才得予以约制，那两位外交家在 1860 年继续并完成了他们在 1858 年开始的工作。而且，在法国阵营的内部也还有摩擦；葛历劳士男爵所担负的首要任务之一，始终就是调停他自己的海陆将领间的严重纠纷。额尔金甚至担心法俄两国可能联合起来对付英国。

227

这样就谈不上考虑战事甚至是否有可能继续到下一年去的问题了。加之皇帝已逃往热河，这一步骤不仅危及大清江山，而且危及和平事业。根据 10 月 15 日两国司令官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决定，格兰特将军通知额尔金伯爵说：

皇帝逃往热河

1. 以军队驻留北京过冬殊非得计。
2. 军队应于 11 月 1 日左右开始向天津开拔。

3. 依照凭以交出安定门的最后通牒的条件，除非中国造成新的挑衅事端，则攻打京城或破坏公共建筑物，不仅违背信誉，而且会破坏英国人严守诺言的既有的令名。

4. 他准备对海甸和圆明园的宫殿彻底加以破坏，如果额尔金伯爵认为这一步骤是合适的话。

因此，额尔金伯爵和葛历劳士男爵只剩有两个星期的功夫去厉行他们对侵害行为施以适当惩罚的要求并将它办理竣事了。这两位大使同意为受害人和死亡者的家属要求赔偿，为二十六个英国人要求三十万两，为十三个法国人要求二十万两，这笔赔款是在10月22日照付的。从此而后他们也就分道扬镳了。

圆明园的焚毁

额尔金伯爵要破坏作为某些俘虏曾经遭受虐待的那个地点和作为足以损伤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措施的圆明园的建筑物，并且须在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以前办到。另一方面，葛历劳士男爵却满不在乎破坏一个纯粹不设防的乡村地方，而宁愿去破坏北京城里的皇宫，但是他希望这种破坏取决于谈判进一步失败这一未必会发生的事件。每一位大使的建议的本意都是怕另一位的建议会把恭亲王和政府的留守人员赶出北京，以致无人负责缔和。破坏圆明园的命令是额尔金伯爵发出的，10月18日，圆明园里所有二百多座为附近一带打劫的中国人烧剩下的建筑物，被格兰特将军指挥下的军队悉数付之一炬。这或许是不得不然的举动，甚或是明智的举动，然而在早已忘掉原来的侵害行为或根本不了解其重要意义的中国人心里，联军焚掠圆明园的生动的印象却一直存留了许多年。

228

1860年10月额尔金和葛历劳士在北京

恭亲王最初对于圆明园的被焚大吃一惊，几乎要逃出北京了；但是他听从了伊格纳提耶夫的劝阻，没有采取这一步，伊格纳提耶夫提醒他不要忘记一旦失去缔和的机会，对于清朝是如

何危险。最后一切都解决了，签约筹备工作的进行没有遭到进一步的阻碍。10月24日，额尔金伯爵堂堂地进入北京城，在一支强大的卫队警卫下，穿过了一条条英军夹道的大街，径往礼部。在那里签订了1860年的北京条约并互换了1858年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次日，葛历劳士男爵在同样的戒备和同样的仪式下进入北京，签订了并互换了他的条约。11月1日法国开始撤兵。格兰特将军于11月7日和8日撤退了他的军队。这年冬季，两国军队都在天津留下了一支警备队，庙岛和芝罘也分别为英法军队所驻守。

俄国公使在1860年所起的作用

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一直留驻北京。据记载，在1860年3月间，他正压迫中国割让外乌苏里的领土，一面表示愿供给大炮和小型武器，一面则以俄国拟派遣舰队赴北塘相威胁。僧格林沁奉命驱退俄国舰队，但收下武器。8月初，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在北塘。他回到北京之后，在10月18日，即同联军的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他写信给葛历劳士男爵说，他已经能够劝喻恭亲王和皇帝的其他大臣，他们真正的政策是认清处境的229 危险，及时调解他们同联军的纠纷。另一方面，他力请后者不要逼迫清朝过甚。他可以说他挽救了这个皇朝，并且保证了联军的撤兵；作为给这个公正的掮客的费用，他在11月14日取得的一项条约的签字，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割让给了俄国①。不发一弹，不需劳师远征之费，这个圆滑的俄国人就得到了普里莫尔斯克这个宝贵的、位于军事要冲的地带。它拥有俄国人现在称做大彼得湾的那个宏伟的海港；1861年他们在这个海湾上建立了海参崴。靠了这个时期的外交，俄国人不但由于把中国人拉到它那一边去而奠定了它在远东的势力，而且大部分洗刷了

① 参阅《文选》，第321、322页。

以法英为敌方的那场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耻辱。

1860年北京条约

1860 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大抵是相同的。皇帝不得不对 1858 年 6 月中国军事当局在大沽造成的破坏友好关系的行为,表示"深为惋惜"。关于英国公使经常驻扎北京一节所行的折衷办法,宣布取消,因而其他有约国也取得了常驻公使的权利[①]。赔款增加到英法各八百万两的数目。五十万两应立即付清,其余则按季各付给各口关税收入总数的五分之一。增辟天津为准许外国人居住和通商的口岸。关于舟山立即撤兵的日期以及天津、大沽、山东和广州等地俟赔款付清后最后撤兵的日期,均经议定。根据会同拟订的适当章程,中国人准许移居外国各地。突入并控制香港港口的那个称作九龙半岛的狭长地峡,永远割让给英国。九龙地界于 1898 年又有进一步的扩充。

230

中法条约和天主教会

中法北京条约中增列了一款,订明将查禁天主教期间没收的教堂和慈善机关悉数发还,作为对于 1860 年法国人被杀害案的赔偿。在这一条款的中文本而不是法文本中,私下添进了下列一句话:"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屋自便。"

5. 慈禧太后的第一次政变

热河的阴谋集团

这时宫廷多故,因此我们必须谈论一下。为停止 1860 年敌对行动打开门径的最后一步措施,就是于 9 月 21 日任命恭亲王为钦差大臣。在简派他为全权大臣之后,咸丰皇帝和朝廷就启跸往热河"秋狩"去了。在热河,这位颓废孱弱的皇帝病势很重,以致不能不把原定 1861 年春回銮的日期推迟。这就剩下恭亲

① 1861 年 3 月在北京设立了英法两国使馆;俄国于 1861 年 7 月、美国于 1862 年 7 月在北京设立了使馆。1861 年 9 月,中国和德意志联邦签订了一项条约;依据该约,普鲁士外交代表的入驻北京推迟了五年。

王作为对西方各国关系上的唯一政府代表人了；但是这样一来却把他束缚在北京，使他无法在辅导皇帝的朝政方面发挥个人的作用，从而替爱国心和政治眼光都有所不及的另一些人，打开了一个篡夺政权的门径。以怡亲王①、郑亲王②和宗室肃顺为首的一个八大臣的阴谋集团于是得以组成。这三个人把持朝政，矫旨传谕京朝大臣和各省督抚将军；但是作为达到这种地位和实现进一步目的所必要的初步措施，首先须抵销皇帝的妃子叶赫那拉氏的影响。

叶赫那拉氏的显贵

叶赫那位氏生于1835年11月，是满洲贵族叶赫那拉族中的一个名叫惠征的女儿。1852年，她列进为咸丰皇帝选作妃嫔的二十八个满洲少女之中。1856年4月27日，她生了一个儿子，即咸丰皇帝的唯一的儿子。于是她升为贵妃，即第一等妃，231 位仅次于皇后。她的势力大起来了，在皇帝病倒之后，她就左右了他的一切决策。叶名琛在广州的蛮横排外态度，宗室耆英的革职和处死，以及1856—1860年清廷采取的整个爱国排外方针，都是由于她的影响。她的影响是左右朝政的主要影响，既是太子的生母，除非被废，则一旦皇帝逝世，就无法不让她摄政了。

赞襄政务大臣的设置

这位孱弱的皇帝的心理首先中了一些谗言的毒，据说她和神机营里的一位少年军官荣禄私通；因而把她的儿子从她那里迁出，并且从此不准她再到皇帝的面前。当时还有种种的阴谋暗算，企图暗损恭亲王的地位，说他阴谋同西方列强勾结，危害皇帝的安全；并且拟好了一件诏书，准备皇帝逝世后发表，饬即屠杀北京的外国人，并将咸丰的兄弟辈一体囚禁或处死。咸丰

① 怡亲王载垣是康熙的宠子第十三子的五代孙，那位第十三子曾受封为亲王，世袭罔替。怡亲王于1860年9月奉派为钦差大臣（即全权大臣）。

② 郑亲王端华是八位"铁帽子"王之一，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一个弟弟的后裔。

病势转剧；旋于8月22日逝世。前一天，在皇帝的寝宫里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皇后和一切妃嫔都摒诸宫外。这时咸丰曾经签署了一项诏书，简派了几个在他的儿子未成年期间赞襄政务的大臣。其中有七个满洲人和一个汉人，都是忠于那三个阴谋者的利益的。皇帝的近支亲属却一个都不在内。

成法和惯例

成法在中国是有无上威权的，根据成法，阴谋者是不败自败的。任命他们为赞襄政务大臣的那件诏书原于程式不合。要想使它有效，必得加盖刻有"大清嗣天子宝"字样的传国御玺，这是任何有关继承皇位的文件所必须有的。这个御玺已经握在叶赫那拉的手里。何况，依照惯例，在大行皇帝灵榇未启程往北京之前，这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不能离热河一步；所以赞襄政务大臣和两位皇后在10月5日殡仪出发的那个吉日到来以前，只得一齐耐心地守在热河。这时一切条件都对于两位帝后有利。赞襄政务大臣和其他大臣们必须和灵榇同行；但两位皇后的责任却是在启灵时祷告，然后赶到前面去迎灵进北京。

232

在荣禄和一支亲兵的保护下，两位皇后于11月1日安然抵达北京。叶赫那拉氏终于能在北京布置抵抗的办法了。11月4日，殡仪抵达北京城门，赞襄政务大臣向聚齐在一起的皇族人员正式报告了他们任务完毕。叶赫那拉氏对他们的操心表示谢意，并且告诉他们已解去赞襄政务大臣的职务。怡亲王企图抗争，但是一声令下，他连同郑亲王和肃顺，立刻被捕。11月2日依式盖有"大清嗣天子宝"御玺的一道以幼皇帝的名义颁行的谕旨，于是发出了。

阴谋者的处分

阴谋者在宗人府由恭亲王主审；他们都被判有罪，爰奏请将这三名元凶凌迟处死，将其余五人遣戍边疆。8日的一道谕旨宣布加恩减刑：命两位亲王自尽，当即以丝索缢死；肃顺的家产

早被查封，奉谕斩决，这是为了使他在阴曹地府和在阳间一样地为众所不齿；其他五人则一体革职，但只有一人被遣戍。

两位太后于是安然掌政了，并以上谕上她们以尊号，此后世人就以这种尊号相称。母后皇太后萨克达氏[①]上尊号为慈安，233 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上尊号为慈禧[②]。她们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任命恭亲王为议政王那个特设的官职。慈安皇太后甘于放弃自己的权威。慈禧有坚强的意志、清楚的头脑，并且要一展伟大的行政才能；她不得不放弃她明显排外的主张，采纳恭亲王的那种有政治家风范的政策，恭亲王认识到戡平叛乱和恢复清朝统治的唯一可能性即在于同各国和平相处，彼此合作。这两个人先是在平等或准平等的基础上一同共事，继而，当这位亲王明白了他在国家中的地位时，才各以君主和宰辅的身分行事。

① 系钮古禄氏之误。——译者

② 两位皇太后都不时各上新尊号，每一个尊号两个字，每一个字附带着每年十万两的年金。慈禧直到逝世时止，除辞却的两个尊号外，一共接受了八个尊号，即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等十六个字。

第十四章　太平天国的国际形势

234

1. 华尔和常胜军

现在注意一下充满了国际牵连的太平天国的发展过程是有必要的了。西方列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越来越不能不去支持清廷，因为它虽则有它的过失，毕竟还是和列强有条约关系的。

太平天国中的国际利害关系

当1860年英法两国正在北方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上海的中国当局却正向英法双方呼吁保护。到1859年，太平天国除去南京和安庆两城之外，已经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地盘。然而，在1860年，当帝国对英法作战时，叛军又四处侵扰，一路自福建北入浙江，另一路原被围在南京的队伍则东入既富庶而又迄未遭兵燹的苏州和上海一带。后一路的军事行动因其领袖忠王的军事天才而颇为奏功。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杭州，据守了六天之后撤出，在城里丢下了七万具满洲驻防军和城市居民的尸体而去。南京的最后一次突围战开始于5月3日，沿运河一路而下。镇江、丹阳、常州相继被攻陷，难民纷纷逃往苏州避难，而6月2日苏州也被攻陷了。在那一个月，华尔和他的副手白齐文组织了后来称作“常胜军”的一支军队。

1860年的太平天国

5月23日，上海道台为正式要求联军负责保卫上海、抵抗太平军而往访英法两国领事，这项要求经转呈两国公使请示，于是他们发布了一项负责保卫县城和租界的声明。8月中旬，太平军的部队应上海外国同情人士之请，已逼近上海四乡，因而卜

中国方面要求英法保卫上海

236

鲁斯和布尔布灉两先生送去一封公函，通知他们说，因为上海这个口岸供作北方军队转运基地之用，所以会作为一个纯军事措施而加以防守的；至于政治动机则矢口否认。8月18日，太平军占领距县城西门约三哩远近的徐家汇教堂。他们立刻进而攻打西门和南门，经过多次坚决的进攻之后被击退。他们保住了他们在县城前面的阵地，继续不断地实行狙击，并且进逼租界北境；但是在21日联军在北方攻占大沽炮台的那一天，联军在上海逐退了大清的敌人，他们于是又退守徐家汇；23日他们从徐家汇撤出，上海在那一年之间没有再受到灾难。

1860年—1861年太平军的活动

太平军从上海城边撤退之后，他们占领了整个江南——即江苏省位于扬子江以南的那一部分——只有上海邻近一带是例外。他们以武力固守松江、青浦和嘉定三城——这三个城分别在上海西南、西和西北约二十五哩的地方。他们也侵入了上海和扬子江之间的东面地段。他们常常侵入这样包围起来的地带以内。1861年3月，在他们洗劫了上海西北八哩处的真茹并拟焚毁上海以西十二哩处的泗泾而被一支法国军队阻止之后，公认叛军是决心要使上海四周化为一片荒芜，从而切断贸易。1862年初，叛军又复出现于上海邻近一带，威胁官吏、阻断贸易并使成千上万的乡民深蒙其害。

曾国藩和李鸿章

中央政府在镇压这次叛乱上面早已显出无能。帝国之所以 237 得以保全，一部分是靠了为它打仗的外国人，但主要却是靠了曾国藩和李鸿章那两位伟大的中国文官。1853年时，年方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是克复他的原籍湖南省的主要人物。他招募了乡勇数千名，1854年收复武昌和汉阳，1855年横扫湖北，1856年直入江西，1858年他奉命主持浙江军务。既平定了浙江，他就在1859年进兵江西，将战败的叛军驱入湖南，转走广西和贵州。

他继而奉命攻打南京；1860 年 6 月，奉派署两江总督，8 月任钦差大臣，辖江南和安徽全境，1861 年又兼管浙江全省。

李鸿章之所以见重于当时，也是由于他尽瘁桑梓，保卫安徽的缘故。1853 年，方年三十一岁的李鸿章从他的原籍庐州府一带招募兵勇，保卫他们的家乡，使免受北路太平军的蹂躏，他致力于这项工作，并且担任地方上的一个微职达两年之久。他的忠荩和能力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于是邀他入幕；从那时起，他就担任了这位湖南籍领袖的总文案。1862 年 7 月，他受任名义上的江苏巡抚，巡抚衙门设在苏州，而当时苏州则尚在太平军手中。

这两位文官带给帝国的事业以他们的前辈所不曾有过的品质：进则勇敢，败而坚定。但是，帝国军队的士气已丧失净尽，要想恢复他们的信心，只靠他们领袖的品质还是不够的，这种不够的地方由于外国人的支援而得到了补救。外国人一连同帝国打了四年仗，但是由于帝国政府改变了政策，由于他们日益感到维持当今朝代对西方国家有利，这才一变过去的敌对态度，如果没有这同一批外国人方面的援助，满洲人的统治是否还能恢复起来，倒是令人怀疑的。这种支援给了曾、李以他们收复疆土所需要的牢固立足点。

外国给清军的援助 238

外国人感情的逐渐转变，给与帝国事业多方面的帮助。在太平天国的初期，他们宣布严守中立，严禁对任何一方供应军火；现在这种限制只适用于叛军方面了，至于帝国官员，则只要付出价款，船舶武器是可以予取予求的。此外，禁止交战双方雇用外国人作战的限制虽然一直是双方的冒险之徒所私下逃避的，却终于对帝国政府放宽了尺度，但对叛军方面则照旧施行。

华尔

华尔是清军方面雇用的外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在

1831年生于塞勒姆地方的马萨诸塞州一个旧家之中，1851年以一艘自旧金山驶往上海的三桅帆船上的大副身分，首次航海来华。1859年，他受雇为一艘航行于扬子江上的轮船的大副，不久之后就担任了中国装甲轮船“孔子”号的管带。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曾有人介绍他去见一个上海爱国华商委员(按指会防局)主席的泰记银号(音译)老板杨坊。他向杨氏建议要从叛军手里夺回松江，索价三万两，事成后付款。这项建议当被接受，于是华尔招募了一百名洋兵，大抵都是存心抢掠一票的水手们；他率同这支洋兵前去攻打松江，但被击退，于是他带领这些乌合之众回到上海，就地将他们解散。他并没挫伤勇气，又招募了同样数目的一批菲律宾人，连同法尔思德和白齐文两名外籍副手；1860年7月17日，他再度回到松江，毅然发动进攻，将太平军的守军逐出城外。继而他又建议收回青浦。这一次他在8月2日归于失败，自己身受重伤。华尔军在白齐文率领下所作的第二次尝试，也被击退。于是这支军队退守松江，此后松江就成为华尔的总部。他在这里改组了他的军队，但是此后一年多他再没有什么胜利可登入他的功劳簿的。

松江的收复鼓起了上海中国商人对华尔的很大信心。他从他们的代表人杨氏那里得到了一笔经常费的赠与。这样他才能训练他的军队，并为他自己购置大炮——纪律和炮火是制胜叛军的两个主要因素。在一般外国人看来，华尔是一个掠夺兵兼海盗，应依法惩处。曾经声明过严守中立的美国当局不以他的行动为然，英国海军当局目睹他们的水手被爱好冒险和贪图不义之财的指望勾引而去，也不以他的行动为可取。1861年5月，英国海军上将何伯以引诱现役水手潜逃为理由将华尔逮捕，并诉诸美国领事；但华尔证明他已取得中国国籍，因而获得释

240

放。后来他又被囚在"查塞皮克"号旗舰上，但是他泅水逃逸。这时他被迫解散了他的洋枪队。他代之以一支由外国人训练并由外国人领导的人数逐渐增多的中国军队，但是将他的忠实的菲律宾籍的私人卫队保留下来。1861年底，海军上将何伯到松江他的营盘访问，表示对于所见到的一切非常高兴，并且答应给华尔的新计划以一切必要的支持。

常胜军

1862年1月11日，号称三万人连同二百名应募入伍的外国人在内的一支太平军，出现于吴淞一带，沿途焚烧村落；两天之后他们到达了距上海英国领事馆以北一哩半远近的一个地点。上海商团同一营印度兵和一队英国炮兵壮着胆去迎敌，太平军竟引兵而去。同时有另一支太平军威胁华尔所把守的松江，并且据传还有第三支军队已从杭州前来。华尔在广富林镇击败进攻松江的那支军队。这时华尔的地位已经奠定；他已成为在江浙两省作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所信赖的盟友和同事。2月24日，由海军上将何伯率领的携有七十七门大炮的一支约七百名英法水兵和海军陆战队所组成的联军，以及华尔率领的由七百名中国兵所组成的华尔军，进攻太平军于吴淞、上海间浦东方面的高桥镇，把他们打败。3月1日，这同一支军队在闵行对面的南桥镇地方进攻另一支约有六千人的太平军，给他们以决定性的打击。由于打了这些胜仗，华尔擢升到了中国军队中的镇台级位，并且降谕以常胜军的名称颁给他的军队。3月底，泗泾方面由李恒嵩统率的一大队帝国军队被一支太平军包围起来，只是靠了华尔和他的军队及时赶到，才获得保全，华尔不但拯救清军免于全军覆没，而且还使李将军能以一次大捷奏报。

241

这时海军上将何伯已批准用英国轮船从安庆为曾国藩的队伍运出九千名兵勇，并由兵船护送过南京，一直送到上海。同

时,他和他的法国同事海军上将卜罗德商议之后,建议以武力维护上海周围三十哩半径之内不受太平军的威胁。这项建议得到了英法两国代表的赞同。经过恭亲王、卜鲁斯和统率天津英国守军的士迪佛立将军一度会商之后,遂决定得将天津的军队运到上海。

士迪佛立将军率同所部军队从天津达到之后,拥有士兵约二千七百人、大炮十一尊的一支挺进队就组织成立了。由英国海军上将何伯、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士迪佛立将军和华尔将军共同统率,但总的指挥权却操在何伯海军上将手里。4 月 4 日,这支军队把叛军从防御工事坚固的王家寺阵地中逐出;华尔将军带领五百人尾追不舍,但在深入内地五哩远近的第二个阵地前被击退,而且何伯海军上将腿部受伤;这个阵地在第二天被攻下。4 月 17 日,这支队伍进攻七宝的另一个坚强阵地,当即攻占,叛军全面溃退。这两次军事行动肃清了紧邻上海南面的沿江一带。由华尔将军统率的一支拥有士兵三千八百四十二人、大炮三十门的部队,于是奉派溯苏州河而上,向西北挺进。这支部队将叛军逐出南翔的阵地,攻占了嘉定。于是开向松江,先后攻陷青浦、南桥镇和柘林各地。在进攻南桥镇时,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阵亡。英法联军的援助以及因海军上将卜罗德的阵亡而遭受的损失,均经明谕嘉奖有案,这是中国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242
1862年5、6 两个月太平军转败为胜

根据英国海军上将何伯、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和士迪佛立将军所订的协议,在攻下最接近敌军的前哨地点青浦之后,华尔的部队就应该将总部迁到青浦县城。这一层是办到了。在 5、6 两个月中,太平军的转败为胜,连同太仓的失而复得,致使华尔将军受权将他所编组的军队扩充到六千人的最高限额;他本人

则擢升为提督，即陆军少将。这时，由法尔思德统率的一支留守青浦的华尔部队，遭到忠王的逼攻，只是靠了华尔率同一支联军部队的驰援，才好不容易地在6月10日被救出重围；青浦随即被太平军占领。华尔将军在松江成立了总部，8月9日他从松江的营盘出发，收复了青浦。此后太平军从苏州出击，8月26日已到达距上海黄浦滩三哩的静安寺。

达尔第福的法华联队

这年夏季，天气极热，疫疠丛生，因而联军的军事行动停顿下来。在上海以外一直被占领的据点虽只有常胜军驻守的松江和联军驻守的南桥镇两处，然而这两个据点却保护了整个浦东半岛。在这期间，法国人在华尔的成就鼓励之下，成立了一支由中国兵组成的法华联队①，由法国炮兵队的达尔第福上尉负责指挥。

宁波已早在1861年12月9日被太平军攻占，他们据守该城，既没有打算侵害外国人的利益，也没有设法建立政权和维持秩序。业经宣布中立的外国居留区没有受到任何骚扰，因而有大约七万中国难民逃到这个和太平军所据守的府城相隔一水之遥的地方避难。1862年5月6日，帝国军队——即招抚的广东海盗——克复了位于江口的镇海以后，即向宁波进发，准备在10日攻城。在攻城军到达的那一天，四艘英国兵船和两艘法国兵船遭到城墙上的炮轰。舰队里的高级官员英国海军上校呩乐德克和法国海军上尉耿呢发炮还击，随即攻城，将太平军逐出。宁波城当即移交给帝国官员。太平军仍逗留在附近一带，四处劫掠蹂躏；因此联军当局决定以武力肃清宁波周围的一带地区。 243

华尔阵亡

8月11日，呩乐德克上校率领一支由常胜军和法国联队抽调的一千人及广东兵一千五百人组成的军队，在一艘英国炮舰

① 指所谓"常捷军"。——译者

和一艘法国炮舰的支持下，攻下宁波以西约十五哩的余姚县。9月18日，华尔将军到达宁波；21日，带领所部九百五十人在英国炮舰“哈代”号和法国装甲轮船“孔子”号的支援下，前往进攻宁波西北十哩的慈溪。城被攻陷了，但华尔受了致命伤。10月9日，这同一支军队在法尔思德陆军上校的指挥下攻占奉化。常胜军随即撤退，代之以法国海军参将勒伯勒东和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所招编一支最后有二千五百人的法华联队。这支军队会同左宗棠的部队在11月28日攻陷位于宁波和绍兴中途的上虞县；1863年1月17日，进攻绍兴被击退，司令官勒伯勒东阵亡。一个月之后，他的继任人达尔第福战死。最后这支军队在德克碑海军少尉的指挥下于3月18日攻占绍兴，这才肃清了浙南的北岸。

华尔的哀荣

华尔的死是中国方面的重大损失。凡是他实际所作的，都是为了出钱维持他的军队的中国人的利益。他的部下都对他忠心耿耿，当他在慈溪被击倒的时候，全体官兵无不愤怒填膺，带着云梯冲上去攻城：估计守军伤亡不下七千人，而这支军队的损失仅七人阵亡，十二人受伤。他同中国官员的关系，尤其是同李鸿章和杨坊的关系是再好不过的；他也得到了同他有联系的英法军官们的尊敬和信任。他的功业受到他本国政府长官的嘉许，中国政府则给以史无前例的哀荣。李鸿章在奏折中盛赞他的勇敢、才干和忠诚；旋奉上谕说：“览奏实深嘉悯。洵属义勇性成，无忝戎行。……并着宁波、松江两府建立专祠，仍交礼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①亚洲的君主对于为他们忠诚服务的人就是这样锡以荣宠的。1877年3月10日，松江专祠以儒教的仪式举行献祭，因为松江的克复是太平军

244

① 录《东华续录》，同治朝第13卷原文。——译者

造反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松江，直到今天，在钦赐华尔的记功碑前依然香火不绝。

2. 白齐文和常胜军

华尔死后，白齐文奉派统率常胜军。这时李鸿章第一次直接负责节制这支军队，虽则这支军队的经费仍旧是由上海华商会防局接济①。在这期间，俄国当局建议李鸿章，请以俄军一万帮助平乱，李氏立刻加以拒绝。同时，俄国舰队也奉到了在中国沿海同英法舰队合作的命令。

李鸿章和常胜军

在1862年夏季的疫疠减退以后，一支拥有士兵四千五百人、大炮三十门的混合军队，在士迪佛立将军及何伯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开上前线，10月24日，经过一次坚决的防守战之后，克复嘉定。11月15日，从南翔开来的一大队叛军被李鸿章亲自率领的清军战败于黄渡。据报另一大队叛军正威胁着青浦，从松江出发的白齐文将军和从青浦开来的程学启将军会师，于11月19日大败敌军于白鹤港。1863年1月初，士迪佛立将军已经可以报告说，在上海周围，叛军已被肃清了。

245

白齐文具有他的前任所赋的许多品质。他勇敢，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并且深得部下的信任。然而，就处事圆通周到来说，向为华尔之所长，却正是他的短处。他没有能和中国官员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大家疑心他的野心比原先认为华尔所抱的野心还要大些，而尤为李鸿章所不信任，李鸿章对于他的任命本来就是不欢迎的。李氏一上来就要求士迪佛立将军推荐一位英国军官担任白齐文的军事秘书，因而在11月11日，奥伦上校奉派

白齐文未能得到中国方面的信任

① 关于这笔经费的来源（大约是出自上海的关税），请参阅海尔：《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第12章。

担任了这个职务。白齐文将军对于这一着当然不满，加之程学启将军在呈报白鹤港战役时，夸大自己的功绩，对白齐文和他的军队只字不提，这就使他格外不满了。他的不满表示，每传到中国当局那里，就增加一分他们对他的忠诚的不信任，而且，他修理松江营房和擢升他认为应该擢升的人花费很多。军费的增加，再加上私人的憎恶，使上海华商钱袋上的绳子格外抽紧了，并且使钱商杨坊更加不愿垫付所需的款项：因此军饷和军队的经费都拖欠下来。1862 年 12 月底，全军六千人奉命援助曾国藩围攻南京，但是他们拒绝在欠饷发齐以前开拔。杨坊答应在 1 月初备妥款项；白齐文应他的邀请在 1 月 4 日前往上海，到这家银号去取款。两人发生了口角，白齐文打了杨坊的耳光，并且从屋子里为他的军队拿去了四万两的一宗款项。于是李鸿章请士迪佛立将军以解职处分通知白齐文，并劝他服从，这一节他遵命照办了。李氏还请士迪佛立将军推荐一位军官充任管带。不久之后他推荐了奥伦上校。

246

奥伦接替白齐文

常胜军的情形已非常不稳。他们对于白齐文将军所受的待遇提出了措词强硬的抗议；签字人——计有校官九人、上尉二十九人和其他军官十三人——郑重声明，如果白齐文被处死，象口口声声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决不再为中国当局服务。但是 1 月 15 日(1863 年)，奥伦上校发表为常胜军管带，并由中国当局给以镇台和道台衔。险些儿发生的哗变已经被李鸿章弭平下去，他发清了所有欠饷，并且负起了以库款维持军队开支的责任①。

① 白齐文将军后来的经历是五光十色的。复职的打算失败之后，他和他的一批旧部就在 8 月间投入苏州的太平军。两个月之后他向戈登投降。11 月，他被押解到日本。1864 年夏季，他又投入太平军。翌年 5 月，他落到福建官员的手里。他被解往苏州，但是在路上落水溺毙，这大约是奉中国方面的命令故意造成的。1865 年 10 月，他的尸体运到上海，经验明无误。美国政府已经声明放弃对白齐文的管辖权，所以美国代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3. 海关总税务司署

随着时日的推移,1854 年在上海成立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博得了人们的尊敬,并且深为外商团体所赞许,而这个机关原是为了外商的利益并同样地为了华商的利益而创立的。在 1858 年 11 月 8 日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第十款规定:

新海关制度的推广

"……各口划一办理,是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船钞项下拨用。……"①

在 1854 年推荐的三位税务司当中,英国方面推荐的威妥玛先生已于 1855 年 6 月由李泰国先生接充,李泰国已经解除了领事馆的职务,而专门办理海关事宜。

李泰国充任总税务司

在首先改组了上海海关并交由受他节制的一位税务司主持其事之后,李泰国前往广州,1859 年 10 月在那里开办了一处海关,一应组织都按上海之例办理。然后转往汕头,1860 年 1 月也在那里开办了一处海关。由于中国国内多事,海关制度没有能很快就得到进一步推广,其他各口的海关是在下列年份中开办的: 1861 年计有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等处;1862 年厦门、汉口两处;1863 年烟台一处;1864 年牛庄一处。1860 年的北京条约既然规定赔款由关税项下拨付,那就有必要成立一个在帝国政府直接管辖下的统一海关。李泰国奉 1861 年 1 月 21 日恭亲王的扎谕,受任为总税务司。从这时起,海关机构就开始成为帝国的一个机构了。

247

① 录自《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卷,第 118 页。——译者

4. 李－阿小舰队

李泰国辞别

李泰国先生在1862年春季作为一个志愿兵从事于抵抗成帮的乱民[①]而保卫上海时，受了重伤，因而不能不返回英国。鹭宾·赫德先生和费子洛先生奉到了委派会同暂代总税务司的札子。费子洛先生原主持上海海关，因而仍旧主持其事。赫德先生并没有任何专管的口岸，在今后两年之内，关务的实际调度一直是掌握在他手里的。

李泰国奉命为中国购备舰队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国当局偶尔也利用过由外籍船员配备的外国雇用船只，去阻截叛军的军火供应。1862年，有人建议帝国政府成立一支由欧洲人配备的舰队，以期包围太平军。李泰国先生奉命在英国购买一支汽船舰队，加以装备，并立即率领来华。李泰国在选定阿思本上校管带这支舰队之后，就申请女王颁给特许状，授权他本人和阿思本上校，"准接受中国政府的聘用，担任陆海军职务，并准装备船只以供在中国进行作战之用，以及招募英国臣民赴中国参加作战。"英国政府的决定是，得颁给准在中国担任军职并为中国政府装备船舰的特许状，但是关于李泰国所请招募英国臣民一节，则不应采取任何措施。

248

李泰国和阿思本上校的合同

除去一艘供应船之外，由七艘轮船组成的一支可供作战之用的舰队，已经购买妥当，装备齐全，并且派遣来华了。在这支舰队开航之前，李泰国和阿思本上校在1863年1月16日在伦敦签订了一项合同，其中重要的条款如下：

(1) 阿思本同意管带欧、华海军，为期四年，并言明，不得以其他欧洲

---

① 所谓乱民系指为反对外国强盗绑架中国人出国充当苦工而举行示威运动的上海爱国人民。——译者

人充任总管带。

(4) 阿思本保证只遵照径行颁给李泰国的上谕办理，并约明对于经由其他任何途径传达的任何命令，一概置诸不理。

(5) 李泰国方面保证对于他所认为不合理的命令，一概拒绝传达。

(6) 阿思本得任命本舰队船只上的一切官兵，但须呈由李泰国代表皇帝予以批准。

(10) 李泰国保证尽速请皇上拨给一笔款项，作为足敷薪工开支等项四年之用的保证金，并据谅解，在目前即以所有船只装备作为该舰队正当要求的担保品。

(12) 此项谅解的条件以及正式合同中各款和刊印的训令等，应于要求阿思本率同所管带的舰队行动以前，由北京的皇帝正式予以批准。

签字人　李泰国

阿思本

李泰国先生的美梦

李泰国先生是一个惯于异想开天的人，他认为他所承担的那项简单任务，是革新中国和将它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奠定在一个新的和比较健全的基础之上的机会。在这种新关系中，他应该是帝国政府的指导人物。他具有

"谋求中国和列强之间的中介地位的抱负，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如何解决将对华和平关系置于稳固基础之上这个问题的方法。……我所处的地位是以一个受雇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人的资格，去为他们作一定的工作，而不是去奉命办事。以一位英国绅士而会在一个亚洲野蛮人的下面奉命办事的那种想法的荒谬，是无需多赘的。"

249

李泰国先生以改变中国的成法为已任；扬言那个通过省当局推行政令的照例办法应予废除；要强迫帝国政府建立一支帝国海军，甚至要将当时在省当局节制下从事镇压叛乱和海盗的船舰也一并归并进去；为此之故，这位受聘于商务方面的外籍僚属李泰国先生，不但应该是首席海军大臣，而且应该是唯一的海

军大臣，只能对皇帝或宰相负责，而且只能接受皇帝或宰相的命令。

大梦初回

阿思本上校在 1863 年 9 月率同他的舰队里的最后一批船只抵达上海时，奉到了恭亲王的一个札子，其中通知他说，所有该师船的总管带一职，已委由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举荐大员充任，以阿思本本人为副管带，一切经费开支委由李泰国经管。阿思本应以副管带的身分管理舰队中的洋员，但在军事行动上须受该管督抚的节制。这就是事实上为生存而挣扎但仍不失为主权国家的一个帝国的大臣，解释他所给李泰国的训令的方法。其他任何解释都是不可能的。

小舰队的结局

阿思本上校将舰队开出了多方设法引诱他的人员离弃他的那个上海口岸，把它停泊在烟台之后，就亲自前往北京，在北京找到了李泰国，李泰国是在 6 月到京的。阿思本在北京等候了三个星期，既没有获得对合同的批准，也没有获得对原拟办法的修正，于是通知恭亲王说，在当前的情况下，只好立刻将舰队解散。在他将这个意思通知英国公使的时候，他认识到价款既由中国方面付清，他自无权扣留船舰，但他指出，一旦以那样强大的船舰交到当时上海为数不可胜计的流氓海盗手里，那是如何的危险。别人也指出了这种危险，而且还指出，如果不将船舰交给中国人而出售，万一落在太平军手里或日本倒幕大名手里，那也是危险的。尤其可怕的是，更有被美国南部联邦买去的危险，加之那些船舰的根据地既然是在一个不能保卫自己中立的国家里，就大有被利用作为武装民船去袭击美国船舶的可能性。这一点经向英国公使陈明，他立刻认识了危险的严重性。在这种以及其他种种考虑的同样程度的影响下，他训令阿思本上校将人员一律资遣回国，并将船只开到英国和印度出售，以价款归还

250

中国政府[1]。中国方面在这次试办的事业上花费了五十五万多英镑——但一无所成。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对阿思本和英国政府的效劳表示了谢意，并且除按照合同应付的款项之外，还自动地赠送他一万两。

中国的恼怒都发泄到了李泰国先生身上。11月15日，他被免去总税务司职务。但是，中国方面却以金钱上的慷慨缓和了这个打击；李泰国领到了一万四千英镑作为他同他所服务的那个政府发生龃龉期间的报酬。赫德奉派继任李泰国的遗缺。另据商定，赫德不应驻在北京，因为如常驻北京，那就会，用卜鲁斯爵士的话来说，“被人疑心在不属于他的职务范围内的事情上充当中国人的顾问，从而因他们所犯的错误而招致反感。”但是，时势需要的迫切，却不容许中国大臣们失去一位精明顾问的进言献策的机会。翌年，即1865年8月，北京设立了总税务司署，他也就一直驻留北京了。

李泰国免去总税务司职务

5. 戈登、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结束

在白齐文免职之后，李鸿章和士迪佛立将军签订了一项整顿常胜军的协定。这项协定中的重要条款如下：

整顿常胜军的条款

(1) 常胜军应由中英官员各一人会同管带。中国方面的官员经派定为李恒嵩；至于英籍官员，则暂行推荐奥伦上校充任，但一俟戈登上尉奉到必要的授权，当即接充。英籍官员的品级应为镇台。

251

(2) 往上海周围三十哩半径以外出征，须先征得联军（即英、法两国）的同意。

(3) 军法、军需及粮台等项均委由中国人主持其事。

(4) 军饷应按期拨付，由两位联合管带发放。

(5) 兵额应裁减至三千人，如将来关税短绌，甚至可裁减至三千人以

[1] 阿思本的旗舰是萨摩藩主买去的。

下。

(6) 外籍军官的额外津贴，应即取消。

(7) 军队及管带均归李鸿章节制，所有军火接济，亦由李鸿章购办。

“中国的”戈登担任常胜军管带

1863年1月15日奥伦上校接管常胜军。由于2月15日在太仓的一次惨败，奥伦失去了中国官员及其本人所部的信心，同时也不能再得到英国方面的支持。1月9日颁发的英国枢密院令，授权英国军官得在中国政府供军职；这项敕令的副本连同准许戈登少校在中国政府供军职的正式许可状，与太仓惨败的消息同时递达士迪佛立将军处。3月24日，查理·乔治·戈登——即“中国的”戈登——发表为华尔所招编的这支军队的管带。他在事机危迫之际接任了管带。全军悻悻，大有哗变之势，他们不愿意要一位英国长官；但是因为他带给他们以衷心的愿望——胜利，他们不久就对戈登表示热烈欢迎了。

由于中国当局的督促，并由于他生性的当机立断，戈登丝毫没有失去时机。他第一步就是进行援救常熟。4月2日，他带了二千二百五十人和十二门大炮从松江出发，在福山登陆，在那里同六千名帝国军队会合。6日，这支联合部队和太平军的掩护部队相遭遇，随即将他们打败；翌日，攻破了围困常熟的阵线，这时城内军民已丧失殆尽了。为了这次的功劳，清廷降谕赏戈登以总兵衔。太仓的诈降使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和他率领的二千清军中了伏兵，损失一千六百人。于是戈登奉命攻取由一万太平军防守的这个地方；他带领二千八百人，在守军坚决抵抗之下，于5月1日攻克该城。

252

这时，昆山是太平军的一个兵工厂和铸铁厂的所在地，也是一个战略上的重镇。它是由八千名驻防部队和慕王所部大约四千到七千名太平军的精锐组成的掩护部队防守的。程学启所部

攻克昆山

的帝国军队曾经围攻了昆山一些时候，但转过来他又被围困在自己的营盘里，只是在5月27日戈登将军到达松江之后，才被救出重围。程学启曾猛攻东门，但戈登却认为西面是比较薄弱的一线。所以当帝国军队在28、29和30日对东线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却在31日搭乘装甲轮船“海生”号沿运河而上，去进行侦查，一直深入至距苏州不到一哩的地方，一路用大炮平息了太平军几处栅寨的炮火。他发现从昆山到苏州的唯一退路可以在距昆山八哩、距苏州十六哩的真仪地方予以切断，这里有一个湖泊紧靠运河。他在去苏州的途中将这里太平军的栅寨攻下，分派了一支军队加以驻守。在6月1日早晨三时回到真仪的时候，他发现昆山的守城部队惊于交通线的被切断，正图弃城而逃。在“海生”号的帮助下，太平军的守军如入瓮中。八千守军之中，“阵亡、溺毙和被乡民屠戮的达四、五千人之多，俘虏二千人，夺获船只一千五百艘。我方仅二人阵亡。可见轮船的价值”，戈登这样写道——其实不妨再加上一句，“可见一位天才军事家的战略上的神机妙算的价值。”

这时昆山在战略上比松江更为重要了。一部分为了这个缘故，一部分因为他感觉到军队在昆山比在松江更容易控制，所以他决定迁移他的总部。军队深为不满，并且以哗变来抗争。祸首被枪决，于是大部分士兵丢下武器潜逃，以致兵力从三千九百人减到了一千七百人。戈登于是把在昆山俘虏的二千名太平军悉数予以收编。 253

苏州的包围

下一个目标是苏州那个荒芜残破的城市，它原有的一百万人口已经只剩了四分之一。戈登进攻苏州的计划是先攻取周围各城镇，游弋太湖一带，而把苏州钳制在西面的湖泊和东面的昆山之间。他带领二千二百人和两艘轮船从昆山出发，7月27日

攻陷苏州以南十哩运河边上界浦地方的一个坚强据点，两天之后，攻陷再往南五哩远近的吴江城。

两个月之后，戈登带领本人所部的八百人和庞发所部法华联队的三百人，从苏州以东六哩的外跨塘出发，攻占了苏州以南二哩、横跨运河上的五十三孔的宝带桥。在太平军方面服务的外国人，感到事业的成功无望，于是决心脱离。10 月 15 日，有三十四名官佐和士兵跑过来，17 日白齐文也跟着过来了，他们都是在戈登免于处分的保证下来降的。投降的人当中有十九名立刻被编入戈登的卫队，还有一位军官恢复了他过去在常胜军中的少校官阶。从这时起，常胜军再没有什么叛离的事情发生了。

苏州的围攻与失陷

11 月 19 日，苏州的围攻战以炮轰东门开始。苏州城是由四万名太平军防守的；无锡有两万人，在苏州和无锡之间有忠王所部的一万八千人。攻城军计有程学启将军所部的帝国军队一万人，常胜军三千一百人和法华联队四百人，还有两艘轮船在太湖上巡弋。这些军队以总部设在常熟的李鸿章所部二万五千名帝国军队为支援。27 日出袭被击退，损失惨重，但是 29 日发动的一次攻势却取得了占领外围栅寨的战果。这时背叛和懦怯开始在太平军中酿成内讧。坚持继续抵抗的慕王被他的诸弟兄王刺死。剩下来的四个王和三十五个天将于是向程学启将军请降。程学启坚持要戈登去会晤他们的领袖纳王；会谈的结果是太平军诸将领及其军队在 12 月 4 日向程学启投降。

254

5 日中午，太平军诸王和天将被召唤到李鸿章的面前。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已经薙发①，但是他们自己却身着长毛王的全

① 将头前面的头发剃光而将后面的头发蓄成长辫，乃是满清征服中国的标志。剪掉辫子而任头发自然地生长，在大清帝国之下始终是造反的象征。

套服装，大踏步去赴会。他们要求委任在帝国军队中任职，好几千名的徒众编入帝国军队，并且请将苏州用城墙隔出半个城来划作他们的驻区。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对于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只有一种对付办法，于是不到一小时的工夫，这八位太平军将领的首级就都滚在路旁了。李鸿章承担了这项举动的全部责任；他辩称，太平军诸王的态度，以及他们要求自成一局，以便遇机再行采取公开敌对行动的主张，使他不能不下令将他们正法。程学启从前是太平军的首领，懂得他们的想法，所以力促他的现时上司采取即决即行的措置。当曾国藩听到李鸿章的作法时，他表示完全同意。

太平军降王的被处决

戈登却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也不能容许这种行为同他的名字牵连在一起。虽然他是一个副管带，虽然太平军诸王是向程学启投降的，可是他认为事关他的名誉，所以大为愤怒。他带着纳王的首级和纳王的那个虎口余生的儿子①，回到昆山他的部队中。在离开苏州之前他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李鸿章，责备他破坏戈登的信誓，要求他将苏州交还太平军，并自请辞职。李氏传信给戈登说，他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戈登决不会受牵连，并且他要把这一件事公布周知——“但是也告诉戈登说，这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戈登甚至调派“海生”号和一支军队去生擒李鸿章。他已经启身赴苏州，继而又中途折回昆山。当时他原想辞去管带职务，然而这似乎也并不能应时势的需要。12月9日，柏郎将军前往昆山，认为局势十分严重，决定将戈登少校及其所部军队正式置于他自己的指挥之下。至于英国政府的意见，则从擢升戈登少校为工兵中校以及取消1862年8月30日颁布的准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招募兵员和1863年1月9日

戈登怒发冲冠

戈登和李鸿章的暂时决裂

255

① 指纳王的义子郜胜镳。——译者

颁布的准陆军军官在中国军服役的那两道枢密院令的举动中，可以概见。戈登终于决定为公众而不顾其个人的感情，在1864年2月底又重上战场。

在这期间，太平军已经放弃了无锡、嘉善、平湖、海宁和乍浦各城。苏州的陷落又在北以南京和常州为据点的太平军与南以杭州和嘉兴为据点的太平军之间，插进一个楔子。2月29日，戈登和他的军队从无锡出发；翌日攻克太湖西北的宜兴，不久之后，宜兴北面的溧阳也投降了。这番进展使戈登的部队可以同正攻打南京的曾国藩在军事上取得联络，并且可以将所俘虏的两万名太平军交到中国官员手里。于是戈登北进，但三次攻打金坛无功。后来戈登的部队撤到溧阳，3月底攻占了无锡以北十二哩处的一个据点。

当太平军的领域被这样割裂成两部分的时候，对太平军在南方各据点的军事行动也正在进行。对嘉兴的军事行动是由程学启将军调度的，嘉兴终于在3月20日被攻陷，程氏受致命伤。左宗棠一连几个月指挥对杭州的围攻战；2月间德克碑率领的法华联队加入了他的阵营。3月31日的最后一次联合进攻，使杭州城复归于帝国的统治之下。4月初，太平军放弃了丹阳，这时，他们在江苏只据有南京、常州和金坛，在浙江只据有湖州和太湖南岸的长兴了。4月25日又弃守金坛。

嘉兴和杭州的攻陷

256

4月11日，戈登亲自率领由他本人所部的军队和八千名帝国军队所组成的一支队伍，对华墅的为数两、三万人的一支太平军发动了进攻；叛军大败，遗尸三千具。这时戈登可以毫无阻碍地会同李鸿章所领导的一支军队去围攻常州了，4月23日攻破了常州外围各防线。5月11日，常州城被攻陷。

常州的攻陷

随着常州的攻陷，戈登的任务告终了，他的军队的使命也完

成了。英国政府取消 1863 年 1 月 9 日枢密院令的训令已经寄到上海，奉调同戈登一起服役的英国官员都接到了通知，限于 6 月 1 日以前各回原队。李鸿章决意解散这支军队。因此，戈登率领常胜军从常州回到昆山，他领到了给外国军官和中国士兵的一笔厚赏，于是就地将他们遣散。他自己拒绝了一度拟行颁发给他的一万两赏银。奉上谕将他从总兵擢升为提督，即陆军少将。另降旨赏穿黄马褂，赏戴花翎。

1864年常胜军解散

常胜军毫无骚扰地解甲归田。华尔是胜利的伟大组织者和有号召力的领袖；戈登的表现也无愧于前贤，而他们所带的军队虽则往往急躁，且有时抗命，然毕竟无负于他们的管带。这支军队成立三年以来，有两年半在积极作战中，历经近百次的战役，而只有三、四次遭受挫败，攻下县城五十余座，帮同遏制了造反的狂澜，这单单靠帝国军队本身的力量是显然办不到的。

随着南面的杭州和北面苏州与常州的陷落，太平军被驱到他们在南京的最后防线。南京的围攻是由曾国藩的军队在没有外国人的援助下进行的。到了 6 月 1 日，合围已经完成。6 月 30 日，天王自杀。7 月 19 日，南京陷落。

南京的陷落

皇帝大事行赏。曾国藩对戡平太平军功劳最大，赏太子太保，封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赏太子少保，封伯爵。李鸿章封伯爵，世袭罔替，其他各封赏有差。

皇上的封赏

257

7 月 4 日，太平军撤出长兴，于是在南京陷落之后他们唯一有组织的队伍就是据守湖州的那一支了。一支帝国军队在一支法华联队的支援下对湖州发动进攻，8 月 28 日守军撤退，进攻军占领了县城。这时轮到法华联队解散了；管带德克碑，赏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日意格，赏总兵衔。

太平天国的结束

最后一幕是在厦门附近的漳州府上演的，从 1864 年年底起

就有少数太平军被围困在那里；随着 1865 年 5 月他们和白齐文一道被俘，太平天国这场大火的最后余烬熄灭了。这次造反蹂躏了十二个行省，面积之广等于中欧加西欧。在战场上，以及由于暴行、屠戮和饥馑而直接被杀死的，不下二千万人。弄得民穷财尽，满清王朝几乎覆亡。中国之所以能从这次叛乱中被拯救出来，纵非主要、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英法两国在 1860 年所勉强给予而在 1862—1864 年所不吝给予的外援——这种援助固然有裨于西方各国的利益，可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6. 合作政策

随后的造反

紧接着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就是一个凋敝时期，这个时期是以山东和河南的捻匪、云南大理县的回乱，以及西北的回变等广为蔓延的、几乎无异于造反的种种动乱为特征的。北京政府几乎是一筹莫展，各处地方当局则陷于无能和无政府状态。

各国公使所给的帮助

258

中国政府从驻北京外交代表那里得到多方的援助。他们并没有忽视自己的责任，一面责令中国履行条约规定，一面保护他们各自负责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认为教导那些对新国际关系毫无经验的中国大臣，并给以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劝告，也是自己的责任。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已经宣布了"协商与合作"的原则，于是训令蒲安臣先生应"遇事与英法两国公使协商合作，除非情形特殊，确有采取个别行动的充分理由"。蒲安臣先生把他接奉的训令解释成为向中国当局提供一个随时可以给予谘询援助的友好机关。他的政策是此后数年各国驻北京代表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基本方针。

1863年的中丹、中荷条约

1863 年,中国同丹麦和荷兰分别在天津签订了条约。每一项条约里都载有给予 1858 年天津条约的一切权益的明文规定,也都载有一项最惠国条款。丹麦条约并附有 1858 年天津条约所载的通商章程,但是删去了禁止从牛庄和登州(即烟台)输出豆类和豆饼的那一项条款。这样给予的权益立刻为所有各国商人和船舶一律享有了。

驻北京公使的合作政策特别是对他们彼此的关系产生了良好的结果。紧接着太平军于 1861 年 12 月攻陷宁波之后,驻扎那里的仅有的英美两国领事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据议定:在当地没有任何中国官厅的情况下,应在城外划出一个地区,专供一般外国人居住和贸易之用。这项协议经 1862 年 5 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加以确认,并经两关系国公使予以批准。

法国创始的单独政策

259

当太平天国占领宁波期间,在这个区域内,对外贸易一直进行无阻,美国传教士能安然度日,有七千中国难民得到了庇护。8 月间,正值开始于余姚而结束于奉化的那次战役进行时,兼管宁波的法国驻上海领事要求一块单独的租界,将过去由于中立化成为公共租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了进去。蒲安臣先生以任何领土租让都是削夺美国条约权利为理由,提出了抗议。他发现中国大臣以及英俄两国公使都和他的看法不谋而合;法国公使到任之后,也对此表示同意。

宁波法国当局的这种行动是紧跟着上海方面的同样行动而来的。上海一度看上去很有希望将所有外国人的利益都联结在一个市政机构之下;但是各自为政的倾向不久就发展起来了,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法国生怕它那一点无关轻重的利益会被英美贸易的优势所掩蔽。保全国家利益在当时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法租界公董局就在 1862 年 5 月 13 日成立起来,它的一

切决议都要取决于法国领事的核准或否决①。

1863年英美租界的合并

上海英租界的外侨，为管理和裨益居住租界内的中国人起见，以西方人的彻底的精神担当起提供警察和卫生工作的必要任务；居住英租界的中国人，到1862年时为数已不下五十万。虹口美租界是座落在这个范围以外的。虹口市政委员会不得不仰仗它的力量比较强大的邻居为靠山，因此在1862年2月，当太平军涌至上海周围的时候，虹口警察同租界警察合并，此后租界警察对苏州河两岸就一并实行管理了。英美租界统一行政运动推动得很快，美国领事乔治·西华大力予以支持。这项建议经于3月份举行的租地人会议上提出讨论，一致通过。随即提向各领事请示，英、美、法三国领事都加以批准；但是俄国领事虽批准了两个租界的合并，却不同意将上海地皮章程适用到虹口方面，因为他并没有批准过那项章程。这项反对意见为外交上的合作政策所克服，决议经1863年9月举行的一次租地人会确认之后，洋泾浜以北的上海公共租界就成立了。

260

7. 领事裁判权

外国租界的领事裁判权

关于领事裁判权的几个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解决。在许多现已开放的口岸，诸如牛庄、天津、汉口、九江、镇江、广州等处，都有英国租界（在天津和广州还有法国租界），租界的整个区域已永久租借给英王，唯保留每亩一千五百文的地租（约合每喃九元），须按年付给中国政府；英王将地皮分租给租地人，为期九十九年。

① 1914年4月8日，中法当局就“专与法公董局会办华人住居法租界及外马路各事”指派两名华董（后增至五名）一节，达成协议。参阅卜方济：《上海简史》，第292—293页。

领事对于他们本国国民的管辖权一般是执行得很有效的，但是也有不正常的情形，其中有一些一直还没有纠正。英国领事馆设有监狱和警务人员，配备完善，判决可以毫无耽搁地付诸执行；至于上诉案件在1865年9月4日根据3月9日的英国枢密院令成立上海最高法院以前，均归香港最高法院受理。美国领事起初并未备有适当的机构，因而执行审判是有缺陷的。在1907年1月2日美国驻华地方法院成立之前，凡对美国领事法庭的判决不服，得向驻北京公使馆提起上诉。法国领事法庭执行审判的情形大体良好，凡对判决不服，现在是要向西贡方面提起上诉的。其他各国的一般规定是，凡不服领事法庭的判决，其上诉得移送各该本国首都；但是对俄国法庭判决不服提起的上诉，在革命爆发以前，是归由海参崴法庭受理的，并且一切比较重大的案件在初审时就移送那个法庭办理。凡被控犯严重罪行的西班牙臣民，须解至马尼拉审讯，而自1898年以后，竟须解至西班牙办理。从德国领事法庭提起的上诉，在大战前归来比锡帝国最高法院受理。

261 对于没有领事代表的外国人的管辖权

对于那些因事趁便而具有一切国籍或根本没有国籍的人的管理方面，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叛乱和海盗盛行的年月，中国境内这类的人确实为数不少。在对付这类人时，领事们一般都是互相支持的，并且在没有充分的证明时，都拒绝接受那些为求庇护其不受另一法庭管辖的人们所提出的主张。凡是没有领事裁判权保护的外国人，如被控犯罪，应受中国法庭的管辖；但是，即使在受中国法官审讯时，这些无国籍人也由于有外国领事馆派员陪审而可以得到保护，决不致承受中国司法程序的全部结果。

对中国人行使管辖权的问题，情形颇为复杂，上海租界是不

1864年上海"会审公廨"

愿意让中国官员插足的。这个问题以1864年"会审公廨"的成立而得到了解决，在会审公廨里设有上海县委派的代表一席。在受理违警案件时，即由代表单独审讯；在受理事涉外国人的以中国人为被告的刑事案件时或受理无领事代表的外国人的刑事案件时，则须由领事馆派员陪同审讯，在受理民事案件时，如双方均为中国人，即由代表单独审讯，如系外国人控告中国人，则须由领事派员陪审。上诉案件由上海道审理，由领事陪审。这种程序在1869年经予修正，由上海道委派同知级别的官员主司其事。凡事涉外国人利益的案件均应有陪审员陪审。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仆役非经关系国领事同意，不得传讯。依法应判死罪或军流处分的刑事案件，应由上海县审断。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所制定的那项"只能视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各按本国法律审断"①的原则，从那时起就成为会审公廨的定章。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案件是由会审公廨法官单独审讯的。每一桩案件都有领事所派的陪审员参加审判——在违警案件中，是因为外侨的利益，而在中国人之间的讼案中，则是因为决不能许可中国官员在专供外国人贸易和居住之用的区域内行使无限制的管辖权。

① 录条约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48页。——译者

第十五章　1860和1875年间中国的重大事件

262

1. 移民

到1860年为止,中华帝国政府总是一贯不准它的臣民向外移殖和脱籍。如果具有特殊理由经申请批准,是容许向外移殖的;但是未经许可而擅自移殖,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关于这方面的法律,甚至课以死刑的处分,对于一个孱弱的政府来说,则未免太严而难以执行了,但在强盛时代,为了制止移民和惩处破坏禁令的人,也曾作过时作时辍的努力。

中国禁止向外移民

一位中国政治家于1893年在呈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前例已不废而自废。"这在1842年以前确是如此。向外移民继续进行,因为是非法的所以是无定规的,而因为是无定规的所以又是无限制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即乘着沙船向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移殖。他们或者象对台湾和海南岛的情形那样,使这些地方殖民地化,并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完全占领之下,或者并吞了它们贸易和工业的最有利部分,把它们变为中华民族的商业属地。

擅自向亚洲各地移民

当时曾听到招往外洋地方去作工的事情。于是外国的帆船,后来常是蒸汽推动的轮船以及外国的船主和水手们,被招来从事这种业务。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吸引着很多中国人。美洲,特别是秘鲁和古巴的垦殖者,也把中国看作为发展他

航轮对中国向外移民的影响

们的财产而招募劳工的一个场所。这多少是废除黑奴的结果。第一次有记载的关于包揽劳工的载运，是在1847年由厦门运往263美洲，那一年大约有八百个名义上自由的劳工被运往古巴。从这时起，向西印度群岛和向中南美洲的移民完全采取包揽劳工的形式。向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移民，都是自由移民；一般承认向后两处地方的移民待遇较好。由于这种待遇和受归国移民带回大量财富这一传说的鼓励，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人数从1849年的三百二十三人上升到1852年的一万八千四百三十四人。在1849到1868年的二十年中，到旧金山的中国人有十万零八千四百七十一人，其中四万五千八百八十七人就在那几年里返回他们的家乡。向澳大利亚的移民在这些年中也同样很多。

招募的虐待

自由移民并未引起特殊事故，但在向中南美洲产糖地带和产海鸟粪岛屿的包揽劳工的移民中，就有性质最严重的虐待了。被雇用的中国招募代理人，其特征可以很恰当地用"拐骗"一词来表达。凡带到收容站或奴隶收容所的移民，这些人都可以在出发口岸从外国代理人那里领到人头费。这种人头费最初是每名三元；但无法制止这种恶例。此外，拐骗们以支付费用为借口，还侵吞了预支给移民的款项，最初从每名八元到一百元不等，并采取各种已知的方法包括绑架在内，把他们的同胞拉到奴隶收容所的门口，到了那里他们的责任就算尽了。被当作抵押品的移民，一进收容站的木门，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了，他想从收容站离开是绝对办不到的。

"海上地狱"

船只一般载运三百到七百名乘客，一次航行可以收入二万到五万元的运费，通常不装回程货。移民在路程中的情况，最好用当时的官方报告和书籍中常见的措辞来表达，即苦力运送船

是"海上地狱"。甚至香港政府法令所允许的最适度的仓位十二平方呎——二呎乘六呎——也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遵守,在航行缓慢的船只中,一般的仓位只有八平方呎。这些船只在去古巴的一百六十八天的航程中,两次横渡广阔的热带,在去秘鲁的一百二十天的航程中,一直不离开热带。死亡率很高——在很多运载移民的船只上,死亡率达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四十五。 264

移民的自杀和暴动

受压迫的亚洲人的第一种防卫形式是自杀。他们在船上随便采取这种抗议的方法。这同一抗议形式也被采用来反抗监工的残暴行为:在钦嘉岛(秘鲁),包揽劳工常常受到剧烈的鞭打,发生了很多起自杀。但是,即使胆怯的人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也要反抗的,在 1850 到 1860 年间,这些胆怯的苦力起而暴动以反抗压迫者的事,数见不鲜。在若干案件中,船员被杀,船只搁浅或失事。

招募移民的罪恶最后使两广总督也不得不加注意,他从 1858 到 1861 年是在英法军事委员会的支配之下的。1859 年,被拐骗者的友人们的控诉和被拐骗者的供述涌到总督手中。他对他的同胞迅即处理,把十八名被宣告为拐骗者的人斩首,把十一个人判处较轻的刑罚。在军事委员会的劝告的鼓励之下,他终于采取大胆步骤,制订章程,制裁帝国法律所禁止的这种贸易。1859 年 12 月,他派遣官员到黄埔去,调查所接到的某些控诉的真实情况。结果是总督方面和外国官员方面协同作了努力,依靠这种努力,在广州采行了通过核准的收容站来管理向外移民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后来并推广到汕头。收容站的检查由中国官员执行,至于船上的检查则由新组织的海关来办理。为了逃避这种轻微的限制,代理人发现在葡萄牙旗帜下的澳门是适合他们需要的庇护所;在那里,苦力贸易兴盛了几年,非志愿

移民的出口给那个凋敝的殖民地提供了唯一的繁荣源泉。在1865年，从澳门运往古巴的苦力有五千二百零七名，运往秘鲁的有八千四百十七名，从广州运往古巴的有二千七百十六名。

1866年的移民协定

英国当局的官方态度是无可指责的，法国当局的态度也是如此；至于美国政府，则准备对于为补救这些明显的罪恶而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进行合作。其他一些国家可以认为不是冷淡便是采取一种消极抵抗政策——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和秘鲁。北京的英、法使节提出了管理问题，在1866年3月5日签订了一项三国协定，对于包揽移民的招募、收容站的管理、运送、工作和报酬的条件、遣送回国等问题都作出了规定。有关领事和中国当局应协力执行，后者由派往收容站的中国官员和派往船上的海关人员来代表。恭亲王代表中国声明：第一，取消移民禁例；第二，绑架仍处死刑；第三，只有在可能实行共同监督的口岸，才准许运载。美国、俄国和普鲁士的使节虽未参加协定，也表示正式承认。法国政府对某些条款未予承认，有两个西方国家则拒绝批准；但中国政府一贯声明，只有在这项协定明文规定的条件下，才准许进行包揽移民。

265

古巴的情况

1874年，中国派出一个正式调查团前往古巴。代表团的成员在哈瓦那的收容站、奴隶收容所和监狱以及乡村的几个种植园作了调查；除收到有一千六百六十五人签名的八十五份控诉外，还取得总共有一千七百二十六人的供述。他们所得证据的结论如下："几乎我们所遇见的每个中国人都在受苦或曾经受过苦，说来说去不外是受苦；这些人我们全都见到，这些话我们也全都听到。"

1873年，英国政府采取步骤，拒绝在澳门从事苦力贸易的船只在香港装备。1874年，英国政府向葡萄牙政府提出建议，

并得到法国和德国的支持。同时，广州的总督颁发一项布告，绝对禁止中国人从澳门向外移民。里斯本政府训令澳门殖民地立即修改办法；宣告包揽移民应改为“自由”移民，奴隶收容所也应改为“自由旅舍”。既得利益的压力固然很强，当代天良的激发则更为强烈；因而在 1875 年 3 月，里斯本训令澳门，禁止包揽移民以及一切自由移民。

对在美华工的仇视 266

向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移民，最初是许可的，不加限制，甚至予以鼓励；可是两国最后的处置是以中国人与之竞争的白人劳工的利益为基础，而不是以劳工雇佣者的利益为基础，雇佣者对于廉价、节俭和稳重的工人原是欢迎的。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一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对于一个拓荒侨民团体的勇敢精神，也有一定的体恤。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种态度一变而为仇视；在西部各州和各领地，中国人的人身和财产多次受到主要是欧洲移来的劳工的聚众袭击，而且得不到任何适当的赔偿。

沿太平洋区域各州，通过他们的暴民和投票箱，对这个问题的表示是毫不含糊的；联邦政府被迫放弃了西华德和蒲安臣的政策。最初企图通过立法限制中国移民，但是这个议案被黑斯总统否决，他吁请国会“维护公共责任和公共荣誉”，极力主张同中国谈判来达到目的。1880 年，为这个目的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谈判于 10 月份开始，发现中国政府并非不愿同意所拟订的各项建议；但对让与禁止移民的权力却踌躇不决。最后，于 11 月在北京签订了两项条约。根据第一项条约，美国政府有权管理、限制或中止中国移民，但是没有“绝对禁止”之权。根据第二项条约，中国对于扩展商务往来的任何提议，允作友好的考虑；美国公民和船只绝对禁止从事鸦片贸易；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

之间的讼案的审理，也作了规定；并且美国委员获得了扩大的最惠国条款。

沿太平洋区域各州的压力继续发生影响；1888年议订的一项条约归于失败，另一项条约在1894年签字，并得到了批准，根据这项条约，在以后十年的期间内禁止华工移入美国。十年期满，根据条约本身规定，此项条约作废。此后，中国政府宁愿美国政府在没有条约所赋予的国际认可之下，自行其是①。

267

2. 蒲安臣的出使

1866年派遣代表前往国外的决定

1866年春季，赫德请假六个月前往欧洲旅行；在启程之前，他建议派一个正式代表偕同前往，以研究外国民情，归国之后，以其所见，提出报告。这项建议得到恭亲王的嘉纳，于是照赫德的推荐，奏派了一个年长的满洲人斌椿充任，斌椿当时在赫德的衙门中任中文文案。他并非奉派充任使节，而是调查和报告他所见到的一切；为了给以担任官职的身分，委派他在总理衙门（外务部）行走，并提升至三品。这位代表由四个随员陪伴同行。

使命的失败

他在伦敦官场和他所访问的其他各首都，都受到了良好的接待。他离开伦敦后，前往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在每个地方都停留了几天。他在厌恶其风俗习惯的那些国家的旅行中所感到的烦闷，使他深为不快。他缩短了旅程，获准于8月间由马赛启航返国。他并未使人对中国文明产生良好的印象，而他对于西方也没有值得称赏的事情可以报告。他的使命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

蒲安臣被任为新使团的首脑

1867年11月底，由于宣布中国皇帝委任了正辞去美国公使职务的蒲安臣为他的特命大使，前往世界各国朝廷进行报聘，

① 关于中国向外移民这个总题目，参看作者宓亨利：《华侨志》。

北京外交界大为震惊。

六年来，赫德一直劝请在各个有约国的朝廷设常驻使节，以便中国政府能直接陈述它的看法和意愿，而不单单通过驻北京的外国使节。中国通过它自己的代理机构，去了解西方各国政府的目的及实行其意愿的力量，则尤其可取。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政府为求见谅于人，并为防止以敌意的高压手段从中国攫取政府迄尚不准备让予的权益，他也认为这样作是相宜的。不单是赫德希望中国在海外直接派有代表，美国的西华德国务卿在1865年也曾力促中国采取这个步骤。

268

外商都瞩望于1868年那个日子，希望那时可以任便提出修约的要求，以期通过修约来保证更忠实地执行、甚至扩大他们的既得权益。帝国的大臣们对于这种意图是完全知道的；他们和外国侨民团体也都知道有很多省份局势不稳，这从对传教士的攻击和到处的骚动情形表现出来。既须对付强化条约运动，又须制止国内局势的不安，以免引起武装干涉和海军示威，这种情况会给任何一个政治家以充分的理由，要把他的国家的情况适当而清楚地向其他国家的统治者说明。可是，中国的统治者对于他们现在所采取的步骤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就是想抗拒为了要开发他们的国家而不断向他们施加的压力：建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建立电报线，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由于别人以为象中国那样庞大和富饶的国家应该这样做。他们可能愿意拥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宁愿依照他们自己的时间来一一设置。拖延是每个中国政治家的本能的目的。

1868年2月使团离开中国

赏戴头品顶戴的蒲安臣，偕同二品官员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出使；以蒲安臣为首的这三个人奉派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除上述人等外，还有欧洲籍秘书二人，中国籍秘书

及随员约三十人，使团于 1868 年 2 月 25 日自上海启程。

269　蒲安臣是一个演说家，易于为一时的热情所冲动。在旧金山的宴会上，他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和平与进步的道路，要大家怀念"利玛窦、南怀仁、马礼逊、米怜、裨治文、克陛存及曾经生活和死亡在那个遥远土地上的别的一大群人，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它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会来临"；当时他不顾事实地宣称"那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到来了"。6 月 28 日在纽约州州长于纽约市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他在演说中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声称，中国已经准备邀请传教士"在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树立光辉的十字架"，聘请西方的工程师来开矿和建筑铁路；并且说，中国已走上进步的道路。他的雄辩的口才轰动了他的听众，引起了广大美国人民的热情；但是他的言论使那些远留在中国的人感到震惊。

蒲安臣的演说：在美、中两国的影响

1868 年的蒲安臣条约

华盛顿政府给予这个使团以殷勤的欢迎。团员们受到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但他对于美国使节尚未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表示了抗议。随后，蒲安臣和西华德之间开始谈判一项由后者起草的条约，条约于 7 月 28 日议定签字。这一条约的八项条款规定：应维护中国的完整；中国得自行管理内地贸易；得在美国各商埠派驻中国领事；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苦力向美国移殖，但禁止包揽移民；相互享有居住和旅行的权利；两国相互准许留学；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发展。

在这些规定当中，最后一条是中国政府唯一注意的一条，其他各条的博爱利他主义使皇帝的顾问们非常惊愕，很不容易才270 说动他们同意这项条约，况且条约的谈判并未奉到他们的授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主要的实际收获是鼓励中国移民。这正是那时加利福尼亚所殷望的。加州一旦改变了看法，联邦政府也

就改变了它的政策，并为打消蒲安臣条件的规定而大伤脑筋。

出使英国的实际效果

蒲安臣出使英国的成就并不惊人，但比较实际。使团到达几个星期之后，基于当时明白表示的下述谅解，才在 11 月 20 日觐见女王于温索尔：即中国皇帝碍于未成年才未召见外国使节。12 月，由于葛莱斯东当政，克勒拉得恩勋爵代司丹立勋爵任外交大臣，于 26 日首次接见蒲安臣。两天之后，克勒拉得恩勋爵宣布，英国政府及其官员今后拟采取的政策是："第一，不施加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不友好的压力；第二，英王陛下政府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不同中国的地方当局直接交涉"——不过基于这样一项谅解，即中国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且以得使用武力来保护受到迫切危险的生命财产作为保留条件。当即依照这个意思分别训令英国驻北京公使、海军部和殖民部，以便照办。并以所达成的谅解照会法国政府，据后者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对待其他问题一样，愿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一致步骤。同时发出训令，表明此项谅解，就涉及海军使用问题而言，也适用于英国和日本的关系。

这个使团从伦敦前往巴黎。在那里它受到法国政府和社会的良好接待；法国皇帝曾予接见，对于中国君主未成年的问题也作了华盛顿和伦敦方面所作的同样保留；但使团既没有得到一件象在华盛顿所取得的那种条约，也没有得到英国政府所承允的那种自制的法令。夏季之后，使团前往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和海牙。1870 年 1 月，它在柏林受到良好的款待，并取得俾斯麦的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实际上为北日尔曼联邦采取了克勒拉得恩勋爵声明中的那些规定。随后，这个使团前往圣彼得堡，2 月 16 日沙皇接见。蒲安臣受不了俄国冬季的严寒，患了肺炎，于 2 月 23 日去世。使团由志刚担任了领导；在访问布鲁塞尔和

271

罗马以后，取道新辟的苏伊士运河路线，于 10 月回到中国。

出使成败参半

蒲安臣出使是把东方和西方联在一起的那条锁链中的必要的一环。为处理中国国际关系而建立的这个基础，此后若干年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才有所背离；这正是蒲安臣所抱有的想法。作为驻北京的美国公使，他曾执行西华德的合作政策，靠了卜鲁斯爵士的合作以及柏尔德密和巴留捷克的支持，在五年的多事之秋把合作政策变成以精神压迫代替物质压迫的手段——变成通过四国公使的联合压力而不是靠一国公使或一国领事的单独行动来发挥作用的手段。蒲安臣出使目的的想法，也是以这同样的意思为基础的。他说服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一种最后变为它们的指导方针的政策，尽管事实上中国的情况并非象他所陈述的那样。

因为中国的排外主义，东方外国人反对新政策

克勒拉得恩和俾斯麦都没有得到他们在东方的代理人的赞同。商人团体激烈反对改变政策，感到这将给商业利益和进步事业带来危险。这种担心由于使团从旧金山前往圣彼得堡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加剧。当蒲安臣正在宣称中国准备“在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树立光辉的十字架”，并保证中国已走上进步的道路时，扬州、台湾、汕头、福州、登州、安庆、武昌和四川都发生了反对教士和排外的风潮，所有这些风潮都是靠了对各省当局施加压力，在多数情况下靠了派遣炮舰而平定下去的。272 人们当场看到中国人的傲慢和仇视因继续施行武力政策而容易有所收敛。可是蒲安臣、西华德、葛莱斯东和克勒拉得恩勋爵等人都抱有这样的信念，认为现在的情况不会永久存在下去，如果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首先要求帝国政府担负其本身的治安工作。

时代的精神是属于革新者方面的；但是在批评他们的人中

间，也有不少当代最能干的人在内。其中主要的就是继任蒲安臣的劳文。劳文认为，由于他的政府对他的前任的游说让步，他为本国政府执行职务受到妨碍。他力陈所见，以致他的政府在 1869 年将他召回。劳文公使深信，避免和中国打仗的办法就是要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和它相处；处处对它表示尊重，但要求履行每项条约义务。在年终以前，他的政府就宣布大体上接受了那些使他被召回的意见①。

劳文公使的想法

历史的裁判一定认为，蒲安臣的出使在西方各国的政策上所造成的改变，终于对中国和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是，它的成就在中国统治者的心理上形成了那样一种强烈的反感，并造成了那样一种自以为所见不误的信心，以致延缓了今后几年帝国的进展②。

3. 对传教士的仇视

273

各国平等的原则已经很勉强地为中国所接受了；只有鸦片、外商和传教士依然使中国高级官员困扰不安。1869 年恭亲王向英国公使阿利国爵士声称——"如果把你们的鸦片和传教士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大约同时，文祥对他说——"如果撤销你们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商人和传教士就可以随处安居了；但

外商、传教士和鸦片同样不受中国欢迎

① "你应当向你驻在国的政府清楚说明，总统的既定宗旨就是忠实遵守美国的一切条约义务和尊重中国人民的各种成见和传统，只要他们不干犯美国凭条约所取得的权利。另一方面，你要使中国政府清楚理解，总统也要求中国全部履行它依照同美国所订各项条约或协定而承担的一切诺言和义务。关于这点，以及在充分保持我们现有的各项权利方面，你要始终坚定而果断。"——1869 年 12 月 3 日。费煦致镂斐迪函，见 1870 年《美国外交档案》，第 303 页。1869 年 3 月，格兰特继约翰逊为总统，费煦继西华德为国务卿。

② 蒲安臣所作努力的最重要的直接结果，在于 1869 年英国政府决定非到皇帝于 1872—1873 年达到成年，不着手修订条约——1858 年的英国条约规定在十年期满时进行。其他各国同意了这个决定。实际上直到 1901—1903 年才作了修订。

如果保留它，我们就一定尽量把我们的负担和你们限制在约开口岸。”在这两次谈话中，可以找出中国对传教问题态度的关键所在。传教所以和鸦片相提并论，是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两样都是以外国武力为后盾的外来祸患，彼此半斤八两，它们干扰了各省的正常行政，而接着就造成了混乱。外商，就他们例外的特权而言，也是以武力为后盾的。

厌恶传教士的理由

即使在约开口岸，传教士也不得人心：他批评世俗的、孜孜求利的商人；他传来了关于人权的动摇人心的思想；他抨击不公正的法官的决定和帝国官吏的腐败。这种动摇人心的思想是使大众对于亚洲式的服从和盲目接受权威发生动摇的一种思想。民众也讨厌他的说教：他分裂家庭；他干涉拜祖先的礼节；他把已经深入他们生活中的佛教和道教的仪式说成是邪教，而认为孔子之道不配按照传统的称号称之为圣；他要求他的教徒不再资助本乡和本族的祀典；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外国”宗教，而这个外国宗教，除了那些入教的信徒之外，没有人承认它在任何方面优于中国流行的各种宗教，它似乎要根绝文明。传教士悄悄地工作的后果，当时看不出来；起初，在官吏看来，他是一个多事的人，一个挑拨是非的人，在人民看来，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革新者。

要求居住内地

把传教士的工作限制在约开口岸，就是不给他以当初前来中国所希求的机会。在 1842 到 1860 年这个早期，主要是研究和准备的时期。1860 年和约以后，传教士开始进一步放眼远瞩，寻求对帝国亿万人民传布福音的机会；因此他们要求在内地居住和传教的权利。在 1860 年和法国所订条约的中文本中，添入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但是，既然声明条约完全以法文本为准，所以并未以这一条作为根据

而提出要求。可是，似乎在1865年签订了一项有时被称为柏尔德密条约的法中条约，这项条约给予法国教会或教堂——不是给予传教士本人——以在内地无论何处购买土地和从而执契的权利；这些教会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在内地居住的权利。虽然这项条约从未公布，但在法国、中国和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它（或其引伸语）曾被直接地或间接地引用过。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一般是根据1858年的中英条约要求居住内地的，该条约给予了“在各口并各地方”建筑栈房、礼拜堂和其他建筑物的权利。所有官方人员，不论中国的或外国的，都一致否认这一条款有将这项权利扩展到内地的意思，但商人和传教士却坚持着这种解释。在1903年的中美条约中，第十四条有一段规定如下：“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这里毫未述及传教士本人有在内地居住的权利，大概是因为美国公使在1897年已获得“美国传教士的待遇……将和法国传教士一样”的保证。

1859年对基督教的排斥

在十九世纪的大半个世纪中，一切教派的传教士都是大多数中国官民的憎恶对象，他们总是要制造事端来为难他们或伤害他们。这种情绪在早一时期就表现出来了。1859年10月，在那件规定基督教完全解禁的中美条约换约三个月以后，江西庐陵县知县针对基督教教士和教民发布了一项冗长而恶毒的布告，以死刑和远戍的旧法律来威吓他们。各省官吏把帝国政府的基督教解禁和负责保护基督教教士和教民一节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大多数问题上一样，谋事可能在北京，而成事却在于各省。

275

1868年—1869年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攻击

在1868年5月到1870年1月期间，当蒲安臣正宣称中国已走上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并准备在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

树立光辉的十字架的时候，在中国的基督战士却遭受到一系列的迫害，这给他的动人的词令提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注解。在广东省，由于1867—1869年期间对神甫、信徒和教堂的攻击，罗马天主教会遭到很多苦难。在直隶省献县，一位神甫在1868年2月几乎被捻匪杀死，在5月又几乎被清廷军队打死。钦差大臣崇厚曾发布一项布告，谕令百姓敬重和保护教会和它的育婴堂，但它在1869年5月的一次民变中却遭到劫掠。

在台湾的骚扰

1868年4月，一群暴民捣毁了台湾凤山县的罗马天主教堂和（英国的）耶稣教堂，激起暴动的原因传说是传教士用一种毒药配成秘方给中国人吃，来诓人信教，英国公使要求中国政府"严饬地方官吏主持公道"，但同时认为"必须有一艘英国炮舰在场来支持领事馆的威信"。领事抓着这个机会要求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不平情事。海军则强占了台湾府港口的安平炮台，在此行动中杀死和杀伤中国士兵各二十一名。他们得到了五万元现金作为全部满足他们要求的保证，作为煤和军火消耗的赔偿费，并作为赏金。这些要求遭到英国当局的批驳；但结果所有可被惩办的人都被惩办了，所有可予赔偿的人都得到了赔偿。

1868年8月对扬州教会的袭击

1867年，戴德生创设了"中华内地会"。在第一年当中，在内地的十一个城市里开办了布道所，其中有一个是在沿运河的276扬州。1868年8月，公开用一种正常途径租得一所房屋。传教士立刻遭到了麻烦；各处张贴告白，称他们为"耶稣教强盗"，并指责他们"挖去了垂死的人的眼睛，开设育婴堂来吃儿童，等等"。22日，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暴动，参加的人数估计不下一万人。外国人仅以身免，很多人受伤；他们的什物被抢走，房屋也被烧毁。次日再度发生暴动，但是一切都早已破坏干净了。

证据表明这次袭击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是由一般文人和绅

士煽动起来的；显然是预谋的；中国官方虽然事先闻讯，但并未认真去制止或缓和这次骚动；事后曾试图强迫传教士把大事化小；当局迄未对祸首的行为表示任何谴责。上海的英国领事麦华陀前往镇江去调查这个案件，于是引起当地暴动，威胁当地的中国官吏，不得偏袒外国人。他随后前往扬州，但未能获得补救办法。在北京，阿利国爵士从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各大臣那里得到了补救的诺言。由于未能获得满意解决，麦华陀以四艘兵船为护卫前往南京；他向曾国藩提出了他的最后通牒，并且强夺了恰好为这位总督开到的一艘新汽船。这一着奏效神速。总督本人保证承认领事的各项条件，他认为这些条件是完全合理的。扬州的知府和知县革职，损失的财产按实际价值赔偿，并且在教堂中竖立一块石碑，保证他们不受干扰。

领事麦华陀的解决办法

英国政府宁愿把台湾府和扬州的事件交给中央政府去处理，而不愿动员海军对地方当局施加压力或予以膺惩，使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处理的机会。今后英国海军的积极干涉只有在"突发的紧急事变和即时危害到生命财产"的情况下才可以利用，一旦把问题提交到北京，那么是否需要用海军作为外交压力的后盾，就要取决于本国政府了。

英国政府对使用武力的意见

277

隔江和约开口岸汉口遥遥相对的，就是总督所在的武昌城。1868年10月，传教士在这里的大街上遭到投石袭击，并有危言恫吓的告白张贴出来。英国领事请调一艘炮舰前来。他接到海军当局的通知说无船可调，并奉到公使的训令说，如果传教士不能平安地在武昌进行他们的工作，那么，在没有申请中国当局派兵保护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究竟有多少理由可以为借口来采取战争性质的措施，在约开口岸以外的地方去保护他们，似乎是颇堪怀疑的。克勒拉得恩勋爵的政策声明于1869年2月底到达

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后几年中几乎没有反对英国教会的暴行，而反对在法国保护下的罗马天主教的行为，在次数上和严重性上则都有增加。关于这点很难提出任何论断，可能是中国当局认识到了英国改变政策之后落在他们身上的责任，并且承担了起来。

法国人的罗马天主教会

在四川省的酉阳州，罗马天主教会和人民已摩擦有年，曾引起了一系列的械斗。1865年8月，即建立教会的三个月以后，有一位神甫被杀，在随后几年中，中国当局证实了由于基督教徒的行动，有一百七十三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一百零五所房屋遭焚毁。1869年1月，一位神甫和三十九名信徒被杀，一些教会的建筑被抢掠和烧毁。据主教的声明，这种行动是由于清朝官员和他们周围人物的纵容。在贵州省的遵义府，教会的建筑于1869年6月被劫，一位神甫遭到痛打后于两个月内身死；在次278 年3月，又发生了另外的暴行。恭亲王以主教越权擅自直接行文总理衙门，向法国公使大发怨言。在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和建德这两处地方的教会，于1869年11月3日被抢劫。

1869年6月，法国代办罗淑亚伯爵前往山西省，目的是研究传教的问题。当他在太原府的时候，幸免于被刺。他激于四川和贵州发生的事件，决定亲自前往那两个省份。他在两艘兵船的卫护下，拜会了南京的总督，随后向安庆、九江和汉口进发，于1870年1月到达汉口。在那里他会见了驻武昌的总督李鸿章；伯爵从他那里接到一封紧急文书，对那些问题作了令人满意的解决。可是，在两江总督管辖境内的安庆事件仍在拖延，只在3月间法国兵舰访问该城以后才告解决。

湖南反对基督教的指责

中国人的态度，突出地表现在1869年9月的一个揭帖中，这个揭帖是从始终保守和排外的湖南省传出来，并流传于全国

各地的。揭帖一开头就说到邪教异说日益猖獗，概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随后提出了性质最为严重的十大罪状。

(1) 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既不敬祖也不敬神；教徒还要毁坏他们供奉的祖先神主牌位以表示真诚。(2) 受洗是基本要求，为受洗用的一种药膏，是由教士的尸体做成的；以这种药膏加进一种迷魂药给人服用，使其唱一种魔人咒语。因此信徒受惑极深，虽经严行查禁，仍执迷不悟。(3) 经过这种仪式之后，信教者就丧心病狂，所以他们竟会将他们的祖先牌位摔得粉碎，毁坏一切神像，甚至遇庙即毁。(4)、(5)、(6)：因过于猥亵，无法刊出。(7) 当这个宗教的信奉者临死的时候，他的同教者便要求他的亲属离开屋子，以便为他的灵魂念祈祷文。但是实际上，在他还没有完全断气以前，他们就取出他的眼睛并挖出他的心脏，准备在制造伪币时使用。因为，据他们说，祈祷是保证他永远得救，但是这具尸体只不过是一个臭皮囊。(8) 他们为金钱力量所驱使而变成教徒。穷苦无知的愚人，为了少数的金钱而出卖了他们的灵魂！(9) 这种宗教的宣传者雇用些能说善道的男女讲道人和江湖相士，用花言巧语来诱惑民众。然后把他们带走，卖给卑劣的外国人；有时甚至用他们的身体作为南海捕鱼的投饵。〔对移民罪行的一种比喻。〕(10) 外国商人根据条约要求完全摆脱中国官厅对他们贸易上的管束，而传教士则是这些商匪的间谍。并且据说，这些教匪在山东省破坏了孔庙；但是民众奋起而杀死了一些，把其余的人驱逐出境。呜呼！如果耶稣教义驱除孔子教训，这将成什么世界？让我们每一个人拔剑而起誓复此仇吧。凡拒绝参加共同行动的人，即与暴徒无异。

279

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出于轻信的愚人的无知之作；但是，鉴于文雅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为反对早期的基督教所提出的指责，鉴

轻信——愚蠢但非少见

于再洗礼教派的把罪恶归于所有新教教派，再鉴于奉正教的俄国对于犹太教式的杀害之信以为真，可见这种轻信的愚蠢并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这尽管是愚蠢的，却是严重的。除极少数教徒阶层之外，很少有人会对基督教运动所提出的污蔑指责的实质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基督教所固有的纯洁性，在许多互相竞争的教派之间这种以个人私德为基本条件的共同信仰，与那些败坏生灵、买通信教、伤风败俗的神甫和修女、杀害孤儿用他们的眼睛和心脏来配制有奇效的西药等谣传之类的流言蜚语相对照，犹如大树之于封蚁，是不为所撼的。局势已危机四伏，一个可怕的爆发——为一系列的对外国教会的打击酝酿一个高潮——似乎是迫在眉睫了。

280

4. 天津的屠杀

法国人在天津为人痛恨

在运河、白河和海河的会合点，以前曾经有一排建筑物，一部分是庙宇一部分是皇宫，贴对着天津城，并占有曾经三度修建和两度被毁的天主教大教堂的现址。1858年，英国和法国的大使在这里设立过谈判条约的总部。从1860到1863年，天津曾被联军占领。尽人皆知，法国人留下了很坏的名声。1860年，望海楼皇宫为法国人占领，被用作领事馆直到1870年以后。在中国人视为具有皇宫和庙宇这双重神圣意义的庙宇原址上，他们建立了罗马天主教大教堂，于1869年6月建筑完工。若说法国人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为人所一体痛恨，是并不过分的。

仁慈堂修女危险的慈善行为

在天津这种反法偏见的温床中，反基督教的敌意行动势必格外活跃；这种敌意行动，由于仁慈堂为把那些穷人的弃婴和孤儿从一个忽视本身责任的国家里所不可避免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而作的种种仁慈的和善意的努力，更为变本加厉。在天津委托他们照料的孩童数目很少，所以凡有孩童送去，修女都发给奖金；一般相信，这种奖金对于当时中国人诱拐孩童送往育婴堂起了鼓励作用。还有这样的说法，显然也是真的，即神甫或修女们，或两者都惯于用引诱方法，使病已垂危的孩童交给他们，给孩子受洗。由于这种作法，大家渐渐相信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孩童在垂危的情况下送到育婴堂，当即受洗，受洗之后不久死亡，于是就葬在育婴堂的私有墓地——教坟。

拐骗的谣言

在1870年5月中旬以前，从流传的什么有儿童失踪、由传教士买通的人拐带而去的谣言之中，已经露出了要出事的苗头。问题由于一场瘟疫而更加恶化，瘟疫在6月上旬传到孤儿院，造成了三、四十个儿童的死亡，他们的尸体都被每天侵掠教坟的成百人一群的中国人挖去。这就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怒，于是搜查拐带也更趋活跃。6月6日和稍后的时期，有四个人被逮捕、审讯，没有经过多少手续就被判处死刑；18日，另外一个人被逮捕和送审，在严刑拷打之下，自然承认他和大教堂的管事人——中国人——有关系，他拐来的孩童就是卖给他的。

281

认为神甫和修女犯有罪行的想法遍及于社会上的各个阶层。绅士们也显然抱着这种想法。县官（地方长官）和知府（县官的上司）在一个恶名昭彰的将军陈国瑞的支持之下，向北方钦差大臣[按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陈述修女们的罪状，并且要求讯办。这位钦差大臣断言她们无罪，但最后准予进行审讯。在这次审讯中，暴民把持一切，谣言代替了证据，据称事实都得到了实证。

282

法国领事和中国官员之间的纷争

6月19日，道台把案件移送给领事，领事转弯抹角地表示该案是以伪造的证据为基础的；可是，道台报称领事已同意

采取一切适当的和必要的步骤。当时县官则扬言并坚持所控属实。接着是一场忿激的讨论。县官要求对教会和育婴堂由官方作一次直接调查;因为他以民众的愤慨来威胁领事，于是领事中止了这次讨论，宣称他只愿和钦差大臣谈判，但是他认为县官应对风潮的后果负责，因为他相信县官本人就是风潮的煽动者。崇厚本人于6月20日访问领事，同他和谢福音神甫充分地和公正地讨论了这种局势;然后同意对于教会房屋和育婴堂作一次检查。6月21日上午十点钟，道台、知府和县官以官员身分，带同牵连到大教堂管事的证人前往大教堂;在那里，他的口证当场逐件被否定了。在这以后，双方同意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教会的育婴堂和学校应永久置于一个委员会监督之下。

风潮现在似乎可以平静下去了,钦差大臣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着手起草一项布告,当时据他向总理衙门报告,"忽闻教堂之人,与观看之众闲人口角相争,抛砖殴打。当派武弁前往弹压。适丰大业来署,当即接见。看其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站一外国人(领事馆的书记官西门)手执利刃,飞奔前来,283 未及进室,一见即口出不逊。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经人拉住,奴才未便与之相持,暂时退避。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奴才复又出见,好言告以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该领事奋不顾身〔云我不畏中国百姓〕,遂盛气而去。奴才恐致滋事,当派弁随同护送。讵意该领事路遇天津县(刘杰),自该堂弹压而回。该领事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群殴毙命。〔传锣聚集各处民人〕,将该教堂焚毁。并将东门外之仁慈堂焚

烧，别处讲书堂亦有拆毁之处。”①

这次风波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抢劫已臻于最高潮。圣温辛特保罗的修女会所属育婴堂、教会房屋、大教堂以及法国领事馆都被抢劫和焚毁了；英美两国的四座礼拜堂也都遭到抢劫和破坏。所有能逮住的法国男人和妇女都被杀死，还由暴民想出各种恶毒主意加以凌辱和虐待。这次攻击是专门对法国人的。牺牲者包括十名修女、两名神甫、丰大业、西门和另外四名法国男人与妇女、两名俄国人和其中一人的妻子，以及教会或育婴堂所雇用的三四十名中国人。

1870年6月21日的屠杀

在这次屠杀后的几个月当中，帝国境内到处骚然。这种情况可以从芝罘、南京②、山东的登州、镇江、江西的吴城和抚州、广州和上海各处教会礼拜堂的被破坏表现出来。

中国局势不稳

在华的外国人普遍感到惊慌。商业团体自己武装起来并巡逻租界，以表示他们已有准备。外国人生命无保障之感也很普遍，报复的呼声已声闻远近了。

外人叫嚣报复

284

商人和传教士感到惊慌是当然的，但缺乏合理的推断；他们并未考虑到实际的责任或任何个人所能阻止其爆发的力量。关于丰大业的惹事生非，大家意见一致。对他的性格的一般看法，认为他是性急和易于动火的，他的性情可以说向来是乖戾的。对于中国官员应负的责任，外国方面持论甚苛。很少或毫未考虑到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处境的困难和危险。主要的攻击是对天津的官员而发的。这里的首要官员是北方各省负责通商——和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崇厚。他是一个官阶很高的

中国官员的责任

① 录自《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2卷，第23—24页。——译者

② 8月24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他的衙门内被人刺死。这是由于他曾于上年冬，在安庆制止暴行和在南京镇压图谋未遂的反基督教暴动的原故。但必须注意，在南京的湘军对曾国藩的调职感到愤慨。9月，曾国藩又第三次奉调回南京。

满州人，名声很好。丰大业曾对他有过良好的印象。这位法国领事在死前数小时写道，崇厚的态度是这样的，他的本国人民称他为洋人的工具，并且还说崇厚向他发过牢骚，地方当局对他的意见很少考虑。崇厚的职位是一个有影响和有威望的职位，但没有实权；他能够拿出朝廷的权威，却不能撤换一个警察。这种权力是授予县官和知府的。所以普遍要求惩办他们，在这种要求中，崇厚被列为罪魁。

外国公使的共同抗议照会

外国公使认为所有外国的利益和外国人的生命都陷于危险境地。他们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一项共同照会，宣称外国人没有得到地方当局的充分保护，并且忠告中国政府说，明告各国，事必公平处断、人命必受保护，乃是不可少的。

帝国政府发出了一道谕旨，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彻查和惩凶。据称，崇厚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

285

责；但承认道台、知府和知县的过失。另外又发出一道谕旨，任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7月23日，发出一道谕旨公布曾国藩和崇厚联名奏报的调查结果，在这封奏折中，为育婴堂洗刷得干干净净，同时说明民众是受张贴在帝国其他各地的仇教告白的迷惑。

法国代办罗淑亚伯爵于7月19日到达天津，不久和法国的海军司令会合。一个月以后，在天津和芝罘开到了法国、美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军舰。8月7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地方法官将已被革职的天津府和天津县在天津进行审讯。罗淑亚伯爵于8月4日从来自伦敦的一封电报中，接到了同德国爆发了战争的消息。一时将有某种危险会危及这个问题的解决；可是，通过美国政府的斡旋，商定了在中国海上的敌对国家的武力必须合作，以便保护一切外人的利益。

法国的赔偿要求

西方国家一般都训令它们的驻北京公使支持法国代表；但是他们却给法国的要求吓住了。罗淑亚伯爵要求将两个地方官和陈国瑞斩首以示惩罚。他声明如果不立即按罪判刑，他觉得他自己得自由地从北京撤退他的使馆和法国侨民，把全部问题提交海军司令，海军司令将会采取他所认为必要的行动。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应当以武力为后盾的，否则就不应当提出了；但法国所处的局势吸引了法国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而海军当局没有明白的训令也不能采取行动。李鸿章[1]在大批军队的护卫下，于 9 月 18 日到达天津；四天之后，恭亲王通知外国公使说，将府、县处决依法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将被终生充军到边疆；他另外提议将十五名暴动者斩首和其他二十五人充军。斩首的人数随后增加到二十个。普鲁士、英国、俄国和美国的代表送出了一项联合照会，声称这个决定无法令人满意。可是，中国政府持强硬态度，并将这个解决办法列进了 10 月份的两道谕旨中[2]。

286

崇厚的出使谢罪

崇厚充任谢罪专使，于 10 月动身到法国。1871 年 11 月，梯也尔总统在凡尔赛宫接见了他。于是他呈递了他所持的亲笔信，并且声明正式谢罪。

中国企图管理基督教工作

中国的大臣们感到危险依旧潜伏在传教问题中，并于 1871 年夏季向各国公使提出了一项传观的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中谋求管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以及控制他们所认为传教

① 李鸿章继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他在天津牢固地确立他的地位达二十五年之久。

② 因为杀人罪，有二十名华人被处以斩首的死刑；因为抢劫和伤人罪，六人被处以十年的充军，二十五人被处以三年的充军。在二十名判处死刑的名单中，十六名由于杀死法国侨民而定罪，当即于天津伏法。四名由于涉及杀死俄国人而定罪；俄国公使拒绝认可他们的罪状是经过证实的，只有罪状经完全证实的两名后来处决了。此外，一笔二十五万两的款项作为赔偿费，十二万两作为对杀死的非教会人员的赔偿，十三万两作为对大教堂的赔偿。

士的无节制的热情的办法。这个备忘录证明为各国所不能接受，因此中国的好意被打消了。

5. 同治成年、接见外使及其逝世

中国不情愿作任何改革

在蒲安臣出使之后，可以渐渐看清，中国已不再轻易接受外国代表的意见了。外国公使们的希望集中在皇帝的将成年上。他们满怀信心地指望他们会终于作为平等友好国家的代表而被允许觐见。

同治大婚

1872年4月30日，同治皇帝达到了十六岁这个成年的年龄，选后已经有了必要。皇太后选择了满人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作为皇后，其他三个淑女，两位满洲人和一位蒙古人，则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妃子。婚礼定于10月15—16日举行。两天以前，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其中之一就是皇后的叔父、最近才从出使法国回来的崇厚）亲自拜访各国公使，宣布即将到来的大事，并要求他们和他们的侨民届时不要外出。要求虽然答应了，但感到很恼怒。

287

藐视外国使臣

外国使臣要求觐见

皇帝已定于1873年2月23日亲政，直接统治帝国。在那天，停在中国口岸的船只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每一个桅杆梢上都装点上龙旗那种船旗；第二天，俄国、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送出了一项联合照会，要求觐见。文祥很不凑巧地生病了，于是在3月初又送出了第二件照会。4月，荷兰使节和日本使节先后到达。日本使臣副岛伯爵，是外务卿兼特派大使；他奉派呈递一个几百年来一直被中国君主视为藩属的国家的元首的贺函，并交换凭以使日本撤出藩属之列的那件在1871年9月签订的条约的批准书。副岛伯爵另外还奉命提出台湾问题。当他路过天津时，曾同李鸿章总督举行会谈，李氏已经开始发挥此后二

十五年中他在中国国际关系上所发挥的卓越影响了。李氏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建议，加上这位特派大使的崇高的官阶，消除了所有的困难；最后，对他和西方各国的代表，终于准予觐见。

6月14日的一道谕旨说："据总理衙门奏称，各国驻①京使臣②殷切恳求③觐见，以便呈递国书。兹准驻京各国使臣欲呈递国书者，准予觐见。"中国大臣们极端审慎地拟出了一项草案，周密地规定了程序的每一步骤，并经各国公使同意——在朝廷官员的指点下实行预演。 288

举行首次觐见

在6月29日星期天的早晨，各国公使于五点半钟的时候在"北堂"教堂会合，上午六时由崇厚引导前往皇城的福华门，他们在那里由文祥接待。在这里他们被款待以茶点，一直到八点半钟，他们又被引到一个行幄中，恭亲王在那里接见了他们。在九点钟的时候，皇帝在紫光阁升上他的宝座。当时作为唯一的特派大使的日本副岛首先单独被接见。然后全权公使和代办们按照他们到达北京的日期的先后为次序，一同进入——倭良嘎哩（俄国）、镂斐迪（美国）、威妥玛（英国）、热福理（法国）和费果荪（荷兰）。他们由作为翻译的俾士麦陪伴着，俾士麦所以膺选，是因为他是使馆中资格最老的翻译官，并且作为暂时缺席的德国公使的代表。倭良嘎哩将军作为外交团的团长致贺词，随后每位公使依次把他的国书呈递在皇帝面前的案上。皇帝通过恭亲王的口，对使臣们所代表的元首表达了他的亲睦之谊；联合觐见至此即告完成。随后，法国公使作了一次特别觐见，以呈递法国

① "驻"是指旅行者和邮差经过的驿站而言。

② 作为"特使和全权公使"的同义语而被使用的专门名词是"钦差大臣"。事实上所用的"使节"一词的译名是"使臣"，也就是用于从朝鲜、琉球等其他进贡国家前来的贡使的名称。

③ 在中国人的礼节上，这是上奏者用来表示他的谦卑的语词。

政府对两年前崇厚所呈递的书信的复文。全部进程在半小时内完成了。

一般的感觉是不满意的。只有日本代表有他自己满意的理由;他不但被准予觐见,而且为了特殊的理由给他一种破格的地位。对其他各国代表来说,情况并不那么令人满意。紫光阁是紫禁城外的一个阁,朝贡国家的使臣照例都在这里觐见。而步行前往的外国公使们,也在那里被召见;在 1894 年日本战胜以前,一切觐见都是单单在这样一个殿里进行的。西方各国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局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朝廷肯定地相信,它在世界各国的朝廷中还处于优越的地位。

289

同治之死

同治皇帝于 1874 年 12 月染上了天花,到 1875 年 1 月 12 日,一道懿旨以他们的圣上已经"龙驭上宾"昭告天下。

光绪皇帝的承选

在中国的君主政体中,在满州及以前的朝代之下都是一样,对于先皇的在天之灵表示应有的敬意是君主的首要责任。这只能由儿孙来做,或者由一个合格的过继儿孙来做。皇帝死后,两位前任摄政立刻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慈禧太后取得了领导权。她不顾先例,竟提出了道光的孙儿、和同治同辈的载湉。载湉不能过继为同治之子。但是他被宣布膺选了。随即降下一道懿旨,宣称载湉继咸丰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新皇帝有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为嗣。新君的年号采用光绪——光辉的永续。

新皇的父亲是醇亲王,在皇室中是慈禧太后最可靠的附和者;新皇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光绪的即位,使慈禧重复掌权达十四年。尽管她有一切的过失,尽管她是出名地不顾一切伦理上、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她却不失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她的再度摄政,使这个帝国得到她和李鸿章总督的精明的施政的裨益。

第十六章　日本的重新开放

290

1.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日本势力在远东国际关系上的发展以及日本的自居领导地位而任命大使参加 1873 年北京的觐见，使我们不能不再转而谈论一下这个国家。两个世纪 (1640—1853 年) 以来，从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历史实际上是一段空白；在锁国的城墙上只留有一个小小的窗口 ——出岛，荷兰人含垢忍辱地住在那里进行一种受严格限制的贸易。甚至中国人也只许进行极小量的贸易①。

日本国际关系的新面目

荷兰人在出岛

有些历史家一直抱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这段长时期的强制锁国并没有使日本蒙受什么损害。固然经过五百年的连年战乱之后，日本在德川氏的统治下，承平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这个国家却被整个切断了一切知识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尽管日本凭靠强有力的政府和一个战略上的地理位置而安享承平，但是它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却两蒙其害。例如，在 1690 和 1840 年之间，这个自给的国家遭受到了不下二十二次饥馑，其中半数是极端严重的。近在咫尺的朝鲜、中国和暹罗有取之不尽的稻米，然而他们却只能望洋兴叹。在这期间有过十次大地震，死亡达四万余人。在国家遭到浩劫的时候，象 1923 年那样博施广济的援助，是丝毫得不到的。西方世界在物质和精神的

锁国的利弊

292

① 1684 年以前，每年驶至长崎的船舶约有七十艘；此后，直至 1740 年，只准二十艘；1740 年以后，则仅十艘。

发展上正取得惊人的进步，一国人民在学习和经验方面如有所得，就传播给邻近各国人民。但日本却得不到什么裨益。日本的一家著名报纸将日本近代进步领袖人物对德川政权所持的批评态度作了一个总结，它在1921年时说："二百五十年来，欧洲各国正开拓殖民地，略取领土之不暇，日本人却在家里沉入梦乡。我们不准迈出国门一步。我们不准建造大船。我们被迫守在家里，把精力浪费在吟诗和茶道这类的消遣上。德川氏的锁国政策虽则使那个政府能够保持安全与繁荣达二百五十年之久，然而在那段期间却阻碍了人民向海外的扩张，结果则是我们今天身受其苦的人口过剩和种族歧视。……我们正在为德川政权的繁荣付出代价。"

现代人物对锁国政策的一种批评

日本的双层政府：天皇

在王政复古运动之前，天皇望之似神圣不可侵犯地幽处于京都，而实权却掌握在将军手里。当1853年潘理海军准将抵达日本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国家仍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社会分成三个阶层：天皇和公卿，也就是由天皇左右的一百五十家所构成的京都宫廷贵族；武士阶级，其中有为数约三百家的大名或藩主和为数约四十万家的侍从或家臣；在这两个阶级的下面则是包括农民、手工艺者、商人和贸易商在内的庶民。在社会阶层以外和以下的是秽多和非人——这是两个最下层阶级：前者以屠宰、制革和其他污秽的职业为业；后者则是最低等的乞丐、刽子手和埋葬罪犯尸首的人们。

幕府

武士阶级是以将军、也就是征夷大将军为首的；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他的僚属都个个官居要津。将军的政府通常称作幕府。武士阶级的道德律叫作武士道，是以刚毅和豪侠为基础的。武士道的主要德行就是忠道，必要时须牺牲身家性命和真理来予以维护，但是孝道也是有密切关联的。武士一度效忠于自己的

293

藩主，后来则效忠于天皇本人，忠道在王政复古以来日本的对外关系上一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日本和中国的对比

至于士大夫和武士在中日两国所起的作用，则只需就两国之间明显的差别简单地提一下就够了。在日本，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藩阀精神至今不衰，而在中国，则于公元之初，东汉建国时已成过去。在那个时候，由科举取士以选官授职之法，已经立为定制。当中国认识到勉强靠了从士、农、商中选拔出来充任的一个民政官僚机构实无法和军事基础上的欧洲列强相抗衡的时候，相反地，日本却能因利乘便，以它本身的军事经验，再加上西方的陆海军科学，转而保护它自己并向海外扩张。

德川政府的弱点

尽管社会基础是封建的，举国上下都是为武士服务而存在的，武士却没有为之而奋斗的伟大事业，因而渐渐失去了大部分力量，沉溺于奢靡和恶习。赋税是既不均等又不公平；德川氏都不善理财，他们支出的方法是浪费的。贪赃枉法在官吏之间几乎是普遍的风气；政府财政之紊乱，严重到了大有全国破产之虞。其他因素姑且不论，单单幕府本身的内部弱点，加之西部强藩的日益增长的嫉忌和力量，就足以酿成一系列的内战而有余，一如十七世纪之初家康统一全国以前的局面。从这样一次斗争之中，未始不会出现另一个幕府。但是局势之中却掺杂进来另一个因素：即一批批新来到日本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确乎是十九世纪中叶局势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

2. 1853年以前打开海禁的尝试

西方车船和武器的改进

当日本的统治者禁止他们的臣民建造海船，境内的承平无需武器的发明时，欧洲和北美的人民却一直逐步地改进渡海的

方法和供陆地及海洋上使用的武器。结果是，日本虽处于一种294军事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在进行攻守战事的能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要来进攻，日本只有听其为所欲为。只是由于欧洲各国常常彼此攻伐，中国又是多少年来一直扮演着阿塔兰塔的金苹果的角色，日本才得长期幸免沦入狼狈之境。

德川吉宗

虽则1853年潘理海军准将到达东京湾是一个剧烈而重要的震动，可是并非完全事出意外，日本本身对于海外的情形也并非一无所知。他们早已从荷兰人、中国人和俄国人方面得到了一些消息。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吉宗(1717—1744年)是一个胸襟开阔、奖励学术的人。他废止了家康禁止欧洲书籍进口的谕令：此后只有关于基督教的书籍才在禁止之列。这时少数日本学者已经有机会通过荷兰人学习一点外国文化了。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点点关于日本的知识，大部分也是来自荷兰人的。

通往远东的海陆路线

当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由海道渐渐进至远东的时候，俄国人则由陆路而来。日本和朝鲜正位于俄国赴东方的通路上，一如前者为美国的必经之路。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俄国人曾经到过萨哈林岛、虾夷岛、千岛群岛及其附近洋面。当时，日本对于北方各岛的控制是很薄弱的。虾夷岛被俄国人划为宜于殖民的地区，日本官员得知北方各岛已陷于势将成为俄国领土而不复为日本所有的危险之中，深为吃惊。1792年，喀德邻女皇派拉克斯曼海军上尉将几名罹难的日本水手护送回国，试图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拉克斯曼一无成就而还。这时295由江户(东京)派出一批委员前往乌鲁普岛，他们把俄国人在那里立的界标一齐移掉。八年之后，幕府派了一个远征队去勘查北方各岛。

就潜势而论，在远东和太平洋史上最具有重要性的俄国人之一，就是尼古拉·彼特罗维奇·德·列扎诺夫。1804年，他担任俄国第一任赴日特使。他的目的是要宣扬国威于全世界，试求从日本取得让与权的尝试只不过是他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他曾劝请沙皇保罗颁给俄美公司以特许状，按照原计划他是要使它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争短长的。这个公司将领有纬度五十五度以北的美洲西海岸以及堪察加以北和南至日本的各岛，以二十年为期。设若列扎诺夫不是从加利福尼亚返俄时死于西伯利亚，他的计划对于俄国、中国、日本和北美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他并没有能同日本商订一项条约，但他使日本人认真地考虑到来自北方的危机和现代的事物。他主张将日本人逐出萨哈林岛，而日本则早于1799年就对萨哈林同虾夷岛一起作过正式的权利主张；1806年，俄国人侵入了萨哈林，俘虏了几名日本兵，并且袭击了这个北方岛群的其他各岛，直到两年之后，日本人才发现萨哈林是一个岛屿而不是半岛。五年之后，俄国单桅帆船"狄亚纳"号试图勘察虾夷岛海岸和千岛群岛。日本人粗暴地加以阻挠，逮捕了戈洛夫宁船长和其他几名军官，囚禁达数年之久；有些日本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俄语。在1811和1814年之间，其他俄国船只仍继续驶至北方各岛。穆拉维约夫伯爵直接指导1849年在萨哈林进行的勘查工作，并且在杜伊港建立了一个俄国居留区。

列扎诺夫

萨哈林

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在日本引起了反应。在战争期间，出岛的荷兰人居留区一度是全世界唯一仍有荷兰国旗继续飘扬的地方。1808年英国兵船"斐敦"号驶入长崎港，搜寻荷兰商船。1813年，新加坡的斯丹福·拉弗尔斯爵士试图开辟对日通商未果。1845年，英国巡洋帆舰"三宝珑"号驶入长崎，四年之后，一

拿破仑战争在日本的反应

296

艘英国测量船在进行测量时，曾分访浦贺和下田。

林子平氏

由于缺乏研读荷兰文的教课书，将军吉宗的胸襟开阔的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然而渗入日本的那点关于西方的知识，连同对俄国和英国侵略的畏惧心，刺激了某些日本人去研习和传布外国学识①。1792年，曾经在出岛研习荷兰文的林子平氏出版了《海国兵谈》一书，在这本书里他竭力主张建造远洋船舶，建设沿海防务；结果本人被监禁，书的刻版也被销毁，然而，他的思想却局部地见诸实行。1838年，渡边崋山和高野长英在他们所写的书中，力倡日本以参加对欧国际关系为得计之说。他们也被捕下狱，高野自杀；几年以后，这两个人死后都受到了尊敬。一些关于医学、解剖学、历史、文学、地理和其他科目的书籍，使一些人相信了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价值。但是，幕府依旧是绝对保守的，它把拿破仑时代外来压迫的大体消除解释为危险已成过去的迹象，因而在1825年颁布了一道命令，饬对一切驶入沿海炮台射程以内的外国船发炮攻击。这道命令在1842年放宽了尺度，准以淡水和食物供给被暴风漂逐到沿海的船只；但船舶须立即开行。

美国的兴起和它的西进

在日本锁国期间，美国的建国和成长，事实上是日本政府所不知道，也是它漠不关心的。随着加利福尼亚的加入联邦，美国对于兴建横贯大陆的铁路，兴趣大为浓厚；东方各国人民被看作美国制造品——特别是棉织品——的潜在消费者。蒸汽之应用于远洋船舶，正处于勃兴时期，泛太平洋航线上非有加煤站不可这一事实使人们注意到了日本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日本蕴煤量甚丰，又是去中国的必经之路。最后，由于罹难的美国捕鲸船和水手在日本的待遇问题，就令人更加认为应达成一项谅解，以

297

① 即日本所谓的兰学。——译者

期使这类不幸者免遭不测。

早在1791年，“华盛顿夫人”号和“天恩”号这两艘美国船就满载皮货，在去广州的途中试图和日本通商而未果。在下一个世纪的初期，有几艘美国船曾经到过长崎，但是否悬挂美国旗进口，尚属疑问。1832和1835年，美国派赴暹罗和马斯喀特的专使埃德蒙·罗伯茨曾备有致日本的国书，但并未前往。1837年，奥利芬特公司的查理·金曾作过一次私人的试销工作。这时澳门有七名罹难的日本水手，于是决定派公司船“马礼逊”号试图将这几个人送还，并商请日本开放海禁，准许传教通商。“马礼逊”号在浦贺和鹿儿岛遭到炮击，没有将日本人送上岸就离去了。加雷布·顾盛建议颁给他一份授权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证书；证书在1844年颁发，但是没有及时递到。两年之后，皮德尔海军准将率船两艘抵达江户湾。日本人拒绝开埠通商和订立条约，海军准将本人还受到了凌辱。同年，法国海军上将塞西尔到达日本，同样一无所获。

早期美日关系

3. 潘理海军准将和第一批条约的签订

1853年7月8日，潘理海军准将率兵船四艘——旗舰“萨斯奎哈纳”号，另“密西西比”号、“萨拉托加”号和“普利茅斯”号——碇泊于浦贺港附近的江户湾。他的到达并不是因为事出意外而更加不受欢迎，前一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曾经将美国政府的计划通知日本，并且他自己也曾试图劝请日人签订一项条约。日本人对于中国东部发生的一切情形以及前几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也不是一无所知。这桩事虽已先有所闻，但并未预作任何攻守的准备，以致潘理率同所部“黑船”（为将军的都城附近出现的第一批汽船）一到，日本朝野一致惊惶失措。

潘理海军准将的到达

298

孝明天皇和幕府

在潘理到达时，德川幕府的第十二代将军家庆(1837—1853年)正在江户当政。在京都的天皇是孝明(1847—1867年)。在他继位后不久，幕府就奉到通知，饬继续实行传统外交政策，并饬于一切有关外交政策事宜未作最后决定之前，先送呈京都请示。家庆是顺从这项饬令的。

潘理远征的目的

潘理的目的有三：(1)取得对罹难美国人生命财产的保护；(2)开辟一两处口岸对外通商；(3)取得购办供应品的权利，尤其是购办煤的权利。日方应被通知，"总统甚愿与天皇和平友好相处"，但"除非日本改变它的政策，不再视美国人民若仇雠，否则两国的友谊绝不能久长"。如果理论无济于事，则潘理应"改变他的口气，以最斩钉截铁的语句告诉他们说，美国决心要坚持的是，今后凡在日本沿海罹难或被暴风漂逐到日本港内的公民和船舶，在被迫居留该地期间，必须予以人道的待遇；如果今后无论日本政府或居民对美国人民有任何残虐行为，他们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潘理准将的平等主义思想

说服这位海军准将前往长崎或通过荷兰商人来进行交涉的种种努力，都归于失败了。美国人对北京和广州的关系记忆犹新，对荷兰人在长崎的处境也深知其详。当如何接受菲尔莫尔总统的文书问题正在讨论的时候，潘理就下令船只开始测量江户湾，并且声言，如果日方不接受文书或置之不复，他将认为是对美国的侮辱，"而对一切后果概不负责"。虽则态度友好，他却威仪自持，拒绝同官阶低于他本人的任何官吏相交接。在同中国人的交往中所吸取的教训，现在应用到对日本的谈判上面了。在他到达六天之后，他偕同他的官员，并在大约三百名武装陆战队和水手的护送下，在距离浦贺数哩远近的久里滨地方上岸。将军的两位最高级官吏奉派来接受总统致天皇的文书。7月17

日，潘理乘轮船而去，约定于翌年率领更多的船舰转来领取回文。

几个星期之后，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到达长崎，要求发展俄日两国间进一步的友好关系，厘定萨哈林岛的边界和开放海口。

普提雅廷伯爵的到达长崎

这时幕府决定召开一次藩主会议，来为这个令人头痛的对外关系问题制定对策。大多数大名都反对立约，理由是：外国人正前来日本侦察各地情形，日本会象印度和中国一样地受对外交往的无穷之累；外国人以进口的奢侈品换取现正源源外流的贵金属，所以对外贸易是有害的。在另一方面，产根的伊井直弼(通称为伊井扫部头)以及其他几个政治家则一致认为日本继续锁国已经不再可能，国家毫无防御，已陷于危险之中。美国的要求不妨允准；国家不应轻启戎衅；在这期间，由于对外交往的关系，可以研究海军建造术，建立海军，以固海防。在政策上没有取得任何明确的决定，但是战时国防计划则已立即着手进行。他们要求荷兰人输入有用的书籍，准许建造远洋船舶，赶速布置海防，并以寺院的大钟熔铸大炮。

幕府召集藩主会议

伊井扫部头

撤离日本之后，潘理即径往琉球群岛洽商煤的供应。三个月之后，称为贝利群岛的小笠原群岛的一部分，以美国的名义被占领①。在中国，正竭全力助清廷抗击太平军的汉符里·马沙利委员，曾试图请潘理海军准将助一臂之力。潘理拒绝改变自己的计划，在香港和澳门度过了这个冬季。

潘理的访问中国 300

1853 年下半年，战云密布，克里米亚战争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这时俄美颇有修好之意——美国人正怀疑英国对远东方

建议俄美合作

① 1873 年以后，美英两国放弃了对小笠原群岛的一切权利主张，此后在政治上一直视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

面心怀叵测——因而在1853年11月，普提雅廷伯爵以所部舰队"彼此合作"的建议，就商于潘理海军准将；对于这项建议，潘理不能同意。他以为法国舰队似乎会偕同俄国舰队一道去访问日本，于是匆匆折回，在1854年2月中旬率领一支扩充了的舰队抵达江户湾。双方最后同意以神奈川这个村落作为谈判条约的地点。

潘理准将的政策

在潘理两次访日的间隔期间，将军家庆已去世，这时继他而统治日本的是家定(1853—1858年)。幕府已决定采取妥协政策，尽管意见分歧，谈判却友好而庄严地进行。3月31日条约签字，以英文和日文为正本，并附有荷兰文和中文的译本。"潘理海军准将的政策比条约条款中所表现的要广泛得多，且更具侵略性"，丹涅特这样说①。和顾盛在澳门的使节团相比，"潘理远征团，整个讲来，在政策上标志出了一些新的内容。顾盛专心致力于保护美国在华的商务利益；潘理则认为他是正在替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上的商业帝国奠定基础。的确，不仅以官方的地位来观察商业问题，而且以这种地位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的，在美国人当中潘理似乎还是第一人"。

潘理所订的条约

301

事实上在横滨签字的这项神奈川条约，计分十二条：第一条规定和平友好；第二条承允立即开放下田口岸对美船通商，一年之后开放函馆，并供应美船以必需的粮食；第三条应允救助罹难人员，其一切费用，无须归还；第四条订明美国人得在日本自由行动，一如在其他各国之例，但应受公正法律的管辖；第五条保证美国人在下田和函馆的自由，不受加诸长崎的荷兰人和中国人的各种限制；第六、七、八各条缜密地规定了商业事项；第九

① 参阅丹涅特前引书，第270页(中译本，第234页)。

条列进了最惠国条款；第十条限制美国船舶除非在不得已时，不得驶至上述两口岸以外的其他港口；第十一条订明，如两国中任何一国认为为管理旅居日本的美国人而有此必要时，美国得于一年半之后斟酌情形，派遣官员驻扎下田；第十二条规定于一年半之内交换批准书。

望厦条约和神奈川条约相比较

与望厦条约作比较，神奈川条约实无足称道。作为贸易据点来说，下田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这个港口并不象潘理设想的那样好，出入极为不便。函馆也距离通商大道很远。对于美国人永久侨居通商口岸一节并无规定，贸易章程非常严格。对采购煤炭，约中并未载有任何圆满办法。虽然条约中确已列进一项重要的规定，但又遗漏了另一项：最惠国条款是列明的，但外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却故意予以删除。其所以一则载明，一则删除，乃是由于代表团首席翻译官卫三畏博士主张的缘故。关于这项条约，有两点须牢牢记住：第一，潘理准将把它仅仅视为贯彻广泛的太平洋和远东计划的第一步，并充分地认识到尚须商订其他条约。第二，潘理已经作到了荷兰人和俄国人——以及日本自由主义者自己——所未能作的事：没有经过战争或屈从，甚至没有引起普遍的敌意，他就成功地使日本废弃了禁止自由国际关系的二百多年的成法。

302
史透林条约

1854年9月，英国海军上将詹姆士·史透林爵士率船舰四艘碇泊于长崎港。他提到英国人和俄国人可能不久就在日本海面发生战事，并且要求立约。1854年10月双方签订了一项条约，内容虽与潘理条约相似，但没有那样广泛。长崎和函馆两口一律对英船开放，任便在岸上修理船舶，购办给养。条约中不但载有最惠国条款，而且以下述规定列进了领事裁判权的雏形：虽则“英国船舶在日本各口须遵守日本法律”，但“低级人员犯法

应交由英船司令官惩处”。这最后一条，无异是潘理条约的一项补充规定。

约普提雅廷伯爵第四次访日

12月，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第四次到达日本。他这次的访问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既是1855年2月7日俄日条约的张本，也是日本现代海军奠基的嚆矢。当普提雅廷到达下田时，他只有“狄亚纳”号这一艘船。这艘战舰在12月23日被地震和海啸损害得如此惨重，以致不久之后就浸水沉没。船员无法回到西伯利亚，所以他们开始在日本造船工人的协助下，建造了两艘纵帆船。这些日本造船工人从欧洲的造船术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后来都成为横须贺海军造船厂的核心分子。

对日订约

根据普提雅廷伯爵最后所能商订的条约和解释条款，下田、函馆和长崎各口开放对俄船通商。通过日本官员的媒介，贸易可以在上述的前两个口岸进行，并可指派一名领事驻扎在这三个口岸中的一处。俄日两国在千岛群岛上的边界经予划定，但在萨哈林岛上的边界并未厘清。条约中载有最惠国条款，且在下述条款中对领事裁判权原则①作了完全的承认：任何人犯法均可加以逮捕，惟须依照其本国法律予以审讯。

303

荷兰条约

在最屈辱的条件下在长崎进行贸易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荷兰人，比其他任何欧洲人都更急于要商订条约，以改善他们的地位。1855年11月9日，草约签字，1856年1月30日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些协议，旧的章程废除了，荷兰人得到了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

---

① 早在1613年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上就可以看到领事裁判权的原则。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家康颁给东印度公司“丁香”号船英籍船长沙里斯的特许状中载有下述规定：“如有英国人犯罪，应由该英国将军斟酌犯罪轻重，予以惩处。”

4. 汤森德·哈里斯和商约

1854年—1856年日本所订各约的意义

1854—1856年的日美、日英、日俄和日荷条约是日本和西方各国订交的友好条约，而不是日本对世界各国自由开放通商的协定。下一步则是缔结日本和其他各国可以自由进行通商的条约了。根据潘理条约第十一条的规定，美国得在十八个月之后指派领事或代表驻扎下田。潘理将军准将和参议员威廉·西华德联名推荐汤森德·哈里斯担任下田总领事这个重要的职位，哈里斯是一个有修养的纽约人，新近在中国任驻宁波领事，并曾周游东方各地。哈里斯在1856年8月抵达下田，他在那里一连十四个月没有看到过任何海军船舶来访，一年半没有接到过本国的训令。日本人勉强地予以接待，而他只是靠了乐观的坚忍精神、坦率和机警，才能慢慢地、好不容易地达成了他奉使的两项目标：在江户呈递国书，和商谈一广泛的商约。

哈里斯的第一个条约

执行他的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商定条约。条约于1857年6月签字，其中计有九款，规定开放长崎作为购办供应品的寄泊港；给美国人以领事裁判权和居住下田及函馆的权利（在1858年7月4日以后），并得于后一处地方派驻美国副领事一人；制定货币兑换的新标准，并准以货物支付船舶修理费及购办给养的价款，而不必按潘理条约中的规定以现银支付。

304

日荷协定

10月，荷兰驻长崎委员敦克尔·克提俄斯先生完成了增补1856年1月荷兰条约的同样工作。取消了对荷兰贸易的许多旧有限制；使国家日趋贫困的日本金银币的出口以及鸦片的进口均在禁止之列。这时荷兰人终于获准奉行"他们自己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了。日方同时给予一项保证，言明他们没有同葡萄牙人签订条约的意思，并且声明，要求荷兰人践踏基督绘像和

十字架的习惯可以终止，可是基督教或其他外国宗教的各种法器仍旧禁止进口。鉴于荷属东印度方面吸食鸦片的情形，可知荷兰委员在条约中列进禁止鸦片进口一款，未必就是出于人道的动机；而很可能是列进这样一款以使英国人难堪①。

在荷兰人签订了增补条款几天之后，普提雅廷伯爵在1857年10月24日为他在二十七个月以前所谈判的协定签定了一项增补条约。俄国新约中的大部分条款都和见诸日美及日荷条约中的条款相同。但此外，俄国同意在战时尊重日本的中立。

1857年的俄日条约

1857年的日美、日荷和日俄条约，虽则意义深远，然而毕竟只不过是补充性质的，所以哈里斯不顾一切挫折，也不顾官方的反对和他本人的患病，再接再厉地试图前往江户晋见将军。他希望能使幕府相信，允准一项内容明确的商约，以便将来作为同西方列强谈判条约的基础，是如何相宜。1857年11月30日，哈里斯达到了他的第二项目标——进入江户。一个星期之后，他承蒙将军召见。从下田由陆路至江户花了一个星期，哈里斯沿途的气派无异于一个藩主；随员不下八十人，全部扈从约有三百五十名之数。久已成为对华外交上的一个绊脚石的叩头问题，又一度提出。哈里斯答复说，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无礼的，于是这个问题就再没有提起。在晋见时，只有哈里斯一人站着，幕府的官吏都匐伏在将军的前面。自1613年接待沙里斯船长以来，向没有这样优礼地接待过一个外国代表。"华若翰委员的进北京和哈里斯总领事的进江户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哈里斯所受的礼遇正是日本政府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以及这位纽约商人外交手腕比较高明的标志。江户方面已经正确地洞悉俄国

哈里斯晋见将军

305

华若翰和哈里斯的对照

北京和江户的对照

① 特里特：《美日早期外交关系史》，1853—1865年》，第69页。

的阴谋，而完全受了骗的北京却把俄国使节引为知己……”①

这时哈里斯就着手以缔结对美商约为如何得计来游说日本官员。为求使他们深深认识到这样一项条约的有利，他指引他们注意其他地方的一些情况：英法正在对中国作战，而美国则并未参加。他也指出了英俄两国有兵戎相见的危险，以及这三个欧洲国家对亚洲所持的弱肉强食的政策。因为蒸汽行船和电报的采用，日美已成为越来越贴近的领国。然而，美国人却比较公平无私，在东方并无领土，也无此意愿。“倘若日本同这位未率一兵一卒的美国大使订立条约，当无损于日本的体面。同一位孑然一身的人所订的条约和一位率领五十艘战舰来到沿海的人所订的条约，其间自有天壤之别。……在其他各国大使来日本缔约时，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已同美国大使订立了如此如此的一项条约，那他们也就会以此为满意了。”此外他还建议由美国帮助日本加强其陆海军防务，并且声称在日本和西方国家发生纠纷时，美国会应日本之请，居间调处。

赞成订立商约的论据

306

但是争取有利行动的种种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直到1858年1月中旬，信浓藩主井上和兵库藩主②岩濑方奉派为委员，与哈里斯起草条约。制订详细条款，费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夫；但是这项文件尚须送往京都呈天皇核准，所以还要有进一步的耽延。3月10日，哈里斯携同幕府五大臣准于4月21日签订条约的书面诺言，自江户折返下田。但是当他在4月间回到江户时，得悉京都方面的阻力很大，不得不再事推延。因此他同意展缓到9月，又重返下田。

重重障碍

7月下旬，美国兵船“密西西比”号和“宝哈丹”号伴同海军

① 参阅丹涅特前引书，第356页(中译本，第303页)。

② 应为肥后，原书作兵库系误。——译者

1858年中国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准将佐赛亚·达底挐抵达下田;这两艘船将中国为英法所战败以及签订天津条约的消息带到了日本。不久之后,一艘俄国船也带来了同样的消息。哈里斯这时看清,他的话既已应验,那么即时赶往江户是可以使日本委员信服他的先知之明的。结果是7月29日,既没有敕许,也不顾大多数外藩和亲藩的反对,条约就在"宝哈丹"号兵船上签字了。

哈里斯商约的重要意义

1844年顾盛和耆英所签订的望厦条约在1858年额尔金伯爵的中英条约在天津签字以前,是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的主要基础;1858年在江户湾"宝哈丹"号船上签订的哈里斯条约在1894年以前的日本对外关系上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最后议定的条约计有三十四款和通商章程七项。派遣外交代表驻扎首都的规定包括在第一条之内;它同派遣领事或副领事一样,都是一种相互的权利。增辟口岸通商:规定在1859年7月4日开放神奈川和长崎;后来则以横滨代替了前一处口岸;新泻或西海岸上的另一处口岸以及兵库将分别在1860年1月1日和1863年1月1日开放。在通商各口,美国人得永久居住,并得承租土地,建筑房屋教堂,但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可能引起宗教仇恨之行动",均须加以避免。在1862和1863年1月1日之后,美国人得分别居住江户和大阪。贸易得自由进行,任何日本官吏均不得按往例加以干涉,并且美国总领事和外交代表得"自由旅行"日本全国各地。一如俄国条约和荷兰条约中的规定,鸦片禁止进口。无论关于民事或刑事案件,均订明实行领事裁判权,一如俄国条约、荷兰条约和前一年哈里斯草约之例。外国货币得按成色重量在日本通行。

307

"协定"税则

条约中附有一项非修改条约本身则不能变更的"协定"税则。日本官员从哈里斯那里学到了制订税则的原理,但是税率

表的拟制却大部分交在他的手里，然而税率表上却将出口税的征课一律定为5%。进口货分为四类，第一类列有金银、自用衣着物、家具和书籍等项，一律免税；第二类，包括食品、船舶用具和某几种金属，均按5%的税率征税；第三类——哈里斯激烈反对饮用的酒类，按35%的税率征税，第四类包括以上所未列举的一切，按20%的税率征税。条约自1859年7月4日起生效，并得"于1872年7月4日以后，由美日两国任何一国政府的请求，于期满前一年提出照会……加以修改"。

日本同欧洲各国的条约

额尔金伯爵于7月31日离沪赴日，葛历劳士男爵于9月6日(1858年)启程前往。普提雅廷伯爵先额尔金和葛历劳士而去，克提俄斯也从长崎赶回。荷兰人、俄国人和英国人在8月间，法国人在10月间先后同日本缔结了条约。葡萄牙和德意志联邦也分别在1860和1861年议定了条约①。英国之所以历来力图鼓励广州和中国其他各地的贸易，就是为了棉布和呢绒制造业方面的利害关系。为了这同一利害的原故，额尔金开始将这一类商品从哈里斯税率表的20%税率的类别中剔出，而转列入税率5%的类别中。

308

日本和中国开放对外贸易的对照

就开放海禁以与世界各国交往这一方面来说，日本比中国幸运。这是有若干原因的。作为一个民族而论，日本人的血缘比中国人单纯；除去堪与中国人媲美的骄傲之外，日本人的忠君爱国精神在十九世纪中叶时远远超过他们的邻邦。中国人既比较散漫，又没有共同方言，而且还重文轻武。团结牢固的日本人则有同一的语言，有坚强的服从精神，守纪律，崇尚武德，崇尚艺

① 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比利时、瑞士、奥匈、瑞典和挪威、秘鲁、夏威夷、中国、朝鲜、暹罗和墨西哥都依次同日本签订了条约。1888年同墨西哥签定的条约是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参阅渡户：《美日交通史》，第60页。

术的美和文学的美——而中国人则只以最后一种崇尚著名。再者，日本本土在地理上是坚实的，中国则适得其反；中国恰恰位于印度和西伯利亚通往东方的道路上——一条是英法为建设他们的帝国所要走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俄国以沉重的步伐走向同一目标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美国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以先例奠定着渐渐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那个政策。潘理和哈里斯，在执行本国政府政策之余，还在为日本的最大利益而尽力。

第十七章　日本的革命和王政复古

1. 驱逐外国人的企图

新约在 1859 年 7 月 1 日生效；在那个月份里，当时任美国驻节公使的哈里斯先生和英国总领事阿利国先生进驻江户了。不久之后，法国全权公使德·贝尔考先生抵日。日本的开港通商最初在民间攘夷情绪上所显示出来的影响之大，和宫廷素所培植的实不相上下。日本金币迅速外流，物价上涨，生活费用较前大增。大部来自中国沿海的许许多多外国人的私人行为乃是滋生纷扰的渊薮；而且日本商人阶级也并不是以诚实著名的。许许多多的原因合而造成一系列对外国人的殴辱事件，致陷幕府和外国代表于极端狼狈和危险之境。

日本人的攘夷

横滨代神奈川而开放对外通商；1859 年 8 月底，有一名俄国军官和两名俄国水兵在夜间被砍倒在这个新辟口岸的大街上。11 月，法国领事的一名华籍仆人遭杀害。1860 年 1 月，阿利国先生的日籍通事在江户的领事住宅门道里受致命伤；2 月又有两名荷兰商船船长在横滨被武士砍成数段。对于这些凶杀，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幕府所能作的，充其量不过是设法保护外国代表，并请他们尽少公开露面而已。江户各使馆周围的守卫增加了，还架设起大炮。

凶杀外国人的事件

1861 年 1 月，和哈里斯先生于 1856 年一同到达的美国使

馆翻译官胡斯根在一天傍晚访问普鲁士使馆回寓时，在江户被砍倒。这是条约实施十八个月以来第七次凶杀外国人的事件。310 经过会商之后，除哈里斯持异议外，英、法、荷等出席会商的其他各有约国代表以及不久之后的普鲁士代表，一齐从江户撤往横滨。哈里斯拒绝撤出的理由是，日本政府当局正竭其全力去执行条约规定，而撤退使馆很可能引起战争。他单独在江户驻留了一个多月，3月2日，在保证使馆安全的协议签订以后，其他各国代表又返回任所。但是，尽管有这项协议，7月5日，英国使馆竟又遭到了一批武士的袭击。使馆秘书和在使馆作客的英国驻长崎领事受伤。几个月之后，日方给予这两名受伤的英国人一万金圆的赔偿：另拨给使馆馆址，并答应将两名凶手处决。

哈里斯公使的态度

1860—1861年这两个年份，对于日本和对于汤森德·哈里斯都是特别危险和紧张的年份，哈里斯在国务卿西华德的充分支持下关心维护日本独立之切，是和1853年汉符里·马沙利之关心维护中国独立的情形一样的。1861年3月，位于日本海之南进口处的对马岛被俄国占领；并且建筑了兵营，大有久踞不去之意。9月间，俄人在英国海军上将何伯的一道命令之下撤去，何伯是以一支强大的舰队作为他的要求的后盾的。

1860年—1861年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这时，令人模糊地想到广州进城权问题的那个运动发生了。横滨已经开放，其他指定各口的开港期限也已经一天一天地接近。江户政府面临着那样强大的反对，不敢允许在其他各口开始通商。他们分请哈里斯和阿利国转请各该国政府允准暂缓开港。1862年1月，日本已开始计划派遣一个使节团前往英、法、普、俄、荷兰和葡萄牙各国政府。两个月之后，阿利国离任返国。6月，约翰·鲁塞尔勋爵和日本使节签订了一项协定，同意在详细规定的条件下，将新泻和兵库的开港以及英国人的进驻江户

横滨开港问题

和大阪展期到 1868 年 1 月 1 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授给哈里斯以便宜行事之权，虽未正式同意延期，但也没有强迫日本即时履行条约中所列举的义务。 311

江户政府明显地表示惋惜的是，1862 年 4 月，哈里斯自请召回，而以纽约的罗伯特·普伦继任，普伦任驻节公使直至 1865 年 4 月。自 1862 年 3 月至 1864 年 3 月这个期间，已升任英国特命全权公使的阿利国氏方在休假；在他离任期间由陆军中校爱德华·尼尔充任代办。

普伦公使和尼尔中校

虽则受到日方显具诚意的接待，普伦先生的处境是异常为难的，其所以如此不独是由于日本局势的混乱，而且是因为美国已经处于内战之中。这就使他无法得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具体支持，并且不能不妨害到他同欧洲各国使节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西华德国务卿却训令他"要保持同其他西方各国驻日代表的友好而亲切的关系。台端无庸谋求任何专有的利权，因为目前在江户特别有尽量维护西方文明的威信的必要，一切问题均不妨同西方各国代表开诚布公地进行洽商"。

美国对日本的政策

在京都，萨摩、长州和土佐这三个西部强藩的领导人已经团结在天皇的周围，左右着朝廷的决策。他们非议幕府，反对开放海禁。幕府早先曾经几度认为有必要把外国人只不过是一时之患的看法暗示给朝廷。萨、长、土和其他倒幕各藩的领袖于 1862 年 6 月得以天皇之命派遣了一位叫做小原的公卿传信江户，在那封信里历述对外交往的为害；并且下令不准开放江户和大阪；饬封闭神奈川，而于绝对必要时，开放下田以为代替。小原是由萨摩藩主的父亲——事实上该藩的领袖——岛津三郎①和六百名藩士伴同前往江户的。

颁给幕府的敕令

① 以前叫做岛津久光。

312 袭击和赔偿

在这项声明的前一个月，英国使馆遭到一个日本人的另一次袭击，这个日本人在杀死了两个英国守卫之后自杀。美、荷、法代表会同英国代办对他们所处的危险地位提出抗议。幕府大臣表示遗憾，并提出三千金元的赔偿；鲁塞尔勋爵却要求一万镑。在这个事件解决之前，又发生了一桩更加严重的意外事件。

理查逊事件

9月14日，岛津所率领的那一队萨摩武士和扈从自江户起程赴京都。在那一天下午有三名英国男子和一名英国妇女从横滨骑马到那条联接江户和京都的军事大道东海道上去闲游。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岛津的这一队人马，但是却没有遵守路上的礼节：照例在这队人马走过的时候，步行者须对领袖的轿子叩头，骑马者须下马鞠躬。于是一名萨摩藩士遂奉岛津之命，对这群英国人加以殴辱，其中一个叫理查逊的人受致命伤，另两个人受重伤。舆论一致认为理查逊应对这次殴辱事件负责。再没有什么事比外国人的最彰明昭著的敌人同欧洲列强之中最富有侵略性的一国象这样碰到一起，更加使幕府莫知所措了。

1863年攘"夷"的决定

1863年1月，江户方面奉到一项敕令，略谓，将军应立诣京都，"扬帝国之兵威，成攘夷之大业"。不久又奉到一项内容相同的敕令。为缓和宫廷的情绪，这时幕府开始惩罚近年来倡导对外交往的人们，在1858年8月继家定而就职的儿童将军家茂答应"一切惟谨遵陛下之命"。

鲁塞尔勋爵的态度和要求

对焚毁圆明园一事记忆犹新的鲁塞尔勋爵，在1862年6月接到两名英国使馆守卫被杀的报告之后就训令尼尔中校，"以一切方法表示女王陛下政府决不能因这些可耻谋杀的威胁而改弦异辙。就是毁掉大君的〔即将军的〕宫殿，也不能听任我国依据条约而取得的正当地位受到削弱或损害"。据命令，索赔不得少于一万镑。鲁塞尔勋爵并没认清幕府对于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313

的被杀害并不负任何责任这一点①。由于缺乏电讯交通，欧美各国政府在这些多事的年份中不能经常接到他们驻东方代表的报告，或随时和他们函电往来。

在1861年7月英国使馆第一次遭到袭击之后，英国公使要求拨给一处新馆址，随即在御殿山公园得到了很合理想的一所房子。1863年1月16日，有一名日本守卫因阻止四名浪人（即无藩主的武士）闯进这个尚未完工、也尚未使用的新馆址而被杀。2月1日，使馆本身被长州藩的武士放火焚毁。几年以后才知道，其中有两个青年，都是后来在更有价值的事业中显扬于世的，即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随着新使馆的焚毁，尼尔中校和美国公使的意见也趋于两歧了，美国公使依旧对于将军维持自己地位和执行条约的能力具有信心。这时尼尔则要求驻扎香港的海军少将古柏在日本沿海举行一次海军示威。

1863年2月1日英国使馆的焚毁

在这位海军少将到达之前，他已经接到了鲁塞尔伯爵对理查逊事件所提出的赔偿要求（3月14日）。鲁塞尔要求江户的幕府和萨摩藩对这项犯罪行为共同负责，并且不顾国际公法和英国同萨摩藩并无条约关系这个事实，训令尼尔中校要求江户政府道歉和偿付十万镑的赔款，并要求萨摩藩主在一、两名英国海军军官的监临下审问和处决凶杀和狙击事件的“祸首”，并赔偿二万五千镑。

英国在理查逊事件中的要求

314

不幸的是，这种要求是正在幕府为本身的存亡而斗争的时候提出的。两个星期以前，家茂的监护人一桥（治济）已到达京都，接着前越前大名松平春嶽大老和将军本人也相继而至；浪人

不幸的后果

① 在1853—1865年期间幕府所处的地位和1843—1848年期间耆英在广州所处的地位一样：两者都是强人所难的列强和反动宫廷之间的缓冲器；两者都是激于爱国的热诚，但是两者都认清，只有妥协才能解决问题。两者都因按照比时代进步的见解行事而付出了代价。

和武士都热切地等待着定一个攘夷的确期。尼尔中校则决定等待古柏海军少将到达后再提出要求；海军少将于3月22日到达，最后通牒于4月6日提出。尼尔中校的要求得到了法国公使德·贝尔考先生的支持。美国公使个人极不以英国的态度为然，一方面因为将军同天皇的关系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另一方面则因为他认为理查逊事件“纯粹是出于偶然的。据认为在同样情况下，就是日本人也会被杀死的”。然而，为避免用兵之后赔款更多起见，他还是力劝幕府应允英国的要求。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竭力主张心平气和。

英法双方请助幕府抵抗倒幕各藩

英国的最后通牒限二十天之内答复，但是经过了两次展期，推延到5月23日。在限期届满之前，英法代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不禁令人想起当英法联军在北方同清军作战而在长江流域保护清廷利益时中国的局势。正在等待致幕府的最后通牒的答复时，英国当局——以及法国当局——就决定请以他们的海军力量帮助幕府对倒幕派的西部大名进行作战。幕府谢绝了这项建议，但保证一俟政府当前的困难解决，赔款当可照付。三天之后美国使馆被焚，这究竟是事出偶然，还是预有计划，迄今无法肯定；于是美国公使暂撤往横滨。

京都的大会列侯

如果要了解英法的建议何以被拒绝，那就必须回顾一下京都大会列侯的发展情形。4月8日，于家茂未到之前在皇宫举行的一次有一桥和松平大老以及许多公卿和大名参加的会议上，宣读了一项驱逐夷人的敕令，但是没有订明日期。一个星期之后，英国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于是将军的驻京都代表传谕三十六个重要大名，号召他们勤王保国。21日将军到达；他在首次朝见天皇时，奉到了任便以和平或战争方法驱逐夷人的命令。但是也没有订明日期。原定于5月28日由天皇颁给将军“征夷

315

尚方宝剑一口”。不幸，家茂和一桥都因“病”不能谨领；但是旋于6月5日觐见，并确定以6月25日为驱逐夷人和将侵略者逐出帝国海岸的日期。将军被留在京都，而由天皇派水户藩主前往江户，去“将夷人一扫净尽”。但是家茂却心平气和地嘱咐这位水户藩主“要为其所当为，以保全日本的令名”。

日本封港的计划

江户当局深知将军的处境。决定无视敕令的文字，将指定的日期解释为对外国人的撤出开始谈判的日期。6月24日，他们偿付了十万镑的赔款。前此提出的请另为萨摩藩主偿付二万五千镑的建议，则被英国代办拒绝。同日，幕府的老中小笠原长行通知外国代表们说，他已经奉到天皇的命令，饬即封闭已开放的各口和驱逐夷人，为执行此项计划，应随即开始谈判。各国使节拒绝考虑这类的建议，并且说这无论在文明国或野蛮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小笠原赶往京都去说明执行敕令的不可能，而同时在江户的一桥也提出了同样的报告，并请辞去将军监护人的职务。

316

长州藩主的爱国心

尽管日本东部的幕府官员想任便给敕令以解释，西部的长州藩主却不是这样办的。他高兴地对敕令加以字面上的解释，并且立即照办，6月26日凌晨一时，自横滨驶往上海的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正停泊在下关海峡附近时，遭到了两艘武装船舶的炮击，其中有一艘悬挂着日本国旗——白底中间一个红色太阳。7月8日，长州的船舰和炮台轰击法国蒸汽炮艇“建昌”号，三天之后，又炮击荷兰蒸汽巡洋舰“密杜沙”号，以示一视同仁。

果报

7月11日，攻击美国船的消息传到横滨，13日，因追逐“阿拉巴玛”号而已抵达横滨的美国船“怀俄明”号——司令官为麦克杜格尔——奉命追捕曾攻击“彭布罗克”号的那些船只。16

日刚驶抵下关海峡,"怀俄明"号就遭到沿岸炮台和船舰的轰击。麦克杜格尔司令官将该船只击毁之后即返回横滨。在麦克杜格尔司令官之后四天,法国海军上将若雷抵达下关。他派一小支军队登陆,毁掉了七个炮台中的一个,烧掉了一个村庄,还以其他一些方法对加诸法国国旗的侮辱施以报复。然而,下关海峡仍旧封闭了一年多。

英国同萨摩的关系

在这期间,尼尔中校和古柏海军少将将英国对杀害理查逊事件的索赔要求向萨摩藩主提出:8月11日,他们率同轮船七艘驶入鹿儿岛湾。对于他们的要求,大名的家臣给了一个不圆满的答复。于是古柏海军少将就夺取了大名的三艘汽船,炮台当即开炮轰击。在对鹿儿岛的两天进攻之中,城市大部分毁于炮火,但是由于台风的缘故,英国舰队被迫撤退。双方都自称获得胜利。然而,在11月中旬,萨摩藩主驻江户的使臣同意付给所要求的赔款,并应允继续缉拿凶手,一经拿获,当即惩处。款项于12月11日付讫,另外还提出了一项书面的诺言,于是英国代办同意协助萨摩在英国购买一艘兵船。后来理查逊案的凶手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是始终没有受到惩罚。

攘夷计划的瓦解

317

1863年夏季,排外运动在长州藩主领导下的京都宫廷中已达到了最高潮。至9月底,政变已告完成,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见罪的长州势力,一举而被逐出京都。"从这时起,攘夷计划就象解冻时期的冰一样融解成为碎片了,"一位日本历史家写道,"宫廷原已提高了的威望,似乎又因其本身的行为而遭到贬损。"这时宫廷颁布了一道敕命,略称:因幕府正在谈判封港事宜,应一惟幕府之命是从,不得卤莽行事。10月,以封闭横滨而将一切贸易移转至长崎和函馆一事就商于美荷两国领事。他们都拒不予以考虑。

10月14日，一个叫作卡缪海军上尉的法国军官，正在横滨附近骑马时，被杀身死。法国当局认为援据理查逊事件所创的先例是不智的，所以劝喻日方派使节赴拿破仑三世的朝廷道歉。幕府认定这样一个使节不独可以前往道歉，而且可以吁请英法两国政府同意封闭横滨口岸。因而于1864年2月使节奉派出国。他们在法国所受的接待，实不足以鼓励他们认为尚有任何理由要去英国一行；他们在8月间返国，带回了一份有待将军批准的草约，其中规定于三个月内开放下关海峡。因为幕府无法执行这些规定，条约未获批准。

1864年日本派赴法国的使节

在这个使节返国之前不久，美国公使已经对于美国政府向幕府所提的索赔要求得到了解决。这些索赔要求是根据使馆的被焚、美国公民在横滨的屡遭狙击以及美国公民某被日本人从小笠原群岛驱逐出境等理由而提出的。对炮击"彭布罗克"号的索赔要求前已获得协议，但尚未偿付。总数共约四万一千金元的索赔要求一直拖延了几个月之久而未获得解决，因为幕府认为如果对美国使馆被毁一事给付赔偿，无异是承认政府牵涉在内。国务卿西华德坚持美国的索赔非照付不可。因而在1864年7月，普伦公使就搭乘美国兵船"詹姆斯敦"号前往江户，率同六十五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登陆，并且临时设立了行馆。在双方没有任何不快的情形下，他对索赔要求取得了一项协议。此外，日方还允为重建美国使馆，可于年底以前完工，以供居住之用。在索赔要求的初期谈判中，普伦曾经以行使便宜行事权相威胁，拟即根据美日条约，宣布江户、大阪、兵库、新泻各城的开放。1864年1月，双方达成了和英国所同意的办法相似的一项协议，允将上述各地的开放展期到1868年1月1日。为换取这项让步，日方同意将某些商品的关税减低到5%，将另一些减低

1864年美国索赔要求的解决

318

到6%。

2. 联军远征长州

1864年3月阿利国爵士回到日本。对于英国公使的那个多少带点侵略性的政策,汤森德·哈里斯先生素少同情。但是从开放日本对外交往上所遇到的困难来看,外国代表方面似乎不但有合作的必要,而且似非实行一种积极的行动方针不可。这种政策正是阿利国不顾鲁塞尔伯爵饬以采取防卫政策的那项措词温和的训令,而决心要予以贯彻执行的。美国公使对于是否同意这项积极政策,多少有点踌躇。英国公使以外交团领袖自居。阿利国断定,以联军进攻长州,用武力打开完全在日本管辖权范围以内的下关海峡,是保证日本遵守条约的唯一方法。

各国驻日代表的合作

对鹿儿岛的进攻在英国议会中已经引起了强烈的批评,所以,鲁塞尔伯爵在接到阿利国呈报其"以战争防止战争"政策的那封信之后,当即于7月下旬函复,切嘱该公使,除非为自卫计迫不得已而为之外,断不许采取敌对措施。由于缺乏便捷的交通工具,命令没有能及时到达日本,来影响阿利国的计划。

鲁塞尔伯爵的对日政策

319

在1864年2月至6月这段期间,天皇和将军以及双方的拥护者又在京都大会列侯。尽管结果是加强了幕府的地位,各国公使却认为局势的严重达于极点。结果是5月30日英、美、法、荷各国代表签订了一项协定,声明决定一致行动并认为有保全条约权利的必要。鲁塞尔伯爵在8月间收到协定的副本和阿利国5月份的各项公函之后,立刻将英国公使召回,声称:"如果大君〔即将军〕和天皇认清英国的强硬立场以及英国海陆军的强大力量,他们纵然不会立时立刻,也会逐渐放弃其打算破坏现行条约和驱逐外国人出境的一切想法。"但是这项意见和召回的命令

1864年京都帝国会议

阿利国公使的召回

到达太迟，已经来不及影响日本局势的发展了①。

在进攻长州藩之前，各合作国公使曾命伊藤和井上往谒他们的藩主；对于他们的斡旋，这位大名答称，他本人是遵奉天皇和将军之命行事的；除非变更前令，他不能改变政策；因而请宽限三个月，以便呈请收回成命。8月15日，四国公使咨请各该国海军官员立即前往打开下关海峡，并摧毁炮台。这次远征私下得到了幕府的支持，据称这是对不法之徒和海贼的一个惩处。由九艘英国船、四艘荷兰船、三艘法国船和一艘专门租来的美国轮船所组成的联合舰队，分别于8月28日和29日从横滨驶出。在9月5日至8日之间，有十五座炮台被平息，登陆部队先塞住了其中的几门大炮的火门，并终于将六十二门大炮一并拆除。这时长州大名的代表开始同联军司令官进行谈判，14日签订了一项协议，其内容如下：(1) 下关海峡对世界各国船舶一体开放通航，准一切船舶购办供应品，并于必要时在下关停泊；(2) 海峡不得设防；(3) 大名应付给赎城费并偿付远征军费。长州藩的战败，使将军无须再实行模棱两可的政策了，因而加强了他的地位。

1864年8月联军进攻长州

320

问题的解决

下关远征对长州所起的作用和鹿儿岛的毁于炮火对萨摩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排外运动终于瓦解，长州和萨摩的倾心外国，至少已经到了承认西方海陆军力量优越的程度。想学习这种力量的秘诀的志愿，很快就显示了出来。这时长州和萨摩已变成了共图倒幕尊王的联盟。

下关远征的影响

早在1863年6月，普伦公使就在致西华德国务卿的一封公

① 10月10日阿利国奉到召回他的命令。但下关远征是那样成功，而他为自己政策的辩护又是那样有力，以致英国政府不但在翌年1月批准了他的政策，而且不久之后还升任他为驻北京公使。

函中，主张在大阪举行联合海军示威，以求取得天皇对幕府所订条约的批准。他的理由是，除非条约经过这样批准，“外国人的地位一定还是得不到安全的，而且如果未经依法有正当权利的元首批准，外国人的到临必致引起党派之争，甚至引起内战。……”英国政府则认为这种批准并无必要，因为缔约权是属于将军分内的。这时联军各国公使已经体会到普伦先生建议的明智，因而要求将军转请天皇敕准。10月(1864年)，幕府的大臣们同意试行照办；并且也自行负起允为长州偿付所索赔款的责任。在10月22日由四国公使和幕府代表所签订的一项协议中，将赔款额定为三百万金元，但日方如愿开放下关或内海的另一处适当港口，则列强究竟接受此项办法抑或接受赔款，得斟酌择取其一。日方并未开放任何港口，款项是在派遣远征军后十年之内陆续付清的①。

天皇批准条约的必要性

1865年普伦先生和阿利国爵士先后离日。自1886年8月至1869年11月，美国公使是凡·法根堡将军。阿利国爵士的后任巴夏礼爵士则于1865年7月抵达日本。他是在1862年受封为爵士的；虽年仅三十七岁，他在东方已经有了差不多二十五年的阅历。在此后十八年之中，他一直是各国驻日本外交团的领袖。

321

巴夏礼爵士调任日本

巴夏礼爵士建议派遣一支联合海军远征队到家茂和幕府五大臣当时驻节的大阪地方，作为同将军进行谈判的一种手段。对于英国公使的这项建议，美、法、荷三国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由五艘英国船、三艘法国船、一艘荷兰船所组成的一支没有美

派遣联合远征队到大阪的决定

① 美国政府所得到的总数是银币七十八万五千元。1883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准将美国应得赔款之数归还日本政府。这笔款项是作为兴建横滨防波堤之用的。美国所创的这项先例没有任何欧洲政府仿效办理。

国船的远征队，载同四国代表——美国代办波特曼先生则搭乘英国巡洋帆舰"佩洛勒斯"号前往——于11月4日抵达兵库海面。当即分函大阪方面的各大臣，声明此行是友好性质的访问，目的是要解决"因1864年10月22日的协定而发生的某些重要问题"。英国公使在照会中补充说，如能取得幕府前曾"应许取得的"天皇对条约的批准，则他会感到"最真诚的满意"。实则幕府并没有作过这样的诺言——而只答应试图取得天皇的敕许而已。同幕府大臣们的关系是友好的，但是天皇却并无批准条约之意；因而，在21日，四国代表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照会，声称：除非在24日以前收到对各国建议的书面确切答复，他们将认为"置不作复即表示日皇陛下对我们所提条件的正式拒绝，因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任便按照我们所认为便宜的方法行事"。

24日，一位幕府大臣访问联合舰队的旗舰，声明天皇已经批准了条约。另据声明，将军也同意减低税则，准食物免税进口；烟草、糖和制造品按5%的固定税额征课；珠宝、香水、酒类等项奢侈品按5%的从价税征课。在此后几年之内，物价的上涨使从量税减低到不足从价标准4%的程度。但是将军宁愿如数偿付为下关远征所索的赔款，而不愿照建议的办法，提前开放兵库和大阪两口的日期。条约的敕准是见诸颁给将军的一道言简意赅的敕令中的，敕令略称："条约已经敕准，着即筹拟一切有关的必要部署。"

条约的敕准

322

随着条约的敕准，日本对外关系和内政问题的纠缠，也就大部分消弥于无形了。幕府在日本西部的敌人已不再被迫实行排外，西方列强也不再仰承将军的照顾了。今后他们在皇运日隆的那一段时期已经可以托庇于天皇的保护。这种变化的全部作用都在王政复古时期暴露无遗。

批准条约的重要意义

3. 王政复古

1867年2月,排外的孝明天皇逝世。在前一年9月,将军家茂已死于大阪。家茂由一桥藩主继任,他在家茂当政的末期早已是真正的权力机关了。一桥藩主以德川庆喜这个名字而殊属可悲地担任了最后一代的将军。孝明天皇则由他十四岁的儿子睦仁继承,改年号为明治。

最后一代的将军

尽管排外运动随着条约的敕准而大抵停止,倒幕运动却并未削弱。长州藩是公然敌对的;萨摩虽试图斡旋于京都宫廷和江户幕府之间,却是和长州在宫廷中竞相争权夺势的一个劲敌。但是这两个西部强藩的领袖都认识到,要想加强宫廷地位和帝国本身,主要在于彼此合作。这类有远见的领袖当中的首脑人物就是萨摩的西乡隆盛和长州的木户孝允。

倒幕派

将军庆喜发觉他的新地位大不易处。在他就任一年之后,他召集当时在京都的藩主和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声明:"窃以方今对外关系日广,非号令统一,则不能维持法律,爰拟奉还大政。余所能为帝国利益尽力者,莫过于此。"因而在1867年11月19日庆喜请辞去将军职务,之后不到一月的工夫,睦仁就接受了这项呈请。

323

将军刚刚卸职,紧接着就在1868年1月初发生了一次政变:卫戍宫廷的德川氏指挥下的会津藩兵突然为萨摩、土佐、长州和肥前的藩兵所接替。年轻的天皇本人现在是掌握在庆喜敌人的手里了,庆喜本人随即被命令辞去内大臣(即掌玺大臣)职务并交出封地。卸任将军于1月31日晨在美国兵船"伊勒夸"号躲避了几小时之后,就偕同他的追随者自大阪取海路逃往江户。2月8日,各国公使已接到正式通知,说天皇已重新亲政,

王政复古

“以前条约中所用的大君称号应改为天皇的称号”。

接踵而来的斗争是简捷了当的。前将军的军队屡战屡败，被迫退到江户，到5月，庆喜对天皇系军队全面投降。诏赦前将军罪，但夺去其一切官职和荣典，并迫其下野隐居。然而，他的追随者仍继续在陆海两方面对天皇系进行抗争，直到1869年7月叛乱终被戡平时为止。继而实行的安抚政策，结果使皇权在全国各地渐渐地奠定下来。

德川的垮台

当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年轻的天皇就在1868年4月6日前往京都的紫宸殿，对大名会议庄严地发表了御誓文。文中誓约拟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并应奠法律于公正无私的基础之上；文中也有“应向世界求知识，以振皇基”的声明。1869年，江户改称东京，并且变成天皇政权的所在地，正如以前一直是幕府的所在地一样。

1868年的御誓文

324

奠都东京

宫廷对外国使节的关系上所取的态度，大抵是以几位高级官吏所上的一件奏折为依据的，在那件奏折中，日本的统治者们想到了中国的命运：“欲重振帝国的衰运，使万国共仰皇帝的威仪，则必须痛下决心，廓清历来偏狭之见。……放弃历来称外国为犬羊夷狄的愚论；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依据万国通例所规定的仪节，召见各国代表。”

中国的事例对日本的影响

在整个王政复古这段期间，各国公使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友好的。1867年4月，美、英、法、荷四国公使前往大阪，商讨有关1868年1月1日届期的各港开放事宜。5月初，他们在大阪受到了将军的正式接待。在安排兵库（神户）和大阪的开放事宜上，并未遭到任何困难，日方官员慷慨地拨出了供作外国居留区之用的地址。

1867年庆喜接见外国使节

在1867年夏季，十七世纪的那种查禁基督教的回声又可以

反对查禁基督教的反响

听到了。美国公使凡·法根堡将军在访问长崎时,得悉大约有六十五名日本基督徒被捕。这些人都是早期基督徒的后裔,他们的家庭不顾危险和查禁,历经二百五十年而仍然忠于他们的信仰不变。美国公使力请释放这些犯人而未果,于是通知日本外相说,宗教的查禁会严重地影响日本的名誉。西华德国务卿训令法根堡将军试求会同其他各国代表,一致吁请废除查禁基督教的敕令。法国公使向日本人作了法国教士决不在日本内地传教的诺言,结果犯人释放,但法律并未废止。

325

兵库的大阪的开放

随着兵库和大阪两口的开放日子将要到来,美、英、法、荷四国代表便会同普、意两国代表动身前往兵库,那里随即就集合了六艘美国船和八艘英国船。因此,在前将军被迫回到江户去的那次大政变时,他们同宫廷的文书往来是很方便的。兵库和大阪于 1868 年 1 月 1 日开放;另据商定将新泻和夷港①两口的开放对外通商以及江户的开放供外人居住,展期到 4 月 1 日。

兵库的骚乱

在 2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中,政府军和德川系军队之间的纷争在兵库造成了暂时的混乱。2 月 4 日进城的天皇系的备前藩军竟对包括外国公使四人在内的外国人开枪射击,虽则天皇系军队不知道有公使在内。结果,美、英、法的海军陆战队和水兵予以还击,并扣留了停泊在港内的四艘日本轮船。四天之后,天皇的代表到达,他承认备前藩军的行为不当,答应如果外国军队撤退的话,负责保护兵库的一切外国人的安全。他也答应由帝国政府负责认真执行条约。一俟新政府同意对射击外国人事件道歉并将下令开枪的军官判处死刑,备前事件也就结束了。

外国代表决定对正在进行中的战争依然保持中立。倘使天皇不曾批准条约,他们未必就会这样办。从 1868 年 2 月 18

① 夷港为日本佐汶两津港之古名。——编者

日到 1869 年 2 月 9 日撤销中立声明时，他们一直遵守着这项决定。在 1868 年 3 月上旬，巴夏礼正私下谈判外国代表赴京都觐见的问题。当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各国公使惊悉在大阪附近有十一名法国水手无缘无故为土佐藩军所杀害。对于这项罪行，日方正式表示道歉，将两名军官和十八名武士判处按古礼自杀，并给付受害者家属以相当数额的赔偿。在这二十名被判死罪的人当中，有十一名经被害人原隶属的船舶的司令官同意按照原判办理，另九名则从宽予以赦免。

在1868—1869年战争期间外国人的中立

326

法国水手在大阪附近被杀害

在解决法国要求期间，京都方面已经向各国公使发出了邀往觐见的正式请帖。这样一种邀请明白表示出宫廷方面态度的变更，因为在仅仅几天之前，甚至一位大名也已经可以瞻仰这位年轻的天皇了。正返回江户的美国公使，没有接到这项邀请，直到 1869 年 1 月才获觐见。英、法、荷代表定于 3 月 23 日（1868 年）接见。接见法荷代表的计划是按期实行了，但是当巴夏礼和他们的扈从人员从知恩院赴皇宫的时候遭到了两名武士的攻击，有十名英国人和一名日本人受伤，而这两名武士，则一被斩首，一被拿获。后者立刻被褫夺武士的身分，并判处斩刑。英国公使力请以天皇真心敦睦邦交之意，布告日本人民周知。日方提出了一项书面道歉；不久之后就将巴夏礼所请一节以敕令公布。敕令中对加害外国人的行为痛加指斥，并以严刑相威胁，如果是武士的话，则还包括除名的处分在内——这是比死本身更难堪的一种处罚。3 月 26 日，天皇接见了英国公使。

拟召见各国使节

对英使的狙击

4. 走向取得国际平等地位的最初步骤

在天皇重行亲政和政府在东京成立之后，一个以争取同西

1869年的公议所

327

方列强立于平等地位为目的的国家现代化过程就接踵而来了。天皇在1868年4月发表的御誓文中，曾应许召开审议会议，商讨国事和进行政府的必要改革。一年之后，公议所举行会议。公议所是由大藩主的代表组成的，与法国的名人会议相似，而与现代的议会则殊不相同。这个会议的总裁是秋月亲王，他曾经在1869年的一件奏折中，毅然主张废除整个封建制度，而"恢复"在天皇统一号令下的"立宪和大一统的局面"。

废除封建制度的必要

显然，王政复古是非废除封建制不能竟其全功的。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大久保利通竭力劝说他们各自的藩主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以推翻幕府为开端的这项功业。于是高松、肥前、萨摩、长州、土佐各藩以及少数其他西部各藩的藩主联合起来，将他们的封地奉还天皇。

封建制度在日本已存在了八百多年，然而这时其他大名也都一致响应这个奉还版籍的举动，于是在1871年8月29日下诏"废藩置县"。在1868—1874年之间，以一系列的法律解放了全国的农民，准许他们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人，径向中央政府缴纳地税，以代替缴纳给各自领主的封建税捐。

普遍征兵制的采行

随着封建制度的废除，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顺利完成了。鉴于日本的改组陆军和兴建海军，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人对于吸取经验教训，搜求西方列国所以强盛之道，以期供本身之用，是如何地加意留心。在1872年年底，日本以普遍征兵制代替了武士那样一种职业军人的制度。日本陆军是取法德国制的。他们起初聘用了一批欧籍军官来帮同改组军队，但不到几年的工夫就一体解雇了。

工业革命的初步措施

日本在进入工业革命第一阶段方面也并不落后，而日本的工业革命是起了使欧美与远东发生接触的作用的。1872年，横

滨和东京庆祝两城之间长十八哩的第一条铁路的通车①。在最初十年之内，日本仅仅兴建了七十八哩的铁路，但是到 1928 年则已经有八千多哩了。 328

随着禁造远洋船舶法令的废除，这类船舶就大量地建造了，而且不到十五年的工夫就有了一百三十八艘之多。在 1928 年，日本已有从事于对外贸易的轮船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二艘。1894—1895 年间初显身手的日本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列强海军中已居第三位。

海军和商船

电报和邮政随即建立起来——前者早在 1868 年就已经开办。不到十一年的工夫日本就参加了国际电报公约，不独国内各大城可以互相通报，而且同世界各国也都有了电讯联系。1877 年日本加入万国邮政公约。这些措施自不能不有助于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所以在 1869—1879 年这十年期间，进出口总额几乎加了一倍。在 1877—1913 年这三十六年之内，日本的对外贸易增加了二十七倍，从二千五百万金元增加到六亿八千万金元。

电报和邮政

教育也有一日千里之势。1871 年文部省改组。在十年多一点的期间内，公立和私立学校约有三万所，平均每一个学校有学生一百余名。这些学校在日本现代化和统一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文部省和普遍兵役制，"冯·西博尔德写道："对日本的融合成为一个政治整体，其贡献之大，实为其他任何制度所不及。"

新教育

新帝国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在 1869 年 7 月确定下来的；设外

① 尽管这条铁路的兴建曾经利用英国资本和英国的工程师，但是严格保留一切铁路和电讯为日本所有的政策，却防止了猎取特权让与的角逐，因而日本铁路没有象中国的情形那样，卷入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去。

新帝国政府的组织形式

务省为政府六省之一。各省长官均隶属于太政大臣和左右大臣之下。

329

在1871年，不但封建制度已渐成过去，而且日本还派遣了两个重要的使节团出国，一个是前大名、大藏卿伊达宗城出使北京的使节团，另一个是岩仓勋爵出使欧美的使节团。4月，伊达奉派为聘问北京朝廷的钦差全权大臣；使节团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于9月13日在天津签订了一项附有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的修好条约。这个条约多少象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所缔结的，日本已不复列为中国的藩属了。商业条款一般是以中国同西方各国的成例为依据；但使日本失望的是，其中没有最惠国条款。条约中没有承认象西方各国人民所享有的那种完全的领事裁判权地位，而规定一切刑事犯应由领事和地方官会同讯办。但是，却进而订明，"两国政事、禁令、各有异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请开办"①。略而未提的是，民事案件应由地方官依据讼案发生地的所在国国法进行裁判。两国承允互相给以通商权利，一如中国给予西方各国人民之例，惟两国人民均不得将进口货物运入另一国的内地，或赴内地采购产品。凡违章运入内地或径赴内地买货者，货均入官；两国通商仅以指定口岸为限。

伊达的出使北京

1871年9月13日的中日天津条约

1871年10月，日本无疑是受了蒲安臣奉使欧美各国的影响，以大纳言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派赴美国和欧洲各主要国家。以副使的身分和他同行的，有参议木户、大藏卿大久保、工部省太辅伊藤和外务省太辅山口。日本前已和西方各国商定于1872年解决修约问题。岩仓使节团的主要目的，就是"首先研

1871年岩仓具视出使西方

① 录自条约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17页，第三条。——译者

究文明各国的制度，采择其于日本最相宜者，用以逐渐改良我国政府和习俗，以期跻于文明各国平等的地位"。 330

和蒲安臣使节团一样，岩仓使节团也是首先访聘华盛顿，在那里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接待。使节团自美转道赴欧，分访英、法、比、荷、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以及俄、丹、瑞典、意大利、奥匈、瑞士等国。回程则取道苏伊士运河。从外交方面着眼，使节团的成就微不足道，但就日本人对西方世界情况的认识而论，意义却是重大的。在使节团回国之后不久，帝国政府就在美、英、法、奥、俄各国设立了使馆。

"玛丽亚·卢斯"号事件

在岩仓使节团返国之前，横滨发生了一桩足以使世界各国对日本外交刮目相视的事件。那就是秘鲁苦力船"玛丽亚·卢斯"号事件。这艘载有从澳门上船的二百三十二名苦力的船舶，于1872年7月驶进横滨港修理。其中有一名苦力从船上逃出，泅到附近的一艘英国兵船上，请求将他救出他和他的同伴正遭受虐待的苦境。日本法原禁止买卖人口，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勋爵就援据这项理由，授给外务卿副岛种臣伯爵以权宜处理的全权。地方法院宣布拐骗中国人的契约完全无效，并一体予以释放。日本当局将这些人接到岸上，给以衣食，并照会上海道和两江总督。中国政府随即派员接收这些苦力并遣送他们回国。

美国对苦力贸易的态度

美国公使德朗前曾叠奉训令，饬于日本有任何涉及秘鲁利益的事故发生时，即行代表秘鲁交涉，所以他遵即出面斡旋，以期解决这桩事件。他为此而受到了国务卿的申斥，因为采取这一步骤会使美国政府蒙有赞同苦力贸易之嫌。于是秘鲁派遣了一个专门使节团去解决这件事。应秘鲁驻华盛顿公使之邀，并经美日两国政府同意，德朗先生再度出面斡旋，而这时美国政府 331 已经明白表示它不赞成苦力贸易了。双方同意将这桩事件讨诸

仲裁。俄国沙皇应邀担任仲裁人;1875 年 5 月 29 日,他裁定日本所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行动也完全是合法的。这样就给了澳门方面的可耻的贸易另一个沉重的打击。葡萄牙总督于是照会日本当局,表示将采取严厉办法加以取缔。英国政府也训令英国东方各领地的总督,嘱于各该辖区内有类似事件发生时,即考虑援引"玛丽亚·卢斯"号作为先例。

5. 台湾问题

对于释放"玛丽亚·卢斯"号上苦力这一友好举动,日本并不想白送人情。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要利用它在中国官员心里所引起的好感,来解决有关朝鲜、琉球和台湾各方面中日关系上的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朝鲜问题因为当时并未获得解决,不妨留待以后再谈。为谋解决因琉球群岛和台湾地位问题而发生的某些纠纷,副岛种臣以全权大臣身分亲赴中国,1873 年 3 月底抵达上海,4 月转往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对日本全权大臣为释放苦力而尽力一节表示谢意,但并不打算给使节团以任何非常的礼遇。5 月 5 日在天津互换 1871 年条约的批准书,如果副岛愿意讨论台湾问题,李鸿章原会进行谈判的。然而,日本全权大臣泥守国际法的文字,在未陛见之前,不肯讨论任何新问题,爰于 5 月 7 日离京。此次觐见之所以能最后订明确期(定为 6 月 29 日),大部分是靠了副岛的力量。

日本的对华政策

这位日本外务卿在争执他本人于陛见时所居的位次上面,为日本赢了一个回合。这是日本志在领导东方的第一次露骨的表示。除此之外,副岛的任务是要解决在台湾和琉球群岛上所发生的纠纷。构成日本群岛之附着物的那后一列岛屿,对中日两国纳贡已有数世纪之久。日本人称之为冲绳的这个群岛,是

332

包括在萨摩藩主的祖先岛津忠宽于1185年开始领有的"南海十二岛"之中的。在十四世纪封建战争的过程中，这个群岛分成三个王国，但是在中国的援助下归于统一，于是在1372年开始向明朝的开国皇帝纳贡称臣；大明皇帝赐名这个群岛为琉球，并加封岛主以王的称号。1451年复向日本进贡，1609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又以他的祖先的名义将琉球征服。于是琉球王开始接受中日两国的册封，向两国纳贡称臣。1850和1865年曾分别派遣贡使至江户和北京。

日本执东方牛耳的先兆

1871年12月，有几名琉球水手在台湾未开化地方因船只失事罹难，据日方报告说，被山中独立的部落杀而食之。日本政府于是为它的琉球臣民的被害要求赔补。李鸿章在1873年4月和副岛的会谈中，答应负责，允即咨请北京对台湾犯法的部落兴师问罪，并保证日后平安无事。但这项决定并未见纳于正苦于经费支绌的北京御前大臣们。6月21日，总理衙门和代表副岛伯爵的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勋爵在北京有过一次会谈。虽则总理衙门声明琉球是中国的领土，但是他们对于柳原所称琉球始终属于日本一节，却没有提出对宗主权的正式对抗要求以为答辩。而且他们还告诉日本人说，中国对于台湾东半部山区中的各部落并不主张任何管辖权。

台湾

日本政府于是决定自行其是，1874年4月，日本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以大隈重信和西乡从道为统帅。和这两个统帅偕同前往的有三名美国陆海军军官。这支舰队在中国厦门港集合，于5月初在琅玡港[1]登陆。这两个统帅曾奉命择一中国治外的地点登陆。在那里和山中各部落有过一些遭遇战；但是，到了7月，中国的态度已渐趋模棱，于是日本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

1874年4月日本的远征台湾

333

[1] 指琅玡的社寮澳。——译者

行动。

中国方面的处置失当是由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分层负责制度所造成的。李瀚章是闽浙总督，台湾即位于他的辖境之内；倘使恭亲王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他一定会给以和他兄弟一样健全的建议。他在5月间通知西乡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惩罚生番是中国本身的事情。这时恭亲王送致东京一项照会，内称，1873年副岛提出三项关于中国对澳门、朝鲜和台湾主张管辖权的问题，当即告以中国对三者均为上国，但并不反对遣使前往台湾调查；今出之以兴师问罪的方式，无异是否认中国对台湾全岛的管辖权，故不得不提出抗议。自8月25日至11月17日，中国陆续派往台湾的军队共达一万零九百七十人，但是北京方面仍有畏避战争之意。

中国对台湾主张管辖权

日本发现它本身已陷于有违初衷的地位。在1873和1874年，日本的武士一直逼迫政府进行征伐。他们所选中的目标是朝鲜。政府认为国家尚力有未逮；因而愿以征讨台湾作为代替。这时局势陡然一变。征讨台湾已不复是对几千名同日本对立的生番的一次战役了，而成为对一个强大帝国的战争。

日本处境的尴尬

只要认为中国对于远征没有什么异议，西方列强的态度只能是抱一种善意关切的态度。美国政府起初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美国人为日本服务；但是到了最后一刻却禁止利用美国船作为运输舰，并调回美国军官。其他各国则一般自始就禁止它们的国民参加远征军。

西方各国的态度

334

两国似乎正在不知不觉地陷入战争。1874年10月初，大久保以特命全权公使自日本到达中国，携有不惜以任何条件解决问题的训令，但是这一点在当时是外人所不知道的。他建议总理衙门，由中国方面去完成惩罚这些部落的工作，另给付日本

1874年10月问题的解决

三百万元的赔款。偿付赔款一节被拒绝；于是日本全权公使提出了最后通牒，声明问题须于10月19日以前解决，逾期则日本将继续其已进行的工作。10月31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①，根据该项协议，"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即琉球人）妄为加害"②，"中国不以日本此次举动为不是"，日本同意撤兵，并由中国给以五十万两。关于此项赔偿，经议明不得认为有任何部分系赔补军费。中国准给琉球被害水手的眷属抚恤银十万两，又日本所修道路及所建房屋，中国愿留自用，准给价银四十万两。此次纠纷的得以解决，实多赖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先生之力。

这段插曲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这项解决，对中国来说殊属可悲。"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地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是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③尤为重要的是，它轻易地就放弃了纳贡达五个世纪之久的琉球群岛——这是安南、朝鲜、缅甸、满洲、蒙古和西藏等藩属或全部或局部地相继被蚕食的前奏。在1881年中国终于承认日本为琉球的宗主国以前，琉球群岛的地位问题一直是一个摩擦的根源。琉球王旋被降为藩主——这正是二、三十年后朝鲜国王的际遇的一个先例。

① 按指北京专条。——译者

② 参阅《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43页。——译者

③ 米基：《在中国的这位英国人》，第2卷，第255页。

第十八章　中国(1875—1894年)：帝国的衰微

1. 1876年的烟台条约

从中国至西方的贸易路线

自从中国的蚕丝通过漫长的队商大道，运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的时候起，如何谋取中华帝国的财富就已经是西方各国的目的了。近代的西方商人盘算着如何进入四川、云南和贵州这三个富饶而多山的省份问题，已非一朝一夕。如何不取道长江而进入这个区域的问题，是由于深入云南省而得到解决的。英印官商一直在研究能否从上缅甸，取道伊洛瓦底江进入云南。1874年，世人都注目于从伊洛瓦底江通航的起点缅甸的八莫开始，经腾越和大理府而至云南府的那一条路线。

柏郎上校率领的勘探队

英属印度政府为了取道八莫路线以勘探这个地方，曾于1868年派遣了由斯莱登上校率领的远征队，并于1874年又派遣了由柏郎上校率领的第二个远征队。这个远征队的人数共计一百九十三名。他们请求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发给护照，并从领事人员中调派一名翻译官。威妥玛先生挑选马嘉理先生担任这个职务，马嘉理在8月22日(1874年)从上海启程，于1875年1月17日偕同六个中国人经陆路到达八莫。

马嘉理被杀害

2月6日远征队离开八莫，21日马嘉理偕同六名中国人走在柏郎上校的前面去探查路线是否安全，被一群武装的中国人背信弃义地杀害了。26日，这个远征队回到八莫。抵抗行动

(马嘉理先生的被杀不过其中的一个插曲)几乎可以肯定是预谋的——但是应该由谁负责呢？是坚决反对进一步开辟贸易路线的缅甸国王呢？还是也反对进一步开辟贸易路线的云南中国当局呢？还是名义上受中国管辖、事实上各自为政并对素所畏惧的英国人率领的一支武装部队的前进感到惶恐的边区各部落呢？当马嘉理先生被害的时候，意义深长的是，和他同去的中国人之中五名华东省份的人被害，一名云南省人则平安无事。腾越和边境中间这一带的地方官，有洗清本身责任的义务。但是在他们之上的却是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因而他被指控要对袭击调查团和杀害马嘉理先生一事负直接责任。岑毓英是广西省人，帝国多亏他才把1855至1873年云南的一次如火如荼的叛变镇压了下去，那番镇压，据估计，把人口从一千六百万减到了六百万。这样一个人为了达到他所希冀的目标，把整个调查团屠杀尽净，也是不会有什么踌躇的，但若说他会故意不顾总理衙门所发的通行证，因而使帝国陷于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则不免过分。何况马嘉理在一封信中曾特别提到岑毓英对他的关怀。根据西方的任何政治理论，这位总督都是无责任可言的；只有根据中国的理论才能谈到他的个人的责任问题，因为照中国的理论来说，每个行政官吏对他的辖区内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要负责。

谋害的责任问题

336

3月11日威妥玛获悉调查团遭袭击和马嘉理遇害的消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试图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爰于3月19日提出了下列各项要求：

威妥玛公使的要求

1. 中国政府应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会同英国官员进行调查。
2. 允准印度政府派遣第二个远征队。
3. 以库平银十五万两交由威妥玛保管，作为办理善后之用。
4. 英国使节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四款所获得的“特权”，应解释为

给予一种合宜的和满意的觐见。

337 5. 应商订实施条约条款的办法,"俾英国贸易得凭以切实免予超过正税和子口半税的一切征课"。

6. "由于官员们的行动而引起的一切要求",应立即予以满足。

3月24日威妥玛将这些要求删为前三项,并电伦敦请示;复电通知他说,英国政府同意前两项要求,但对第三项却未置可否。

威妥玛的谈判方法

要对他所代表的国家利害关系如此重要的一个局面作明智的处理,威妥玛的性格殊不相宜。他希望能随时同他的伦敦的上司取得直接联系,而这一点,当时只有在电报的终点站——上海——才能办到;他想去上海,因而常常结合着这种打算而提出最后通牒和下旗回国的威胁。28日他通知恭亲王说,如果他的三条要求能够照办,"保证英国政府在摩民事件的罪犯依法惩处的时候,不另外要求赔偿";但是,如果到29日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满足,他就要从北京撤退使馆。中国的大臣们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三项要求;但是后来他们又乘机对提出这三项要求的专横的语气提出抗议。

1875年3月威妥玛对他的三条要求获得满足之后,立即前往上海。8月初他回到华北,11日在天津和李鸿章会晤时,又提出了额外要求。李鸿章受权同他谈判;但威妥玛说,他只能同朝廷讨论,爰于9月9日以好战的意图离津赴京。他又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29日以前获得满意的保证;只是由于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的让步,他才没有撤退使馆和华北各口岸本来会在冬季失却保护的英国侨民。

威妥玛的车轮大战

威妥玛无所施其技了,但仍不以为满足;10月11日又启程

338 前往上海,因而在他的同事们的心目中留下了一种强烈的不满

情绪，他们觉得，他在重新调整英中关系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各国的利益。1876年春季他回到北京，经过了拖延不决的谈判之后[1]，于6月间下旗，再度前往上海。威妥玛爵士在7月间到达上海后不久，赫德接踵而至，告诉他说，如果他能去烟台，帝国政府保证李鸿章将在那里和他会晤。因此他离开上海，于8月10日到达烟台，李鸿章于18日和他会晤。

烟台条约的签订

现在最后一幕戏的场面已经布置妥当。代表中国方面出面的是它的大总督李鸿章。备他谘询的有四十年来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顾问赫德，以及此后二十年中将成为这位总督的亲信顾问的现任烟台关税务司德璀琳。英国方面则有威妥玛公使统率驻华英国舰队的海军上将雷德尔以及统率因其陈兵海上而促成问题解决的那支分遣舰队的海军上将兰波特。会议一再举行，直到终于达成了9月13日所签订并于四天之后为中国方面批准的那项解决办法为止。

解决的条件

烟台条约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昭雪滇案”。中国方面应将奏折、谕旨和通令各省发布告示的底稿一并照会英国公使，征求同意。关于缅甸和云南省之间进行边境贸易事宜，应订立章程。英国得从印度另派官员前往云南，该项官员得在大理府或云南省其他城市驻留五年。对于被害人员的家属，对于为此次案件所用的经费，以及对英国商人由于中国官吏的措施而提出的赔偿要求，应付给关平二十万两的赔款。最后，中国应派遣使节前往伦敦去递送一封表示歉意的玺书。

① 威妥玛公使第一项要求中所规定的调查团于1876年3月6日抵达云南府。实际的结果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下级军官经判定应对未能维持治安负责，此外调查团还收到了十三名土著的供词，而这十三个人根本就不懂得诉状的言词或供词的重要性，威妥玛先生以署理总督岑毓英个人应负责任，拒不接受这些供词，并且继续施加压力，要求惩办岑毓英。

339

官员往来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优待往来各节”。中国大臣们应请各外国公使会同商讨礼节条款，以期驻在中国各口岸或其他地方的外国官员，得享受和他们出使其他各国以及中国官员出使外国所享受的同样待遇。至于在各通商口岸应如何认真审理司法案件，也应商请各国公使妥为议定。经规定凡华洋案件应视“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员处观审。……庶保各无向隅”①。在这种情况下，所引用的法律应为审理案件的官员的本国法律。

通商事务

第三部分是关于通商事务的。鉴于过去曾应承凡通商各口岸，准外国人所租用的地方一律免征厘金，中国政府兹同意开辟宜昌、芜湖、温州和北海为约开口岸；并准在重庆派驻领事，但在轮船未到达重庆之前，该地暂不开放通商②。另沿长江开放六处地方作为轮船停泊所。各口岸的租界应会同厘定界址。经双方同意，应妥议鸦片税厘③并征办法，关税厘金均应于出官栈时缴纳。内地贸易应妥订章程(另议专条)。对于英国拟行派员从中国出发，经西藏去印度，沿途应妥为保护一节，作有规定。

对于条约的估价

烟台条约备受英国商人的批评，他们宣称这倒不如回复到天津条约，而坚持予以不折不扣地执行来得更好些。除非认为英国得任意以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人，而中国只能毫无异议地唯命是从，这样一种批评就无法站得住脚。另一方面，高第却把这

① 录自条约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48页，烟台条约，第二端，第三款。——译者

② 这项条件后来经1890年3月31日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所废弃，而允准专门租用的民船往来运货，从而把约开口岸的权益扩展到距上海一千四百哩的长江上游的重庆。

③ 厘金是一种省当局抽收的内地通过税，原为按货物价值十取其一，首次开征于太平天国时期。参阅马士：《中朝制度考》。

项条约说成是中国国际关系史中的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1842年1858年的条约。这种看法似乎较为合理。除去未能将岑毓英及其他人员付诸审判之外，威妥玛爵士获得了他在以前十八个月当中一再要求的一切让步，而且还有所超过。

340

其他外国的驻北京公使，对于威妥玛爵士的烟台的解决办法，正如以前对于他在北京进行的初步谈判一样，都不满意。俄国和德国[①]公使尤其反对这项条约中列有关于厘金和官员往来的条款。法国公使则指示法国各领事，如有任何厘定租界界址的问题发生，即以对此问题并未奉到训令作复。这项条约有三分之二规定须所有其他国家的同意方能讨诸实施；而那些国家的代表却通知总理衙门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谈判应当以通常的方式进行，而在结果未定之前，他们不能同意缩小现行条约的规定。英国政府虽在原则上同意了这项条约的各项条款，但在物议沸腾之下，也只有低头退让了。列强都充分利用了中国所作的种种让步，但是英国却拖延了九年，直到1885年7月才批准了这项条约。

其他各国公使的不满

烟台条约中订有中国应派遣大臣赴伦敦道歉一款。这一点正合于中国政府拟在海外设立常驻使馆的意图。在1877—1879年之间，在欧洲各重要首都以及在东京和华盛顿都相继设立了使馆。

中国在海外设立常驻使馆

2. 俄国和伊犁

中国叫作新疆的那一片边远的疆土，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

① 经过四年的谈判之后，1880年3月31日德国公使同中国签订了续修条约。这件条约中值得注意之点是，每规定中国方面的一项让步，即规定德国方面的一项相应让步。这些互相让步之中，唯一具有重要性的，即给予一国的权益，如德国欲援例均沾，则非承允原议的附带条件不可。为了这项规定，中国一直争执了多少年。

阿古柏的叛乱

形，位于甘肃和库库诺尔(青海)以西，蒙古与西藏之间。中国据有这片疆土已有二千多年之久；往往脱离中国的统治，但总归又重隶于中国的治下。1864年，新疆西南部的喀什噶尔摆脱了中国的羁束。两年之后，北面伊犁一带的另一次叛乱，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回民政府。东干族的叛乱，在新疆东部奠定了它的权力，横扫甘肃全省，其军队甚至深入陕西以至湖北省境。

341

左宗棠

帝国的实力，由于太平天国的起事以及各地连年相继发生事故，以致骎衰；但是，一俟人力和财力有了办法，就来对这个回民的脓疮下手了。1867年，左宗棠担负起这项任务。左氏为人直率，生活俭朴，严格执行纪律但为士兵所爱戴，他对叛乱的城市采取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残暴的欺诈手段来作为惩罚的政策，而以他的卓越的将才，来贯彻执行。左宗棠的出征是在1867年从湖北襄阳府开始的。在随后十年中，他连战皆捷，长驱直入陕西、甘肃，跨新疆北部，南至喀什噶尔和莎车，靠了刀剑——和外国的攻城炮，他恢复了安宁和帝国的统治。

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

十九世纪中叶，中俄边境贸易在固尔札和塔尔巴哈台两处地方，已蒸蒸日上。1851年，两国为管理这种贸易曾在固尔札签订了一项条约①。由于关心这条通商路线的安全，俄国在1871年进兵固尔札，占领了伊犁地方。同时，俄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保证，说明占领伊犁是暂时性的，一俟中国能维持该地治安，当即将该地归还中国。在当时看来，似乎中国政府未必再能恢复这种力量，但左宗棠的节节前进不久就使这种力量的恢复具有实现的可能。1878年7月，中国于克服土耳其斯坦之后，立即通知俄国政府说，中国即将恢复对伊犁的行政，并将派遣使臣到圣彼得堡去谈判这个问题。土耳其斯坦现在在新疆这个

① 即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译者

名称之下成为中国的第十九省了。

1879年崇厚的出使

为了这个目的而奉派为全权大臣的崇厚于1879年1月20日在圣彼得堡呈递了国书。他的任务表面上很简单。中国现在只不过要求俄国早已答应过的事情而已。但是,俄国却霸占着这块土地,不肯放手。崇厚是一个饱学之士,为人和蔼可亲,然而却不是一个外交家。经过九个月的谈判之后,他所能得到的最有利的条件,就是1879年9月15日签订的利沣底条约①中所载的条件,也就是使中国举国震动的那些条件。根据这项条约,伊犁的西部,即比较富庶和比较大的一部分割让给俄国;通过天山的各山口,尤其是乾隆的那条从固尔札到阿克苏的行军大道所穿过的莫萨山口,都让给俄国;给予俄国人在中国西部很大的贸易特权和行动自由。除了这些让与之外,中国还需付给俄国五百万卢布,作为占领费。这类条件只会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但从来没有作为谈判的结果而被接受的。

1879年9月的利沣底条约

崇厚回到北京就发现有一道1880年1月3日的上谕已在等待他了,这道上谕以其未奉上谕即擅自回国,饬革去一切官职,并饬军机处就其所订条约妥议具奏。经过王公大臣会讯之后,他被判决处斩。这个结果有几分令人觉得是排外派对过分讨好列强的人的一个打击。各国公使对于试图以外交惯例解决国际纠纷而失败的一位钦差大臣所受的遭遇,表示愤慨。他们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都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但是,中国舆情汹汹,这次审判被迫达到对这位大使定罪的结果。于是俄国就向这带发生争执的地方进兵,在它的附近集结了为数达九万人以上的兵力;6月间,在这精神极度紧张的时刻,英国维多利亚

1880年崇厚的定罪

① 即伊犁条约,又称崇厚条约,据《中外旧约章汇编》载,系于1879年10月2日在利沣底签字。——译者

女王以她个人名义电请慈禧太后宽赦崇厚。

中国民心向战

343

中国民心向战已至于无以复加的程度。左宗棠在新疆有一支六万人的军队，十年来东征西讨的那些老兵宿将已结成为一个战斗机体。他渴望用这支军队来对付俄国人。把帝国推向战争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许多汉人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可以把他们从满洲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希望。

崇厚的缓刑

满洲政治家和他们的汉籍同僚都认识到这个朝代所面临的危险，最后决定必须抛弃一切战争的打算。第一个步骤是崇厚的缓刑。据宣布，加恩宽赦是为了表示中国不愿损伤俄国的体面，希望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第二个步骤是早在2月间已奉派为出使俄国全权大臣的曾国藩的儿子——驻英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现在的奉命出使。

电报的传入中国

这次危局的一个附带的结果，就是电报的传入中国。从上海经旧金山到伦敦的电报交通在1871年已经建立。中国的大臣们颇想在对俄交涉期间能和曾纪泽保持密切的接触，因而深刻理解到北京与海底电报终点站的上海不通电报的不便。1880年11月，李鸿章的一道奏折奉硃批拨发一笔巨款作为敷设从上海到北京的电报线之用。从上海到天津的电报线在1881年12月1日通报，随即延展到北京①。

曾侯的交涉

曾侯于1880年7月前往圣彼得堡，并且呈递了国书。他以俄国在满洲沿边既无金汤之固，在伊犁边境纵有所获也未必可靠的话，劝告俄国政府。中国大臣所给这位钦差的训令，语气坚决，并且大体上也是合理的。他显示出令人钦佩的外交才能，1881年2月24日圣彼得堡条约签字。

① 电讯一经采用，就很快地推广起来，到1928年时中国官营电报总局所属电报局已有一千一百七十所(其中计无线电电报局六十五所)。

根据这个条约的条款，俄国把崇厚所割让的帖克斯河流域和伊犁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一切山口都归还中国；伊犁西边地方则仍由俄国保留，但割让给俄国的东土耳其斯坦其余部分的土地须归还中国。由于这些让步，中国所付的赔款从五百万增加到九百万金卢布。此外，中国还允准俄国立即在土耳其斯坦和蒙古的某些城市设立领事馆，并允将来商业上如有需要，再陆续商议在其他城市添设。在这些地方，俄国人得购买土地，建造住宅、商店和货栈。他们也可以在土耳其斯坦和蒙古，直至长城一带经商，而只要商业情况尚不需征收关税时，即暂不纳税；将来如订定税则，应"符合于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曾侯也同意了其他一些有利于付税的协议。这个条约在交换批准书十年之后可以修订；但是，"如限满前六个月未请修改，应仍照行十年"①。

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2月)
344

左宗棠曾用武力平定了喀什噶尔一带，现在曾纪泽又和平而光荣地收回了伊犁。象曾侯这样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中国的经验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大臣们得到了教训。在距双方同样遥远的边境上，中国已经准备一战——正如它的对手一样，而正在秣马厉兵之际，发现外交毕竟是更好的武器。胜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法国历史学家高第后来在考虑东京问题(1883—1885年)时曾说："曾侯所签订的条约，结果是造成中国的傲慢，俄国的让步使中国人感到惊异；他们把不过是利己心和远见当作了恐吓，于是他们就从恐慌一跃而为最荒唐的自夸了。"

外交上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影响

骄傲自大而不是进一步的准备

3. 法国和东京

过去中国的政策是以许多缓冲国家围绕在自己的四周，形

① 参阅《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84页，改订条约第15条。——译者

中国为各藩属所围绕

345

成它本身与外面世界之间的一个中立地带。蒙古占据特殊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它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其他方面，它是由许多小的盟旗所组成的。其他的缓冲国都是中国的藩属，自理内政，不受干涉，只是承认中国皇帝为上国的君主，按期进贡，并在新王即位时接受册封而已。琉球每三年进贡两次，最后一次进贡是在1875年。朝鲜在1894年以前是每四年进贡一次。尼泊尔从1790至1882年每五年进贡一次；缅甸在1895年以前是每十年进贡一次；老挝每十年进贡一次；苏禄每五年一次；暹罗在1882年以前每三年一次。

安南的朝贡国地位

自汉代以来，中国曾屡次征服安南，并确立了皇帝的宗主权。从1801年一直到1884年，除因叛乱而道路被阻外，安南的统治者不请求册封或不按期四年一贡的情形，还无案可查。

1862年法国西班牙同安南立约

当1787年安南内乱爆发时，保皇军队的领袖派遣一个法国教会的主教作为他的特使到巴黎请求法国的援助。为了这个目的，双方于1787年11月在凡尔赛签订了一项条约，但并未执行。在法国大革命结束、王权恢复之后，法国渐图在印度支那扩张它的势力。在1843到1857年之间，法国以教士被害事件层见叠出，曾派海军远征队到印度支那勒索赔偿。这些事件给了法国以求之不得的借口。于是法国就同西班牙联合起来以图于安南逞其心愿，西班牙从马尼拉派遣了一支分舰队，而法国则调派了它在1858年远征中国的军队。战争从1858年9月开始，以1862年6月5日在西贡签订条约而宣告结束。根据这个条约，西班牙除在四百万元的赔款内分到一份外，别无所获；而法国除了昆仑岛之外，还获得西贡和交趾支那的东部三省（边和、定群、嘉定）的割让——而且安南王还应允除法国外永不割让领土的任何部分给予他国。1863年，法国又和柬埔寨签订了一项条约，以法国对

它的保护权代替了过去暹罗和安南对它的保护。最后在1867年6月，法国又吞并了下交趾支那的西部三省。

安南王国分为三个部分：北为东京(即北圻)，中为安南本部，南为交趾支那。其中控制着湄公河流域出口的南部，现在已经割让给法国了。但是，这条河却不能成为当时商人和官员们正寻求的进入中国西南各省的路线。在所有这些路线之中，除去从广东取道西江的那条路线之外，以通过东京取道红河的那一条路线为最方便，在商业上也最经济。红河航线的价值由于包括安邺、特拉格莱和堵布益在内的一连串大胆探险家的努力，而引起了法国的注意。1871年堵布益进入云南，1873年，他又旧地重游，并与云贵总督订了一个合同，规定运入武器和食盐以换取锡和铜。然后他又继续登程，前往河内，而河内的安南当局不许他利用红河航路运货到云南。于是他就纠合了一群中国人和菲律宾人，占领了河内，并向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海军上将求援。同时，安南嗣德王(阮福时)也派使往见杜白蕾，请派一艘巡洋舰帮助他把这个胆大妄为的法国人从他的领土上驱逐出去。

进入云南的路线

346

这时，杜白蕾将安邺召回，给了他九十名兵士和两只小船，命他前往河内，去裁决争执中的问题，至于方法，得便宜行事。安邺于1873年11月5日到达河内，他试图取得安南对法国在红河航行"权"的承认，但未成功。于在11月20日他攻占了河内的卫城，并于12月上半月内攻占了海阳、宁平、南定等城。既失河内，安南当局想起中国是它的宗主国，于是就向黑旗军①求

安邺强占河内(1873年11月)

① 黑旗军是刘永福所部的一支游击队。他们并不是中国正规军，然而却被用来维持中国在广西和云南南部边境一带的地位。这支部队大部分是从太平军残部中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安邺发动袭击时应安南方面之邀而入境之后，就留驻于该地，安南人既欢迎这些强劲的战士所提供的保护，中国大臣也拒绝命令他们撤出。他们以武装占领和沿途设征税站抽征通过税，来继续封锁红河——法国的真正目标。

援。黑旗军应声前往，12月21日与法军发生冲突，安邺阵亡。这时，法国所派遣的一个民政委员费拉斯德出场了，1874年2月6日同安南签订了一项协定，把河内和安邺所占领的其他城市归还安南人，堵布益被驱逐出境。法国因于普法战争之后，创夷未复，力不足以采取冒险政策。法国所失去的一切，都靠了对安南王施加外交压力而照数收回，结果是在西贡签订了两个条约：一个是3月15日签订的媾和同盟条约，另一个是8月31日签订的通商条约。

347

西贡条约(1874年3月)

根据媾和同盟条约，法国承认安南的完全独立，不受任何外国的统治，如有内忧外患，法国允予保护。法国将赠送安南王军器并供给军事教官。安南承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全部主权。允给天主教以充分的自由和许多权利。在安南的法国人以及一般的外国人均享有领事裁判权，但行使管理权和裁判权的当局是法国专员。河内市和归仁(东奈)、宁海两个口岸开放通商，并给予法国从海口通过红河前往云南的航行权，按照通商条约条款进行贸易。

法国要求宗主权——中国的抗议

法国这时已代替中国而为安南的宗主国了，于是训令它的驻华公使将这种变更通知切身利害攸关的中国。同时，法国要求中国取缔经常越境到东京进行抢劫的游勇，并为取道红河路线的贸易，在云南开放一条通路。在1875年5月的时候，中国正全力应付马嘉理被害事件而不遑其他；但恭亲王答复说，他已经在十八个月之前将云南从未开放而且也不能开放对外通商之意，通知了法国公使热福里。他并进一步声称，安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当时在安南的中国军队是应安南王之请前往驻扎的。后来在9月6日的一个照会中，他仍坚持这一立场。

根据1874年的条约，安南王实际上已经把他对中国的效忠

移转给法国了，但他仍力图逃避。在1879—1880年他试图与暹罗和西班牙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但为法国随时监视的外交所梗阻。但是，嗣德王的希望主要是寄托在他的世世代代的宗主——中国皇帝身上。虽然他已签订了1874年的条约，但在1876年1880年他仍照例派遣使臣到北京进贡。1880年，曾侯曾两度得到法国外长佛莱新纳和法国总统格利维的保证说：法国对东京并无野心。中国公使再行询问，法国新任外长圣希拉尔竟答复说，法国根据1874年的条约已经承认安南的安全独立。曾侯对于这个解释提出抗议。1882年1月1日，法国新任外长刚必达照复说，法国对于安南事务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权。5月31日佛莱新纳一反自己以前的决定，通知中国公使说，关于只是法国和安南之间的事情，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解释可提。曾侯宣称，所要讨论的问题乃是中国对安南的宗主权问题。现在法国对这种宗主权争持不让。这样，争执的问题就直截了当地摊出了。

安南方面企图规避法国的宗主权

中法在安南问题上的交涉

348

1881年秋季，法国要求安南王驱逐黑旗军。因为知道这件事是他力量所不及的，法国就把防守河内的军队增加到四百五十人，归法国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1882年3月25日李维业到达河内。安南人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大为恐慌，于是增援加强卫城的防御，而现在法国人则认为占领并解除卫城的武装是必要的了。占据河内的这一小支法国军队，已经为黑旗军有效地包围达一年之久，而只能作一些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李维业在河内

12月20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在上海签订了一个协议，中国应允从东京撤兵，法国则承允不侵占安南的土地，不侵犯安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同保证安南的独立，中国并允准由红河入云南贸易。这种解决纠纷的办法似乎可以恢复和平了。这

中法的外交活动

个办法完全为中国所接受，虽则照例还是有一个大声疾呼的主
349 战派；但是当时法国的政治已混乱到不许可作出一个明智决定的状态。最后，茹费理上台，他提出一个五百五十万法郎的远征东京的军费案，1883年5月15日经国会通过。这样，两国都准备一战了。黑旗军在河内周围发动了一次更积极的攻势，黑旗军的统帅向李维业下了一封战书，李维业在获得增援之后，于5月19日发动了一次突围战，就在作战中阵亡了。法国接受了这个挑战，组成了海陆军混合队去解决东京问题。

顺化条约(1883年8月)

1883年7月17日安南嗣德王逝世，其弟继位，旋于11月又由幼主阮福升继位。8月25日法国和安南在顺化签订了一项条约，其第一条规定，安南承认和接受法国的保护，法国管理安南政府的一切对外关系，包括对华关系在内。根据其他各款，法属交趾支那的面积得到了扩充；东京在行政上已置于法国专员的管辖之下；除海关和公共工程外，安南本部由安南人自行管理；法国商人得在东京全境和安南的某些口岸进行贸易而不受限制；法国认为必要时，得派兵据守红河全程。这样，1874年条约获得了确认和扩大，安南也就被置诸法国的控制之下了。

中国坚持对安南的宗主权

中国朝廷大为震惊。7月间，中国请求美国政府出面调停，但为法国所拒绝。8月法国宣布封锁安南和东京各口。11月，恭亲王和曾侯通知法国说：二百多年来安南一直是大清的藩属；中国极愿与法国保持和平；但如法国军队在东京与中国军队相遇，则必定会引起冲突。

山西是东京各河流的战略中心，12月16日为法军所攻占；北宁是红河三角洲的最坚强的据点，又在1884年3月12日被占领。在这两个地方，中华帝国的军队都参加了防守。北宁失守之后，恭亲王被免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似乎完全决裂了，但

它又为非正式的外交接触所羁延。广州公认是法军可能进攻的地点；3 月底，德璀琳先生正首途前往广州就任税务司的职位。在从香港至广州途中，他在福禄诺舰长所指挥的“伏尔他”号军舰上，受到法国海军上将利士比的款待，利士比是次于孤拔海军上将的副司令；他们三人在友好的气氛中讨论了东京问题。后来，德璀琳力请两广总督立即将广州无法防守的情形告知李鸿章。于是，李鸿章召德璀琳到天津去商量。他们决定邀请福禄诺到天津来，李鸿章和福禄诺原是相识的。福禄诺舰长备妥了全权证书，1884 年 5 月 11 日这两位谈判人员在天津签订了一个协定。

350

1884年9月的李—福协定

根据李—福协定，法国应允尊重和保护中国现在的南部边界。中国承允即行撤退当时在东京的驻军，并尊重法国与顺化朝廷之间直接订立的或将要订立的各项条约。法国放弃任何索赔的要求，中国准许在东京与毗邻中国各省的货运自由。最后，法国同意在它与安南的谈判中决不使用伤害中国威望体面的字样。不幸，李鸿章把主战派的反对称作“群犬狂吠”，而没有来得及同主战派达成妥协，他甚至越出了他的主要支持者慈禧太后的意旨。慈禧太后曾经声言，只有在四个条件下才能媾和：(1) 中国不能放弃它对安南的宗主权：但这已经放弃了；(2) 中国不能否认黑旗军：黑旗军未被否认；(3) 中国不能偿付赔款：并未偿付赔款；(4) 不允许对云南通商：通商已经允许了。这四个条件中的最重要的两个都未做到，因此帝国政府不能或不愿下令执行协议的条件。

351

1884年6月23日法军败于北黎

李鸿章和福禄诺商定，中国在广西边境的防营在 6 月 6 日前撤退，在云南边境的防营在 6 月 26 日前撤退，过了这个限期，法国军队得加以驱逐。度日业上校奉命率领兵士九百名前往占

领谅山,这是一个进窥广西边境的据点,6月23日他在北黎遇到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统帅以书面通知度日业说,他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并且很合理地请他转知法国当局以必要的命令见示。度日业没有中文翻译为他解释信中的正确意义,而立即发动进攻。他被击败了,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

败于北黎之后

法国政府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7月12日法国公使奉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履行李－福协定,并赔款两亿五千万法郎;这项要求如在一星期内未被接受,法国将夺取物质保证。中国大臣们的答复是接受履行李－福协定的要求,但对夺取物质保证的恫吓提出抗议,拒绝赔款的要求,并请对于从安南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立即撤兵一节从广义方面加以解释。然而,7月16日却降谕撤兵。再度通过美国政府的斡旋而获得调停的企图又为法国拒绝之后,法使巴德诺和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28日在上海开始了最后条约的谈判。法方提出将赔款减为八千万法郎,中国仍然拒绝,但许以关平五十万两(约合三百三十万法郎)作为北黎误会的事件中法国被害者家属的抚恤金。

袭击基隆

8月4日,海军上将利士比率领兵舰四艘,向基隆炮台招降;因未得到答复,即于次日开炮轰击,并使炮台停止了炮火,随后又以火棉将炮台损毁,但是,6日法军攻占基隆城的企图却告失败,还略有伤亡。中国以谈判期间不宣而战,实为史无前例,352 一面提出抗议,一面向各国呼吁。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两国的代表仍在交换外交照会。8月19日,法国驻北京代办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其中唯一的要求是索取已减至八千万法郎之数的赔款。他以未获满意解决,当即索取护照,于8月21日下旗回国。

中国主和派的困难

除非认为一个亚洲国家没有欧洲人所必须尊重的那些权利,法国的行动是无法解释的。在李－福协定中,中国在每个重

要问题上都对法国让步了。在作这些让步时李鸿章不失为一个政治家，但他不是帝国的主宰，一大批有势力的主战派，由于为最近伊犁事件的成功所鼓舞，立即拒绝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如法国执政者果有真知灼见，就应该了解李鸿章的困难，在他已经作了那样多的让步之后，不要再迫人太甚。

福州的中国船队和炮台遭到摧毁(1884年8月)

孤拔海军上将于7月13日进入福州港塔埠的时候，曾受到最友好的接待。8月22日他接到进攻的命令，次日下午一时五十六分开了第一炮。法方计有船舰八艘，内装甲舰两艘，共一万四千五百十四吨，另鱼雷艇二艘，配备有兵员一千七百九十人，大炮七十七门，几乎全部是重炮，此外还有许多最新式的机关枪。中国方面计船舰十一艘，其中有木船九艘，共约六千五百吨，配备有兵员一千零四十人，大炮四十五门，其中大口径的只占极少数；此外还有旧式炮船十三艘，武装划子若干。不到一分钟的工夫，中国旗舰就中鱼雷沉没。这场战斗实际上不到七分钟就结束了。不到一小时工夫，中国兵船不是在停泊的地方沉没，就是起火焚烧，无可奈何地随波漂荡在作战地点的上游或下游相继沉没。在这一小时终了之前，法国人所建造的那个兵工厂受到攻击，船坞也被炸毁。法国方面的伤亡是死五人，伤十五人，中国方面死五百二十一人，伤一百五十人，失踪五十一人。翌日，即8月24日，“拉喀利苏理埃”号从海面上攻击金牌炮台，但随即撤退。金牌炮台及上游的闽安炮台都是把大炮建在坚固的石头炮眼里，因此只能向面海的一方发炮，对来自上游的敌人则无法攻击。而现在它们正是从上游受到攻击和破坏的，闽安炮台在8月25至26日被击毁，金牌炮台在8月27日被击毁。

353

战争状态与报复状态

中国政府这时才宣布中法两国已经交战。法国人方面正为欧洲的局势所困，埃及问题也很尖锐，而且他们希望能利用远东

方面的中立港口作为基地。所以他们没有宣战,宁可进行以"聪明的破坏"来实现的报复。

炮轰淡水

利士比在8月5日进攻基隆之后,就在港外坚守阵地,到了9月间则从事夺取基隆港和港口周围小山中第一座山头的行动。这个阵地是由杜且斯尼将军率三千陆军据守的,这支军队虽经多次会战,却始终未能越过划分这座山头的那些山峡而深入内地。10月1日孤拔海军上将率领舰队抵达淡水港外,次日就炮轰炮台,但造成的损失不大。8日又恢复炮击,并以军队八百人登陆进攻炮台。经过三小时的战斗,他们被击退回船。据守台湾的中国军队约有五万人,防御工作是由刘铭传精心擘划的,刘氏当时是督办台湾防务大臣;以后台湾建省,任第一任巡抚。

台湾的封锁(1884年10月23日)

孤拔海军上将宣布,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有效封锁。这就引起了敌对双方交战国地位的问题。11月,英国通知法国政府说,英国准备承认台湾的封锁是一种交战的封锁,但是,因为法国与中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局限于特定地区,且中立国的船只在公海上不受到妨碍,所以英国决定只限于严格执行外国募兵法而不正式宣告中立,以免使局势恶化。又据宣称,英国政府认为就事实和法理而言,中法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这一决定的后果之一,就是封闭香港不再供装运煤炭和修理船只之用。法国政府最初曾经同意不在公海上行使检查船舶的权利,现在则决定执行交战国的一切权利了。当时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正因朝鲜问题感到紧张,法国就怂恿日本也对中国宣战。这样就可使日本的港口供法国使用。但日本方面尚无作战准备,因此这项劝告没有发生作用。

354

接着法国政府又发出通知说,自1885年2月26日起,凡运

往广州以北各口的大米，一律视为战时违禁品。采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对中国朝廷直接施加压力，迫使求和。从海军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但这时漕粮大部分是由英美轮船运送的，这项办法引起了一阵激烈的抗议。英国政府抗议将大米一般地视为战时违禁品，并且声明将不受任何捕获法庭所作与此原则相反的裁定的约束。美国政府"宁愿等具体事件发生后，再决定哪些是违禁品哪些不是违禁品"。为了采取结束战争最有效的手段，法国人陷入同英国发生摩擦的危险中，而他们在埃及问题上原来就同英国纠缠不清了。他们已经厌战，准备随时听取和平的建议。

1885年宣布大米为战时违禁品

解决中法问题的努力一直都在进行，但无结果。最后在1885年1月，赫德爵士开始了一系列的交涉，终于恢复了和平。10月间，海关巡艇"飞虎"号在台湾海面被法舰劫走，孤拔海军上将通知海关当局说，他非奉到巴黎方面的训令不能将它放回。赫德总税务司爰于1月7日训令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前往巴黎交涉这只巡艇的释放事宜。同时，他又奉命向茹费理探明法国在什么条件下才同意终止这种报复状态。3月1日他将一道密谕照会茹费理，其中列有明确的建议。3月28日中国方面克服谅山的这个意外成功，造成了茹费理内阁的辞职，也未始不会造成问题的复杂化；但是上谕中所开条件已载在4月4日由毕乐和金登干所签订的草约之中。草约体现了中国在3月1日提出的建议，其内容如下：

赫德爵士同茹费理的交涉

355

"第一款　中国允将西历1884年5月11号所订天津条约批准，法国亦惟愿完全实行此项条约，别无他种目的。

1885年签订的草约与和约

第二款　中、法两国允俟必须之命令能颁布及奉到后即行停战，法国并允将台湾封港事宜撤除。

第三款　法国允派大臣一员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之细目，然后再由两国订立撤兵日期。”①

4 月 13 日的上谕批准了李－福协定，并且核准了休战。三天之后，台湾封锁解除，法国海军撤到 3 月 31 日所占领的澎湖列岛。

战争的代价

自 1885 年春季的谈判起，李鸿章就被排斥出去了，于是赫德爵士才能直接在北京的大臣们身上下功夫②。双方都衷心厌倦这种无结果的战争，都欢迎结束这场给任何一方都没有带来荣誉或利益的争端。1885 年 6 月 9 日李鸿章和巴德诺所商订的天津条约签字，这个条约扩大了李－福协定的条款，将谅山和老街划给法国以解决边境问题，将安南的宗主权让给了法国，并商定了边境贸易办法。另附有诠解书一件，言明约内关于中国威望体面之“望”字，不能解释为“冀望”“盼望”的意思③。十二个月来成为和平障碍的一直就是法国的赔款要求，起初要二亿五千万法郎，后来减到八千万法郎。赔款是不提了；但是，为使法国政府得向国内表示已经替法国实业界争得了一些利益，作为 1883—1885 年开支三亿四千四百万法郎的补偿，特规定，如果中国决定建筑铁路，“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④。

356

① 录自《停战条件》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卷，第 463 页。—— 译者

② 赫德参与其事的价值，在 1885 年 8 月 4 日的上谕中得到了具体的承认。他奉派继 3 月间逝世的巴夏礼爵士任英国驻北京公使一节，于 1885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京报。由于另派总税务司困难重重，赫德爵士在 8 月间辞去公使的任命，以便重任总税务司职。

③ 请参阅海关编：《中外条约汇编》，第 1 卷，第 902 页，《中法条约》所附诠解。—— 译者

④ 录自条约第七款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卷，第 468 页。—— 译者

继1885年和约的缔结，中国和法国在1887年又签订了两个条约——一个是4月25日签订的，一个是在6月26日签订的。根据以往来照会和后一日期所签订的一项划界条约为补充规定的这两项条约，中国与东京之间的边界划在这样一条分界线上，把中国侵入东京的一切可能的进出口都归入法方；越境贸易则是按照互惠待遇规定的；云南的蒙自市及其附属口岸蛮耗，还有广西的龙州，开放为越境贸易的通商口岸。根据1895年6月20日所签订的一项条约，改以东京的老街市对岸正处于边境上的河口代蛮耗为通商处所。云南西南角的思茅开放为云南和法属老挝之间的通商处所，共同边界也作了修改，将江洪区域的一部地方割让给法国。这项条约是中国为酬答法国在4月间俄、德、法三国对日干涉中所扮演的角色付给的一部分代价。

1887年和1895年中法两国所订的条约

4. 暹罗、马来亚和缅甸

暹罗王国与印度支那和缅甸关系密切，直到1882年还是中国的朝贡国，王国的一部分居于马来亚半岛的北部。十六世纪初叶，欧洲人在东方的出现，对于暹罗－马来各国的历史，不能没有重大的影响。在欧洲人出现之前的几百年期间，中国各族人民早已在这个区域经商和定居了，暹罗人的确一部分是佬泰的后裔，这一族人是始居于中国西南部，在六一十三世纪之间移居暹罗，然后与吉蔑人同化的。1511年阿布奎基对当时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的马六甲的征服，助长了不久之后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中葡交往之初的险恶局面。

中国与暹罗早期的往来

357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暹罗的大部分历史是和暹罗同缅甸以及暹罗同后来并入法属印度支那的各王国间的战争有关的。葡萄牙人在暹罗保持优越地位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他们经营贸易，

暹罗与葡萄牙和日本的关系

并帮助暹罗人进行与邻邦的战争。但是他们并没有独占暹罗。十六世纪后半叶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统一日本，结果造成了十六世纪最后十年和十七世纪前三十年日本在经济和陆海军方面的极盛时期。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群岛，而且也达于暹罗。在1592至1632年之间，有大批日本人前往暹罗，在那里参加贸易和战争。日本人所受到的尊敬无异于欧洲人。但是，他们的势力终于太大了，因而遭到暹罗人的屠杀，正如中国人同时在菲律宾遭到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的屠杀一样。1640年日本封锁对外往来，结束了暹罗与日本之间的这一段有趣的关系，直到二十世纪才又重新开始。

暹罗与荷兰人的关系

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对外关系具有那样深远影响的葡萄牙与荷兰之间的竞争，在暹罗的对外关系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章节。葡萄牙警告暹罗说，荷兰人是海盗，这种诽谤是由于暹罗在1604年派遣了一个赴爪哇并转道至荷兰的使节团而被揭穿的。此后，暹罗继续与荷兰通商；1624年一度暂停，但是三年之后应暹罗商人自己的请求而又重新开放。暹罗商人终于非常依靠同荷兰人的贸易了，当1663年荷兰人停止贸易活动以抗议不公平的待遇时，358 暹罗很快就消除了摩擦的原因，翌年8月22日签订的一项条约，甚至允准荷兰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几年之后，荷兰的手工艺者、水手和工程师从巴达维亚聘往暹罗服务，荷兰代表且蒙暹罗王召见。但是到十七世纪末叶，荷兰势力就渐渐衰落了。

暹罗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的关系

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本来是很想夺取荷兰人渐渐失去的经济地位的，倘使他们肯以平等的地位看待暹罗人，他们倒也未始不会成功。1717年，他们派遣了一个使节团，颇受到暹罗王的优待，而且暹罗王很快地就允准与菲律宾建立贸易关系。当这位西班牙使节还耽搁在暹罗朝廷的时候，一船暹罗物产已经运到

马尼拉去开辟贸易了。但是，这条船的船长和全体船员受到了无礼的待遇，而对他们带去的西班牙驻暹罗使节写给菲律宾总督的信件也不甚注意，因此暹罗人大怒——这次可望成功的海运贸易一无所获。

暹罗与法国的关系

暹罗与法国的初次交往，正如与菲律宾和日本一样，是以不幸的结局而告终的；在它那种把宗教和政治亵渎地混杂在一起的问题上，令人不禁模糊地想起几乎同时在中国和日本所发生的种种演变。大约在1650年，耶稣会教士已开始在暹罗活动了；几年之后，他们找到一个谄佞的代理人富尔康，他是希腊克法利尼亚岛的冒险家，是在一条英国船上做舵手而来到东方的；他的宗教色彩的善变正如人所共知的变色龙的体色一样。这个精明的希腊人很得暹罗王佛那莱的宠信，他未始不会作到首相，但是他安于外交大臣的职位，这是他聪明的地方。他实行了许多改革，其中包括建筑新式炮台，并建议派遣一个使节团访聘路易十四；1685年路易十四也派寿蒙和著名的福尔宾带了他自己写给暹罗王的一封信前往报聘。法国使臣带来了织物、钟表、镜子等贵重礼物，以及其他可以取悦东方统治者并使他们对法国的灿烂文明获得印象的商品。福尔宾所给暹罗王的印象之好，显然无异于马可波罗所给忽必烈汗的印象；他担任了国王的大将军(即总司令)和曼谷的长官。两年之后，他因富尔康的妒忌而引退。路易十四和耶稣会教士急于要使暹罗王和他的人民改信天主教，从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控制这个国家。法国的兵士作为仪仗队被派到暹罗去，他们逐渐变成了曼谷和墨即(又作丹荖)的驻防军。1686和1688年，塔沙尔神父任暹罗王驻欧洲特派专使。在第一次出使时，他和英国商订了一项条约，根据那项条约英国人准在暹罗居住和经商。

359

法国的策略逐渐引起暹罗朝廷的反对；1688年暹罗王逝世之后，一个名叫拉碧罗扎的大臣篡夺了王位，领导了一个反法的运动。富尔康被控阴谋把暹罗置于法国的统治之下而遭到拷问；他不久就死了，他的日本籍妻子和家属被卖出去做奴隶。法国在曼谷和墨即的驻防军被驱逐出去了，他们被迫逃避到庞迪契里。耶稣会教士和教徒接着也受到了这个篡位者的注意，他们所受的处置与半个世纪前日本基督教徒所受的处置如出一辙，使人不禁怀疑这个篡位者是以日本人的行动作为榜样的。法国教士和当地教徒所受的虐待和侮辱是无以复加的；许多教徒被判处死刑，而法国教士所面临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最后在1780年，朝廷下命令将天主教教士一律驱逐出境；然而，正如在中国和日本的情形一样，他们仍有少数人不声不响地私下继续工作。1786年已在英国控制之下的槟榔屿，被他们用来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法国势力早期的失败

暹罗的基督教徒受到迫害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内战和对外战争使得暹罗人不暇他顾，因此与欧洲的关系也就无足轻重了。可是，在十八世纪中，英国在印度击败了法国人，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它的大印度帝国的大部分上层建筑。为了在东部保卫这个帝国，为了控制同中国和太平洋的交通，对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加以控制是必要的。马来半岛位于南北和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有史以来它就是人类的熔炉和混乱的地方。

马来半岛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360

英国的帝国缔造者们从这种混乱中逐步地建立了秩序。英国控制马六甲海峡北入口处附近的槟榔屿是从1786年开始的；四年之后槟榔屿就被永久割让给英国了。这是莱特爵士具有远见的结果。大英帝国之所以能获得位于马来半岛以南、控制海峡南面进出口的新加坡岛，则应归功于拉斐尔斯爵士的同样能

英国在马来半岛的地位

干的政治手腕。新加坡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以前很少为人所见到，然而却是拉斐尔斯所清楚理解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819年6月的下述一句话中看出："我敢保证，这是东方最最重要的驻防地，并且就海军优势和商业利益而论，它比整个大陆还具有更大的价值。"一个世纪之后英国把新加坡建成为东方直布罗陀那样一个要塞的计划正是他具有先见之明的佐证。1819年2月英国采取了控制新加坡的第一个步骤；而全面控制这个岛屿——面积共有二百十七平方哩——"以及邻近的海面、海峡和距离该新加坡岛沿岸十浬的各小岛"，则是在1824年8月克劳佛德同柔佛国王和新加坡当地的酋长谈妥，将新加坡永久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时完成的。

拉斐尔斯与新加坡

在同一年，拉斐尔斯从荷兰获取对马六甲的控制，也告成功了。自1511到1641年，这个商业的要冲据点一直在葡萄牙的控制之下，而自1641到1795年则是在荷兰的控制之下；在1795到1818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曾经占有这个地方，后来又还给荷兰。现在，以苏门答腊的几块不重要的土地作为交换，狡黠的英国政治家得以完成英国对印度至远东的航线的控制。这三个战略据点在1867年与韦尔兹利省和天定两地合并成为海峡殖民地。

拉斐尔斯与马六甲

克劳佛德在转让新加坡给东印度公司的谈判成功两年之前，曾由印度总督派为赴暹罗专使。经过一些周折之后，他获得朝见。他的目的是要争取豁免印度贸易方面的进出口税，并同暹罗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他的成就殊不足道，虽然暹罗表示愿意继续通商。1826年，白奈舰长奉派去请求暹罗帮助英国进行第一次对缅战争，这时他同暹罗签订了一项条约和一项商务协定。根据条约规定，自由贸易只准在各省长官所指定的地点进

361
克劳佛德与暹罗

行。暹罗不但不允许英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一如1664年曾允许荷兰人的那样,而且规定了这样的原则:"凡进入暹罗地方的英国人民,一切行为须完全遵照暹罗地方的法律,也就是说,英国人如犯杀人罪,应处死刑,如犯其他的罪名,应分别处以鞭责、罚款或监禁,如对暹罗官员出言无状,应即驱逐出境。"暹罗方面继续对进出口征课重税,而贸易关系很少改善。

1855年包吟条约

在1855年,英国女王陛下驻华贸易监督包吟爵士奉派为专使,赴暹罗商订条约。他受到殷勤的接待,并且签订一项比以前任何条约都更令人满意的条约,这项条约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同外国所订条约的原则而签订的。条约中列进了最惠国条款以及缔约的一方对另一方侨居本国境内的国民给予保护的规定。条约中以下述规定承认了英国方面的领事裁判权:英国得在曼谷派驻领事一人,该领事在某些细微的限制下,有权审理一切英国人涉讼的案件。依照领事裁判权的原则,旅居暹罗的英国人民在居住和行动方面现在受到了一些限制;但是,却获准按照基督教的仪式礼拜,在政府特准的地方建造教堂。鸦片准免税进口。其他一切进口货按值百抽三的税率纳税;出口货则依照条约附表纳税。缔约双方均得在十年届满时要求修订条约。

最惠国条款和领事裁判权

362

基督教的弛禁

准鸦片进口

1833年3月30日,美国政府的一个特派代表罗伯茨,曾经与暹罗签订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和英国白奈舰长在1826年订的那个条约并没有多大不同。在领事裁判权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让步,而在鸦片贸易解禁方面,虽然经过这个美国代表的努力,却也不比英国人有更多的成就。关税虽然豁免了,但是代替关税而抽收的吨税却高到了寓禁于征的程度。美国驻新加坡的兼任领事巴勒斯铁在1849年企图补救这个缺点的尝试完全归于失败。哈里斯奉命在前往下田就任总领事的途中,在曼谷稍事

暹罗与美国的关系

逗留，谈判一项条约，这项条约缔成后将给予美国的利益之大，无异于1855年条约所给予英国的那样。在1833年罗伯茨订约的同时，美国基督教的教士已在暹罗开始活动。美国政府于是训令它的使节商订办法，使这项工作得毫无阻碍地继续下去。1856年4月哈里斯正在巴夏礼和暹罗交换包呤条约批准书的时候到达暹罗，他很快地同暹罗商订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同包呤爵士所达成的大同小异。因1824—1826年和1852年的英缅战争而深感不安的暹罗人，原是很高兴给以出乎美国要求或想望之外的东西的。哈里斯报告华盛顿说："在我和暹罗大臣们秘密会谈中，他们表示对英国是既怕且恨。他们从缅甸的历史中看到也许在等着他们的那种命运，他们认为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们亟想托庇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他们坦率告诉我说，如果我肯缔结一项同盟条约，他们将不惜给予我们以所能要求的一切，甚至贸易垄断权也可同意。"

哈里斯在暹罗

暹罗对英国的恐惧

如果暹罗对于英国并吞缅甸的领土感到不安，那他们就有理由对法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帝国的政策感到惊慌。法国在十七世纪时，狼蒙羊皮，披着宗教外衣，阴谋鲸吞暹罗的扩张企图，曾经遭到悲惨的失败。两个世纪之后，法国在维持它的被保护国安南的权利的借口下，准备再图以暹罗为牺牲来建立一个帝国。安邺误以为湄公河流域对法国会有巨大的商业上的价值。这条河在暹罗和安南的关系上所起的作用，与来因河在德法关系上所起的作用并无不同。暹罗据有湄公河南岸以迄于安南的峰峦起伏的边界那一带土地至少已有五十年之久，但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法国在同中国争夺对东京的控制权之后，向暹罗提出对琅勃拉邦省以南直至湄公河口一带的领土要求。暹罗提出抗议，并且主张任命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划定两国的边界，同时建立

363

法国卷土重来

湄公河

一个宽三十哩的中立地带。

正如日本在1882年向欧洲国家建议朝鲜中立化一样，法国在1885年也向英国建议暹罗的中立化。可是，对暹罗的情况来说，中立化也并不比对朝鲜过去的情况更为适合。英国预见到在马来半岛和暹罗与缅甸交界地方可能发生的事情，因而尚未准备同意法国的建议。暹罗和法国的意见分歧，直到1893年初在暹罗境内发生了冲突，法国人遭到杀害时，才获得解决。法国这时在暹罗所用的办法，就是二十二年前俾斯麦在法国、两年后日本在中国所用的办法。法国对暹罗提出的要求大为增加，为了迫使暹罗接受，并以炮轰曼谷相威胁。法国要求暹罗割让包括大约琅勃拉邦省半个省在内的湄公河以东的全部领土，以及河中的岛屿；要求暹罗的军警永久撤至距湄公河右岸十五哩以外的地方；偿付赔款；并由法国驻守尖竹汶城直到1893年10月3日所订条约中的条款付诸实行时为止。由于这项条约，法国在东南亚的领土实际上加了一倍。

主张暹罗中立化的建议的失败

法国对暹罗所提出的要求

364

但是，法国对暹罗的要求还不止上面所说的那些；这项条约的第八款规定："法国政府保留在它认为需要设立领事、保护其臣民(指归由法国审判的侨民〔ressortissants〕)的利益的地方，设立领事的权利。"1885年领事裁判权已在暹罗开始实行，从而使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安全和舒适地住在那里。法国现在不是为了司法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把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不但包括旅居暹罗的欧洲人，而且包括他们的那些旅居暹罗的亚洲臣民——英国亦复如此，不过略有程度之分而已。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国竟决定保护境内的某些华侨；他们鼓励华侨向设立在各中心地点的法国领事馆申请保护；在三年之中归由法国审判的侨民的人数从二百人上升到

领事裁判权和归由法国审判的侨民

三万人。象第八款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对暹罗主权的侵害，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法国最后要将暹罗置于它的统治之下的意图。我们可以说，暹罗在1893年的对法斗争中已经乖时背运到了极点；它如同夹在钳子中间的硬壳果一样，似乎将遭到朝鲜所要遭到的命运，从亚洲的地图上消失了。暹罗人民幸运的是，暹罗局势的内外因素都和朝鲜不同，因而这两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也就不同了。

中国同它的藩属安南的关系的调整，接着就引起它同缅甸的关系的类似的调整。1862年下缅甸并入英属印度，但是，上缅甸虽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却仍由缅甸王统治。可是，到1886年，为了印度的福利和法国在远东的扩张野心这种种关系，上缅甸也被并入英属印度。缅甸与中国的关系是由1886年7月24日帝国政府被卷入朝鲜事件时在北京签订的一项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同意不过分强迫开放西藏，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让步：允由缅甸循例每十年一次遣使向中国呈进方物。作为这些让步的交换条件是中国承认英国在缅甸的地位。

1886年7月的缅甸条约

365

根据1894年3月1日签订的一项条约，中缅边界经予划定，中国允开放一个城市——后来指定为腾越——作为内地的通商口岸。并且特别订明：中国必不将孟连或江洪的任何部分让给其他国家。1895年6月由于中国将江洪的一部分割让给法国而违犯了这一条规定，因此，根据1897年2月4日签订的一项条约，英国得到了补偿：滇缅边界经双方同意应加修订，以便将某些区域划归缅甸，当时英方希望以这些区域控制萨尔温江，象一个楔子一样插入中国以后，可以提供一条通入云南的贸易路线。另据一项专条的规定，梧州、三水和江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并将西江沿岸四处地方开放为停泊所。

1894年3月订立的条约

5. 香港和澳门

英国政府所以迟迟不批准烟台条约,主要是由于鸦片问题难以解决。1843年以后信德的兼并,使波斯和土耳其以外的一切鸦片供应来源都处于英国控制之下,所以鸦片问题主要是英国的问题了。鸦片是作例外处理的。根据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的规定,鸦片只能由中国人运往内地,而且只能作为中国的所有物,至于鸦片如何征税则听凭中国政府办理。外国进口商可以在通商口岸界内储存鸦片,这样就只须每担缴纳进口税银三十两。但是,鸦片一经脱离通商口岸的保护,中国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尽可任便征收苛重的子口税,以至于重到实际上无异把1858年已经放弃的那种旧有禁止进口的政策重新恢复起来。

鸦片征税问题

有了这个武器来增加辩论的力量,并有中国高级官员的积极支持,禁烟运动就在英国恢复起来了。中国官员的政策载明在1881年李鸿章署名的一封信中。他对英国禁烟协会的支持和同情表示感谢,并且宣称:"在鸦片问题上,中英两国始终是南辕北辙,各执一词的;中国是从道德观点来看整个问题,而英国却是从财政的观点出发的。"他采取这种高尚的立场说,"中国政府对鸦片征税的唯一目的,将来正如过去一样,是为了遏制鸦片贸易,决不是希望从这样一个来源获取收入——既没有把毒蛇杀死,岂能再轻率从事,把它哺育在怀里呢?"倘如这个时候,在他一手掌握的直隶省以及他和他的家庭有绝大势力的安徽省不种植鸦片,那么他在道德上的地位就会坚强得多。在安徽他有大量的田产,上面盛开着罂粟花。这时人们对于中国的鸦片产量是有清楚了解的,约为外国进口最高额的二至四倍①,所以,

366

1881年英国的禁烟运动

当中国要求英国批准限制外国鸦片进口的措施时，英国有许多好心肠的人也要求中国首先减少国内的产量以证明其诚恳。然而，尽管中国国内种植鸦片，这也绝不能使外国具有任何坚持要中国进口外国鸦片的道德上或法律上的权利。

1880年美国的禁烟条约

美国政府对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呼吁助了一臂之力。根据1880年在北京签订的两份条约中的一份，美国同意禁止美国商人贩卖鸦片和用美国船只运送鸦片。虽然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鸦片是由美国船只运送的，但是1887年2月23日批准的国会法案终于授予执行这项条约所必需的权力。

烟台条约与鸦片

根据烟台条约，认为鸦片应另定办法，与其他进口货不同。鸦片进口后应存入保税仓库；由进口商完纳关税，买主完纳厘金；应征厘金多少则由各省当局决定。这样就使完全由中国人完纳的厘金数额得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1885年7月18日，沙士勃里勋爵和曾侯在伦敦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根据这个专条，凡鸦片运抵中国的口岸，即应存入保税仓库，出货时，每担应付进口税银三十两和厘金八十两，此后便可行销中国不收任何捐税。附带还有一项规定：关于查禁香港走私至中国一节，应尽速派员办理。

367

香港——一个走私的中心

香港这个港口的东面入口只有六百码宽，而且在1899年以前，它的北面的海岸一直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沿着北岸，船只可以非常便利地从英国海面的安全地带潜入中国海面的任何地点。在1858年的条约签订之后，香港的商人一致坚持这个殖民地的自由港地位。当时的香港全岛以及后来两平方哩的九龙拓界，不可避免地变成活跃的走私贸易中心。鸦片因价值大

① 1867年鸦片的价值是31,994,576两银子——占全部进口的46%。1905年鸦片的价值是34,070,021两银子——占全部价值的7.5%。

而体积小，被广泛地私运；食盐在香港价廉，在中国则因为是严格的政府专卖品而价格较高，因而也广为走私。此外，一般商品也在大量走私，尽管中国的关税甚至还没有达到名义上的5%的协定税率。

在香港海面以外，税收的管辖权是由广东全省关税首长粤海关监督行使的。1885年，单是鸦片走私一项，据估计国家收入一年即损失五十万两，而其他税收的偷漏则使粤海关监督个人的损失更大，不管受损失的是他的私囊还是国库，粤海关监督所可采取的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在那短短的陆地边界上设立一些缉私站，并且用一些武装小船在他辖区内周围的海面上进行巡逻——这是1867年10月开始实行的一种制度。

中国的损失——和粤海关监督

"香港的封锁"

香港人士对这种贸易上的干涉，一直是愤愤不平，他们认为，这种贸易"并不是走私贸易，而只是对一个征收额外费用的口岸〔广州〕所作的一种正当逃避行为"。

368

良好的结果

1886年6月，中英调查委员会终于派定，它的任务是商定香港方面对实施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进行合作，并使香港免于讨厌的封锁。最后在9月11日双方议定，香港应禁止除鸦片包税人以外，存置、输出或输入数量不足一箱的鸦片；并应报告鸦片的一切移动情形。作为交换条件的是，中国应商请澳门方面采取同样措施；民船贸易应划归设于中国境内的洋关管辖，并施行划一税则，无所轩轾。从香港输入的鸦片，在完清每担一百一十两的关税后，应即豁免其他一切征课。这种办法施行下来，对双方都很好。香港方面的主要收获是制止了那种伤风败俗、危害正直商人的走私行为，但该殖民地的收入也有所增益。中国方面最大的收获则是在1887年将大量的对港民船贸易从腐败的中古式的粤海关监督手中转移到中央政府直属的税务司署管辖之下。

同香港订立的协定能否实施须视能否同澳门签立同样的协议而定。中国始终坚决而一贯地拒绝葡萄牙人对澳门及其海面所作的主权要求，并曾拒绝批准1862年的第一件葡萄牙条约。葡萄牙这时可以要求它的代价了。1887年3月26日，中葡签订了一项列有四项条款的草约：(1)应订立一项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2)澳门及其附属地方应割让给葡萄牙；但是(3)未经中国同意，葡萄牙不得将澳门转让给他国；(4)澳门在处理鸦片的工作上按照香港的办法进行合作。于是葡萄牙于12月1日在北京签订了一个友好通商条约，以实行草约中的各项条款。这个条约以及它所依据的那个草约都是赫德爵士的杰作，因而给了他的声誉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他以前有过外交上的胜利，但帝国的汉族政治家对于澳门的割让是决不原谅他的。

1887年的中葡草约和条约

6. 和平年代(1886—1894年)

369

觐见问题是在1873年以一种任由中国暗自以为居于至高无上地位以满足其自尊心的方式解决的。在光绪皇帝未成年的期间，对于这种事情不能采取什么步骤；但是，在中法战争之后，中国朝廷表现得比较愿意遵从外交惯例了。1886年8月4日，总理衙门正式宴请全体外交使团，由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主持宴会。光绪帝在1887年2月7日正式成年，虽然仍在慈禧太后的监护之下；这两件事都没有正式通知各国使节。这时是否应当要求觐见的问题已在考虑之中。这件事没有急急进行，1887年11月到达北京的法国公使李梅两次要求觐见未获允准。1889年3月4日光绪亲政。1890年12月14日，各国公使们出乎意外地接到了抄寄上谕的照会，命立即召见外交使团，并且每年举行同样的召见和宴会一次。各国公使开列出为使觐见仪式圆满举行

1891年和1894年允准各国使节觐见

所必需的种种条件。经过许多争论之后,1891年3月5日在各国公使称为十分满意的条件下举行了觐见——但是,觐见是在紫光阁举行的。在1891至1893年间的其他几次觐见则是在比紫光阁更要不得的承光殿里举行的,致使整个外交团大为愤激。

觐见问题的最后解决

因而这个问题一直拖宕到中日战争爆发之后。那时,在早期灾难的影响下,恭亲王又奉召重掌大权。他觉得自己即使违反朝廷的意旨,也不能不和西方列强修好,正如三十四年前他曾经做过的那样。法国和俄国公使坚定地拒绝一切在一个低级的殿上举行觐见的建议,恭亲王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奏请皇帝下了一道在满意的条件下举行觐见的上谕。因而先后在1893年11月12日和1895年2月14日中国新年的时候,外交团在文华殿——皇宫里的一个大殿上,并按照仔细规定了仪节的议定书,举行了觐见。

370

觐见问题的重要性

觐见问题之所以重要,只因为它表现出中国趋向觉醒的态度。三十四年以来,除了与法国的没有结果的敌对行为之外,中国和外国是和平相处的。太平天国已于三十年前被镇压下去了。二十五年来,一切国际纠纷也都用外交活动解决或和解了。中国曾经有充分时间去开始整顿内政,并开始证明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同支配它的那些国家平等的。但是这个时期蹉跎过去,没有任何改良或革新的迹象。官吏们和过去一样,仍然说不上是人民的领导者,除了对外国的改革感到厌恶外,很少有人被激励去做任何事情。国家的多数高级大臣对于解决纠缠帝国的种种困难所作的唯一贡献,就是继续主张早在五十年前已被否定的那种自高自大。中国的自满情绪非再受几次震撼是不会减轻的,现在日本就要给中国这样的一次震憾了,日本既在内部作到了自力更生,就在国际事务中跃跃欲试了。

第十九章　中国、日本和朝鲜（1871—1895年）

371

1. 日本争取同西方列强立于平等地位的斗争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中，取消所受司法和财政自主权上的限制，将国家跻于西方各国平等之列，已成为日本外交上的重要目标。司法的改良和现代化，同促致修约的企图是息息相关的。在王政复古之后不久，刑部省和各级法院先后成立。1871年公布了刑法，它虽是仿照中国的体例，但已纳进了欧洲的司法原则。有几位欧洲法学家应邀来到日本；其中巴桑纳先生旅居日本八年，提出了重要的改革。1879年，公布废止体刑；翌年，关于证据法和律师法的规定都有了改进。

日本争取与西方处于同等地位的方法

1882年公布实施的日本刑法和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是以法国法典为蓝本的。这次以绞刑代替了斩首，而且只以适用于谋杀、放火和叛国等罪为限。在商法方面，日本大抵取法德国；在民法方面，西方式的诉讼程序已普遍建立，并兼顾日本的地方情况。

日本和西方列强间的条约修改于1872年届期；日本爰于1871年以拟请修改条约的意思正式通知列国。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就是派遣岩仓使节团出洋，该使节团于1873年返国。根据1866年6月25日的关税协定，关税事实上对于日本已无财政价值可言。随着岩仓使节团的返国，日本的领袖们比

岩仓使节团及其结果

372

以往更加理会到他们处境的屈辱,所以谋求取消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限制以及恢复本国沿岸贸易控制权的企图,也相应地积极起来。帝国政府尤汲汲于打破列强的合作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希望摆脱仅适用于单方面的最惠国条款。

美国对行使于日本的领事裁判权的解释

依照原有的条约规定只准外国人居住约开口岸的限制,使外国商务蒙受很大损害。1873年,意大利政府为了帮助希望进入内地购买蚕卵的本国人民,同意修订条约,根据新约,居住和旅行的限制一并予以取消,而日本的司法自主权则得到了部分的承认。其他列强方面的抗议阻挠了条约的批准。然而,就在这一年,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件完全基于平等原则的邮政条约。这个条约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因而大受其他各国驻东京代表的非难。在1874—1879年间,美国政府有几次由于命令美国人民服从日本法律,缩小了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美国认为,所谓领事裁判权,不过是说美国人民于违反日本法而被捕时,须按美国法讯办而已。在中国,以及在日本,除刚刚提到的例外不论,列强认为它们的人民只应服从各该外国政府批准的法律。

库页岛问题

根据俄日1855年条约,库页岛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使俄国在远东的兴趣转浓。1859年,穆拉维约夫伯爵率同一支俄国分遣舰队到达江户湾,要求日本承认库页岛为俄国所有。俄国的主张是以中国以前对该岛的所有权为依据的,据称该岛原包括在中国以1858年5月瑷珲条约所割让的黑龙江和太平洋沿岸土地之内。穆拉维约夫未获成功。1861—1862年的日本赴欧使节团,同俄国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获得解决。最后,在1875年,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计有八款的一项条约。议定两国以拉彼鲁兹海峡(即宗谷海峡)

373

为界。日本放弃了对库页岛的主张,俄国则以承认其对千岛群岛的不容争辩的占有权,作为交换。和条约本身规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就是条约是作为两个平等国之间的条约而订定的。

国内的发展使修约运动受到了暂时的挫折,虽然往长远看,是对它有帮助的。1873 年,太政官因朝鲜问题而发生分裂①。1874 年 1 月,副岛、后藤、板垣和江藤新平等上书政府,其中提到了御誓文,并且主张日本应采行使节团人员在国外看到的那种代议制度。这个奏折事先采取了审慎的步骤,但仍被政府认为所呈各节时机尚未成熟;1875 年成立了以达官显宦和领袖人物所组成的元老院,以期防范少数人的专权跋扈,终于导致民选议会的建立。1890 年,以帝国议会代替了元老院。

元老院的成立

1877 年发生了西乡隆盛在岛津久光支持下所领导的萨摩叛乱。西乡曾掌兵权,于 1873 年政府内讧之后辞去太政官职务。在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政府以财政困难,武断地规定停发废藩置县以来付给公卿和武士的俸金。前此准武士自行决定是否应佩刀的规定,也一并废除,而禁止佩刀。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使新帝国政府看上去未免专横的措施,连同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军队的成立——从而置武士于农工商平等之列——使萨摩藩决意作一次最后努力,来恢复武士的地位,并自行攫取政权。萨摩藩为这次斗争准备了四年,终于能以配有来福枪和大炮的四万军队投入战场。政府也能以六万五千多人的一支队伍与之兵戎相见。自 1877 年 1 月 29 日至 9 月 24 日,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伤亡人数达双方战斗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萨摩军是精锐的部队,而政府军则是征自所有各阶层人民的。后者的胜利证明了那些推翻军阀专政而将政府建立在全民基础上的人们的明智。

1877年的萨摩叛乱

374

萨摩叛乱的重要意义

① 参阅本书第 368—369 页。

在叛乱结束时,西乡按照武士道的传统方式,切腹自杀了。

1877年板垣伯爵和他的追随者又上书天皇,请勿忘1868年的诺言,并主张建立立宪政府和民选议会。板垣领导一个叫作自由党的强大政党。翌年萨摩的大久保被刺。行刺大久保的凶手的主要动机,据说是因为他反对迅速实行立宪政府和代议制度。于是府县的民选代表会议成立。这种会议虽只能讨论和请愿,但为比较发展的自治制度作好了准备。1881年肥前的大限重信辞去太政官,以便更自由地提倡改革。不久之后他担任了进步党的党魁,进步党的主义与自由党大同小异。两党党员都是各自党魁的追随者而并不是不同主义的代表人。因大限的辞职而有1881年10月12日敕书的颁布,天皇在敕书中允于1890年建立议会,并饬即进行一切必要的筹备工作。

代议制政府的潮流

1882年初,伊藤博文因这项敕书而第三次游历欧洲;他此次出国是为了考察各国政府制度的利弊,以备日本采纳实行。1883年8月回国,旋于1885年将内阁制介绍到日本,他本人担任了总理大臣,并依照欧洲所行办法组织了内阁各省。1888年成立枢密院,以资深官员、尤其是勋绩卓著的官员充任。枢密院的职责是备天皇顾问。枢密院成立后,伊藤为了出任院长,辞去总理大臣职务。

375

1885年日本采行内阁制

伊藤侯爵是1889年2月11日公布的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在本源上是折衷性质的这部根本大法,表示出伊藤对于俾斯麦公爵所发展的那套政府制度,印象如何之深。皇权受到了缜密的保护,不至有为人民代表过分自由干涉之虞。伊藤对天皇的态度在他的那部著名的《宪法诠释》中表露无遗:"天皇系天降神明,俯临万庶,全国景仰而不可冒渎。天皇固须尊重法律,但法律却无权使天皇负责。不但对天皇本身不得有任何不敬,且不

日本的宪法

天皇的地位

得妄肆诽谤或议论。"

根据宪法规定，帝国议会设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两院正副议长均由天皇任命——上院议长的任命不受任何限制，下院议长则由该院选出的三人之中任命一人。无疑是学习了1863年俾斯麦对普鲁士下院的经验，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若帝国议会未通过预算，或预算尚未实际产生，政府可取上年之预算施行之。"

帝国议会

和日本凭以走向立宪政府(虽非民选政府)的措施齐头并进的，是修约运动。在1873—1885年期间，美国驻东京公使是约翰·平安法官。在促成日本所想望的修约方面，他所给予日本的帮助，就其重要性而论，除几年前的汤森德·哈里斯而外是无出其右的。在1873年9月抵达日本后不到四个月的工夫，平安公使在致美国政府的第一件公函中，就促请进行修约了。

修改条约运动

376

各国在巴夏礼爵士领导下的对日合作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唯英国之命是从的局面。平安法官在十二年的驻东京公使任内，竭力打破这种合作政策，帮助日本争取修约。1866年条约在他看来是特别应该反对的。日本因不能从关税中征得足够的税收来支付政府开支，致不能不征课苛重的土地税，从而成为1877年萨摩叛乱的起因之一。美国公使所给予日本的鼓励，使他自己在英国官商两界大为不得人心，但是幸而他还经得起毁誉。

日本需要改修税则

1876年日本政府向美国声明它有修改"旧约中细微条款"的意思，尤其是涉及关税自主方面的规定。萨摩叛变结束后，外务卿寺岛(宗则)伯爵开始了第二次有系统的修约尝试——岩仓使节团已经作了第一次的尝试。1878年7月25日，日美条约在华盛顿签字。美国承认了日本有厘定税则和管理沿岸贸易的专有权，日本则以增辟两个口岸和取消出口税作为交换。给

1878年的美日条约

予美国的补偿并不适用于第三国,除非该国也作了美国所作的同样让步。不过这项条约要等到其他各国也签订了相同的条约后,方能付诸实施。在签订这项条约时,美国部分地放弃了合作政策。英德两国驻东京代表为此颇为愤怒,虽则他们未商诸美国政府而先已自行以一项适用于各该国的条约改变了1866年条约的规定。在德英两国领导下,欧洲各国合力阻挠1878年条约的实施。尽管如此,美国赞同日本的抱负这一事实,却是有助于提高美国在东京的威望和鼓励日本再接再厉的。

377

井上伯爵的谈判

1879年井上伯爵继寺岛伯爵任外务卿。井上在任八年,直到1887年方才离职。1878年英国领事法庭释放一个往日本走私鸦片的英国人的事件,使日本官民大为激怒,他们要求废除容许有这类事件发生的领事裁判权。井上伯爵在大隈伯爵的帮助下同列强秘密地谈判了一项条约,议定逐渐实行关税自主和司法独立。由于荷兰公使的不慎,条约草案在一家横滨报纸上披露。人民抗议这种不彻底的办法,谈判中辍,荷兰公使被召回。

英国对日政策的变更

在1882—1887年间,井上伯爵仍时常在东京和外国代表举行会议,来进行第四次的修约尝试。这些会议终于发展成为1886年有十二国公使参加的正式会议。日本同中国和朝鲜的纠纷,阻碍了谈判的迅速开展。在这些年份中,英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一部分是由于平安公使在东京所持的政策,一部分则是由于日本在欧洲所进行的宣传运动。日本政府的改良以及英国阻挠策略所造成的不得人心的后果,已经对英国的政策发生了影响。1882年,巴夏礼爵士转任北京。巴夏礼的调任,为日本跻身于西方各国平等之列铺平了道路。1883年12月4日,阿瑟总统致国会的年度咨文正式鼓励了日本"去划一它同其他文明国家所订条约的条款和有效期间"。一个星期之后,英国

外相格兰维尔勋爵表示同意修改日本税则。自从伊藤伯爵回国之后，德国在东京的影响就不断地增长，而在1884年英国方面也有了转变，而趋向于和日本敦睦邦交。“以前德国在远东的一切行动一直和英国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因德国被争取到日本一方，致英国的地位大为削弱，这就为英、日进一步的谅解铺平了道路。所以在西方国家正图将远东作为欧洲政治的后院的时候，日本在对西方世界初开海禁仅仅三十年之后，就毅然进入欧洲，想把欧洲大陆作为日本政治家的竞技场了。”①

378

在1886年5月1日修约会议开幕的前一日，克利夫兰总统同意了美日引渡条约，作为加强日本立场的另一步骤。井上伯爵和各国代表会议的结果，是1887年4月议定的一项修正案，根据这项修正案，他们拟允准日本法庭对外国人行使管辖权，惟以受理外国人的法庭须聘用外国法官，并以某些日本法律须咨由各国同意为条件。至于关税方面英国却不打算作什么让步：英国自己的以及德国的制造品拟征税7%；美国货拟征税自12%至14%不等，中国糖须征税20%——而中国并未派代表参加会议。

拟议的1887年协定

所拟条约的细节又是时机尚未成熟就泄露了出来，以致各方反对的声浪越来越高。新从欧洲考察国际政治回国的商农相谷(干城)子爵就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上书指出所议条约的七点错误。就1858年崛田勋爵的奏章、1895年林伯爵的议论以及所谓1914年黑龙会的备忘录一并看来，1887年谷子爵的奏章在阐明日本自重开海禁直至今日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在指出日本事事以德国为借鉴殊非得计之后，他进而概述一项政策，那项政策在二十世纪初期和1914—

协定未成

谷子爵上书(1887年)

① 参阅丹涅特前引书，第525页(中译本，第445页)。

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反应。谷子爵在答复379日本应如何行事方为上策这个问题时,说道:"废绝过去之政策原则,摈却倚赖之心,修我内政,整我军旅,以策国家之安全,外树信义,正威严而勿玷辱国光,内振民心,立共守之志,以待欧洲变乱,欧洲之变乱实迟早所不免,虽则其事与我国并无直接干系,但不能不受其影响,因如此一件大事,势必动摇东洋各国,故就欧洲而论,我国虽不致卷入漩涡,然而方此之时,我国却大可一跃而为东方之盟主。

日本"与欧洲各国并立"

"倘于此时我国拥有坚强之战舰二十艘,精兵十万人,当可争衡东洋,示西方列国以一坚强阵容。于其时,英俄间如有战争,俄国可联我以制英,英国亦可与我结盟而败俄。倘中法间发生战事,我国对俄、英两国的关系亦如上述。……所以,我国显然可乘此机会,取得东方举足轻重之地位,从而使列国不得不对我敬畏。我国可以同样方法与欧洲各国并立。"

1888年与墨西哥订约

1887年7月,井上伯爵由于备遭物议和反对,停止了修约会议,并辞去外务卿职务。这样,第四次修约的尝试又告结束。翌年年初,伊藤总理大臣任命大隈伯爵担任外务卿一职。大隈又回到副岛的分别谈判政策。1888年11月30日,日本同墨西哥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在实施上是双边性质的;其中取消了领事裁判权,承认了关税自主;而且最惠国条款在适用上也变成为相互性质的。并经议定,缔约一方非作相互的让与,不得要求另一方所给第三国的让与权。

第五次修约的尝试

修约运动因1889年2月宪法的公布而大为加速了。这一年,日本又分别地和秘密地同美、英、德、俄等国政府进行修约尝380试。在这些尝试之中,日本又复考虑允准一项部分协定的税则和在外国人涉讼的案件中派外国人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办法。

1889年4月19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所拟日英条约的内容,于是另一连串的抗议接踵而来,终于酿成大限遭炸弹受伤而辞职的事,因此第五次修约的尝试又行告终。

1890年召开的帝国议会第一届会议的议员决定提出司法和财政完全自主的主张。同年年初公布的各项新法典,在随后几年中次第实施。这对于修约该是有帮助的。1893年,国会议员再度奏请天皇饬与列国缔结平等条约,俾使恢复帝国国政得竟其全功。这时外务卿陆奥伯爵刚从当时商务外交关系最密切的英国返国。

1890年帝国议会的要求

1894年7月16日,即英国开始实行对日敦睦政策的十年之后,亦即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星期,英日两国签订了一项为后来各项条约所取法的条约。条约是互惠的,而且是有限期的,其中规定在五年之后,即于1899年废止领事裁判权。约有六十种商品仍保持协定税则,其税率自从价5%至15%不等;其他各货的税则由日本政府决定,税率订为自5%至45%。英国船仍得参加沿岸贸易。嗣后准外国人在全国各地居住、旅行和购置不动产,而不以约开口岸为限。但外国人不准以自己的名义在日本购置土地,虽则在外国租界中现有的永久租地权得到了确认。这项条约有效期十二年,期满时,任何一方均得凭前一年预先通知,废止条约。

1894年关键性的对英条约

381

率先打破了合作政策,从而使英国的同意修约不但比较容易而且成为必要之举的,正是美国。但是由于平安的政策(美国的友谊已使日本对美国既无所怀惧也无所希求了)以及1885年平安公使本人的去职,美国在日本的影响已不如英国。在签订1894年11月的条约时,美国是沿着它自己所标志出来的那条道路而追随于英国之后的;除去并未要求关税让与权以及规定

美国的政策和1894年的对日条约

十三年的有效期间外,这件条约和英国的那一件并无二致。日本继续谈判修约达四年之久,新约随于1899年5月同时生效。德法两国虽同意修约,却步趋英国而提出关税让与权的要求。根据最惠国条款,所有各国都均沾了协定税则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个条款本身就变成了相互的和无条件的。为了争取司法自主和摆脱领事裁判权,日本在关税问题上采取了妥协态度。根据条约权利,它在1910年废止了1899年各约中所载的协定税则,并自1911年7月起享有了关税自主。

日本一跃而为强国

日本参加国际社会不到半个世纪的工夫,就在世界各国的首都谈判取消早期条约所加于它的限制,根据自己的立场和欧洲相周旋了。日本人民确凿地表示出不但具有有效地治理国家,以保护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而使秩序井然的政治能力,而且具有抵御外侮以自卫的军事力量。他们的统治者们更在应付落后民族方面进一步运用欧洲的方法:日本政府既愤于领事裁判权和1866年协定税则的限制,所以在为日本侨民要求领事裁判权而同中国、朝鲜和暹罗交涉时,是非常慎重的。仔细研究一下日本同其他各国的一般交往,特别是同中国和朝鲜的交往,就使人不能不对日本在其现代对外关系上学习和运用欧洲外交最恶劣的特点以及在某些制度上融会西方文化的比较优良部分的聪明智慧,具有深刻印象。

382

2. 中日战争的背景

作为一个藩属的朝鲜

这时朝鲜将渐渐成为中日之间的争夺物了。几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双方朝廷完全承认相互间的义务,一方给以抵御外侮、弭平内乱的保护,另一方则输纳贡物,并为每一个统治者请求承认和册封。1592年,这个藩属曾经受到丰臣秀吉

统治下的日本人的进犯。1598 年丰臣秀吉逝世，日人撤出朝鲜，惟仍继续盘踞釜山港不去。1637 年满洲人征服了朝鲜。1644 年满洲统治者登上了中国的帝位，这臣服的朝鲜王国又恢复了对中国皇帝的藩属地位，历经二百多年，一直平静无事。

1866年法国对朝鲜的远征

1794 年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朝鲜。1839 年有法国神甫三人以受斩刑而殉道，在随后十四年中又有几名本地神甫遭到同样的命运。1866 年有九名法国神甫被斩首。法国代办以法国拟兼并朝鲜之意通知了总理衙门的王大臣。10 月，罗惹海军上将统率的一支由七艘船舰组成的远征队奉派驻至江华岛，并宣布对通往王京汉城的各孔道实行封锁。朝鲜朝廷毫无开始谈判之意，而法国海军上将又不敢轻离海岸。因而 11 月底法国军队在和朝鲜互有胜负之后折返烟台。他们焚毁了江华城，但是对于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在朝鲜和中国政府看来，法国人已经被逐去；这桩事件迄被引证作为 1870 年天津大屠杀①的一个局部的说明。

383

1867年—1868年美国兵船的访问朝鲜

1866 年 6 月，美国双桅帆船“袭击”号在朝鲜海岸失事；船上的水手受到优待。同年 7 月，当美国双桅帆船“谢尔曼将军”号在一个朝鲜港口停泊时，船上的水手因行为野蛮，在岸上酿成了一场风波，但被救遁去；于是那艘船受到民众的袭击，杀死水手八人，其余一并就擒。1867 年 1 月，美国三等炮舰“瓦丘塞茨”号曾进行过一次调查，但无结果；1868 年 3 月，巡洋舰“谢南多亚”号访问朝鲜，然而关于所传有几名“谢尔曼将军”号船上的水手依然生存以及朝鲜政府有派使节前往西方各国之意的报道，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可予以证实。

上项报道是一个叫作詹金斯的美国人传递给美国当局的。

① 指天津教案。——译者

1868年对朝鲜海盗式的侵掠

1868年春季,他偕同一个普鲁士商人奥佩尔特和一个法国神甫费隆搭乘一艘租用的德国轮船"中国"号前往朝鲜,扬言目的是要调查这些报道的真假。在他们回到上海之后,真相才渐渐大白,原来他们策划这次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要盗挖某几处朝鲜故王的坟墓。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想劫持这些尸体来要挟朝鲜宫廷同他们各该本国商谈商约。詹金斯以六项罪名被控于上海美国领事法庭,但是起诉人并没有能把他同这桩案件直接联系起来。其他有关各国领事都等候美国领事起诉的结果,再决定是否对他们本国国民提起诉讼。没有一国领事提起过这样的诉讼。然而法国神甫却被递解回国。

拟议的美国外交使节

直到这时为止,西方各国同朝鲜的关系只不过是一次被击退的武装远征、一次受到冷淡待遇的友好调查和一次归于失败的海盗式劫掠而已。1868年,有人建议美国政府应派遣一个负有双重目的的使节:第一个目的是调查"谢尔曼将军"号水手的下落,假如受到虐待,还要要求补偿,同时将美国对朝鲜方面厚待"袭击"号罹难水手的那番感激的意思,告诉他们。第二个目的是求取一项商约。美国驻北京公使奉派担任这项拟议的调查工作,并于条件有利的情形下商订一项商约。这位公使应由驻扎当地的海军上将陪同前往,并适当地炫兵耀武,以张美国政府的声威。美国政府的决定着手打开朝鲜海禁,就其在远东国际关系上影响的深远而论,同以前的决定重新打开日本与外界的关系,以及三十年后的决定占领菲律宾,是应该作等量齐观的①。

384

1869年德国和俄国的企图

在这期间,德国政府在1869年6月试图以伴随德国使节的一位日本官员为桥梁,作为打开谈判的门径。釜山的朝鲜官员

① 参阅丹涅特前引书,第450页(中译本,第381页)。

对于日人的傲慢无礼颇为愤怒,使节团无功而还。1869年5月,在朝鲜海岸进行测量的一艘俄国炮艇受到轰击,被逐出境外。

在这几次远征之中,没有一次曾经提到过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在那时还没有取得台湾的教训。中国的大臣们不肯负任何责任,甚至在1871年3月间竟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其政教禁令,悉听其自为,中国向不干预云云。

1871年5月美国使节所受的敌意接待

海军上将鲁籍寿率领的一支由五艘汽船组成的分舰队,载同美国驻北京公使镂斐迪及其属僚,于1871年5月抵达江华岛海面。这位公使由于立刻收到了一封询问此行目的的来函而大为振奋。镂斐迪当以书面答复和口头解释通知来信人说,一俟妥派适当的高级官员前来和公使会晤,当即以此行目的相告,又说在这期间将分别派员前往勘查海湾及河道。镂斐迪想要从这次出使中获致外交结果的希望,立即幻灭了:6月1日,测量船遭到了掩蔽下的炮台的轰击。随后又有过一次函件的往还,其中之一附有一件朝鲜王致北京礼部咨文的副本,在那件咨文中,朝鲜王请他的宗主国为他排难解纷。

美方决定平息并攻占江华岛上的各炮台,占领二十四小时之后再行撤退,以表示他们有声讨的能力。由两艘炮艇和二十艘武装汽艇组成的一支远征队于6月10日离开了舰队,攻占并破坏了五座炮台,击毙了朝鲜兵二百五十名以上,另击伤多名,386 嗣于两天之后归队,损失轻微。镂裴迪再行试图打开谈判,但仍是徒劳。既然不打算征服这个国家,公使和舰队便于7月3日退出朝鲜海面,希望和平打开朝鲜海禁的人们又告失望。

汉城的宫廷革命

日本帝国政府因朝鲜近已不遵守丰臣秀吉时代以来的旧例纳贡朝贺,曾于1868年派专使赴朝鲜,告以最近日本政府的变动。朝鲜本身的四年前曾经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宫廷革命。自

1392年建代以来的李朝的直系后裔，至1864年1月15日未建储的哲宗逝世时断绝。自1831年以来相继当国的三位朝鲜王的遗孀中的最长者赵妃，立即夺取到国玺和其他标章或权力，从而居于当权的地位。她指定向来不关心政治的兴宣君的儿子、十二岁的命福为继承人。实则兴宣君是野心勃勃的；他立即攫得了政权，自号为大院君。他是排外的、反基督教的，而且是专恣反动的，一如1866年法国神甫的被处决所表现的那样。

大院君

大院君对于抛弃固有的中国文明而采行西法的日本，殊存蔑视之心，拒不理采1868年的使节团。翌年，日本派调查团前往调查朝鲜同中俄两国的关系。这个使节团的团员于不久回到日本之后即力主征朝。后来在同一年中派去的另一个使节团所受的侮辱，则更使火上加油。1871年日本派去的又一个使节团也遭到了朝鲜方面拒与往还的侮辱。

他对日本的轻视

关于如何解决朝鲜和台湾这两个问题，日本维新领袖之间的摩擦日益加深。在这个时代的杰出领袖之中，计有旧公卿太政官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萨摩藩士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长州藩士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土佐藩士后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以及肥前的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和大隈重信等。当1873年朝鲜问题发展到决定性阶段时，上列的前五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

387

副岛种臣出使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探悉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明告这位狡黠的公使说，朝鲜王虽受中国的册封，“然而内政及和战问题，悉听其自为，中国向不干预”。对朝鲜宣战，正是副岛求之不得的。在这一方面他得到了日本陆军元帅西乡的热烈赞助。这两个领袖渴望领导一个使节团前往朝鲜，因为料定是会受到侮辱或攻击的，从而可以为战争

中国对朝鲜的态度

造成一个良好的借口。如果岩仓勋爵赞同战争政策,三条公是可以同意的。岩仓曾得到保证,在他出国期间,政府将不实行任何重要的更张,而且他不久即将完成出使西方各国的任务而返回本国。7月副岛自北京回到东京,9月(1873年)岩仓返国,意见立趋两歧。主战的一方计有副岛、西乡、后藤、板垣和江藤新平;反对他们的意见的则有岩仓、木户、大久保、伊藤博文和岩仓使节团原有的全体人员。自10月14至23日,朝议争论达十日之久。反对战争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大久保所举的理由是,国家仍处于过渡阶段,财政力量薄弱①,国际地位不稳,实无力进行战争。"在列强之中俄国最不可侮,"大久保这样说,"俄国的南进运动是世所共知的;因此,日韩相争,则俄国正可坐收渔人之利。英国也是一个强国,日本已经向它举债不少,倘我国因战争之故不能照付利息,则英国必将以此为口实,干涉我国内政,这样就会使我国成为印度第二。"三条公终于将这个问题奏请年轻的天皇睦仁裁定。天皇赞成和平,因而战争推迟了二十年。

日本领袖间的摩擦

大久保对俄国的怀惧

388

天皇的钦裁

在日本发生这次重要内阁危机的同一年,年轻的朝鲜王(后来称作李熙)已达成年。他在赵妃的帮助下,使他的父亲大院君暂时退出政治舞台,而自行试掌国政。他在1866年十四岁时与闵氏妇结婚。闵氏在血统上和传统上都和中国有密切关系,是大院君所领导的李党的一个劲敌。闵妃对于朝鲜王有无限的影响力;大院君所以在1873年暂时失势,大部分就是由于闵妃对大院君的敌视。朝鲜之所以酿成积弱之势,以致在几年之内竟成为强邻之鱼肉,大部分就是由于意志坚强的王妃和意志同样坚强的大院君谋求控制国王、把持王权而进行斗争所致。

闵妃的抬头

1875年,有日本兵船一艘奉派巡逻朝鲜海岸,12月,船上的

① 当时日本尚须按期付伦敦各银行下关赔款借款10%的息金。

1875年朝鲜攻击日本水手

几名水手在江华岛岸上遭到射击。1876年2月,日本在釜山举行了一次海军示威。在确知中国必会置身事外一如1873年的情形之后,日本就以2月26日在江华岛上签字的那件友好通商条约强加于无可奈何的朝鲜王了。在条约中,朝鲜被公然说成是一个"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①。根据条约,釜山、仁川和元山三口开放对日通商。总之,这件条约和列强加诸中日两国的条约相似,大部分是单边的,而且在刑事问题上给日本以领事裁判权。"1876年的条约是日本对朝鲜外交政策第一次的明白公布。……日本决不许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具体实现其对朝鲜的宗主权主张,从而妨害日本基于自由竞争的对朝鲜的通商自由,"日本历史家有贺长雄这样说。实则这个条约是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第一步。而且它和三年前副岛大使在北京觐见时所取的态度是完全合拍的。在这个条约议定之后三个月,一个大约由十五名朝鲜人组成的使节团往访日本,他们在那里看到了日本采纳西方文明所获得的具体结果。

1876年日朝条约的重要意义

389

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的有限制的商业交往已有数世纪之久,但日本人所提出的自主之邦的说法却殊少为人所注意。结果,朝鲜的那种臣服中国和与世隔绝的政策,显然仍无变动。所以,当一位法国神甫先后在1878年1879年在朝鲜被捕,生命发生危险时,法国代表是向北京总理衙门讲话的,而使犯人获得释放的也正是中国政府。然而日本人却分明在汉城设法削弱这种宗藩关系。1879年,李鸿章给朝鲜的一位高级官员②以老谋深算的忠告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之策,抵制日本诡计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西方各国立约。

1882年—1886年朝鲜和西方各国间的条约

① 请以这件条约与1874年3月15日的西贡条约作一比较。

② 指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译者

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很想在朝鲜扮演潘理在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在1867年1月统率美国兵船"瓦丘塞茨"号前往朝鲜探询"谢尔曼将军"号劫遗水手的下落的正是薛斐尔。1880年5月，他奉国务卿埃瓦茨之命抵达釜山，试图就地通过日本领事递送一封函件给朝鲜王，但却是一场徒劳。薛斐尔于是前往东京，劝请当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写一封信，连同他本人的信一并送去，同意他自己在长崎等候回讯。这个第二次试探并不比第一次成功。朝鲜复文中所说"我国三百年来仅与近邻日本相交，至于别国，则不独相距辽远，且素无往还，此节为世所共知"云云这段显然欺人的答复，使人顿疑日本有从中捣鬼之嫌。

薛斐尔海军准将的朝鲜政策

两次以日本为桥梁去沟通朝鲜宫廷的试探既均告失败，薛斐尔就欣然应李鸿章之邀前往天津。中俄伊犁纠纷尚未解决；李氏受到了英国的鼓励，亟欲设法置朝鲜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因而，理所当然地对于美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表面上的合作，抱猜疑态度。他表示愿为这位美国海军准将谈判对朝鲜订约一事，从中斡旋，企图不独可借以制止美日之间的日益亲密，而且可借以抵消1876年日朝条约的作用。美国谈判在1882年春季开始，李氏亟欲在条约中加进"朝鲜为中国属邦"一语。薛斐尔指出，这样一项声明无异是同中国结盟，而这种条约势必不能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因而双方同意了一项妥协办法，根据这项办法，美国谈判人员愿在一项公函中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所以条约是由中国经手议定，另由朝鲜王致美国总统一函，申明由于同样的理由，条约是经中国同意而签订的。因此，条约在中国经李氏议定之后，未加讨论即于1882年5月22日由朝鲜使臣签字了。

390

以日本为桥梁沟通朝鲜的失败

同李鸿章的谈判

李氏既如上文所述，已于1879年得出一项结论，认为朝鲜

薛斐尔条约的重要意义

不能长此以往,无限期地与世不相往来,又鉴于1858年哈里斯同日本所议条约相当宽大,且一直被欧洲各国列为楷模,因而颇为所惑。薛斐尔拒不同意将属邦一款列进条约固理所当然,然而,却严重地影响了李氏的计划,双方同意的那两项公函实际上既毫无价值可言,李氏的继续立约谈判就无异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令名之累了。"虽然1876年的日朝条约是劈开朝中两国

391

的第一个楔子,而薛斐尔条约不过是第二个,但是它的重要性却尤有过之,因为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了六年前日本首次提出的朝鲜保有象日本一样的平等之权的主张。薛斐尔条约是走向瓦解中华帝国的一个步骤,正如肯定是走向有关安南和缅甸的中英或中法条约那样的步骤一样。这是加诸中华帝国的安全一记无心的打击。……在表面上,这种条约看上去象是对朝鲜的一个急公好义的举动,它不独将世界文明和贸易公诸朝鲜,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使朝鲜脱离了中国的羁縻。但是稍加仔细研究,用历史的眼光加以观察,则不难看出,朝鲜的被置于险谋诡计的惊涛骇浪之中,随波逐流,不由自主,这个条约实是始作俑者。"①

朝鲜和欧洲各国间的条约

接着在1883年11月有对英和对德条约,1884年有对意和对俄条约,1886年又有对法条约。欧洲各国为避免对朝鲜独立问题作成定案起见,都派由各该国驻北京公使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兼充驻汉城的代表。但是美国鉴于北京方面放弃责任,便援日本之例,委派了一个与北京和东京使馆完全无关的驻朝全权公使——这是使日本方面非常满意的一个步骤。

对美条约的签字,使得自1873年朝鲜王达到成年以来在名义上就已经下野的大院君所领导的朝鲜反动派,大为震惊。

① 参阅丹涅特前引书,第461、462页(中译本、第391、392页)。

1882年夏季的饥馑使得大院君的党羽所散布的什么老天对国王和王妃的任意开放海禁,准万恶的外国人自由出入大为震怒的流言,仿佛信而有征。国库的匮乏造成了国王的士兵和朝臣的不满。1882年7月23日有一群暴动者攻犯汉城的宫阙,企图劫持国王,也许还企图谋杀王妃。闵妃赶忙同一个宫娥换装逃走。当暴民抵达王妃的寝宫时,人们把一个为了保全王妃而服毒的宫女的尸体指给暴民,并向他们解释说,王妃为怕落入他们手中而已经自杀。王妃的族人多被杀戮。当晚这群暴动者又往攻日本使馆,杀死了几名馆员。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遁去。

1882年7月汉城的排外暴动

392

中国和日本都派兵去平乱,两国之间战争几不可免。日方在9月间取得了惩办暴徒和偿付赔款五十五万元的保证;其中有四十万元在两年之后由日本归还——作为此后日本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补偿。中国将大院君逮捕,带往保定,作为国事犯在那里拘禁了三年。12月,日本否认有占领朝鲜的任何意图,并且非正式地提出朝鲜中立化的建议。不幸,未尝不会使朝鲜成为远东瑞士的这项建设性的建议没有发生作用,朝鲜成为争夺物达三十年之久。

朝鲜中立化的建议

这时中国决定要比较积极地过问朝鲜事务了。1882年9月,负责其事的李鸿章为中、朝颁布了几项贸易章程;在这几项章程中,朝鲜被看作是朝贡国,中国在朝鲜居于独特的地位,而这是不适用最惠国条款的。但是在1884年11月,日本公使竹添(进一)要求给日本人以中国人的同等待遇。李鸿章也派遣他最亲信的幕僚之一袁世凯赴汉城。袁世凯任中国驻朝鲜商务总办一直到1894年;他虽力主改革却坚持朝鲜非依附中国不可。除去袁世凯之外,李鸿章又在朝鲜王身边安置了一个外国顾问,想使这位外国顾问之于朝鲜就象赫德之于中国的情形那样。至

袁世凯和穆麟德奉派赴朝

于这个位置的人选，他择定了穆麟德，穆麟德原是为参加海关工作而来中国的，当时正任职于德国领事馆。他在1883年春季到达朝鲜。他并不以中国的代表自居，而同朝鲜沆瀣一气。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开办海关，自任主持人。继而外务署成立，他又奉派为参判之一，运筹决策，都身预其事。在本身的职责以外，他还为朝鲜工、商、财政的改良以及交通工具的改善，积极筹拟革新办法。

393

1884年12月汉城政变

穆麟德的方案之一就是举办邮政。1884年12月4日，庆祝邮局落成，大张宴席。当时朝鲜京城有一个由几名曾在日本游学的青年所领导的进步团体。这些留学生的首脑是徐载弼，一个任后营正领官的十七岁的世家子弟。这些进步分子的一项有日本使馆参加的阴谋活动，在刚刚提到的那次大宴会的晚间已酝酿成熟。迄被视为自由和进步分子的闵妃(这与其说是因为她倾心于进步，还毋宁说是因为她同反动的象征大院君势不两立)，最近已不再给朝廷中的自由分子以支持。所以后者很自然地转而求助于日人，日人在汉城的地位自壬午(1882年)兵变以来已大为增强。经决定劫持国王，然后用他的名义颁布改革的命令。在宴会时，由阴谋活动者中一个叫作金玉均的人发出火警；在惊慌失措之中，他们试图刺杀保守派大臣的领袖人物闵泳翊。闵冰翊是靠了后来任美国驻朝公使阿兰博士那位医务传教士的照顾，才得保全性命的。另一些出席宴会的保守派官员则翻过后墙逃去。阴谋叛乱者冲往王宫，告诉国王说他有立即被中国方面逮捕的危险，劝他到日本使馆避难。他们组织了一个政府，在第二天早晨将内侍和六名守旧大臣处死，但是后者先已向中国驻节朝鲜的袁世凯①告变乞援了。袁世凯接着又得到

① 当时袁世凯的官职是营务处同知。——译者

了王妃乞援的讯息之后,就率同自1882年起驻扎朝鲜的中国卫队前往王宫保护国王。他发现王宫已为日本公使和日本军队盘踞。于是中国军队向日方开火,汉城居民蜂拥而起,给中国军队以支援。日人第二次夺路出城,奔往海岸。中国和日本再度濒于战争边缘。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正处于北圻纠纷之中,无法同日本抗衡,因此日本特派大使井上馨伯爵在一支强大海军的支持下,以1885年1月9日签订的一项条约,取得了充分的赔偿。根据这项条约,朝鲜同意道歉惩凶,支付赔款,并为日本使馆卫队建筑营房和重修日本使馆。

394

1885年4月18日,在中国批准中法停战协定的同时,赴中国专使伊藤博文伯爵和李鸿章在天津商妥了一项条约①;根据该项条约,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将双方的军队尽数撤出朝鲜。双方允劝朝鲜自行组织军队,中日两国人均不得充任教练。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平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

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

改组朝鲜军队原是穆麟德的计划之一。朝鲜政府请求美国借调陆军教练三人。中国和日本同意这项请求。三名美国教练终于在1888年到达——但已来得太迟,对朝鲜没有什么用处了。日本的侵略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危险,所以1884年7月穆麟德建议外务署同俄国商定一项协议,据协议,俄国允借调军官为朝鲜训练军队。俄国拟派军官一百余名。除去俄国大臣们可能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外,俄国将立刻取得元山湾附近永兴港②的使用收益权。这个港口的占有,将给予俄国一个比较不封冻的海军基地,而海参崴则是一年之中有四个月要封冻的。日本

俄国对朝鲜的关切

① 指天津会议专条。——译者

② 应作永兴湾元山港,原文似有误。——译者

认为这是直接来自日本海对岸的一种威胁。在中国看来,这似乎危及朝鲜的独立生存,因而也就危及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英国则必须面对有利于它的亚洲主要劲敌俄国的亚洲均势的失衡,而法国仍然盘据着澎湖列岛,中日间的关系已日趋紧张。

395

1885年4月巨文岛的占领

为了应付这种影响英国的局势,英国海军于1885年4月占领巨文岛——这是朝鲜南端海面上一群小岛中的一个停泊所,适居于可监视俄国、日本和中国三方面的一切可能影响朝鲜的行动的战略地位。占领一直继续到1887年2月27日英国确信俄国不会占领永兴港时为止。这时中国充分警觉到局势的阽危,决意铲除朝鲜方面的祸根:李鸿章命令朝鲜王废止对俄条约,立即将穆麟德解职。朝鲜王这时已了解到他处境的危险,于是一一照办;他否认了对俄协定,解除了穆麟德外务署参判的职务。不过还暂留穆麟德主持海关,而请求李鸿章举荐一个美国人来接替他的这个职务。这项请求经交由赫德爵士办理,赫德推举了在中国海关服务的墨贤理。1885年10月墨贤理接任朝鲜海关职务。

中朝应保持团结

朝鲜海关的高级职位都渐渐由调自中国海关的人员担任了。这表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正如赫德爵士在写给墨贤理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朝鲜海关虽则是一个独立单位,却是作为中国海关的一个附属机构管理的。1889年,墨贤理由德人史纳机接替,1893年史纳机又由英人柏卓安接替。这两个人都是调自中国海关的。柏卓安还奉有控制国库开支的权力,一切支付命令都要由他副署。他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05年为止。

李鸿章对赫德的猜忌

李鸿章对赫德爵士在北京方面的外交问题上发挥的影响早有猜忌之心。他不愿见到这种影响再通过赫德所主持的机构中的一个员司而伸张到朝鲜事务方面。于是这位总督就推荐过去

任驻天津领事时颇著声誉的一个美国人德尼为朝鲜外务署顾问,来解决他的这个政治上的难题。

俄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它的计划,日本在随后几年中则一步紧一步地追求它的目标。中国的主要目的则是对两国一并加以遏制。李鸿章在1886年2月所以要把德尼安置在朝鲜国王的身边,就是指望他能忠实支持自己的政策。他却没有认识到一个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国官职的人并不见得会对中国忠诚,反而倒会觉得他首先应为他所服务的那个国家尽忠职守。德尼想尽办法使朝鲜获得独立自主,直到1888年年尾由于袁世凯的反对,被迫去职而后已。

396

德尼和袁世凯目的的分歧

从1889到1894年的五年期间,在汉城的朝廷中只剩下中国和日本面面相对了。阴谋和反阴谋,攻讦和反攻讦,建议和反建议,这一切的一切都灌进了那个心烦意乱的傀儡国王李熙的耳朵里,直到除听候战争的最终裁判外,别无他法而后已。双方都自信可操左券:中国相信它能保持它的古老的宗主权,以比较积极过问朝鲜事务的方法来代替宗主权的消极行使;日本相信它能把中国逐出朝鲜,自己在那里称霸一方。枪炮已经装上了实弹,朝鲜地位的解决,只需火门上的一个火花了。

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敌对情形的日益加剧

1894年3月18日,驻汉城各使馆得悉东学党人正浩荡而来,他们的宗旨之一就是逐灭夷倭。东学党是一个姓崔①的朝鲜学者在1859年创立的一个会社,多少有几分同中国的三合会或太平军相似,所奉信的条则是揉杂儒、佛、道三家之说的共同要旨而成的。因为它要求革新,东学党人一被查出,自然就要遭到迫害。3月29日,这个会社的一个代表团来到王宫的门前,在那里一直平心静气地等到31日国王拒绝倾听他们的请愿时

1894年3至5月东学党的起事

① 即崔济愚,崔济愚遇害后,由崔时亨继任道主。——译者

为止。在随后的几天中，逐灭夷倭的揭帖出现了。袁世凯立刻通知各使馆说，中国兵船两艘已在来朝鲜途中，并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负完全责任。日本侨民则接到本国领事的警告说，由于专门反对日本人的揭帖已经出现，日本侨民眷属的处境已危险万状。5月，据传大批东学党人已聚集在南方各道起事，举着写有“逐灭夷倭”字样的旗帜。运动是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因而397是排外的色彩的。派去迎击的官军被打败，看上去叛乱很象是要发展成为严重的造反了。

金玉均

3月间还发生了另一件阴谋举动。金玉均曾经是1884年12月的暴动和政变①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逃往日本避难，在那里勾留了九年，在这九年期间至少有过一次对他行刺未遂的事件。1894年3月，他被诱到上海，在上海的一家日本旅馆里被一个叫作洪钟宇的朝鲜人谋杀毙命。洪钟宇被捕，中国当局应朝鲜国王之请，派由中国兵船将他连同被害者的尸体一并送往朝鲜。到达朝鲜后，金玉均的尸体蒙上了一幅写有“金玉均巨逆教匪”字样的布单，随即枭首肢解，首级在汉城示众，四肢则再加分割，分送至八道。凶手洪钟宇备极优礼地护送到汉城，并在汉城被释放。这段经过使日本舆情大哗，但并未促致该国采取任何直接行动。

1894年中日双方派兵至朝鲜

由于东学党人历经5月一个月的连续不断的胜利，朝鲜政府向它的宗主国发出呼吁。袁世凯断然决然地力请干涉；但是李鸿章坚持非朝鲜王本人乞援不可，以便一切由他负责。朝鲜王发出了呼吁，于是中国应其所请，在6月6日派轮船从天津载运了一千五百名军队前往牙山，随后又增派七百二十五名军队和三艘兵船到济物浦。李鸿章正式向日本政府保证，敌对行动

① 即朝鲜史所称甲申政变。——译者

一旦停止，中国立即撤兵，他也向俄国驻北京公使作了同样的保证。他还向日本表示，希望该国政府派一两艘炮艇到朝鲜，保护旅朝的日本侨民。日本采取了相应的行动。6月1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五百名抵达汉城，6月13日又有陆军一千人接踵而至。三天之后，另一支三千人的队伍在济物浦登陆，并且据汉城方面传说，日本正调派大批军队到釜山和元山。在这期间，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些军队尚未到达之前，朝鲜军已经打败了东学党人，并且擒获了他们的为首者。但是中日这两支敌对的军队仍互相监视，留防不去。 398

中日两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往来照会

中国是遵照一个宗主国所负的责任和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所规定的义务而行事的。日本否认中国宗主权的主张，一如1876年它否认这种主张一样。当总理衙门将中国拟派兵前往朝鲜的意思通知日本公使时，它是以"派援兵戡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①这项原则作为行动的根据的。6月7日的日本复文则声称："查贵国照会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日本〕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②6月12日的一件公文中又重申了这项声明。五天之后，日本建议由中日两国会同改组朝鲜政府，并进行改革。中国复照说，就朝鲜为中国的藩属而论，宗主国向无干涉属国内政的惯例；若视朝鲜为独立国，则任何一国均无干涉之权。日本政府丝毫不为这种推理论事的说法所动，而以日本拟单独进行这项工作的意思通知中国；6月28日日本驻汉城公使要求朝鲜国王声明朝鲜为独立国，而非中国的属邦。

① 录自致日本照会原用语，见《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9页。——译者

② 录自日本复照原用语，见前引书，第21页。——译者

敌对双方的形势

在6月底时,济物浦以南的牙山有中国军队三千人,在汉城和济物浦仅有几百名卫队。日本在朝鲜境内则约有一万八千人。美、俄、法、英驻汉城代表向中国和日本代表提出联合照会,要求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敌对双方均坚持对方先撤,虽则中国方面愿实行同时撤兵的建议。在这期间,中国还请求西方各国出面干涉,日本则不愿接受。

局势一发千钧。驻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已经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7月15日,英国总领事偕同一行人在街上散步时,两次遭到穿制服的日本兵的袭击。英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然而据日本方面声称,他们是以朋友的资格而不是以战胜者的资格来到朝鲜的。日本代表提交朝鲜政府一项列有二十六款的改革内政纲领,关于这项纲领,我们只须提一下"限于十日内决定并付诸实施"的那一个条目下所列的修筑公路、建设铁路和电线这一款就足够了。闵妃和妃党这时正会同袁世凯设法保持中国在朝鲜境内的控制权。他们的势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外交方法已缓不济急,于是日方遂诉诸武力,在7月23日晨四时将王宫攻占,掳走王妃和她的子女,一并囚禁在日本使馆。他们指派国王的父亲、年已八旬的大院君代国王摄政。20日袁世凯只身逃出汉城,中国的权益托由英国代表照管。27日,这个摄政对他的宗主国宣战,并邀请日人将中国军队逐出朝鲜。

399

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沉没

7月21日分乘两艘轮船从白河出发的增援部队,将中国的兵力约增加到四千五百人。第三艘船,即专为运输增援部队而租用的英国轮船"高升"号,于7月23日载同兵勇枪炮驶离大沽,于25日晨到达牙山湾。在湾内和日本的分舰队相遇。从"浪速丸"巡洋舰派出的一支小艇驶近"高升"号船边,检查船舶证件;这艘船虽则是供敌运输之用,却正确地悬挂着一个中立国

的旗帜，而且声称是在宣战以前驶离港口的，所以对于这样一艘船究应如何处理，才最为妥善，当时略有踌躇。继而"浪速丸"发出了"跟我走"的信号。这时船上的军队已经在惊慌之下哗变，声明拟进行抵抗，拒不准许船上的非战斗人员服从"离船"的命令。于是"浪速丸"升起红旗，跟着就放出一个鱼雷，但未命中，继而船上炮火齐发。不到半小时"高升"号就沉没了；船上的一千三百人之中，只有一百七十人左右泅水上岸，得以逸去。船主和大副以及一些中国人经"浪速丸"派出的小艇救起。日军对海面上泅水的人们则开枪射击。据英国外交部的判断，战争已早于7月23日上午四时日人进犯汉城王宫时开始。如今认为这项判断是对的，那么日人击沉一艘载有拒绝投降的敌军的运输舰，也就可以认为是他们权利以内的事了。

400

牙山之役

大岛(义昌)少将留下一个旅团扼守汉城和济物浦，随即率同二万人的一支各式武器齐备的军队，向牙山叶(志超)提督所部的中国军队进逼。7月29日拂晓，他对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经过五小时的战斗，获得全胜。中国方面伤亡五百人，日方伤亡七十五人。中国的残余部队与平壤的主力会合，而把汉城以南的朝鲜地方全部委弃给日方。双方提出了指责。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申明开战理由的宣言。在这同一月里，日朝签订了同盟条约，其目的据说是维持"朝鲜在牢固基础上的独立"。

3. 中日战争：日本对欧洲的第一次挑战

日本在朝鲜的政策

不管中国曾经对朝鲜保有怎样表面上的宗主权，根据朝鲜和各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包括和中国签订的在内，这种权利早已不复存在了。8月16日，中国正式委弃了这种宗主权。日本

并没有表示过不愿为朝鲜而同中国一战。既是一个黩武的种族,日本兵在朝鲜表现出了振奋全国的精神。它进行战争唯一可理喻的理由,就是中国拒绝同它合作,去强使朝鲜政府改革内政。日本已经改造了它本国的政府,但是这却不能作为有力的根据,要求另一个更加落后的国家在一夜之间就接受政府机构的全盘改组。何况,日本被它自己的行动堵住了嘴:在1876年的日朝条约中,日本曾经强逼朝鲜自称为独立国。以1894年7月日本所提出的那样激烈的改革方案强加于一个独立国家,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然而,改革朝鲜内政不过是一种借口。日本决意实行侵略,以期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想谋取中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而代之,从而巩固它本身的独立及其今后在远东的地位。

401

日本谋求平等的愿望

促使日本在这特定时刻对中国采取行动的一个特殊理由,可以得之于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根据最近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条约,日本将于1899年摆脱这种制度。为表示和列强平等起见,日本决心要为它的旅华臣民要求领事裁判权而拒绝给予旅日华侨以这种特权。只有打一场胜仗,这才能如愿以偿。

中国为求避免战争而向列强发出了呼吁。6月25日,各国驻汉城代表曾经劝请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7月8日,总督李鸿章邀请美国政府出面斡旋,英国外交部也询问美国政府是否愿为这个目的而合作。美国国务卿拒绝干涉,但建议将争执的问题付诸仲裁。

9月16日日本在平壤的胜利

在7月29日的战事以前,中国驻牙山军队的一部分就已经开拔,同中国在平壤的驻朝鲜军队会合。这支军队从平壤向汉城方面挺进,但是前哨各据点却一个接一个地被迫后撤。日本分三路向平壤进扑:其中的一路,在9月15日作过一次时机未

成熟的进攻,经过十二小时的战斗之后被击退。第二天又发动进攻,经过数小时的博斗,中国军队完全溃败;伤亡六千六百人,日方伤亡据公布为六百三十二人。中国将领之中只有左宝贵一人显出了一点个人的英勇,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一点将才。中国兵勇的表现也不比他们的将领强一些。日军占领了平壤,中国的残余部队仓皇撤至鸭绿江对岸。

在这期间,中国军队的主力正集结在鸭绿江沿岸,军队和给养都加紧运往大东沟。载运军队和给养的运输舰,是由丁汝昌提督统率下的中国唯一精锐舰队——北洋舰队——护送的。在丁提督的指挥下,计有铁甲兵船二艘,非装甲巡洋舰十艘,共船舰十二艘,计三万五千零七十吨,另有鱼雷艇四艘。9月17日中午,伊东祐亨海军司令统率的日本舰队出现于鸭绿江口外。在他的指挥下,计有兵船十二艘,共约四万吨。中国方面固以两艘铁甲兵船占优势,但是日本舰队却配备比较整齐,且以速度和快速炮的数量见长。第一炮是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五时双方弹药缺乏时为止。日方伤亡二百三十九人,中国方面包括溺毙者在内,伤亡约六百人。丁提督也在受伤者之列。日本旗舰受重伤;中国船舰被击沉或被迫靠岸的计四艘,另一艘则临阵脱逃。就某种意义来说,战术上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两艘铁甲兵船的,因为在傍晚撤退的是日本舰队,而且中国运输舰还卸下了所载的军队和给养。但从那一天起,海上的优势就一直被日本占去了。

402

9月17日鸭绿江(海阳)之战

这两次会战对中国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很大。从李鸿章和他的眷属以及他卵翼下的人们身上可以反映出举国人心惶惶的情形。战争的爆发、调度以至于失利,都认为应由这位总督本人负责。他仍暂留原职并保住他的官衔,但上谕谴责他的过失并褫

中国人的慌乱

夺了黄马褂和三眼花翎那两项最高的荣誉。国内人民的情绪从各口岸的多次仇外的表示中反映出来。10 月间,争取西方各国出面干涉的第二次试探,并不比第一次更加成功①。

403　日本进犯满洲

占领平壤之后,日军继续前进,到了 9 月 30 日,已经驰骋于朝鲜全境,直抵鸭绿江边。10 月 24 日渡江成功,中国军队被迫退守九连城。两天之后,又退到凤凰城,继而撤至摩天岭,这一带山脉经过一番相当坚强的据守之后,终被日军攻陷。12 月 11 日,两军相遇于海城东南十哩的析木城,经过两天的战斗,中国军队又遭败北。侵略军于是占领海城。在这期间,10 月 24 日,由大山(岩)伯爵领导的日本第二军竟轻蔑地对当地炮台和中国舰队视若无睹,而在旅顺口东北的貔子窝登陆。11 月 6 日,这支军队攻占了大连湾(即大连),并完成了对旅顺口的包围。

恭亲王再请调停

北京方面所感到的惊慌是向所未有的。11 月 7 日是西太后的六旬大庆,为了筹备庆祝,清廷曾拨款一千万两,可是这个日子却几乎是无声无息地度过去了。早在 10 月间官复原职的恭亲王于 11 月 3 日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

---

① 关于中日战争的广泛国际方面,下述评论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自从 1882 年日朝条约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坚定地、始终如一地使中国不要认为在朝鲜的危机中,美国会支持中国的主张,可是英国却始终支持中国的要求。这时英国除去拉拢欧洲列强和美国参加对日共同干涉而毫无结果外,并未作其他任何努力。英国的中立事实上是对日本怀有善意的表示……”——丹涅特前引书,第 500 页(中译本,第 424 页)。另参阅同一作者的《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 53 页:“中日战争暴露出,中华帝国的孱弱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则显得气热壮盛而前途不可限量。英国突然之间……转而属望于日本,因为日本看上去最可能予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象这样正在战争之际竟将平素所给予它一向怂恿其在朝鲜锐意进取的那个国家的支持转移到对方,英国伤透了中国人的感情。这种转移虽然奠定了 1902 年英日同盟的基础,却也将中国投入了殷殷期待的俄国怀抱。……新奠定的英日亲善的直接后果,也许可以说是它的结果,就是 1896 年中俄的秘密攻守同盟。李鸿章为了 1894 年的那件他视为背信弃义的行为,对英国是绝不原谅的。”

对中日问题进行斡旋。第二天他邀集美、英、德、法、俄各国公使会商,请各国政府共同出面干涉。各次的建议都是以朝鲜独立和对日赔偿作为谈判基础的。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一切干涉的建议。

11月21日旅顺口的攻占

中国舰队在鸭绿江战役之后就一直开到旅顺口,而且没有参加旅顺口的保卫战,又从那里驶往威海卫。在大连湾被攻占之后,宋提督率领一支八千人的中国军队从摩天岭南下去堵击日军。他一到金州,便在11月21日向敌人发动进攻,但被击败。旅顺口的防务是由统率中国最精锐部队中训练最优良的那一镇的总兵卫汝成负责调度的。他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比中国方面在这次战役中的其他部署更加有效,日军经过11月21日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就完全占有了炮台、港口和城镇。这次胜利由于大批地屠戮中国人而失去了光彩,在占领后被杀的人数,据某些人的估计,竟达二千名之多。日本方面是以日本进攻军在看到他们被俘同伴的被肢解了的尸体和被割下来的头颅而不禁发出怒火,以及中国兵惯于在战败时抛掉自己宽松的制服而穿上乡下劳动人民的便装这两种情形来作为说词的。

404

11月17至26日谈判的交叉进行

在这期间,两个互不相关但互相抵触的试探谈和的举动已经着手了。11月17日,日本政府照会美国政府说,倘中国希望同日本谈和,应通过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办理。11月23日,田贝公使电称,前一日,中国曾通过他向日本直接谈和,谈判的基础是朝鲜独立和赔偿兵费。在这项举动的前一两天,批复李鸿章奏折的一道上谕饬由李氏迅派德璀琳赴日,要求停战,并探询日本应允缔和的条件。11月26日德璀琳抵神户,但接获通知说,由于他未奉中国政府的正式委派,不能受到任何接待或承认。通过美国使馆所作的和平建议也同告失败。

1895年1至2月威海卫和中国舰队的投降

日方继续其军事进展。1月18、19和26日，山东登州府一再受到日本兵船的炮轰。这项表面上反常的行动是在完全无视中国舰队的情形下进行的，并且大约是为了分散对于往东一百哩的另一项军事行动的注意力而这样拟定的。1月20日，黑田大将所部的一支拥有二万人的日军，连同一万名运输队在威海卫以东约三十哩、山东东北海角南端的荣成湾登陆。日军占领荣成之后，即进而围攻炮台，中国舰队就是在它的大炮掩护之下停泊在那里的。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让这支舰队开出作战。舰队的弹药既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充，而证诸鸭绿江之战的经验，即再图和组织比较优良的日本舰队相抗，也没有获胜的希望。

405

中国方面唯求当时所提出的和平建议能获致成果，从而中国方面尚可有保存其残余舰队的一线之望。然而中国方面的这种希望却又落空。1895年1月26日，港口南岸的沿岸各炮台遭到了攻击。丁汝昌提督在日军攻占炮台迫在眉睫的时候，令由几批海军兵勇将弹药库炸毁，将大炮拆除。日军用旅顺口带来的装配零件立刻修复了几尊大炮，并且就用这些大炮，配合着日军舰队开始对刘公岛进行轰击。中国船舰有一艘被炮火击沉，另几艘则是被设法潜入警备线的鱼雷艇击沉的，其中包括旗舰"定远"号在内。投降是无可避免了。丁提督和副管带自杀。在刘公岛，守将张德山和他的副手也都自杀了。这样他们就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并且使他们自己免于斩首，他们的家属免于死亡，财产免于查抄。这个要塞所残存的一切，连同铁甲舰一艘、巡洋舰四艘一并在2月12日投降。

在日军开始向威海卫进兵以前，中国已经派出了另一个议和使节。12月21日上谕，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为议和大臣，探询

日本所要求的停战条件。这两位大臣以种种借口一路逡巡不前，1月30日始抵达神户，在那里和著名的美国外交家科士达上校会齐，科士达担任了这个使节团和接踵而来的另一个使节团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在2月2日中日双方会晤时，伊藤伯爵向中国大臣表示，鉴于他们并未奉到充分的权限，足证清廷尚无切实求和之意。

中国第一次议和使节

日本乘这次拒绝求和之际，力图在满洲作进一步的进展。1月10日，日军从他们在海城的据点出发，攻陷盖州。宋提督所部的中国军队于是向海城挺进，但于2月16日被击退，并被逐回营口。在3月4日和3月9日之间，日军相继攻占辽阳、牛庄、营口和田庄台。这时在侵略军和山海关之间已毫无阻挡。山海关一旦落到日军手中，那就无法阻截他们直下天津和北京了。

406
1895年1至3月日本在满洲的进展

2月15日，李鸿章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他记取了先前的经验，将他的证书全文经由美使馆电告东京方面。3月4日，中国政府获悉证书的款式可以接受。中国派了它的最卓越的政治家亲往求和，这位政治家曾经主持中国外交政策多年，并且有充分的支持，足可将他承担的一切付诸实施。3月5日，他偕同科士达先生、他的儿子李经方、罗丰禄、伍廷芳及随员等一行一百三十五人离京。3月19日，这个议和代表团抵达下关(即马关)。日本方面的全权办理大臣是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伯爵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伯爵。

李鸿章奉使议和

在3月2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李鸿章要求完全停止敌对行动。翌日，日方同意在将山海关、大沽和天津连同联接这三个地方的铁路线一并交与日本的条件下，实行休战。由于这样一来势必将北京置于日军的支配之下，这个条件立

1895年3月和议在马关开始

即被拒绝。伊藤于是宣称，在那种情形下，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休战问题将不再加以考虑。李鸿章请休会三天，以便向北京请示；24日他放弃了休战之议，而要求日本开列和平条件。日方答应在第二天提出。伊藤顺便提到了日本已派兵往征台湾的话。

407　当中国议和大臣从这次会议回寓的时候，他遭到一个日本狂徒的狙击，子弹射入面颊的左眼下一吋的地方，嵌在那里无法夹出。日本惊慌起来。主战派势力强大，非有重要的割让不肯缔和；这时正如陆相所说，这个凶犯将国家的功业毁于一旦。天皇颁布了一道敕书，表示最深切的伤痛和歉意。皇后也关切备至。日本社会的各阶层都纷纷表示同情。

暗杀李鸿章未遂

李鸿章继续在病房中调度交涉事宜，他卧病达十七天之久，在这个期间李经方参预议和。这次行刺的第一个结果是日本自动建议在满洲、直隶和山东无条件休战二十一天。关于这项建议的协定在3月30日签字，4月17日又展期二十一天。第二个结果是日本所提的苛刻条件大为减轻了。割让满洲领土的面积业经缩小，赔款减去了三分之一，要求在中国内地享受特殊权益的主张也放弃了，并且日方撤回了占领清朝老家奉天作为具体保证的要求。通过往来照会进行了三个星期的交涉之后，以日、中、英文写成的马关条约在4月17日签字。

日本因此而作的让步

根据这项条约，中国必须承认朝鲜的充分独立自主。它还须割让给日本(甲)辽河以东(辽东)以及从安平河和鸭绿江的汇合点起，沿凤凰城、海城直到营口这一条线以南的满洲地方；(乙)台湾；和(丙)澎湖列岛。中国须偿付赔款银二亿两，并且在赔款付清、以后要谈判的商约签字批准以前，日本将继续占领威海卫。同时增辟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约开口岸，并将通达

1895年4月17日的马关条约

各该城的水道一律开放通航。附带的通商条约①于1896年7月21日在北京签字。其中载有业经许给西方各国的一切权益，包括对日本旅华臣民所行使的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条款。这件条约比其他各约占先的一点是特别许给日本以在各约开口岸从事商业、工业和制造业的权利——这是以往中国方面拒绝给予的一项权利。 408

马关条约签字八天之后，日本政府收到了俄、法、德三国公使的照会，"建议"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理由是"日本的占有辽东，不独是对北京的一个直接威胁，而且使朝鲜的独立完全成为欺人之谈"。俄、德两国各有其阻止日本跨入辽东的一番打算。阻止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扩张，关系俄国的利害很大；而德国却指望在中国占一立脚点，日本的扩张则会阻碍其实现。1891年，大西伯利亚铁路的乌苏里段开始兴工建筑。这条路线的完工，希望能使俄国和一个亚洲的不冻港沟通起来。在兴建这条铁路的同时，俄法议定了一项同盟条约。其附带的协定之一就是法国为俄国兴修铁路，贷给巨额款项。在马关条约签字后八个月，即1895年12月，这条大铁路第一段、即切利亚宾斯克至鄂木斯克段开始通车。

俄、法、德三国的干涉

李鸿章的指望欧洲干涉，一定是有相当道理的。在离开北京之前，他曾专诚访问俄、法两国使馆。在马关会议时，他对于要求割让台湾一节曾经力争，但是却不认为有一谈辽东问题的迫切需要。当5月8日在烟台换约时，有许多国家的军舰停泊在那里，其中包括一支拥有十七艘军舰和若干艘鱼雷艇的俄国舰队。要求归还辽东在日本方面看来无足惊异。在那个时候兼并中国大陆上的领土是和伊藤伯爵与陆奥伯爵两人的高明之见

① 即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译者

相左的,但是迫于军方的态度却不得不提出这个要求。抗拒三409国的劝告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屈服,11月8日在北京签订了一项条约①,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得到了三千万两的新增赔款作为交换,这就使赔款总额成为二亿三千万两②。

台湾反对割让的抗议

就台湾来说,这件条约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事情的结束。伊藤伯爵对李鸿章说过的那支远征军于3月20日到达澎湖列岛海面。23日,舰队轰毁了各主要炮台;不到三天的工夫,登陆部队战胜了一切抵抗,完全占领了构成台湾门户的那些岛屿和马公港。

台湾共和国

台湾方面一旦得悉割让该岛是和平条件之一,舆情大哗。4月20日,台湾缙绅代表商请英国以该岛为保护地,条件是主权和田赋仍归中国所有,行政由英国单独管理,行政费则由所征捐税负担。在这项建议被拒绝之后,5月20日,又以同样的建议向法国提出,但也遭拒绝。在中国主战派的直接鼓励下,5月24日台湾共和国宣告成立。巡抚唐景崧不得已而接受了新共和国的总统职。同时国会召集开会。

1895年6月2日台湾的割让

这时李鸿章的政敌设法使他的儿子李经方出任割让台湾专使,得如愿已偿。李经方由科士达陪同前往台湾,6月2日,在

① 即辽南条约。——译者

② 在1902年代表日本谈判英日同盟的林董伯爵对于归还辽东所发的议论是值得注意的。他在1895年夏季写道:"历史的往例教导我们,列强联合强迫日本归还辽东,是无须惊异的。……现在日本所必须作的,是绝对保持镇静,以消弭对日本的猜忌,厚增国力,伺机而动,静待东洋终必有一日到来的机会。一旦时日到来,则日本当可自行其是,不独可使多事的各国各安其所,而且于必要时,甚至可以过问他国的事务。那时日本当可收其实惠。"参阅波雷编的《林董伯爵秘录》,普特南父子公司特许发表,第107和288页。在这些话里,我听到了堀田勋爵和谷子爵分别在1858和1887年所上的奏章的回声,并且这些话也预示出日本在1904、1914和1915年的某些行动。英日同盟本身在1895年夏季就已经由林伯爵预示端倪了。参阅前引书,第82页。

基隆海面的日本旗舰上正式将台湾交给日本当局。在不到五个月的工夫，日本安然占领了这个岛屿。

410 在必须筹措约四千万英镑以偿付对日本赔款的时候，中国政府商之于赫德爵士。但是俄法两国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应该丧失一点它们因三国干涉而取得的外交声势。经过中国驻巴黎使节的交涉，以俄国财政部为一方，六家法国银行和四家俄国银行所组成的一个银行团为另一方，在7月6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由俄国政府担保，借给中国为期三十六年的一笔四亿法郎(合一千五百八十二万镑)的四厘息借款。

为偿付赔款所举的外债

英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项借款提出抗议。被三国干涉中的同伴抛弃了的德国，不得不同英国携手。随后的两笔为筹借赔款和修复战争创痍所举的借款是由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分别于1896和1898年共同承借的。第一笔是一千六百万镑为期三十六年的五厘息借款；第二笔是一千六百万镑为期四十五年的四厘半息借款。这两笔借款都没有英德这两个有关国政府的保证。所有这三笔借款都是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为尽够抵还第三笔借款起见，中国不得不以长江流域六处的货厘和盐厘作为担保。这六处的厘金的征收事宜均派由总税务司监督。如有欠缴情事，即由总税务司接管。

中国的屈辱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唯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地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

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结果。挽救中国免于侵略和瓜分，是列强的义务，而中国却不负任何责任。中国现在已经丧失了台湾，而辽东只是由于三个西方国家因自身利害而进行干涉方得保全。战争赔款已经加给了中国一笔前所未有的国债。除去蒙古和西藏以外，中国已经失去了它的最后一个屏藩；而且这些结果都是由一个受人蔑视的亚洲国家一手造成的。那个国家现在已经表明了它不独凌驾于中国之上，而且和享有特权的西方各国并驾齐驱了。随着和约的缔结，中国的大臣们已普遍不为人所信任，就连中国的唯一政治家李鸿章也不例外，李氏已遭谪而暂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国是屈辱备至了。在一切有经验(是西方所谓的有经验而不是东方所谓的那种有经验)的观察家看来，帝国的瓦解似乎已显然迫在眉睫而无可避免了。

第二十章　中国临到瓜分关头

412

1. 铁路的发展

中国甘心于交通落后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没有铁路的商业大国。在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中，有十三省是用价廉而安全的水路来运输它们的商品的。在其余的省份中，只有四川一省物产既丰，而又人口稠密，但是境内山岭连绵，冈峦起伏；云南贫瘠多山；甘肃硗薄而又遥远；只有陕西和山西这两个接境的省份，还可算作有发展铁路希望的一个地区。

预料到苏州即将攻陷，太平天国叛乱行将结束，上海有二十七家英美行号于1863年7月20日向江苏巡抚李鸿章递呈了一个禀帖，请求准许修造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巡抚害怕外国人在中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将禀帖驳回。

1875年—1876年的淞沪铁路

在1865年，上海的英美商人，在美国领事和外交官员的赞助下，组成了一个公司，想在上海与吴淞之间，在所有中国人最为尊敬的坟地上，修造一条长十哩的铁路。发起人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们取得了重建上海到吴淞间的军运道路的许可并通过私下商议而获得为加宽和整理道路所必需的土地。不久，吴淞线的发起人宣布他们要沿着他们的新路敷设"车道"路轨①。关于这点，他们是得到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的授权的，而威妥玛爵士的行动则以1858年的条约第四款的条文——"由沿海无论

① 将"road"(路)和"tramway"(车道)两字译成中文，要避免用"horse"(马)字作为冠首词，是绝不可能的。

413 何处”——为依据，因而就支持了外国商人的极端主张。1872年横滨东京铁路开放的消息鼓舞了上海－吴淞线的发起人。中国人不久即知悉所谓车道实际上是一条铁路，于是上海道在1876年2月23日谕知发起人在他向北京请示以前停止兴筑。同时英国公使奉指示说，英国政府向不支持外国人的活动可以扩展到“无论何处”的那种论点。当发起人决定继续兴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获得他们本国使馆的授权。

淞沪铁路的拆毁

到6月30日，有五哩长的通到江湾的路线已经筑好，从那一天起，每天往返行驶，都有六次专门载客的列车。这些列车很拥挤，铁路似乎颇得人心。但是在8月3日，有一个在轨道上行走的人被轧毙，于是人民的态度变得其势汹汹了。威妥玛爵士当时正在上海，打算动身到烟台去谈判烟台条约。按照他的命令，列车停驶了。在10月24日，两江总督签定了一个合约，由中国照实价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买进铁路。价款既经在一年后偿清，中国官员就将铁路拆除，将路轨和车辆运往台湾，让它们弃在海滩上锈烂。

1880年的开平轻便铁路

第二次企图也是基于一种欺诈的手段，但那是通过中国人实现的。招商局的主持人唐景星在1878年开办开平煤矿，以便为他的轮船取得国产谋。在唐山的主要煤井距离北塘有二十九哩，距离可以开凿运河的最近地点胥各庄有七哩。唐氏赞成修造一条连接唐山和胥各庄的车道。车辆用骡子拖拉。这条路线在1880年开始修建，到1881年筑成。在这期间，公司所用的一位工程师金德尔先生已经以五百二十元(九十五镑)的代价造成了一个火车头。在1881年6月9日，它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它的成就不久就表现出来，于是在1882年购置了两部水柜式蒸汽机，在通往运河的铁路上使用，这时运河已经开凿至北塘

河畔的芦台。

下一次的冒险尝试是在台湾进行的。台湾巡抚刘铭传曾经考虑过修改一条联络台北府和基隆的长十八哩的马车道的计划。但是刘氏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军事统帅，他很容易地被说服去用铁路代替马车道。1886 年年底，奉旨核准。1891 年，到基隆的一段铁路完工，1893 年，向台湾南部伸展的那段筑到了距台北府三十哩的新竹。这条路始终是中国官吏管理下的牺牲物，所以在 1895 年日本人除掉五十哩铺得很简陋的路轨以外，没有接收到什么。

1887年的台湾铁道
414

1886 年，开平轻便铁路延展到芦台。直隶总督很感兴趣。他的兴趣是建立在战略理由上的，并且他获得皇上的生父醇亲王的支持。在 1887 年 3 月 15 日，这位亲王奏请将铁路向东延展到山海关，向西延展到天津，再由此而延展到北京。皇帝立即降旨准如所请。于是中国铁路公司宣告成立，在 1888 年 8 月间通往天津的一段筑成。这时铁路已筑了八十哩。西段，即天津、北京段，将长八十哩；东段，即唐山、山海关段，也是长八十哩。现在建议先筑西段，后筑东段；但是反动的和反对李鸿章的势力活跃起来，军机处不予批准。李氏这时决定贯彻醇亲王奏章中的计划，将铁路向东延筑到山海关。工程在 1891 年开始，到 1894 年完成。他将这件事当作政府事业来办，为此成立了一个政府机关，称做“山海关内外铁路局”。该局于 1894 年将中国铁路公司的路线和设备归并了进来。同时，为使满洲有备无患以御侵袭起见，他提议将他所筑的铁路延展到山海关以东而伸入长城以外的地方。遵照他的命令，勘测工作于 1890 年开始。俄国注意到了这个企图是要阻止它按照控制满洲的方式去发展俄国铁路的。对拟由中国延展路线持积极反对意见的人在北京受

1888年的天津铁路

到了鼓励。然而在1893年,李鸿章得到了他所企求的允准,在415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路线已经筑到了山海关以东四十哩的中后所。

华北各铁路的完成

直到中日战争时止,铁路的发展情形就是这样。那一次战争的结果显示了铁路的战略价值。在1895年秋季,以前被驳斥了的将铁路延筑到北京的计划又付诸实行,一年以后筑到了丰台,随后又修到离北京城外不远的马家堡。这条铁路纯粹由中国人管理,而且管理得那样得法,以致从它的盈余项下支付了几条支线的建筑费。

俄国得到李鸿章的帮助

直到中日战争时止,李鸿章一直担心着俄国在朝鲜的阴谋。他看到,如果朝鲜被俄国吞并,满洲就会完全被俄国领土所包围,中国就不能希望在那里维持它的通商自由。既然单凭他本身无能为力,他就去倚赖英美等商业国家,从商业上来发展满洲。在战争以后,他却越来越依靠俄国。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的北部铁路已经在通往奉天的一条线上筑到新民府,还有从沟帮子到达牛庄的口岸营口的一条支路。但是满洲的其余部分实际上已经归由俄国去发展。达到这一结果的谈判,是在商谈退还辽东半岛的同时,或在事后不久进行的。

华俄道胜银行

为了实行依靠铁路进行征服的政策,俄国在1895年12月特许设立华俄银行,这个银行在五年后同北方银行合并,此后则称为华俄道胜银行。名义上这是一家俄国的公司,但在它的创办人当中有四家巴黎的主要银行和许多法国金融界的领袖人物。

1896年5月的中俄密约

1896年3月,李鸿章奉命代表中国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同罗巴诺夫亲王于6月3日(旧历5月22日)

签订了一项为期十五年的专门对付日本的秘密同盟条约①。设若日本在中国、朝鲜或满洲推行侵略政策，缔约国双方约定彼此在海陆两方面相互支援。实际上同李氏谈判条约的维特（后封伯爵），以中国的安全有赖于俄国建成一条经过北满到海参崴的横贯大陆的铁路这一点劝说李氏而获得成功。这项权利的给予，载在条约第四款中。在9月8日，驻圣彼得堡的中国公使同华俄道胜银行代表人签订了修建中东铁路的合同。这个银行根据俄国法律，组织了"中东铁路公司"，公司条例于12月由沙皇批准②。 416

英俄争夺投资

在满洲的铁路中，由山海关内外铁路局于1895年前后所筑的山海关到新民府和营口（牛庄）的路线，并不在俄国控制之下。为了供应铁路的建筑费，外国银行截至1897年年底止，共计垫款二百四十四万两。1898年，在投资于关内外铁路的贷款问题上，英俄利益集团之间有一场外交战。这个问题特别牵涉到满洲。在9月7日，李鸿章被革职，10月10日，签订了一项合同，由英国贷给铁路二百三十万镑的款项，遇有短付情事，概由中国政府理清。这样，俄国受到了保护而使英国在满洲不能发生影响。

矿务铁路总局

中国曾经作过几次努力，以巩固对于铁路建筑的控制权。1896年5月，盛宣怀奉派为所有这类铁路建筑事宜的督办大臣。10月间，他又奉旨专门筹办京汉铁路事宜，这条路早就由

① 由于俄国后来在满洲进行侵略，这个条约被中国宣布废除了；设若俄国遵守条约条款，1904－1905年对日本的战争原是未必会发生的。

② 在满洲的俄国铁路是：从西到东，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线，九百五十哩；由北到南，哈尔滨－大连湾－旅顺口线，六百四十六哩——到1904年，总长达一千五百九十六哩。根据协定，中国得在三十年内备价赎回这些铁路，在八十年期满时，它们均由中国收回，不另给价。横贯西伯利亚的干线在1904年竣工。这条路线有一千哩左右经过满洲境内。

湖广总督张之洞交给他管理。1898 年 4 月，作为那一年变法运动的一部分，皇上颁布上谕，成立矿务铁路总局，派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王文韶和张荫桓主持其事。这个机构认真地削减了许多地位很高的官员的津贴，因而它的主持人在变法运动的反动时期受到严厉的处分。1903 年，这个局原属于新成立的商部，后来又改属邮传部。

417

京汉铁路争夺管理权

京汉铁路是必须用中国资金和中国材料修造的。为了满足材料的需要，张之洞设立了汉阳铁矿局，在萍乡开采了一个煤矿，在大冶开办了一个铁矿。资金的筹措遇到了较多困难，于是在 1896 年 10 月，获得了举借外债的许可。开始是同美华启兴公司谈判。同时，一家比利时银团提出了更有吸引力的相对开价，而美国银团，由于华盛顿政府的冷淡，坐失了所争取的目的物，但是比利时人所走的也不是平坦道路。在比利时的幕后是法国和俄国。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要求或许支持，或许不予支持，但是它们对于比利时的要求却联合起来反对。同比利时的谈判曾经暂时中断，但是，在 1898 年 6 月 26 日终于签订了一个京汉路贷款和经营的合同。贷款——俄法两国不参加——是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从 1909 年起，分二十年还清。这个银团从合同生效日起，经营该路三十年，在减除营运费用和贷款本息之后，分取 20% 的纯利。这条铁路在 1905 年筑成，全线共长八百二十哩，包括五十八哩支线在内。

德国在山东修造的铁路

德国要求把山东作为它的发展范围。按照 1898 年 3 月 6 日签订的一项条约，德国租到胶州，暂以九十九年为期，并且获得山东省内两条铁路线的建筑权。在 1899 年 6 月 1 日，山东胶济华德合办铁路公司获得德帝国的一个特许状，以五千四百万马克的资本，修建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该公司还有权中

请修造从青岛到沂州和从济南到沂州的两条铁路。这项特许状还辅以同中国在1900年3月21日签订的一项关于取得土地和保护铁路的协定。在这个特许状下，从青岛到济南长达二百四十五哩的铁路，连同到博山煤矿区的长三十六哩的支线——共长二百八十一哩——于1904年竣工，共费德国资金五千二百九十万马克。 418

法国在华南修造的铁路

法国要求把毗邻东京的三个省份作为它的发展范围，并将它的要求扩展到四川。1895年6月，议定安南的铁路可以延长至中国境内。两年以后，按照1898年4月批准的一项合同的规定，准许法国从安南边境修造一条铁路到云南府，同在东京准备修造的从河内溯红河到老街的铁路相衔接。这条铁路直到1910年才通车。

粤汉铁路美国合同

美国银团曾在1896年遭到失败。但是，鉴于至少有四个欧洲国家在1898年春季表现了领土野心，那么，寻求美国资本家的支援自然是有坚强的理由的，因为美国还没有表现出领土野心。在1897年12月，盛宣怀奏请皇上允准修造从汉口到广州的一条铁路，并且建议同美国商订合同。1898年4月14日，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同美华启兴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贷款规定为四百万英镑。在1899－1900年冬季以前，并未进行勘测。后来发现工程上的困难可能很大，因而不得不将估计的造价加以修正。在1900年7月13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合同，将贷款数目增至美金四千万元。这项合同规定"美国人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

比利时的好机会

对于那条通过北京－汉口－广州的中央大干线，如果中国方面渴望它的全线不致落到比利时人控制之下，那么在幕后有他国利益的比利时方面也同样地渴望取得对它的控制。到

1903年年底，比利时人已经不声不响地取得了美华启兴公司的大多数股权，于是他们选出了他们所提名的惠铁尔将军为公司

419 的总经理。中国根据补充合同第十七款提出抗议，因为在这一款中明文规定禁止这种管理权的转移。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坚持法律立场，认为公司依然是一家美国的公司。中国认为这是一种违约行为而感到愤怒，并且因为给予比利时的要求以最坚强的支持的俄国屡次战败而强硬起来，于是正式宣布取消合同。美国国务卿提出抗议，并且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声明美国人已经重新控制了公司全部股份的真正大多数。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广东、湖南和湖北等省士绅的激烈反对。筹措这项事业的资金依然有困难，最后议定以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将租让权和铁路售给中国政府。两国政府都接受了这种办法。

英国政府对于铁路要求的态度

在军事国家之中，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以及法国在华南三省，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它们发展铁路独占权利的承认。日本也对福建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在商业国家之中，美国得到过为它所不能履行的一个合同，英国资本也要取得其他让与权。美国和英国都把"门户开放"的维持，作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所不同的是美国主张这项原则适用于整个帝国，而英国则承认在满洲、山东、福建以及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西部有其他的优先权利。在山海关以东的铁路的争夺上，已可看出英俄有谅解的必要，于是在1899年4月，按照斯柯特－穆拉维约夫协定，双方商就，英国将不在中国长城以北寻求筑路的让与权，也不妨碍俄国在那里的要求，而俄国将不在扬子江流域寻求筑路的让与权，也不妨碍英国在那里的要求。进一步又议定山海关铁路及其直接延长线是中国的铁路，不得抵押或让与一个非中国的公司。

1899年4月的英俄协定

一年以前，当英国占有威海卫的时候，英国政府曾经自动发

表声明说，它在威海卫确立据点时，无意损害或夺取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和利益，并且它同意不从威海卫建造任何进入山东内地的铁路。另一方面，德国在 1900 年却主张说，既然英国在扬子江流域并无基地，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毫无保留地对德国企业开放的。这项论点终于占了上风。 420

扬子江流域的英国铁路

自由贸易的英国由于一再让步，承认了在各自发展范围内主张保护贸易原则的其他各国的最高要求，而自己落到的，却是同俄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在扬子江流域的铁路发展上、依照自由贸易原则竞争的特权。在那里，英中公司取得了第一件英国的合同，建造一条从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初步协定在 1898 年 5 月 13 日签订，最后的协定在 1903 年 7 月 9 日签订。这个合同规定了一笔以五十年为期，金额三百二十五万镑的贷款。铁路的修建和经营归五个委员——两名中国人、两名英国人和一名英国总工程师——组成的管理处掌管。全线共长二百一十哩，在 1908 年竣工，从那时起，管理权就交与作为总办的一位中国人手里了。

山西的铁路

山西省是世界上最富饶的产煤区之一，此外它还蕴藏着大量的铁矿。在 1898 年 5 月 21 日，福公司同山西省商务局签订了一项合同，这家公司虽是英意合办，但资本却是英国的；合同授予福公司以"专办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的权利"，期限六十年。根据另行议定，福公司得"筑路造桥，开掘河道，或修筑与干线或水道相连的铁路支线"，以便运送煤铁。1898 年 6 月 21 日，又同河南巡抚特派的一位人员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合同，取得怀庆和河南省黄河以北山区里的同样的开矿筑路权利。这些合同均于 1898 年 5 月 17 日奉旨批准；各准使用外国资本以银一千万两为度。于是这个 421 公司就以所募集的一百五十二万镑的资本进行开矿，建造一条

以渭水上驳船渡口道口镇为起点的铁路通至矿山。义和团叛乱耽搁了这项工程，但在1902年重新开工，在1905年铁路就修到了（博山）清化，长达九十哩。中国人然后决定收买福公司在铁路方面的权利，在1905年7月3日签订了两项合同。此后路线又向前延长了三十五哩，通到山西省的泽州。其他铁路也都着手建造，关于这些铁路，只需提一下每一条都代表着中国政府所受到的一些外交压力就够了。

在满洲的日本铁路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俄国在满洲的铁路权益大部分转让给日本。俄国保留了从满洲里起到绥芬河为止的西伯利亚铁路的全部干线，共长九百五十哩。在从哈尔滨到大连的南北路线中，它保留了到长春的长达一百三十二哩的北段，从那里起的南段路线长达五百四十哩，则让给了日本。除此之外，在1905年又同中国议定，日本用自筹款项，得造一条从奉天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长达一百八十九哩的铁路；还有一条从新民府到奉天长达四十八哩的铁路，一条从长春到吉林、长达七十五哩的铁路。关于后两条铁路，修造费用一半由中国筹措，另一半由日本贷与。日本为新民府奉天线贷与中国三万三千三百镑，为长春吉林线贷与二十二万五千镑。日本为了经营满洲的其他铁路，在1906年设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

四国银行团的组成

四川是英法两国争逐的对象；法国希望从东京，英国希望从缅甸，以贯通云南的铁路来开拓它的贸易。英国将会因扬子江沿线的联运而获得利益。在1905年，英法组成了一个银团，即华中铁路公司，以经营扬子江流域的铁路。1909年，德国银团被允许参加，组成了三国银行团。同年，一个美国银行团根据美国的条约权利和义务以及中国负责官员在1903和1904年向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诺言，要求参加。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人

422

反对美国人在平等基础上参加。中国政府有意拒绝美国的请求，于是获得暗示说，如不顾美国的请求，则可能对庚子赔款的计划产生不利的影响。最后，在1909年7月15日，塔夫脱总统以个人名义电致满清末代皇帝的父亲摄政醇亲王，力请准许美国以平等地位参加，以便实行对中美两国均有利益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点达到了所希望的效果。1910年5月，在巴黎会议上达成了协议，将包括川汉线和粤汉线北段在内的湖广铁路平均分配给四国银行团的成员。

湖广铁路

在1911年5月20日，四国银行团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签订了一个湖广铁路合同。它订明目前借款为六百万镑，随后借款四百万镑，统在四十年内偿清，以营业收入及湖广(湖北和湖南)两省内若干种盐税和厘金为抵押，并由中国政府作担保。当时借款是为了提供资本：第一，赎回美华启兴公司代理大清政府发售的金圆债票美金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第二，建造粤汉铁路的估计长达五百五十九哩的湖北至湖南段；第三，建造一条估计长达三百七十三哩的由广水经襄阳府和荆门州到宜昌的铁路，以及一条估计长达一百八十六哩的宜昌到夔州府的铁路。这些铁路的建筑和管理，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

2. 租让权的争夺①

中国改变它在外交上的基本原则

对日本的战争使中国屈膝。日本已经确立了同欧洲六国平等的权利。可是中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从失败中取得教训，他们以后的举动只是表现了两种政策路线：第一，他们必须筹得大宗款项以偿付强加于帝国的赔款；第二，他们必须重新考虑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而且必须更加倚靠那三个干涉的国

423

① 或象一位中国作者所说："无耻的盗窃时代。"

家，即俄国、法国及德国。他们既无改组计划，又无开发国内资源的计划，至于自力更生也是计无所出。他们依然认为西方国家有将中国从积弱中拯救出来的义务，既然商业国家使它失望，那种义务现在就只得落在军事国家的头上了。

中国使节公开承认的目的

为了庆贺1896年6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中国派遣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氏出使公开承认的目的，除了代表中国皇帝参加加冕典礼之外，是为俄、德、法促致收回辽东半岛的那次干涉而向三国正式道谢；向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呈送问候函件；并征询西方国家关于修改关税税则的意见。自1858年以来，物价早已有了变动，并且，由于银价跌落的影响，国库这时在许多重要商品方面所收到的关税并不是5%，而只有2-3%。中国主张仍照1858年的税率征税，但是以黄金代替白银计算。尽管各国表示一般的同意，可是没有继之以行动，因而关税税则还是原封未动。使节的真正目的是没有经过公开承认的，但是它的结果却早于上文提及。中俄双方以一项密约议定，在缔约国一方或朝鲜的领土遭到日本侵犯时，彼此进行合作。

俄国控制朝鲜，继而撤退（1896—1897年）

俄国正凭借这项条约巩固着它在中国、特别是在满洲的优势；同时还伸张到朝鲜去建立它的势力。在1896年1897年这两年，它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相结合的手段，在这个不久才宣布独立的王国里获得了一个极有势力的地位。但是，到1898年，它更关心于维持它在中国的地位；为了避免分散力量，它从在朝鲜已经取得的地位上撤退并且召回它的所有军官。1898年4月25日，在东京签订了一项条约，其中俄国明白地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商务利益①。

424

① 当时朝鲜情况，见本书477页及以后各页。

德国希望在中国取得海军基地

为了辽东半岛的归还，中国显然要酬谢那三个干涉国家。在1895－1897年间①，法国和俄国已经部分地获得了酬报。德国也急于要分享一杯羹。早在1895年9月，它就考虑要租借胶州湾；在1897年春季，它将想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的意图通知了俄国、奥国和意大利。这原可凭靠在北京施加无法抗拒的外交压力而获得的。在翌年夏秋两季中，消息不断传来，说德国兵舰在福建、浙江和山东沿海一带勘测。机会终于来到了。在1897年11月1日，一个罗马天主教会的两名德国籍教士尼斯和休尔，在山东西南角上贾庄被杀害。命案是洗劫全村的强盗所干的。中国当局立即采取行动，臬台亲自赶到犯案地点进行审讯。

占领胶州

德国已经准备行动，不单是在上述的这些方面，而且在1891年就已经把它以后欲将所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德国籍教士置于它本国保护之下的意图，告知了法国驻北京的公使。德国驻北京的公使说过，“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教士负责，遇有同中国人发生纠纷时，我们将提出我们的要求，而且能够保证获得十足的赔偿。”在11月14日，即发生命案的消息获悉之后四天，一小队德国军队驱走了在胶州湾入口处的青岛港口的中国驻防军，攻下了炮台，占领了港口。德国要求中国给予一个海军基地已经很久了，于是德国报纸就立刻在指使之下大肆煽动，力请政府永久占领俄国早已一度占有后来又撤走的胶州湾。政府并无不愿的表示，于是在11月22日提出了下列要求：第一，树立御赐匾额，纪念被害的德国教士；第二，应给他们家属以赔款；第三，革去卸任山东巡抚、新任四川总督李秉衡的官职，永不叙用；第四，偿还青岛占领费用；第五，给予德国以在山东建造铁路

425

① 见本书第341、396页及以后各页。

和开采煤矿的独占权利；第六，以胶州军港让与德国。

1898年3月租借胶州湾

面对着德国的坚决态度[①]，中国在1月初就一点接着一点地让步了。最后步骤是在1898年3月6日采取的，那一天在北京签订了一项协定，中国答应了德国要求的最后一条。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将胶州湾入口处两岸土地，包括青岛[②]和一切岛屿以及湾内海面在内，租与德国，暂以九十九年为限。在距离胶州湾海岸五十公里的陆地上，准许德国军队自由通行，当地行政事宜应得德国当局的同意。中国保有主权，中国海关在五十公里地带内执行职务，准予保障。"嗣后如德国租期未满之前，自愿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德国所有在胶州费用，中国应许赔还，另将较此适宜之处让与德国；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应许永远不转租与他国。"中国许给德国在山东兴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让与权。再者，"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由，或用外国人民，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物料，中国应允先问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物料。"这样，倘若发生瓜分帝国的情况，德国就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而且它在欧洲的地位也增强了。

426

青岛的海关行政

按照赫德爵士和德国公使在1899年4月17日和1905年12月1日签订的两项协定，中国的海关行政机构设在青岛。按照这些协定，港口、船坞和工业区都划为保税区，一切货物都可

① 德国人的精神，可从1897年12月18日在汉堡举行的欢送海军上将普鲁士亲王亨利克带同增援的船舰、兵员和大炮前往中国的一次宴会上概见。德皇在他的致词中说："我自知发扬光大先辈们所传给我的东西乃是我的职责。……在那遥远地区的每一个人，须知德国大使已将绘有德国鹰徽的盾牌牢固地树立在中国土地之上，以便一劳永逸地给予一切请求保护的人以保护。……倘若有任何人竟想破坏我们的正当权利，或者损害我们，那就立刻起来用你们的铁拳去对付他。"

② 中国的胶州城，位于湾内陆地而在那五十公里的中立区内，仍归中国管辖；德国的港口和行政中心则在湾口的青岛。

免税运入。对于这个区域运往中国领土的进口货以及从这个区域装运出口的山东土货，均征中国关税。作为对这点的交换条件，青岛享有中国通商口岸的特权，并从海路运来的进口货的关税收入净额中提五分之一给德国的行政机关。

1898年3月俄国取得旅顺口和大连湾

俄国曾经保证对德国提出的要求予以支持。现在，它把注意力转到旅顺口，这是在它的公认势力范围以内的海岸上的一个不冻港。在德国突袭青岛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俄国兵舰就开到了旅顺口。俄国已经准备吞并这个港口，中国却无法抗拒，于是这个港口的命运就由两个协定决定下来，第一个协定于1898年3月27日在北京签订，第二个于同年5月7日在圣彼得堡签订。这些协定将旅顺口和大连湾，连同附近海面和岛屿，以及东至貔子窝、西至普兰店以南的那个半岛，租与俄国。这项租借将不损害中国主权；期限为二十五年，并有期满续租的规定。在租借地以北约六十哩的地方有一个中立地带，仍归中国管辖，但是禁止中国军队入内。违背了以前俄国对英国所作的保证，也违背了最惠国条款，旅顺口将辟为军港，并且除俄国和中国船只外，禁止一切船只驶入了。大连湾辟为商港，准许各国商船往来，但是这里的港口有一部分是专供俄国和中国的船只使用的。俄国得在中东铁路上建造一条联络这两个港口和哈尔滨的铁路线；但也承认中国有从山海关向东修筑铁路的权利。中立地带的开矿权和其它让与权除给俄国人外，不得让给别国人民。与这些有关的是，维特伯爵曾以五十万卢布的“礼物”馈送李鸿章，以二十五万卢布的“礼物”馈送张荫桓。按照协定，中国驻防军于3月27日撤出这两个港口，俄国军队就在次日加以占领。俄国这时已经处于可以支配华北和朝鲜的地位了。

427

法国密切注视这些活动。外交部长哈乐驼在2月间声明

1898年4月法国取得广州湾

说,法国无意仿效德国在中国攫取海军基地。然而,在4月11日,驻北京的法国公使却告诉他说,中国已经应允将广州湾连同附属地区,以九十九年为期,租与法国作为海军基地。4月22日,法国国旗就在广州湾升起了。租借条约却在1898年5月27日才送交总理衙门,并且在1900年1月5日中国才加以批准。应允给予法国的,是广洲湾连同海湾内外岛屿以及环绕海湾的大陆上的土地。这些土地均归法国一国治理和管辖。所有各国船只均按照中国通商口岸办法办理。中国还让与一项铁路修造权。因为海防非常靠近,广州湾除了充作避风港外,并无多大作用。租借的主要作用是使法国国旗进一步的插进中国领土。

1898年6月英国扩展香港区域

很久以来,香港的军事地位就成为英国当局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港口的北面边界有大部分贴近中国领土,因而英方急于取得殖民地界址的扩展,使该岛免于任何袭击的危险。作为对广州湾租让给法国的一个直接补偿,以前进行过的关于扩展界址的试验性质的谈判,现在又推动起来,并且在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取得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权,其范围是从深州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全部,连同两个海湾的海面及其邻近的其他海面和岛屿。九龙城的民事管辖权仍由中国官员行使,并规定建造一条通往广州的铁路。这样就在原有的二十九平方哩的面积上又加了三百七十六平方哩——计陆地二百八十六平方哩,岛屿九十平方哩——总数共达四百零五平方哩。按照原有计划,英国国旗将在1899年4月17日在这个新领地上升起。在15日,当地居民蜂拥而起,反抗他们家宅的被割让;英国军警将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了。在随后三天的冲突中,有一些伤亡。在5月16日,作为抗拒的惩罚,中

428

国的管辖权被逐出九龙城。把深州湾和大鹏湾海面包括进租让之内，对于中国海关巡艇的工作是一道严重的障碍，因为海关巡艇是不许进入这个海面以内的。

1898年7月威海卫租借给英国

在1898年3月25日，萨理斯伯勋爵通知窦纳乐爵士说，由于旅顺口租让给俄国而使北直隶湾的均势在实质上起了变化，所以有必要在日本人离开之后，按照租让旅顺口的同样条件，取得威海卫的租让权。日本政府勉强表示赞同；中国的大臣们面对着英国海军行动的危险，表示同意，因而在7月1日签订了一项条约，将威海卫海湾连同刘公岛和威海卫沿岸十哩宽的地段“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租与英国。在威海卫城内，中国官员仍得继续行使民事管辖权。在最后一期赔款于5月9日付清之后，日本军队从威海卫撤退，英国国旗就在5月24日升起。在承认了胶州湾割让给德国以后，萨理斯伯勋爵不想让德国有猜疑的理由。威海卫并未设防，它只被用作英国舰队可以毫无疑问地随时往来的一个港口。

领土不割让的声明

对中国的需索不仅是土地租让而已。在1897年3月15日，中国曾向法国提出一项“不割让的声明”①。法国曾经要求中国声明“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不论久暂，作停船趸煤之用”。总理衙门曾经否认有任何意愿，欲将海南岛割让与任何国家。当德国已经确定地获得胶州湾的租让权，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要求显然已届成熟的时候，英国公使曾经要求“明确保证中国嗣后决不将扬子江流域各省的任何地方，以租借、出典以及其他名义租与任何国家”。在1898年2月11日，总理衙门作出

429

① 第一次关于中国方面的不割让原则的应用，可见于1846年4月4日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按照该约第三款，中国应允英国“永不以舟山等岛割让于他国”。

了保证。在1898年4月，法国要求“中国保证，决不暂时或永久地，或以租借，或以其他任何名义，将中国与东京接邻诸省的全部或一部让与其他任何国家”。在4月10日，中国作了保证。于是日本要求对福建省作同样的保证；因而在4月26日，中国作出了不将福建省的任何部分割让与任何国家的保证。

关于海关和邮政的主持问题

有两项重大的业务是由赫德爵士以海关总税务司和邮政总办的名义主持的；对于这些业务现在也要求作出保证。为了打击俄国的野心，英国公使“鉴于英国对华贸易既已大大超过他国”，乃要求一项保证，声明“海关总税务司将来仍照以前办法，应由英人担任”。在1898年2月13日，中国作出所要求的保证，但加上了一句话：“将来如有一国贸易总额超过英国时，总税务司之任用，中国政府当自行决定，不限定任用英人。”法国要求中国任用一名法国人为邮政主持人。总理衙门指出邮政和海关均属一人管理，但是含糊地允诺说：将来由欧洲员司的协助而成立一个单独的邮政机构时，中国政府将“考虑法国政府所推荐的员司人选”①。

1898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的扩充

中国国势的衰微，也被利用作为在某几个约开口岸设立新的外国“租界”的可乘之机，前此在这些口岸已经有了名义上专属英国、而实际上对一切国家同样开放的英国租界。俄国在牛庄、德国在天津取得了这样的租界，日本则要求在厦门和福州的租界。在汉口，法国重新要求过去放弃了的租界；俄国、德国、日本和比利时都提出新的要求。上海公共租界的扩界运动，酝酿已将近二十年。尽管中国人反对，终于在1899年5月达成协

430

① 在1902年10月，这项诺言变得格外明确。中国邮务于1911年5月28日从海关分出，改隶邮传部。主管方面设置中国总办一人，法国会办一人，法国会办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都是实际上的主持人，但此后则正式成为中国总办的僚属。

议，将界址从一千五百亩左右扩展到五千五百八十四亩。法国租界也在1900年1月扩充到三百五十八亩。

1898年英国在中国

英国已经无法阻止德国对胶州海军基地的要求，而这个基地却造成了德国在山东省的优势地位。它又被迫撤销它对俄国要求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以及在满洲获得优势地位所持的积极反对意见。这两处地方都是深入侵略中国的基地。后来法国获得了广州湾的防御基地和前面所列举的其他利益，英国则占领了威海卫这个防御基地。大多数英国著作家觉得这对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屈辱的地位，因为它在1834至1856年间，曾经单枪匹马打开帝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它直到1894年都在西方国家共同议事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现在却显得完全丧失了对于事务动向的支配权。然而即在这种混乱中它还成功地拾到一些无足重轻的利益。除了威海卫和香港扩展之外，它也曾获得不割让扬子江流域的各项声明，以及海关的总税务司职位，尽管这些事情的实际价值可能都很小。窦纳乐爵士还进一步地取得中国"内河"对汽船航运的开放，以及广西南宁和湖南岳州等通商口岸的开放①。

1899年2月意大利要求割让三门湾 431

在对中国事务表示强烈兴趣的那六个强国中，有五国已经各自取得了一片瓜，只有美国未曾下手。现在意大利又出场了。1899年2月下旬，意大利宣称它打算派遣一支舰队前来中国海面，并且要求增设派驻中国领事的人数。在3月初，它要求割让

① 在开发中国资源方面，英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除去让与福公司（英商）的采矿权而外，窦纳乐爵士声称，到1898年11月底止，中国在铁路方面所许可的让与权如下：

英国……2800哩　俄国……1530哩

德国……720哩　比利时……650哩

法国……420哩　美国……300哩

这些数字倘若不是多少有些虚构的话，那就使人格外满意了。

浙江东海岸上一个深入的海口三门湾,作为海军基地。这个要求曾经获得英、德、法三国精神上的赞同。俄国的态度是暧昧的。日本则认为意大利所要求的地方,正位于中日协定所规定的不得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的地区的范围以内。一开始,意大利驻北京公使因为就这问题向中国大臣提出最后通牒,而遭到意政府的驳斥,并被召回国。军机处指示浙江巡抚,着对一切侵略行动进行抵抗,并咨请两江和浙闽总督对浙抚所需的兵员粮饷妥予接济。面对着这样的抵抗,意大利放弃了它的要求,在5月底发表声明说,它无意在中国推行侵占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种扩张商业的政策。爱国的中国人士大有洋洋得意之感。

中国情况之恶劣达于极点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拥有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曾经遭到过中国在1897年11月到1898年5月这六个月中所遭到的那样一连串的屈辱。我们不妨补上一句,也没有一个国家在行政上的那些公认弊病的改革方面,在具有很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所居住的一块极其富庶的土地上一切资源的组织方面,曾经表现出那样的无能。列强现正心满意足地期待着瓜分中国的日子逐渐逼近。可是中国还得陷入如此之深的一个屈辱阶段,以致列强会担心它的瓜分而设法予以防止。

3. 美国变为一个亚洲强国

1898年美国与菲律宾

美国在租让权角逐期间是置身事外的。在1898年,它忙于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在1899年又忙于对付菲律宾的叛乱。美432国同西班牙的外交关系是在1898年4月20日断绝的,四天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从21日起即进入战争状态。在5月1日,杜威海军司令率领一小队军舰,出现于马尼拉海湾,兵不血刃地摧毁或俘获了西班牙舰队的每一艘船只。

1844年—1898年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地位

虽说远东的形势并不成为战争爆发的原因，可是，在斗争的进行和解决上却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和国际中立法很足以阐明当时美国事务在东方的发展。在1844和1858年之间，美国对远东的商务曾经迅速地增长。从六十年代起直到1895年，它逐渐衰落，有几家年代悠久和声誉卓著的美国公司宣告破产。在1860—1987年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从贸易总数的3%降低到不及2%；同日本的贸易从一无所有而上升到2%。在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中，美国在远东的兴趣是宗教的和政治的，还不是商业的。虽说如此，到了本世纪末，中国的瓜分已在意料中的时候，美国制造商在世界市场上的利害关系已渐渐使美国政府有理由对于远东重新发生兴趣了。就大致的轮廓来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并没有改变。1844年的望厦条约大抵以取得一种在外交上与香港等同的收获为目标，同样地，这时在1898—1899年间，美国也有必要取得一种与租让权、势力范围以及德、俄、英、法和日本等国同中国所订立的不割让协议之类的东西相对等的事物。

美国的政策

在1897—1898年间杜威海军司令所遇到的问题 433

在1897年10月，杜威海军司令奉命担任美国远东舰队指挥官；次年2月，在哈瓦那港口里的美国战斗舰“缅因”号沉没之后，他几乎立即接到指示，着即准备攻击西班牙在马尼拉的舰队，并对菲律宾采取攻势。在战事爆发的时候，美国因为在远东没有海军基地，舰队就停泊在香港。杜威取得必要的给养，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英国官员在得知美西处于战争态度时，受到中立法的约束，不得不要求美国舰队驶离它的停泊地点。4月25日是规定舰队离境的日期。在这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杜威就赢得了马尼拉湾的大捷。

这次战役在对西班牙战争中是偶发的事件，在当初并没有

1898年5月1日马尼拉湾之役

把它当作并吞那些岛屿的一个步骤，这从后来的长期停顿状况可以看出来。几乎有三个半月的时间都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去攻夺那个城市本身。在这期间，美国当局和菲律宾叛军之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因为这些叛军企图在整个群岛上推翻西班牙的权力而建立独立国家。许多人都认为美国人的到来是托天之佑。杜威以及一些美国领事馆人员，虽然小心地避免对叛军作出诺言，以防日后使他们的政府受窘，可是显然并没有想到，或者很少想到，美国政府有决定并吞那些岛屿的可能；因此，他们就同菲律宾人的领袖埃密利奥·阿奎那多进行合作，借以削弱西班牙人在那些岛屿上的势力。这位领袖，以及他属下的一些叛军首领，曾经被西班牙收买，在1897年退出了那些岛屿；他现在却很容易地被说服重返故土以进行他的反西班牙活动。由于杜威的鼓励，阿奎那多遂在马尼拉城外对西班牙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甚至在1898年夏季已经发展到了组织临时政府和求取外国承认的地步。在西班牙舰队被消灭和8月13日马尼拉城陷落之间的那段时期内，他是能这样做的。杜威海军司令在强迫该城投降以前，一直等待着足以警卫该城和完成对菲律宾群岛的征服工作的军队的到达。

美国同菲律宾叛军的关系

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利益

德、法、英等国对于这次战争的参与者的态度是很有意义的。德国攫取胶州，远不能使它满足，它一心还想扩张它在太平洋上的地盘。在萨摩阿岛上，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曾经竞争了好多年。没有什么疑问，欧洲六个主要国家的驻华盛顿代表为图防止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进攻，于4月6日向麦金莱总统提出的正式和平呼吁，是由德国倡议的。也有证据证明，在战事发生以前，或在战争过程中，德国政府正在商谈从西班牙方面购买菲律宾群岛、加罗林群岛、拉德伦群岛和帛琉群岛事宜；无论

434

如何，这最后三处群岛，除关岛外，在 1899 年 2 月 12 日，即美国参议院批准巴黎条约以后六天，就已经售出。因此，在战争期间，德国政府和人民对待美国的态度所以不太使人满意，原是不足为奇的。在马尼拉湾战役之后不久，两艘德国军舰就奉德皇之命，在海军司令迪德里赫率领下驶到马尼拉。此后不久，组成德国亚洲舰队的七艘船舰中的六艘都停泊在马尼拉，还有一艘装载着一千二百名德国后备军的运输舰在那里停泊了一个月。在谣传马尼拉城被轰击的时候，德国船舰曾供应这被围城池的给养并且收容西班牙的难民。德国官员受到岸上的西班牙官员的欢宴招待。8 月 6 日，德国驻伦敦大使向英国首相建议由各大国将菲律宾中立化。萨理斯伯勋爵不同意，也许还警告过美国。

英国和日本的态度

英国和日本的态度，相形之下，是完全正确的。英国海军司令奇切斯特在保持中立的同时，谨守着为德国海军司令所无视的杜威的封锁规定。当后者的态度危及德国和美国的和平关系的时候，英国海军司令曾将他从伦敦方面奉到的秘密训令的内容告诉了杜威。虽说这些内容一直没有透露过，但在 8 月 13 日进攻马尼拉的当口，海军司令奇切斯特曾将英国皇家海军的“不朽”号军舰调放在德国军舰和美国军舰之间，这个事实连同其他的证据一起看来，却显示出英国政府的命令似乎就是，万一德国人和美国人在马尼拉湾发生战事，英国舰队应当同美国人合作。在马尼拉湾指挥一艘日本军舰的斋藤男爵，也维持了一种友善地对待美国人的中立态度。在马尼拉陷落后，一艘英国军舰向美国旗舰鸣炮致贺，而一艘德国军舰则将西班牙的菲律宾前任总督载往香港。攻占马尼拉城的消息首先就是从这艘军舰上向全世界发布出去的。

435

美国并吞夏威夷

在这期间,7 月 3 日在古巴圣地亚哥的西班牙舰队被美国海军消灭,这就促使西班牙委托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卡姆崩去探询美国的议和条件。而且,在 7 月 8 日,麦金莱总统对于国会两院赞成美国兼并夏威夷各岛的联合决议案,已经表示同意。从商业上说,这些岛屿具有双重价值,既可作为从美国前往日本和中国的船只的中途停泊所,也可作为美国人民食糖的来源地。从战略上说,它们既被认作是保卫太平洋沿岸所必需的地方,又可作为驶向菲律宾的船舰的中途加煤站。把西班牙人逐出菲律宾和吞并夏威夷这两件事在相互的影响上,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美国的和平条件

在对 7 月 30 日卡姆崩探询的答复中,麦金莱总统要求的条件是:(1) 撤出古巴并由西班牙放弃对该岛的主权;(2) 割让波多黎各以及其它包括少数小岛在内的西印度方面的西班牙领地,和拉德伦群岛中的一处岛屿给美国;(3) 美国"在为决定菲律宾的控制、处理和政府而缔订和约以前有据守马尼拉城市、海湾和港口"的权利。在 8 月 12 日签订的议定书中,双方同意各派议和代表于 10 月 1 日在巴黎举行会议,谈判最后和约。

中国在解决菲律宾问题中的重要性

远东的形势,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形势,对于美国政府最后处理菲律宾群岛的决定,不能没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机会出现了,既不必参加对中华帝国的瓜分,也不必对菲律宾人民作出不公正的行为,就可以对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地位,取得部分的均势。

436

菲律宾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

美国总统迟迟没有决定菲律宾的处理方法;这是由于想要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情报,以便实现和平与公正。当议和代表在巴黎会谈的时候,菲律宾问题有五种可能解决的办法:(1) 将群岛归还西班牙;(2) 允许将群岛转让与第三国;(3) 建立菲律宾人的统治;(4) 确立美国人的统治;(5) 将各岛

分配与几个国家治理。在9月16日，总统训令议和代表要求“让与吕宋岛的全部权利和主权，以及在所有未割让岛屿中和西班牙人同等地使用港口和贸易的权利”。他否认对这些岛屿“原来有过任何全部取得、甚至部分取得的意思”，但是接下去就提到远东的整个局势，并首次在美国公文中提出“门户开放”原则①。他说，“使用一切合法手段以扩大美国的贸易是正当的行为；但是我们在东方并不追求非大家所共有的利益。我们一面只为自己要求‘门户开放’，一面也准备以‘门户开放’给予别人。商务上的机会，是自然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同这种新的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它与其说依赖于大块领土的占有，还不如说依赖于适当的商业基础和广泛而平等的特权。”从这些指示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总统心目中，菲律宾和中国问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麦金莱总统决定并吞菲律宾群岛

从议和代表奉令要求割让吕宋岛时起不到六个星期，他们又接到国务卿海约翰的电报，要求整个群岛的割让。美国政府所以采取断然行动，显然取决于远东方面和萨摩阿岛方面的局势的报道②。越来越明显，这些群岛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性。显然，对于菲律宾人本身说来，无论是将群岛交还他们许多年来所反对的西班牙人去统治，或者是让他们转归另一个

437

① 奥斯丁·张伯伦先生在5月13日伯明翰的演说中，曾经用过这个词句。这篇演说有一部分是同美国大使海约翰谈话的结果，海约翰在1897年春季到1898年9月期间驻在英国。

② “据报，俄国很想在群岛中至少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法国在华南的属地既然和菲律宾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似乎绝不会白白放过这样另一个机会而不加利用。日本深以为虑的是它在另一次岛屿的瓜分中，是否会不象旅顺口的情形一样，被挤出台湾，所以它很希望将菲律宾群岛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虽则它并非不愿意和美国取得一项谅解，俾使日本可以分得一杯羹。英国对于欧洲势力在香港、新加坡和它的南太平洋各属地附近日趋增长的形势，颇为惴惴不安。绝大部分的议论都是从军事和政治的立场出发而反对美国仅保留一个海军基地或仅保留吕宋岛一处的。完全放弃或仅占有群岛的一部分，势将在亚洲助长战争，而不是促进和平”。见丹涅特前引书，第623页(中译本，第526—527页)。

欧洲国家或是一个亚洲国家去治理,这都是不公平的。群岛上的各族人民,由于有种族上、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分歧,并没有掌管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准备。为了这个群岛的本身,为了维持太平洋和远东的和平,以及为了美国本身的利益,美国政府决定保持这些群岛。这项决定是在 11 月 21 日宣布的。

1898 年 12 月 10 日的巴黎条约

两国议定,在签订条约后的十年内,美国和西班牙的船只及货物应在平等条件下进入群岛的各口岸。美国还应允偿付西班牙美金二千万元,以免接受西班牙在古巴和菲律宾的债务并作为西班牙在群岛上所建的具有永久价值的工程的补偿。这并不是购买菲律宾群岛的价款,因为群岛是由征服而加以占有的。经过多次的抗议,西班牙议和代表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于是巴黎条约在 1898 年 12 月 10 日签定。美国参议院经过大量辩论之后,于次年 2 月 6 日批准了条约。四天以后,美国总统签署了批准书。西班牙女王摄政在 3 月 17 日签署了条约,批准书是在 4 月 11 日在华盛顿互换的。

吞并菲律宾群岛的重要性

随着群岛的吞并,就发生了在阿奎那多领导下的叛变。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绝没有使群岛的各异族人民准备好独立的条件,而且那个时期的远东国际局势,也不会容许他们在国内最好的情况下保持住独立。经过两年的挣扎,叛乱终于在 1901 年 2 月由于阿奎那多的被俘而结束。菲律宾群岛的吞并,同远东问题的关系,比同古巴纠纷的关系还要更为密切。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保护亚洲使免于欧洲人的侵略,乃是美西战争中决定菲律宾地位的根本所在。从此以后,美国列入了世界强国之中,而对于研究东方历史的人更重要的是,它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了一个亚洲的强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以外,很少有人懂得这些情形,可是这并不减少其重要意义。

第二十一章　防止中国的瓜分

1. 门户开放政策

军事国家所追求的瓜分中国政策，不能不引起英国、美国和日本在程度上仅次于在中国本国所引起的反对。就国内说，中国上自朝廷，下自义和团，都如痴如狂地力图以改革内政和驱逐外国人的办法来保全它自己。就国外说，保全这个国家的努力是用宣布一种所谓门户开放的政策来进行的，这个政策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新的政策，而其实可以溯源于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并且可以在中国人、英国人以及美国人自从最初在远东诸海的商人当中出现以来所遵循的政策上，找到它的根源。

从上到下的中外保全中国的努力

美国政府在占领菲律宾群岛之后，对中国局势的明显关切的第一个重要证据，是由国务卿海约翰在 1899 年 9 月 6 日提供出来的。在这一天，他行文知照美国驻英、德、俄等国的大使；于 11 月 13 和 17 日分别知照驻日本和意大利两国大使；又在 11 月 21 日知照驻法国大使，训令他们向各该驻在国政府取得一项"正式保证，允于各自的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内：

海约翰国务卿致列强的照会

"1. 决不干犯今后在中国可能取得的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

"2. 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税则办理。

"3. 决不另给本国臣民以特惠的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的利益。"

将海约翰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作一分析，就可以清楚看出，

海约翰政策的起源

440

门户开放主义无异是要给予中国的利益和外国的利益以同样的保护，那个政策实际上就是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重申，而这个原则却构成十九和二十世纪美国远东政策的基调。

美国的要求最惠国待遇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义律大佐在他的1841年1月20日的声明中，曾经遵照巴麦尊勋爵的训令，指出他所设想的英国对华政策绝不以专为英国船只和商人寻求特别的或排他性的权益为目的。这个时候所作的这项声明在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兴趣在第一次中英战争过程中是非常浓厚的。只有驻广州领事士那和前总统约翰·昆赛·亚当斯之类的少数人认识到了利害攸关的原则就是外国同中国在进行国际交往上的平等；而其他大多数人却认真相信英国正在中国海洋上追求一种完全自私的政策。指挥美国东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加尼派往远东去注视局势的发展。他在致耆英的公函中要求将美国公民“置于与最惠国商人同等的地位”。对于这点耆英表示衷心赞同。这次文书往来是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六个星期进行的。最惠国条款的第一次正式的出现，则是在1843年10月8日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第八款中。不过，在9月20日，美国驻广州领事人员已报告国务卿说：他的本国人民的特权同英国人是一样的。中国官员和英国人同样赞成外国人之间的通商权益一律平等，这一点，从上文所提到的第八款的中文本译文中可以清楚看出，其中略谓，新开各口，“恩准各外国商人”一体前往贸易，并且对于这点“英国毫无靳惜”。

441

在美国政府同远东的全部关系，无论是同中国、日本或朝鲜的关系中，它在十九世纪的目标是开放通商的门户，并务使门户保持开放。1899年各国对国务卿海约翰照会的复文的口气，再

一次表明美国人所久已体会到的那种情形，即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中还必须将日本加进去——所采取的政策和作为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的门户开放的保卫者的政策是全然不同的。既对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政策久已有深刻的了解，所以遇有可能就帮同加强远东国家的力量使它们能保卫自己的门户，从很早以来就成了美国政策的目标。在执行这个计划时，美国政府随时奉行各种不同的办法。蒲安臣实行了一种同各国在中国合作的政策。但是，在克利夫兰第二次执政时代以及麦金莱总统时代，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合作却完全成为过去了。美国已陷于孤立——这一事实很能说明菲律宾群岛的占领以及1899年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正式宣布。

各国在远东的地位

在欧洲，英国并没有盟国，而且南非的波尔战争已成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在中日战争结束时已受到干涉。它固然取得了台湾，但是在亚洲大陆本身却力不足以同欧洲国家角逐。英国控制通往远东的海上通商路线已有半个多世纪。可是在德国占有胶州、日本吞并台湾和俄国据有辽东半岛之后，它的地位已大为削弱。况且，横贯大西伯利亚铁路的筑成，还给了俄国一条通往东方的军事和商业路线，而完全不依附于英国所控制的路线。这些事实很足以说明英国政府对于美国的占有菲律宾和重申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何以采取友好态度。日本政府也并不见得比英国不殷勤：因为倘若一个西方国家占有了菲律宾群岛，作为新取得的台湾的邻居来说，麻烦决不会比美国少，而且在那时候，日本对于门户开放原则还并不反对。 442

美国对东方的决策

按照东方的局势，美国政府在政策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保持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同所有的国家相角逐而且有丧失所有在中国的势力的危险；或者是回到同欧洲列强

至少保持部分合作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它总能对上述国家的政策发生一点抑制作用。在国务卿海约翰的精明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采取了后一种政策，然而，对门户开放主义的宣布主要负责的，并不是国务卿海约翰，而是海约翰的朋友兼顾问、后来出任驻华公使的柔克义先生。柔克义在1899年8月28日呈国务卿的一件备忘录中所作的具体建议，都列进了9月6日海约翰先生的同文照会中。

列强对海约翰照会的态度

列强对于海约翰的照会立即加以注意。俄国对于关税问题应由中国本身决定一节，闪烁其辞地作出保留，但是否认有为其本国臣民要求任何排斥其他外国人的特权的意图；然而它没有提到任何势力范围；除了它所租借的土地以外也并未作出保证，对于航行税或铁路优惠运费也没有提及。德国声称，它不但自始就主张，而且事实上在它的中国租借地内也一直充分地实行着贸易、航运和商业方面的各国绝对平等的待遇。它还进而声称，德国的东方政策事实上就是门户开放政策。法国声明它希望各国公民和臣民在中国全境内一律待遇平等，特别是在关税、航行税以及铁路运输费等方面。英国政府衷心赞同概述的政策，但是萨理斯伯勋爵将英国新近取得的九龙方面拓展的土地，保留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范围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有放弃在它们利益范围内为它们人民主张开发和发展资源的排他性特权的任何意思。日本和意大利却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

门户开放与“势力范围”

443

国务卿海约翰是否认为中国的瓜分能永远防止住，固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确想保卫美国的条约权利和商务利益，虽则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他在这一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存在，已经在照会的文字中加以正式承认，虽则这个名词是放在引号之内的；而海约翰并没有

提到维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一节。这个原则是在1900年7月3日宣布的。至于中国对门户开放的意愿如何或是对"势力范围"的态度如何,它本身并没有被询问过。在1900年义和团兴起以后,当美国海军希望在中国海面上有一个加煤站的时候,华盛顿政府曾经以租借福建三沙湾上的这样一个加煤站的打算征询东京方面的意见——因为这个地方是在日本所主张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当日本对这个海湾的租借拒不同意时,美国政府也就没有将问题向中国提出①。因此非常明显,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有助于防止中华帝国的瓜分,这对美国和中国同样有利的,但它对于欧洲各国和日本在中国推演而成的"势力范围"政策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②。

2. 百日维新——慈禧的第三次政策

日益增长的行政改革要求

中国所受的耻辱对于中国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凡是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能看出西方各国和日本在管理国家大事和为人民谋求幸福方面取得的成就的人,都渴望看到他们本国也能达到同样的进步水平。可是这种人最多不过几千,而且,在那个时期,他们在舆论上发生的作用也很小。但是,其他数以万计的仅能以他们对中国情况的知识来判断中国事情的人,也由于帝国的种种灾难而得到了启发。在力主维新的那一种人中,甚至还发现有一些官场人士,就这种人的利益来说,任何行政改革计划,对于他们都一定是很不利的。

444

改革的开端

最早的公开宣言是在1894和1895年发表的。第一次,在

① 参阅维廉士:《中国的今昔》(第四版),第491页。

② 关于海约翰－柔克义政策的有趣分析,参阅克莱德:《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载《历史展望》,第22卷、第5期,第210—214页,1931年5月号。

对日战争前夕，是由孙中山起稿并由许多广东士绅签名的一件上皇帝书。第二次，是在战争刚刚结束后，也是一件上皇帝书，是由康有为起稿并由来自许多省份的一千多名举人①签名，其中有维新的建议以及对于批准马关条约的抗议。两次上书都没有发生直接的效果。各处都成立了宣传维新的团体。然而，一般地说，任何官方的维新倾向仍旧是一个诚意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作为一个急进改革中心的广州

维新的愿望在沿海一带和扬子江流域要比在内地强烈。在内地，散布于帝国全境的传教士所放进的酵母发生了一些作用。然而，在通商路线上的各城市中，从北京、上海和香港的外国学堂以及在后两个地方刊行的华文报纸所发生的影响，却产生了更加有力的效果。没有一个省份象广东那样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个事业。它的年轻一代感到英国在香港施政的直接影响。在广东有很多去加利福尼亚和澳洲的移民，而移民中的最有知识的一部分又前往新加坡和南洋群岛各地。从这些有现代思潮的地方带回来了民主观念，而那些观念，在腐朽老大的中华帝国的令人沮丧的空气之中，必然要成为革命性的。从曾经产生过太平天国领袖的广东省，出现了两位维新的战士，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和立宪党的领袖康有为。

孙中山

孙逸仙（中山）②出生于1867年③。他的父亲是一位基督教徒，他是在外国人、主要是在传教士的帮助之下受教育的。他在1892年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在澳门开始行医。就在那里他同广

445

① 是第二级，也是较高的省级学位。四级学位可以用学士（秀才）、硕士（举人）、博士（进士）和院士（翰林）来代表。

② 他的正名是孙文。逸仙——按广东音读的译名——是他自己在成年后照中国习惯所起的别号，也是他的朋友所熟悉的名字。

③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原书有误。——编者

东的革命党人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从这时起，他就积极参加反满的密谋。在1895年10月，他从香港布置了一次对广州的武装袭击，以配合汕头方面的革命运动，但是当局已有戒备，因而失败。先后到澳门和香港等处避难而被拒绝之后，他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在他所到的地方，他都为驱逐满州人和建立共和国而努力。他又从美国前往英国。在1896年10月，他在伦敦被中国使馆绑去，幽禁了十天，后来由于孙中山从前的医学教师康德黎博士(爵士)运动萨理斯伯勋爵出面干涉，才获得释放。从1895到1912年这十七年中，他经常受到死于非命的威胁。然而，死亡和酷刑的恐怖决不能使他改变宗旨。

康有为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首创者。他也是广东人，出生于1858年。虽然他只学过中国的课程，却能将日本所采用的措施的成功和中国所有的政治家的昏瞶糊涂作一对比。他虽然鼓吹君主立宪，但并没有推翻清室的思想。他的目的是要使皇上支持维新，并向文武百官指出彻底改组政府机构的明智和必要。

他的著作最著名的有三本：《大同书》、《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考》；由于这些著作，康有为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在帝国各地取得了"当代圣人"的称号。他并没有官职，但是他的名字却是被那些既憎恶革命方法而又渴望用维新将中国从看上去不可避免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知识分子常常提到的。

446

在帝国仅仅受到中日战争的屈辱的时候，这些运动就已经有了一些进展。1897到1898年的外国侵略行动，大大加深了耻辱感，并且促使帝国的知识分子更充分认识到维新的迫切需要。很可以这样说，在1898年春季，所有年轻的官员和士绅都是维新家。甚至满洲贵族中的年轻人也受到了感染。

向光绪举荐康有为

早在1898年6月，康有为就为皇上个人所注意。深居宫禁的光绪，已经很想研究其他各国的所作所为。在1894年，他的注意力就已被西太后六十寿辰时一万零九百名女基督徒作为寿礼进呈的一部装璜富丽的《新约》所吸引。从那时起，他就孜孜不倦地尽可能吸取西方的宗教和习俗方面的知识。虽然当时他已经将近三十岁，可是智力并不成熟，认识也很肤浅；但是在1898年春季，他已经感觉到要保全这个国家，就非变更不可。在他看来，立宪维新家无异是光明使者，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阅读康有为当时进呈的所著《俄大彼得变政考》和《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效果马上发生。6月13日即降谕，派康有为一个低级官位并予以传见的殊荣。

维新和慈禧

6月11日，皇上颁下他的第一道维新诏，这是一般地昭示维新的必要以及预示创办京师大学堂的一件诏书。6月12日的第二道诏书，督饬宗室王公出国游历并研究外国制度。这两道诏书使满洲人大为惊诧。但是因为都已经向1889年已经归政但仍掌握实权的慈禧奏明，所以反对无效。不过这位伟大的太后的灵敏嗅觉已经嗅到危险，于是她立刻采取了将于一百天之后结束维新运动的种种步骤。6月13日，有几道上谕出现了，都带有在西太后胁制之下颁发的迹象。有一道上谕是着所447有大员，凡除授官职，均应向皇上和西太后两处陛见谢恩；另一道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凭借第一道上谕，慈禧在尚未重新垂帘听政之时就已经将她的手指放在政府的脉搏上了；凭借第二道上谕，她使她的密友和忠仆掌握了中国唯一有组织的军队。

《劝学篇》

在各省维新运动之中，最有力的附和者是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这时候他写了一部叫作《劝学篇》的书，这本书在全国行销极广，广泛为人所阅读。它的那种工稳的古典文体，对所

有阅读这本书的知识分子都很有号召力，并且对皇帝以下所有读者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序言中，作者列举了五"知"：知耻，耻不如日本等国的耻；知惧，惧蹈印度、安南、缅甸、朝鲜、埃及、波兰等国的复辙；知变，如不变更我们的习俗，就不能改变我们的办法；知要，特别要知西方各国施政的方法；知本，不可因多知而忘记圣贤。凡是这种"知"都符合于"中庸之道"。张氏谆谆劝人保存宗教和孔子的教训：并且说明人人都必须效忠清朝。他曾经证明西方各国一般也都遵守三项道义责任——"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这证明它们也承认等级的差别；因此研究它们的制度是有益的。日本比较近，学生应该到那个国家去留学。各地都应设立学校；将用在慈善机关、迎神赛会、演戏和宗祠的费用，改充学校必需的经费。书籍应该迻译，报纸应该多办。方法应该改良，铁路应该兴筑，军队应该改组和维持其实力，各种宗教都应允许并存。

维新诏令

维新运动现在显然发轫了，完全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的皇上，颁发诏令的疾速，简直使人目迷五色。兹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法诏书表列如下：

6月20日——总理衙门奉旨筹议文艺、科学和农业奖励办法具奏。

448

6月20日——谕令赶筑京汉铁路。

6月23日——废止以八股文作为考试主要科目，这是举世公认能戕害中国人思想的。

6月27日——着王公大臣对满洲各旗采用西洋武器和操法一事妥议具奏。

7月4日——着各省筹设农业学堂。

7月5日——施行专利法和版权法。

7月6日——谕内阁对以智力测验代替武试中现行骑射击剑考试一事妥议具奏。

7月7日——着奖励发明著作。

7月10日——着各省府厅州县成立各级学堂，即以民间祠庙改充。

7月14日——着地方官鼓励贸易，奖掖商民。

7月29日——全国各城市设置管理学校机构。

7月29日——预示改革司法。

8月9日——鼓励报馆主笔撰著政论以广官吏见闻。

8月9日——京师大学堂成立。

8月10日——设矿务铁路总局。

8月10日——着荣禄、刘坤一对筹办海军学堂，添置练船一事妥议具奏。

8月10日
8月29日 } 勗勉内外大臣匡助皇帝变法维新。

8月16日——设译书局。

8月19日——改革选授翰林办法。

8月21日——设立农工商总局。

8月21日——在外洋为侨居外洋的中国子弟设置学堂，由各使馆督办。

8月24日——谕知10月29日①皇帝和太后乘火车前往天津阅兵。

8月28日——着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两地设立商务局，讲求商务。

8月30日——裁汰北京不重要的六个闲曹及各省许多闲曹。

9月5日——准张荫桓奏，开始筹办以征兵为基础的西法练军。

9月8日——降旨颁发工赈，奖励机器，开办医学堂。

9月10日——裁汰更多的闲散官职。

9月11日——筹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9月12日——改定武科考试办法。

9月13日——准许所有官民封章奏事。

449

9月14日——凡满洲不愿或不能充任文武官职人员，准经商贸易。

9月14日——卫所荒地准由人民领种。

9月16日——诏准制定岁出岁入预算逐年公布。

9月16日——晋授袁世凯侍郎衔，专办北洋练兵事宜。

① 据当时记载，为阴历9月5日，即10月19日。原文有误。——译者

倘若维新应该从顶端而不从基础上开始，那么在这张变法维新的清单上是找不到一点毛病的。每一条都击中一个明显的弊端，而且每一条都可以见诸实行。但是这个用上谕变法的整个结构就是一个将尖顶倒竖在地上的金字塔，而且显现出同中国所有传统的政府观念都截然分歧。这就是那位身体孱弱、心智衰竭的皇帝和他那位既缺乏行政经验而又不善驾驭人的心地单纯的赤诚顾问的功业。

倒置的金字塔

在8月底以前所颁发的上谕，获得了普遍赞同，但是，因成功而胆壮之后，这两位维新家又颁发了一系列的上谕，触及当时弊病的根源，并且引起许多本身利益直接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们积极的仇视。9月4日，为了压制应诏上书言事的一件奏折而违旨的事，许多礼部官员立被革职，遗缺由维新派中人递补。7日，李鸿章免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官职。保守派为他们的特权而惶惶不安，维新派对他们的政敌的可能行动也同样心怀戒惧，双方都看出交手的时候已经到了。皇帝的打鼻是要把荣禄正法，并借助袁世凯[①]和北洋军队的力量劫持西太后和逮捕保守派的领袖。

诏令的效果

李鸿章免职

获得维新派阴谋的警告之后，荣禄赶忙在9月20日从天津前往颐和园陛见西太后。当时慈禧拥护者中的权贵，包括军机大臣在内，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中决定了反对革命的办法，以当夜赶回天津的荣禄所派来的军队为后援。9月22日早晨，皇帝原定召见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侯爵。可是在规定时间以前，他奉西太后召见，从此就没有再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露面。很有

1898年9月22日光绪失败

450

① 关于袁世凯在慈禧的政变中所起的作用的详细情形，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42－144页；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传》，第12章；普特曼·维尔：《为中国的共和而斗争》，第2章。

一些时候人们怀疑他已被处死，关于他生病的谣言也经常在传播。显然皇帝生命的保全主要是由于担心外国人的反对和一时难以选定一位继位者。

慈禧再度摄政

在9月22日，被幽禁的皇帝向西太后呈递了一件低声下气的奏折，恳请她重新听政。慈禧于是降下恩准办理朝政的懿旨。汉族的老政治家们现在都立刻就范了。张之洞连忙收回他的鼓励维新的前言，并且电请慈禧用强硬手段对付维新派。可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却刚正不阿，竟为光绪说话，他的意见应该认作是保全皇帝生命的一个因素。

维新派的究处

西太后对于维新派是狠狠打击的，特别挑出广东省予以报复。9月23日，降下一道上谕，将康有为革职，并着即缉拿就地正法。另一道上谕是着即拿问张荫桓并抄没他的家产。张荫桓曾任中国驻外公使，只是由于各国公使为他提出了极强硬的抗议，这才保全了他的性命。他被发往新疆边境；1900年义和团起事时他奉命自尽。另一道上谕则着令拿问十六个维新分子，他们都是广州人。在这些人中，有些已经逃亡，有些已经革职，只有六个人被拿获到案，随即被判死罪处斩。

维新诏书的翻案

反维新的运动立刻进行了。9月26日降下一道概括一切

451

的上谕，将许多改革全部推翻：在北京已被视为闲曹而裁撤的各种衙门都恢复了原状，它们的官员也恢复原职、原薪；以前授予全国人民上书言事的权利一概撤销，这种特权又仅限于御史及高级官员享有了；以前命令改成学堂的祠庙，一律恢复了原状。在11月1日的另一些上谕，则将皇帝的其他一些改革一笔勾销。

董福祥及其禁军

这种混乱的政局已使人心惶惶，但是真正的危险却在于为了担心外国侵略而调到京师的那些专门滋事的军队，其中最为

滋事的就是董福祥所领的驻扎在南苑的甘军。9 月 30 日，这个部队的兵勇曾经袭击有英美使馆人员在内的一群人，翌日外国使节们就决定从他们各自的舰队中调一支海军陆战队来作为卫队。10 月 23 日，董福祥的兵勇在车站对一群工程师和英国使馆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使馆人员的危险是很显然的，于是各国公使联合提出了将董福祥的甘军从北京附近调走的要求。帝国大臣终于将甘军调到北京以东八十哩的祁州碑。

1898年维新失败的说明

除了皇位继承问题在今后的一年多之中还没有着手处理以外，反对维新的运动现在是已经完成了。就排外而论同维新派大概并无轩轾、但经验较丰的西太后，已经安如磐石，正在准备重新使用传统的政治手段，来防御外国的侵略，以保全国家。维新的激进领袖人物已被处决、发往边疆、充军、革职或迫令反省。广州派已经被打垮，帝国境内的一次虽则是保存清室、但很有希望的维新尝试已完全成为泡影了。

3. 义和团的起源

452

1898 年这一年是在大局动荡不宁的情况下结束的；但是在商业让与权方面却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些特权是英国使节部分地靠了海军示威和奉命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要求而获得的。内港行船章程随即颁布，根据这项章程，轮船运输开始发展成一项巨大的运输事业。所用的船只一般只是一些小汽艇，有时装载货物，有时拖带民船；但是来往于非约开口岸的大型汽船也适用这项章程。这时中国开始给予更多的口岸以约开口岸的地位，以便置于准国际性保证的保护之下，这些口岸包括秦皇岛、三都澳和南京。

1899年的商业发展

仇教的情绪到处可见，教士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使教会脱离政治的企图

1886年，他们曾请求教皇派一使节来代表他主持教会，企图使天主教教会与政治脱离。但是法国反对，要求继续行使它旧有的保护权。

1891年仇教暴动的复炽

1890年10月间，在山东济南府由于对土地问题的误会，产生了一次反美国教士的暴动。1891年初春，在福州的公共场所中张贴出很多反对教士的丑恶画片；地方当局对这件事曾加以处理。继此之后，重庆、汉口、镇江、扬州、芜湖、南京、武穴、无锡以及其他各地也发生了暴动。很多教会财产被毁；在武穴有两个英国人被杀害。暴民却极少受到惩处。

骚乱为外国干涉所制止

各国使馆认为暴动必须制止，教会必须保护，爰于1891年6月向总理衙门提出一份强硬的联合抗议。作为帝国真正内阁的这个机关当即请旨严令各省负责镇压骚乱并切实保护基督教会。但是它也认为传教士们对于历次的暴动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曾要求对教民行使管辖权，而这种管辖权是理应专属于中国当局的。在深以确保和平为念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尚且抱这种看法，那么由育婴堂问题引起极大不安的各省，自当更远甚于北京了。固然各省当局也有给予赔偿的情事，那都是直接命令和外界压力的结果。英、法、美、德等国军舰所采取的行动和经常的干涉给这种压力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453

1895年—1898年间发生的反对洋人、反对洋教的案件

中国人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既不能占日本的上风，于是就拿教士来出气了。1895年，美国驻北京使馆月月都有美国教士处境危险的报告向国内呈递。但是特别令人觉得忿怒的是，在和约签订之后，甚至直到1896年，这类暴动还在继续发生，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是1895年5月发生于四川成都的，另一次是同年8月1日发生于福建古城的；前一次是为反对法、英、美教士，后一次是为反对英、美教士而发生的。四川省的官

员们被控以纵非默许也是玩忽的罪名；而福建省的官员们则被控以不但默许而且企图阻挠事后调查的罪名。这类态度是和当时人民的情绪非常投合的。据称应对1869和1870年所张贴的仇教告白负责的那位名叫周汉的湖南绅士，又以一系列排外仇教的言论而在湖南省成为风头人物了。北京政府力图维护各省当局，但法、英、美三个关系国政府却坚不让步。为了成都暴动，四川总督降级，其他一些官员免职，六名肇事者斩首，其他十七人分别惩处。为了古城暴动，二十六名肇事者斩首，但没有一个官员受到处分。

在1898年的春夏两季，海南岛、沙市、宋埠和扬州各地都发生了排外运动。在湖北，当地教民有大批被屠杀的危险。在那一年春季，广西有一位法国教士被杀害；夏季叛乱爆发，用兵五年才平定下去。戊戌政变之后，10月25日广州发生了一次排外暴动。11月间在贵州有一位英国教士被杀害。在11、12月间，山东一再发生激烈的排外运动；在最后的一次运动中，有两位天主教传教士遇害，许多教产被毁。

454

1899年3月15日的上谕

1899年3月15日颁发了一道上谕，给予传教士以官员的身分。主教与督抚列为同等，得以平等地位拜会和致函督抚，较低级的天主教传教士则分别与较低级的中国官吏平行往来。主教应将其下属名单送交官方，传教士不得出庭干预讼案。这最后一项表示出中国力图纠正其所受真正损害的要求。鉴于这道上谕的颁布，足证西太后的意思是要顺应中国人民的传统，以缓进而稳健的改革来保护国家和朝代免于外侮。目的是要把基督教吸收到中国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之中，从而逐渐消除教士和教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地位，肃清中西关系上纠纷的根源。1898年维新派的方针是要按照西方的政府负责的观念而实行

权力集中化。这时，西太后的方针则是要恢复、甚至加重各省的自治和责任，以实行政府的分权。1899年1月3日，太后下了一道上谕，命各省将军、督抚一律加总理衙门大臣衔，以便今后对于辖区内所发生的普通交涉事件，特别是"民教之争"的事件，得自行处理，而一面仍照旧将经过情形呈报总理衙门。这样就为3月15日的上谕准备了条件。但是早在1898年7月14日，光绪曾下了一道上谕，令"各省最高当局"遇有教士来访，不得455"断然拒绝或谢绝不见"。光绪和慈禧都极想把在外国宗教工作人员和地方官吏之间正式交往的一向不合法的做法正常化，以便使宗教上的纠纷得以迎刃而解，从而使审判可以顺利进行，并使小问题不致演变为非由领事或外交人员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英国的保留

英国政府立即感到有损害英国利益的可能，于是训令英国公使通知中国大臣们说，凡涉及英国传教士时，除英国政府以外，不容其他任何政府的官吏过问。英国的这种保留是对3月15日上谕的第四款而发的，该款规定："各省如有重大教案发生，主教及当地教士应报请教皇委以保护宗教之权的国家所派公使或领事出面处理。"德国在1897年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那道上谕只提到罗马天主教教会，但是其他各教会自然也应享有同等特权。天主教教士立即要求享有这些特权，但基督教教士却一部分作为原则问题，一部分作为政策问题，一致予以拒绝，因为传教士一旦有了官员的身分，那么维持基督教徒之间的秩序和停止干预讼案的责任也就偕以俱来了。

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所抱的不同态度

湖南没有动乱，但是帝国其他各地却是天灾人祸一时并起。有一些地方的叛乱是反清的；另一些地方是排外的；还有一些地方则是特别针对传教士的。有些是起因于造反的精神；有些是起因于仇恨洋人；还有些是由于吃不饱的缘故。有两种恐惧把

各省的不稳

所有这些不安的情况贯穿起来，一种是对德国人在山东所作所为的恐惧，一种是对意大利在华中沿海一带所抱的目的的恐惧，两者都激起了对所有洋人的极端不信任。早在1898年11月5日和12月31日，西太后就下过几道上谕，责令各督抚对所辖地区作好防卫工作。为了帮助作好这项工作，地方当局、特别是华北各省和东三省当局，奉令改组旧有的民兵组织、即民团。1899年5月26日由于意大利和德国所采取的威胁态度，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和福建各省的督抚都奉令整军备战，浙江当局则更奉令采取积极步骤保卫三门湾。在6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奉上谕，对任何欧洲国家的军队在他的辖区内进行登陆，即作武装抵抗。准备抗战的工作继续了整整一年；这个已经燃起了叛乱和排外骚动的火焰的国家，被煽成为仇恨外国侵略的熊熊烈火。11月底，分令各省督抚，授以"便宜行事之权，得对各该辖区内所遭一切侵略行为进行武装抵抗，并于必要时，得不先行请示北京，即宣布战争状态"。

对外国侵略的恐惧

456

防卫措施

在这人心激动的时期，整个帝国为弥补匮竭的国库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激起了反清的狂澜。1899年5月，协办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刚毅奉派为钦差大臣前往江苏考查吏治。刚毅是地道的满洲人，在上年的反维新反动行动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他是极端排外的。他负有三重使命。表面上目的是考察。其次，为弥补帝国国库约二千万两的亏空，他必须把省税从现在的八千万两至少增到一亿两。最后，西太后为加强她的地位以应付维新派，非钱不可，所以刚毅必须弄到这笔钱。这位聚敛大臣——正如外国报纸对他所作的称呼——找到了这笔钱。在各省对国库的解缴上面，他无论如何总要从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和广东五省之中至少弄到每年五百万两的增加额。此外，既赋有全权，他

刚毅的使命

就不能不给西太后带回去几百万两银子，以作为捐献者的一种特别忠诚的表示；而且象这样一位不愧为满汉官场传统的代表457人物，肯定也会为自己的这番辛苦捞一笔谢仪。1898年1月应德国要求而革职的李秉衡现在为了同样的目的奉派为钦差大臣赴满洲和直隶一带。中国官吏每逢被上司敲去一笔，照例是把这笔款子转嫁到他们的捐献者身上，而归根到底还是由百姓负担。中国老百姓早已愤怒填膺，而税吏对他们的加重征课，就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了。

李秉衡的使命

山东的排外态度

全国人心浮动，山东的情形也是一样，而且在那年之中，山东的情况正是一般舆情的表征。1898年沂州发生了几次仇教的严重暴乱。已经有这样的警告提出来了：德国银团预定在1899年春季购买土地的打算势必要激起当地的动乱。更有进一步的警告说：日照方面一个由当地绅士领导的排外运动，已有一触即发之势。1899年2月底，反对教会的告白和闹事事件又重新出现了。正当这一团可燃物就要被点着的时候，3月22日有三名打算从日照到内地去的德国人遭到一百名村民攻击，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打退。

1899年德国制止排德的行动

德国当局为制止山东南部风行的排外情绪，采取了迅速行动，甚至在这次攻击发生之前，他们就已经派武装军队前往日照方面去巡察。为了三名工程师的被侵犯，一队一百二十五名德兵把暴民出动的两个村庄一并焚毁。4月间为了一名德国传教士被逮捕并遭虐待，另一队一百二十五名德兵开到深入内地十五哩的日照去实行惩罚。攻陷了该镇并加以占领。这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在占领该镇六个星期之后，德军在5月底带走五位绅士到青岛作为人质，以谋求这项案件的解决。德国的要求于是得到了解决。其他天主教堂的损失也得到了赔偿；但是基督

教会的要求一直到来年 8 月还未解决。

从 1899 年春季起，仇外的情绪在全国各省都很炽烈，而以山东为尤甚。1898 年底奉上谕改组的民团现在渐渐地得势了。458 在义和团或义和拳①的名义下，他们以中国人信奉洋教即是汉奸为理由，开始向中国基督徒袭击，把他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包括粮食在内，都抢掠而去。一有可能，基督教徒就被迫在庙宇里的祭坛前面烧香下跪。各地驻军都奉命非有巡抚的明确指示，不得向团民开枪。这道命令把以前分谕各县保护洋人、维持治安的命令不啻抵消无余了。

1899 年 12 月伯鲁克被谋杀

12 月 31 日，英格兰教会牧师伯鲁克在济南西南五十哩的毛家铺被一群强盗杀害。祸首经查明是一些大刀会分子，他们曾费了几天的工夫筹划一次排外变乱。帝国政府由西太后亲笔声明“良深悲痛”；并饬将凶犯拿获讯办。2 月 28 日，济南有七名罪犯由该省臬台当着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的面予以审判。两名判处死刑；三名被分别判为终身监禁、十年监禁和两年监禁；两名释放。赔款九千五百两作为筹备纪念事项之用，对于血债并未要求赔款。当地知县遭到奏参。

毓贤和义和团

“毓贤是罪魁祸首，除非先惩办此人，我们就不能坚持要求处罚那些事实上是奉命行事的低级官吏，”这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的论调。毓贤是极端排外仇教的一位宗室，深得西太后的宠幸，他在 1899 年 3 月奉派为山东巡抚。责令全体官员抵御外侮的那几道上谕，特别在毓贤的肩上加了一个务使德国人安分守己的重任，但是他的热心超越了他的本分。他对传教士和教 459

① 因此通称为“拳民”。在 1898 年拳民是反满的；而不久即被诱导成为排外的了。在它的旗帜上有四个字的题词作为标志——“扶清灭洋”；团众须经过各阶段的秘密传授和神秘的仪式。其最高一级的传道者，据说有鬼灵卫护，可以刀枪不入。

民的态度是恶名昭彰的。上海的中外记者一致指出：使治安无法恢复的，正是巡抚毓贤，正是他一个人。由于美国公使馆的抗议，在12月6日下了一道上谕将毓贤召回北京，派袁世凯代理巡抚。1月中旬毓贤到达北京，立蒙慈禧召见。不顾外国的抗议，他不久就奉派为山西巡抚。

1900年1月11日上谕鼓励了义和团

1月4日为杀害伯鲁克一案所颁的上谕用一种抚慰的语气。但是在11日接着又颁布了一道上谕，据法国代表的说法，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并且是“语意双关的”。这道上谕首先提到近来各省抢劫之事颇见增加，实系不肖之徒妄结帮会所致，继而命令对于这些帮会的性质和目的应加以区别。凡以抢劫滋事为务的非法帮会，自不容存在，至于守法忠诚的百姓或为自卫而联合操练，或联村自保，实不过尽百姓守望相助的天职。大小官员凡不能善加区别者，即为溺职。对于教士和教民应公平相待，善加保护；但保卫家园乃人民之天职，如此则太平可期，实所殷盼。从山东和直隶南部再度传来的报告说，根据一般的意见，这道上谕大大地鼓舞了义和团和大刀会，其成员因而日见增加。

各国使馆要求取缔义和团

1900年1月27日，与此直接有关的美、英、法、德、意各使馆向总理衙门提出内容相同的照会，提请对那道上谕中的模棱的措词加以注意，要求另颁一道上谕“指名取缔义和团和大刀会”，并且不妨“在谕旨中言明，凡属团、会分子，或藏匿不报者，都是违反中国法律的罪犯”。2月25日各国使馆接到通知说：已分谕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取缔这些团、会；3月1日，直隶总督遵旨发出一道布告。各国使馆曾两度要求把这道上谕在京报上公开发表。这项要求因违例而被拒绝。3月11日，这五位公使分请各该国政府在北直隶湾举行海军示威。

460

这个时刻被选定为对维新派重新实行镇压的时机。2月22

日，西太后传谕将分住各省的二十名维新分子一律逮捕。3月9日，以有亏职守、贪脏枉法、"丧尽天良"、"居心叵测"等罪名对五名主张维新的翰林判处严刑。这被认为是西太后及其谋臣朝士排外态度的不容置辩的证明。大部分由于刘坤一的痛切陈词，对维新派的镇压在4月间停止了。同月15日取缔义和团和大刀会的上谕在京报上公布，外国军舰各返原防。

1900年对于官吏的赏罚

不安情绪遍及各地。2月间得到消息说，在离腾越二百哩的蛮卡地方有两名英属缅甸边界调查委员会委员被土人杀害，另一名领事人员受伤。在山东，义和团除了攻击教士和教民之外，还破坏德国铁路工程。最可怕的一次是2月2日，当时有五名铁路工程师被来自高密的一帮武装匪徒从工地上赶走。在直隶，义和团运动不声不响地伸张到省境的北部，据传有八千名端王的军队加入义和团。5月初，义和团袭击距北京八十哩保定府附近各天主教教民的村庄，杀死教民约七十人。两天之后，他们又进攻距北京仅四十哩涞水县的基督教徒村庄。

帝国普遍不安

5月初，从北京来的一项消息，警告大众说，消灭中国境内的一切外国人和夺回外国租界的计划已经拟定；策划的主要首脑人物是慈禧太后、庆端二王、刚毅、赵舒翘和李秉衡；计划的执行迫在目前。上层的汉人知道这件事，并警告过他们的外国友人，但被一笑置之。各国使馆曾要求取缔义和团，并且早已被蒙骗过去了。

461
排外暴动的警告

第二十二章　中国与世界为敌

1. 暴风雨的爆发

各国使节的态度

对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的忧惧具有深刻印象的法国公使，邀请各国公使商讨大局。他们在 5 月 21 日发出一份联合照会，明白地要求对义和团进行逮捕、判刑和明谕禁止以资取缔。中国是否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并无确据，只是政府中的温和派请得几道措词极其堂皇的上谕来抚慰各国使馆。责令北京警备当局妥议制止义和团活动的最好方法具奏的那道上谕，原拟在 5 月 17 日秘密发出，但是到 5 月 21 日才告知各国使馆。接着在 5 月 24、29、30 各日又先后颁发几道上谕，限令立即采取行动，镇压义和团并保护教堂，其措词之严厉实无以复加。各国使馆又得到了一层保证。但是在此同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却以更快的步伐超过那些重提保证的上谕。5 月 20 日，义和团在北京以南六十哩的霸州烧毁了美国教会教徒的房屋，杀害了九名基督教徒。28 日有消息说：铁路遭袭击，在去保定的铁路线上的两座桥梁和两所车站被焚毁；在去天津的铁路线上、离北京仅有十哩的丰台[①]车站和所有机修房也都被焚。又说在北京与天津之间没有火车行驶了。

义和团的敌对行动

5 月 28 日铁路交通被阻

各使馆已经分别请派海军陆战队前往天津。5 月 28 日各

① 在丰台的铁路工程师被关在房子里。外交团并未采取措施；但是一名瑞士籍的旅馆老板沙穆和他的美籍妻子同其他五人启程赴京，5 月 30 日一行二十九人平安到达。

国公使会商决定调用使馆卫队；法国公使事实上在会议之前业已调派他的卫队了。美国政府对于联合行动一节颇有顾虑。其他各国则无保留地表示赞同。使馆卫队已在天津整装待发，于5月31日到达北京①。

使馆卫队奉令开往北京
463

告急调兵是有充分根据的。在保定东北二十哩的永清，英国传教士孙牧师和孟牧师二人请求在知县衙门避难被拒绝之后，先后在6月1日和2日被杀害。比、意等国籍的铁路工程师连同眷属一行四十一人在5月29日由水道前往天津。他们由中国官方派了一队兵勇护送，但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几位官员都借题离开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就遭到一群暴民袭击，护送的兵勇也参加了袭击，结果被打退了。于是他门就在风沙烈日之下，带着极少的一点粮食，徒步前进。有时边逃边战，有时在各村之间僻静的间隙匍匐前进，免被发现，他们在6月4日才到达天津。在这一行人之中，有九人失踪，二十三人受伤，九人平安无恙。整个直隶现在到处都闹义和团。他们在北京和天津已经大开山门，广收门徒，进行操练并举行神秘的仪式。

工程师逃出保定

各国使节现在对局势看得更加清楚了，因而异常惊慌。6月4日，八国政府同时接到报告说，公使有随时被围、铁路电报有一并被切断的危险。八国公使力请各该政府训令海军当局采取联合行动，前往援救。6月8日，各国公使要求觐见西太后和皇帝。他们也商请总理衙门准予增调使馆卫队。这两项请求都

各国使馆呼吁援助

① 计有：英兵七十九人、俄兵七十九人、法兵七十五人、美兵五十三人、意兵三十九人和日兵二十四人；此外，德兵五十一人和奥、匈兵三十二人于6月3日也相继到达；另加上十九名军官，总计武装人员四百五十一人。其中以二名军官和四十一名卫兵守卫北堂，以十七名军官和三百九十一名卫兵守卫使馆区。英、美、奥、意等国部队各有机枪一挺。俄兵带来的弹药只能供他们自己的大炮使用，他国大炮都无法使用，但是他们自己的大炮却又丢在天津了。

遭到断然拒绝。但是,第二天各公使还是调来了额外的卫队。铁路交通的割断已经迫在眉睫。最后几列火车是在9日从马家铺开出的,最后几份电报是在10日拍发的。各国海军上将已经464 接到通知,并且已经准备随时应变。在6月9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爵士——当时同其他几位海军上将一同驻扎在大沽口——接到窦纳乐爵士促请他立即向北京进军的急电以前,他们并未奉到任何一国国内当局的明确指示。在同一天,美国公使康格也拍给美国海军上将恳布夫一份大意相同的电报。那位英国海军上将在两小时之内就率领一支登陆部队离开了他的旗舰,于6月10日率同一支海军混合部队从天津出发。第二天,在离天津二十哩的杨村地方,同其他联队会合,使他的这支部队总数达到二千一百五十六人①。12日他到达去北京一半路程的廊坊。从这个地方起铁路无法修复,行军因而受阻。几天来同义和团发生了多次小冲突,义和团损失惨重,西摩尔所部则损失轻微。

义和团活跃于京郊

6月9日,西太后和皇帝从圆明园的颐和宫回到紫禁城。在那天以及第二天,义和团在北京四周格外活跃;焚毁了北京以西三哩的赛马场看台,殴打了一批骑马驰往那里去的使馆实习员,焚毁了英国使馆在西山的避暑山庄。在北京东南十三哩的通州,义和团焚毁了美国教士的住宅,屠杀了许多教徒。作为达于顶点的威胁,6月10日的上谕简派露骨排外的端王会同优柔寡断的庆王为总理衙门大臣。

现在是为外县的外国人寻找避难所的时候了,但是内地各处的传教士是没有避难地方的。6月8日,一个抢救队从通州

① 计有:英兵九百十五人,德兵五百四十人,俄兵三百十二人,法兵一百五十八人,美兵一百十二人,日兵五十四人,意兵四十人,奥兵二十五人。

接来了一批美国教会人员和本地教徒。在这同一天，决定将凡是还未到英、美使馆避难的旅京传教士，都集中在附近美国监理会会所中。6月9日，住在一哩半以外的海关和同文馆的教职员都被召集到海关税务司署。6月13日，一个抢救队从南堂——天主教的南教堂——接来了一批男、女修士。其余的天主教徒则集中在北堂，由四十三名法、意海军陆战队加以保护。在使馆区的周围布下防哨线，由使馆卫队把守。除了比国使馆以外，海关邮政总税务司署以及各国使馆都包括在这道防线之内。

外国人在北京及其附近集中

465

6月11日，日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为董福祥的甘军所杀害。两天之后，有一大批义和团由哈德门冲进内城。他们向北推进，杀人放火，到处抢掠。在三个警卫区以外的所有外国人的住宅全部遭到劫掠的破坏。在天主教东教堂的教民和牧师遭到了屠杀。南堂的房产全部被毁，但是由一支义勇队救出了四名牧师和二十五个中、法修女，后来又把大部分是妇孺的二千名劫余的中国教民救出。很多满、汉富人的店铺和住宅也都遭到洗劫和破坏①。

6月11日杉山彬遇害

天津也处于同样的险恶局势中。到了6月2日，纵火事件在各国租界内已经司空见惯。6月5日以后，通往北京的铁路交通已经断绝，17日津沽铁路天津段被拆毁。6月14日，义和团的武装力量在天津城里出现了。象在北京一样，当局对于他们的越轨行为并未加以制止；总督衙门事实上就是义和团的总部。官吏和绅士被迫屈膝，凡同情外国人或与外国人交往者都

6月14日义和团进入天津

① 破坏的规模很大。仅仅七处基督新教教会就损失了三十四所住房、十八座教堂、十二所男子小学、十一所女子小学、四所训练班、十一所药房和八所医院，这统统是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的公墓也被挖掘了，尸体被暴露，墓碑被打碎。

遭杀戮。该城和城郊的许多建筑物被焚毁，包括各教会的礼拜堂和1870年遭过同样命运的法国维多利亚圣母院在内。

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同驻大沽的各国海军当局曾经多次磋商，但是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6月15日，各国海军上将举行了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经议决必须采取步骤保全铁路，保护天津外侨并与西摩尔部队保持联系。三百名日兵立即调派到塘沽，另二百五十名法、俄兵调派到溯铁路线而上的军粮城。各海军上将①认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事态，而不是空想，在16日所举行的那次会议上，经决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6月17日上午二时以前交出大沽炮台。中国守军以攻为守，在最后通牒限满前一小时零一刻钟开火。他们受到了还击。拂晓时，进攻部队开始发动攻势，到了上午六点半时，最后一座炮台也被他们占领了。

6月16日各国海军上将的最后通牒

466

中国政府将攻占大沽炮台视为联军各国的宣战，因而立即展开敌对行动。此后，穿着制服的武装部队第一次公开向外国人攻击了。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攻占大沽炮台的行动是造成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理由呢？还只是一个借口呢？各国海军上将对于6月10日以后的政治情势了解得很有限，这是因为同北京的电报已经不通，但是他们却看到了一些军事调动。

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理由

① 美国海军上将恳布夫并未参预这些决议和行动。6月14日，他通知英国海军上将卜鲁斯说，他未奉授权向一个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采取任何战争行动。他以不能侵占中国政府的财产为理由，拒绝参加塘沽车站的占领。关于攻取大沽炮台一节，他简单地说："我未参加对炮台的进攻。'莫诺开西'号舰长威兹已经下令保护美国利益；一旦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他将认为那就是宣战，当即采取相应行动。""莫诺开西"号收容了大沽外侨，无巧不巧的是，它正是首先被中国炮弹击中的舰只。海军上将恳布夫的避不合作是得到麦金莱总统批准的，其理由是："我们既未同中国开战，敌意的示威反可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并加强义和团对救援部队的抵抗。"

聂军门的部队已经从天津往东移动。在炮台附近和通往炮台的一带也看到其他部队的移动，此外在沽河以及在河口布置水雷的兵勇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大沽可以看得见的具体行动。大沽方面的确证，再加上北京发生的种种情况，足证攻占炮台并不是中国方面开衅的真正原因，而只是排外派迫不及待地抓来作为一个确凿的论据，一面堵住他们政敌之口，一面推动政府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

467

6月12日进攻天津

海军上将西摩尔离开天津后，外国租界即由一支约二千四百人的军队加以防守，其中有6月14日到来的一千七百名俄国步兵。大沽炮台的攻占使局势急转直下。6月17日，天津城里和城背后向外国租界开炮，中国兵勇也开始向河对岸开枪，造成许多伤亡。一些漫无计划的进攻都被打退了。天津的外国军事当局决定，倘若援军不能很快到达，那就非退守大沽不可。亏了有几位勇敢的人，这种不幸情形才未发生；这几个人在20日把公文送到了从17日起已经断绝联络的塘沽。一旦从天津撤退，则北京外侨必致失去最后获得援救的机会，而上海及北方各口岸也必将陷入危险之中。

6月23日大沽救兵开到

一支由许多国籍士兵组成的增援联队在烈日暴晒、食粮缺乏和以含有尸毒的河水为饮料的情形下，一路苦战而来。经过十二哩的边跑边战，不惜以重大损失战胜了激烈抵抗之后，这支增援联队在6月23日晨进入天津。

6月16至26日海军上将西摩尔的退却

6月16日海军上将西摩尔同他的官佐决定修复从廊坊回到天津的铁路，并在那里组织一个水路进军。在杨村，大桥既被破坏，就在19日夺取了许多艘民船以供运送伤员、给养、大炮和军火之用。在这期间，由于攻占大沽炮台，6月18日殿后部队在廊坊遭到在天津以外公开采取敌对行动的第一批中国军队董

福祥部队的攻击。从那天起一直到23日止，这支军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就经常发动攻击了。在6月21日下午四时，有两队兵——一队是英国兵，另一队是德国兵——渡河后占据了距天津三哩的西沽兵工厂，在那里发现有大量粮食和约值三百万英镑的军火。6月23日，这座兵工厂在中国重兵坚攻之下被据守下来。两天之后，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这支国际部队得到了来468自天津的一支以俄兵为主的军队的支援。26日在把这所兵工厂及其储藏破坏之后，全体撤回天津。西摩尔部队中计有六十二人死亡，二百三十八人受伤。妇孺一齐从海道撤出天津，现在这支应援部队也被包围了。

6月8至20日北京陷于半包围状态

从6月8日到20日，集中在使馆区、北堂和监理会这三个地方的北京外侨陷于半包围的状态中。在整个这段期间，纵火和抢劫之事遍于全城。北堂已处于防御状态中，监理会由义勇队巡逻，使馆区已竖起障碍物以资防卫。各国公使力持妥协政策，他们还希望中国政府会开始了解它的责任，并且在那些焦灼不安的日子里还常常和一些中国大臣举行商谈。中国政府不论在制止义和团的越轨行动或威胁各国使馆方面都未采取任何公开行动。在6月17日大沽炮台被攻占的那一天，曾有一道上谕提到"民教相仇之事……以致种种为非"①，并且命令荣禄配置军队对使馆妥加保护。

6月19日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西太后和后党"希望光绪帝能重新亲政。当日下午，西太后召开军机会议，在会议上宣布说，对于大沽炮台的被攻占究应采取什么行动，须延至次日再作决定。于是，"端王、启秀和那桐呈给她各国公使发来的一份措词极尽侮辱之能事的公文，要求她立即退

① 录自上谕原文。——译者

位，废除皇储①，让光绪帝复政……'彼族焉敢干预予之权，'她高喊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②

469

6月19、20日中国的宣战

虽然各国使节不能使用电报线，但对中国人还是畅通无阻的。大概就是那篇社论的摘要由电报拍发到北京，然后被人用来拟出一份诡称是来自外交团的公文。西太后很久以来就避免使自己陷于一种无法自拔的地位，但是现在她却一言出口，使兵燹之灾一发而不可收拾了。第二天，即6月20日，她召六部九卿会议，但是经常主张尊重外国使节的荣禄却未出席。西太后作了一篇冗长而又激动的训示，痛诋洋人的无理，因为呈给她的那份公文是极尽侮辱之能事的。她号召复仇。只有满人立山和汉人袁昶、许景澄的言论是反对战争的。一道对所有洋人宣战的上谕于是奉命公布。

6月19日命令各国使节离开北京

在6月19日下午四时至五时之间，外交团的各成员都接到总理衙门的一份注明四点钟发出的一式公文，第一次将各国海军上将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通知他们，但是对于大沽炮台被占一节，却一字未提。各国公使和所有外国人一律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由北京撤到天津。已分令军队准备沿途护送。各国公使弄得张口结舌。他们从16日起就被严密地包围起来了，对于大沽或天津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拟就了一份照会，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表示惊异，指出有举行商谈的必要，以便解决行军的细节、护送的方式以及运输工具等问题，并且要求在6月20日上午九时到总理衙门会晤。当时人心惶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各国使节又恢复了镇定，如果曾经丧失过的话；并决定不撤

① 1900年1月24日上谕立瑞王的十四岁儿子溥儁为皇储；1901年1月被废黜。

② 6月20日《景善日记》，参阅濮兰德和白克浩司：《慈禧外传》，第178、179各页。景善是刚毅的姻亲。

出北京。

上午八点钟刚过，外交团就会齐了。直到九点钟——即约定会晤的时间——还未接到复文。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告诉他的同僚们说，他已经发出照会，要求单独访问，并声称他要按照他的原意去作。不顾一切反对，他就向总理衙门出发，仅由译员柯德和没有武装的中国人所组成的仪仗队随同前往。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他的一个骑马的中国随从冲回来报告男爵遇害的消息。柯德先生受伤逃往监理会。这次谋杀是一个旗人恩海所干的，他把他自己所干的事呈报上去，要求特别提升[①]。

6月20日暗杀克林德男爵

470

现在每个念头都是在防卫上打转，每个男女都决心继续防御到底。在监理会的外国人和中国人被接进来。北堂的教民和卫队则仍留守原处。下午四时正（在要求离开北京的通知上注明的时间二十四小时之后），使馆区和北堂就遭到了来福枪的猛烈射击。从此以后，这两处共计四百七十三名外国平民、四百五十一名外国卫兵和数千名中国教民就经常处于义和团和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了。

2. 北京和天津

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上将各自负起责任，采取似乎适当的措施，以保护其本国利益。各国政府对于这种责任的承担立即以直接训令予以节制。6月20日，即天津方面获悉北京那一天发生的事故整整一个星期以前，各国海军上将宣布：他们只打算对义和团和阻挠他们前往北京营救其同胞的那些人使用武力。

6月20日各国海军上将发表重加保证的宣言

① 在围攻使馆之后他为日兵所捕获，由德人审判，处以死刑。他在审讯时说："我是奉班长的命令，在街上遇洋人就杀的。我是一个军人，只知道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在扬子江流域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有意接受上述的保证。早在6月间，刘坤一就一再严令拿捕一切大刀会会友，立即正法，而勿庸事先向他请示。6月20日，有两名大刀会会友在南京正法。6月16日，这两位总督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及安徽、江西两省巡抚联名电奏朝廷，以义和团并非爱国之士而是革命党徒，恳请西太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步骤予以镇压。在各国海军上将发表了6月20日的那项宣言之后，扬子江流域各总督声明，他们将竭力维持其辖区内的治安，对可能发生事故的地方慎加防范。

驻扬子江流域各总督的正确态度

471

各国政府在为它们使节的安全担心之余，随着又为他们在对华关系上以及在彼此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担心。甚至在接到攻占大沽炮台的消息之前，各国政府就已经开始保证其彼此合作的诚意。美国政府放弃了它的避免联合行动的一贯政策，而立即同意与各国共同行动，以打开通往北京的道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7月3日致各国驻华使节的通函中，宣布了美国为中国谋求永久和平与安全、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保护条约权利和维持门户开放的决心。各国对此相继表示同意。要阐明这种局势，就有必要确定一下究竟对中国是否已处于战争状态。对于这一点，各国一致认为并不存在战争状态。

各国同意采取共同行动

门户开放政策的扩大

7月3日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致电中国驻外使节，指出北方各省的动荡未始没有波及南方的可能。他们建议各国同意不派遣军队到扬子江流域或江浙两省内地，并且他们同意保护在他们辖区内的外国利益。他们的建议被接受了。这两位总督立即发布告示，公布周知。代理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原则上也接受这个政策。端方在陕西坚决反对北京政府的这种无知愚行。义和团的爆发只是在直隶、山西和满洲各地得

对义和团活动规模的限制

472

到积极的支持。

围攻北京各使馆

从6月20日起，旅京的外国人就处于经常不断的猛烈炮火之下，但是间或也有一段停火期间。这类的停火，在使馆区内的人们是颇难理解的，而只能用北京以外发生的事件来予以解释，那些立刻为满汉大员所获悉的事件助长了认清这次凶暴攻击所产生的后果的那一派的志气，而暂时挫损了那些冒险行事的人们的威风。一共有三次显著的停火——6月25到28日，7月18到28日，8月3到4日。

团民控制中国政府

6月24日(？)尽灭洋人的上谕

中国政府一旦下了决心，发布的命令就是坚决而严厉的。6月20日，下了一道上谕，责令各督抚保护所辖省份，“以防外国阴谋侵犯”，并派兵进京。6月24日的上谕完成了义和团的组织，派由庄王和大学士刚毅会同节制。7月2日又下了一道重要的上谕，述及“民教相仇之事”。教民“亦国家赤子，其中非无良善之徒”，但“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为非，执迷不返”。凡属教民，应善诱其改邪归正。至于“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这道上谕虽然口气非常温和，但是似乎在6月24日先已有过一道措词暴戾的上谕。那道“逢洋人即杀，倘图逃匿立即格杀勿论”的命令，在世人的心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世人也不能忘记北京竟有人赋有将“杀”字改为“保”字的勇气。这项改动据揣测一定是袁昶和许景澄那两位汉大臣所作的。这两位大臣终以这种大胆作为而遭斩首，因而，凡是用电报传送的地方，这项灭473尽洋人的命令，都没有能达到目的，但是在发生变乱的地区，上谕是以抄本交由驿站递送的，因而立刻严予执行。

在北京，一刻都没有耽搁。6月22日发布了一道布告，对生擒洋人，悬出赏格。6月24日，屠杀开始。洋人已有托庇之

所，而中国教民却不得不大遭其殃。从那天以后，被处死的中国教民达数百名之多。

6月24日中国教民在北京处死

可是义和团的狂热却造成他们暂时的失宠，也是促成第一次停火的因素。6月25日，有六十名义和团员，在端王和庄王率领下冲入皇宫禁地，声势汹汹地要找皇帝——"洋鬼子的朋友"。西太后突然迎面而来，于是指着端王申斥道："须知大阿哥之名号本不难撤，将伊逐出宫外，真如反掌之易。"①她限令停止在北京作战，以便荣禄前往各国使馆磋商和平条件。但是一无结果，只是安静了一个短时期而已，继而又发动了比以往更加猛烈的进攻。

6月25日第一次停火

尽灭洋人的命令首先能送达的地方是保定，那里有几个教士业经中国政府答应给以充分保护。6月30日，有一个教会遭到义和团在穿着制服的兵勇帮助下所发动的攻击，7月1日另一个教会也遭到攻击。教士不是在攻击中被杀死，就是在房子里被烧死，而大多数是被杀头的。有十一个美国人和四个英国人连同他们的忠心耿耿的中国仆人就是这样处死的。

7月1日保定屠杀洋人

尽灭洋人的命令第二个送达的地方是山西太原。6月27日，一群暴民毁坏了一所教会医院；医院里的人，除了一个受伤的英国妇人被推回着火的房子里烧死外，其余全部逃出。7月3日，巡抚派来的三名官员迫令所有教士到一所中国房子里集中。7月6日，他们偕同许多仆人遵命前往。在东面八十哩的寿阳的另一些教士，在企图东逃至沿海一带的计划失败后，7月8日被带到太原，关进监牢。7月9日，所有这些人都被押到毓贤的衙门。在衙门的大门外面，男女老幼都象普通犯人一样地剥去上衣，听候发落。最后，这位巡抚出来了，验明正身之后，即下令

太原的屠杀

474

① 录自6月25日《景善日记》。——译者

处斩。三十四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基督教徒以及十二个天主教徒在他亲眼目睹和亲自指挥下,就这样送了命。另据毓贤他自己对西太后的奏报,太谷县处斩的六名美国教士的首级也曾送到遗臭万年的毓贤那里验明。

山西的其余的教士,有些往西逃走,越过省界进入陕西。他们备尝艰苦,至少有七个人因此丧命。在陕西,他们在巡抚端方的保护下,被送到张之洞治下的湖北境内。那些往北逃到蒙古的人遭到和留下来的教士相同的命运。另一些人在山西的传教站被杀。据悉在山西和蒙古边区遇害的共有一百七十八人①。

山西和蒙古的屠杀

在满洲南部的基督教传教士都逃到牛庄避难,附近虽驻有俄国军队,他们的教会还是在6月30日被毁。7月3日,在沈阳的天主教主教、四位神甫、二位修女以及他处的五位神甫连同所有可以捉到的中国教民一齐被杀害。7月14日,黑龙江上的俄国汽船在瑷珲遭到射击,15日,北岸的俄国城市海兰泡遭到江对岸的一座中国炮台的轰击。俄国人创造了一个可怖的先例;屠杀数千名中国男子和妇孺,将他们的尸体抛到黑龙江中,任其漂流而下。这个行动受到圣彼得堡政府的申斥。

7月3至15日,沈阳和海兰泡的屠杀

送达浙江巡抚的那道尽灭洋人的命令,似乎并未改成较为仁慈的词句。巡抚在一位满籍臬司的劝诱下,把这道命令转饬所属各县遵行。他旋即收回成命,但是大祸已经闯下了。7月21日,衢州有几帮强盗和乱兵纠合在一起,把有意保护教士的知县劫持而去,并把他和他的眷属以及仆从等一齐押送到知府衙门。全家三十三人,只有两人幸免。之后,这群暴民就转向传教士;在7月21—23日这三天中,所有住在衢州的和自常山

7月21至23日浙江衢州的屠杀

475

① 此外,皇家工程师瓦茨-琼斯上尉在蒙古受刑致死,他是为铁路勘察路线的三名工程师之一。

逃来的传教士十一人全部被杀①。

援救天津的兵力共约八千人，包括俄、美、英、德、日等国兵员。连同原有的卫队和西摩尔的残部，现有驻军约达一万二千人。在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继续不断地展开了进攻和反攻。距外国租界五哩的东局子兵工厂是华北方面中国军火供应的主要来源。6月27日，这座兵工厂由俄国部队在其他盟国的混合部队支援下攻占。接着几天双方都有小规模的进攻。7月9日，有一千名日军，在一千名混合部队支持下，扫清了南部阵地，夺占了海光寺(即1858年条约签字的所在)的西局子兵工厂。7月13日，俄、德、日、美、英、法等国军队联合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结果在第三天早晨攻陷了天津县城。天津的陷落不但打通了去北京的道路，而且把上海和烟台从日益加剧的危险中挽救出来。天津城和它的富庶的近郊曾落在义和团掌握中有若干天之久，他们烧、杀、抢掠，为所欲为。他们和世界上抢掠能手的中国军队勾结在一起又有不少天。天津的暴民也相率效尤，绝不落后。在这几段期间，生命损失无法估计，而被破坏的财产约值数百万两之多。中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又在城里到处放火，肆行破坏。外国人尽速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②。在秩序未恢复以前，又轮到外国军队洗劫了。他们的主要目的物是银元宝，所获之数以吨计，一并据为己有③。美国兵似乎主要是以砸碎精致瓷器取乐。“有些俄、法、印度、德等国军队在打家劫舍方面大显身

7月14日联军攻占天津

攻占天津的后果

476

① 据悉，在从6月24日到7月24日期间，包括其他几省的被杀的人数在内共计二百三十一人，其中成年人一百七十八名，儿童五十三名。

② 旧称为都统衙门。——译者

③ 就有案可查的来说，多少还退还一点给中国政府的只有美国一国。在1900年7月美国军队从天津盐运司衙门抢去库银五十万两，在1902年1月24日以相等价值的三十七万六千三百金圆退还中国。

手……军队抢劫情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耶稣十诫中的最短的三诫肯定是经常大规模地触犯了。”①中国破坏了国际公法并蔑视全世界;而不幸的是,西方各国在对待违法者方面也无视自己国家的法律。

荣禄在北京的势力

在6月25日的短暂停火之后,北京各国使馆又经常不断地遭到炮火的射击。在这两个月的围攻期间,据估计约有二千九百发炮弹落在使馆区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炮弹的数目既不算多,而射击目标又极不准确。这点要归功于荣禄,他虽然不敢不让他的部队参加进攻,但是他却不让把他的大炮用于“近在皇宫咫尺之地”,并断然拒绝批准使用他的那些崭新的、甚至还未开箱的备用大炮。7月初,他再上奏折,警告西太后说,文明国家义不侵虐来使,攻打使馆,实属不智,必致各国怀恨中国,永矢不忘。因中国军队未能固守天津而加强了的荣禄的这种坚定态度,发生了实效,从而产生了7月18日的停火。

中国驻外使节的努力

7月上半月,中国驻外使节,特别是驻美国的伍廷芳,曾经不断努力来减少因北京各国使馆久无消息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伍氏不断向美国政府和报界代表保证各国使馆的安然无恙。作为对他的态度的正确性的一个考验,海约翰先生要求他发一封电报给康格公使,并且要得到回电,而来往的电报都要用美国国务院的密码拍发。因而美国公使得于7月17日发出下述电报:“我们被围在英国使馆,已达一月之久,经常遭到中国军队炮火的攻击;非迅速援救,将无法免于全体被杀。”这封电报于20日到达华盛顿,使千百万关切各国使节安全的人们得以放心。但是它却给这些被围困起来的外国人的惨状描绘出了一幅

477

① 参阅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第2卷,第583页。1900年8月3日《东京新闻》载:某日从天津运来白银一百四十万两,卸在日本口岸,并收入政府帐户。

令人难安的图景。

3. 各国使馆的解围

在华北的外国部队

6月底，在大沽与天津之间的外国军队共有一万四千人，计俄兵六千人，日兵四千人，其中有九千二百二十三人驻扎天津。当7月14日天津陷落的时候，那里的外国军队约有一万二千人；7月底约增至一万七千人①。各国司令官对营救北京问题都很关切。主张进兵的人认为除去自大沽至北京沿途所需的守卫部队以外，还须有二万五千名野战部队。那些比较谨慎的要求，则认为仅野战部队所需的人数就在二万五千至八万人之间。

征集野战部队的迟缓

英国正在对南非作战，仅能派遣印度部队。法国仅能派遣安南士兵。德国在国内动员了七千人，但是此时只能抽调少数海军兵员。二千五百名美兵已从菲律宾派出。俄国可以控制住满洲并分调数千人到直隶，但为数也很有限。只有日本能够派出成千上万的军队，于是列强都指望它了。它希望列强能保证将来不发生任何纠纷并给以财政上的补助，但是没有等答复，就在7月初把它在天津的兵力增到两万人了。为了节省时间，英国政府承担了它所要求的财政上的负担，但是在为了营救使馆所采取的直接军事行动与将来可能采取的任何间接军事行动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线。在7月底，日本开到了一些援军，这是日本在1899年摆脱领事裁判权的束缚后第一次以平等地位同列强合作。英、美的增援部队也到达了；这时各国意见虽仍有分歧，但是多倾向于冒险一途。7月30日奉有采取攻势的命令的美国将军沙飞的到达，支持了英国司令官的进军的意愿，并

478

① 内计：日兵八千人，俄兵四千人，英兵二千人，美兵一千七百人，其余都属于其他四国，主要是法国兵。

克服了俄、日将军们的顾忌,而俄、日将军们统率当时可用部队的三分之二,自然是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8月4日联军从天津出发

既然"没有一个军官,不论其官阶的高低,能对其他任何国家军队的军官发号施令,所以决定每晚或于必要时举行司令官会议,以决定第二天或随后几天的行动,并以服从多数为原则"①。8月4日下午3时联军从天津开拔,旋于四哩外扎营。根据各国司令官的报告,联军总数共达一万八千八百人②;但是可用之兵大概不过一万六千人。美军实际出动了二千五百人。在英国军队中,只有炮兵和四营步兵是英籍兵,其余都是印籍兵。在法国军队中,大部分是安南士兵。意、奥两国军队的出场不过是为了有人代表那个国家而已。

从北仓向通州进军

8月5日,联军野战部队从扎营的地点出发。河右岸的日军先头部队在上午一时出发,上午四时向北仓前线的中国防地进攻,随即攻占。于是,整个左翼向北仓进攻,经过一场激战,在中午加以占领。河左岸的俄、法军队为险恶的地势所阻;在最后一次进攻中,他们对中国阵地也只能起威胁作用而已。中国军 479 队溃败,据闻统帅李秉衡受伤。第二天继续挺进,中国军队在杨村被打垮,这场战役是由英、美军队担任主攻。总督裕禄于战败后在蔡村自尽。8月7日,联军在杨村休整,同时举行将领会议,经决定继续向通州挺进,并在该地举行第二次会议。8日,

① 参阅达吉特:《在华解围远征的美国》,第55页。

② 日军(山口素臣元帅)80,000人(按系8,000人之误。——译者)

俄军(李涅维奇将军)	4,800人
英军(盖斯里将军)	3,000人
美军(沙飞将军)	2,100人
法军(福里将军)	800人
奥军	58人
意军	53人

联军渡到右岸前进。傍晚，全军会师于蔡村，9日会师于河西务；10日，会师于码头；11日，会师于张家湾；12日会师于通州。沿途除烈日和风沙之外，只有在张家湾和通州之间遇到过敌军的阻击，12日凌晨占领通州城。

8月12日联军各司令官在通州的计划

占领通州之后，日军先头部队向前推进了六哩半，已至去北京路途一半的地方。司令官会议决定翌日，即8月13日，专门作侦察工作。14日，一切部队应在日军所据守的前进阵线上集中，并由下次会议决定进攻北京所应取的战术。美、英军队在13日按时完成了侦察工作，日军不但侦察了他们自己的前线，而且还侦察了理应由俄军布防的前线。所有三国的军队都向前推进到距北京五、六哩的地方。

李涅维奇将军的诡计

8月12日，俄军司令官李涅维奇将军说他走不动了，他的士兵必须休息；提议各国军队在13日休息一天。其他各国司令官不能同意这个建议，折衷的办法是建议在那天专门作侦察工作。俄国军队留守通州兵营，至13日傍晚才开拔。下午九时左右，从西北方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彻夜不停，到第二天才确悉那是俄军攻打东便门的枪声。沙飞将军在上午十时获悉俄军已在他的右侧作战并听到日军已在更右的地方行动起来，便命令他的部队越过侦察线前进，大约中午的时候他发现俄军正在攻占东便门。他所部的美国部队有些也冲到那里，奋勇爬城，并在城下的部队和炮兵掩护之下，爬上内城城墙，将城上肃清。下午三时，他们到达美国使馆前面。他们的国旗事实上是第一面在城墙上出现的国旗。这时，日军正在攻打齐化门①，这是在他们进军路线上指定的目标。由于遇到激烈的抵抗，他们是最后进入北京城的军队。

480

① 就是现在的北京朝阳门。——编者

援军到达北京

13日午夜知道了俄军攻打东便门的消息后，盖斯里将军便在14日晨二时率领英军出动。他按计划所规定的路线，直奔外城东面居中的沙锅门①。一路无阻，不战而进入城里。窦纳乐爵士送出一封密码信，告诉盖斯里将军说，英使馆以南的水关是进入内城的捷径。英军遂获得于下午三时首先进入内城和首先进入被围使馆区的荣誉。美军不久也跟着由水关进城。

紧张的局面过去了，获救之感表现为洋溢的欢乐。一千名养尊处优的洋人在溽暑烈日之下被关在屋子里，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米和配给的少量马肉来维持生命的。三千名中国教民只有米吃，而到被围的末期，配给的米也减少了。但是所有这些困苦，若与实际遭到的危险以及他们日夜所担忧的更大的危险相比较，又微不足道了。攻方的军火供应源源而来；但是，守方的军火供应则微乎其微。义勇队里有些是用美国使馆所储备的来福枪武装起来的，有些是用他们所能搜集到的来福枪或猎枪武装起来的，所用的弹药便是刚刚过去的打猎季节所留剩下来的。在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们竟没有统统被打死，确是一件奇迹。战斗人员的伤亡却十分惨重：在四百五十八名水兵和七十五名义勇队员之中，七十六人阵亡，一百七十九人受伤。

481

北堂的英勇防守

北堂挤满了中国教民，为数约三千人。从事防守工作的有四十三名海军陆战队员，另有约五百名中国教民，后者是用改良的长矛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持有从被打死的进攻者手里得来的来福枪。对他们的攻击，甚至比对使馆区还要激烈，据悉有二千四百多发炮弹落在院内，而地雷的危险尤其大。加之，艰苦也更甚。将近解围的时候，从8月1日起，配给的口粮，除海军陆战队以外，每人每天仅有五两；从8日起，则只有三两了。8月16

① 就是现在的北京广渠门。——编者

日晨，有两支部队在教堂会师：一支是由北而来的日军；另一支是由西而来的福里将军所率领的以英、法、俄军各四百人组成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几乎同时到达，但是日军获得首先战胜抵抗而突破包围的荣誉，法军接踵而至。北堂于是解围了，在四十三名据守的海军陆战队中，十一人阵亡，十二人受伤。在这两月中，有四百多中国人埋葬在教堂的花园里。

朝廷的出走

8月15日上午四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改扮成农民模样乘一辆普通马车偷偷离开皇宫。上午八时，他们风尘仆仆地到达了颐和园，在那里有端、庆、那、肃四位王爷和几位公爷以及一些朝中大臣同他们会齐。从那里，由一队军队护送他们到张家口，再从张家口前往陕西省西安府；就在西安暂时建立起帝国的朝廷和政府。

北京受到惩罚

北京受尽了屈辱，它遭到一般亚洲城市被亚洲军队攻占后总归遭到的那种苦难，不过，现在的侵略军则是西方国家的军队。许多人逃跑了；许多满洲贵族和成千上万的妇女自尽了，成千上万的男子被屠杀；而那些虎口余生的人们也都胆战心惊。北京城先后遭到义和团和中国士兵的抢劫，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刮去一层表面上的浮油而已。外国军队现在却展开了嚣张而有系统的洗劫。他们说抢就抢，把北京和它所包含的一切东西都看成是战利品，予取予夺，恣意而为。有些地区在一、二星期内就比较地恢复了治安；另一些地区则混乱达数星期之久；但是整个北京城都是在戒严令的控制之下①。

482

中国破坏了国际法。那些犯罪的官吏以及积极参加屠杀和

① 作为掠夺对象之一，德人从观象台里掠走美丽的铜制天文仪，把它搬到柏林。按照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这些仪器应归还北京。关于北京的详情，请特别参阅：马士前引书，第3卷，第284—286页(中译本第302—304页)；《文选》，第59节；威尔，《北京书简》，第227—301页。

破坏的军队和义和团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是，那些也许在情绪上有罪然并未积极参加屠杀的老百姓，既遭到义和团和中国士兵的蹂躏，又复落到那些因其同胞或受惊险或遭屠戮而愤怒的外国军队手里。帝国这次蒙受的耻辱是以往历次战争所未有的；它不但丧失了威望，而且还丧失了名誉；朝廷受到了流亡和自感无能的惩罚。政府这时不得不进行一场外交战，结果是这个国家蒙受到更深的屈辱。

第二十三章　中国与列强的解决方案

1. 李鸿章重开谈判

李氏重任直隶总督

不到7月底，李鸿章就为整顿中国国际关系上紊乱局面而开始工作了。他最初几次的尝试都是毫无结果的。列强对于是否承认他为全权大臣这一点，意见分歧。蒙尘的太后，在8月24日的上谕中扩大了李鸿章的权限，并指派了庆亲王同他一起担任这个使命。李氏于10月1日就任直隶总督，于两天后启程晋京。他如早一点到达北京，未始不会对中国有利一些，可是，到这个时候，列强的各有其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俄国的照会

8月28日，俄国政府向其他各国发出一份同文照会，声明它并没有在中国取得领土的野心；为了军事目的，俄国已占领牛庄作为一项防卫措施，一旦秩序恢复，如果其他列强的行动不妨碍到那里，当立即撤兵；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撤离北京，俄国已经指令俄国公使暂时撤至天津；最后，俄国军队也将撤出。俄国从北京撤退外交代表的意图令人颇感惊愕，大家都不解背后是什么把戏。最为普遍接受的解释是，俄国已经同意支持李鸿章的外交战计划，以换取俄国在满洲的自由行动权。此后几个月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支持了这种解释。

俄国照会的接受

除了俄国以及经过一番踌躇之后的法国以外，其他列强都不愿意将军队撤出北京，从而把靠了首都的占领和继续向四乡

484 派兵讨伐的潜在可能性而施加于中国的军事压力松弛下来。俄国外交代表于9月29日离开北京，可是，因为其他外交代表中没有一个人援例照办，于是10月21日又折回北京。

瓦德西被委为总司令

欧洲方面于7月1日获悉克林德男爵遇害的确实消息后，翌日即下令组织一支拥有七千人的海外远征军①，以元帅瓦德西伯爵任统帅。以瓦德西伯爵为最高统帅的建议，从英国方面热烈赞同到法国方面的冷淡接受，态度各有不同，但各国政府是一致同意的。他在8月19日离开柏林，于9月25日到达天津，在天津一直驻留到10月15日。10月17日他进入北京，以联军总司令的资格，在南海的皇宫内设立了司令部。

中国军队的分散

北京攻下以后，中国军队普遍地向四面八方逃去——只是没有朝向敌人的那个方向罢了。帝国有组织的军队朝西逃去——往西南逃向保定和山西，往西北逃向张家口和口外一带。还有大量的军队，包括董福祥和他所部的甘军，随同宫廷逃往西安府。北京四郊的义和团劫掠村庄，肆行威压；比较远一些的地方则有散兵游勇；更远一点的地带还有维持原来编制的帝国军队。军事当局看到这种危险，就来自行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甚至在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之前，传教士们就采取了援救边远乡村中教友的措施。在这类的远征中，传教士们必须由武装的卫兵伴随同行，从而有力量强使曾经犯过署杀或虐待基督徒罪行的那些村庄接受条件。他们几乎一成不变地科以罚金作为惩

援救措施

① 这支军队的第一批在7月27日从不来梅港启程，德皇对它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讲，其中提及德国政府的一般政策的有下列词句：

"当你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打败他。决不给以赦免，决不收容俘虏。让落到你们手里的一切都听凭你们发落。正如一千年前在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取得了他们凭以在历史传说中迄仍不朽的那种令名一样，德意志也可以这样名震中国，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处，用这些罚款来为贫苦教友购办食粮，否则那些人在来冬是非挨饿不可的。

9月8日，一支混合纵队开到了天津以南十五哩的一个义和团中心——独流，并且烧毁了这个地方。三天之后，一支由一千七百名德国人组成的军队由北京出发，开往距京汉铁路起点十五哩的良乡；在遭遇顽强的抵抗后，攻占了这个城镇。十六日，三支纵队从北京开拔，向京城以西十八哩的三家店进军。摧毁了一个兵工厂和两个庙宇，焚烧了几处义和团的总部，并且炸毁了一座宝塔，作为6月9日英国使馆避暑山庄被焚毁的惩罚。在联军最高统帅到达之前，联军各司令官就议定，如果任北塘和山海关的炮台保留在中国人手里，他们军事地位就无安全可言。因此，在9月下旬攻占了北塘、秦皇岛和山海关的炮台，分派给各国——俄、日、英、法、德、意——只是为了联军共同的利益分别据守。

9月间北京、天津近郊的肃清

485

沿海岸炮台为联军所占领

瓦德西到达之后，由于厉行处罚政策，讨伐性的出征和对许多城市实行的报复性惩处，在次数上都大见增加。瓦德西的远征保定是窦纳乐爵士建议的，而这位德国将领抱怨说：在谈判进程中接替窦纳乐爵士的萨道义爵士为了把德国军队留在华北，作为拦阻俄国人的障碍物，毫无必要地拖长了谈判。10月8日，一支拥有一千名法国士兵的队伍从天津向南进军，解救了喀塔①的教会，这地方的一千八百名教徒已经被义和团队伍紧紧地围攻了三个多月；摧毁了那些曾经积极参加屠杀基督徒的村庄；在冬季留下了一支警备队驻守献县的教会。

讨伐队

与此同时，另外一支法国军队向保定府进发。它没有遇到抵抗，因而在10月13日进城，救出了当地和在正定被看管的教

对保定的惩罚

① 译音，原文为“Kata”。——译者

486 士。五天之后，德、法、英和意大利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分别开到保定府，在20日冲进城门。于是组织了一个国际军事法庭，来调查7月1日的杀害传教士案。它将藩台、满将军和曾经将那些想在他的营盘里避难的传教士逐走的营管带判处死刑。这三个人的判决都执行了。道台则被解送天津，在那里经过审讯之后，被判处斩，枭首示众六天。除此之外，城门和城墙的一角被拆掉了，两个与杀害案有关的庙宇被拆毁了；征科了十万两银子的罚款，还抄没了在藩库里发现的二十四万两银子。留下一支由二千名德国兵和一千二百名法国兵组成的驻防军驻在城内过冬。在主力军从保定撤退时，一个支队开往6月1日杀害案出事所在的永清；拆毁了一座城门和三所庙宇，征科了四万两银子的罚金。这宗款项是充作救济永清灾难的专款的。

惩罚行动的消退

这时，各国开始对于这些远征队伍表示不赞成了，只有德国坚持不变。从1900年12月12日到1901年4月底一共派出了四十六支远征军，其中有三十五支是仅仅由德国部队组成的。俄国人没有参加这些远征军，可是，后来却参加扼守北京和天津的任务。日本人勉强地参加了少数几支的远征军。英国在每一支远征军中，派有一个军官和一班卫兵，借以维持行动一致的姿态。美国不赞成这种政策，也不打算在政策的执行上进行合作。

俄国在满洲的侵略

一度为了解救各国使馆而暂时地团结起来之后，现在各国显然在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正当俄国公使同他的同事们准备议定书的时候，俄国政府却按照满洲和义和团问题无关因而是一个要采取个别行动和谈判的地方这种想法去行事了。从9月24日开始到10月10日终了的那一场战役中，俄国人攻占了南满的全部——南起旅顺口，北至铁岭，西面则远及北京一山

海关—新民府铁路沿线。山海关却漏出了他们的手掌。山海关的防军遵照李鸿章的节节撤退的政策，已经从防地撤出，并且在撤出之后不多几小时的工夫，一支俄国队伍就开到了。然而，在他们到达之前一小时，从英国炮艇"侏儒"号上派出的一个登陆队已于9月29日占领了该地，并升起英国国旗，为联盟各国把守住这个要塞。靠了在天津的优势，俄国夺取到从天津至北京的铁路——但是被迫交出，由各国共同使用和占领——并夺取到唐山的煤矿，但随即归还了中国业主。它也攫取到从天津至山海关及其以北的铁路，而一直保持到1901年2月。牛庄的港口营口，在8月4日被俄国军队占领，他们在海关和炮台上升起了他们的海军旗帜，但提出了不干犯各国和中国的权益的保证。在10月4日，海关上的俄国海军旗换了俄国的海关旗帜——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487

俄国在天津的侵略

在天津外围作战时，俄国的军队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他们担任河东岸的防务，在那里扎了营，占据了火车站和车站的岔道所在地。这条铁路是在中国人的管理之下的，外国人并没有参加管理。俄国当局在11月6日发出了同文照会，声称俄国部队已在6月23日扫清了白河左岸，并通过战事行动和征服的权利而确立了在那里的地位。包括有火车站在内的这个地方被宣告为在俄国的单独管理之下。美国代表竭力反对这个运动，认为它破坏了从纠纷开始起各国所达成的全部协约。然而，俄国的主张占了优势，于是一块将近一千啢，带有一万一千呎的沿河地带的地面就变成了一个俄国租界。但是，争论的关键——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却于1901年2月间移交给了英国当局。由于这一个移转行为，包括火车站及其进出路在内的这个地带就保留在中国管辖之下了。

在天津的“攫取”政策

象这样开始的“攫取”伎俩，其他各国也相率效尤。这里从1861年起，本来有三个租界——英国的、法国的和美国的。在美国的租界中从来没有行使过美国的统理权，但是租界的权利美国也没有正式放弃。在1895年又划出了一个德国租界；1896年又划出一个日本租界。而现在，俄国开了一个头，其他各国就接踵而起了。在11月7日(1900年)，比利时当局要求一个比利时租界。接着法国和日本当局也要求扩展各该国的租界，而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也要求有租界。对于这些要求美国公使都作了无济于事的抗议。1901年，德国和英国的租界扩充了。美国当局一度有过恢复旧美国租界要求的想法，以免自己被摈于天津之外。结果，商定在附有收回权的条件下，将它合并于英国租界。

488

美国的抗议

如果说俄国有领土野心，那么德国也有它的怀抱——一个是用撤出中国的方法来求其实现，另一个是用惩罚的政策予以推行。然而，英国却要设法阻止俄国达到它的目的。为此，在10月16日(1900年)签订了一个包括四项条款的英德协定。第一条，在实质上重申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两国政府同意“尽它们所能运用的影响，对中国全部领土”维持这项原则。第二条宣称：两国将不“利用当前复杂状态，在中国领域内为自己谋求任何领土利益，并且要运用它们的政策来维持中华帝国的领土状况而使其毫不减少”。第三条是：“如果另一个国家利用中国的纷扰状态，不论采取任何形式来谋求这种领土利益”，两国同意共同协商，以保护各自在中国的权益。最后一条是：两国要邀请其他联盟国家参加。海约翰先生对于英德协定的意义发表了一项率直的意见：“当英德协定发表的时候，我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去探索它的用意所在。不久我就从柏林方面获悉，这无异是

英德协定

对英国的玩笑

对英国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恶作剧。”英德协定对于文内引用“中国领域”和“中华帝国”等名词并未下一定义。旺·毕洛伯爵不久就宣布说：它并不象英国所认为的那样适用于满洲，并且他的政府拒绝对俄国在该地区内的侵略提出共同的抗议。这项协定的结果是削弱了英国在扬子江流域的地位，正如在 1902 年上海撤兵问题发生时表明出来的那样。

489

1902年上海的撤退

外国军队曾于 1900 年在上海登陆。紧接着首先到达的英国(印度)军队之后，其他各国军队在互相猜疑之下也接踵而至，生怕在扬子江流域的优势地位会被单独一个国家所独占。在 1902 年，英、法、德、日在该地的军队各有二、三千人不等。7 月底，中国当局力请外国军队在交还天津的同时，撤出上海。四国都同意撤兵，但以其他各国也撤兵为条件；法国的条件是：如果其他任何一国重行占领上海，它有照样行事的权利。德国怀疑英国正在进行在扬子江流域谋求特殊地位的谈判，而且决意要参与那个地区的开发工作，所以附加了一项条件，即“北京政府和沿江总督必须担保不给予任何国家以政治、军事、海事或经济性质的特殊权利，也不得允许任何国家占据上海上下游其他任何冲要据点”①。德国政府一面保留在山东省的绝对优势地位，一面却公然主张扬子江流域的门户开放原则。其他三国已同意了那项原则，但是反对以它作为上海共同撤兵的先决条件；所以向中国提出抗议。各总督担保不对于这个问题签署任何秘密协定；但是，德国政府却扬言它已经“从中国中央政府和各总督方面得到一项按照它所要求的具有拘束辞句的一般性声明，即中国政府决不割让中国主权的任何部分，并且决不同意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的任何优先权利”。德国希望适用于扬子江流域的原

① 关于 1898—1914 年战争起源的英国档案，第 2 卷，第 141 页。

则，中国把它应用于全国各地。英、日两国都对中国抗议说：它们既然不是缔约的一方，它们"决不承认中国和任何国家就上海撤兵事宜所作的任何协议，对于它们有任何影响"。德、英、法国的军队分别于1902年12月20、22和26日开始从上海撤出。

490

2. 外交上的解决方案

中国统治者一筹莫展的处境

虽然联盟各国有它们的困难，可是中国大臣们的任务却也毫不轻松。政府解体了，权力操在那些坚定地站在皇上和皇太后一边的总督们的手里。9月间，两位长江流域的总督在外国代表们的建议之下，作为帮办全权大臣来协助庆亲王和李鸿章。

1900年12月24日各国代表发出的联合照会

经过外国代表们两个多月的讨论以后，于1900年12月24日以联合照会的形式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它是用电报拍发到西安的，并经帝国朝廷予以接受。接下来的八个月都消磨在各国代表们之间的磋商上。在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桩又复标志出各国所抱目的各有不同的事件。(1)尽管英、美政府表示不赞同，然而讨伐队伍在1901年整个的4月份里还是继续活动。(2)俄国于1900年10月间奠定它在满洲的地位以后，就进行巩固它的地位的工作。11月11日，满将军增祺同海军上将阿莱克塞夫在旅顺口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如果付诸实施，则势必使满洲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了。中俄两国政府否认有这个所谓协定的存在。

各国的警告

美、英、德、日各国政府警告中国政府说：同任何一国缔结单独的条约都会成为中国的危机的根源。中国政府随即吁请英、美、日、德共同调停。俄国政府拒绝发送这个协定的正本或进行讨论，并且宣称：如果各国对俄国在8月间所提的保证表示不信任，"俄国自当加意保卫它自己的权益"。然而，这桩事件既已成为公开秘密，俄国认为有必要对这个协定作相

当的修改，甚至不再逼迫订立明确的协定。但是，俄国方面对满洲却抓得更紧了，两年之后，该地区的局势就将变成中华帝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491

1901年9月7日最后议定书的签字

联盟各国之间的磋商是通过一种可以说是相互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某些问题上，诸如死刑之类，为了意见一致起见，那些倾向于采取更严厉的惩处办法的国家，就接受了最低限度的要求。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诸如赔款之类，每一个国家都容许提出它自己的条件，而不受牵制——美国在下述两项尝试中都没有成功：第一，把赔款和修订商务条约的磋商移到华盛顿或欧洲方面的一个首都去进行；第二，争取对赔款"定出一个中国力能偿付的总数"，倘使这个总数超过它的能力时，则相应减少每一个国家的索赔要求。最后的议定书是在联盟各国的要求第一次商定之后的第十一个月，即1901年9月7日签订的。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有中国全权大臣庆亲王和肃毅伯李鸿章，以及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的全权大使。

赔款与惩罚

第一条：规定对于戕害克林德男爵应付的赔偿。光绪皇帝的兄弟，亦即宣统的父亲——醇亲王——于7月12日离开北京，为这桩戕害事，亲自去向德国皇帝表达中国皇帝和政府的歉意①。第二条：对于义和团暴行的惩罚，重加申述。根据2月13日和21日的上谕，分别定了下列的罪名。皇族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二人定为斩监候；但经约定皇帝得加恩贷其一死，发往新疆，监禁终身。满族庄亲王和英年，以及汉大臣赵舒翘，均定

① 同时还要在遇害地点树立一个刻有拉丁文、德文和中文的纪念碑，以及一个宽度与案件发生所在的街道相等的牌坊，来表达这项歉意。这个纪念碑于1919年拆除，移往中央公园，改建成为胜利纪念碑。（中央公园即北京现在的中山公园，所谓胜利纪念碑，解放后已改为"保卫和平"的牌坊。——编者）

492 为赐令自尽。毓贤、启秀和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均追夺原官(即死后革职)，所谓追夺原官与判处死刑所产生的效果和法律上的后果是一样的，包括没收其财产在内。当时还不能触动的董福祥被革军职，“俟应得罪名最后定谳惩办”。此外，上谕开复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和袁昶等人，以示昭雪。

对外省有罪官员的惩罚则不是这样轻而易举的，所以中国全权大臣们就申请从轻议处。对于斩首的要求终于从十名减至四名，这四名乃是在屠杀传教士的举动中一向出名活跃的人。最后商定判罪的总数共九十六人，从死刑到永不叙用，谴责和追夺官职，轻重不等。

科举的停止

知识阶级——中国的士绅，一般说来，总是任何排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在这一段期间，士绅是通过考试而源源补充的，这种考试给他们以进身之阶。根据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8月19日发表了“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四十五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的一道上谕，给了他们一个打击。

第三条：规定简派那桐为全权专使大臣，为日本公使馆秘书被害事，向日本天皇表示歉意。第四条规定：在被污渎各坟地建立涤垢雪侮的碑碣一方。第五条禁止军火和军用器材的输入，直到1903年8月为止。

义和团赔款

第六条：关于赔款问题。各代表要求一个共计为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总数①，这个数目经5月29日上谕接受。利息四厘，由1901年7月1日开始支付；正本则自1902年1月1日开始分还，至1940年12月31日付清。每年度的本息均用金币支
493

① 虽然赔款的数目是用各国所通用的银两表示，但据声明这是一笔按照固定兑率计算的“金币债务”。

付，这样应付的全部本息总额为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在核计所索偿的战争费用上，并未采用共同原则，各国政府提出的数字也没有受过严格的审查。在早一个阶段中，美国政府宣称：美国的索赔，包括公私索赔一并在内，是二千五百万金元，并称，军事作战行动的久暂并不影响所索赔款的数额。1908 年，美国以退还款项应专用于教育方面为条件，将这项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中国。1924 年，美国政府根据国会的一项法案，退还其应得赔款份额中的余数，否则这笔款项要到 1940 年方能付清。俄国和德国的索赔——几近二亿二千五百万两银子——合计起来，和其他六个国家的总和几乎相等，法国毫无疑义地居第三位；意大利的公开索赔之数和它在军事上所尽的力量是不相称的。

分配上欠公正

根据第七条，中国同意将各国使馆大事扩充下的使馆界保留作为外交官和使馆人员专用之区，由各使馆自行管理。使馆界亦可自行防守。各国有权设置一支常驻卫队以保卫使馆。

使馆区域

根据第八条，中国同意拆除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自由通道"的炮台。这一条规定被广泛地解释为包括北塘、秦皇岛和山海关在内。拆毁工作于 1902 年 6 月间完成。根据第九条，让予了派兵驻守某些地点的权利，"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

议定书的杂项规定

根据第十条，中国政府同意"在两年期间，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前所颁之上谕公告"：(1) 禁止参加任何排外的会社；(2) 列举犯罪的人如何惩办；(3) 在诸国人民被屠杀或遭受虐待的一切城市内停止举行考试；(4) 遇有排外纠纷或其他违反条约的情事，应由各省官员个人负责。第十一条提到凡现行条约中有关"诸国政府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即行商议，并提及按照第六条所规定

494

的关于改善白河、黄埔两水道的事宜。第十二条重申：根据7月24日上谕，已将总理衙门改为位居各部之前的外务部，并载有关于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的一份协议。最后还申明：议定书以及诸国代表所发出的所有各项附件"均系以法文为凭"。各国同意，除使馆卫队之外，所有各国军队应于9月17日一律撤出北京，并且，除第九条所列举的十二处之外，于9月22日撤出直隶省。

中国地位的低落

在同西方国家直接发生关系的七十年之后，中国的地位历经1842、1858、1860、1885、1895年已经逐步地降低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致到目前1901年，仅仅保存下一个主权国的寥寥几个属性。如果要使它的皇位保持不变，如果想要继续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下去，显然它非变更自1834到1900年所遵循的办法不可。

3. 商务上的解决方案

李鸿章、刘坤一、荣禄逝世

最后议定书于1901年9月7日签字，在签字的时候，李鸿章已奄奄一息。他在11月7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一年之后，即1902年10月6日，两位沿江总督中的比较伟大而又刚毅的一位——刘坤一——也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荣禄逝于1903年4月11日，享年六十七岁。于是国事就归由次一流的人物去操持了。在这些人物中，最出色的一位是张之洞。刘坤一逝世后，张氏回任前职，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逝世后，袁世凯即奉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朝廷还都北京

在最后议定书签字和外国军队从北京撤出之后，朝廷决定还都。10月6日由西安启程，在正定改乘火车，于1902年1月7日抵达北京。希望言归于好的心情是可以看出的。1月28

495

日，外国使节受到了适当体面的接待。2月1日，西太后接待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态度亲切；并且于吩咐引见那些经历过围困的人们之后，“在问候她们的时候，颇为伤感，一面同她们谈话，一面流泪”。满洲的统治者们或许已经汲取了一些教训。也许他们只是想要别人相信他们如此。可是，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把这些教训的大部分置诸脑后了，并且希望全世界也都是健忘的。

商务条约的修订(1902——1903年)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最后议定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修订商约的那些条款。首先谈判的就是1902年9月5日签字的那件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美国条约和日本条约于1903年10月8日签字。前者，除了下文即将指明的那些部分之外，在条文上多依英国之例；而后者则实际上是一个详尽的最惠国协定。随即同德国开始了谈判；但是，谈了没有多久，中国的全权大臣就发现了：十九个有约国中，剩余下来的每一个国家都意在对修约所会给予中国的全部利益，要求特殊代价；所以，全部谈判都停顿下来，并且始终未予恢复。英国条约和美国条约遂构成目前中国应行遵守的规章了。

拟议的改革并未执行

条约各款的规定自然地分为三大类：关于对外贸易一般利益的那些规定；为中国国家改革所必需的那些规定；以及认为是英、美特殊权益所必需的那些规定。在第一类中，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项就是能使中国废除繁剧的厘金制度的一件详细方案。各种商品在国内运转上的征课是四十年来许多国际摩擦的根由。现在所制定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厘金仍旧构成了一个滋生纠纷的来源。

英国条约

英国条约也涉及若干特别与英国权益有关的问题。中国保证清除1884和1894年在珠江中设置的阻截航行的人工障碍

496

物。中国也同意限制其禁止沿海装运米谷的权力。这些为香港的贸易和英国航运事业的利益而设的特别条款，给了其他各国以考虑其各自特别利益的借口。

美国条约

美国条约将截至目前为止仅凭最惠国条款所享受的一些特权作了明文规定。现在经双方同意，美国使节得常驻京城，并在驻京期内应以与其地位相称之礼予以接待。美国驻中国的领事应与中国驻美国的领事受同等的尊重。美国公民得在任何通商口岸"居住和办理商业、工业、制造业以及各项正当的事业"。在一切有关信仰方面的事宜上，给予传教士和教徒以完全的保障。传教士不得干涉中国对教徒的管辖权，但中国官员也不得对教徒与非教徒之间有任何歧视。自 1860 年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所已享有的那种在帝国各地购置产业的权利，现在也给予美国各教会团体了。

中国币制的紊乱情况

各条约中的其他条款都是旨在引导中国走上改革之路的。各国同意中国得禁止吗啡和注射吗啡用具的输入，但为医药用途者除外；中国也同意禁止在中国制造吗啡①。五十多年以来，中国以及与中国通商的各商业国家的最迫切的需要，一直是它的币制改革和为国际汇兑规定一种标准的铸币。英国条约和美国条约现在都要求中国规定一种全国性的统一铸币。日本条约则进而要求中国"规定一种全国性的统一国币"②。尽管在 1911 年 4 月 15 日，为了改革币制和发展满洲的工业起见，美、英、法、

① 由于禁令的缘故，输入从 1902 年的十九万五千一百三十三盎司的最高额降到了几近绝迹的程度；但据一般人相信，"降低的原因不在于需求的减低，而是由于走私所致。"

② 1918 年，日本建议中国采用金本位作为币制的改革。它所提出的计划有把中国币制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可能。这项建议并无结果。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聘请了金穆尔博士和大批专家作有关财政和币制问题的研究，并拟具建议。工作是做了，但是还得经过一段时间来判断其后果。

德四国代表其金融机构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贷款协定，可是币制改革还是未竟全功。日本条约还规定了极其需要的中国度量衡的划一制度，但在这一方面的改革并无成就。 497

司法改革之拟议

中国更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司法行政的情况，但是这时外国人可以靠了他们享有领事裁判权的特权而不受它的影响。中国人对于这种特权感到不平，素以争取废除这种特权为职志，正如日本由于改良内政和立意履行国际关系上的责任而已经做到的那样。在英国条约和美国条约内都规定：对中国改革司法制度一节，愿尽力协助；外国列强“一俟查悉中国律例及其审断办法，以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允即放弃其领事裁判权”。

4. 解决方案中的海关

1900年以后的海关

关于列强如何提防猜忌姑且撇开不谈，中国海关乃是中国赖以无灾无难地渡过从义和团解决时起到清廷覆亡为止这一段漂泊无依的时期的凭借。在义和团起事那一年之后，中国和列强都把海关看成是保证中国履行所负义务的一个工具。

“常关”的管理

为了提供赔款的充分保障，凡约开口岸所设的“常关”一律置于外国总税务司署的管理之下。照各使馆的解释，所应管理的乃是毫无例外地在每一约开口岸及五十里(十七哩)半径以内对非外国船只载运的商品所征收的除厘金以外的一切捐税。这种管理应于1901年11月11日与确实的值百抽五的税则同时施行。

总理衙门下的海关

海关总税务司署对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受对外条约严格约束的外国船只和外商所有的货物，负有管理的责任。但是，从1860年起，它已成为偿付英、法赔款的出纳机关；它是中国各大臣们在新颖而困难的国际关系上，获得情报和建议的唯一桥梁。 498

为了这些理由，它当然是设置在总理衙门之下，而且不但在财政和商务的问题上，就是关于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宜，也时常征询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意见。为了提供中日战争赔款之用而订立的1895、1896 和 1898 年的借款是以海关税收为担保的，仅剩少数余额应付帝国的需用；官僚阶级这时体会到：洋关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充作外国债权人的收款代理人，而不复能完成作为它继续存在的基础的目的——认真征收并据实呈报一笔令人满意的税款，以供帝国政府使用。目前，在中国受到侮辱的时刻，由于 1901 年最后议定书以及 1902 和 1903 年各商约的若干规定，海关成了它的主人的主人。这时关心于扩大海关重要性的是外国的权益集团，而不复是中国人了。海关失去了中国人的欢心，也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重要性。

税务处的成立

海关的重要性和总税务司所运用的权势的根源在于总税务司对外务部的直接依附关系，以及海关人员对总税务司的绝对隶属关系。中国当局既然对这种情形感到恼怒，他们就把总税务司和外务部的关系切断了。1906 年 5 月 9 日的一道上谕指派户部尚书铁良为税务大臣，外务部左侍郎唐绍仪为会办大臣，"所有海关事务及各海关华洋人员统归节制"。后来的一道上谕令饬成立税务处——海关事务处，就以这两个人作为主持人。

赫德爵士退休和逝世

赫德爵士的个人地位因而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两年之后，499 他请准最后一次的休假；1911 年 9 月 20 日，还在正式休假期中，于主持了他留有出色的印象的一个巨大的机构达半世纪之后逝世。在那半个世纪中，他为中国并为同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各国完成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工作；他的工作经各国颁赐荣典，以资表扬。他的后任是另一位英国人安格联先生(后封爵士)。

第二十四章　日俄战争——日本对欧洲的第二次挑战

500

1. 朝鲜的地位(1894—1904年)

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这是日本早在1876年就已经承认的。本以为朝鲜的两个最贴近的邻国既然已经承认了它的完全独立，而且它又同美国和欧洲各重要国家发生了条约关系，那么马关条约总可以从此把朝鲜问题解决了。然而事实却大谬不然。朝鲜的真正独立，既不适合俄国的计划，也不适合日本的计划;加之，朝鲜的统治者们又不适合于管理他们的王国大政，远不足以同俄、日这样两个强邻的野心相周旋。

朝鲜的"独立"

1894年8月26日，朝、日两国签订了暂定合同条款，这个条约足可使两国提携到空前未有的紧密程度。朝鲜的独立虽得到了保障，但朝鲜同意于必要时征询日本的意见并向日本求援。十年之后，于日俄战争爆发之际，又公布了一项类似的条约。那种事实上只以聘用日本顾问为限的政策，使其他各国纷纷向朝鲜政府提出抗议，结果是朝鲜表面上的独立总算小心谨慎地维持了下来。

1894年日朝两国的提携

10月，井上伯爵任驻朝公使，一种强有力的前进政策已在推动之中。当1894年12月朝鲜国王的内阁改组时，凡是在1884年谋求政府的自由化最为出力、因而被迫旅居国外的人

朝鲜政府改组——1894年12月

们，都被召还当政。军队在军务部之下进行了改组，以日本战术501代替了以前所用的战术。由大约四十名议员组成的枢密院，奉有讨论重要政务的权力，并拥有有限度的否决权。曾经参加1884年政变、继而逃亡美国的徐载弼，奉派为枢密院顾问。已经成为医科毕业生和美国公民的菲力浦·戴松（按照徐氏这时的姓名来称呼）追随凯旋的日本人之后，回国来担任了朝鲜朝廷中的一个有影响的职位。

1895年国王的宣誓

1895年一开始是一个好兆头。国王在告庙的时候，誓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已任。他宣誓说，"大君主御正殿视事，政务亲询各大臣裁决，后嫔宗戚不容干预。""租税课征及经费支出，总由度支衙门管辖"；"国中聪俊子弟广行派遣，以传习外国学术技艺"；"用人不拘门第，求士遍及朝野，以广人才登庸。"①

大院君

这时大院君已正式下野，然而他在朝廷中的势力却并未减弱。他决心要用"烈火、刀剑、毒药和炸弹"把他的儿媳去掉。至于王妃对他所持的态度，则依然是和1873年迫使他隐退时一般无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清楚的是，只要王妃和大院君在朝廷中各立门户，就没有和平和进步的可能。

1895年10月8日王妃遇害

1895年7月，和王妃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那位坚强而又有政治风范的井上伯爵，退出了日本使馆，随即为"执迷不悟而又毫无见识的"陆军少将三浦子爵所接替。大院君不久就能同三浦建立一项谅解，从而产生了杀害闵妃的后果，因为据说闵妃曾直接或间接地致她的臣民约九千人于死命。大院君在日本公使、日使馆一等书记官、朝鲜军务部和宫内部顾问以及其他四十五人的协助下，率同一批备有重武器的日本"壮士"——政治打手——和日本训练的朝鲜兵于10月8日拂晓闯入宫中。他们

① 录自《洪范十四条》，见太白狂奴：《韩国痛史》，第96—97页。——译者

很快地把闵妃砍倒，用布单裹起来，不管她是否已经断气，就浸透石油，在宫廷的院子里加以焚化。宫内大臣在王妃的寝殿前受重伤，几分钟之后就在国王和世子面前被杀死了。大院君暂时负起了朝廷的责任，但不久就引退，他由于去掉他的敌人而颇感心满意足了。三浦子爵和日本使馆一等书记官在凶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进宫。国王很快地被骗诱签署了几项文件，保证以内阁治理国政，并选任对进步事物——以及对日本——持友好态度的官员。 502

凶杀事件的责任

三浦公使为铲除自己道路上的障碍所取的方法是有效的，然而缺乏外交策略。他立即被召回，并且由于他的那种罕见的轻率举动而和他的同谋者同遭逮捕。在广岛传讯之后，以证据不足被释放，虽然他们的参加阴谋是公开而且正式承认过的。1910年，即并吞朝鲜的那一年，当三浦晋升到枢密院议员的地位时，他的国人的感激之情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在对华战争中赢得的威望暂时受到了减损，12月，日本将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896年2月11日国王逃往俄国使馆

在王妃死后，朝鲜国王事实上成为内阁手中的囚徒达四个月之久。一连几个星期，国王都时时为自己的性命担忧，除了从宫外用加锁的食盒送进来的食物而外，不肯吃任何东西；夜间每有动静他总是找两、三个西洋人作伴。在这些危险的月份里，他在焦灼忧虑之中主要是倚靠美国代办阿兰博士和俄国公使韦贝先生。三浦子爵所犯错误之大，从国王和世子在1896年2月11日清晨出奔俄国使馆一事中得到清楚的证明。国王逃走的消息一经传出，他的亲日内阁就立刻垮台了，有几名阁员遭暗杀，有一名逃亡日本。国王从俄国使馆内的行在中任命了一个新内阁，但是，由于继续那种以夷制夷的两面政策，据说他同东京宫廷还一直书信往来不绝。在朝鲜人民本身当中，这时反日

的情绪已高涨到十六世纪末叶以来向所未有的程度了。

503　俄国人在汉城的势力

尽管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先生(后封男爵)提出了种种论证,国王还是拒绝离开俄国使馆的保护。直到 1897 年 2 月 20 日俄国使馆附近的一座新宫殿落成、从而无须回到王妃遇难的那一座时止,他一直驻跸在俄国使馆。这时俄国势力之大,同当年中国和日本的情形不相上下。1896 年 4 月 22 日,图们江一带的采矿权让给了俄国人;5 月,日本训练的军队被解散;8 月 28 日(旧历),签订了一项合同,将"鸭绿江流域"和日本海中郁陵岛上的森林采伐权让给了俄国人。

1896年韦贝—小村协定和罗拔诺夫—山县协定

在 1896 年沙皇尼[illegible]二世举行加[illegible]典礼时,代表日本参加的陆军元帅山县(友朋)[illegible]两国在朝鲜拟行采取的立场。小村公使也[illegible]使进行了商谈。后者的结果是 1896 年 5[illegible]的韦贝—小村议定书;前者的结果则是 6 月 9[illegible]签订的罗拔诺夫—山县议定书。想到在罗拔诺夫—李[illegible]同盟条约缔结之后不到一个月工夫罗拔诺夫—山县协定即行签字的情形,俄国对远东外交的两面性当可了然。韦贝—小村协定和罗拔诺夫—山县协定实质上都是 1885 年中日天津条约的翻版。就这两项协定而论,虽则面子上维护朝鲜的独立,而日本同外国所缔结的协定事实上却都否定了朝鲜的独立——两者都构成走向战争的初步。这时,关于俄国在半岛上的地位,日本承认现状。两国都承认了在未恢复秩序以前在朝鲜驻扎卫队的权利。日本得继续"管理其事实上已经掌握的电讯线",而俄国得"架设由汉城至俄国国境的电线"。

不久俄国就不再理会协定的精神了,纵非不理会协定的文

504　字。俄国士官在 1897 年开始前来充任朝鲜军队的军事教练;兵

工厂已委由一个俄国军官监管；若干俄国副领事已担任了海关税务司；一个亲俄的朝鲜人奉派为外务大臣。1897年9月，一位勇于进取的公使德·斯培耶先生在汉城接替了态度友善的韦贝公使。这位新公使立刻为俄国在控制釜山港进出口的鹿岛上要求一个加煤站；但未获成功。自从朝鲜和中国断绝关系以来历经整个战争而一直担任朝鲜国王财政顾问和海关长官的英人柏卓安于10月间断然被解职，这两个职位一并由俄人亚历克塞耶夫接充。

俄国无视它的对日协定

对于胶州和旅顺口问题深为关切的英国，对朝鲜也正从旁注视。英国靠了它的驻中国和朝鲜的公使和驻汉城领事的抗议，并终于靠了12月间命令七艘兵舰的访问济物浦，才得以强迫将柏卓安复职。亚历克塞耶夫则被安置在一个僚属的位置上。

英法德的态度

俄、日两国都争取美国的同意和同情。1895年，一家美国公司已经得到了一处金矿①的开采权；翌年，俄国人又帮助美国人取得了一件修筑京仁铁路的合同。但是朝鲜局势的阽危把美国资本吓住了，因而将这项合同转让给了日本人。这时后者力劝美国资本家在日本的保护下向朝鲜投资——这是他们后来在满洲和中国本部实行得多少有点成就的政策。为了力图争取美国在朝鲜方面的支持，日本政府"撤回了它对兼并夏威夷所提的抗议，对移民问题也采取了极尽妥协的政策，并且当兼并菲律宾的问题正在讨论的时候，表示希望美国能保留这个群岛"②。美国的关心于防止中国的瓜分，遮掩住了它对朝鲜的关心，而且美西战争以前的种种情况正愈来愈使它一时不暇分心及于这两

美国对朝鲜所取的立场

505

① 即平安北道云山郡金矿。——译者

② 丹涅特前引书，第505页（中译本，第627页）。

国的任何一国了。

在这期间，朝鲜政府中饶有兴趣的变化正在开展。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力量，虽为控制朝廷和朝鲜全国而彼此争衡，却联合一致来反对俄国势力或任何外国势力在朝鲜的滋长。1896年春季，在国王访问俄国使馆的同时，以前一个秘密团体公开宣布为独立协会，以戴松博士为会长。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扶植自由政府和民族独立。虽然国王在理论上赞成这个协会，然而他是极端保守的，更确切地说，因为他类似听凭顾问捏塑的泥团，他已为保守分子所包围。1896年下半年和1897年头几个月当中的一批改革令的颁布，徒然加速了保守势力和自由势力之间日益加深的分裂。

汉城的独立会

1897年10月，在英、俄两国为柏卓安的解职而发生争执的同时，国王李熙采取了皇帝的称号。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各有约国的支持，因为这个举动将朝鲜肯定地置于和中日两国同等的地位。

朝鲜成为“帝国”

在朝鲜历史上正如在中国历史上一样，1898年是一个安危存亡的关头；的确，在这两国的事态发展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在这一年中，俄国暂时撤出了对朝鲜事务的干涉，日本恢复了在朝鲜的支配地位，而为国家争取真正独立和政治社会改革操之过切的自由独立协会瓦解了。俄国对中国事务的关切以及不愿分散力量的打算，连同独立协会的反俄情绪，合而造成了3、4月间撤回全体俄国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关闭俄朝银行以及召还勇于进取的斯培耶的结果。

日本在朝鲜的得势

506

4月25日，西德二郎－罗善议定书签字。于再一次确认了“朝鲜的独立和完全主权”之后，俄、日两国政府互相约定，“关于推荐练兵教官和财政顾问事，非经两国事前商得同意，不采取任

1898年的西－罗善议定书

何措施"。最为重要的是，俄国方面同意不"妨碍日朝两国商业及工业关系之发展"。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委婉地所说的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第一次获得了承认，因而向日俄战争又迈进了一步。9月，日本人取得了京釜铁路的修筑权，这条铁路是在1904年和大西伯利亚铁路同时完工的。

李熙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的失势

作为十九世纪朝鲜历史上两个突出人物之一的大院君于1898年2月逝世，比王妃多活了不到两年半。这两个人物的退出政治舞台，并未有助于皇帝本人的独立自主，只是使他落到了他的朋友、即那些在朝廷中身居显要的保守分子的手里。在独立协会的会员们毫无结果的改革政府的企图中，他们给予王室的种种特权以沉重的打击。结果是自由运动由于该年下半年大批改革者的被捕而陷于瓦解。

巴布罗福先生和林董先生

1899年，俄国将保罗·巴布罗福先生从北京调到汉城。巴布罗福在中国为俄国政府争取旅顺口和大连湾的租借以及争取在北满修筑一条与中东铁路相联接的铁路让与权，显然已经取得成功。这位外交家的调任汉城，表示俄国对朝鲜的兴趣经过前一年淡漠之后，又复转浓了。日本这时是以林董先生为代表，林氏的深思远虑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堪与俄国公使的生龙活虎和野心勃勃的意气相媲美。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爆发时止，俄国和日本一直是在朝鲜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互相倾轧的。

507

马山浦及其重要性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南部的马山浦，马山浦雄踞朝鲜海峡，拥有远东最优良的港口之一。1899年5月，巴布罗福先生在他的陆军武官陪同下，往访甫经辟为通商口岸的马山浦；在这里他会到了俄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马加罗夫上将。在测量了沿岸和港口之后，俄国人圈出了一大片处于军事要冲的地段，通知地方当局说，即将有一家俄国轮船公司前来购买。两个月之后，俄使馆

翻译官前往交涉买地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间隔期间，这段地已经卖给了日本人。在马山浦和汉城两地的抗议和威胁都证明无用，俄人不得不以一块不太合理想的地段聊以自慰。当他们企图在规定的三哩范围外购买一段地皮时，他们又由于林董先生以外国人不得在规定范围外购置土地一节提请朝鲜外务署注意，而受到阻挠。1901 年初巴布罗福先生试图租借距马山浦不远的镇海湾上的土地的举动，也告失败。日本人在马山浦和镇海的胜利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它事实上防止了在日本的大门前面发展一个海军要塞而把海参崴和旅顺口联成一气。

汉城的外交角逐

在汉城本身，俄日之间外交战的尖锐也不相上下。俄国先后在 1901 年 3 月和 5 月再度设法以亚历克塞耶夫顶替柏卓安而任海关的长官。由于英国代办和日本公使的联合力量，这些努力卒告失败，正如 1901—1902 年法俄两国的金融家力图和朝鲜政府商谈贷款，以期将朝鲜财政置于外国控制之下，从而取得采矿和其他让与权的情形一样。

北朝鲜的角逐

但是在北朝鲜，俄国却能对日本占上风。鸭绿江和图们江这两条河流构成朝鲜北部边界的大部分。依据 1884 年签订的一项条约，俄国已经从朝鲜取得了图们江的航行权以及庆兴的开放对俄陆路通商。当 1896—1897 年朝鲜王在俄使馆作客的时候，他给予他东道主以庆兴县附近的各矿开采权和其他让与权，为期十五至二十年不等。俄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日益强大，甚至连俄国货币都在当地通用了。但是在 1902 年不经许可就将电话线架设到庆兴境内的企图却归于失败，电线经朝鲜外务署下令拆除。但是在 1903 年巴布罗福先生却能作到将其朝鲜境内鸭绿江畔的义州和满洲境内的旅顺口及哈尔滨之间的电话线接通。但是，俄国一切谋求攫取京义铁路修筑权的企图都未

成功。这条铁路终于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筑成。

俄日两国对朝政策的背驰同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大有关系，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那项历史性文件的第一条中。在互相承认"中国和朝鲜的独立"之后，两国政府声明，它们注意到"英国之利益以关于中国者为主，日本之利益除在中国者外，尚有在朝鲜之政治上、商务上以及工业上之〔特殊〕利益"①。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

英日同盟和朝鲜

1903年，就朝鲜问题而言，两竞争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896年朝鲜王驻跸俄国使馆时所签订的伐木合同上达到了决裂点。在1897和1898年，俄国人曾在图们江流域采伐森林。他们突然在1903年4月通知朝鲜政府说，他们不久就要在鸭绿江一带进行采伐。现在他们将流域一词解释成把富有价值约五千万金元的木料的朝鲜一半地区都包括在内了②。双方曾经议定，以利润的一小部分拨归朝鲜国王，但却不准他的官员会同监督森林的采伐。

俄国在北朝鲜的伐木让与权

伐木工作主要是在盖马高原进行的。鸭绿江口附近的龙岩浦港则远在这个工业中心的南面。俄国这时派了一批穿便衣的士兵到这个地方。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也运到了。于是开始建筑据说是作伐木工人宿舍之用的房屋，而随即出现了二、三百名俄国兵。5月中旬，朝鲜政府力图使俄国人撤出龙岩浦，但巴布罗福先生却以要求保护俄人作为反建议③。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从旅顺口向鸭绿江对岸满洲境内的安东调动。6月5日，俄国海军司令斯塔克率同军舰四艘访问济物浦，一连勾留了五天。

1903年4月俄人来龙岩浦

509

① 录自《中日条约汇编》，外交月报社版，第853页。——译者

② 参阅葛利菲：《朝鲜：隐者之国》，第485页。

③ 法国人在暹罗曾奉行同样的策略；踵随湄公河流域的伐木权之后就在该河两岸行使起行政管辖权了。参阅本书第346页及以下各页。

在满洲，初以为俄国人是按照他们的诺言和协议实行撤兵，然而撤兵只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满洲和朝鲜的情形既如此，而中、朝两国的当政者又无法加以控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在圣彼得堡开始直接谈判。在讨论日俄谈判的结果以前，进一步估量一下满洲的事态是必要的。

2. 满洲的地位（1902—1904 年）

1902 年这一年是以俄军在整个满洲居于不容置辩的军事占领地位开始的。这样一种地位，对于所有其他各国的利益以及对中国的利益都充满了危险性。为抵制起见，英国和日本缔结了 1902 年 1 月 30 日的英日协定，协定的非正式谈判早在上年 4 月已经开始。这项协定有效期限五年，规定缔约国的任何一方为保护其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得采取必要行动；倘任何一方在采取这种必要行动时而遭到攻击，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守严正中立，并竭力防止其他国家参加对其盟国作战”；但“如有任何其他国家参加对该同盟作战，则他一缔约国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媾和时亦须相互同意然后实行”①。

1902 年 1 月 30 日第一次英日同盟

510

这个行动的直接结果有二：自 1895 年以来即有同盟关系存在的俄法两国，于 3 月 16 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明法俄同盟今后适用于远东；悬而未决的中俄关于满洲的条约于 1902 年 4 月 8 日在北京签字。根据这项条约，俄国明白地确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并允由中国重新在那里设官治理。俄国允于履行前订协议的条件下，在六个月以内撤退辽河以西一带的俄军，十二个月以内撤离盛京和吉林其余的地方，十八个月以内撤离齐齐哈尔。中国军队须先行征得俄国当局的同意，方得重新进驻交

俄人盘踞东满

① 参阅《中日条约汇编》，外交月报社版，第 853 页。——译者

还的各省；关于交还中国各铁路、修建新路以及赔偿俄方开支等事项，均另订专条。辽河以西地方以及山海关－营口－新民铁路根据条约均限于六个月内交还中国管理。营口应于1903年4月8日以前撤兵。但是营口的俄国当局仍完全居于占领的地位，撤兵并未如期实行，俄国人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由。而真正的理由却是俄国想作满洲的主人，一如日本已经在朝鲜作到的情形那样；俄国人也看到了日本拟向他们的优越地位进行挑战的朕兆。彼卓布拉左夫将军第一次正式提到鸭绿江流域的俄国私人伐木权，正是在这个时候。

“条约七款”

与此同时，俄国开始筹划以所谓“条约七款”的对华新协定（这件条约是俄国所矢口否认的），来巩固它在满洲的地位。俄国要求中国同意作为进一步从满洲撤兵的先决条件的这七款是：在满洲不得增设约开口岸或外国领事；在华北的公职中不得聘用非俄籍的外国人员；蒙古的行政地位继续保持不动；牛庄海关的税款继续存放于道胜银行；牛庄的检疫事宜由俄国人主持；俄国得保留旅顺口、营口、奉天电报线的管理权；满洲的土地 511 不得割让予任何外国。关于第二点，中国大臣们私底下告诉英国方面说，直隶也打算包括在禁用非俄籍外国人员的区域中。美国政府立刻对中国政府接受第一、二两点提出抗议，并保留对其他各点进行商榷。英国政府以接受俄国要求的危险警告中国大臣；日本则是一面警告，一面提出抗议。禁止在满洲开辟通商口岸和驻扎领事，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议约代表早已提出了开放鸭绿江畔的安东和大东沟以及奉天为通商口岸的要求。

俄国反对在满洲开放通商口岸

俄国的外交路线因本国政府的政出多门、事权不一，弄得比平常更加迂回曲折了：驻满洲和蒙古的领事官向外交部呈报；驻奉天、吉林和齐齐哈尔的陆军总督则对军政部负责；东方局势

的财政专家则向财政部汇报。军政和财政两部之间的竞争是尖锐的。前者决心在东方实行侵略政策和修筑战略性铁路；后者则同样坚决地要实行和平的经济渗透政策。这时军政大臣是克鲁巴特金将金；财政大臣是维特伯爵。沙皇倾向于侵略政策，并且往往是不通知他的大臣们而行事的，即如，举例来说，1903年7月指派海军司令亚历克塞耶夫为远东大总督一事，就是这样的。俄国的迂回政策不妨用对新口岸开放所采取的措施来予以说明。4月29日(1903年)，俄国外务大臣兰斯多夫伯爵通知美国大使说，决没有缔结任何条约，而且俄国也没有排斥其他各国现在满洲所享有的利权的意思，俄国大使也通知了海约翰先生。5月27日，俄国驻北京代办却通知中国大臣们说，在允许开放新口岸和指派领事之前，必须先与俄国政府洽商。6月4日，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向海约翰先生保证说，他的政府不反对开放口岸，并于6月6日应他之请，谈判在北京暂停，改在华盛顿举行。7月11日，俄国政府在华盛顿和伦敦两处正式撤回了对开放新口岸的反对，惟以哈尔滨为例外，因为哈尔滨关系于俄国铁路系统至为重大。至于撤回原案一节并没有照会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虽愿开放新口岸，但俄国一天不撤出满洲，则一天不愿实行。最后，海约翰答应接受，而庆亲王也同意提出一项正式保证，即条约(包括开放新口岸在内)将于10月8日签字。

512

中俄新约

4月的条约七款现在似乎已渐成过去了；但是在9月俄国又提出了一项性质缓和得多的新协定。日本以条件中有两项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立刻训令它的驻北京代表提出反对：一项是中国永远不将东三省的任何部分割让与任何外国；另一项是给以松花江沿岸的贸易权。日本对于俄国的迟迟不从满洲撤兵，已不能再事容忍。它最初要求俄国须从满洲完全撤出，并承认

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这项要求未被接受;于是它建议在北朝鲜划一道分界线,该线以北地区确认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以南则在日人的范围以内。俄国力图遵循它照例的延宕策略行事,但日本已经有了准备,拒不容许拖延。1904年2月6日,它断绝了外交关系,10日发出宣战书。

3. 远东的战争与和平(1904—1905年)

战争中的陆海战役

日本迅雷不及掩耳地动手了。2月8日,日本舰队在旅顺口外对俄国舰队发动进攻,并将它打败。俄国舰队突围未成,反而被封锁在旅顺口内。海参崴的舰队也被包围得很严,以致一筹莫展。日本方面不顾朝鲜在宣战前三个星期发出的中立声明,竟在济物浦登陆。到3月中旬,日本在济物浦和鸭绿江之间已经有十万人了。5月1日在没有什么抵抗之下渡过鸭绿江,5月4日第二军在貔子窝登陆,5月19日第三军在大孤山登陆。在5月之中,俄军屡战屡退,直至据守旅顺口的部队和北面的主力被切断为止。5月30日,日军攻占大连湾。于是开始围攻旅顺口,双方损失惨重。11月30日,日军不惜以严重的损失攻陷了二〇三米要塞,这个要塞把全城和港口完全置于控制之下。舰队试图逃出,有几艘船舰被击沉,另几艘负重伤遁去。1905年1月1日,斯托耶塞将军以要塞和守军向乃木(希典)将军投降。在这期间,野战尚在继续进行,并利用壕沟战把战事维持了几天。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罗哲斯特温斯基司令的统率下于1904年10月15日离利堡,经过许多波折,于1905年5月27日抵达对马岛海面。当日和第二日在日本海之战中他在那里受到东乡海军大将所部舰队的进攻,实际上遭到全军覆灭。

513

中国的中立

2月12日，中国发表了一项严守中立的声明。海约翰先生早就力劝采取这一措施，以期中国的中立及其行政完整得受尊重，而战争得以局部化并有所限制。同日，英、法、德、意各国使节同意发出一项内容相同的电报，促请各该国政府建议俄、日两国声明避免派兵进入直隶。各该国采纳了建议，两交战国同意照办，中国朝廷始放下心来。在接受这项建议时，俄国声称整个满洲必须包括在战区以内。

中国奉行中立

关于对中立国船舰执行中立的问题，中国由于没有认清它的中立义务基本上是行政警察性质的，而且不宜于提供外交讨论，所以开始做得很糟。在战争爆发之际，俄国炮舰“满洲人”号正驻泊上海。在1904年8月10日俄国海军从旅顺口突围之后，“亚斯柯德”号和“暴风雨”号也躲避在上海。照中国中立声514明，对这种情况规定的办法是，凡在四十八小时内不离境的交战国船舶，应即下令拘禁。中国却没有遵照声明采取行政措施，反而陷入了冗长的谈判。最后，船只被解除武装和拘禁。中国当局从这次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在罗哲斯特温斯基海军上将的舰队抵达东方海面之后，就为海军统帅委派了一个精通中立事宜的顾问。1905年5月，有几艘为俄国舰队执行职务的运输舰抵达吴淞。统帅叶提督立时宣布它们为兵船，限它们在立即开行和听受拘禁这两者之间抉择其一。关于中国在履行中立国责任方面并不受交战国治外法权原则的限制这项重要原则，已见诸实行。在这以前，1904年8月11日有几艘船舰从旅顺口逃出。其中的一艘驱逐舰“刚毅”号避难于芝罘约开口岸。这时，萨提督统率的三艘中国巡洋舰正在芝罘。在二十四小时内，“刚毅”号就听受拘禁，它的解除武装工作事实上也已经办竣。薄暮之前，有两艘日本驱逐舰进港，进行了一番侦查之后离去。薄暮

以后，这两艘，也许是另两艘，又驶回港内，停泊在中国军舰附近。萨提督亲自往访日本高级军官，将“刚毅”号已被拘禁一节当面告诉他，日本舰长答复说，他即将离港。在早晨三时前后，日方不顾船上中国守卫官员的抗议，突将“刚毅”号夺去。俄人起而抵抗，据说双方略有伤亡。中国中立所遭受的这个重大侵害行为，始终没有得到补偿。

为维持中国的中立，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关，甚至连上文所述的事情也是由两个口岸的税务司负责承办的。这是第一次要求中国保持它本身的中立，但是由于它本身没有力量以及它的官员们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以致虽有严守中立之心，只能一无所恃地、手忙脚乱地做去。中外商人都想抓住这个有额外利润可图的机会，凡是有机可乘的人都不分厚薄地以供应品供给双方，以致两交战国代表经常对有利于另一方的违反中立的行为提出抗议。

515

各中立国的公正态度

到 1905 年 5 月底，俄国舰队已经在东方海面上被肃清，俄国陆上部队已经从旅顺口被逐退到昌图府以北二十哩的地方，而且俄国本身已经处于一次严重革命运动的诞生阶段。1 月，局势已经明朗，干涉之说甚嚣尘上。在那个月里，德皇满腹狐疑，生怕俄、法、英合谋瓜分中国。根据他的建议，海约翰发出一项同文照会，要求各中立国约定，关于在缔和或在其他方面为交战国所作的任何效劳，它们决不为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这一层立刻为英、法、德、意各国所同意。

罗斯福总统与和平谈判

1905 年 4 月 5 日，德赉加赛先生以如能商定合宜条件，俄国即愿缔和之意，通知日本的驻巴黎公使。日本政府则转以“或需某国作友好的斡旋”之意，暗示给罗斯福总统。总统在作复时劝请日俄两国直接谈判，同时希望日本能在满洲遵守门户

开放原则，并将该地区归还中国。日本同意了这一点，并在5月初表示希望他能充当调解人——这项请求于5月31日正式提出。德皇在6月3、4两日，致文美国总统，表示愿支持他的和平努力。6月6日，沙皇本人同意举行和谈。因而于6月8日，罗斯福总统向俄、日两国发出同文照会，促请两国委派全权代表商讨和平条件，但否认有斡旋、甚或有参预和谈之意。两国政府立即接受，同意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但是因为在8月的酷热季节，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地点比较合宜，会议就在那里举行。

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条约

俄国全权代表维特和罗善男爵大体接受了对战争的仲裁，凡有关朝鲜和满洲的各点随即达成协议。日本在朝鲜的"政治上、军事上及经济上之卓绝利益"获得承认。两国应即撤出满洲，完全交还中国治理，惟转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租借地不在此限。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门户开放原则均经明文予以承认。俄国将自旅顺口至长春的铁路让给日本，但仍保留长春以北的铁路。这时麻烦发生了。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男爵和高平小五郎先生一意要收取胜利的果实。日军只占领了库页岛的南部，而全权代表却要求将全岛割让；此外，他们还要求十二亿日元的一笔赔款。俄国全权代表既拒绝赔偿战费，也拒绝割让国土。8月25日谈判陷入僵局，俄国全权代表已经奉到如于29日以前未取得圆满协议即结束谈判的措词坚决的命令。8月27日，罗斯福总统为努力确保和平，致电德皇，要求他促请沙皇在不赔款和以库页岛北部归还俄国的基础上缔和，至于对归还库页岛如何付给报酬，则不妨留待以后商决。同时，美国总统向日本全权代表缕述理由，劝喻他们去争取那样内容的一道训令。沙皇发出了缔和的命令，日本方面在8月29日的会议上不但没

516

有提出赔款的要求①，而且提议以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北的一半归还俄国。朴次茅斯条约于是在9月5日签字。

① 8月12日，英日同盟条约在伦敦续约，虽然续约一事是直到朴次茅斯条约签字以后方才公布的，可是日本由于有了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受到他国攻击时，另一方应援助其同盟这一项规定，得到了防范俄国报复战争的保障。仗着英日同盟的续约，日本才能放弃它也许原不指望收到的那笔赔款。

517

第二十五章　1905—1914 年的远东 —— 日本、暹罗

1. 影响到东亚的条约和同盟

罗斯福总统对德法的警告

既然知道俄法结盟以及德国对中国的兴趣，又坚信就防止俄国在亚洲大陆上向东南扩张而言，日本正遵循着一个对美国有利的政策，罗斯福总统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很客气然而很露骨地向德、法两国表示，如果对日本有和 1895 年发生的情况相似的举动，他必予日本以支持①。法、德两国任何一方的干涉，必然也会使英国依照 1902 年英日同盟的规定，给它的盟国以援助。所以，罗斯福总统对这两个欧洲国家所提出的警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事实上使他的国家已成为英日同盟中的一个不声不响的、不具名的伙伴。美国总统的措施还不止于此。7 月 29 日，即英日同盟续约前两个星期，罗斯福政府的陆军部长维廉·塔夫特先生在东京同日本首相桂(太郎)伯爵有过一次会谈。这次举行的会谈是桂太郎发起的，他亟于想使美国成为英日续盟中的一个匿名伙伴。日本是急于要使它在朝鲜的政策不受美国方面的干涉。后者想尽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维持远东各国独立的政策，以前曾经使日本受惠不浅，但现在却有妨害日本之虞了。在远东既有一个高奏凯歌的日本，罗斯福总统对菲律宾的局势就不免多少有点焦急；何况，他已预见到并担心日俄之间会

美国和第二次英日同盟的关系

① 参阅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 2 页。

达成"谅解"或缔结同盟。

日本的放心 518

日本方面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至少在六个月以前就已经得出了朝鲜的积弱和腐败终必自陷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这样一个结论。桂伯爵这时得知，如果"日军在朝鲜建立的宗主权，只以要求朝鲜非经日本同意不得缔结对外条约为度"，罗斯福总统并不见得会出面干涉。为换取这项使人放心的消息，日本首相正式提出了他的国家对菲律宾决不抱任何侵略野心的保证。塔夫特和桂伯爵之间这种交换意见的结果，是直到 1909 年 3 月 4 日罗斯福总统下台时为止，美国事实上成为第二次英日同盟中一个匿名的伙伴了①。

亚洲和欧洲政治间的相互关系

1904 年 4 月，英、法两国在英法协约中靠拢。在东方角逐的结果是加强了这种友好的谅解。俄国这时已不复成为英国的一个经常威胁，而且也渐渐不能再在法国的摩洛哥政策上予以支持了。在另一方面，德国却渐渐成为英国的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和法国的劲敌。这曾经是促成 1904 年英法携手的一个因素，并且在翌年英日同盟续约中也起了一部分作用。

1905年英日同盟的目的

1905 年夏季续签的英日同盟的目的，在条约序言中申明如下：

1. 巩固和维持东亚和印度的全面和平；

2. 保全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各国在华商业和工业的机会均等原则，以保持各国在华的共同利益；

3. 维持两缔约国在东亚及印度的领土权利，并防卫它们在上述地区的特殊权益。

1902 和 1905 年两次协定序言中的最重要区别是一面将朝

① 丹涅特前引书，第 5 章及第 317 页。

1902年和1905年盟约的区别 519

鲜略去不提①，一面将印度列进第二次协定的序言范围之内。条约正文中也有了根本的变更。据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之一方，若非衅由己开，而因其它一国或数国的攻击或侵略行动，致为防护其在本协定序言中所述的领土权利或特殊利益而至于开战，不论此项攻击或侵略行为发生于何地，另一缔约国应立即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并以互相协议的条件媾和。"这种盟约的加强不仅是以可能策划一次报复战争的俄国为对象，而且也是以正在摩洛哥压迫法国并很可能在远东成为一个危险根源的德国为目标的。

1907年的法日协定

下一个理所当然的步骤自然是法日的携手了。这一步是由两国代表于1907年6月10日签订的一项协议来进行的。根据这项协定，两国政府同意尊重中国的独立和完整。两缔约国声明它们特别关心维持与各该国领土接壤的"中国地域"内的和平与秩序，故约定互相协助，以确保该地区内的安宁，并维持"两缔约国在亚洲大陆上各自的领土权利"。今后日本臣民得在印度支那享受最惠国待遇。尽管这项条约看来是无害的，它却把日法两国仍然奉行"势力范围"政策这个事实记录在案了。它的效果是消除了法国政府自1904—1905年战争以来对日本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所抱的疑惧，并加强了英、法、日三国在东方的地位。

1907年的第一次俄日协定

现在只剩下英俄和俄日各结友好同盟来完成在欧洲对德国的包围，并将它排除于一个亚洲国家和三个欧洲国家不顾门户开放原则而将控制中国的那个集团之外了。走向俄日携手的第一步是1907年7月30日两国签订公开协定时采取的，在那项协定中，允予维持门户开放原则，并且缔约双方承允"尊重彼此

520

① 关于1905年盟约第三条涉及朝鲜的规定，参阅第502页。

现时领土的完整,以及因两国各自与中国缔结的现行条约、协定和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权利……”与此同时,两国还签订了一项密约,从而澄清了该两国与朝鲜,满洲和蒙古的关系。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再度为俄国所承认,而俄国在蒙古的利益这时也第一次明白地为日本所承认。在满洲,以嫩江往东的河道作势力范围的分界线①,日俄两国协议互不在界线以北或以南各自谋取任何铁路或电讯的让与权。这样,在日俄战争之后——以及在日本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其决在满洲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并以该地归还中国的保证之后——不到两年的工夫,以前的这两个敌国,竟以友好的姿态协议共同以中国为牺牲而继续实行它们的侵略政策了。

日俄协定签字一个月之后,英俄协定于1907年8月31日签字。根据这项协约,两国(1)厘定了它们在波斯的势力范围;(2)议定了英国得凭以控制阿富汗对外关系的一项对该国的政策;以及(3)承认西藏的领土完整和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为了抵消欧洲大陆上的德、奥、意三国同盟,现在有了应用于东、西两半球的英、法、俄、日之间的诸协定。对罗斯福总统所给日本的诺言毫不知情的德皇,为图抵制起见,在1907—1908年曾努力谋求一项德、中、美三国的协约,而这项协约应有俄国予以支持。总统对这个方案虚与委蛇;而中国又行动迟缓——以致德国的计划归于失败。翌年11月,根据鲁特-高平换文,美、日两国重申其遵守门户开放原则之意。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下文中可以看

1907年的英俄协定

1908年的鲁特-高平换文

① 日俄密约附款规定:“本约第一条所述北满与南满之界线,议定如下:从俄韩边界西北端起画一直线至珲春,从珲春画一直线到毕尔滕湖(即镜泊湖),再由此画一直线至秀水甸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与洮儿河交流之点,再由此点起沿洮儿河至此河横过东经一百二十二度止。”——译者

出①。

在东亚方面缔结同盟的下一个步骤，是由俄日两国在1910年7月4日进行的。早开始于三年前的这项政策持续了下去，但这时由于美国建议将满洲的铁路中立化而几乎是直接以美国为目标了②。俄国和日本在缔结另一项公开协定时，又附加了另一个密约。根据该协定，两国互相承允维持满洲的现状，特别提到各该国在满洲所控制的铁路。根据差不多十年后方为世人得知其内容的这项密约，缔约双方承允互相支持，以增进其1907年密约在满洲所划定的范围内的特殊权力的利益③。

1910年的俄日协定　521

1911年英日同盟第二次续约

1911年7月13日，英日同盟第二次续约。新约将至少继续有效十年。倘于条约废止时，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正在交战之中，则条约当继续有效至缔和时为止。先失效日期四年而续立盟约是有若干理由的。自从1904年以来，德国的政策一直就是力图在任何两个以共同行动妨碍其取得世界权力的任何计划的国家之间，挑起纠纷。摩洛哥问题曾经从一个危机渡到另一个危机，因而第三次盟约在阿加迪尔事件两天之后签字并不是偶然的。局势的另一方面是，尽管自1907年以来俄英两国就存在着友好关系，1910年沙皇的访问波茨坦未必不会增加英国政治家精神上的不安。在同盟本身之中，另外还有英国所希望消除的一个可能有的弱点。这就是一旦日美之间发生战争，英国有可能陷入尴尬的地位。

提早续约的原因

1911年盟约的文句和1905年盟约相似，不过有三项显著

① 参阅本书第511页。

② 参阅本书第512页及以下各页。

③ 1907和1910年的两项条约中所概述的政策，显然产生了1912年6月25日所订第三次密约和1916年7月3日所订第四次密约的效果——后者比前三次密约的范围更广，约束力也更强。

的例外。所有提到朝鲜的字句都删略了。除去序言而外，凡提到印度的字句也一并删去了，因为1907年俄英间的条约已经大体消除了作这项规定的必要。最后，第四条规定："若缔约国的一方与第三国缔结普遍仲裁条约，则在此仲裁条约有效期间，本约任何规定都不得使此缔约国负有与该第三国交战之义务。"①

522

1905年和1911年盟约的异同

在这里所提到的在世界大战前夕正属有效的各种盟约之中，显而易见，英日同盟和日俄同盟是最具有重要性的。一个是一项公开的同盟条约，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秘密协定或背后的一套陪衬；另一个似乎也是无可怀疑的，然而时间证明其并非如此。美国维持东亚各国的独立以及在各该国内经济机会均等的政策，在1905—1914年之间的成败如何，现在不妨谈论一下。

2. 日本的扩张——兼并朝鲜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日同盟签字所经过的这段期间内，俄国和日本之间进行了一次战争。在这场恶战爆发之际，日本天皇宣布说："帝国之置重于韩国之保全［实非一朝之故，是不仅因两国累世之关系］，韩国之存在，实为帝国安危之所系。"②十三天以后，即1904年2月23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了一项议定书。朝鲜在海军提督李舜臣时代曾经轻蔑地拒绝日本假道以征伐中国，现在为了换取皇室的安全和国家的完整与独立的保证，同意充作日本的盟国并在内政上遵照后者的意见行事了。一个月以

日本维持朝鲜完整的意愿

523

① 在这时候，英美两国政府之间正在商谈一项普遍仲裁条约。美国参议院未予批准；因而，倘美日两国发生战争，则可能英国会应邀对美作战。1914年9月15日英美两国缔结了和平调查委员会条约，这虽不是一件普遍仲裁条约，却被英国政府解释为属于1911年盟约第四条规定的范围以内。参阅丹尼斯：《英日同盟》，第58—62页。

② 录自旧译之日皇宣战诏，见《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203页。——译者

前所建立的中立的门面，现在丢开了，事实上，朝鲜已变成日本的一个保护国。今后所用的“独立”这个名词，不过是客气的虚套而已。

日本对朝鲜的方策

日本人给朝鲜政府和人民的第一个印象倒还不错。但不久就开始了另外一章。无数的商人、工人和恶棍继日本纪律严明的军队而至，这些人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不远千里而至南部各州的那些想白手起家的事业家并无不同。这第二批不速之客大部分是由日本的最低阶层构成的，他们在国内一直是屈居人下，却很快地就对他们开始视为己有的那个国家的本地人作威作福了。以日本人来开发这个国家的荒地的计划已经透露出来；这种暗示引起了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阶级的愤激的反对。为图抵拒日益增长的日本人的势力，朝鲜人纷纷上书皇帝，并且组织了保安会。朝鲜工人这时开始拒绝为北部的日军服务，并且朝鲜人几次对日本向战场输送军队和给养的铁路发动进攻。这种进攻是以为首者的就地正法加以惩处的。7 月，日人开始设法取缔保安会并制止陆续不断的奏章。六千日军进驻汉城，接着日本第一次示意朝鲜君主，希望撤回该国驻外代表，以日本外交机构来处理对外事务。但这项计划暂时并未力逼付诸实行。

1904 年 8 月 22 日的议定书

8 月 22 日，两国商定了增补 2 月 23 日议定书的一项新议定书。这时朝鲜承允聘用日本财政顾问，管理一切财政事宜。朝鲜外务省增设由日本政府推荐的外籍外交顾问，凡朝鲜外交方面的一切重要问题均须向他谘询。这时朝鲜政府非征询日本政府的意见，就不能同外国缔结协定了。在这年的下半年，大将长谷川(好道)子爵奉派去朝鲜掌管军务；目贺田(种太郎)先生(后封男爵)至朝任财政顾问；美国人史蒂文斯从东京来担任外

524

务省顾问的职务。

1905年朝鲜的改革

在1905年这一年，日本的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独断独行。大体说来，目贺田的财政管理是为朝鲜的利益着想的。他提出了一种新币制。旧币制度一直是任何文明国家中最糟的一种——糟至如此的程度，以致某英国领事正式报告说：朝鲜货币可分为真币、良伪币和劣伪币数种，而伪币之劣，只有在黑暗中才混得过去。不管这种改良是如何需要，新币制的采行却不是没有相当困难的。数百万枚伪辅币从日本带到朝鲜。中、日商人利用朝鲜货币的贬值而进行投机，老百姓大遭其殃。最后决定要在日本募集一大笔债款。因此，朝鲜的金融家为使国家不致沦为日本的债务国，愿以低于日本银行所要求的利率，贷款给他们的政府。对于这一点，日本不肯同意①。甚至皇帝也无法帮助他的那些陷入经济困难中的商人，因为日本财政顾问竟禁止兑付他的支票。

没收土地

土地的没收变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日本人并不限制他们自己开发荒地。汉城附近有八平方哩的有价值的土地为了军用而被夺占——十六倍于军事专家认为必需之数。在平壤也有大量土地被夺占。以伪造的地契驱逐合法业主或殴打业主至不得不按远低于土地原价的数目出售田产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为了保全他们自己，很多人都以纯粹虚有其名的价格将家宅卖给外国人，以期免于没收和受辱。朝鲜人横遭殴辱杀害而没有要求赔偿的机会。

525

其他改革

朝鲜政府被迫给予日本人以沿海的渔业权，以及沿海和内河的航行及通商权利。日本依据4月间强迫签订的一项合同接

①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的胶济铁路谈判中作出了这种政策的另一个事例。参阅第664页。

管了邮政、电报和电话系统。日本用宪兵来控制政治活动。戒严法实施了。城镇一律起上了日本名字。虽然在日本和朝鲜都禁止吸食鸦片，日本经销商却开始深入内地去出售吗啡给朝鲜人民。

日本安然执行着这类的政策。大多数列强认为朝鲜积弱无能，以致不能采取明智的策略以求自保，乃是远东和平经常遭受威胁的原因。皇帝本人也显不出有任何能力来运用高出于阴谋诡计的外交。皇帝和他的大多数大臣，自始至终都是毫无定见地依违于国际条约的虚无飘渺的保证，那些条约虽保证朝鲜的独立，并且就 1882 年的美国条约而论，答应过遇有外来的危险，当设法调处，但却没有载明朝鲜保持中立化的任何规定。专想依赖外国的帮助，而自己却并不采取任何步骤，这是如何的愚昧无知。以这类的话向朝廷提出警告，却是充耳不闻。这位皇帝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在 1905 年 1 月 28 日致海约翰国务卿的一件公文中曾经写过："我们不可能为朝鲜人反对日本而进行干涉。他们不能为自己的防卫挥拳一击。"这位皇帝也不知道 1905 年英日同盟第三条有这样的规定："日本在朝鲜拥有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卓越利益，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为保护和增进此项利益，有采取其认为正当和必要的措置，以行使指导、管理和保护的权利，惟此项措置须不违反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位皇帝也不能知道英国外交大臣澜斯登勋爵曾于 9 月 6 日以最近的续盟一事分函英国驻圣彼得堡和巴黎的大使说，朝鲜"由于和日本帝国毗邻，以及不能独自生存，一定要沦于日本的控制和保护之下"。朴次茅斯条约中所作的关于日本在朝鲜应有"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卓越利益"的规定，在李熙皇帝看来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

日本何以能在朝鲜自由行动

526

同盟、调处和干涉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朝鲜人决不是很清楚的。1882年薛斐尔条约中的调处条款只是说：若他国同朝鲜发生任何纠纷，一经知照，应即在外交上进行调处，并力谋与争国之间达成协议。1904年2月23日和8月22日的日韩协定已使调处条款失效。在这两项协定未生效以前，这位朝鲜皇帝曾向罗斯福总统求援，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给予任何援助的。

朝鲜朝廷对国际法的无知

1905年11月初，伊藤侯爵抵达汉城，他受权强迫这位朝鲜元首同意日本接管朝鲜对外关系的整个管理权，包括对一切现行条约的履行在内，并允于汉城设日本统监一人，统辖外交事务和监督日本驻韩官员。11月17日夜，皇宫为日本警宪所包围。在用尽了各种精神上的、纵非实际物质上的压力以求取这位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诺许之后，伊藤侯爵在大将长谷川子爵和林权助公使的赞助下，谋取到在那项新协定上盖了印。最后，议政府参政大臣韩圭卨拒绝同意，并获准辞职。至于皇帝李熙是否同意，则殊可怀疑。如果他同意过，那一定是想到了十年前闵妃的遇害，因为不到十天，他就授权从中国（以规避日本人控制的电报线）发送一份海底电报，内容如下："余兹声明，朝鲜和日本最近缔结的所谓保护国条约，是在刀剑胁迫之下要挟而成的，所以无效。余从未允准，也决不肯允准。此致美国政府。"

1905年11月17日的条约

朝鲜皇帝否认条约

527

当朝鲜和日本的关系宣告变更后，凡在汉城设有使馆的各国政府立即撤销使馆。翌年，伊藤侯爵奉派为驻朝鲜统监。没有一位官员能比伊藤这位年老的政治家膺选更为相宜了，他固然忠荩了他的本国，对朝鲜人民却是友好而同情的。他的政策是尽可能的抚绥政策。为了实行这种政策，他准许朝鲜人在法院控告日本下等社会的滋事者的讼案有时得到秉公处断，并命令将许多侵害朝鲜人最为穷凶极恶的日本人遣回本国。日本人

外国代表撤出汉城

伊藤侯爵任驻朝鲜统监

这时完成了从汉城至满洲边境的铁路线以及为便利日本军队在半岛上的调动和进入满洲所必需的其他铁路线和军用公路。日本顾问和官员渐渐地控制了政府的各部门，而统监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独裁者。西方国家的顾问一律解聘，其中包括柏卓安先生。

日本在朝鲜的"同化"政策

日本人认为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以朝鲜人作为一个分开的异族来统治，要么就使他们（计有一千二百万人口）和日本本身同化。它选择了后一种办法。公布了种种禁令：鼓励男子断发髻，至于官员，则通令遵办；人民禁止在冬季穿着白色衣服；朝廷命妇则采用西式服装。日本军方对西方各国的旅朝侨民以及朝鲜人本身则采取了一种压服的政策。遭到侮辱并有时受到人身攻击的，不仅以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男女传教士为限，但以他们为尤甚。

对1907年海牙和会试作呼吁

在 1906 年夏至以后，朝鲜皇帝事实上已经是日本顾问的亲日的朝鲜廷臣掌握中的阶下囚了。1907 年的海牙和会似乎给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可以在列强的面前申述其委曲，并否认 1905 年条约的约束力。在夏初的时候，这位皇帝极端秘密地派去了三位高级的朝鲜人，并偕同一位久居朝鲜且富有阅历的美国人荷马·胡伯特先生。胡伯特曾于两年前徒然地把这位皇帝抗议日本对朝鲜日甚一日的控制的私人呼吁带给了罗斯福总统。向 1907 年海牙和会发出的呼吁一无所获；日本人是能够阻挠对朝鲜问题的听断的。

528

1907年7月24日的条约

然而，这次遣使并不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控制的内阁在统监府举行过一次会议之后，要求李熙皇帝禅位。皇帝拒绝。但是，经过通宵的会议，皇帝终于在7月9日晨被迫让位给那个意志薄弱的皇太子了。7月24日，日本和朝鲜签订了另一项条

约。在六项简单的条款之中，规定"韩国政府关于施政之改善，受统监之指导"，"韩国高等官吏之任免，须经统监同意行之"，"韩国政府(须)佣聘统监所推荐之日本人为韩国官吏"，"韩国政府未得统监之同意，不得佣聘外国人为韩国官吏。"①

这位新皇帝李拓在继任之后不久而尚未登极时，就下令解散朝鲜军队，以便成立"一支精锐的部队"。在这期间则以日本军队维持秩序。这道命令在 8 月 1 日导致了一次规模虽小但死伤很多的兵变，但不久就平定了。可是，朝鲜东南部山区中爆发的一次叛乱却不是那样容易平定的。无数的农民、猎户，在简陋的武装之下开始了游击战，战事一直蔓延到大约半个朝鲜都枕戈待命时为止；这次叛乱使日本在 1915 年扫平叛乱以前不能不调用军队达二万人之数。

对抗日本人的群众起事

李熙禅位之后，伊藤侯爵晋升为公爵。就在这一年，他辞去统监职，而以曾祢(荒助)子爵继任，曾祢继续实行伊藤的政策直到 1910 年。对于朝鲜的名誉殊为不幸的是，有些朝鲜人决意对他们所认为的仇人实行暗杀政策。1908 年，曾任外国顾问的史蒂文斯在旧金山遭暗杀；翌年，即 1909 年，伊藤公爵在哈尔滨被刺。这些犯罪行为使朝鲜在两方面受到损害。第一，过去一直孜孜不倦地在国外散布的那种朝鲜人无决心、也无能力实行自治的说法，现在似乎得到了证实；第二，久已谋求永远兼并和同化朝鲜的日本军方，占了上风。1910 年 7 月，寺内伯爵奉派至汉城任统监。他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又是参谋本部的一员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的陆军大臣，这位新统监实行了一种和恐怖主义相去无几的政策。报纸勒令停刊，密探到处皆是，逮

政治暗杀及其后果

529

寺内伯爵的政策

① 录自《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 5 卷，第 78 页，转引黑龙会主编：《日韩合邦秘史》，第 329 页条文。——译者

捕者不计其数;宪兵和军队又复从日本源源开来。最后的一些措施是在8月中采取的:皇帝李拓让位,他的国土合并于日本,以及改统监为总督。合并条约于22日签字,一个星期之后,正式宣布韩国已成为日本的朝鲜省。朝鲜现在已不复是比利时,而成为远东的爱尔兰了。朝鲜和列强所缔结的关税条约得继续有效十年,新政府于10月1日正式成立①。

3. 日本对满洲的扩张

朴次茅斯条约中的满洲

根据1905年9月5日订立的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和日本同意撤出满洲,将该地归还中国,但辽东半岛不在此限。对该半岛原有的至1923年期满的二十五年租借权一概转与日本。对于中国的主权和门户开放也作有明文规定。在条约的第三条内,俄国政府申明,"在满洲之领土上利益、或优先的让与、或专属的让与,有侵害中国主权及有违机会均等主义者,一概无之。"此外,俄国与日本还约定,"凡中国在满洲为发展商务工业起见,所有一切办法,列国视为当然者,不得阻碍"②。同时,两国又一致同意"在满洲地方各自经营专以工商业为目的之铁道,而决不经营以军事为目的之铁路"③。

530

1905年12月22日的小村条约

12月22日,日本同中国签订了小村条约,按照条约,中国同意朴次茅斯条约内涉及的各项移转和让授的规定。日本方面则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尽力遵行"④。小村条约中的限制条款的后果是:日本在满洲获得了自由行动的

① 关于兼并朝鲜的重要意义的解释,请参阅洪倍克:《当代远东的政治》,第214页。

②③ 录自东亚同文会:《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编》,第983页。——译者

④ 录自《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的第三款原文,见海关编:《中外条约汇编》,第2卷,第637页。——译者

机会，这就开始了那个关闭开放的门户的过程。在1905年以前，日本对于德国在山东和俄国在满洲有破坏门户开放政策的行动曾啧有烦言，而现在这类行动却被当作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先例了。

满洲的海关

大连海关迟迟未曾成立，使得日本商民不付进口税和厘金而输入大量商货，海关之所以久不建立，据说是因为俄国迟迟不允在北满边界设立海关的缘故。尽管从北部输入的商货在同南部输入的商货相比之下，数量微不足道，但是，那些不得不在牛庄缴纳税款，因而与日本商民难以竞争的其他各国商人，对此也并非没有烦言。在1906年9月1日以前，大连一直没有宣布作为通商口岸，因而，日本商船独享该口岸的进口权为时几近一年。直到1907年7月1日，根据中日两国所达成的以日本租借地关东作为免税区域，以及凡运出该免税区的商货均应缴纳关税这项协议，海关问题方始得到解决。不久之后，中俄边境上也设立了关卡。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

由于朴次茅斯条约的订立，日本接收了行驶于旅顺口与哈尔滨之间的属于长春以南的那一段铁路，全长在五百哩以上。在北满的其余铁路线，通称中东铁路，约长一千一百哩，则仍旧归俄国管理。1906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根据日本政府的敕令组织成立——这个股份公司在建树帝国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堪与过去三个世纪欧洲各特许公司所起的作用相比拟。公司的资本定为二千万英镑，其中一千万英镑由政府拨付，二百万英镑公开认购，其余之数则于1907和1908年在伦敦发行债券。债券本息由官方予以担保，社长、副社长和理事均由政府任命。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铁路沿线两旁约十七哩的铁路地带以内的土地与房屋；管理电气、煤气和水的供应事宜；管理学校、医院和

531

铁路的权益和权力

旅馆；经办轮船航线事业；管理港口码头；并开采燕台和抚顺的煤矿。在 1919 年改组以前，管理租借地及南满日本全部势力范围的是关东都督，都督一职须以陆军中将或大将充任。关东都督府承东京外务省的监督，保护并管理铁路，以及租借地的军队和行政事宜。在 1919 年，以文职官员担任长官的一个称作关东厅的民政府代替了以前的军政府。这时，关东厅长官是兼管租借地和铁路的。

满洲的总督职位

整个满洲的面积有三十六万三千至四十万平方哩的种种不同的估计；人口约二千四百五十万，而具有维持一亿人口生活的潜力。在 1907 年以前，中国将满洲分为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管理。由于日本人的侵略姿态，中国于 1907 年 6 月将满洲提升为总督辖区，希望借此统一事权，进行改组，以应付外患。后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奉派为总督，驻节奉天，而以袁世凯的宠信唐绍仪任奉天巡抚。奉天省的奉天既是总督驻节的所532 在又是省城。美国在这里派由总领事司戴德驻扎，他曾任美国最后一任驻汉城公使的秘书，对于日本用什么方法将朝鲜置于它的统治之下，曾经极关切地予以注意。

司戴德和哈利满

司戴德是哈利满的一个朋友，他希望通过哈利满来阻止日本的侵略，保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并利用吸引美国投资的方法，以维持门户开放。在 1905 年，朴次茅斯条约缔结之后不久，哈利满想出了一个建立和控制环绕世界的运输系统的计划，所以同伊藤侯爵和桂太郎侯爵订立了一项初步谅解，旨在将南满铁路，连同其附属的伐木业和矿业的特许权，归由日美两国在日本法律管辖之下共同经办。小村男爵于谈判和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回国之后，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在 1905 年 12 月间，他同中国议约的顺利完成，将他本国的地位加强到了不再需要依赖

哈利满－伊藤－桂太郎计划

美国资本和共同经营日本在满洲的铁路线的地步。因而，哈利满就接得通知说，中国政府不肯同意美国参加经营满洲的铁路。1908年，唐绍仪否认小村男爵曾以哈利满－伊藤－桂太郎的计划征询过中国的意见。

在满洲的铁路外交

正是由于通过铁路的发展——也可以说，通过对这种发展的阻挠——日本才能无视门户开放政策，在满洲伸张并维持它的特殊利益，所以回顾一下修建新路计划的讨诸实行或遭到阻挠的步骤是有必要的。早在1898年，中国就已经筹划延长它在满洲的铁路线，但因日俄战争而拖延下来。1907年夏季，徐总督和唐巡抚到达奉天之后不久，司戴德总领事就向他们提出以美国资本修建满洲的铁路和从事其他开发事业的问题。唐巡抚赞成以二千万美元的资本，设立一个官办银行，通过这个银行将所需的资金来供给这些事业。由于美国发生了一次财政恐慌，哈利满先生无力考虑这个计划。结果是，在11月间，另行商定由中英公司同意接济资金，由英国的一家铁路建筑公司在奉天的富饶而未经开发的地区修建一条铁路，从华北的帝国铁路北端的新民屯到奉天西北约五十哩的法库门，全路计长五十哩。这是计划日后展修至中东铁路上的齐齐哈尔，再由齐齐哈尔延展至满洲北边黑龙江畔的瑷珲的一条铁路线的第一段。

533

拟议的法新铁路

日本的抗议

日本以这条路线势将与南满铁路的一部分平行，因而同它根据朴次茅斯条约和1905年12月的小村条约所得继承的权利直接发生抵触为由，在北京提出强硬抗议。日本声称，在小村条约之后附有一项议定书，规定中国"于该路[即南满铁路]收回以前，不能于该路附近另设并行之干线，或侵害该路利益之支线"①。

① 录自日本照会原文，见《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93页。译者

英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政府根据1905年的续约，对日本政府负有义务，所以现在所采取的态度是，拟修建这条铁路的银团必须证明该路不致成为南满铁路的竞争线，而能使日本方面认为满意。这样，英国就给予日本以权利，来决定中国所要在满洲修建的任何铁路是否会成为竞争线，从而极其有力地帮助了日本巩固它在满洲的地位。

日本提出抗议的根据

事实上，日本的抗议是以战略上的理由作为根据的，尽管在朴次茅斯条约中作有在满洲经营铁路专以"工商业为目的"的规定。日本强迫中国为修造这条铁路而向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借款一事，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它意在控制在南满所拟修建的一切铁534路。日本的阻挠修建法新铁路，清楚地表明了它在关闭机会均等之门和奉行过去它在表面上不惜为之同俄国一战的封锁政策上，得到了成功。

1908年中国在满洲的目的

与日本抗议修建法新铁路的同时，中国决定自行设立宣传机构，以抵制其邻国关于满洲的宣传运动的影响。这个原出自司戴德的主意在1908年1月首次付诸实行了。在推行这个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其他一些计划，其目的都是要借维护因英美投资而产生的国际利益以确保中国在满洲的主权。3月间，徐总督在奉天召集东三省的巡抚，会商筹借外债以开发满洲的问题。8月，唐巡抚会同司戴德总领事提出了一份合同草案，内容与前经拟定但由于上一年美国财政恐慌以致未能实现的草案相仿。

1908年唐绍仪出使华盛顿

美国政府于1908年5月25日将庚子赔款美国份额的一部分退还中国一事，给了清廷一个以表达中国的谢意为名，而派遣唐巡抚赴华盛顿的机会。事实上，这个使节的目的是同美国政府洽商中、德、美三国同盟问题①，谈判满洲借款，并安排以退还

① 参阅本书第497页。

的庚子赔款用于满洲经济开发事宜。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连串不幸的偶合事件使唐氏所负使命惨遭失败。

日美不和的前兆

尽管美国银行家曾在战时资助过日本，尽管美国政府抱着善意的中立态度，坐视日本击败俄国而将朝鲜囊括而去，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之初，日美之间的关系就紧张过不只一次。姑且不问日本政府所指望得之于朴次茅斯条约的是什么，一小部分大声疾呼的日本人民却认为日本之未能向俄国勒索赔款，应当由美国负其责任。在美国太平洋沿岸，日本人继排华法案和夏威夷群岛的兼并而涌入美国，造成了激起种族交恶的后果，这一部分是经济性的，一部分是社会性的。在1894年的美日商务条约中，美国实际上保留了限制或排斥日本移民的权利。这是远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愉快的。在1906年，日本学生被隔离在特设的学校里，就发生了旧金山学校问题。随后几年，美国总统经国会授权，防止日本人进一步由夏威夷、墨西哥和加拿大移入美国。他作了就美国条约义务而论是否合乎宪法的声明。当美国和日本由于种种摩擦，以致分道扬镳的时候，日俄之间达成了一项和解，正如1907年7月30日的协定所证明的那样。最后，在1908年2月18日，罗斯福总统同日本缔结了所谓"君子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日本同意签发愿往美国的日本臣民的护照，以适合于美国的限额为度。同年10月，美国舰队在环游世界的航程中，访问了日本，在日本和在中国一样，受到了优渥的接待，并且还发表了不少祝贺的言论。

535

1908年2月18日的君子协定

1908年11月30日的鲁特—高平照会

当美国舰队正在访问日本、奉天巡抚唐绍仪正在赴美途中的时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高平男爵却正忙于谈判换文事宜。这位大使于将近10月底时，以通过关于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换文来巩固太平洋局势的建议，就商于国务卿鲁特和总统。除非

记住1910年以前关于朝鲜独立的许多保证，以及在远东的联盟关系、协议和谅解的发展，那就可能看不清何以要进行换文，或者何以这类换文在表面上虽无关宏旨而事实上却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些换文值得注意的有三方面：谈判之匆匆进行以及在"中国的完整"一词上面略去了"领土的"这个形容词，以及使用"维持既存的现状"一词。在高平男爵迫不及待的情形下，将换文推迟至1908年11月30日签字，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唐巡抚于30日抵达华盛顿，午间见到了这些换文；下午四时，即行签字。尽管文内把缔约双方说成是"决意保全""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但省略了"领土的"这个形容词。至于"现状"一词，含义未作阐明，并且是指太平洋而不是指中国来说的。

换文的特点

536

唐氏出使失败而归

鲁特-高平换文清楚地表明，罗斯福政府已经改变主张而给予日本以在满洲行动的自由，一如在朝鲜的情形那样。唐巡抚的地位因11月中旬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逝世而大为削弱。故皇之弟醇亲王受命为他的儿子幼皇宣统的监国摄政王。这预示出袁世凯的失势已为期不远，而袁氏则是唐巡抚的举荐人。唐氏开始谈判，但一无结果，不久就返回中国了。

购买在满洲的俄日铁路之建议

朴次茅斯条约签字一年之后，中东铁路的俄籍官员以俄国有出让该路之意就商于美国的资本家。在1908年年底以前，又以俄国如出售中东铁路，是否也愿出让南满铁路一节询问日本。1909年1月日本对这项询问作了坚定的否定答复。

建议下的锦州—瑷珲铁路

对于日本在满洲的实力和它的计划的第二个考验，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利用美国资本和英国工程师的合作，在它本国领土上修建从北直隶湾的锦州到瑷珲的一条铁路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要维持在满洲的国际利益的一种尝试，而且也是哈利满力图推行其环球运输计划的尝试的死灰复燃。这一

条路线上没有任何地方是和南满铁路距离在一百五十哩以内的，所以，除了直达通车以外，它不致成为那条日本铁路的商业上的竞争者。然而，这条铁路若再平行地向西延展下去，就会使北京和西伯利亚与俄国方面更加可以直接有所联系，所以，在战略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尽管日本拒绝了考虑出卖满洲铁路一事，伊藤公爵显然仍旧赞成满洲各铁路管理方面的国际化。1909年8月，哈利满得悉俄国财政部长柯克甫策夫同意出让中东铁路，并且在远东之行以后，即将向俄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中国政府虽于10月2日签定了修建锦瑷铁路的初步协议，可是，人物的死亡再度对国际开发满洲起了阻挠作用。哈利满未作好实施他的计划的部署，就在9月9日去世了，而伊藤公爵同柯克甫策夫商讨了关于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奉行不太具有排斥性的政策的可能性之后，于10月26日在哈尔滨被刺了。

537

哈利满和伊藤亲王之逝世

多时以来，美国一直关怀地注视着在满洲和中国本土攫取让与权和势力范围的斗争的持续情形，这种情形是早在十年前海约翰国务卿宣布门户开放原则时部分地打算予以防止的。1905年以后日本人在满洲的政策，以及美国政府为了保证美国公民参加湖广借款集团而不得不采取的步骤，使得类似重申海约翰－柔克义政策的原则的举动显然很有必要，否则满洲的门户势将不能保持开放。1909年11月6日，在塔夫脱总统的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诺克斯致送英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他在文内概括地说明了为“满洲的全部商业中立化”而提出的两项可供选择的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由各国给予一笔贷款，使中国政府得以购回在满洲的俄国和日本的铁路；这几条铁路应由各参与国的国民加以监督，并应“在相互公平的基础上”使用各国提供的人员和物料。这样就可用一种合作的政策来代替易于酿成另

诺克斯的中立化计划

538

一次战争的那种相互竞争、相互猜忌的政策。另一种作为替换计划而建议的是，英美两国可以外交方式支持锦瑷铁路计划，并请"各关系国友好地完成满洲的商业中立化，共同参加锦瑷铁路及将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附属铁路的投资和建筑，同时提供资金，以便中国购买那些可以购进而纳入这一铁路系统的线路"。

一项替换的计划

葛雷爵士的复文

葛雷爵士于11月25日复照。尽管对这个中立化计划的"一般性原则"表示赞同，他却因湖广铁路借款谈判迄未完成，力请暂缓予以考虑。至于那项替换计划，他冷淡地建议说："两国政府应协力劝请中国政府允许利害关系最密切的日本人参加锦瑷铁路。"

其他国家的态度

12月14日，美国驻北京、东京、圣彼得堡、柏林和巴黎的外交代表奉命以诺克斯计划知照各该驻在国政府，并声明美国政府随时准备"与英国政府协力劝请中国政府允许日本及其他国家参加锦瑷铁路"。中国和德国不久即予答复，表示一般地赞同这个计划。俄国和日本则分别于1910年1月20和21日断然地拒绝过问中立化一事。法国是站在俄国和日本一边的。

替换计划的失败

至于替换的建议，也毫无结果。1910年1月21日，在中国政府有保留地批准上年10月2日的草约时，接到俄日两国政府措词强硬的正式劝告说：对于投资和修建锦瑷铁路的各项协议，未经与各该国磋商，不得订立。2月24日，美国政府接得通知称：所建议的铁路线将损及俄国的利益，而且修建该路势将抵触1899年的中俄协定。到了4月底，很明显的是，中国不敢为了订立修建该铁路的一个专门合同，而冒干犯日俄两国的危险，7月4日，俄国和日本采取了第二步的和解步骤①。几星期以后，朝鲜的兼并使数千名定居于满洲的朝鲜人归于日本的管

540

① 参阅本书第498页。

辖之下，从而加强了日本对于该地区南部的控制。

诺克斯计划失败的原因

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和修建锦瑷铁路计划的失败，是由于国务卿诺克斯未能看出：(1)远东问题是同欧洲外交密切结合的；(2)除美国以外的各国，对于中华帝国的完整并不真诚地感到关切；(3)美国在东方外交的成功始终是，而且只能是，得之于与该地区各利害关系国至少进行部分合作的政策的结果；而且(4)在一个贪得无餍的世界中，不付出一些代价作为交换条件，是难以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美国历届多数的政府对于上述最后一个原则，总是迟迟认识不清[①]。满洲问题不过是一个更大得多的问题的一部分，这一点已经由英国所起的作用而清楚地表现出来。1905和1910年之间的局势，重又证明了美国维护东方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意愿，而且也证明了日本和欧洲各国正遵循着和门户开放政策大相径庭的各种政策。然而，俄国和日本都被国务卿诺克斯逼得摊出牌来，从而昭示出它们不干预中国在满洲的主权的庄严保证，都是一文不值的——也使全世界更加看清了中国的虚弱。

4. 暹罗赎身的经过

暹罗的中立化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暹罗在国内外发展上出现了一次危机。法帝国在东南亚的扩展使英国宜于对暹罗问题同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正如对阿富汗问题同俄国达成协议一样。法国保护中国和印度支那在暹侨民的政策，导致英国采取行动，这主要并不是为了暹罗的利益，而是为了使法国不能接近缅甸边境。谈判在1895年开始，结果是签订了1896年1月15日的英法协定。这次，双方同意对暹罗的部分地区实行法国在十一年前所

541

① 参阅丹涅特前引书，第315—335页。

建议而为英国拒绝了的中立化原则。暹罗物产最丰、人烟最密的地区是形成王国中心的湄南河流域；这一部分地区现在由于英国和法国的相互协议而中立化了。1896年协定的不适用于该国东部和南部地区是意味深长的。

日本与暹罗

英法协定签字两年之后，日本和暹罗缔结了一个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性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为它的臣民取得了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地位，直到暹罗颁布现代法典时为止。根据最惠国条款，日本臣民也享到了值百抽三的协定税则的利益，暹罗将受这项规定的限制直到1927年为止。两个半世纪以来，两国正式交往，这还是第一次。

朱拉隆公的统治时期

暹罗的统治者们，由于1896年的协定而得暂免于欧洲的侵略之虞，于是继续进行十九世纪中叶玛哈王治下已然开始的内政改革。他们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表现出来的能力比朝鲜的统治者们强，所得的机会也比较好。同其他纯粹亚洲式的政府一样，暹罗政府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这类政府的优点是：只要有一个精明强干的统治者，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取得不小的成就。就统治者方面来说，暹罗在最近三代里显然是很幸运的。在睦仁天皇统治日本的同一时期(1867—1912年)，暹罗的国王是玛哈王的儿子朱拉隆公(1868—1910年)。在亲政以前，朱拉隆公打破前例，周游了印度和荷属东印度。1897年，他访问了欧洲的几个首都。他的几个儿子，包括承继王位的拉542玛六世(1910—1925年)在内，都是在英国受教育的；其他的亲族也曾在法国和美国读书。

国王的改革事业

朱拉隆公国王早已认识到：如果要他的国家的本地名称“泰”或“泰国”(意指“自由”或“自由的王国”)除了语言学上的意义以外还具有其他任何意义，那么，主要就要由他自己以身作

则，为人民树立模范。他刚刚开始亲政，就着手废除奴隶制；1900年的一道谕令解放了1897年12月16日以后诞生的一切奴隶。开办了学校和医院；信仰自由也得到了保障。公路有了改进；在1893年敷设了从曼谷到湄南河口的北榄、全长十二哩的第一条铁路。目前，暹罗国内的铁路线长达二千余哩。币制标准化了；邮政电报事业发展了；电气照明和电话系统也架设起来。

西方文化的同化作用

当暹罗的统治者们抗议法国"保护"非法籍人民的政策时，他们接得通知说，他们的国家必须"实行欧化"。这也是汲取现代文化以改变本国文明的一部分原因。为废除领事裁判权而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指派一个委员会，起草刑事法典；草成的法典于1908年9月21日付诸实施。早在九年以前，暹罗就已经同英国订立一个条约，经双方同意对英国臣民所享的领事裁判权加以限制。当德赉加赛在1902年企图同暹罗缔结一个类似的协议作为同英国订立英法协约的步骤时，他未能取得法国众议院的支持。法国人无视1893年条约的规定，不仅继续盘踞着尖竹汶，在附近的暹罗领土内行使管辖权，而且甚至企图统治湄公河以西，垄断该河流域的贸易，强使法国人参加暹罗政府供职——日本人在朝鲜抄袭了最后一项办法。

法国在暹罗的政策

在终于切断英国对暹罗的支援的英法协约成立以前两个月，德赉加赛于1904年2月14日强以一项新条约加之于暹罗，以代替1893年的条约。法国因而得以并吞了将近八千平方哩的土地，包括琅勃拉邦的剩余部分、巴色和穆鲁白利两个省份，以及克拉特地区和重要港口在内。此外，还划出了一个"中立地带"，由法国警官率领下的柬埔寨人巡逻，并准由法国方面在该地带内修筑一条铁路。这时，法国人撤出了尖竹汶，对侨民制度

543

也多少作了一些修改。1907年3月，法人又强使暹罗接受了1904年条约的修正条款；克拉特和丹赛地区现在被交还了，而以早一世纪左右暹罗从柬埔寨征服得来的马德望省作为交换。割让了1904年划定的“中立地带”，并将湄公河流域上游的四个港口“永租”予法国。暹罗一共又丧失了一万二千平方哩，但是，法国这时却同意，再过十年，就让1893年以来即承认作为它的被保护人的亚洲人受暹罗法院的管辖。

英国在暹罗的政策

如果不是为了英国的关系，法国无疑会在暹罗实施它的“合法的愿望”，一如日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而且会取得类似的结果。但是，英国的态度并不象1885、1896和1904年那样看上去纯粹是利他主义的了。它正图夺取暹罗所属的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吉打等四个马来亚土邦，以加强自己在新加坡——它的东方的直布罗陀——邻近地区的地位。1896年的中立化协议，由于1907年4月的英法协定，而得到了说明和证实。英国和法国得分别以湄南河西东两岸为势力范围，不过法国的范围要大得多。英国希冀取得马来亚土地的欲望现在通过谈判的方式而得到满足，这些谈判的目的是要消除对暹罗主权上的种种限制，诸如领事裁判权和税收权等。谈判在1908年持续了一整年，终以1909年3月10日的条约而告结束。英国以进一步切实放弃它的大部分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早已过时和已无必要的特权（这些权利都是以1874年暹罗和印度政府之间签立的条约为开始的），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了上述的四个土邦——面积一万五千平方哩，人口约一百万人的一个非常富饶的地区。

领事裁判权

财政政策

544

英法两国对于土地的贪婪，在1910年拉玛五世逝世以前，似乎终于得到满足。这就使他那位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儿子——拉玛六世——能够比较地不受牵制，而集中精力于他的这个拥

有八百万人口的坚实国家的内部发展了。在英国和法国把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土地圈了出去之后，留作暹罗国土的那一部分，是保持在一个健全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据国王谕令，甚至皇室的私有财产也须照章纳税。赌博特税几为国家收入的六分之一；尽管如此，彩票包销行和赌场都被封禁了，鸦片烟贩运也严加管理。在外国顾问（他们都是顾问而不是行政人员，但是他们的意见因于国家有利，一般都是采纳施行的）协助下，暹罗的矿产、农业和林业资源都得到了科学化的发展。1903 年，陆军改革以实施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服现役二年、预备役二年的义务兵役制而开始。1914 年开办航空学校。暹罗国内外的繁荣与安全是它的进步的结果。暹罗已不再是列强棋局中的一个小卒了。

545

第二十六章　1904—1914年的远东——中国：改革与革命

1. 改革的要求，新式教育

汉人对满人的愤慨

义和团起事解决之后，排外风潮连年不断，虽以反对传教士为主，一般说来，里面也掺和着对清廷为偿付赔款而开征新税或提高税额所怀的不满。对中央和省政府的积怨表现为许多省份的盗贼蜂起，以广西和江西两省的武装叛乱而达于顶点。孙逸仙在广东领导的那个积极的反清党和康有为在大多数省份中的信徒所不倦地鼓动起来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则是以要求变法为宗旨的。

1902年2月同化满汉的上谕

满清统治者模糊地感觉到了改革的必要。1902年2月1日慈禧下了两道懿旨。第一道懿旨废除了满汉通婚的禁例，但着满洲幼女仍须应选秀女，并斥责汉族妇女缠足的风气。第二道懿旨饬慎选满洲子弟赴各国游学，"以副朝廷图治育才之至意"。

1092年1月准备改革教育

另一项改革接触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利益——教育。1902年1月10日颁发了两道上谕，饬将翰林院人员量才分等，重新建立京师大学堂。西方知识的教育一直是循由四个途径进行的：传教士所办的教育；北京和广州的同文馆；中国派遣学童赴美国留学；以及政府为将新式教育普及于全国而采取的措施。

546

中国人最早的欧洲教师是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①。俄国人

① 参阅本书第3章第2节。

作为现代知识媒介的传教士

通过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得到了在北京设置一所学校的权利①。这所学校作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一个世纪后连遗迹都没有了。基督新教徒的活动在十九世纪才开始，英国方面可以追溯到1807年教士马礼逊的来华，美国方面则以1829年裨治文来华为嚆矢。在早期的年代里，教士们往往自己也是学生，他们的教学必然只限于培训他们的助手。但是他们的妻子却常常教导中国青年，例如容闳最初就是在1839年受教于郭士立夫人的。在澳门，传教士建立了马礼逊学堂。

教会学校

在半个世纪之中，尤其是一般本身是大学毕业生的美国人，竭尽才智从事于教学，从而有助于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在传教士的主持下，几百所学校创立了起来。到1905年，在基督教会管理之下的学校计二千五百八十五所，其中十四所（美国办的十二所，英国办的二所）可以说已经完全达到了大学水平。在这十四所学校之中，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在三十年期间一直居于领导地位，毕业出来的一批虽然人数不多但精明强干的学生在中国新的教育、宗教和社会活动方面，以及商界、政界和外交界中，都渐渐成为领袖人物。各教会学校学生的总数是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三名，内包括女生九千九百二十九名。在1900年以前，中国所储备的具有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和欧洲语文知识的男女人才，主要是得之于这些教会学校以及香港官立学校的。

同文馆

1860年，中国政府首次与外国使节发生直接关系。两年以后，同文馆直接奉恭亲王的札谕成立，招收了某些阶层的满洲人，隶属于新设置的总理衙门。1865年，课程中新增了科学的

① 恰克图条约第5款规定，准造庙宇，礼佛念经，并无准设学校一款。——译者

科目，从而将这所学馆提高到了大学的地位。这所学校是交由总税务司管理的。到1884年，其中设有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国际法、化学、数学、天文学和生理学等科。在此后三十多年间，总理衙门和驻外使馆的所有翻译人员都是由这所学校和开设在547 广州的一所性质相同但规模较小的学校提供的。然而这个学校对中国的学制并没有多大影响。

容闳和中国人的赴美留学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一位广东人容闳，渐渐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具有现代知识的人才，并且在1870年终于争取到了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汝昌的支持。由于他们三人的倡议，1871年8月降谕，准组织中国教育考察团，以容闳、陈兰彬为监督。审慎地选定了学生一百二十名，自1872至1875年，每年派遣学生三十名到美国的新英格兰留学。1881年，由于中国官员的守旧，这个考察团解散，学生全部被召回。他们回国以后，遭到一位盛怒的清廷大员的凌辱，一体被安置在极不重要的事务性工作上。但是，他们的杰出才能逐步产生了效果，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一个一个地显露了头角①。

1900年以前的官办大学教育

国家的奖励西学是迟迟其来的，但是，在对日战争以后，京师大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和上海南洋公学都已经奠定了始基。这三所大学都有强有力的官方背景；并且由于有三位渊博的美国教育家担任校长②和拥有英美籍教授，所以很快地就能对一般规划起轴心作用了。但是在这期间插进了一段反革命运动和义和团的起事，事过之后，除了三所大学以外，一切都荡然无存，而且这些大学也并不是奠定在教育基础上的，所以只能依靠教

① 在这一百二十名学生之中，有八十名在1907年还活着。其中二十三名已经晋升到候补道台或者更高的官阶。

② 这三个人是：丁韪良、邓尼和福开森。

会所办的学校作为学生的来源。

义和团起事以后，山西省接受了一项设置官办学校的规划，作为规避该省境内所犯罪行的其它惩罚的方法。李提摩太博士这位著名的非常受人尊敬的教士、慈善家和教育家，曾经受山西巡抚和中国议和大臣的邀请，作为山西省与列强之间的调停人。李提摩太博士认为，中国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愚昧无知，因而他建议该省应在十年之内偿付赔款库平银五十万两，在太原府设立一所大学并在各主要城市分别设立学堂。这个计划为中国和列强所接受。

义和团以后山西的教育事业

548

1903年学部成立。当时一切改革措施虽都受到了日俄战争的牵制，但在1905年，一个创办各级学校的方案已付诸实施。当时并没有作过任何尝试来吸收、甚至以任何方法来承认外国传教士所创办和经营的许多优良的专门学校和学堂，虽则这些学校之中大约没有一所曾强使在校学生接受任何宗教测验。除了官办大学的学生以外，还有许多人到国外去接受他们在国内所得不到的教育——每年有几千人去日本，几百人去美国，几十人去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

一般官办教育创始于中国

2. 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鸦片改革

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整个中国震动起来。在这次战争中，亚洲人已经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并且取代了后者在南满的优势地位。日本竟然把久已认为是东西方之间理所当然的关系颠倒过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禁要问：日本到底用什么办法得到这样的结果？于是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争着解释说：这是由于日本全盘接受西化的结果。日本创立了一个国会，照新法改组了军队，接受了西历，采行了西方的衣冠和理发的式样。中国只须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照办就行了。

1905年5至9月的抵制美货

这种新被唤醒起来的民族意识的第一个表现，就是1905年5至9月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国人民想以这种抵货运动作为手段，在准许无限制向美国移民这个问题上加强他们政府的发言地位。这个运动是从旧金山发动和鼓励起来的。那里的中国领事宣称，这个运动是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各地纷纷抵制美货，其中主要有广州、厦门、福州、上海、汉口、天津和牛庄等地。列强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休戚相关，这个运动在香港和青岛两地被高压手段压制了下去，日本人在牛庄也采取了同样行动。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扑灭了这个运动，其他各地的巡抚和道台也都纷纷贴出了严加取缔的告示。清廷同样地也颁发了措词严厉的上谕。一般说来，它的态度是正确的。这次抵货运动事实上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由广州和旧金山两地的广东人所策动，而由新时代的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酝酿而成的。中国政府接到了须对这次运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的通知。到9月里，这个运动渐渐消沉下去，这主要是由于业经按照长期合同购买美国布匹的中国商人，发现其无法使存货脱手的缘故。

549

禁烟风潮再起

新民族意识的另一个群众性表现就是禁烟措施的复活。以往的禁烟尝试都是从上面发动的：现在学生来处理这个问题了。他们认为这种恶习是使他们的祖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屈居人下的主要原因之一。1903年，在美国的留学生就路易斯安那博览会把鸦片烟具列入中国展览品一事提出了抗议，中国钦差同意了他们的主张。在日本的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从这个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的国家得到了启发，他们把这一点也增列为日本所以蒸蒸日上的原因之一。外国教士们的长期教诲已经在直接受他们影响的数十万中国人心中产生了效果，通过这些人，

又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起了作用。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中国政府也随即采取行动，因为它很有把握可以得到以前所无法取得的人民的支持了。

1906年11月21日颁发的上谕，命令所有过去种植罂粟的土地，应逐年递减，限于十年内禁绝种植，所有吸食鸦片者必须请领执照，六十岁以下者应逐渐减少食用量；烟具的发售以及烟馆的开设，应加限制；至政府官员，则一律禁吸鸦片。关于外国鸦片的进口，应即举行谈判，以期逐年递减，在十年之内全部停止输入。全国雷厉风行。减少种植是用强迫方法的，靠了为这项社会改革事业而征募的警察之助，这个目的不上几年的工夫就达到了。

1906年11月21日的禁烟上谕 550

输入中国的外国鸦片，差不多完全是英属印度和波斯所出产，而单独由英国口岸运入中国的。1906年12月，英国政府同意自1908年起限印度的出口量每年递减十分之一。这个协定暂定三年内有效，但是三年届满的时候，发现中国事实上已将土鸦片的产量减至限额以下。1911年5月8日的新协定，规定双方继续合作，逐年减少输入量，一直到1917年底，完全停止输入为止。1907年的输入量原定为五万一千箱，双方同意每年递减五千一百箱，到1915年，全部输入当为四千一百三十六箱。此外双方还同意，在已经完全停止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的省份得禁止输入外国鸦片。到1915年，公开输入外国鸦片的只有江西、江苏和广东三省。最后在1917年2月，中国政府同意按每箱八千二百两的价格，收购凭证进口的鸦片存货计二千箱左右，“供作医药之用”。

减少外国鸦片的进口

可是，别的国家还是可以生产鸦片的，并且依照现行条约，它们的国民得任便将任何地方出产的鸦片输入中国。为了解决

国际鸦片会议

这个问题，1909年2月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由美国政府发出了召开会议的请柬，并由一位美国人查理·勃兰脱主教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决议，承认“中国政府对于力图根除全国各地鸦片的生产与消费一事具有至诚”，敦促与会各国政府采取限制办法协助中国达到它已经布告中外的这个目的。1912年1月，在海牙举行第二次国际会议，出席的国家计有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波斯、葡萄牙、俄国和暹罗。仍旧由勃兰脱主教主持会议。会上通过并签订了一个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应颁布有效之法律或章程以控制生鸦片之生产与分配；缔约各国应采取办法以逐渐切实禁止鸦片之制造及国内贩卖和吸食；缔约各国应禁止鸦片之输入及输出；缔约各国应颁布法律以控制吗啡、高根及其化合质料之国内贩卖及吸食；缔约各国应会同防止将上述药品走私运入或运出中国”。这样，中国和列强在鸦片问题的财政和商业方面历经一百多年的矛盾，终于在这个问题的道德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而中英两国则是以国库收入的损失作为代价的。世界大战又使鸦片走私猖獗起来，特别是在山东和满洲，而在1916年以后，中国军阀的统治则造成了鸦片问题的死灰复燃，迄今未获解决。

551

3. 1911年的革命

争取宪政改革的学潮

推动抵制美货运动以及促使禁烟运动复活的那个刺激素，继续鼓动着这个国家。义和团运动以后的学生，仍然是一种推动力量，但是这一次，容闳所带领的为数不满一百的留美学生，从他们久被埋没之中崭然露出了头角。他们以及在其他地方受教育的另外一些人，分担了起草新宪法的主要任务，其中最知名的有留美的唐绍仪、梁敦彦和梁诚，以及在英国获有律师资格的

伍廷芳。他们以袁世凯的强有力的支持为奥援。

在1906年9月和1908年8月间，一系列的上谕为1917年建立有限的君主立宪制度，扼要地列出政府形式上的种种改革。第二次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本体和基础原封未动。真正需要的改革是保证给人民以法律上的平等，保护纳税人不受勒索，以固定薪金代替无定额的外水，并责成官吏们将取自人民的全部税款缴纳国库。

552

1906年—1908年走向宪政改革的第一步

1908年11月15日，操持皇权垂一世纪之久[1]的那个唯一强有力的人物慈禧太后，以七十三岁的高年去世了。也许最能使她称心的是，光绪皇帝在早一天的晚上逝世。慈禧太后的始终保持着权力可以从她临死前最后一次行动上看出来。11月14日晚上，她宣布以醇亲王的年甫三岁的儿子溥仪为嗣皇帝，并且特简醇亲王为摄政王监国。新皇帝改元宣统。在此以前，袁世凯已由直隶总督调任军机。12月18日袁世凯和张之洞同拜命为太子少保。但这时袁世凯的地位是不牢固的。1909年1月2日的一道上谕，以他因患足疾未能依式行礼为词，命辞职回河南原籍。惴惴于更坏命运的降临，袁世凯躲到天津外国租界去托庇求安。但是，在几位显要的满人的私人保证之下，他回北京，又从北京放逐回籍。

皇帝和太后的逝世

宣统皇帝（1908年11月）

1909年1月袁世凯的倒台

在各省，中国的维新主义者重又开始了他们的活动。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首次召开会议。他们提出了应于两年之内召开国会的共同要求。这个要求为1910年1月10日的上谕拒绝了。同年10月3日，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它力请提早召开第一届国会。经过了一番踌躇，终于颁布了定于1913年设立议院的上谕。这还不能使资政院满意，它要求立即召开，

要求代议政府

[1] 原书的"一世纪之久"疑为"半世纪之久"之误。——译者

553 进一步坚持军机处须对国会负责。清廷拒不允行，但同意质询权，于是资政院在1911年1月11日闭会。

在要求成立立宪政府、削弱朝廷权力的同时，中国中部和西部各地正酝酿着省自治运动，这种运动在反对借外债和争取省自行管理矿藏和铁路的企图中表现出来。盛宣怀于1896年曾被任命督办兴建中国铁路事宜。他的中央集权政策和他本人与铁路借款有关的劣迹昭彰的贪污行为，使他成为各省嫉妒猜疑的对象。1911年1月，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5月9日的一道上谕宣布，将所有私人资本建筑的铁路收归国有，此后一切干路应由国家修筑管理。1911年5月20日湖广铁路借款使人深恐中国的主权已名存实亡，满洲的情况将重演于长江流域，中国更多的资源将主要为外国的利益而开发。各省也不愿看到清廷通过外国借款和铁路收归国有来增强它的权力，因为这样势必减少省库的收入和自治权。

省自治运动

湖广铁路借款

秘密会社国内遍地皆是，其中有很多都是反满宣传的中心，如太平天国时代那样。孙中山在国内外策划推翻满清皇朝已达十五年以上。自1895年以来，广州一直是新中国的心脏和已经逐渐转化为反清的立宪改良派的大本营。1911年4月，广州将军遇刺，总督衙门被焚，但一时还未酿成巨变。四川方面反对铁路政策和中央集权特别激烈，因为为了筑路，已经在地方上筹募了必需的基金，并且已经用去了若干。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作为消极抵抗。

孙博士的反叛

四川的革命起事

554 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发生了暴动和械斗。10月9日，在汉口俄租界内的一所屋子里一枚过早爆炸的炸弹使革命计划暴露了出来。第二天，武汉大肆逮捕和处决人犯。同日，在汉口和武昌的革命领袖强迫新军协统黎元洪担任他们的领袖。当晚，武

武汉起义

汉的起事使革命急转直下。汉口和汉阳及其附近都有战斗，结果是革命军占了上风。其他各大城市纷纷起义响应。在这些起义中，很少发生战斗，只有西安府是例外，那里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丧失了性命。这次革命运动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一概取得了成功，它的性质，与其说是一次叛乱，毋宁说是一次总罢工。袁世凯重被启用，清廷赋给他以最充分的权力，以图挽狂澜于既倒。他还能控制北方各省，甚至能以武力收复汉口和汉阳，但中部和南部革命党的坚决态度，清室的优柔寡断的保守主义，以及列强的严守中立（这种中立把一笔原定给予清廷的贷款打消了），合而使保全皇室作为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的元首的那个任务无法完成。康有为的追随者被撇在一旁，孙中山的信徒肩负起革命的责任。

孙中山和袁世凯

12月初，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和议。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刚从伦敦返国的孙中山经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据商定，孙中山应随即引退而让位给袁世凯，袁氏得留任至一永久性政府组织成立时为止。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三天以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氏宣誓就职，同时，临时约法公布施行。1912年4月29日，参议院召开会议。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两者均为事事反对袁世凯的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党员所左右。

555

借款谈判

国会和临时总统之间的斗争是为了向外国银行团洽商借款开始的。四国银行团因1912年6月俄国和日本的正式加入而成为六国银行团。俄日两国对1911年4月15日签订的借款颇怀疑忌[1]，至是虽然参加，但对于它们在蒙古和满洲的特殊地位，提出了保留，而且主张袁世凯政府所得到的任何借款均不得

① 参阅本书第474—475页。

用以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六国银行团为了它本身和中国的利益，认为应有权对中国政府的各项用途提供贷款。对于这一主张，袁世凯无意予以承认，这一点从谈判自1912年2月一直拖延到1913年4月以及中国同时和比、英、奥银行界进行谈判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通过后一项谈判，袁世凯得到了一些小额借款，却耽搁了只有由政府支持的六国银行团才能提供的那笔迫切需要的大借款。原来磋商的计划是拟于若干年内贷予中国四千万至六千万英镑。但银行团的要求是硬性的：中国须(1)说明所需款项的用途；(2)建立稽核制度，以保证借款用于指定的用途；以及(3)以盐税收入作为担保，盐政事宜应由海关或类似的中外联合机构管理。列强对于它们要求指派的外籍顾问人选彼此意见分歧，以致在整个问题中又引进了一个国籍问题。威尔逊总统在就职后的第十二天，即1913年3月16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鉴于借款的条件似威胁到中国的行政独立，爰不复支持美国人民参加六国银行团。

六国银行团的要求

美国退出银行团

与贷款有关的列强，动机各自不同。美国在塔夫脱任总统时，始终从事于维护中国的完整，以图保持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俄国和日本无款可贷，因此它们的利害关系显然是政治性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则有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利害关系。由于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中国本部及蒙古攫取让与权的角逐遂又重新开始。

列强的动机

556

反对缔结借款合同的抗议，一个接一个地从国会和从各省向总统、银行团以及外国政府提出。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于是在4月26日，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正式合同，5月21日，为数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开始在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和东京发售债券。

“善后借款”

不顾国会反对而擅自缔结借款协定的行为，以及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一案应由这位临时总统负责的指控，都成了南派驱袁企图的借口。1913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了所谓二次革命。虽有日本方面的鼓励和援助，但是这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轻而易举地被镇压了下去，临时总统的地位大为增强。10月6日，国会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选举袁世凯和黎元洪分任总统和副总统。中国最后算是有了一个正式元首。在上一年的5月2日，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中华民国；至此，其他各大国政府也予以承认。这位总统已经力量强大，足以在11月4日将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了。12月，国会休会，旋于1914年1月10日被解散。四个月之后，以一部称作“中华民国约法”的文件代替了临时约法。由于这个约法，总统成为权力之源泉，事实上无异是独裁者。一个间接选举的、单院式的、每年仅仅举行四个月会议的立法机构，只具有一些有名无实的权力。国务院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总统的任期现在由五年延长到十年，可以无限制连任。袁世凯现在已经成为独裁者，回到君主政体显然只是迟早更换一下名义的问题而已。

一个独裁者的形成

约法

557

4. 中国、英国和西藏

当1912年清室退位的时候，许多有关西藏、蒙古和满洲的问题都悬而未决。袁世凯总统的政府必须将这些问题与建立国内和平的任务同时予以解决。

中国的藩属

从七世纪时起，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各个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西藏这个广大地区在地理上形成为英属印度的国防前哨，同样，作为中国的一个防卫地区，它同新疆、蒙古和满洲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有史以来，满洲就和中国本土多少有

西藏和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

点密切关系；作为大清皇朝的发祥地，它在十七世纪同中国密切结合起来。蒙古处于满洲之西，地广人稀，曾经是多次入侵中国本部的策源地，又是元朝的祖籍。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范这个土地上的侵略者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修筑的。尽管十四世纪时庞大的鞑靼或蒙古帝国崩溃了，蒙古各个部落仍成为中国的一个危险泉源，直到康熙帝和乾隆帝在1688到1756年征服了他们的土地时为止。

喇嘛教

蒙古人的主要宗教是从西藏传给他们的喇嘛教——佛教的一个支派。主持西藏喇嘛教教政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前者与其说是一个宗教上的领袖，不如说是一个俗界的领袖，他的称号是在1576年由一位蒙古可汗册封的。自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汗征服中国的东部以后，中国同西藏之间的关系就是宗主国同藩属的关系，历经元、明、清以至民国的统治者都予以确认和保持。满清皇朝的征服蒙古，使它尤须同西藏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两个藩属之间在宗教上是有联系的。1720 558 年，蒙古和准噶尔部的干涉有争议的达赖喇嘛继承问题，导致了康熙帝派兵入驻拉萨，并给西藏建立了一套政权制度，这套制度一直持续到现在。两个钦差大臣或驻藏办事大臣，奉派驻在拉萨。此外还有两三个参赞大臣以及几个次要的官员协助他们。

西藏和"闭关"政策

西藏是欧洲人最不熟悉的亚洲地方。在本世纪以前，英印政府想同西藏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尝试都归于失败。虽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西藏却并不认为它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它还阻挠中英官吏在1893年签订的贸易协定的实施。尽管英国很想在西藏开辟一条新的贸易路线，但如果没有1880和1900年间俄国的干涉，说不定英国就不去打搅这个地方了。在这十几

俄国和西藏

年中间，达赖喇嘛处于一个充当俄国代理人的名叫杜杰也夫的

布利亚特蒙古喇嘛的影响之下，这个喇嘛一直在怂恿达赖喇嘛采取反华和反英的政策。俄国输送军火到拉萨，1900和1901年，西藏的使者在圣彼得堡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如果不是为顾问们所劝阻，达赖喇嘛本人也要去访问俄国了。与此同时，俄国在蒙古和满洲也奉行着不久就酿成战争的侵略政策。

1904年英国赴西藏的远征军

在中国的提议下，英国政府同意为了磋商贸易和边界问题，由英国、中国和西藏的代表们于1903年夏在邻近印度边界的西藏领土内举行一次会议。中国和西藏都没有派遣负责的代表，英国则于1904年初派遣了一支由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远征军。派遣这样一支远征军以及在谈判开始前在拉萨设置一位常设英国代表，正是印度政府公开表示的愿望。但伦敦政府对后一项建议不予同意，并发出除非代表团遭受攻击或它的交通受到威胁，不得使用武力的命令。西藏人尽管没有对付一个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准备，还是对侵略者发动了攻击，在几次战役中，计伤亡一千五百人，数百人被俘。英国方面阵亡三十七人。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逃往蒙古，8月3日，拉萨被占领。根据一个月之后双方签订的一项条约，西藏允给五十万镑作为赔偿，商定同印度贸易并开放三个通商中心地。另据规定，“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西藏土地无论何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为使条约各款付诸实施，英国政府于未办之先，仍于春丕驻兵暂守作质，至“赔款清缴或商埠妥立三年后最晚之日为止”①。英国既经向俄国表示了不容对西藏进行干涉之后，为怕伤中国的感情，决定将赔款减少三分之二。 559

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的草约

中国决定要保持它作为西藏宗主国的正确态度。1906年4月27日，它同英国签订了一项草约，对1904年9月7日的英藏

① 录自条约原文，见海关编：《中外条约汇编》，第1卷，第657页。——译者

草约，更正后予以确认，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是英国应允不兼并西藏领土，也不干涉西藏内政。中国也应允不许其他任何外国干涉藏境及其内政。但是，英国得在新辟各商埠敷设电报线与印度通报。英藏关系中的下一个步骤就是1907年8月31日那个著名的英俄协定的签字。在这个协定中，双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并且承允只可"经过中国政府中介"与西藏进行交涉。两国政府承允均不派代表到拉萨，并不得为自己或本国国民要求任何种类的让与权——包括要求以西藏税收作抵押或分配的情形在内。

1907年英俄协定

中国对藏政策

这时中国决定用强硬的手腕统治西藏了。1908年1月，中国付清英国1904年条约所规定的赔款，次月，英军即从春丕撤退。达赖喇嘛应邀从蒙古前往北京。他在北京度过190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这时他清楚地看出，他非但谈不上是西藏的主权者，就是他的教权也要以满清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在西藏境内，中国人也正大张国威。1908年3月9日的上谕，给西藏的军事、教育、矿业、工业以及政治等各方面的改革提出一个纲领。中国的军事地位大为加强，中国驻藏办事大臣事实上成了一个独裁者。赵尔丰由护理四川总督调任驻藏大臣和办理川滇边务大臣。达赖喇嘛在1909年圣诞节返回拉萨，他发现除去几个空头衔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中国驻藏大臣经常争权，而且在次年2月12日，有一小支中国军队开进拉萨，声称要使行政机构成为纯粹中国式的。于是，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随即被中国革去了封号。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杜杰也夫就留在印度，直到中国革命爆发而拉萨的中国驻军在1912年8月投降时为止。这时除了驻藏大臣的卫兵以外，所有中国军队都取道印度回国。

560

辛亥革命对西藏的影响

袁世凯总统意欲继续执行清廷的同化西藏政策。他在

1912年3月和4月先后发布命令，宣布西藏和蒙古是组成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将在国会里享有代表权。一个新的行省将以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组织成立①，并由四川和云南两省的都督组织一支收复西藏的远征军。这支远征军在1912年7月从四川成都出发，次月占领巴塘。

英国对西藏的政策 561

在这个阶段，英国出面干涉了。8月间，一份备忘录送到了北京，其中所持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正以军事行动破坏1906年的条约。英国并不否认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是不能容许对一个与英国有独立条约关系的国家进行武力征服。中国被邀请同西藏和英国商订新约。在未订约以前，英国将不承认中国的新政府，而且切断所有中藏之间取道印度的一切交通路线。虽然中国政府撤回了它征服西藏的命令，但是在四川军队和东境的西藏军队之间的战斗仍继续进行。1912年12月，中国政府复照英国，声明无意把西藏当作一个行省，并已恢复了达赖喇嘛的原有地位，但是1916年②条约既承认中国有维持商埠治安和保卫交通的权利，则军事行动自是名正言顺的。中国认为不需要签订新条约，并且要求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1913年西藏宣告独立

1912年底，所有中国军队都被赶出西藏；不久，中国官吏也全部撤离。在这年的7月中，杜杰也夫到外蒙古访问了库伦活佛呼图克图。这位呼图克图在喇嘛教中列第三位，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他在蒙古的地位，正同他的宗教上的上司

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这个区域建立西康省，以康定为省会。同时以甘肃的西宁县划入青海而组织青海省，并以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并入宁夏、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等四个新的省份，其中包括华北各省的若干地区在内。这样，南京方面正试图将它们并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省来管理，以尽量挽救出中国一部分旧有的藩属。

② 系1906年之误。——译者

在西藏的地位一样。1913年1月初，达赖喇嘛宣告西藏独立，并同呼图克图缔结了一项条约，相互承认独立。4月间，四川都督重新开始向西藏进兵，袁世凯总统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和平建议，但无效果。

西姆拉会议（1913—1914年）

次月，英国再次提议召开一个三边会议。在得到中国同意后，1913年10月13日中英藏三方开始在印度西姆拉地方举行会议，一直断断续续地举行到第二年（1914年）7月。西藏要求完全独立，中国则大抵坚持1906年条约。英国主张把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两个地区。根据英国的计划，外藏应实行自治，虽然562名义上中国仍保有宗主权，并且可以派代表驻在拉萨，而英国代表得驻江孜，并有访问拉萨的权利；内藏应由中国直接管辖；达赖喇嘛在全藏境内仍保持完全的宗教上的最高权；藏英之间应订立新商约，而今后倘宗主国与藩属之间发生争执，英国将作为居间调停者。主要是由于昌都被划入外藏，而里塘和巴塘——四川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划入内藏，中国拒绝批准1914年4月27日签订的载有上述各款的条约。此外，中华民国政府也不同意在废除了1906年条约之后将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并在英国的保护下实行自治。

英国承认西藏自治

当中国绝不会批准4月27日条约这件事已逐渐明朗化的时候，英国和西藏于7月3日在西姆拉订立了一个商约。西藏的自治现在经条约予以承认。中国政府接到通知说，中国在准备同意之前，将不能享受新约所规定的任何权利。在此后三年，其他种种问题的互相纠缠使对西藏边界问题的解决未能采取任何步骤。在这一段时期中，边界上保持着一种军事戒备状态，终于导致了1917至1918年间中藏战争的再度发生。

1919年5月30日，北京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中国承认昌都及其他某些地区属于外藏，青海的南部属于内藏，而内藏应保留在中国的管辖之下。这种解决方法，事实上就是恢复到1727年前这两个地区的历史上的疆界。英国踌躇了三个月，到那个时候，山东问题发生。愤于中国代表及其利权在巴黎所受到的那种待遇，认为列强的本性已经一举而暴露无遗，北京政府撤回了它的折衷方案。就中国来说，西藏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但是英国在西藏的地位却由于中国同它的藩属间的内讧和混乱，变得越来越巩固了。

中国提出折衷方案

5. 中国、俄国和蒙古

563

正如早一个时期中华帝国是将周围一大圈土地向它本身吸引而来的一块磁石那样，英、法、俄、日各帝国在后一个时期也同样地成为将那些土地吸引而去的一些磁石。就蒙古而论，这种吸引作用是怎样进行的，现在不妨一谈。

中国保持藩属的斗争

远在1907年，日本含糊地承认了俄国在蒙古的利益。1910年朝鲜的兼并随巴黎《时报》所载的一项声明以俱来，据那项声明说，日本为换取俄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保证听任俄国在蒙古自由行动。不久之后，俄国派遣了一个特别调查团到蒙古“调查俄国在这个地区的贸易情况”，跟着就提请中国外务部注意所谓中国违背1881年条约的行为。俄国就中国对茶叶的独占经营以及中国官方禁止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经营茶叶事提出抗议。中国复称，俄国在蒙古和天山南北两路的贸易权利，只以经营外国商品为限。俄国拟在蒙古设置新领事馆，但是却抗议中国根据同一条约权利在那里开办关税的对应措施。根据该约所载条款，1881年的条约可以每隔十年修正或续订一次，或于期满前六个月通知作废。这个条约在1891和1901年曾经续订，1911

俄国在蒙古的利益以及随后对中国的不睦

1881年的中俄条约

年8月又值修订或续约期限了。中国是否会在1911年续约殊难逆料。在这一年的2月和3月，俄国先后以两份照会和一份最后通牒，强迫中国同意俄国的解释及其所提的要求。6月间，爱德华·格雷爵士声明英国政府承认"俄国和日本在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与此同时，他还公开提到日本在"南满以及邻近南满的东部内蒙古的权利与特殊利益"。据说俄国的特殊利益则在北满、蒙古和中国西部。1911年这一年既没有废除1881年的条约，也没有续订新约，就这样过去了。

在蒙古的"特殊利益"

564

内蒙古与外蒙古

1913年英国提出的分西藏为内外藏的办法，就是以久已公认的蒙古的同样划分办法为依据的。内蒙古靠中国最近，因而是首先归附于满清宗主权之下的。内蒙虽然面积较小，可是境内农产较丰，人口也比较稠密。外蒙则地广人稀，沙漠辽阔。由于它的北部边疆与西伯利亚接壤，因此当十八世纪俄国开始向太平洋东进时，就首先受到了它的注意。一度为称作扎萨克的王公们所统治的逐水草而居的骁勇善战的部落游牧其间的蒙古，现在稀疏地居住着一些半游牧群，其中大约八分之五的男子是僧侣。

中国对其藩属的强硬政策

在清代的最后几年中，中国在内蒙古和满洲实行了一种几乎是侵略活动的政策。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汉人住在长城以外的很少，或者简直没有，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开始实行侵略政策之后，中国才准许往那里移民。奉天巡抚唐绍仪在中国广袤的藩属中奖励殖民计划，这个计划不仅会吸收去中国本土的一部分大量过剩的人口，而且还可以把商业和铁路建立起来。1909年，涌入蒙古北部的移民几乎年达十万人。中国人在内蒙古这个辽阔的地区上每年开垦的草地有一哩。朴实的蒙古人毫不踌躇地以土地为担保品向中国商人承借高利贷，而那些

节俭的中国商人的犹太商人式的作风却弄得自己在当地的扎萨克之间声名狼藉。此外，内蒙古有一些旗（或称艾麦克斯，即王公的封土）被划入中国本部的直隶省治之内。在 1910—1911 年，中国在北部和西部驻扎了军队，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行政制度；蒙古人须输捐纳税，被迫服兵役，并且还须供应政府官吏的给养。

565

蒙古的反抗

中国急进政策的结果惹起了蒙古人的大规模的反抗。蒙古王公指责满洲人和汉人正破坏着他们的国家早先承认中国宗主权的那项协定。在中国革命党正准备推翻清室的时候，外蒙各王公也正准备打破 1691 年以来蒙古和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蒙古王公和喇嘛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在 1911 年 7 月派遣使节团前往圣彼得堡，请求俄国保护他们的领土。8 月，俄国驻北京公使提请清政府外务部注意正危及边境和平的紧张局势。

1911年蒙古赴俄使节团

外蒙独立

四川省和长江流域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库伦，全城欢腾，随即在那里举行了另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外蒙古的完全独立。清廷办事大臣三多和他的军队被迫撤离。1911 年 12 月 28 日，呼图克图活佛以适当的威严在欢欣鼓舞中登上了帝位。为了换取特殊权利，俄国给予这个新政权以除了事实上的承认以外的一切必要的鼓励和援助。在呼图克图加冕的同时，第二个蒙古使节团抵达圣彼得堡，在 1912 年 1 月初，俄国政府正式宣布了它的政策。俄国否认在蒙古怀有任何领土野心，并声称它愿为中国及其藩属进行调解，不过中国只应保持宗主权，而不得实行直接统治。俄国愿帮助蒙古实行改革，但要求在那里保持和平，维护贸易，并停止中国的殖民政策。既为一跃而处于军事强权地位的一个远东帝国所击败，俄国为了避免招致第二次的祸患，是不肯再让边境上出现一个不管是蒙古还是中国

俄国政策

的强大军事国家的，因为这样一个国家，一旦攻占了西伯利亚铁路，就可切断俄国与太平洋的交通。

袁世凯的对蒙政策

566 在 1912 年 2 月 12 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了谋求外蒙古与中华民国合并，曾经提出过几次外交建议。这些建议都归于失败了。俄国这时却向前走了两步：第一步是，在 9 月间通知中华民国政府说，俄国认为 1881 年的条约仍然有效，但是俄国境内沿边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哩的自由贸易地带，将依照中国的愿望，自 1913 年 1 月 1 日起予以撤销；第二步是，它在 11 月初同蒙古订立了一个条约，承认后者的自治，保证给予援助以维护其自治权，并且同意蒙古有权组织自己的军队和阻止中国军队或殖民者进入这个国家。附于条约的一项议定书，扩充并确认了俄国在蒙古的利益，并经明文规定，凡未给予俄国人的权利，不得给予任何外国国民。1913 年 1 月，西藏的达赖喇嘛和蒙古的呼图克图互相承认为独立国的元首。

俄国稳步进入外蒙

在拒绝了袁世凯总统提出的把外蒙古和中国的命运重新联合起来的要求以后，呼图克图进而表示此后两国之间的外交来往应通过俄国居间进行。1913 年 3 月，中国政府向圣彼得堡呼吁，11 月中，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该约，俄国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而中国则承认了这个地区的自治。通过这项条约，俄国的地位由于中国承认了 1912 年 11 月的条约所给予俄国在蒙古的权利而增强了。

欧战爆发的结果

欧战的爆发使俄国可以很容易地再迈进一步。1914 年 9 月 30 日，它同呼图克图的政府代表在恰克图签订了两项条约。根据第一项条约，它得到了铺设一条电报线的让与权，这条电报线得由蒙古在三十年后备价购回；根据第二项条约，蒙古保证在决定铁路路线时征求俄国的意见，采用俄国的轨幅并且非商得

俄国同意不给予非俄籍外国人以筑路让与权。

在此后九个月中，中、俄、蒙代表们积极从事于准备一个三边条约的签订。磋商的旷日持久以及所争胜利品的价值之大，构成了日本决定为保卫其大陆上的地位而于1915年1月向袁总统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包含这些要求的条约于5月25日签字。不到两星期以后，在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订了一项三边条约。外蒙古承认中国继续享有宗主权，并同意不同外国签订有关"政治和领土问题"的条约，虽然得签订有关工商业的条约。中俄两国再次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双方同意不干涉它的内政。袁世凯总统册封呼图克图为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中俄两国代表都享有单独觐见的特权。中国得派员驻库伦办事，参赞人员得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但其武装卫队的数量将受到严格限制，有如俄国领事和副领事的卫队一样。对贸易和司法事项都作了详细规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中国重新确认了1913年11月5日的条约，允对一切有关政治和领土性质的问题都征询俄国和外蒙古的意见。这就意味着俄国已经和中国同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正如英国事实上在西藏的情形一样。

567

1915年6月7日的三边协定

568

第二十七章　世界大战：对远东的影响

1. 日本对德国：对欧洲的第三次挑战

大战前夕的远东

1914年夏季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远东是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的。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所加的压力和俄国在蒙古的压力的一并撤除，似乎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至于崛田伯爵、谷子爵和林伯爵嘱咐他们国人伺隙而动的那个时刻已经到来一节，则是日本政界以外的人士很少认识到的。

日本宪法

1889年日本宪法的颁布和翌年第一次帝国国会的召开，为互相矛盾的各利害关系方面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斗争，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些斗争和二、三十年后北京方面的那些斗争，虽同样令人叹为大观，然而并不象后者那样无补于实际的。日本宪法比中国方面迄今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略见功效，其所以如此，大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表面上似乎是以民主政府代替了传统的极权的专制政府形式，实则这后一种形式已在人民不知不觉之间作为主要部分被保全在新的成文的根本大法之中了。国会在初成立的八年当中，曾被日皇解散过五次之多。在1898年以前，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势力始终保持，未曾中断，首相则是由这两个藩当中轮流任命。长州藩控制现代日本的陆军，萨摩藩则控制海军。

藩阀统治的政府

在 1898 年，在新组成的宪政党联合内阁的大限和坂垣的领导下，作了第一次的组织政党政府的尝试，这个政党的领导人是不属于两大藩中的任何一个的。既无力实行和平分赃，再加之文部大臣尾崎行雄的一篇毫无忌惮的演讲，对于日本一旦实行共和制，哪一类人会当选总统一节，妄肆揣测，这就使这个政府很快倒台了。

569

元老派和官僚政府

除了天皇和藩阀之外，在日本政府中，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即元老派和官僚。元老派是藩阀领袖所组成的一个宪法外的集团，自天皇重新当政起，几乎直至今日，政治始终为这一集团所左右。他们既是天皇的私人顾问，又操有组阁和倒阁的实权，元老派两个世代以来实际上享有绝对的权力，而且和政党政府相对立的官僚政府，就是他们予以支持的，然而现在只有西园寺①这一位硕果仅存的元老了。虽有时日本首相迫于舆论而辞职，官僚分子和政党分子在国会中不断的争吵引起全国反响，但是代议政府的原则——内阁是立法机关中多数党的一个委员会并对国会负责——在理论上向未得到承认，在事实上也向未遵行过。

军人在日本的地位

穷兵黩武的寡头官僚领袖们之所以能不顾日益高涨的要求自由民主政府以及减低海陆军开支的呼声，而事实上一直控制着国家的命运，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成功地领导过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并诡计多端地兼并了太平洋中和亚洲大陆上的领土。1870 年，长州藩的山县和萨摩藩的西乡从道奉派往欧洲研究西方军事科学。结果是实行了征兵制，并在 1877 年的萨摩叛乱中发挥了作用。几年之后，一位普鲁士军官迈克尔将军受聘为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又建立了一支海军，并且在 1892 年，几乎与

① 西园寺公望已于 1940 年去世。——编者

明治天皇与海军

德国海军力量发展的同时，睦仁天皇①表示决心要扶植本国的海上力量。

日本外交上的复视病

尽管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官僚们控制着政府，可是在建立陆军和海军两事的愿望上，他们却往往意见不一致。前者因为菲律宾以北的各海和岛屿已经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而觊觎大陆；后者则集中其注意力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岛屿，以及在各该地区内的战略基地。

570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在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若干年前，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们就利用日本，以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经济支援来推翻清朝。在反满运动爆发的时候，日本政府的政策究竟怎样，当时殊属暧昧。四川刚刚起事，陆军省的中国问题的权威斋藤将军就奉派前往该地，他抵达汉口时，正赶上观察革命发展的情况。革命党人向日本要求顾问、军火和借款；尽管日本政府保持正式中立，他们却得到了前两种支援。日本政府很巧妙地大要其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于1911年12月派遣松井庆四郎(后封男爵)赴北京，会同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后封伯爵)，以满洲作为交换条件，洽商支持清廷；同时又派日本外务省的美籍法律顾问邓尼逊前往上海与革命党人谈判。12月8日，桂太郎公爵宣称，"为了远东的和平起见"，日本出面干涉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五天之后，伊集院彦吉正式通知袁世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日本都不会承认中华民国。与此同时，日本又增添驻满洲的军队，而横滨正金银行也开始同满洲人——而不是同袁世凯——谈判借款，供军事之用。

两面派的手法

英日不和的前兆

这时，英国对它的盟国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提出了一系列的抗议；英国反对外交、财政或军事方面的任何形式的干涉。结

① 即明治天皇。——编者

果是：拟议的两项贷款被打消了，干涉没有实现。1912年2月2日，当内田子爵在议会中受到关于他对华政策的质询时，他承认，由于其他列强以日本中立政策正遭破坏而提出抗议，日本的计划和行动不得不有所变更。英国以后所持的克制态度以及它给予袁世凯道义上的支持，可以看到三个结果：日本把它谋取新利权以控制中国资源的企图，推迟了三年；两盟国之间的关系冷淡到这样的程度，以致1916年日本报界对英国人民和政府的严厉攻击竟获得东京政府的许可，而且，日本政府自从1907年以来，大致一贯地同俄国靠拢，所以终于在1916年，曲解1911年英日同盟的条款，与沙皇政府订立了一项秘密条约。 571

远东与世界大战

当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战争地区是否会蔓延到远东这个问题立刻就发生了。8月3日，中国要求：不得在中国本土，在租借给英、俄、德、日的中国领土，或中国的领海内，进行敌对行动。三天之后，中国以大总统令宣布中立，并请求美国斡旋。对于请求美国而不请求近邻国家出面斡旋一事，日本政府在其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的前二天，对北京政府曾加责备。美国建议各交战国应严格限制敌对行动的区域，以保全远东的现状。对于这一点，德国和英国都表示同意。然而，维持现状一节，是不合日本的心意的。

日本致德国的最后通牒

早在8月8日，日本军用船只就已出现于山东海面。一星期后，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劝告"它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这次，日本为了"确保东亚稳固而持久的和平"，"诚恳地"相信它有"责任劝告德国帝国政府执行下列两项建议：

"(一)立即从日本与中国的领海内撤回德国所有各种军舰及武装船只，凡不能撤回的军舰船只等，应立刻解除武装。 572

"(二)必须在9月15日以前，将胶州全部租借地，无条件

地、无偿地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俾最后将该地归还中国。”当时给予德国八天时间来考虑“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条件，逾期则“日本将不得不采取它认为应付当前局面所必需的某些行动”。

英国就日本参战所发布的公告

在这项通牒发出之前，英国政府一直没有得到有关的消息，它切盼能保持远东现状，并早于8月间就谢绝了日本愿出兵相助的建议。三天之后，英国政府发表了下述声明：“英日两国政府，在互相保持联系之下，一致认为：各该国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以保护英日同盟所考虑到的以及盟约所规定的远东地区的一般利益，而特别要注意到中国的独立和完整。不用说，日本的行动，除了为保护该国太平洋航线所必需的以外，将不会超出中国海而扩展到太平洋，也不会超出中国海以西的亚洲海面，更不会扩展到东亚大陆上德国所占据的领土以外的任何外国领土。”这项声明，就其对两国政府的动机并未作任何说明这一点而论，是词意含混的，可是就它严格限制日本的行动范围这一点而论，却是非常明确的。尽管根据英日同盟的条款，日英两国受共同媾和的约束，然而，日本却于10月19日签署了1914年9月5日的伦敦协定，根据该项协定规定，英、法、俄一致同意共同媾和。当意大利接受这一协定时，日本又于1915年11月30日再度签字。所以看上去日本并不是由于英日同盟的规定而参战的。

胶澳租界条约中的“补偿”条款

胶澳租界条约（又称德租胶澳专条）第五款中载有中国方面的一项诺言，即“嗣后如德国租期未满之前，自愿将胶澳归还中国，德国所有在胶澳费项，中国应许赔还，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与德国”①。于是日本警告中国说，归还胶州是绝不许可的。中国本身原可毫无困难地向德国宣战，攻取胶州，因为德国对任何规模的武力都是不能长期抵抗的。但是，日本暗示不同意中国

573

① 录自条约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739页。——译者

参战，并在8月20日通知外交部说，中国最好不要有什么举动，因为胶州事件已与中国无涉。三天之后，日本未收到柏林政府的答复，于是正式向德国宣战，并封锁胶州湾。

1914年德国在东方的海军活动

统率德国远东舰队的是海军上将麦克西米良·冯·斯比伯爵，他在义和团时期，供职"布兰登堡"号战舰，任副舰长。8月12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前三日，德国政府训令其驻日大使列克斯伯爵："东亚舰队已奉命在日本保持中立的场合下，避免对英国采取敌对行动。请即通知日本政府。"对于这一节，日本除当日即动员其舰队之外，并未置答。当战事开始时，海军上将冯·斯比率同旗舰"向霍斯特"号、"格奈塞瑙"号这两艘装甲巡洋舰泊于南海中的加罗林群岛。轻型巡洋舰"爱姆登"号是停泊在中国领海中的唯一具有危险性的德国军舰。"爱姆登"号带着这位海军上将的紧急公文驶入青岛，于8月初向海参崴进发，夺获俄国辅助巡洋舰一艘和商船一二艘。旋由该处南驶，往马利亚纳群岛与海军上将冯·斯比会合。8月14日，"爱姆登"号离开主力舰队，驶往东印度群岛作闻名一时的突袭航行；自战事爆发时起，至11月9日该舰在科科斯群岛被击毁时止，计击沉俄国轻型巡洋舰一艘、法国驱逐舰一艘和价值美金一千万元的英国商船二十三艘，同时并破坏了在槟榔屿和马德拉斯的供应站。10月下旬，海军上将冯·斯比与轻型巡洋舰"来比锡"号、"纽伦堡"号和"德累斯顿"号会师。11月1日，他在智利海岸科罗内耳地方以外的一场海战中，击败了英国海军上将克拉多克，后者与其所搭乘的船只"好望角"号以及另一艘"芒默思"号同沉于茫茫大海之中。12月8日，海军上将斯特迪率同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与冯·斯比相遇于福克兰群岛之外；后者和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向霍斯特"号、"来比锡"号和"纽伦堡"号等舰一并葬身

于大海之中。"德累斯顿"号脱逃之后，旋在太平洋上胡安·费
574 南德斯群岛外被击沉。德国在东方海洋上的海军力量从此告终，而青岛（胶州）也不再是具有任何危险性的一个海军基地了。不过，在那个区域内，却正发展着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日本海军方面的准备

日本在宣战三日之后，即8月26日，就将战斗巡洋舰"伊吹"号及巡洋舰"筑摩"号划归英国海军上将杰拉姆统率下的英国驻华舰队指挥，之后不久，又有六艘日本巡洋舰加入。与此同时，海军中将加藤率领一支由1905年获自俄国的三艘船只组成的舰队，驶离台湾基地，在距青岛十哩处，布成半圆形的阵容，就此开始了对这一德国领土的封锁。海军大将加藤宽治以及日本的主力舰队暂时留驻台湾附近和华东沿海一带。原拟短时间参加对胶州军事行动的英国巡洋舰"凯旋"号及炮艇"肯尼特"号，则卫戍华东和华南沿海一带，以防可能来自德国方面的攻袭。胶州湾进口处遍布鱼雷，停泊口内的计有已被解除武装的奥国巡洋舰"凯塞琳·伊丽莎白"号，德国驱逐舰"S-90"号，以及商船若干艘。这个德国租借地对抵抗围城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布置就绪。驻青岛的警备队只有一千六百名，但是，由于驻扎东方各地的约三千名德国后备兵纷纷云集，因而得到了补充。

日本进攻山东的战略

德国方面正等待着海上的正面进攻，可是，日本却决定由陆路兜攻后方。为了执行这一计划，日本运输舰艇载同士兵二万人驶至德国并无利害关系的山东半岛北岸。日本巡洋舰和运输舰驶入龙口，并且超过了中立地位所许可的停泊二十四小时的时限。日本远征队伍即于9月3日在这里登陆，占领了该城，并

侵犯中国中立

准备越过中国领土，直趋胶州。他们铺设了一条通往胶济铁路上潍县的长达七十五哩的军用铁路和电报线，接管了中国海关和邮政局。日本军队驻屯在中国民房，掠夺军队所需的各种给

养，价款则以日本军票付给。凡日军足迹所至，人民备受粗暴虐待，有时竟惨遭残杀。日本军队于9月26日抵达距德国租借地一百二十哩的潍县，夺占了车站，并利用中德私营的胶济铁路将军队运至济南。德国所办的矿场也被接收。鉴于世界舆论对德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颇为重视，确有必要仔细讨论一下日本侵犯中国中立的行为。从8月15日日本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起，尽管它在早些时候曾经有过尊重中国中立的保证，显然，日本绝无意要听由中国的中立妨害到它在山东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在它发出最后通牒的前两天，它曾清楚地表示不同意中国拟将沿海一带中立化的举动。 575

为什么是无可抗辩的

对租借地本身的进攻，是无可置辩地破坏中国中立的行为，因为来自德国方面的危险并不是"立时的、无法抵挡的、别无其他办法的和不遑考虑的"——这是国际公法上认为非此不得破坏中立的必要条件。严格地讲，这个责任是应该由中国自己、德国、英国和日本来分担的。中国虽不是应注意而未注意，一如它一再提出的强烈抗议所证明的那样，然而太软弱了。德国曾利用铁路从济南运入士兵和给养，而且，"爱姆登"号是从青岛出发到远东海面进行袭击的。英国纵然没有予以鼓励，却纵容了日本的行为。不过，侵犯中国中立的主要责任应加在日本头上。

破坏中立的责任

因为，引起中国和世界公愤的破坏中立的行为并不是占领胶州这件事本身，而是日军在租借地以外的区域强行登陆，攻占领土，夺取铁路和电报线，并在军队所至之处，对中国非战斗人员横施残暴的行为。以租借地以外的地区作军事上的使用，并无必要，巴纳迪斯顿少将于9月24日由天津赴青岛去同日军合作时，即有所部九百一十名英国官兵和四百五十名锡克兵的一支队伍，在位于租借区域之内，但在德国炮程以外的劳山港口登陆 576

德国和日本在侵犯中立地位的行为上不同之点

一事，可作为证明。日方将英国队伍置于从属的地位，对于英军的开到显然并不欢迎。德国人的侵犯比利时中立，事先曾请求借道。日方则是仅仅向中国宣布了一下他们的意图。然而，比利时是处于欧洲而且是能够作战的，而中国却是处于不太注意遵守国际法的亚洲，而且它连表示一下自卫的姿态都没有准备。

中国划定战区

北京政府一经得悉日军在龙口方面登陆的情事，就发出一份正式抗议，对方却完全不加理会。之后，它听从日本顾问有贺博士的劝告，援日俄战争的先例，在龙口和胶州之间划出一个战争区域。然而，日本军方对于这项战区界限，并不比对德国租借地界限，更加重视。事实上，日俄战争时的办法不是一个恰当的先例，因为当时那个战区是为双方相互的利益而划出的，而且是得到交战国双方同意的，而在1914年所划定的战区则只是对日本有利——而且为德国所反对。在9月份，中国对日本破坏中国的中立，提出过三次抗议，日本都未予置理。

神尾将军的双重荣誉

9月12日，日、德双方首次在即墨交锋，德方于当地有驻卫军十名。在互击中，二名受伤，德方随即后撤，日方即加以占领。在龙口的基地既已发挥了作用，日方于是移至劳山湾；劳山湾一部分在德租借地内，一部分在租借地外。9月中旬，在英国将领及其部队到达之前不久，一万五千名日本军队即在该地登陆。日英军队都由神尾将军节制，因此他得到了双重荣誉——在日本民族中统率欧洲人作战的，他是第一人，同时又是日本人中率领欧洲人同另外一些欧洲人斗争的第一个。

"S－90"号和"高千穗"号

10月中，分布在内地保卫公路并阻截日军的德国士兵，逐渐地被日军迫退至青岛防御工事以内。在这几次交战中，有一次日方夺得四门大炮，这些都是普鲁士军于1870年战事中夺自法国方面的。这时日方也是第一次得到测验它们空军能力的机

577

会，日空军在青岛城上空投掷炸弹，并将德国军队调动的情况随时通知日方的陆、海军。10月17日夜间，德国驱逐舰"S-90"号顺利地从青岛港口驶出，并击沉巡洋舰"高千穗"号。二十八名军官和二百四十名水手被溺毙，得救者仅军官一名、水手十二名而已。"S-90"号逃避至中国领海内，旋即搁浅。舰长及水手均被中国方面拘禁，但日本军队翌日在直接违反1907年海牙公约(第十三次)第二款的规定下，将该炮舰攫夺而去。据该款的规定，禁止交战国战舰在中立国领海内采取敌对行动。

青岛陷落

10月31日开始对青岛作海陆总攻。一周之后，德军奉准德皇投降。11日，联军开始接收该城，16日，英日两国军队奏凯进城。日本司令官在围攻当时和攻占之后，对于德人极为优待。当德国军官和商民抵达日本等待囚禁的时候，也受到同样的礼遇。

在山东战役中，日人之收获与损失

在山东战役中，日军死伤一千九百六十八人，除"高千穗"号巡洋舰外，还损失了驱逐舰和鱼雷艇各一艘。为弥补"这项生命财产的重大牺牲"，他们把在山东劫夺的德国租借地和财产一直扣留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胶济铁路的德国员司一律由日人接替，在济南配置了一支日本警备队。日方在山东内陆各地树立界石，建造石砌混凝土营房，大有永久占领的模样。神尾将军受任青岛总督，并且未征得中国同意，就擅自在租借地内外行使警务和收税的权力。青岛对外地的商业停顿达数星期之久；不过，有一条日本轮船航线得到了使用这一口岸的许可，其他各国船只则完全被排除。直到1915年1月1日，该口岸方开放通商。

578

关于青岛海关的问题

在德租借时代，经中德双方议定，青岛海关税务司一职应由总税务司派德人充任，至该关所用洋员，亦应尽量选派德人。这时日方建议，税务司一职以及全体关员，应一律改由日本政府委

派日人担任。中国拒绝接受日方建议，这个问题一直拖延到翌年8月，在允给日人在中国海关以较大的代表权的附加条件下，日本方才同意按照德国的先例办理。

大隈侯爵担任首相

1914年4月至1916年10月，素以自由派和对长州、萨摩两藩抱批评态度闻名国内外的大隈侯爵，担任首相。8月15日，即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大隈首相发出一封电报，交由设在美国的一家日本半官方通讯社纽约东西社在美国发表，略称："日本的邻近中国，惹起了许多无稽的谣言；但是，我宣布日本的行动是问心无愧的，符合正义的，而且是同它的盟国完全一致的。日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愿以东方的和平保护者自任。"三天之后，他在东京发表谈话说："日本的军事行动，以保卫本身合法利益为目的，不会扩展到为达成此项目的所必需的范围以外。帝国政府决不采取任何行动，致引起第三者对其领土或属地的安全问题，发生焦虑或不安。"24日，他再度向美国人发出一项消息，其中略称："窃愿美国人民深信日本政府及人民就目前远东和欧洲方面令人遗憾的局势所作的声明具有诚意……我曾以日本首相的资格向美国和世界人民声明过，兹再声明：日本并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或攫取更多领土的要求，也不想剥夺中国或他国人民现所占有的一切。日本政府和人民曾经答应并保证信守诺言，正如向来的情形一样。"然而，在11月间，青岛的陷落使腔调为之一变。大隈首相向《新日本》编辑发表下述声明："优越民族应统治劣等民族。我相信在二、三世纪以内，世界上必会出现少数伟大的统治国，而另一些国家则将受它们的统治，服从它们的武力。例如，英、俄、德、法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国家。今后，我国应黾勉去作这样一个统治国。"

他的声明

579

"优越民族"

12月9日，东京帝国国会提出了日本政府对于归还胶州一节是否作过任何保证，以及是否有此计划的问题。加藤男爵答称，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当时是无从回答的，但是他接着说："最后通牒的目的是要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以便恢复东方的和平。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在一次战役之后即交还胶州，在最后通牒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归还胶州问题

1915年1月7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驻北京的英、日公使说：既然战区不再有必要，这一区域的原有地位应即恢复。尽管日方曾经抗议划定战区，并自始即不予理会，可是现在他们却反对取消战区，并声明他们决不"容许日本军队在必要时期内的调动受到取消战区行为的影响或限制"。由于英国曾经严谨地遵守战区规则，现在又同意取消战区，所以，中国政府又向日本公使单独发出最后的一份照会。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在叙明了划定战区前的种种原因以后，接着说道："我方的声明既是独立行动，目前自可以同等独立方式予以撤销——根本无需取得任何方面的同意。阁下认为我方撤销特区的声明出于武断或并不恰当一节，殊难理解"，——同时，并提醒日本方面说：既然日方的目的在于"确保远东和平"，中国现在正是本同样的目的而撤销战区。日本于一切准备都已就绪之后，日本报界就以威胁的口吻扬言日本已遭到"侮辱"，日置乃于1月18日亲自向袁总统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

中国的取消战区

580

2. 二十一条要求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久，所谓黑龙会备忘录似乎就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来了，读其内容，不能不令人想起崛田、谷、林等勋爵的写作。"目前欧洲的风云激变，"备忘录的执笔人这样说，

黑龙会备忘录

"是历史上无双的。不独危害欧洲的平衡，影响遍及于寰球，且结果势必在政治界和社会界创一新领域。是以，日本帝国政府能否解决远东问题，实现我伟大的帝国政策，端赖我能否善于利用世界大势，以伸张我权势，决定切合实际的对华行动方针。倘若我官民漠视目前欧洲战争，不深加关切，而专心致力于攻打胶州，忽略战争之更大问题，则必将使我伟大的帝国政策成为泡影，铸成不可设想的大错。……今天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时机。这样一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今天，不但采取行动是日本的神圣责任，而且目前中国的局势实有利于执行这样一个计划。我国无论如何须下定决心，立即行动……"接下去便详述中日"防守同盟秘密条款"的大纲，俾凭以取得对其邻国在财政、军事和政治上的控制权①。

二十一条要求的面面观

在考虑这些要求本身之前，有几点必须澄清。首先，虽然这些要求是在1月18日夜晚提出的，可是，上年12月3日就已经在东京交到日置公使手里了，并且确切地说，"帝国政府为图时局之善后，且巩固帝国将来之地位，以永远保持东洋之和平，此际意图与中国政府缔结大体如别纸第一号至第四号所述趣旨之条约及协定"②。日本事前不露声色，一直把这些要求保留到两国政府对取消山东战区问题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似可作为借口时，方才越过通常的外交途径而直接递交袁总统。这些要求是写在日本陆军省绘有机关枪和无畏舰的、带有透明水纹的笺片纸上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上年12月25日大隈首相在帝国国会中所宣布的原则："欲使我国在外交上更能发挥作用，如诸君

581

① 《美国外交档案》，1915年，第132－137页；另参阅普特南·维尔：《中国为共和而斗争》，第7章。

② 录自《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85页，转译《支那关系条约集》，第367页原文。——译者

所希望的那样，就需要有更大的武力作为外交活动的后盾。所以，政府方面已拟妥扩充海陆军方案。"然而，对于海陆军拨款往往加以非议的那个议会，却拒绝通过必要的经费；因而，按照惯例，解散议会，并下令在三个月之后举行新的选举。所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涉，是在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无法提出质难时进行的。

第一号——山东

这些要求依性质分为五号。第一号是有关山东问题的。日本要求中国允诺 (1) 日后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的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的一切权利等项处分，概行承认；(2) 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他国；(3) 由日本建造自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的铁路；以及 (4) 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满洲和蒙古

第二号是关于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的，"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①。中国须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并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相同。这样，辽东半岛的租借满限年月将由 1923 年改为 1997 年，南满铁路的租借要由 1928 年展至 2002 年，安奉铁路的租借须至 2007 年届满，不是以十五年为限。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从事各种工商业"，并"租借或拥有土地"；他们还享有"各矿开采权"，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定。中国如在上开地区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政府商议，如允准他国人在上开地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款，或以上开地区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时，均须先经日本政

582

① 录自袁世凯朱批二十一条原译文，见《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 92 页。——译者。

府同意而后办理。

第三号——汉冶萍

第三号是关于两国对湖北省武昌和汉口对面汉阳地方的汉冶萍公司的共同利益问题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开采铁矿和炼铁公司。日本要求："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不得任意处分，并且，该公司应在附近一带，保持独占权利。

第四号——中国领土之割让

第四号要求是，"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不让与或租与他国"①。

第五号——综合的要求

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一个保护国的一切必要条件，如果在前四号中还有什么遗漏，都一并简洁扼要地在第五号中汇总提出来了。中国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并"允认日本臣民在中国有布〔佛〕教之权"。须将"重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至少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中国须"向日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最后，日本要求凡"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港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须先向日本协议。

583

第二十二条要求——保密

人们只要温读一遍朝鲜名义上独立的末期历史，就能了解这些要求的重大意义，同时，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公使将二十一条直接递交给总统，并警告他说，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必须完全保密。这些要求所以起了使中国政见不同的分子团结起来的

① 录自条约原译文，见前引书。——译者

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总统的政敌也都支持他进行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从这些要求上，可以看清日本的五重政策：即，经济剥削，领土扩张，至高无上的势力，政治控制，以及"亚洲的门罗主义"①。

日本的五重政策

保密是办不到的；某位阁员于22日以二十一条的内容告知了美国公使芮恩施博士；三天以后，北京的报纸就纷纷发表议论了。27日，日本就提出要求一事，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发表声明正式否认，而英美各报纸就根据这项声明，拒绝刊载它们驻北京通讯记者的报道。2月3日，东京外务省否认日本正向中国提出任何侵犯中国领土完整或损害外国在华权利的要求；不久之后，又向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政府发出了一份经过删改的要求清单。其中简略地开列了前十四条中的十一条，而第五号则全未开列。2月17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了二十一条的原文；五天之后，日本又开出了原来漏掉的七条原文，不过解释说，这几条只是劝告，而不是要求。但日置公使却通知袁世凯说，这些要求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而且一直坚持到4月2日。日本所施的这套伎俩，乃是仿效1900－1903年俄国在满洲所创的先例。

日本之否认

584

修正说明

自二十一条提出之日起至订立条约以结束谈判之日止，五个多月过去了。5月7日下午三时，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下午六时以前接受第一号至第四号所开各项要求以及第五号有关福建的要求，倘无圆满答复，"帝国政府将采取为应付局势而认为必要的独立行动"。第五号其他各项留待"日后另行协商"。

1915年5月7日的最后通牒

中国没有能够同日本作战的陆海军或领导人物。整个西方

① 参阅鲍明钤：《中国外交史》，第181页及以下各页。

美国政府之反对

世界都集中全力于欧洲的战斗；而日本又是英国、法国和俄国的盟国。对东方的这段公案还加以过问的，只美国一国而已。3月13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收到一份备忘录，国务院在这项备忘录中，于重述美国的远东政策并提及罗脱－高平换文之后，指出这项政策依旧没有变动，而美国的条约权利须予尊重。美国反对给予任何国家以在福建的特权，以及采办军械和聘用顾问的要求。至于山东、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地，美国政府承认"因土地毗连，在日本与各该地区之间造成特殊的关系"。5月6日，国务院电与争双方政府，"劝相忍相让"，并于11日以同文照会电达北京和东京。13日，芮恩施将这项照会送达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美国政府声明，"凡损害美国和旅华美国人民之条约权利、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对华国际政策（即世所共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任何协议或保证……美国政府概不能承认。"芮恩施公使并指出，凡允准日本臣民在满洲享有的任何居住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各有约国人民应一体均沾。5月15日，这项声明经美国政府予以确认。

585

1915年中日条约

中国除去答应日本的条件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在5月25日，就签订了关于山东省的条约，以及关于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条约，并就这两份条约以及汉冶萍问题、福建问题进行了换文。除去把"他国"一词删去之外，中国接受了关于山东的一切要求，同时中国宣布："将山东省内或其沿海一带之地或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租与或让与外国。"日本则宣布准备战后在四个条件下，将胶州归还中国：(1) 以胶州湾全部开放为商港；(2) 设置日本专管租界；(3) 如列强希望开辟公共租界，可另行设置；(4) 关于德国财产的处分，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应协商解决。

在关于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的条约内，中国并未承认第二

号要求的前言中所提到的日本在这些地区的"优越地位"，但是，除去吉长铁路租借问题外，却对日本在南满的希求作了让步①。在东部内蒙古方面，中国仅同意开辟商埠，与日本公使协商后决定。中国同意"嗣后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需造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如需外资，应先向日本资本家商借"。

南满洲与东部内蒙古

586

关于汉冶萍公司，日本以日本资本家曾于 1911 和 1912 年两度给予贷款，认为有切身利害关系。中国以一项换文，表示如有合办可能，即予允准，并同意"不将该公司充公，且未得日本资本家之同意，不将该公司收归国有，也不使该公司借用日本国以外之外国资本"。

汉冶萍公司

5 月 8 日，日本公使馆又要求中国政府，在对最后通牒的复文中，加入对第五号中各项"容日后协商"一语。在 5 月 25 日关于福建问题的换文中，日方又要求中国对于是否有"在福建省沿海地方允许外国设造船所、军用贮煤所、海军根据地，或建立其他军事设施，以及自借外资以建立上述设施之意"，有所表示。中国复称并无此种意图。1915 年 5 月 25 日签订的条约订明由盖印之日起生效。这项条约未经中国国会依照宪法规定予以批准，并且自始至终就被中国人民视为无效的。

福建

3. 中国与大战

在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之前，一年多以来筹划恢复帝制的迹

① "可是，中国却同意修订当时有关该铁路借款的现行协定。这一点是在 1917 年 10 月 12 日办妥的。借款期限为三十年，在贷款期内，全线均归南满铁路公司经营。关于建设铁路和其他用途的借款以及聘用顾问等事项的换文中，最后采取的措词并不是命令式的而是许可的口气，但是一个弱国在一个强国的威逼之下，这是无所谓的。"——威廉斯：《中国的今昔》，第 591 页，第 4 版，纽约，1929 年，托马斯·克罗维尔公司出版。另参阅麦克墨莱，前引书，第 2 卷，第 1221、1390—1394 页。

对于恢复君主政体的准备

象，已经比比可见。二十一条本身更增加了对这个运动的刺激作用。随着把袁世凯作为俯顺舆情模样的种种布置渐渐就绪，袁氏遂于12月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举行登极大典，虽然日、英、俄三国政府已在10月28日就劝请暂缓改变政体。不久，云南爆发了反对帝制计划的起义，贵州、广西、广东随即响应。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向这位即将登极的皇帝提出了秘密而直接的警告，劝他切不可再进一步推行帝制计划。1916年1月26日，袁氏宣布登极大典暂缓举行。由于起义的继续扩展。袁氏乃于3月22日取消了全部帝制运动，但是对于要求他辞职的呼声却置之不理。这个僵局总算随着袁总统于6月6日逝世而告终，但是国家却陷入了严重的局面。从善后借款得来的款项已浪费尽净，而袁的背叛民国则为在他死后当权的军阀们创了一个争先效尤的恶例，结果是公德心沦丧殆尽。以合法选出的副总统黎元洪将军继任总统，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8月初国会重新开会，内阁随即组织成立，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587

日本的警告

袁世凯逝世（1916年6月）

黎元洪继任总统

除了国内纠纷和中国积极参战的问题以外，由于日本重又企图实现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全部，中日两国之间还正在进行一场外交上的斗争。1916年8月，中国和日本的士兵在满洲和蒙古边境的郑家屯地方发生了一场冲突，日本兵伤亡数人。日本在这个远离南满铁路地带的城镇原没有驻兵权，但日本政府不顾事实，竟向中国提出苛重的要求。日方要求中国允准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某些地方，派驻警察官，以保护日本臣民。中国更须同意“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驻扎之中国各部队，聘用日本将校若干名为顾问”，以及“中国士官学校聘用日本将校若干名为教官。”

1916年8月的郑家屯事件

与郑家屯事件交涉的同时，大隈内阁准许报界发动了一个

强烈的反对英国和英日同盟的运动。舆论咸以英国在帝国的海外各地歧视日本人民，在南海和华南方面抵制日本的权益，并帮同阻挠二十一条要求中第五号的顺利谈判。此外更声言，日本对于德俄已不再有所畏惧，仅就美国而论，这个同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日本报刊的反英运动

588

大隈侯爵的政府所以敢于在这样一个时候允许发动宣传运动，并公开地重提它在满、蒙独特地位的要求，大部分是由于1916年7月3日日俄同盟条约的签订。1916年7月3日的协定公开声言：两关系国政府"决心协力维护远东的永久和平"，兹经同意互不参加对彼此存有敌意的结合，如缔约国之一方的权益受到"危胁"，双方当协商办法，以图防卫。原拟作为秘密协定的一部分规定，于1918年3月2日，"从彼得格勒地方，由托洛茨基－列宁政府的俄国外交部档案中揭露了出来"。缔约国同意"推诚相见"，以"保护中国不落于对俄国或日本怀有敌意的任何第三国的政治势力之下"。但是，缔约国的一方"若不能获得另一同盟国的保证，肯定给以与迫在眉睫的冲突的重要性相适应的援助"，则无须给另一缔约国以协助。条约有效期定为五年，或继续有效，直至缔约国之一方通知不愿续约之日起满一年为止。最后，这项协议"须由缔约国双方对外严守秘密"——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地说明了：俄国不忠实于1907年的英俄协定，而日本也同样地不忠实于1911年的英日同盟。

1916年7月俄日同盟

于是问题发生了：这个同盟是对付哪一个国家而成立的呢？据传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曾经说过：在俄国心目中的是德国，因为德国在1916年5月曾建议与日本单独媾和，所以希望对日本加以双重约束，以保证其站在协约国一边。但是下述几项事实却是同这种解释不符合的：(1) 鉴于美国就二十一条

俄日同盟的理由

589

要求递送给东京和北京方面的警告性照会，以及华盛顿方面对郑家屯事件解决办法所表示的关切，足证美国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的现行的、人所共知的政策，仍旧不变；(2) 在 1916 年，美国仍然是一个中立国；(3) 如果德国战败，则德国自无可畏惧，倘然战胜，则俄、日同盟当毫无用处；(4) 没有理由对反德条约"严予守密"；(5)最后，值得注意的是，1918 年，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在"俄日两国为 1921 年夏季以前有在远东共同对英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而缔结的密约"这个标题下将条约公布的。

寺内一本野政府

东京和北京政府对郑家屯事件的交涉，从 1916 年夏季一直拖延到翌年的 2 月。当时，部分地由于大隈首相和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对华政策缺少成就，元老派认为以军方的一个官僚、现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元帅接替大隈是相宜的。曾任驻俄大使并代表日本签订 1916 年同盟条约的本野一郎子爵，奉召回国担任外务大臣。在罗马担任大使职的林男爵调任到驻北京公使馆。寺内政府把郑家屯事件的交涉办完。1917 年 2 月，中国同意道歉，并偿付少数赔款。同时还有条件地答应对被指控为有过失的军官酌情惩处。日本再度暂时放弃了那些旨在巩固其在满洲和东部内蒙古的势力的要求。

郑家屯问题的解决

中俄和中法的关系

由于酿成中俄、中法紧张关系的那几桩事件的发生，中国参战问题就更加困难了。1916 年 10 月，北京从新疆喀什噶尔方面收到了一份报告，内称中国回民约有四百名为俄国哥萨克人所杀害。中国提出了抗议，而所得到的答复是，在两个帝国接壤的地带是无法辨认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同一个月份，天津法国当局对于兼并比邻法租界的一小块土地的交涉久无结果，大不耐烦，就夺占了这块素所觊觎的土地，并将守卫该地的中国警察拘禁了几天。诸如此类的事件，都成了德国宣传机器的材料

590

——然而这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在战后和会上占一个席位的必要性。

中国要求参战的早期尝试

中国的统治者们自始就认识到，欧洲的斗争会给日本在东亚一个比较自由的行动机会。“日本正想要利用这场战事来攫取对中国的控制”，1914年9月，袁世凯总统对美国公使曾这样说。1915年10月底，袁世凯的一位顾问向他建议说，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作战，中国的困难局面也许就可以得到解决，对此，这位总统答称：这种解决办法已经两度试行——第一次是早在战事初期，第二次是在1915年8月——但两次的尝试都归于失败。日本反对中国参战。1915年11月23日，英、法、俄三国驻东京大使正式请求日本外务大臣石井子爵给与日本方面的合作，会同各该国政府劝请中国加入协约国。石井子爵反对这项计划，据云曾坦率地声明日本必须小心地控制中国，并宣称：“日本对于中国组织一支为其积极参战所必需的精锐军队，不能处之泰然，对于具有四亿人口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解放，也不能不感到悬虑。”①日本政府清楚地表示的这种态度，也足以说明日本报界为什么发动那一场反英运动了。

日本的态度

日本在大战中的作用
591

早在战争初期，海军大将加藤男爵——不应与加藤子爵相混——曾经公开地反对日本派军队到近东或欧洲前线。但是在1915年2月，日本海军陆战队曾协助英国军队和法、俄的海军陆战队镇压新加坡的一支印度团队的叛变。1914年9月12日，一支澳大利亚部队曾经占领了叫做德属新几内亚的那些西太平洋岛屿，其中包括德皇威廉岛、俾斯麦群岛、德属所罗门群岛、瑙鲁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不到一个月之后，一支日本舰队占领了上述最后三个群岛

① 参阅威洛比：《外国人在华特权和权益》，修正版，第1卷，第383页。

中的几个岛屿。在占领这些岛屿的同时，日本还正协助输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赴欧的护航工作。在青岛陷落以后，事实上日本在大战中的活动仅以海军方面为限。

从远东方面取得更大支援之必要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第四个年头开始时，欧洲协约国已有疲于奔命之势。随着德国宣布将于 1917 年 2 月 1 日以后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争，协约国更加穷于应付。因此协约国也就愈益希望能使中国积极参战，以便将拘留在中国口岸的德国船舰交由协约国接受，并得在后方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英国这时恳切地请求它的东方同盟国日本在地中海方面给以海军支援。英国的这项请求是法国所支持的。因而，日本得了进一步实行其太平洋上往南扩张的海上政策的机会，正如通过青岛之役，它已经在大陆政策上取得了满意的进展一样。本野子爵向英国政府表示得清清楚楚：如果英国愿在将来的和会上，不仅支持日本对山东的主张——那是在中国参战的情形下，非予以支持不可的——而且还支持它对赤道以北太平洋上德属各岛屿的主张，那么，日本当可派遣海军前往地中海区域。英国默认了这些要求。在 1917 年 2 月 16 日的换文中所提出的交换条件是：日本答应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属各岛的主张予以支持。当时，日本指派了佐藤海军少将率领巡洋舰“红日”号和三个驱逐舰分队前往地中海。在协约国舰队正在进行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和亚得里亚海时，日本方面为它们的船只从地中海上的一个口岸到另一口岸实行护航。

日本与英国的交易

592

1917年的秘密条约

日本希望其他协约国同英国一样，对于它在战事结束后所提出的主张予以支持。法国同日本在 3 月 1 日交换了照会，法国在照会中承允支持日本的主张，而后者则答应“在促使中国同德国断绝邦交方面，予以支持”，并给予这一行动以“应有的重

视”。所谓“应有的重视”就是将所有德国人驱逐出中国，将中国领海内的德国船舰加以拘留，然后将这些船舰交与协约国，没收在中国境内的德国财产，并取消德国在中国各地的租界。法国将它对德国的仇恨带到中国去的后果，到战后愈益明显。当1917 年上半年，俄国驻东京大使力劝日本同意中国参战的时候，1916 年的密约使这位大使的主张格外有力量。在 3 月 5 日的一份秘密照会中，俄国同意支持日本对山东及赤道以北各岛屿的要求。不久之后，意大利外交部长也口头保证意大利政府“对此事决不反对”。所有这些协定都是在美国同德国断绝邦交以后而尚未宣战之前搞出来的。在威尔逊总统去巴黎以前，这些协定始终是对美国政府保密的。然而，1917 年 11 月 2 日在华盛顿签订的蓝辛－石井协定，却同这些协定如出一辙。

中国加入作战的条件

为了对蓝辛－石井协定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谈一谈中国同德国断绝关系及其正式参战时当地的情况，是有必要的。由于英法两国的人力渐渐为欧洲各战区吸取殆尽，它们转而注意中国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1916 年初，法国政府不顾德国的抗议，开始招募华工供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两地、特别是供法国本土之用，但经商定不以华工用于军事行动。共计招募华工约五万人。翌年夏，英国援法国之例，先后共招华工约十万人。其中有几百人受雇于英国各工业中心，但大多数是安置在法兰德斯和法国军区工作的。

593

美国劝请中国与德国绝交

美国政府的决定对德绝交和邀请各中立国采行同样行动，与德方击沉法国载运华工赴欧的“阿托斯”号船，溺毙华人约五百名一事，相距不过一个月。1917 年 2 月 4 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接奉美国政府劝请中国对德绝交的训令。当北京内阁正讨论绝交问题之际，日本公使林(权助)男爵已经离京；与此同

时，日本外务大臣则正在商定一项秘密条约，根据这项协定，俄国以支持日本对山东和赤道以北德属各岛的要求，作为日本劝说中国参战的交换条件。

1917年2月9日中国的对德抗议

1917年2月9日，中国向德国发出了一份照会，抗议无限制潜艇战争，并提及中国人民所遭到的生命损失，声称，如抗议无效，当即断绝邦交。一个月之后（在这段期间已经得到了“阿托斯”号轮船沉没的消息），国会两院通过对德国绝交。当国会正在对内阁的意见进行表决时，德国建议谈判的复文到达——但已来不及影响政府的决定了。德国公使及其属员于3月14日接得护照，同时荷兰公使馆代管德国各种权益。

1909年—1918年间日本对中国的贷款

594

整整五个月之后，中国于8月14日对德宣战。在这段间隔期间，主要由于总统、国务总理和国会之间的相互猜忌而引起了一场骚乱。段总理和北方的督军当时正同日本谈判借款与装备，包括中国军队所需的军官。日本既然通过它和同盟国的秘密协定而取得了它在中国和太平洋地位的保障，所以，就决心在中国备战和参战方面以领导人自居。毫无责任感的军阀们正愿意不惜以几乎所有的一切抵押给日本，包括不是他们控制的资产在内，以换取贷款，而日本虽为国际财团的成员，却亟于作成这笔交易。自1909年至欧战爆发这段期间，日本贷给中国的款项，几达两千五百万金元（四千九百六十七万日元）；自大战爆发到1918年之间，又另贷给了三亿九千一百三十四万日元之数。1918年这一年的贷款竟达二亿五千万日元。外国货币从来没有那样大量地在北京泛滥过；它也从来没有这样无耻地浪费过。1918年9月，寺内内阁的倒台使日金向中国的流溢和以中国工矿资源进行的易货暂告中断。

1917年4月26日，自以为是权力渊源的国务总理在北京

召开了一次督军会议。会议的目的要使国会认清“舆论”是要求对德国宣战的。5月1日，内阁通过参战案，六天之后，黎总统正式请求国会批准。国会犹豫不决；5月10日，一批暴徒蜂拥到国会，对议员进行威胁。后来得悉，这批暴徒原来是段的军队组成的；这时内阁已经辞职，剩下这位总理一个人称孤道寡，但是国会却明确表示，只要段氏在任一天，国会就一天不采取任何行动。5月23日，总统免去这位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既不肯辞职，也不承认免职令是合法的。

段祺瑞总理与督军对黎元洪总统与国会

于是，北洋系的督军纷纷宣布独立，以声援段祺瑞，前后计有奉天、直隶、山东、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各省。黎总统召在苏北率有两万人的一支反动军队的张勋将军北上，进行调解。张将军立刻动身，一面要求即时解散国会。黎总统不顾英国和日本顾问的劝阻，且非出于本愿，在6月12日的大总统令中勉从所请。三天之后，张勋进京，国会议员纷纷逃往南方。1898年的维新派、保皇党领袖康有为的到京，给了张勋以很大的鼓舞，爰于7月1日晨四时发动政变，企图复辟。

1917年7月张勋复辟

595

复辟仅有十四天这久。谢绝了公爵封号的黎元洪，不肯辞去总统职位，但逃亡日本使馆避难。副总统冯国璋声明本人与复辟运动无关。除三省之外，全国一致表示拥护共和。7月12日，五万共和军开始进攻北京。张勋将军逃入荷兰使馆，段祺瑞随即入京，重任总理。黎元洪拒绝留任，8月1日，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以补满1918年10月届期的袁世凯五年任期。十三天之后，代理总统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国会议员作为逋逃薮的广州也接着采取了这个步骤。中国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对全世界摆出了一个统一的阵容。在所有其他问题上，南北总是意见龃龉，南方各省始终是在孙中山博士的领导下，高举义

复辟的失败

旗的。

义和团赔款之停付

除了保证在召开和平会议时取得一个席次外，中国由于对同盟国宣战而得到了某些显见的好处。在前一年的2月间，协约国的公使们曾以各该国政府必可对修订关税税则和停付庚子赔款等问题善加考虑，应许过中国。这时经商定，庚子赔款得自1917年12月1日起停付五年，这就为中国每年节省下约二千四百万银元。特别是法国坚欲将德国势力驱逐出中国的决心，造成了西方列强之间的分裂，因此使它们在远东各地的势力大为削弱。德国和奥国的银行、商业和工业等企业一律封闭；在协约国船只继续使用中国口岸时扣留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共约四万吨的德国船舰移交给协约国；德奥租界由中国接收；所有在中国政府供职的德国人员均经革退；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德奥侨民都被遣送回国。

条顿民族的势力被排出中国境外

596

美国重申它的中国政策

以是否决定参战为题目而在中国国内造成的紊乱状态，是美国政府所极为关切的一件事。后者原指望中国的各敌对派系能在这一个问题上携手合作。6月6日，美国政府递致北京一份照会，表示希望不久就能恢复风平浪静的局面，并且说中国对待德国的态度毕竟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它再度重申了鼓励在远东维持强有力的独立政府这个奉行了一世纪之久的政策："中国能否保持一个统一的、单独负责的中央政府，美国深感关怀，兹切盼中国……能努力从事于重行建立一个同心协力的政府，并取得中国在国际间理应占据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论，这个照会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在日本方面却不是这样的。在日本，这个照会被解释成为未经先与东京洽商而干涉中国事务的确证。

1917年3月，俄国沙皇政府被推翻了，这个国家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以解决其多方面的问题。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前一年7月日本与俄国订立的秘密协定失效。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作为一个协约国——而不是作为同盟国——参与了战争。美国是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没有同日本订立任何特别协定的唯一大国。东京政府决定抓住英、法两国政府派遣战事代表团到华盛顿的机会，也派了它自己的代表团，去同美国就东方问题商得一项谅解。这个以石井子爵为首的代表团，在8月奉派前往，其公开宣布的目的是：同美国当局会商关于海军部署事宜，并实行船只交换，以供运送美国钢铁给日本船厂的军事运输之用。代表团的其他目的则直到三个月以后，林男爵于11月4日以载有日美协议节略的一份电报出示美国驻北京公使时，方始揭露。

蓝辛—石井谈判的理由

597

这项协定是包涵在11月2日由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石井子爵互换的照会中的。照会中重申"在中国维持所谓'门户开放'或工商业机会均等"的诚意。再度宣布说，不问哪一国政府，凡欲取得"足以侵害中国的独立或领土完整，或足以妨害列国臣民或公民在中国充分享有工商业方面的均等机会的任何特殊权利或特权者"，两国都是反对的。这些声明不过是重申1899年海约翰一柔克义的原则而已；但是，在这些声明的前言中，却将卜莱安国务卿在1915年3月13日致东京照会中所承允的下述原则开列进去："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承认，领土上的邻近造成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尤其是在和日本领土接近的地方。"

1917年11月2日蓝辛—石井协定

原来商定，交换照会一事在11月7日以前不得公布，但是，在照会签字之前，其内容就已经由东京外务省秘密地——但是正式地——透露给英、俄大使了。法、意大使也于双方商定的

协定是怎样公布的

公布日期以前，得到了消息。11月4日晚，林男爵以日美协定正式通知北京外交部。美国国务院迟至7日晨，方才通知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代表①。

协定造成的印象

598 蓝辛－石井交换照会一事公布之后，在中国造成了恶劣的印象。令人不解的是，倘使门户开放原则的含义始终如一，为什么还要这样一再加以重申。何况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同英国在1905年英日同盟条约中所承认的日本在朝鲜的"卓越利益"，不幸而太相似了。在谈判中，石井子爵曾经企图用"特殊势力"字样来代替"特殊利益"一词，但未能如愿以偿。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英国人在缅甸、北部印度和西藏；俄国人在蒙古；以及日本人在朝鲜和满洲——都靠了"特殊势力"而造成他们的地位。虽然美国仅只准备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一种据认为不危害门户开放主义的特殊经济权益；但是，它却将这种利益的承认奠定在"领土邻近"的基础上。美国方面原可辩称：就领土上的邻近而言，蓝辛－石井协定只不过是确认了犹如俄、英、法、甚至美国本身由于同样的领土邻近关系而在中国享有平等权利，或中国基于同样理由而在邻近地方享有权利那样一个旧有的明显原则

① 关于日本在华"特殊利益"的意义以及"邻近"的范围各节，立刻就发生了问题。在将这些名词译成中文时，美国使馆和日本使馆有所分歧。前者用了一个表示"特殊关系"之意的名词；后者用了一个含有"特殊地位"之意的名词。国务院授权芮恩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件照会，说明"特殊利益"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

前首相大隈重信解释这项照会如下："以往美国在华的活动，常常是轻率而欠思考的。例如，美国国务卿诺克司所提满洲铁路中立化之议，的确就是一个造次的举动。在美国向中国递送6月7日的照会，对该国提出关于国内和平的劝告时，它也把日本置之事外。美国就这样漠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理解，按照这个新协定来看，美国当不致再有这种愚蠢的举动。"关于以上所引一节及芮恩施公使所作的"当然，这些照会中没有任何事情妨碍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对任何问题的最充分和最自由的交换文件"云云一项评论，请参阅芮恩施：《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外交家》，第311页（道布尔德、多兰公司，1922年版）。

而已。然而，这项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新协定，根本未同中国洽商而竟由美日两国秘密地达成协议，总归是确凿的事实。

美国谈判的目的

根据蓝辛－石井协定来看，似乎美国已经同意日本得在中国本部享有特殊权利的地位。在交涉时，威尔逊总统和蓝辛国务卿并没有征询过国务院的任何其他人员的意见，也不知道盟国之间所签订的那些秘密协定；他们心里所打算的只不过是想加强同日本的友好关系，以便使日本更积极地参战。当1918年蓝辛国务卿受参议院委员会的质询时，已经清楚地申明，这位国务卿曾经拒绝讨论关于日本在中国的“政治或最高控制权”的问题。

599

中国的态度

照会原文经美国公使于11月8日连同一份临时说明书一并递交北京政府。翌日，外交部复称：“并再声明，嗣后中国政府仍保持向来之主义，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然而这项协定一直继续有效至1923年4月14日。那时协定才告废止，由华盛顿九国公约来实现两国的目的。

协定对于满洲和山东的影响

蓝辛－石井谈判的影响不久就在满洲和山东方面显现出来了。在这两个区域之内，日本完全按照自己对于“特殊利益”一词的解释行事。若干年来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在满洲就备受种种歧视，诸如对于某些日本货的制造商或经销商，以及对于由日本取道大连或旅顺口运货至奉天以北各地或从上海到满洲专门利用日本轮船运货者，在南满铁路上一律给以折扣或特别运货待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时，某些日本官员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变得如此傲慢无礼，以致美国驻奉天总领事不得不于1918年4月9日对究应如何应付一节向本国政府请示。“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他这样写道，“为何不应要求日本政府训令该国侦探和其他官员，使他们至少可以减轻一点那种说不下

去的和侮辱性的行动。”在山东，日本的地位由于1917年的各项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而大见增强。日本在前德国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两旁十哩的“铁路地带”内，维持军事统治达三年之久。在后一区域内，德国不但始终未要求过任何管辖权，而且在1911年甚至放弃了以前在该区域内的采矿权，以换取另外地600 方的采矿权。日本盘踞这一“地带”不去，纯粹是侵略性行为。

日本在山东的行政机关

帝国政府在1917年10月1日颁布一道命令，饬以民政代替军政。这似有将该地并于日本帝国之意，因为民政意味着永久的治理。中国立即提出抗议。12月，美国政府就所传行政方面的变更，向东京提出询问，并清楚表明不赞成的意见。东京答称，这是一种误会，并且说：“民政”一词不能解释成为“国内的”行政。于是，这个新行政当局就改名为“军政府民政署”。可是，换汤不换药，在青岛的外国教会学校须一律遵守日本文部的规定；1918年春，试图调查美国传教士人数而未果；这一地带的煤、铁矿都由日本人从事开采；日本工商业者来到后，强制征购中国业主的土地；贩卖武器的商人私运军用品，售给省内盗匪；由于海

山东贩毒情形

关被日方所接收，吗啡大量输入，并通过小贩，廉价售出。据1915年日本官方统计，日本计购入吗啡三十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三唡，其中大部分运往山东与满洲，而日本国内则是禁毒的。在英国抵制鸦片运动协会劝请英国政府禁止吗啡出口时，日方在朝鲜从事于罂粟的种植，在大连和青岛则利用承包方式经营鸦片的贩运。1918年间，从东印度方面购得鸦片至少二千箱，经由神户运入青岛。

中日协定——1918年9月24日

中外居民对于日本人在山东的行径，几乎感到同样的震愤。双方一致提出抗议。然而，欧美各国正专心致志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以致除将所得资料存档之外，不遑其他。但是，山东人民

已经组织了“各界联合会”，并且一致地在积极唤起民众，舆情之激昂，使北京的段总理及其党羽——当时称之为“安福系”——深感焦虑不安。1918年9月24日，他们同日本签立了一项秘密协定，后者同意将省会济南的领事馆警卫以外的一切军队召还，并取消民政署，作为组织经营管理胶济铁路的中日合营公司的交换条件。日本方面将握有左右这家公司的控制权。铁路本身将由日本官员指挥的中国警察负责警卫。此时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关于山东进一步的斗争以及日本在远东日益发展的优势，不久就要在巴黎予以考虑了。 601

4. 巴黎和会与远东

日本与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权

在军事意义上说，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两个多月之后，协约国的代表们在巴黎会面，商订和平条款。日本作为五个主要国家之一，在会议上得到五个席位，而中国则仅分得两席。日本代表为元老之一、两度任首相的西园寺侯爵，驻英大使珍田子爵，担任过外务相的牧野男爵，驻法大使松井先生(后封男爵)，以及驻意大使伊集院先生(后封男爵)。

中国南方与北方之倾轧

由于内战的关系，中国选派代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冯国璋将军代理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的任期于1918年10月届满。段祺瑞总理决心不让冯国璋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当选为总统。他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北方军阀御用议员们所组成的国会——即所谓安福或“督军国会”；这一批人选出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大总统。南北意见一致的只有一件事，即派遣一代表双方的代表团前往巴黎。代表团是由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分任驻美、英、比三国公使的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和中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组成的。后二人代表南方。根据抽派代 602

表制，中国得派遣二个以上的代表，所以，和会的第一次全体大会由陆、王两氏出席，而在第二次大会则由顾、施两氏出席①。中国各代表并未因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不统一而意见分歧，然而，他们在和会中的地位却因之而削弱。

十四点原则

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8日的国会演讲中所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之中，有两点似乎使中国特别寄以期望。第一点建议："以公开方式商订和约；"第五点建议："在决定所有殖民地的主权问题时，须给予有关地方居民的利益与确定享有权利的各该政府的公平主张以同等的重视，以严格遵守此项原则为基础，而对所有殖民地的权利主张作自由、坦率和绝对公平无私的调整。"倘使这两点受到应有的重视，看上去中国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然而，五大国在巴黎的代表最后达成的决议却是，实际的谈判一概秘密举行，只是偶尔举行的全体大会，方准新闻记者参加。十人委员会和后来的巨头委员会构成和会的执行部门。在十人委员会中，日、英、法、意、美等国各占代表二人。而在3月份成立的巨头委员会中，其组成人物为：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首相、奥尔朗多总理和克里孟梭总理，而无日本人员参加。对中、日争执的主张最后作出决定的，就是这后一组织。这两个行政小组的决议由全体大会加以认可。

日本、中国的宗旨和目标

日本代表在巴黎有两个宗旨和三个目标。中国代表则只有一个直接的宗旨和一个目标，那就是：保护中国不受日本的侵害，并为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物权。此外，中国希望取消对其主权的一切限制，一如中国代表提出的《希望条件之说帖》中所表示的那样。这个说帖要求废弃势力范围或权益范围，撤

603

① 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尚有中国分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的各公使以及前外交总长伍廷芳的儿子、后来任驻美公使的伍朝枢先生。

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和居留地并实行关税自主。日本的目的则是：(1) 获致对该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的承认；以及 (2) 就日本对中国独特的关系，取得西方列强的承认。日本的具体目标则是：(1) 取得西方各国对种族平等原则的无保留的承认，并将这个原则列入国际联盟盟约；(2) 将德国以前在山东省内享有的物权、权利和特权一并交由日本接收；以及 (3) 取得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各岛屿。

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意见上的分歧

和会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举行第一次大会，一星期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意见，欲将太平洋中的德属各岛作为胜利品由战胜者予以瓜分；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国联盟约纳入和约中，借以防止兼并并保证由国联对这些岛屿实行委托管理。十人委员会决定应将国联订入对德国和约之中，当经第二次全体大会予以通过。

日本要求之提出

1 月 27 日，威尔逊总统在十人委员会中建议：由日本代表提出他们的主张，并应同时邀请中国代表出席。牧野男爵表示不愿在有中国方面出席的情况下讨论“日本与德国的关系”；然而，该委员会以胶州的处分事关中国，决议于当日下午邀请中国代表出席。牧野男爵、松井和佐分利贞夫代表日本。顾维钧、王正廷和伍朝枢代表中国。牧野男爵简单地陈述了“日本如何根据 1911 年的协议，经与英国政府商定之后”而参加战争，并且在结语时宣称：日本政府认为“理应要求德国无条件地让与 (1) 胶州湾租借地，以及德国在山东省内所持有的铁路和其他权利；(2) 德国在太平洋中赤道以北所占有的一切岛屿，以及上述岛屿上面的各种权利和财产”。 604

顾维钧于次日提出中国方面的主张，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

中国的反要求

一切权利归还中国。他说：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中国的圣地，该省人口稠密，不容他国殖民，且该省与北京近在咫尺，如为外国所控制，则有危及政府之虞。牧野男爵指出，所讨论的这块领土，是通过征服而占领的，并且迄今仍在日本占有之下，但是，至于这块领土的最终处分，确有征得德国同意的必要。顾氏则声称，中国的参战"已经完全地改变了它的地位"，关于山东问题的中日协定已不再有任何拘束力，并且说，中国深盼将德国租借地直接归还中国，而不必转手。

日本的"种族平等"的主张

日本方面于1月份提出了实质性的主张之后，又准备于2月份提出其他一些实质性较差的主张。13日，牧野男爵在国际联盟委员会中提出了种族平等"的条款。在中国代表团的竭诚赞助之下，他主张用下述方式，将该条款归纳在国联盟约之中："民族平等乃是国际联盟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各缔约国同意尽速给予国联会员国的一切外国侨民，在各个方面以平等而公平的待遇，不因其种族或民族的关系而在法律或事实上有所区别。"然而这个问题引起了巨大的困难。据认为：在国联盟约中，具体地承认和提出这个原则，无异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取消对亚洲移民的限制。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声称：这对英帝国来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所以，不得不暂从缓议。4月11日，这个问题又在国联委员会中重付讨论，原来的条款则已修改成为拥护"民族平等及其人民的公平待遇原则"的前言中的一个短语。英国代表仍然认为不能支持日本的修正案。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声称，他"个人完全同意日本代表提出的意见"，但指出盟约既规定日本为国联理事会的理事，则已将日本置于"与其他大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因而使日本代表得随时"将种族平等问题提出讨论"。珍田子爵要求付诸表决，并且说，如果该

塞西尔勋爵之反对

要求之失败

605

修正案被否决，国联将在日本极其不得人心。日本发言人不仅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委员会中意、法、捷、波各委员们的支持。在紧接着的那次投票中，到会的十七人之中有十一人赞成修正案。威尔逊总统以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宣称，因委员会的决议非全体一致赞成不能生效，所以该案不能采纳实行。日本代表既不能取得对他们所坚持的原则的承认，于是保留了遇适当机会再行提出的权利——同时以加倍的努力转向对山东和太平洋方面的主张了。

蓝辛对日本主张所建议的解决办法

4月14日，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和奥尔朗多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声明，已定于4月25日召德国代表前来凡尔赛。殖民地问题迄未有所决定一节，在四人委员会中无代表权的日本看来是颇多疑窦的。4月15和17两日，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参加的外长委员会中，对日本的主张进行了讨论。在这次会议中，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建议将德国在中国的权利让予协约各国，以后再由它们尽力予以公平处理。劳合·乔治曾经建议将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各岛屿的权利，"让与国际联盟"托管。牧野男爵和珍田子爵对两种建议都不愿接受，乃于4月21日往访威尔逊总统和蓝辛国务卿。他们在坚持原来的要求之下得到了总统的下列建议：(1)接受蓝辛先生在外长委员会中所提的建议；(2)"不用说，日本将受托管理北太平洋各岛屿，虽则总统对于他本人认为应当由国际共管的雅浦岛作了保留"；(3)撤销一切"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总统和中国代表同样地切盼能由国际行动使山东和太平洋各岛屿问题得以解决。

劳合·乔治

607

威尔逊的建议

斗争的高潮

在4月份的最后九天中，关于山东问题解决办法的争执到达了最高峰。据中国方面的主张，既经对德宣战，中德间的一切约章已全部废除，所以，德国方面无转让与日本的权利，而且，中

国同日本在1915和1918年谈判的条约及协定，都是违反中国的意志而签订的，是纯粹临时性的，应在和会上予以修正。22日，牧野男爵对此项主张作了答复，他辩称：因使用武力而签订的条约并不是无效的，在中日两国于前一年谈判补充协定时，中国并未提出抗议，而且还按照该项协定的条件，接受了二千万日元的款项。中国辩称，由德国将它过去在中国的权利归还中国，"将符合中国的国家威信，并足以进一步证明协约和参战各国是为正义原则而与共同敌人作战的"。日本反驳说，"研究一下中国的备忘录使人得到的印象是：日本须承担一切牺牲的责任，而中国则坐享其成。"①

日本的主张得到英法意的支持

牧野男爵于是将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希望载入对德条约中的条款散发出来。根据1917年秘密协定的条件，英、法、意三国首相事实上是有支持日本要求的义务的。美国代表直到1919年1月18日方才得悉英国曾签订了这样一项协定。现在劳合·乔治证实此事。可是，他回过来又提出了将山东划归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建议。珍田子爵反对任何进一步拖延解决山东问题的企图，并且说：他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尚有待尽的责任，如果不把胶州交给他们，就无从履行他们对中国的责任。他们奉有日本政府的明白指示，除非使日本能居于对中国履行责任的地位，他们不得签署这项条约"。

608

有助于日本的因素

日本所以终于成功，主要得力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日本方面的种族平等的主张未为其他各国所接受；另一个事实是，日本

① 凡本节中未用其他方法说明的直接引语，都录自雷·斯坦纳德·贝克：《威尔逊与巴黎和约》，道布尔德、多兰公司1922年版，第2卷。关于贝克先生对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两先生对取消在华势力范围所持态度的评述，请参阅同书，第2卷，第248页。"他们虽然很愿意帮助把日本逐出中国，却不愿意以废除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来换取日本放弃其在华地位！"

方面的要求是和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的要求，在4月下旬和会成败关头同时提出的。日、意两国的要求都是从那些在压力下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来的。意大利的要求终于造成了4月24日奥尔朗多总理退出和会的后果。对日、意两国的要求所作的斗争，乃是新旧秩序之间、维护原则与强取豪夺之间、公道与分赃之间的斗争。美国一百年来的远东政策，防止为西方的主要利益而剥削亚洲的政策，以及维持东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完整的政策，从未有比威尔逊总统在巴黎试图对山东问题求得一公平解决时说明得更加清楚了。

威尔逊总统为公平解决而斗争

与日本方面的意愿相反的是，中国代表出席了当日下午的会议，阐明中国政府缔约的经过。在这次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对顾维钧说：中国对德宣战，并不曾使1915年的中日协定失效，顾氏答称："1915年条约及以后的互换照会，都是同一桩事情的几个部分……他认为这些条约以及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以后互换的照会，都是出乎缔约的正常程序和手续之外的。"劳合·乔治先生询及顾氏所称最后通牒究系指何而言。威尔逊总统解释说，他是指二十一条要求——英国首相则声称：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在克里孟梭的支持之下，劳合·乔治先生立即重申了他信守1917年秘密条约的决心。在意大利代表团退出和会的那天，日本代表团团长西园寺侯爵，发出了"一封措词非常专横的公函，……要求'对这个问题……尽速作一明确的解决'"。

英国首相对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毫无所闻

609

4月25日，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及克里孟梭两首相为考虑与中、日双方的主张有关的三项文件而举行会晤。其中第一项系西园寺侯爵的来信；第二项系专家委员会的报告；第三项是中国提出的另一强硬抗议。英、法两首相再度声明拟遵守1917年秘密条约。威尔逊总统指称，日本愿意就各国一体放弃

帝国主义的要求的矛盾

在中国权利一节进行讨论，又说："解除加于中国的枷锁正是他的目的。"英国首相说，对于这一点他的政府不能同意。威尔逊总统为求达到他和他的代表团认为是这一问题的公正而妥当的解决办法而作的种种尝试，都为日、英、法代表坚守1915、1917和1918年协定的决心所阻挠，无法推行。

日本在巴黎的胜利受到它的诺言的限制

4月30日晨，当三人委员会同意接受事实上即4月22日牧野男爵散发的草案中所表明的日本愿望时，终于达成了一项决议。根据凡尔赛条约第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条的规定，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与日本。作为交换条件的是，日本代表在答复威尔逊总统的问题时，作了下述声明——这项声明是不载入条约本身的——"日本政策系将山东半岛之全部主权归还中国，仅留业经给与德国之所有经济权利，暨按通常条约在青岛设立租界之权。铁路业主得专为保证运输安全设置特别警察，该警察不得移作别用，并须以中国人充之，铁路主管所遴选之日本警察教练官，由中国政府任命。"然而，珍田男爵又补充说：倘使中国不能同日本合作解决山东问题，日本政府"保留援用1915和1918年协定的权利"，同时要求总统"代为说项，劝导中国方面履行这些协定"。总统答称："坦率地说，他必须坚持的是，他的任何言论都不应解释为已经同意对中日互换照会以承认。"

610

国际联盟对中国的重大意义

布尔什维主义的汹涌澎湃的潮流以及日本同苏俄和与德国结盟的可能性，无疑都是促成这种解决的因素。而且正为组织国际联盟而努力的威尔逊总统，认为正在组织中的这个机构必会解决和会所不能立刻解决的问题——尤以山东问题之类的争执为然。在问题解决的那一天，即4月30日，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宣布他的信念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使

中国从它本身陷入的条约纠纷之中解脱出来，在我看来是令人满意的。……这样，日本就仅仅取得了经济让受人的权利，一如其他一二大国在中国所享有的和常见的那样，何况中日两国全部未来的关系当立即由国际联盟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予以保证。”

在巴黎所作有关远东的其他决定

各方对于山东问题十分注意，以致和会上对于远东方面所作的其他一些极端重要的决定，都几乎被忽略过去了。5月6日，三人委员会将太平洋中赤道以北的岛屿(除雅浦岛以外)委由日本统治。关于雅浦岛和岛上重要的电台的处理，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中才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引人注意的是，凡尔赛条约把中国和山东分别列在不同的项目之下，仿佛后者并不是前者的一部分那样。第一二八至一三四条论及“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些条文的规定，德国允将“根据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的最后议定书各款规定所取得的一切利益与特权……以及1917年3月14日以后根据该议定书所发生的一切赔款的要求，全部放弃，以与中国”。它还同意“废除据以在汉口和天津两地设置德国租界的中国政府所立的各项租约”，并在某种规定之下，允将德国在华租界和其他地区内的所有公产，除外交和领事馆建筑物以外，一并让与中国。德国负责将其在义和团期间所劫走的天文仪器，免费归还中国，虽然其他国家没有采取相类的步骤。它还放弃了“由于在中国境内拘禁德侨和遣送回国问题而发生的……一切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以及“自1917年8月14日以来，由于捕获和没收中国境内的德国船舰，或由于清算、没收或管理中国境内的德国财产、权利和权益而发生的一切要求”。

611

学生示威

关于山东问题决议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外人士无不愤慨。

5月7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最后通牒的第四周年，中国各大教育中心的各级学生，不分年龄，一致举行抗议游行，谴责巴黎所作的决议。他们在北京袭击了被认为是特别亲日和被指为"卖国贼"的三位政府官员。全国各地立刻组成学生联合会，在民族危机中显示出学生的力量，这在近代还是第一次。学生运动固然可以远溯到汉代，但是却从来没有发展到堪与1919年和随后若干年中的学生运动媲美的那样一种声势浩大的程度。商人和银行家都起而予以支持。6月间，北京政府不得不予让步，"三个卖国贼"在被革职之后，逃往日本。

1919年学生运动

中国拒绝在凡尔赛签约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国内民族精神滋长的鼓励之下，既未能争得修正或作有保留的签字，遂拒签凡尔赛条约，同时发表声明说："愿竭诚布陈，静待世界公论的裁判。"他们不顾612日本方面的反对，签署了1919年9月10日圣惹耳曼对奥条约，而且，通过这一举动，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取得了国际联盟的会籍。不仅如此，中国还以第二类国家的资格受任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国，从而在欧洲各国组成的种种委员会中同日本保持部分的均势地位。

中国与德之间和平的恢复

1919年9月15日徐世昌总统发布命令，宣布恢复中德间的和平关系。1921年5月20日，两国政府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德协约及声明文件。根据这项文件，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全部恢复了，同时，德国放弃了根据1898年3月6日条约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权益和特权。德国并同意撤销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5. 东方的民族自决——菲律宾群岛

要想找一个比威尔逊总统在1917－1918年所用的"民族自

决"这个词更好一点的例子，来说明用语巧妙的力量，那倒是不容易的。如要表明眼界不出欧美两洲之外、以欧洲为中心的那种心理状态，则莫若研究一下西方政治家们在战时以及和会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在处理战败的中欧各帝国时，民族自决原则本可能，虽则事实上并没有，在协约国的心理上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可是，一旦适用到非洲、亚洲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中各岛屿的时候，这个原则可就不幸了。中国在巴黎所遭到的种种失望，上文已经述及。至于这场战争对于菲律宾群岛、朝鲜、法属印度支那和暹罗所起的一些作用，以及对有关那些地方的理想所提出的声明，则尚待讨论。

欧洲中心思想和欧洲以外的世界

从1901年在威廉·塔夫脱总督的统治下成立民政制度时起到1917年美国参加欧战时止这十六个年头中，菲律宾所取得的进步，在附属国政府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主旨，就是要使菲律宾人作好迅速参加政府的准备，其最终目的，是要在共和政体的民主制度之下赋予菲律宾人以独立地位。1901年9月1日指派三名菲律宾人担任菲律宾民政委员会委员，以及建立公立学校制度，都是这个政策的明证，在那种学校制度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在1924年已达一百一十二万八千九百九十七人，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为同样性质的其他任何属地在学人数所不及。

1901年—1917年菲律宾群岛之发展

613

1902年7月1日的菲律宾法案，虽然暂时将这个群岛的立法权付托给以总督为主席的民政委员会，但却规定须及早成立立法会议，然后即以该立法会议作为两院制立法机构中的下院。立法会议将由菲律宾人以选举组成之，而上院则是委任的民事委员会。两院在权力方面将是平等的。立法会议于1907年间选出。菲律宾得派遣常驻专员二人出席美国众议院，但无投票

1902年7月1日的菲律宾法案

权。

民事委员会与立法会议

在最初几次选举中，约三分之一的登记选民自称为国民党。第一届会议于1907年10月16日正式开幕。塞尔希奥·奥斯梅亚当选为下院议长。后者在会议致词中声称：菲律宾人民是有自治能力的。然而，试图在会议中通过一项决议以要求美国国会允准菲律宾独立的举动，却失败了。第一届会议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颇为友好，可是，1909年选举的第二届会议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则不甚和谐。有几项措施都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批准，其中包括一项拨款法案和一项要求美国国会允许菲律宾人民起草本身宪法的决议。

群岛在物质方面的发展

尽管菲律宾立法部门的两个机构缺乏一致的意见，群岛上社会、教育、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在1912年总统选举之前，却是非常迅速的。漂亮的公共建筑兴建起来了，公路和铁路修筑起来了，港口已经挖深，农业已经得到改进，有效的司法制度已经奠定，贸易扩充到了1913年一亿一千万金元的总数，比1899年增加了七千五百万金元。由于大战的缘故，菲律宾贸易的进展更加迅速了。到1920年，输出的货物达一亿五千一百多万金元，输入的货物在一亿四千九百万金元以上。部分地由于关税上的操纵，三分之二的贸易是对美国的。1925年，菲律宾进口货的百分之五十五是来自美国方面的。

614

1912年美国民主党的胜利

美国1912年的大选使民主党于翌年3月上台。这是该党自菲律宾群岛被美国兼并以来第一次握得政权。以菲律宾问题而言，民主党人是“反帝”的，他们的党纲主张尽可能地首先解放群岛。威尔逊总统就职之后，接受了除一名菲律宾籍委员外该群岛全体九名委员的辞职。几个月之后，他派民主党众议员佛兰西斯·伯顿·哈里森继卡梅伦·福布斯任总督。哈里森先生

哈里森总督

于1914年10月6日就任时，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将威尔逊总统的咨文传达给菲律宾人民，其中包含这样一段政策性声明："为菲律宾群岛的最终独立，并为这种独立作好准备起见，拟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而且，我们希望在菲律宾群岛的安全和长久利益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迅速走向这个目标。"

公职之菲律宾化

纲领中所撮述的第一个步骤，是委员的任命应以菲律宾人占多数。接着就是公共职务在相当程度上的菲律宾化。1913年时，服务于政府的美国人有二千六百二十三名，菲律宾人计六千三百六十三名。1927年12月31日，美国人计四百七十名，菲律宾人则有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六名。这种情况对于公务员人数的增加以及在民主党执政下开始的公共职务菲律宾化的飞速倾向，构成一个同样有趣的说明。1920年7月1日，占据政府各局处较高职位的美国人计有二十名，菲律宾人三十名。

615

1916年的菲律宾法案

经美国国会通过并经总统批准的通称为"琼斯法案"的1916年菲律宾法案，对菲律宾的独立又采取了显然更进一步的措施。这个法案规定将以前兼有执行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职能的那个委员会取消。此后立法机关的职能将由以二十四名议员组成的参议院来执行。而立法会议则改称为众议院，议员名额以九十三名为限。参议员中有两个名额，众议员中有九个名额，应由总督委任，以代表主要为群岛内非基督教人民所居住的几个特别组成的省份[①]。两院其余的议员都由选举产生。凡识

① 在非基督教人口中计有南部各岛的伊斯兰教徒(摩洛人)约四十三万五千人和异教徒约五十四万人。后者主要是在吕宋北部的山区省份中，在新维斯卡亚群岛、民都洛岛、巴拉望岛和民答那莪岛上的阿古散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非基督教人民在菲律宾群岛的总人口中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力图使他们和十个或十一个基督教群团或部族和平相处的尝试，一直是成就非常有限。这里面涉及的一些困难一直成为反对菲律宾独立者(包括非基督教民族本身的发言人在内)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字的男子，以及置有价值五百元菲币的财产、或年付捐税三十元菲币的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这时均享有选举权。1918年，在达到选举年龄的男子中，百分之五十三享有选举权——这是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都高得多的一个比例数字。经过重行组织的立法机关，权力扩大到了可观的限度。另一方面，行政上的权力也大为扩充；据明文规定，"政府的一切行政职能应直接属于总督，或在总督监管下的某行政部门的职掌范围以内"。美国总统保有某些否决权；对于立法案的另外一些否决权则由总督行使。

行政上的权力

哈里森总督的行使行政权

在1916年法案的弁言中，据称："美国人民的目的，正如过去一向那样，是要撤销他们对于菲律宾群岛的主权，一俟该群岛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当即承认他们的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更进一步宣称："有必要在不损及美国人民行使主权权利的情况下，将尽量以内务管理权交付给菲律宾人民。"根据这些概述的条件，哈里森总督认为，理应尽量谨慎地行使他的行政权力，尽管陆军部长贝克在转达这项法律时，曾经通知总督说，为防止菲律宾人任意行使美国国会所未曾赋予的权力起见，他已奉有其他美国行政官员所未曾享有过的特别权力。哈里森同意了奥斯梅亚提出的一项建议，指派一个由总督主持并由立法机关的两院议长及各行政部门首长组成的国务委员会，来处理行政事宜和决定公务人员的任命。这一法外机构的组织成立，其结果是把总督放到一个有名无实的地位。这样一个违反1916年法案的精神和字义的制度，只有在一位谦顺和平的人受命担任总督时，才行得通。

616

世界大战与菲律宾

美国由于参战的缘故，实际上将全部军队和现役的海军船舰一并撤出菲律宾和群岛海面。群岛的防务和维持治安的工作，暂由五千名左右经过良好训练的菲律宾警察队担任。1917

年4月25日成立的一支菲律宾国民军曾申请由美国政府调往海外服役。由于种种困难，这项请求经婉言拒绝。立法机关于1917年国会开会期间通过一项载有菲律宾人民效忠于美国事业的肯定表示的决议，其他种种表现忠诚的证据不一而足。

走向民族自决方面的发展：1919年的独立使节团

617

从1916年法案通过时起到战争结束止，菲律宾领导人并没有采取过任何走向独立的行动。正如参议院议长曼纽尔·奎松后来所说：在威尔逊总统两次任期内，菲律宾享受到"实际上的自治"；美菲之间的行政立法合作的实验，圆满地实行了七年多①。然而，随着战事的终了，采取一些走向民族自决的步骤，看来时机是合适的了。1919年初，由四十名领导人组成的一个独立使节团抵达华盛顿，但没有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威尔逊总统对于菲律宾人渴望独立的公私双方的同情，在他致国会的最后咨文中肯定地表示了出来，他在咨文中说：国会所提出的赋予菲律宾以独立的前提要求既然已经做到，他建议即由国会票决，授予该群岛以独立。国会并未依照总统的建议行事。

1921年伍德一福布斯考察团

1920年11月间的选举，使共和党候选人华伦·哈定于翌年3月就总统职。在对菲律宾问题向国会提出任何建议以前，哈定总统派了一个考察团前往进行实地调查。考察团是由前摩罗省省长兼菲律宾美国驻军统帅伦纳德·伍德少将和哈里森上台之前任总督达四年之久的卡梅伦·福布斯率领的。他们偕同随从人等于1921年5月初抵达马尼拉。在随后的四个月中，考察团遍历各地，对行政、政治、教育、社会和经济等各种制度，作了详尽的调查。他们发现有不少可赞扬的事情，却也有许多应该予以责备的。菲律宾对美国的忠诚是不容置辩的；治安情况

群岛的若干有利方面

① 这个政府如何民主，可以就1921年奎松致奥斯梅亚函的叙述中，加以判断。参阅《大西洋月刊》，第137卷，第3号（1926年3月），第489页。

一般良好，刑事制度大体令人满意；民众教育和自治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经济繁荣。在另一方面，司法行政尚有有待改进之处；公共职务的菲律宾化似乎进展太快，以致影响有效的行政管理；捐税和政府开支大增；最为人所诟病的是菲律宾行政当局在前七年中所执行的财政政策。1916年特许成立的菲律宾国家银行，系菲岛政府控制的一个机构。其监理委员会是由哈里森总督和奎松及奥斯梅亚两先生组成的，银行董事会则再由该会推荐。虽收储公私款项，它在初成立的三年之内，负债总额竟达二亿三千万菲币之数。由于经营不善和营私舞弊，该机构损失已达七千五百万菲币，终于造成银行负责人身受监禁的结果。通过这一机构，菲律宾政府本身在1917年至1920年间，与煤、石、油、铁、混凝土和其他开发公司发生了关系，投资数额几达菲币七千八百万元。菲律宾库存枯竭，政府开支远远超出收入，菲币价值贬低了四分之一以上；总之，政府已面临破产的局面。伍德－福布斯考察团根据这一些调查结果所作的报告指出，完全独立的时机尚未成熟。据建议："菲律宾群岛当前的一般地位应继续到人民有充分时间吸收并彻底掌握已经操在他们手中的权力时为止。"并建议："无论在何种环境下，美国政府都不应容许在菲律宾群岛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致使美国陷入有责无权的地位。"

群岛的若干不利方面

618

菲律宾国家银行

伍德－福布斯考察团的结论

伍德总督

1921年10月，伍德将军就任菲律宾群岛行政首长之职，他一直担任到1927年8月逝世时止。这位共和党的总督接任后立即从事克服他在政府中发现的各种缺点。他的第一个预算比前一年核减了菲币一千二百万元。靠了一项货币法案并靠了美国国会准许扩大群岛负债限额以及在美国国内豁免菲律宾政府债券的捐税等措施，菲岛的信用才得以恢复，菲币才达到了票面

价格。

伍德总督所奉行的强力的行政措施和哈里森先生的礼让政策是大相径庭的。对于行政首脑的权力究应如何解释既是这样南辕北辙，自然就不免造成一种斗争。尽管如此，分裂的局面还是经过了两年之后方才出现。这固然一部分是由于总督应付得法，但一部分也是由于菲律宾领导人在那段时期内能够防止伍德将军的许多计划的实现。1923 年 7 月，国务委员会中的菲籍委员集体辞职。总督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且要求各部次长继续执行公务，而各部次长也成功地担当起了这项任务。立法部门在批准了委员们呈请辞职的行动之后，进而根据一项联合决议呈请将总督召回。该立法机构并且对所谓伍德将军的专权和暴政向美国政府和人民提出抗议。10 月 11 日，即在哈定总统逝世之后，陆军部长威克斯发出一份电报，对于柯立芝总统就伍德将军对其职位的权力与责任所作的解释，给予全面支持一节，作了详细的叙述。六天之后，菲律宾立法部门再度呈请调换伍德将军，并请指派菲律宾人接任。18 日，陆军部长威克斯在一份公开声明中，给这位总督以充分支持。这时，立法部门就决定派遣第二次的独立请愿团，但是，它无论在抨击总督或者在为菲岛争取即时独立方面所作的一切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

在行政权力问题上的摩擦

619

驱逐总督的企图

1925 年 6 月立法部门的选举，证明了菲律宾人民自治经验的稳步增长，其结果必然是逐渐走上更大程度的民族自决。选民的总登记数约九十万人，其中有七十多万人进行了投票。这些选举足以证明年轻领导人的势力已经抬头，起而与奥斯梅亚和奎松的寡头式权力相争衡。许多年轻人——包括将近四十名菲律宾大学毕业生在内——都是在美国制度的影响下成长

日益增长的自治经验；年轻的领导人的兴起

起来的。

民族自决而未决

620

在 1926 年 12 月，由卡米·汤普森上校作了另一份关于菲岛情况的报告书，他是柯立芝总统专门为了这事而派遣前往的。在提出的许多建议中，有两项是突出的——一是授予绝对的独立尚非其时；二是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裂痕应予补救。伍德总督的继任人是亨利·史汀生上校，他在很短的任期内部分地恢复了哈里森采取的具有改良议会型式的责任政府的政策。国务委员会恢复了，并以民政顾问代替了美国陆军方面所派的顾问，后者大部分是几位前任总督鉴于经费不足而不得不调用的。史汀生总督还从事了反对国内政府对菲律宾产品征收差别关税的工作。他于 1929 年 3 月辞职，改任胡佛总统内阁中的国务卿职务。不久之后，前任陆军部长德怀诗·戴维斯继任总督。近年来事实证明，在大体上取得了菲律宾领导人的信任和合作下，一个有效的政府已经确立起来。然而，只要菲岛完全的民族自决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在政治上和商务上就都可能继续存在一种缺乏完全令人满意和风平浪静的局面。

6. 东方的民族自决——朝鲜

消灭民族特征和同化

日本在 1910 年并吞朝鲜之后，对待统治朝鲜这项自引为己任的工作所持的态度，可以从一位日本官员对美国新闻记者的谈话中窥见一斑："管理殖民地不外两种办法。一种是把人民当作外国人统治。英国人在印度就是那种作法；所以，印度帝国不能维持久长。你们在菲律宾的作法也大同小异。所以，菲律宾可能在最近将来会从你们手里挣脱。第二种办法就是同化这个民族。这就是我们的作法。朝鲜人民将为日本人民所同化。我们以我们的语言文字教他们，建立起我们的制度，并且使他们同

我们合而为一。”①简言之，日本在朝鲜所采取的就是一个消灭民族特征和同化的政策，这大体上显然是以某些法国行政人员的想法和在交趾支那的作法为依据的②。在寺内将军（1910—1916年）和长谷川将军（1916—1920年）担任朝鲜总督任内，这个政策是雷厉风行的。伊藤公爵的比较缓和的政策至此翻然一变。经他安插在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朝鲜人都被寺内伯爵撤换了。朝鲜人民的言论、出版以及集会自由都以立法措施予以剥夺。“在并吞之后，尤注意于普遍应用日本语言……而且，1921年3月颁布的私立学校改组条例增列日本语文和伦理为必修课目。”③1916年在朝鲜发行的二十种报纸中，日文报占十八种，朝鲜文报仅一种，另英文报一种；后两种报纸和一种日文报纸都是政府的机关报。学校教科书一律用日文印行，并经缜密地审查。教师大体上都是着制服、佩刀的日本人。大多数学校禁止讲授历史；学术性研究一般是受排斥的。在官立学校中，日本人占尽一切便宜，所学科目时间较长，也比较合乎理想。朝鲜人出国求学和游历，都在禁阻之列。惟学习实用性质的工业知识是受鼓励的。旨在将朝鲜人同化成为低级的体力劳动者是显而易见的。违法犯罪，其处罚的轻重视行为人是日本人或鲜鲜人而各有不同。警察、宪兵和特务遍布全境。警察在处理朝鲜人的案件上，具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非常权力；他们可以判处罚金、杖责、监禁和驱逐出境，即令罪名查无实据。日本人则一律不得施以鞭鞑处分。1915年，经过简易法庭审讯的有五万九千四百八十三名，其中只有七名宣告无罪释放。1916年，犯罪的人数计

621

执行政策的方法

① 亨克尔：《善意的同化朝鲜》，载《民族杂志》，第109卷，第2832号，第505、506页。

② 参阅本书第600页及以下各页。

③ 参阅《朝鲜的改革与进步年度报告书》（1918—1921年），第83页。

八万二千一百二十一名；其中判刑者计八万一千一百三十九名，赦免者九百五十二名，而能证明其为无罪的计三十名——无罪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告一方。

在日本化了的朝鲜境内的基督教工作

622

在旧的政权下，基督教的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许多年。尽管类似的工作在日本本土进行得颇具规模，但是在1910年以后，朝鲜总督对于基督教运动的进展，却是不大同情或不大赞成的。在大约一千七百万人口中就有三十万基督教徒这个事实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基督教徒与朝鲜人口的比例数要比日本国内的比例数大出好几倍。教会成了外国统治者无法控制的一些既庞大而又有势力的组织。每逢星期日，有些中心地点作礼拜的人数平均达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歌唱赞美诗的音调，在警察和宪兵听来，往往是带有战斗性的，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例如：

"信徒如同精兵，争战向前行！"

朝鲜籍的耶稣会基督教徒，遇有争端，往往请其他基督教徒予以仲裁，而不诉诸警察——这在统治者的眼中是一种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当公娼制度由日本传入朝鲜城镇，而毒品和香烟的消费受到鼓励时，朝鲜籍牧师就展开宣传，反对这种罪恶行为——至少有一次受到警察的惩戒，理由是：劝止吸用作为政府专卖品的烟草，构成了叛国罪。1910—1911年进行的"百万人福音传教运动"，使警察当局大为惶恐。"于是，警察方面加倍其活动。每举行特别礼拜，都有穿着制服的宪兵和便衣侦探到场。入教者的姓名，牧师须随时呈报警务部。有一名宪兵曾径入私人住宅，拔出短刀，喝问屋主为什么在头一天晚上加入'耶稣会'。信教的商店老板因星期日停止营业，遭到警察的访问和告

"百万人福音传道运动"

诫。有一个日本官员在一座大乡村教堂正举行星期礼拜时，走上讲道坛，当众对基督教大肆抨击。”①

“朝鲜人结党阴谋不轨案”

623

1911年秋季发生了后来通称为“朝鲜阴谋不轨案”的事件，在这个案件中有几百名基督教徒——教师、学生、牧师和著名的领袖——因嫌疑而被捕下狱，许多人拘留达数月之久，“衣食既不足，又不知所犯何罪，且不许接见辩护律师”②。在许多人被释放之后，对其余在押人犯都以同谋杀害寺内总督罪提起诉讼，并于1912年6月28日至9月28日在汉城地方法院进行审讯。在这次审讯中，“供词既没有向不懂朝鲜语言的法官作公正的口译；又不准辩护律师提出原可供证被告在出事时并不在场的证人，至于‘口供’则竟然是在警察秘密审问时非刑拷打下取得，而为那些据说是曾经招供的人们在公开审讯时予以推翻的”③。被告中有一百零五人被判有罪，分别处以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1912年11月26日至1913年3月21日，经高等法院重审之后，除六名以外，所有被告均经宣告无罪。这项判决于1913年10月经汉城最高法院予以维持。1915年2月，裕仁天皇举行加冕典礼时，这六名“同谋犯”，一律赦免，以示“皇恩”。

日本人之移住朝鲜

在1910年以后的若干年中，日本人迁往朝鲜的达三十八万六千多人，其中有许多人在官方的协助下取得了耕地。在并吞之前，朝鲜土地向分为私有、王室所有、市有和佛教寺院的庙产等类。随着日本总督府的建立，后述三类土地一律加以征用，而转让给一个由政府扶植的、以鼓励往朝鲜移民为目的的东洋拓

① 参阅布朗：《远东的霸权》，第570、571页。上文是承著者惠允引证的，据著者在1931年6月4日致宓亨利的一封信中说，“继任的总督们对待朝鲜基督徒是很公正的。”

② 参阅布朗前引书，第571、572页。

③ 同上，第572页。

殖会社。这家公司遂以增租为手段，将朝鲜农户撤佃，而将土地转让给日本居留民。由于这种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而移往满洲、西伯利亚、中国、夏威夷和美国各地的朝鲜人约有一百五十万之数。

朝鲜人之移出

在日本人领导下所取得的物质进展

然而，事情的反面，也不能不加以叙述。虽则日本在解决它的殖民地问题的广义的精神方面或非物质方面的企图上，缺乏智慧、经验、气度和鉴别力，但是它在许多有关的物质方面的企图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朝鲜总督府成立时，那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也就停止执行职务了。虽然大部分由于日本军方的势力压倒一切，以致错误百出，但总比它所取代的那个政府要好一些。政府各个部门都实行了真正切合实际的改革。港口改良了；铁路里程增加了一倍以上；公路开辟了，城中街道铺成了；现代化政府大厦也建造了起来，其建筑式样与当地一般式样的出奇的不相调和，正和受了西方影响的东方各国的一般情形一样。护林和造林工作都大规模地进行了，在荒秃的山上种植树木不下数百万棵。清洁卫生工作也已开始推行，开设了公立医院，改进了公共卫生。模范农场、实验站、农业学校和畜牧业都次第予以发展。农业得到了改进，新的食品生产了出来。新建的工厂达一千五百所。在朝鲜被并吞后十年之内，煤和铁的产值从六百万日元增加到二千五百万日元。在同一期间内，朝鲜的出口增加了十倍，进口增加了七倍。

624

朝鲜新政府

朝鲜人的怨言

尽管有这些事实，但是朝鲜人埋怨说：得到好处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纵使许多朝鲜农民的命运有所改进，这却不足以抵偿把土地转让给日本移民之所失。虽则煤铁的开采量较前增加，可是，在1916年以后，只有日本公司才准许开发这些资源。虽则开设的工厂有数百之多，可是为它们劳动的是廉价

的朝鲜劳工，而坐享大部分利润的却是日本资本家。总而言之，人们已把朝鲜说成是"一个日本放印子钱和投机倒把者的乐园"。

625

协约国在大战中取得胜利，对朝鲜的影响；朝鲜人希望巴黎的代表权

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鼓起了朝鲜人民的信心，以为受日本奴役的时期已将近结束了。威尔逊总统曾经宣告过，国联的任务"是扶植弱小民族的自由，防止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统治"。这就使朝鲜的领导人充满了热情；他们决定派遣发言人，前往巴黎和会陈述他们的立场。三位当选的旅美朝鲜人未能获得出国护照；另外一位代表虽得到达巴黎，却被拒绝出席会议。朝鲜国内于是着手筹备一次全国规模的示威运动。

消极性的示威

当发生是否应对日本人使用武力的问题时，参加运动的基督徒则坚持认为运动应当是和平和消极的。就半岛上的朝鲜人几乎为日本人的五十倍这一点来说，日本人是理应感激的。示威者所接到的指示是："不管做什么——总不要侮辱日本人；不要投石子；不要挥拳动武——因为这都是野蛮行动。"由于人民已被统治者解除了武装，关于使用军器一节就不必给予任何指示了。这次示威运动是打算在整个半岛上同时举行的，而以在汉城本地的为主，从各地来的几千个人就在那里会齐。这样一个集会怎样举行方才不致引起警察和宪兵队方面的怀疑，倒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真象是上苍保佑，大皇帝李熙——自朝鲜被并吞之后，改称李太公——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官方报道，他在 1919 年 2 月 22 日突患脑溢血病逝世。这事发生在他的儿子李中公[①]与一日本皇族结婚的原定日期前三天

1919年大皇帝李熙逝世

① 李中公是安妃的儿子——所以在幼年时，他的绰号是安利蛋——安妃是李熙皇帝的宠妃，在 1896 年作宫嫔的时候，曾帮助这位皇帝逃往俄国使馆。他是最后一位皇帝、闵妃之子李拓的异母兄弟。

——这次联姻是大皇帝和他的人民所反对的——而且，也正是626朝鲜重要人物被邀请在一份准备送往巴黎和会的声明书上签字，表示他们对于日本人的统治完全满意的时刻。人们普遍认为李熙不是为抗议这桩婚事而自杀，就是因为他拒绝签署准备送往巴黎的声明书而被毒死的。皇室丧礼订于3月4日举行，这就给了群众一个拥进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丧仪的求之不得的机会。当运动爆发时，涌进汉城的不下二十万人。

朝鲜独立宣言

示威运动于3月1日开始。在这一天，先后在汉城的一家著名饭店和一个公园里当众宣读了由三十三位人民领袖签署的朝鲜独立宣言。在签署人之中，有十五位是基督教徒，三位是佛教徒，另十五位则属于日本人为图抵制朝鲜境内基督教的影响而扶植的一个折衷性质的宗教组织——天道教。有两名签署人曾经在那件大"阴谋不轨案"中受过害。人人都明白，参加这个运动对于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个宣言本身是一项异常庄严审慎的文件，它的那些差不多以韵文写成的主张都是奠定在道德基础上的。在宣布朝鲜独立和略述它的悠久历史之后，这项文件接下去说："我们这些在暴力和掠夺之风横行的旧时代中的牺牲品，经过数千年漫长岁月之后，历经十年异族压迫之苦，丧尽了生存的权利，受尽了思想自由方面的一切限制；人生的庄严备受摧残，分享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一切机会丧失尽净……在我们眼前，一个新的时代觉醒了，旧日的武力世界已成过去，具有正义和真理的新世界已经到来。从旧世界的经验和劳苦之中，出现了这道照耀在人生事务上的光芒。被冬季冰雪窒息了的昆虫，在春天的和风吹拂及和煦阳光普照之下，又苏醒了——但愿内则千万代祖先们的保佑，外则全世界力量的支援，让我们所掌握的今天成为我们成功的时日。我

们抱着这个希望朝前迈进。”宣言结尾有“三项协议”，劝阻人民勿施强暴，而宁愿“带着高兴的心情”，把“一切事情做得合适而有条不紊，这样，我们的行为就会自始至终是光荣而正直的。”宣言的日期写的是“朝鲜王国第4252年3月”。 627

起义之爆发

在向一位大吃一惊的日本官员——被邀前往饭店与宴的一批显要当中唯一到席的客人——宣读了这项文件之后，各签字人就把他们的举动通知了警察当局，并且静候逮捕和监禁，而这很快就发生了。当这项文件向汉城和举凡秘密运到之处的人民宣读时，群众都报以“万岁，万岁”的高声欢呼。除去几处由于受到野蛮对待发生事故外，当时和事后人民方面并未诉诸武力。

日本方面所施的镇压

面临着许多地方同时发生起义，为数达三万九千名的警察、宪兵和士兵就开始以最最严厉的手段来加以粉碎了。被杀害的朝鲜人在六百到一千名之间，受伤者在一千四百名以上；日本警察被杀害者九人，受伤者一百八十六人。从3月1日至7月20日之间，约有二万九千人遭逮捕。其中，以整数计，未经审判而释放的有七千人，受审的九千人，监禁的五千人，受体刑后被释放的计一万零五百人。在举行起义的五百七十七处据点中，只有在两处地方人民曾使用火器；而朝鲜人遭到开枪射击的地方，则有一百八十五处之多。监狱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施以严刑拷问。许多房屋和若干村庄被焚毁。在某一村庄中大多数男子被集中于一所教堂里予以枪毙，教堂则付诸一炬。

所用的方法

日本采取严峻措施的理由

1918年夏季，由于米价昂贵而在日本国内爆发的严重暴动，可能同朝鲜境内的疯狂镇压有关。另应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正参预西伯利亚的干涉行动，不能甘冒供应基地被切断的危险。但是，纵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日本军方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似乎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起义的方式和人民手无寸铁的事实已使他 628

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西方国家对朝鲜的关切

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在非常不凑巧的时刻被吸引到了朝鲜方面，舆论大哗，尤以美国国内为甚。当运动方开始时，朝鲜境内的传教士们大为吃惊，尽管他们象日本人一样地认识到，有助于产生这种运动和维持民族精神的自由教育和精神鼓励，大部分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日方为扑灭独立运动和破坏民气所采取的措施，引起了传教士和旅居该国的其他外侨基于人道主义的抗议。关于朝鲜境内各种情况的消息，通过这些侨民而流传于欧美各国。日本方面立刻看清，和会正在巴黎开会，国际联盟又正在酝酿的过程之中，最好还是改进同它正设法进行同化的那个顽强属地之间的关系。

日本政府的更迭

东京政府的处境是困难的。一方面，军方蓄意在朝鲜执行无情的镇压政策；而在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自由主义者的集团却对军方所采取的方法及其后果，都不以为然。在背后还有国外的舆论，纵不迁就，却也不能不予重视。在巴黎方面，赞成完全接受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主张和诺言所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最近东京政府有过一次变动。寺内伯爵由于米骚动中所表现的群众不满情绪已于1918年9月辞去首相之职，并且已由著名的新闻界人士兼政治组织家、政友会总裁、久为井上及伊藤的支持者的原敬继任。原敬先生是以平民而担任首相的第一人，也是按照严格的代议制原则组阁的第一位首相。他在首相任内的显著事迹是：将选民资格从每年纳税十日元减低到三日元，从而将选举权从一百四十五万扩大到三百万选民。从日本的眼光看，原敬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在西方看来，他是一个保守派，而他的任期恰恰是日本对山东和西伯利亚极尽需索之能事的那段时期。

1918年—1921年原敬首相

日本选民的扩充

629

面临着在朝鲜爆发的事件，原敬首相决定采取"中庸之道"的政策。长谷川总督被召还，而以海军大将斋藤继任①，伴同斋藤前往的还有朝鲜行政督察长水野。8月19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据称日本的宗旨一向在于"促进朝鲜的安全与福利……并使当地人民……在各方面都受到公正不阿的待遇，以期一视同仁，人各安居乐业"。又据谕令，饬将所有改革事项一体付诸实施。总督一职改为文武官员均得充任。宪兵队撤废，代之以隶属地方长官的普通警察。官署的例行公事和虚套都略有简化，委派朝鲜人担任公职也比较容易一些了。体刑宣告废止，同时采取了旨在使朝鲜人与日本人待遇平等的各种步骤，特别是在教育制度方面。人民相当感兴趣的道、市、乡委员会组织了起来。由七十二名朝鲜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即中枢院奉派成立，讨论总督交议的一切事项。朝鲜独立运动的大部分物质和精神支持都来自、并且继续来自旅居中国、西伯利亚、夏威夷和美国的朝鲜人。一个朝鲜"临时政府"的总机构曾在上海维持了数年之久。

朝鲜政治改革之开始

在满洲的间岛和西伯利亚滨海省有成千上万的朝鲜人定居下来。在1919年以前和以后，他们特别活跃，这是受了东北亚不稳定局面的鼓励，而同时又对这种局面起了促进作用。边境纠纷不时地发展成严重的形势。既惧怕朝鲜流亡者的势力，又亟想防止这种势力蔓延到朝鲜境内，日本驻间岛、安东、吉林和奉天的领事以及在满洲和西伯利亚各据点的特设官员，均于1920年3月被授予特别权力，作为朝鲜总督的助手。同年9、10月间，中、俄股匪（究竟有无朝鲜人牵连在内，说法不一）三度袭击间岛的浑春村，在第二次袭击时，焚毁了日本领事馆和许多其

1920年的间岛事件

630

① 参阅本书第415页。

他建筑物，杀死了在领事馆避难的日本人与朝鲜人数名。其他设有日本领事馆的各村镇也都受到类似的股匪的威胁。至于日本派兵前往间岛有无必要以及是否相宜一节，从中日两国政府的来往公文中可以看出双方各执一词。包括有三千人左右的一支军队于10月和11月间奉调前往。大批朝鲜人被日兵杀死，许多村庄、学校和教堂也被毁坏。后来中国军队会同将土匪镇压下去，并迫使若干土匪投降。1921年4月日军从这一带中国领土上撤出。

1926年逊帝李拓逝世

第二代逊位皇帝——李拓——于1926年5月间逝世。翌月举行国葬。1919年起义爆发后所进行的种种改革并未能使气氛完全澄清，这一点从丧礼期间尽管官方万分警惕而仍有示威运动发生的情形中可以看出。1929年10月，起义再度发生。事情是起因于朝鲜南部光州地方朝鲜学生和日本学生之间发生的争执，它迅即蔓延到朝鲜大部分地区，持续达数月之久。

现代朝鲜形势概述

关于朝鲜在“自决”方面的企图这一段叙述，最好以旅居朝鲜的一位公正观察家的论断作为结束：“的确，日本官员一直勤勤恳恳，并且往往为朝鲜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朝鲜情况的改良而认真工作，但是，他们的方法却不够圆通而且缺乏同情心和谅解。然而却不能因为对日本的严酷的黩武政策及其执行这项政策时所采取的暴戾手段的非议，就无视他们操守的廉正、在行政上的巨大才能，以及在执行物质改革时所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他们〔指朝鲜人〕一直是残暴、不公道和压迫下的牺牲者。如果他们竟不愿自己管理自己，那么他们也就不值得尊敬了。但是，对于日本方面我也很能同情。……从不偏不倚的观点上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方面是未可厚非的。不仅如此，我还愿意进一步说，如果要把日本人赶走，朝鲜可能会遭到更大的灾

631

难。这并不是说日本有这样做的丝毫可能性，因为中国国内的动荡不安，加之俄国局面的不稳，这只会使日本对这个半岛加强控制，而不会放松。因为，不管怎样说和怎样做，朝鲜毕竟是整个远东局势的关键部分。日本向西伯利亚、满洲和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整个计划，是以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为转移的。对日本来说，撤出朝鲜无异是放弃这个富庶的大市场，而听其开门揖盗，我深信，日本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朝鲜方面如能愈早认识到日本必不肯放弃这个半岛的坚定决心，而日本方面如能愈早认识到朝鲜人民必誓死抵抗任何进一步以武力消灭民族特征的企图，则对两国人民愈好……"①

朝鲜是东方的"关键部分"

7. 二十世纪的法属印度支那

法国的同化政策

在印度支那，正如在远东其他地区一样，世界大战所发生的反响，和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所发生的正复相同。要了解这个庞大的法国属地的形势，回顾一下这两次战争以前的某些条件与原则，是有必要的。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中，当法国以外交和战争为手段而从事于征服印度支那时，政策、目的和方法上的矛盾一直在发展着，这种矛盾不但事实上打乱了工作的调度，而且拖延到本世纪尚未解决。根本说来，困难是一个欧洲国家所发生的困难，其政府既高度集中化，而又处于政党方针经常变动之下，且十分有意识地要担负起宣扬文化的使命，它企图统治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尽管在许多方面是落后的，却满足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对外来的干涉感到愤懑。1889 年，法国殖民地大会主张对一切海外属地采用同化政策；

632

① 鲍威尔：《十字路口的亚洲》，第 179、180 页；承纽约世纪出版公司惠允引证。

这项政策的内容就是破坏当地固有的文化和制度，而代之以法国文化和制度，并以法国法律和行政人员来代替当地固有的法律、习惯和官员。同这项政策相对立的是在印度支那(自始就已实行同化政策的交趾支那在外)建立保护国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当地固有的制度将继续予以维持，尽可能不加变动。

保护与同化之争

茹费理是保护国政策的杰出的倡议者；他命令尊重既存的权力，而渐图代之以欧洲的方法。1886 年，德·拉讷桑奉派往印度支那进行调查，嗣据报告称茹费理的理想是切实可行的。结果在 1886 年 1 月至 11 月担任安南和东京两地总督职务的保罗·伯尔制定了保护国政策。根据 4 月份的一项公告，他一反前任的政策而保证尊重当地固有的习惯。同月，召开了由东京各乡领袖人物组成的名人会议，以期用这一阶层的人代替早先由安南派来统治这个北部属地的历史悠久的中国式的文人官吏。但是，在情况不尽相同的安南，他仍旧继续维持旧日的官吏。不幸，伯尔没有等到他的政策行有成效就去世了，在随后的五年中，巴黎方面又回到同化政策上去。接着在很短时期内调换了五位总督，伯尔的成绩完全付诸东流，北部已几近公开叛乱；河内近郊各地则盗匪横行。只有在交趾支那，还存在着近似繁荣的景况。其他各地，法国人和他们的方法都是令人怀疑的。

拉讷桑和经济发展

自 1891 到 1894 年担任总督的是赋有统治全权而不受巴黎方面干涉的德·拉讷桑。他颇不以同化政策为然，同时又因为没有其他一批人所肩负治理国家的任务，所以又开始起用旧官吏，并重行承认安南对东京的宗主权。在将近四年的任期中，德·拉讷桑为该国的经济发展作了一个开端，而且卓有成效地将它奠定在健全的财政基础上。继而法国国内政府的态度又起了变化；随即将这位总督召回，他的继任人发现自己的权力是有

633

限的，无法继续从经济方面巩固这个属地。

印度支那幸而在1897－1902年间由富于财政经验的前阁员保罗·杜梅出任总督。他在行政和财政方面，采取了一种具有活力的改造政策。他以一种联邦的形式将行政集中化，不但继续而且大大地加强了德·拉讷桑所创始的经济政策，集中力量来发展交通工具和贸易。在贸易方面，他采行了以盐、酒和鸦片专卖为基础的间接税制度。他对于这些商品的考虑，纯粹是从财政观点出发的，而对有关的社会和道德因素则一概不问。在交趾支那方面，同化政策连同任用法国官员的办法，已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改革，但是，在安南和柬埔寨方面却应用了保护国制度。在柬埔寨，法国势力还是第一次真正发生影响。现代化的工作已开始进行，法国殖民问题也有了安排；然而，柬埔寨人本身的权益同时也受到了加意的保护。通过当地村庄民主组织和法国理事长官监督下的文人官吏的行政管理，东京得到了不小程度的自治。

杜梅统治下的改组

从行政效率的观点看，杜梅的成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接任时，是一个一团糟的局面，离任时，则一切都上了轨道——他以有组织的政府替代了无政府状态。然而，对于有关的各族人民的影响，则尚有未尽善之处。本地人和中国居留民都愤愤不平并且深感不满，这种心理状态乃是近年施行的物质上的改进、暹罗在自己的统治者之下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几年之后的日俄战争等因素所促成的。在印度支那和在亚洲其他各地一样，土著各族人民对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新的自我评价，这一点从他们私底下和公开地对西方人以及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方式的批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法国方面渐渐认清，物质上的征服是不够的；道义上的征服实有必要。1908

好的和坏的结果

634

年，迪格上校写道①："必须把我们亲手在这两个民族之间挖掘的鸿沟填平。必须丢掉我们那种征服者的骄横之气，并且要看到我们的被保护者家里都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从国际关系以及从朝鲜人与日本人的福利观点来看，遗憾的是：日本人虽然从法国抄袭了许多征服和治理殖民地的手法，在他们对朝鲜的统治上却认为效法二十世纪的法国对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政策是不相宜的。

萨罗先生与司法问题

到了1911年，法国人已渐渐看出，对他们的亚洲臣民采取一种协作或合作的政策，是刻不容缓了。在战前和大战期内(1911—1919年)担任总督、继而在巴黎担任阁员的亚尔培·萨罗，在其任期里诚心诚意地遵守这个政策。他在总督任内集中精力来处理的是司法问题："交趾支那在1881年就采用了法国的民刑法典，并且仍在施行。所以，一桩牵涉到几世纪中国传统的土地案件，就会由一位法国籍法官根据巴黎郊区所施行的法典来加以处理。至于当地情况则不予理会……东京方面的情形还不是如此之糟。那里有一种介乎新旧之间的折衷办法。官吏所执行的照例是当地的法律，可是由于政策的朝令夕改，欧洲人究竟预闻其事到怎样的程度，也就随着每位理事长官的性格而各有不同了……在安南方面，本地人的审判完全操在官吏手中，而且，作为安南法律基础的嘉隆法典，已经由一个专门委员会编纂成律例。……[每一]省份对一完全相同的问题各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而显然，不可能全都是正确的。"②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法律和道德分开，而在一个习惯

① 转引自哈里斯：《欧洲与东方》，第374页。承出版者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惠允引证。

② 罗伯茨：《法国殖民政策史》(1870—1925年)，第2卷，第472页。本节主要是以这部有价值的著作为依据的。承伦敦金氏公司惠允引证。

和宗教纠缠在一起的地方，正如在大多数东方国家一样，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使行政和司法职权各自分立，这一点又是印度支那人极其反对的，并且，举例来说，至今还是中国取消领事裁判权企图上的一个显著的困难。1917年7月16日，安南启定皇帝颁布了适用于安南和东京两地的一项法令，着以商事和民事程序法以及刑法等五种新法典付诸实施，并成立法庭。不顾土著人民的反对，将官吏分为行政和司法两类，但是，这个新制度是由法国和安南双方所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缓步予以实施的，直到1923年萨罗的后任莫里斯·龙先生(1919—1923年)任期内方始完成。同日本人在朝鲜对本地方言所取的政策相形之下，令人注意的是，萨罗却力主法国官员学习和使用印度支那语言。

牵连的因素

635

在龙总督任内，世界大战对印度支那的影响已渐渐明显。加强土著官员政治权力的要求是明确而坚决的，甚至达到了要求自治的程度。龙先生于是改组安南乡村的行政管理，以各有独立预算的、奠定在选举基础上的、新的地方行政自治委员会代替旧有的名人会议，以应付这些要求的一部分。这种作法是和早一时期伯尔的政策完全一致的。此外，殖民地委员会也根据1922年6月的一道命令而改组了，将该会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法国人员组成，另一部分则由土著组成，而以前者占多数。土著委员应由初次享有选举权的二万零八百二十二名纳税人直接选出。尽管这位总督认为"印度支那自力更生"的时机已到，认为它是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一个殖民地"，巴黎方面却不赞成走向自主和责任政府的趋势。龙先生所主张的不是安南独立，而是与英帝国自治领相似的一种地位。这会鼓励土著的文化，并发展政治责任感。1927年，又对土著势力作了进一步的让步，同时也在合作过程中取得了一种进展。这时，全印度支那政

世界大战对于印度支那的影响

636

府委员会实行改组，设委员六十名，计土著委员二十五名，法籍委员三十五员，其中十六名（包括法籍者十名）由总督派任；十二名（包括法籍者九名）由农会和商会推选；其余三十二名则由地方议会选出。

经济与政治

战后期间法国奉行的政策，在消除政治动荡的根源和发展普遍繁荣方面，当时已著成效。大部分注意力已从政治方面移转到经济方面。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虽不无困难和紊乱，然而毕竟成功地建立起来了，而且还对农贷制度的实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东京方面——在西贡一带则只是程度上略差而已——工业化已大规模进行。公路和铁路的修筑一直继续不断，东方的一些最优良的汽车公路是可以在印度支那看到的，铁路则约有一千三百哩。

印度支那的政府

印度支那，照当前管理的情形来说，是法国海外属地最重要的一处。它包括六个单位：法国直属殖民地交趾支那；安南、东京、柬埔寨和老挝四个保护国——后者是在1911年主要由暹罗割让的土地组成的；以及从中国租借的广州湾。居于首脑地位而赋有民政、军事、行政和立法大权的，是直接对法国殖民部部长负责的总督（由一名秘书长予以襄助）。总督可以停止或解散政府委员会；但是他本人颁布的法令可以由巴黎的上司予以批驳。交趾支那由地方长官管辖，而四个保护国则各驻有理事长官一名。交趾支那的司法系统是法国式的；在各保护国则是既有法国法院也有本地法院，本地法院的上诉案件得控至西贡或河内的法院，在这两处法院，凡本地人涉讼的案件，法国籍法官由本地官员陪审。1928年8月22日，比埃尔·帕斯基埃奉派为总督，他过去的经历一直是同印度支那有关的。

由于萨罗的政治才干，印度支那自1920年以来，就在法国

的殖民计划上以及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国际关系上，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对于连结和发展法属太平洋各岛的企图方面来讲，它成了法帝国在这一部分世界里的弧形线上的一个正式基石。在法国国会同意之后，印度支那政府于1923年12月批准了一项建议，其目的可以概述如下："授予印度支那总督以必要的权力，俾确立并维护法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政策，以期确保我国的权益；另以对我国大洋洲属地的道义上的以及在某种场合下物质上的监护权授予印度支那，以免再有由于距离首都遥远而造成的几乎完全不闻不问的情形。"①

印度支那与太平洋法属各岛屿的联系 637

作为执行这一计划的步骤，数以千计的印度支那人被鼓励迁往新喀里多尼岛、新赫布里底群岛和塔希提岛，并在这些岛屿和西贡之间建立起海运航线。尽管印度支那的官员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淡态度，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是执行得显具成效的。

8. 暹罗（1914—1931年）

暹罗与世界大战

在朱拉隆公国王的长期统治（1868—1910年）之后，继之以他的儿子拉玛六世的较短的统治（1910—1925年），拉玛六世继续执行他的父亲已创始的种种改革，使暹罗有了在世界大战期中发挥一份作用的准备，而不愧为一个现代化和具有几乎完全主权的国家。虽然就暹罗人对法国的感情而论，在法国对德国作战时未必就会给以支援，但是他们却感到，以他们同英国的关系，则不能不防止给敌人以支援和救助，因为他们的国王曾在英国留学并且在英国军队中获有名誉将军的职衔。保持了大约三年的中立之后，暹罗于1917年7月22日对德意志和奥匈宣战，

① 转引自罗伯茨前引书，第542页。

并且立刻接收了中欧同盟的二十多艘的汽轮和帆船。境内的敌国侨民不久都拘禁在英属印度，暹罗红十字会也展开了活动。638 翌年年初，一个军事代表团奉派前往西欧，随即于6月间有一支拥有一队飞机的远征军奉派参加协约国服务。

直接的结果

由于在战时的合作，暹罗成为巴黎和会的一个参与国，凡尔赛条约的一个签字国，因而也是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根据凡尔赛条约第一三五至一三七条的规定，德国对暹罗放弃了类似对中国放弃的那些权利，其中包括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在内。根据圣慈耳曼条约第一一〇条和特里阿农条约第九四条的规定，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作了相应的让步。因而，这三个欧洲国家同时丧失了它们在暹罗的特权，而在暹罗的领事裁判权的壁垒上，也和中国的情形一样，被打开了一个大洞。况且，威尔逊总统在巴黎时也同意美国放弃其在暹罗的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豪爽而无代价的公道的行为"①。

1920年暹罗—美国条约

这位美国总统的诺言，虽然带有一项虚而不实的保留条件，却通过1856年哈里斯条约的全部废除和1920年12月16日暹美条约的签订而实现了。这项新约得于十年届满的前一年，由任何一方的通知而于届满后废止。这项条约对于暹罗的重要性，无异于1894年英日条约之于日本，成为后来所订条约的蓝本。根据这项条约，美国人自1856年条约以来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保护的权利一并撤废，此后个别美国人和美国权益则一律受暹罗法律和正规法院的管辖。约中所载的唯一保障就是下述的规定：美国得将美国公民作被告的案件从暹罗法院(最高法院除外)调至美国领事法庭，依照业经颁布实施的暹罗法律进行

① 参阅塞尔：《暹罗为主权而斗争》，载《大西洋月刊》，第140卷(1927年)，第678页。

审讯。条约中对外国籍法律顾问一节并无规定，至于调审权则在刑法、民商法、各该程序法以及法院组织法等暹罗法典颁布五年之后，失去时效。因为美国官员并没有调审过任何案件，事实上威尔逊总统的诺言是付诸实行了。 639

在有关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以外，另据规定，以往对于暹罗财政自主所加的限制，特别是关于关税方面的限制，应无偿地予以放弃，并且一俟同其他各国在无赔偿的条件下取得类似的协议，暹罗即可对美国货增加现行关税3%。美国就这样援用了过去同日本交涉时它本身所创的先例，而同时凭借最惠国条款的实施来继续保障它的权益。

1920年以后在暹罗残存的被奴役的情况

尽管到了1920年，直接或间接地由于世界大战的关系，德、奥、匈、俄、美都自动地或被动地放弃了它们在暹罗的领事裁判权和某些财政上的权利，然而，还有十个欧洲国家和一个亚洲国家，即英、法、意、荷、比、挪威、瑞典、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本，没有放弃它们的特权和权益，并且也没有表示立刻这样去做的意思。在一个时期，1920年的美国条约至少在有关财政的规定上，似乎并不会比1878年的日美条约更具有实际价值。然而事实之所以并非如此，固然是由于暹罗政府在国家现代化和安定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折服的进展，而更重要的却是由于各国外交部在某些方针上的宽宏大量以及在1923—1925年担任国王拉玛六世的外事顾问的美国人弗朗西斯·鲍斯·塞尔的卓越外交才干。

1924年的暹日条约

日本是追随美国之后在1924年3月10日签订条约的第一个国家。根据这项条约的规定，签字国双方同意在进口税方面相互适用最惠国条款。但是，关于领事裁判权一节，日本由于接受了美国条约中所作的规定，事实上却把享受这项制度的期限

640 在技术上延长了五年，因为两国于1898年签订的条约曾规定一俟暹罗颁布新法典，日本当即放弃领事裁判权。在某种意义上讲，暹罗已经后退了一步，但是为了加强它同欧洲国家周旋时所提出的主张，它已赢得另一个大国对它的立场的支持。

英法两国不愿签订新条约

面临着1919年所提出的要求取消各该国旅暹侨民的那些陈腐特权的呼吁，欧洲外交家们不愿勉从暹罗的意愿，正如过去对中国的情形一样。紧接着对美国商订条约谈判之后，暹罗向英、法两国提出了第二个呼吁，这两个国家同暹罗关系是最为直接的，并且也是以往由于暹罗不能保全本国领土的完整而渔利最多的。英国提到它在1909年所作的让步，并且表示不愿意在目前再做进一步的行动。法国似乎态度较好，但是，一部分由于暹罗和印度支那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对于立时改变却有所踌躇。最后双方同意：凡有关印度支那的事项应直接由河内与曼谷商决，至于其他问题则应由法国派驻暹罗首都的公使于1924年予以处理。

前往欧洲的塞尔使节团

曼谷和欧洲各首都之间进行谈判时在所不免的种种困难，终于使暹罗政府不得不仿效中国与日本在和西方周旋时所树立的十九世纪的先例，即派遣使节团至欧洲各首都，并遴选一位美国人来领导这个使节团。正如蒲安臣曾经在1868－1870年充任中国代表的情形一样，塞尔在1924－1925年曾代表暹罗与驻欧洲的暹罗外交官合作。

1925年订立的暹罗—法国条约

塞尔于1924年秋季启程前往法国，并于12月和翌年1月间，从事于了结1924年内一直在考虑中的对法条约的商谈事宜。由于一个暹罗醉汉袭击了一个法国公民，谈判虽在双方满意的情况下完成，条约的缔结却功亏一篑，未能签字，搁置了两星期，才于1925年2月14日完成了签字手续。在一定期间内

的若干限制条件之下，废止了法国的领事裁判权。关于财政独立的条款，其规定与美国条约中的规定相仿。除早期条约中有关印度支那的条款仍继续有效外，一切早期的法暹条约和协约一律废止。此外，另据规定，两国之间不论发生任何性质的争执，包括事关“重大利益”和“民族荣誉”的争执在内，应一律付诸仲裁，或诉由海牙常设国际法庭处理。 641

1925年的暹罗一荷兰条约

在对法条约的谈判业经结束而尚未签字的这段期间，塞尔开始同荷兰政府商谈，因为荷兰的东印度人侨居暹罗的为数很多。6月8日，荷兰政府在海牙签订了一项对暹条约，其措辞几乎与1920年的美国条约完全相同。

1925年的暹罗一英国条约

性质更为重要，困难也正复不少，不过可能不那么太复杂的，是塞尔和英国代表的会谈。英国属地同暹罗西境和南境接壤。而且，暹罗的进口货由英国人供应的占80%以上，出品货由英国人承购的几达70%。由于暹罗已经在1909年条约中将凡是它能够让与而不致丧失其领土和行政独立的一切，都让给了英国——包括让给旅暹英侨以暹罗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在内——所以暹罗除去呼吁这个世界强国以慷慨大方的态度来对待一个遇有机会就表示诚信(包括参加世界大战在内)的小国之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这项呼吁颇为奏效，特别因为暹罗是一个农业国，情愿同意在一定期间内对于英国的工业品不加重进口税。从美国条约中引申出来的原则都载在两项条约中，一项是一般性的条约，另一项是全面而详尽的商约。这两项条约于7月14日签字，另一项仲裁条约则于同年11月25日签订。随着7月14日条约的订立，除有关边界问题的规定外，所有以前的英暹条约，一律作废。美国和英国在二十世纪分别同暹罗交涉时所遵行的原则，和十九世纪同日本交涉时所遵循的 642

原则大同小异，是值得注意的。

其他各国一致行动

由于英国立约，暹罗取得了胜利：其他欧洲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事实上已成为当然的事情。在塞尔和英国政治家们会谈的同时，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都同意签订新条约，并分别在8月3日、14日和9月1日正式签字。12月19日，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签约。意大利政府在塞尔和墨索里尼首相的会谈之后，于1926年5月9日在罗马签定了一项条约；比利时和挪威则分别于7月13日和7月16日签订了条约。欧洲各国条约的最后几个批准书是在1927年2月初互换的。除比利时和西班牙条约之外——前者有效期为五年，后者则随时得由签字国的一方在事前六个月通知作废——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条约，在条约有效期间和终止生效的规定上都是仿效美国条约的。签字国任何一方的声明废约，并不能使以前的任何条约重行生效。

暹罗谈判圆满结束的理由

关于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的那些复杂问题之所以能在1926年年终之前就一并解决，推其原因，是由于暹罗三个世代的皇室领导人都有志气和能力要把政府和其他的国家机关加以现代化，而不企图代之以新的或外来的组织；是由于他们有保护外国人生命、贸易和财产的力量与意愿；是由于他们遇到象1914年大战爆发时出现的那种危机，运筹调度，既具政治家风度而又精明干练；是由于法国和英国认定它们帝国的福利无需进一步要求领土割让，而且认为对有关问题作慷慨而和平的解决，总比万一弄到迫不得已时再解决要强得多；也是由于拉玛六世和他的外交部长普拉邦亲王在处理这些特殊问题时具有政治手腕，以及外交顾问塞尔具有卓越的外交技巧。

643

新制度的成功

暹罗法典迄今（1931年）尚未完成，而且在1932或1933年以前未必会完成，但是编纂工作却一直稳步进行。暹罗法律的

健全和公平以及法院执法的公正，可以由上文所述自1920年美暹条约签订以来，美国领事法庭向没有从暹罗法院调审过任何案件这一事实来予以证明。

普拉雅济波克国王于1925年即位

1925年11月，在为暹罗建立新制度的最后一项条约签字之前，国王拉玛六世逝世。在拉玛六世朝代的最后几年中，君主专制政体的缺点之一，在暹罗渐渐暴露出来，那就是，有一批在相当程度上孤立了国王、从而利用他和他们本身官职以遂其私图的官吏们起而当政。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几陷国家于债台高筑之境的挥霍浪费的短暂时期。故王的胞弟普拉雅济波克王即位之后，这个当权的奸党当即被推翻，于是组织了以厉行节约为基础的政府，以不仰赖外债或增加税收而平衡国家收支为宗旨。1927年3月施行的新关税税则大大地帮助了国内财政状况的改善和新政府的加强。此外，这位年轻的国王还下令将皇室收入裁减三分之一。

最高国务委员会

为了预防君主专制制度的另一种危险，普拉雅济波克王又调整了最高国务委员会的各部委的工作，以其中五位委员随时备国王顾问，经常向国王呈报国内外情况，并成为御前承上启下的桥梁。普拉雅济波克王虽然赞成民主化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行政权转让，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空想理论家；在国民教育尚未充分发达，人民责任感尚未发展之前，他未必就会组织议会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于包括国王个人的和绝对的否决权在内的皇室特权，还没有受到任何侵犯。

暹罗一印度支那间的1926年协约
644

新王面临的最重大的对外问题是同法属印度支那的边界关系的问题。这问题部分地起因于1925年2月14日的对法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签字国互相保证维持暹罗－印度支那的边界，同意只以警察管理这些地区，并且承允另订一项附有边界章

程的专约。根据这项规定，双方于 1926 年 8 月 25 日在曼谷签订了一项附有两个议定书的专约。1893 年条约中某些条款的一部分或全部以及 1904 年的协约现已一并作废，并经双方议定：将国界两边二十五公里的距离内划为非武装地区；在以湄公河为天然界线的地带，在附有某些限制后即以该水道作为分界线，而该河本身则应对双方人民开放通航，并由双方派警察维持治安。双方应就指派法暹湄公河常设高级委员会一事，进行商谈，以便由委员会负责监督两国地方单位间协议的实施，并随时建议必要的变更，但任何变更在实施以前都必须经双方政府同意。该委员会于 1928 年 1 月开始执行任务。双方另须进行协商，以期根据与旅暹印度支那人身分问题的处理办法相同的基础，来解决旅居印度支那的暹罗人的身分问题。协约于 1927 年 6 月 29 日批准，并自 1925 年 2 月 14 日法暹条约换约之日起——即自 1926 年 1 月 12 日起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暹罗当前未解决的问题

暹罗主要的对外难题看来既已解决，那么如何将受过现代教育而在政府机关中又找不到就业机会的一般青年吸收到国内自由职业、商业和农业方面去，也许就是目前突出的问题了。到目前为止，暹罗的贸易和商业实际上是由中国人、印度人和欧洲人控制的，他们，尤其是中国人，在该地落户的极多，并且填补了一向把经商和体力劳动看作是有失尊严的那个尽管和蔼可亲而多少有些懒惰成性和随遇而安的民族所任其存在的空隙。如上文所述，领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和进入稳定状态的是最近的 645 四位国王，而统治家族和贵族中有不少的成员都从旁加以赞助。总之，我们不妨这样说，全体人民都以驯顺而多少有些消极的态度，追随皇室的领导，而经济上比较幸运的那些集团，却从不想在政府机关以外另谋出路。国家的繁荣富强毕竟要依靠各阶级

人民对政府的积极关心和暹罗人自己对开发国内富源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不能凭赖一个不论如何能干、开明的极权统治者的统治，也不能凭赖外国人对国家资源的控制。

第二十八章 苏俄和远东（1917—1925年）

646

1. 俄国革命

目的在于世界革命

就俄国革命对于远东的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所发生的直接影响而言，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日本在山东所起的作用，而且还要深远得多。在中国对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同时，1917 年 3 月爆发的革命，于同年 11 月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最初革命的影响，在西伯利亚只是慢慢地感受到的，西伯利亚自 1905 年以后曾经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繁荣时期。使直达海参崴的全俄交通线西伯利亚大铁道臻于完成的黑龙江铁路，曾经招来新的居民、资本和工业。到了 1921 年，人口已经增加到一千二百万。欧战爆发，使这种可喜的情况部分地发生变化，许多西伯利亚人丢弃了生产性职业而应征入伍了。物价上涨，食物和许多制成品供应稀少。由于美国货的输入，海参崴部分地保持住自从 1905 年俄国失去旅顺口以后所逢到的繁荣。但是农民的命运却越来越艰苦。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以对付牟取暴利的商人集团，农民开始组织合作社，以购进制成品和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些合作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社员获得宝贵的组织经验，而这种经验在革命的年代中是运用过的。

1905年后的西伯利亚

合作社

克拉斯诺斯切科夫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东部西伯利亚的时候，远东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正在海参崴开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 10 月 28 日开

始的,它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对那为大家所赞同的共产主义在现有情况下是否适合于西伯利亚一层进行了辩论。急进派的领袖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拉斯诺斯切科夫,他是离开了俄国十二年后最近到达海参崴的一个犹太人,他为了避免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一向逃亡在美国。克拉斯诺斯切科夫的主要对手是尼基费罗夫,他是西伯利亚的土著农民,曾经到过俄罗斯,但是由于他的不受欢迎的政治活动,又从那里被放逐回到原籍。尼基费罗夫相信,为了获得最后从共产主义产生的最好的效果,对西伯利亚来说,资本主义暂时是有必要的。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消息,导致了这两派共产主义者的分裂,会议也因而中止。几星期后,12月间,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会议,这是和地方自治会派的会议同时召开的。地方自治会派主张保留旧政体。在两个会议中都是代表的克拉斯诺斯切科夫企图实行一种折衷方案,以促成一个联合政权。这个计划失败了,于是地方自治会被解散。

648

尼基费罗夫

俄国革命的爆发对于日本究竟是福是祸,一上来是看不清楚的。在1905和1916年之间谈判的那些秘密的和公开的条约,似乎使这两个专制政府已经紧紧地凑拢到一起。日本军人集团决定对亚洲北部的情况加以利用。早在1917年的夏季,在欧洲就有这样的一个非正式的表示,说英国和法国政府可能请求日本对西伯利亚进行干涉。这种表示究竟是出自日本,还是出自欧洲,现在仍然不得而知。但是在12月,日本政府向美国和其他几个协约国的政府提出一个照会,建议由它出兵西伯利亚去"维持秩序",并保护协约国在这个地区和欧俄的利益,交换条件是准日本在西伯利亚东部取得矿产、木材和渔业的专有让与权,并由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它否认抱有任何

俄国革命对于日本的影响

干涉的意念

走向干涉的最初步骤

领土野心。同月30日,一艘日军军舰没有依照国际惯例于事先通知俄国当局,就驻泊在海参崴港内。日本领事宣称这艘军舰是来保护日本侨民的。滨海省的地方自治会主席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得到答复。英国和美国的领事给日本以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华盛顿则拒不赞同日本的干涉计划。1月中旬,第二艘日本军舰、一艘英国巡洋舰和一艘美国船到达了。

649

远东人民委员会

哈巴罗夫斯克的地方自治会会议于1917年12月解散后,接着就在两个月内成立了称作远东人民委员会的苏维埃政府,由克拉斯诺斯切科夫担任主席。到6月间,这个政府已经控制了整个东部西伯利亚,包括海参崴在内。这是面对着日本人的反对、海参崴领事团的反对和那些反抗在西伯利亚推翻旧制度的白色反动派的反对而成立的。这个早期的苏维埃统治曾经被公平地描绘作仅仅是"温和的共产主义的"。西伯利亚的其他各地则处于各种不同政权的混乱统治之下。假如东部西伯利亚曾经听其自然,可以想象,人民可能繁荣地发展起来。事实不然,他们的地区成为好战分子的战场,因而远东的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2. 在西伯利亚的干涉行动

俄国的军事专制政权的崩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在西伯利亚的传播,似乎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不仅能在北满和外蒙取代俄国的地位并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而且甚至把西伯利亚的一大部分地区也置于它的利益范围之内。但是中国和美国也象日本一样,对西伯利亚表示关切。这两个国家都是西伯利亚的近邻,一个是陆地上的,一个是海上的,而所有这三个国家在大战中都属于协约国的一边。1918年3月俄国被迫同意

日本的机会

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使二十万名战俘从中欧释放出来，并且似乎要将西伯利亚开放给条顿族的势力。这也产生了俄国把海参崴的大量军火储备出售给德国的可能性。

1918年在西伯利亚的条顿势力

导致武装干涉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俄国境内存在着五万名左右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这些士兵不愿为保卫奥地利而战，却在欧洲向俄国投降。他们经俄国人加以改编去对德国人作战。1918年初发生的两个事件，促使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在4月间冲过西伯利亚，意在越过太平洋和美国，以达法国西线。这两个事件是1月间布拉格发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独立宣言和3月间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签订，后一事件已使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可能再在东线对德作战。在开始跋涉以前，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于4月间在莫斯科得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许可，而这时他们本来是可以占领莫斯科并摧毁那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府的。但是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之间发生了摩擦，而后者发觉到他们面临着各种阻挠。他们在伊尔库次克以及其他地方遭到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新兵的袭击。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现在攻占了叶卡特林堡、切利亚宾斯克、鄂木斯克、诺沃尼古拉也夫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和雅库次克，并且在贝加尔湖东岸击溃了一支军队。他们中间有一万人越过远东委员会的领地，并且在海参崴受到东部各苏维埃的友好接待。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显然在协约国的鼓励下，于1918年6月28日突然占领了海参崴，并且推翻了这个港口的苏维埃政府。两个星期后，他们回过头来重新越过西伯利亚，以便从东面进攻俄罗斯，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前进到乌苏里江流域。他们对这一次的折回所提出的理由是，去援助正在西伯利亚西部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同志们。

650

捷克斯洛伐克人

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布尔什维克人之间的摩擦

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第一次远征

与此同时,日本正为进行干涉作好一切部署。在哈尔滨,好久以来一直充任中东铁路局长的俄国将军霍尔瓦特正在策划组织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日本没有能够同他达成协议;因此,就同某些驻留在西伯利亚边境的哥萨克集团进行谈判。日本的目的是双重的:以同等的真诚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势力在西伯利亚的蔓延和一个强有力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建立。受到日本鼓励的一个哥萨克领袖是谢米诺夫长官,这人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横跨赤塔附近的铁路,切断了东西两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交通。另一个哥萨克人是卡尔米科夫长官,他成为一个独立的领袖,于1918年秋季在伯力及其附近一带建立了恐怖统治。这些得到日本鼓励和援助的人,既阻挡了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统一,也阻挡了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统一。

日本对于干涉的准备

651

日本的双重目的

在中国,日本也在施展外交伎俩。1917年中国参加欧战的结果,一个督办参战事务处在北京成立,由日本武官斋藤将军任顾问。这个处成为北京安福系政府和它在东京的扶植者之间的连锁。在巴黎和会中屡被提起的中日两国1918年协定,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商妥的。那年1月签订的军械借款合同,规定由东京以价值四千万日元的军火供给安福系。5月16日,中日军事协定在东京秘密签字。三天之后,又签订了一项海军协定。这些协定直到1921年1月28日都继续有效,并且对于中国参加欧战和在西伯利亚进行干涉两事,都起着使中国为日本军方所左右的作用。1919年3月14日,东京和北京同时对这些协定加以所谓全部公布。

北京的督办参战事务处

1918年1月的军械借款合同

1918年5月的陆军和海军协定

继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政变而来的,是地方布尔什维克党人企图夺取哈尔滨的举动,因此,中国根据1896年的铁路协定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到北满去保护边疆、中东铁路和当地

中日两国在西伯利亚的联合行动

的俄国人民。通过1918年的中日军事协定及其补充的解释和商定办法,特别是1918年9月6日的详细协定,日本和中国同意在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省和阿穆尔省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其任务在救援捷克斯拉夫军并排除德奥两国及为之援助之势力"①。在这两省行动的中国军队归日本军司令官指挥。一部分中国军队应由库伦往外贝加尔省方面行动,而派往这个地区进行协助的日本军队,则应归中国军司令官指挥。中国可以利用南满铁路从大连、牛庄或奉天运兵到长春。"至于东清铁路之输送,应以东清铁路之当局当实施之任,而为与该当局交涉并使中日及捷克斯拉夫各军输送之调度有方起见,中日应设协同机关,但此项机关,将来联合国军队倘行动于此方面之时,联军重要之人员亦可参加。"②

652

1918年7月海参崴的被接管

在日本和美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遭到由德奥军官指挥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攻击的消息,以及给养物资可能落入中欧列强之手的危险,助长了要求进行干涉的舆论。1918年7月初,在海参崴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协约国方面已经接管了这个港的政府。这项声明是由美国海军上将奈特、日本海军中将加藤以及英国、法国、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司令官们签署的。法国、英国和比利时都渴望进行干涉。

干涉的目的

最后,华盛顿政府向东京建议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目的,正如8月3日美国政府所宣布的那样,是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使其不受德奥战俘的攻击,保卫军需品,并促进"俄国人自己愿意从中接受援助的任何关于自治和自卫的努力"。东京

① 录自《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第1条原文,见《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34页。——译者

② 录前引协定第4条原文,见前引书,第7卷,第235页。——译者

立即同意根据美国的提议采取行动,并宣称,"日本政府……重653申其已经公开宣布过的尊重俄国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他们进一步宣布,在上述目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得到救援〕实现以后,他们将立即从俄国领土撤退所有的日本军队。"不久以后,又发布了一项声明,规定每一个进行干涉的国家为守卫海参崴的军需品和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人而派遣的军队将不超过七千名。

干涉的开始

1918年8月3日,即美国政府陈述其进行干涉的原因和目的的那一天,第一批联军的分遣队——英国的——在海参崴登陆。一星期后,法国派遣的四连安南兵开来。12日,从日本开来一个营;15日,从菲律宾开来的美国武装部队到达。从一开始起,日本要想在东部西伯利亚建立霸权的决心就表现得非常清楚,致使西伯利亚人有理由来对日本干涉的动机疑虑重重。官方机关报《消息报》宣称:"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阻遏俄国革命并将俄国同太平洋切断。他们要夺取西伯利亚肥沃富庶的土地,奴役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那些同日本合作的国家也批评日本,其严厉的程度不相上下。

日本居于领导和侵略的地位

日本派遣的军队不是七千名,而是如它后来所宣布的,按照它同中国签订的5月16日的协定,派遣了七万二千名。一个师团从北海道开抵海参崴;另一个师团从名古屋取道朝鲜和满洲,再开至外贝加尔省,大本营则设在赤塔;第三个师团采取相同的路线,在蒙古与外贝加尔省边界的满洲里设下大本营。中国的兵营被霸占,而且还企图取代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守卫着中东铁路的中国军队。第三个进兵地点在海参崴以北八百多哩的黑龙江口。日本海军陆战队于8月16日就在北库页岛对岸的庙街地方登陆。干涉军的首席将领是日本最高军事参议院里的大谷

在庙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大将。

654

在西伯利亚的联军不协调

到了10月中旬,穿越西伯利亚而通到离莫斯科仅三百哩的那个地区的铁路交通线,都落入联军的手中。要是联军和反革命军队能够步调一致,布尔什维主义可能在这时已被击溃,可是他们不相协调,而且侵略军互相牵制的情形几乎造成一次新的战争。在格雷夫斯少将统率下的美国军队希望严格遵守干涉协定上所规定的条款;法国和其他欧洲各盟国想增强欧洲东线的力量;日本人则决心要在大陆上扩张他们的领土和经济势力。

日本的侵略

在西伯利亚,一个为数约为二百人的工程师队本已应克伦斯基政府之邀去修复西伯利亚铁路,以便重新通车,这个队在获得英国、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许可后,准备经营中东铁路,直到一个足以为盟国方面承认的政府成立时为止。日本拒不同意。与此同时,一个似乎受到日本扶助的巨大反美宣传运动展开了。价值达一千万日元的日本食品和其他商品装在密封的车厢内从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免税运到西伯利亚来,并且开办商店以销售这些货物,而这时俄国人简直无法使他们的货物装运。日本军事当局的行动同它们的政府所宣布的目的以及其他干涉国的目的背道而驰,以致美国政府在11月2日通过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和它自己在东京的大使提出了抗议。在一个时期内,两国间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似已悬于一发。但是胸襟较为宽阔和比较有远见的日本人士,特别是那些对工商业有利害关系的人,在接到欧洲停战的消息时占了上风。结果是,日本下令将西伯利亚的日军几乎减少了一半,格雷夫斯将军得到了日本方面今后予以衷心合作的保证。

美国的抗议

高尔察克海军上将

实际上也与欧洲停战同时发生的,就是高尔察克海军上将成为在西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地方政府的独裁者——这个

政府是俄罗斯帝国内最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在捷克斯洛655伐克军队的支持下,高尔察克于1919年的最初几个月中开始组织了一支为数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的军队。在西伯利亚的外国现役军人同高尔察克上将或多或少地都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为数将近十一万九千人:捷克斯洛伐克五万五千人;日本二万八千人;波兰一万二千人;美国七千五百人;加拿大四千人;塞尔维亚四千人;罗马尼亚四千人;意大利二千人;英国一千六百人;法国七百六十人。在一个时间内,高尔察克似乎有可能把布尔什维克政府推翻,但是在1920年1月,他的政府瓦解了。高尔察克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他们这时正为了真正的撤退,取道西伯利亚退却)押解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并在2月6日被枪决。

三个哥萨克领袖的权力

高尔察克倾覆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一个结果,就是三名哥萨克领袖的权力日益增长和被极端滥用,这三名领袖在名义上是高尔察克的下属,因此他们的残暴行为,不得不由他负责。三人中的两人——谢米诺夫和卡尔米科夫——上文已经提及;第三个名叫伊凡诺夫-里诺夫,是东部西伯利亚军队的司令。大都就是这三个人的行动使高尔察克的政权在群众中不得人心,并且不能得到盟国方面的完全承认。谢米诺夫特别蔑视高尔察克;此人控制着赤塔一带的铁路,使那位独裁的海军上将无法得到武器,并且把后者同海参崴之间的交通切断。

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合作"

日本在欧洲停战前夕所允诺的在西伯利亚同西方国家的合作,是沿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发展的。东京作出计划,而西伯利亚的军事当局予以处理。日本与它盟国之间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铁路的控制权。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以前,日本一直在商谈将它对南满铁路的管理权从长春延展到哈尔滨。日本军事当局656决心要独占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对于日本拒不在盟国共同监督

这条铁路的协定上签字而再度提出抗议之后,1919年2月12日宣布这个协定已正式签字。一个由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和美国的代表所组成的盟国国际铁路委员会,将对这条铁路加以管理、控制和保护。关于这条铁路的技术上的问题,将由一个专门技术机构予以解决,这个机构由美国工程师斯蒂文斯上校主持。在赤塔的谢米诺夫对这个协定置之不理,他完全处于西伯利亚的日本当局的掌握中,后者给他以金钱、军火以及其他供应品,以便由他来控制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会合的这个铁路地区。1920年1月20日,谢米诺夫自称为西伯利亚的临时统治者,但是没有划定他的疆界。

盟国国际铁路委员会

1920年1月12日,即谢米诺夫自命为西伯利亚统治者的前八天,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声明它将从西伯利亚撤退它的军队。五天以后,第一个分遣队出发往马尼拉。到4月1日,所有的美国军队都已撤离完毕。在同一个时期内,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中国的军队也都撤退了。日本企图延迟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军队的撤退。3月31日,日本发表了一项文件,宣称它不能"立即"撤兵,但否认它对俄国有任何政治阴谋,并且含糊其词地允诺,一俟事态圆满解决,即从西伯利亚撤出。

外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除外

高尔察克政权的崩溃,谢米诺夫所负有的残暴名声,以及西方干涉者撤退的迫近,促使东部西伯利亚重新组织了苏维埃。参加这些苏维埃的人,对于政体并不象对于改进他们的经济地位和获致和平那样关心。在赤塔以北和以东地区——在海兰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参崴、伯力以及其他地方——具有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滨海省成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农民团体到处拿起武器、镰刀和锄头,准备把反革命分子和外国侵略者清除出境。这些称作游击队的农民团

游击队

657

体,是由各种类型的人组成的;他们采用一种游击战术,使日本人和哥萨克领袖们深感头痛。在日本扶助下统治着伯力的卡尔米科夫,在他企图潜逃时被擒获处死。

日本在东部西伯利亚加强控制

在1920年4月1日以后,由于美国及联军的撤退,在西伯利亚战场上只剩下了日本。与此同时,在海参崴北面几哩的双城子地方开了一个会议,东部西伯利亚许多地区都有代表参加,以便成立一个政府。滨海省临时政府的军队这时已将近二万五千名——与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兵力不相上下。日本的地位濒于危殆,除非它能找到一个增援的口实。在4月2日,向游击队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大意是一切反日的势力必须加以遏制,这不仅就西伯利亚方面来说,也是就希洲和朝鲜方面来说的,并且应在各方面予日军以协助。接着有两天频频举行会议;结果,西伯利亚人在抗议下同意了这些要求。但是,日本军阀所期望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协定。在谈判停止后大约四个小时,日本人就开始在海参崴市街上开炮,连政府房屋也毁于炮火。俄国卫戍军队被日军解除了武装,日军在全城及其近郊占领了所有的战略据点。在第二天早晨,即4月5日晨,双城子和伯力也发生了同样的袭击。更多的政府房屋被炮弹和机关枪火力所破坏。在三次袭击中,有好几百人死难。同月28日,东京派驻海参崴的外交代表企图装出一副他的政府是为干涉国而采取行动的模样,美国领事却立刻否认东京在任何方面是代表美国政府的。4月29日,俄国人被迫签订了一项协定,从而使日本在滨海省增强了控制力量。

庙街事件

海参崴协定签订后不到一个月,位于黑龙江口的庙街地方发生了一个事件,使日本得到一个机会在精神和物质上增强它对北方海岸的控制力量。1918年4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在

658

庙街地方立下脚跟。随后在9月间，有两连步兵接替了海军陆战队。在进行干涉的整个时期，日本陆海军在这个地区的行动使人既怕且恨。日本的炮舰在黑龙江上向村庄开炮，有些村庄被焚毁，居民们遭到袭击，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杀戮。1919至1920年冬季，日本在庙街的驻军有六百四十人，协助他们的还有一些白俄卫队。一个名叫特里皮岑的土匪首领，纠合了约三千名的一支军队，决心要把日本人和他们的反动的同盟者驱逐出境。特里皮岑和他的追随者宣称他们自己为游击队。1920年2月29日，在一次炮击之后，日本驻军及其白军同盟者就投降了，他们在宣誓后未予缴械就被释放。3月12日早晨两点钟他们背叛了誓约而袭击特里皮岑的司令部。他们失败了，只剩下官兵一百三十四名；当即被拘禁。5月27日，在一支日本援军即将到达的时候，特里皮岑放火焚烧这个拥有二千幢房屋的城市，包括拘禁日本俘虏的监狱在内，而日本领事和家属也同这些俘虏在一起。6月3日，当援军到达时，只剩下十七处建筑物了。这一个野蛮行为是不顾中国领事的抗议而发生的，中国领事曾经被给予时间带同四千名中国人和七百名俄国人撤退。

特里皮岑和他的"游击队"

庙街事件同样地受到日本人和真正的游击队员们的非难。后者在几个星期后俘获了特里皮岑，经过一次审讯，于7月25日把他和他的主要帮凶 —— 一个妇女 —— 处决了。他的强盗军队中的其他二十多名首领也受到同样的处置。这次屠杀在精神上的影响是重要的；日本为了进行干涉已经花了三亿多日元，还显不出多大成绩。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断然向北扩张其地位的机会。1920年7月4日，日本政府宣称，它将占领库页岛的部分地区，直到一个可以被承认的俄国政府作出圆满的解决时为止。这样，自从1875年以来就被俄国占有的北库页岛暂时归日

事件的重要性

659

占领北库页岛

本控制,一如根据4月29日的协定对滨海省的情形一样。一个可贵的外交上的战略基地就这样落到日本手中,而日本还继续控制着黑龙江口。

违反与盟国的协定

在西伯利亚攫取领土,直接违反了日本和美国所达成的下述协议:即两国将不“利用这次联合远征或可能因之而起的任何事件作为一个机会以占领土地,甚或暂时对西伯利亚人民实行军事或行政的控制”。海参崴的日本人企图让人看来好象他们在东部西伯利亚的行动是得到各干涉国的许可的,结果,华盛顿方面发出了一项正式声明,说明美国政府在1919年的中东铁路协定以后,从未与日本政府作出任何协定。日本夺占库页岛以后,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照会,表示惊讶和反对。这些驳斥的声明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愤怒,但对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地位却没有直接或即时的影响。

美国的抗议

3. 远东共和国

“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

到1920年,克拉斯诺斯切科夫根据当地的实际经验,认为通过资本主义以发展西伯利亚的一个过渡阶段是有必要的。经过他的努力而获得莫斯科政府的许可后,东部西伯利亚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议,结果在上乌丁斯克成立了被称作“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这是在1920年4月6日,即日本在双城子和伯力发动袭击的次日,也就是庙街事件发生前的七个星期成立的。

苏俄政府予以承认

5月11日,日本的大井大将从海参崴发出电报,对成立新政府表示赞同,并且保证一旦建立稳定的政府,日本军队将立即撤退。16日,收到莫斯科外交委员契切林的一份照会,承认新共和国。

660

由于莫斯科给予援助,以及游击队又重整旗鼓,远东共和国的力量增强起来,因而使日本人及其被保护者谢米诺夫的地位越来越难支持。1920年7月,按照关于停止外贝加尔湖线军事行动的协定,日本人同意从外贝加尔省撤兵。几星期后协定获得履行,谢米诺夫对日本撤兵抗议无效,然后参加了谈判,指望自己被任命为共和国军队的总司令。10月下旬,谈判终止,这时农民游击队迫使谢米诺夫乘坐飞机逃离赤塔。

谢米诺夫逃离赤塔

滨海省的人民会议在6月间宣称他们愿意同新共和国联合。阿穆尔省的居民也有同样的愿望。谢米诺夫的被驱逐,使赤塔在11月初成为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联省的首府。日本人仍然据有滨海省的南部、伯力和黑龙江口、北库页岛以及堪察加的一部分。12月3日,他们正式禁止滨海省参加远东共和国。这并没有能够阻止那个地区的人民参加1921年1月间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当会议于2月12日在赤塔召开的时候,百分之七十的代表是无党派农民,他们的崇高目的是谋取以结束外国干涉和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和平。立法权归于一个单院式的国民议会,行政权则在以克拉斯诺斯切科夫为主席的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主席团手中。

滨海省

远东共和国政府

如果说俄罗斯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满意的,那么,远东共和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却刚好相反。正当赤塔的制宪会议制订和采用宪法并组织政府的时候,日本军事当局不但继续维持,而且甚至增强他们的地位。他们在西伯利亚境内和境外对远东共和国大造谣言。他们控制着黑龙江,劫夺俄国船只。他们阻挠铁路和电报的畅通,致使瘟疫蔓延和饥荒加剧。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禁俄国人。他们同土匪和反革命集团合作,或者给予他们以援助,并且在海参崴解除了企图控制那些反动

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

661

集团的民兵的武装。他们宣称将控制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所有渔场,连黑龙江下游的渔场在内。1921年3月21日,据声明,庙街和北部库页岛将被重新占领,并且将以民政府来代替军政府。设立民政府的意义在山东方面曾是有目共睹的。在4月11和21日,共和国政府向日本人发出照会,前一个照会要求日本撤兵,停止在西伯利亚的干涉,并且给予新政府以真正的承认;后一个照会对于以上刚提到的那些行动表示抗议,特别是对于前一个月发出的关于库页岛的宣言。日本军事当局的答复是在西伯利亚增兵一万人,以及派遣驱逐舰到库页岛和堪察加。在日本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还对俄国人进行了人口调查,并且订出计划要把海参崴发展为一个"国际自由港"。

日本对西伯利亚的政策在东京遭到反对

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冒险尝试付出的代价,以及由于对西伯利亚的政策而招来的责难,成为宪政会反对原敬首相和政友会的政治火药。在二十一条要求时期任外务相的加藤子爵于1921年1月发动了对原敬政府的攻击,指责政府在西伯利亚所得到的结果,并不足以证明其所用方法的正确。首相和陆相田中男爵辩称,布尔什维主义扩张的威胁,使日本有理由采取西伯利亚政策。尽管如此,还是决定在5月15日在东京召开一个包括文职官员和军事首脑在内的殖民会议。这个会议还没有举行,东京的军事集团在陆相主持下就议决了一系列无法做到的条件作为从西伯利亚撤兵的先决条件。会议刚在东京开始,一个经过周密准备的政变在海参崴发动了,其目的在于表示西伯利亚的局势并不安定,因而需要日本继续干涉。在日本军事当局的鼓励和非正式的援助下,过去追随高尔察克和谢米诺夫的卡彼尔将军的军队,推翻了那个由选举产生而与赤塔有联系的政府。一个反动政权成立了,不久就扩张到双城子和伯力。

662

远东共和国已经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政府，于是在1921年的上半年，不仅把反对日本侵略的抗议照会送达东京，而且也送达华盛顿。所提的要求是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应予新政府以正式的承认。赤塔政府以华盛顿曾经于1918年邀请日本合作进行干涉，认为美国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在东京殖民会议上力持政府应停止在西伯利亚干涉的自由主义者的地位，由于1921年5月31日华盛顿向东京提出的一份照会而获得加强。这份照会包含有一项声明，略谓美国政府"现在和今后都不能承认日本由此次占领或控制所引起的任何要求或权利为有效，它也不能默认日本所采取的任何足以损害现行条约权利或俄国的政治或领土完整的行动"。7月10日，哈定总统向日本发出初步邀请，要求它参加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旨在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及远东事务的一个会议，这使东京不得不三思而行；于是作出决定，同赤塔政府进行谈判。这项决定导致日本人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邻人举行了两次会议。

来自美国和远东共和国的责难和抗议

第一次会议是在海参崴的日本代理人和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尤林先生会谈之后在大连举行的。这个会议于1921年8月26日开始，比华盛顿会议早两个半月，会期则延至华盛顿会议以后。由于日本提出了过分的经济和军事要求，以及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们相信日本正在援助白军反动派以反对伯力，而一面则拒绝从西伯利亚撤兵，于是大连会议陷入僵局而一无成就。莫斯科派遣了一名非正式的观察员来加强远东代表的力量，这就说明了远东共和国不过是莫斯科的一个代言人而已。当俄国从华盛顿会议的与会国名单上被划除以后，曾有企图使远东共和国取得与会资格。由于国务卿休斯指出了凡世界上获得承认的政府都没有承认远东共和国这一事实，这次企图归于失败。

大连会议(1921年8月至1922年4月)

663

尽管这样,美国政府却公开宣称,俄国的利益将获得公正而充分的保护。

华盛顿会议与西伯利亚问题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邀请,导致日本试求对于西伯利亚和山东的悬而未决的争端获得一个解决方案,目的是要以既成事实放在聚于一堂的那些西方各国的代表的面前。这些企图失败了;因此,这一连串的争端在华盛顿作了讨论。关于西伯利亚,提供考虑的主题有两个:第一,尽管在1920年9月最后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已经离境,日本却没有撤兵;第二,涉及中东铁路的一些事情。对于第一个问题,日本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币原男爵代表日本政府指出了撤兵的困难:第一,牵涉到保护西伯利亚日侨问题;第二,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海参崴和双城子周围地区的一般情况必然会影响朝鲜边境的安全"。关于庙街问题,他声明占领不过是一种"报复措施"。最后币原男爵声称,"日本代表团受权宣布,尊重俄国的领土完整,遵守不干涉该国内政的原则,以及遵守在俄国属地的每一个地区内一切国家应在商业和工业上得到均等机会的原则,是日本既定不变的政策。"

664

国务卿休斯在答复币原男爵时,以友好而坦率的态度清楚地表示,美国政府决没有赞同对西伯利亚土地的霸占以及日本军队在那里的继续驻守。他结束时表示"希望日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它已经表明的意图,即最后结束对西伯利亚的远征并把库页岛归还给俄国人民"。

日本决定从西伯利亚大陆撤兵

华盛顿会议促成了十分必需的西伯利亚局势的开朗;它表明了国际舆论赞成日本撤兵,并带来了日本的一项声明,即门户开放的原则将见诸实施。会议于1922年2月6日结束。大连会议由于俄国人要求日本从滨海省撤兵而于4月间破裂了。在那个省里的白军反动派向赤塔挺进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大多

数的日本人民剧烈反对继续进行干涉，因而在1922年夏季，日本宣布将在10月底从大陆上撤退它的军队。

长春会议(1922年9月)

9月3日，日本和远东共和国在北满的长春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时赤塔和莫斯科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已渐渐表现得很明显。苏俄企图强迫日本给予承认并以平等的条件相对待。赤塔和莫斯科也坚持，日本不但应从大陆而且应从库页岛撤退。日本对于这些要求，概不同意。它表示愿意交出储存在海参崴的价值二亿五千万日元的军火，并且愿意同苏俄在以后一次会议上相见，但是它在没有得到对庙街死难者的赔偿以前，不愿从北库页岛撤兵，并且它坚持所提议的协定只直接与远东共和国有关。会议于25日破裂。尽管这样，日本还是遵守它从大陆撤兵的决定。到了11月1日，它所有的军队都已经撤离了。

665

日本远征西伯利亚的代价

日本是得不偿失的。它公布的伤亡人数计战死的官兵有一千四百七十五名，受伤的一万余名，此外还有六百多人病死。四年多的干涉在财政上花费七亿日元左右。远东共和国在很好地达到了它的目的以后，于11月13日议决废除这个国家，因而莫斯科政府能够宣布它的统治从波兰一直伸展到太平洋。

4. 赤塔和莫斯科同库伦的关系

布尔什维主义的俄罗斯和中国

为行文清楚起见，至今还没有提到苏俄和西伯利亚同中国及其藩属的关系。但是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这两个国家体系中间存在着的关系和过去帝国时代所维持的关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国在日本的卵翼下对西伯利亚进行干涉时所扮演的角色是无足轻重的。俄国和中国间在其他地方存在着的关系就迥然不同了。

关于蒙古问题，俄国革命的爆发对中国来说是好机会，正如

安福系对蒙古的政策

1911年的中国革命对俄国那样。北京的安福系人物受鼓励拟订了三重目标。他们计划要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经蒙古传入中国。他们希望堵塞日本势力向外蒙古扩张。最后,随着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他们越来越急于向那些愤怒的国人显示一下他们有收复失地的能力,而这些领土显然是在前总统袁世凯当政时失去的。1918至1919年间谢米诺夫在赤塔及其附近所建立的恐怖统治,以及那位领袖在外贝加尔省布利亚特人协助下组成一个泛蒙古帝国的计划,鼓励了中国去加强对内外蒙古的控制。

强有力的政策

这项政策是在1919年3月从违反1915年的三边协定而增加派驻特使人员的卫队人数开始的。欧战结束后,北京的督办参战事务处在1919年7月改组为边防局。

"小徐"在蒙古

666

徐树铮将军在接受新设置的筹边使职位以后,不顾条约规定而派兵到外蒙古。在几个月之内,在库伦的中国旅已达四千人。中国驻库伦都护使陈毅企图劝告蒙古人取消自治失败以后,徐将军即于10月间前往,强迫外蒙古当局向北京政府申请准许外蒙古重新归入中国主权统治之下。11月16日,他从蒙古官员方面收到了由他自己口授的申请书。这份申请书上并没有呼图克图的签署,也没有经过那个半代议式的上院和下院的批准。六天以后,北京徐世昌总统签发一项训令,批准了这项申请,而据他说,申请书中"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王公、喇嘛等……同心爱国"①。过去在满清皇朝时代所实施的制度,宣布将予恢复,一个光荣的称号授与了呼图克图。根据12月1日的总统命令,中国驻库伦的大员由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的名义接替。伴随着这个行动的就是把蒙古军队解散和

蒙古取消自治的"申请书"

① 录自中国大总统令原文,见民国8月11月23日《政府公报》。——译者

解除武装,以及在库伦开设边业银行的一个分行。中国的经济势力,包括通用货币在内,现在代替了俄国的势力,后者自从1915年以来一直是至高无上的。

安福系倒台(1920年)

徐将军在外蒙古的地位是使奉天督军张作霖不快的根源,张作霖这时控制着东三省,并且把外蒙古看作在他自已的势力范围以内。首都所在的那个直隶省,这时由曹锟任督军,他的主要将领是吴佩孚。奉系和直系决定推翻安福系,他们在1920年夏季用战争达到了目的。段祺瑞将军下野到天津去研究佛经,而徐总统则犹豫地留任两年。

徐总统企图抚慰蒙古

北京政府了解到它派在库伦的代表不得人心,以及它在库伦的地位不大稳定,这可以从1920年8月15和31日的两道总统命令中看出来。前一道命令着中国官员在外蒙古谨慎从事;后一道命令提升了王公和喇嘛们原有的等级。9月初,外蒙古政府组织大纲拟就。以前驻节库伦的陈毅被任命为镇抚使——徐树铮将军已经免职,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买卖城和唐努乌梁海的中蒙委员,都要向陈呈报。但是他的权力被驻库伦的中国军队司令褚其祥所分享,此人的排外倾向是众所周知的。

667

褚其祥将军的野蛮和大不敬

在日本于8月间自外贝加尔省撤兵而造成谢米诺夫地位的削弱之后,接着他部下的一个白俄将军温根男爵就带领了三千军队突然离去。温根向远东共和国进攻,但是被驱入蒙古。10月间(1920年),他同他的为数已见增加的包括俄国人、布利亚特人、鞑靼人、西藏人、蒙古人、汉人、日本人以及其他国籍的战俘在内的部队,开始向库伦展开一连串的进攻。库伦及其近郊的混乱状态,给褚将军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纵容他的军队向这个城市的外国居民(内中有二千多名俄国人)进行干扰,他们大多数受到极端野蛮的虐待。这位中国将军后来又拘禁了几个蒙古

王公,甚至拘禁了呼图克图活佛。见到这样的大不敬,佛教界不禁为之震悚。

温根攻陷库伦

在1921年2月的开头四天中,温根男爵率领二千名军队向库伦发动了第二次的直接进攻。该城连同二、三千名中国驻军中的大部分一并失陷。幸存者逃到恰克图,他们在那里屠杀了三百多名俄国人,以示报复。屠杀和劫掠的恐怖图景,伴随着和接着库伦的陷落而来。俄国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以及中国人被处死,他们的财产不是被捣毁,就是被没收。获得释放的呼图克图于5月间复行登位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国家的君主。势力已经扩展到外蒙古各主要中心地点的温根男爵,做了这位新君主的最高军事顾问。

668

温根被处决

3月13日,在俄国领土上的恰克图,蒙古人民临时革命政府由1918年在俄国组成的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告成立。温根于6月间进攻恰克图,被苏俄和远东共和国的军队击败。在夏季的后期,温根的军队叛变;他于是逃亡,但为一队蒙古兵所俘获,这些蒙古兵把他捆绑起来丢在草原上。苏俄士兵发现了他,把他交给了当局,苏俄当局加以审讯后,在诺沃尼古拉也夫斯克将他处决。

在库伦的赤色统治(1921年7月)

在击败温根以后,苏俄军队一路进逼,于7月间占领库伦。那些在中国人和俄国人白色政权下幸存在蒙古的俄国人,随着赤色统治的建立,大部分死亡了。呼图克图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君主而再次满足于精神上的宗主权,7月6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这个政府同莫斯科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远东共和国同莫斯科那样。一个部长会议统治着国家,由巴托同志任主席,巴托过去曾经在库伦俄国总领事馆里当过打字员。

安福系被推倒,是莫斯科所衷心赞许的,它希望有一个反日

亲俄的政府继之掌权。但是,在安福系崩溃以后受任的奉直两系的内阁,却显然是不听布尔什维主义那一套理论的。1920年12月31日,中国驻伦敦公使向克拉辛递交了一份致送他的政府的公文,这项公文正式否认契切林关于在库伦的中国官员曾经请求俄国协助驱逐白军侵略者的说法的真实性。

中国懂得用什么手法

新成立的蒙古革命政府于1921年7月底恳求莫斯科"在目前正在东部草原地带寻求援军的共同敌人的威胁完全解除以前,不撤出蒙古的苏俄军队"。因此,苏俄军队一直驻扎外蒙古到1925年为止。但是在这个年份以后,苏俄教练和专家仍然继续在蒙古军队中任职。1921年11月5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条约里没有只字提到中国。尽管有了这个条约,莫斯科仍然拒不放松它对北部和西部蒙古的乌梁海地区的控制。相反地,这个地区却被组成为唐努都瓦共和国,同各苏维埃——尤其是西伯利亚——维持着甚至比它同蒙古共和国本身更为密切的关系。

莫斯科对赤色蒙古政府的援助

669

蒙古各族人民的第三次大会于1922年8月在库伦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外蒙古的政策应该同俄国各苏维埃的政策一致。中国的势力相应地减弱,并且在同年12月,一批中国人被驱逐出境。为了抚慰中国本部,并保证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苏俄在它于1924年5月31日同中国签订的条约中,同意"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①。实际上,外蒙古变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共和国之一,纵然是非正式的。尽管中国提出了多次的抗议,尽管莫斯科也作了同样多的关于大公无私的政策和公正处理的诺言,但是明显的是,又有一块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国家体系里一个组成部分的

1921年后俄国和中国在蒙古的地位

① 录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5条。——译者

广袤土地,已经被合并到一个年轻力壮的社会主义帝国里去了。

5. 到中国和日本的尤林和越飞使团

亚洲对俄国的世界革命来说是必要条件

西伯利亚和外蒙古的成为苏俄的卫星国,不过是那遐迩咸知的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计划中的一个初步行动,而在这个计划中,亚洲将是"东线"。自从1917年底中国军队被派遣到哈尔滨去保护国民和他们国家的利益时起,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就变得甚至比沙皇和满清皇朝时的那种关系更为重要了。问题的各方面在西伯利亚、新疆、蒙古、北满和中国本部发展着。数以千计的白俄流亡到中国和日本,借以逃避赤色革命的后果。日本和法国决心要在东方阻挡布尔什维克党人,它们一时也颇能给东来寻求承认并蹉商新条约的苏俄使者造成困难。670

孙中山(1916—1925年)

孙中山从1916年袁世凯之死起到他本人于1925年逝世时为止,不是在广州作为那个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政府的领袖,就是在上海策划如何重新获得政权。孙博士和他的追随者,对于那些为中国满清以后时期所特有的、同中俄和中日关系都有重大影响的历次内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每个国家视方便的需要,同敌对的双方进行谈判。

俄国送达中国的革命呼吁书(1919—1920年)

早在1919年1月,在莫斯科的中国工人联合会决定要派遣宣传员到中国来。3月,有一份呼吁书送达广州;7月,又向北京发出了另外一份呼吁书。但是这后一份呼吁书一直延至1920年3月方经由伊尔库次克转达。在前一份呼吁书中,对于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力量、反对压迫人民的北洋政府和外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进军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备加赞扬。北洋政府被称作"外国银行家的傀儡",促请中国的无产阶级同俄国人结成联盟。俄国领袖们很快地就觉察到,对中国无产阶级发出一封呼

吁书是不够的。于是就探求其他门径以弥补在西方所曾应用的手段的不足。在那个屈辱的4月份巴黎决议以后,莫斯科政府于7月间由苏俄外交副人民委员加拉罕向“中华民国各部长、各首长、各机关以及人民”发出了一项宣言。这份宣言主张“一切人民,不管他们的国家大小,不管他们住在哪里,不管他们在什么时候丧失了他们的独立,都应该独立自主,不应该屈服于外国的束缚之下”。在宣布废除秘密条约之后,莫斯科建议同中国在下列基础上进行谈判:

关于山东的决议的另一影响

1. 凡前帝俄政府所掠夺的土地一律归还。

2. 俄国政府愿将中东铁路的主权以及前帝俄政府攫为己有的矿藏和森林归还中国,并且不需索分文。

671

3. 现政府将不再接受庚子赔款。

4. 由前帝俄政府和中国为俄国人设定的特殊权益一概无效。一切领事裁判权也予取消。

5. 在上述各项之外,凡前帝俄政府不论单独地或与日本或协约国联合地同中国使节所订立的条约,如其中有不公平之处,将一律无效。”

中国的慎重态度

这项宣言有大量的印本在全中国散布,而以上海为宣传基地。这时,共产党人在西伯利亚节节胜利,击溃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军队,这使俄国在中国的势力大为增强。在他们博得广东政府的好感的同时,赤俄正在鼓励朝鲜人民对日本进行消极反抗。在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作的呼吁,进展颇为迟慢,直到1920年夏季安福系垮台之后才有重大的发展。

塔什干新疆条约(1920年9月)

9月间,北京政府批准了一个由塔什干苏维埃同中国新疆督军所派代表商订的商约。通过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一个经由土耳其斯坦同中国交往的新途径。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和中国

新疆将分别互派商业和外交代表。关于取消俄国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放弃在新疆的这项特权。中国人不顾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不久以前已开始在新疆边境征收关税。这时,在哈古斯河畔的伊犁设立了一个关卡。

抵达北京的尤林使团

远东共和国在1920年5月得到了莫斯科的承认以后,就同北京开始进行谈判。在安福系垮台后不到一个月,一位与旧时贵族有牵连而举止文雅的俄国人伊格纳提乌斯·尤林率领一个使团于8月21日抵达北京。尽管日本公使抗议中国同远东共和国交往,这个代表团还是受到了非正式的接待。法国公使在获得不讨论政治事务的保证以后,撤回了抗议。尤林立即开始工作,来破坏至今仍被认作是俄国合法代表的帝俄驻北京公使科达契夫亲王及其外交和领事馆方面助手们的信誉。在1917年11月30日,八国联军各国的驻北京公使同意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支付的时候,也同意俄国的情形应为例外,它只能放弃一小部分赔款,大部分仍需偿付,并"暂由华俄道胜银行保管,以便日后移交给为中国所正式承认的俄国政府"。靠着这笔基金的支持,帝俄的外交和领事官员曾经在中国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地位削弱的第一次证明,就是从8月1日起停止支付赔款,这就使他们失掉了财政上的支持。尤林使命的成功,部分地由9月23日发布的一道大总统命令显示出来,这项命令中止了对科达契夫以及俄国驻华领事官员的承认。大多数俄国领事馆被中国官员所接管。所有俄国邮局不久也都关闭了。

672

科达契夫亲王信誉丧失

俄国失去领事裁判权

由于俄国同中国之间的条约继续有效,居留在中国境内的二十到三十万俄国人在理论上仍然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地位。事实上,这种地位是已经丧失了的。既然领事法庭已经不能尽其职能,而且俄国租界已经归由中国官员接管,那么,俄国人在实

际上已经处于没有任何领事裁判权的无约国侨民的地位。这就在新疆、蒙古、北满和中国本部引起了极度的混乱和最大的弊端。哈尔滨的俄国法庭被中国当局强制封闭,如在中东铁路地区的治安及初审法庭一样。尤林使团的代表们在估量他们的新政策的结果时,偶然也感到内疚。在1921年2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的照会中,曾提到了哈尔滨的中国法庭中流行着的可怕情况①。 673

尤林使团未竟全功

在塔什干-新疆条约的谈判和尤林使团于1920年9月抵达北京的同时,由张斯麐将军率领的中国使团抵达了莫斯科,它的目的是考察俄国在新政权下的状况。由于北京方面缺乏一个稳定的政府,由于知道尤林在中国以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为目的,也由于外蒙古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这三者合起来使尤林不能取得中国对远东共和国的承认。他在1921年5月回到赤塔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之职。

巴克斯使团

恰于1921年11月5日蒙俄协定秘密签订的时候,莫斯科派遣了另一位专使巴克斯来代表它在中国北部的利益。他最初否认俄国与外蒙古之间曾经商订过任何条约,但不久却被迫加以承认。这就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愤怒,它宣称"苏维埃政府和蒙古之间秘密签订的任何条约,中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

俄国转向东方

俄国现在派遣了一位聪明的外交家和老练的宣传家越飞到

① 参阅《中国年鉴》,1921—1922年,第638—644页。"译员的无能,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因为打破一扇窗子(window)而被控诉的一个人,由于译员的错误,就被中国审判官当作谋杀了温多(Window)先生而判罚苦役;幸而错误被发现了,于是这位审判官只不过取消了他自拟的判决书而科犯者以轻微的罚金。N的钱被偷去,被译作N偷钱……一些中国审判官对于法律原则认识的粗浅,在一次民事审讯中得到很好的例证,这次审讯的结果不是对被告下判决,而是对一个证人下了判决。当这个突兀的决定使在场听审的人骇愕不置时,审判官只不过说了一句'庭上晓得所为何事'罢了。"

东方来。他在1922年8月抵达北京,这时吴佩孚将军和张作霖元帅之间的战事结束未久,这个战事的结果就是张作霖元帅被驱出中国本部,徐世昌总统辞职和黎元洪复总统职。越飞是紧接着热那亚和海牙会议给予苏俄以回击而来到北京的。在对欧洲各国和美国呼吁无效后,苏俄准备以复苏的活力在亚洲继续674进行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画俄国人不成反类鞑靼人"这句老话,由越飞和他的追随者们体现了出来,他们说,俄国人实际上是亚洲人,由于沿着彼得大帝于十八世纪初错误地规定下来的西方路线走得过头了,现在正重新回到他们祖先的亚洲政策。越飞在北京开展了一个新闻报道和演说运动,这在学生们和许多教师当中造成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下述的话给了苏俄专使和学生们以鼓励,他说,"自从欧洲的思想传入中国以来,一个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变化过程就已在这个国家中发展起来。中国革命是一个政治革命。它现时正趋向于社会革命。俄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人认为学习俄国革命的教训是适宜的,因为这个革命也是以一个政治运动开始,而后才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的。"

向中国知识界的呼吁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论社会革命

在进行了三个多星期的宣传运动以后,越飞于1922年9月2日向中国外交部致送了一份照会,建议根据1919和1920年加拉罕的提议进行谈判。由于中国人对蒙古问题深感愤怒,谈判没有能取得进展,因而越飞就到长春去参加远东共和国同日本的谈判。10月3日,他回到北京,因为长春会议破裂了,而他自己在出席会议时也生了重病。在此后的两个半月中,越飞和中国外交部之间有一系列的争论不休的照会来往。这些照会,除了表明俄国在1919和1920年所作的诺言并不具有它们在表面上的意义之外,并没有什么成就。11月5日,这位专使写道,

在北京和长春的谈判

“特别是,举例来说,即使俄国把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交给中国人民,这也不会取消俄国在这条铁路上的利益,因为它是西伯利亚大铁道的一部分,并且是联络俄国的一部分领土和另一部分领土的。”

越飞和孙中山

尽管越飞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位成功的宣传家,他却不能把他对北京政府的计划付诸实行。1923年1月中旬,他从北京溜到上海。孙中山自从上年夏季在广州被他过去的朋友陈炯明将军推翻以后,一直避居在这里的法租界内。这时越飞访谒了孙博士,几次的会晤颇有助于把他拉进布尔什维克阵营。1月26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出二人之间存在有“最恳挚和友好的”关系。从这时起,孙博士及其一部分追随者就越来越向左边倒了。

675

越飞和后藤

在香港政府以不能允许他在那个岛上养病的意思通知越飞之后,这位苏俄专使就决定接受东京市长后藤新平子爵的邀请,试图在日本休养,以便恢复健康。这位日本政治家是一位日俄修好政策的坦率主张者;5月初,越飞同他进入非正式的谈判。关于库页岛北部,俄国曾于1876年建议由日本以美金一百万元收回,现在日本出价一亿五千万日元。越飞要求这个数目的十倍;他不能同意对庙街事件道歉,也不能承认以前对日条约的效力和沙皇的债务。因此,东京谈判并不比北京和长春的谈判更为成功,于是越飞退出了远东外交舞台。

6. 苏俄和中国——加拉罕先生

中国要求收回辽东半岛(1923年3月)

当越飞访问东京的时候,而一部分也是为了抵消他访问东京的作用,北京内阁于1923年3月10日向日本提出了一项照会,要求废除1915年的中日条约,并归还辽东半岛。如果不是

有了这些条约的话，辽东半岛的租借应于3月27日期满。中国的要求遭到断然的拒绝，于是学生运动重新活跃起来，群众大会、激昂的演说和报纸上的议论一时并作，3月和5月抵制日货和示威游行又复出现。

驻北京大使加拉罕

676

名义上隶属黎元洪总统的政府而握有真正权力的吴佩孚将军，主张解决俄国问题。莫斯科现在决定派遣一位大使到中国。所有驻北京的其他使节都是公使。列夫·加拉罕先生膺选担任了这个大使职位，他曾经以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的身分起草过1919和1920年的那些诱人的诺言。

临城事件

在这位大使于1923年9月到达以前，曾经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件，其中包括北京政府的又一次万花筒式的变化。5月6日早晨，一股土匪在山东临城县附近毁坏了一列特别快车，枪杀了一名英国人，架走二十六名外侨和一百多名中国人来勒索赎金。外国妇女很快地就被释放，但是有一些男子被拘禁在山顶上，直到6月12日才放出。外交团于8月10日向中国外交部致送了一份照会，要求从优赔偿损失，成立一支由外国人监督的中国特警队和惩办负责的官员，包括山东督军在内。中国政府虽然否认有赔偿损失的义务，却终于偿付了为数达美金三十万元的赔款，但是拒绝由外国会同警卫中国的铁路。几个次要的官吏被撤职，而且"已责成内政部和陆军部考虑对山东督军的处分"。次年10月，这位督军被擢升到元帅的级位。

冯玉祥的野心

在1923年春季，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显然正酝酿着一场新战争。由于在临城事件谈判期间，怕外国人出面干涉，这个战争才推迟下来。但是战争虽然推迟了，推翻黎元洪总统和捧曹锟上台的阴谋却进展得很快。从4月起，总统和冯玉祥之间为了崇文门税收问题发生争执。总统在财政上是仰赖这些关税的，

但是冯玉祥却想要夺过来,作为驻扎在京城南面几哩的他那支模范军的军费。6 月 6 日,国务总理被迫避居天津,内阁辞职;总统本人于一星期后也逃往那里。通过对仍然留在北京的议员们的空前未有的大贿赂,曹锟终于在 10 月 5 日被"选"为总统。

国务总理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的逃亡,曹锟"选"为总统

9 月 2 日加拉罕抵达北京。前参议院副议长、曾出席巴黎和会的王正廷,从山东被召回到北京,来同加拉罕举行谈判,王正廷曾经在山东办理接收日本人交还旧德国产业的事宜。俄国大使继续进行由越飞先生开始的诋毁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运动。他迅即利用临城事件来遂其私图。当王正廷赞扬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暗示俄国大可以遵循一个相似的政策时,加拉罕答称:"俄国永远不会效法美国的例子,也永远不会在最近的临城事件的照会这类文件上签字。俄国决不会要求领事裁判权,也决不会在中国领土上设置法庭或行政机构。最使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在哈尔滨逗留时所看到的那个事实,即在那里有中国的行政机构、中国的法律,以及中国主权的行使。"①

677

加拉罕和王正廷之间的谈判

布尔什维克式的对欧美的诋毁

加拉罕宣称,在能够进行正式谈判以前,中国有给予俄国新政府以承认的必要。这是北京所不准备给予的。于是就又开始了一系列的争论不休的照会,同去年 1 月间越飞离开北京之前的那些照会并无不同。正就是苏俄在 1919 和 1920 年所承诺的一些事情再次引起了争论。中国仍然要求俄国从蒙古撤兵,而俄国则继续抱怨白俄在满洲的活动。苏俄大使的地位,由于英国和意大利政府给予他的政府以承认而增强了。中国没有先前

俄国要求中国正式予以承认

① 在大使的观察锐敏的眼睛里看来是那样可爱的哈尔滨的情况,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俄国人说来却一点不可爱。这个城市里的俄国报纸大为抱怨中俄两国人民"在交往中的野蛮行为"。一篇描写这些情况的文章说:"只要到哈尔滨街头去蹓跶一下,就足能看到中国当局如何想使那些委由他们照管的三十万俄国人的生活尽可能的不愉快和不方便。"参阅《中国年鉴》,1924 年,第 866 页。

那么举棋不定了,终于在1924年3月14日由加拉罕和王正廷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王正廷仅仅是受委托进行谈判,在协议上签字是越权行为,因而不承认这项协议,加678 拉罕于是发出一项最后通牒,限中国在三天内重新考虑并批准这个协议。顾维钧总长冷淡地拒绝"承认俄使有任何权利可以强加中国政府以时限"。

1924年5月31日的中俄协定

在达成一个协议以前,不是三天,而是两个半月过去了。最后,在5月31日,一项中俄协定签字。按照这个协定,俄国废除了对侨民的领事裁判权,也放弃了汉口和天津的租界。俄国公使馆以及在全国各地的领事官均予恢复,所有属于俄国正教教堂的财产,"即按照中国内地置产现行法律及章程"移交给俄国政府。俄国放弃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这笔款项将由一个三人委员会加以管理,以"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委员会由中国委派二人,俄国委派一人。两国政府彼此同意"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政府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得到特别的承认,至于俄国从外蒙撤兵事宜,将由一个委员会作出安排。

中国向国际平等地位前进

中东铁路

尽管俄国人在1919和1920年有所承诺,他们只有在一点上是不会让步的,即令是表面上的让步。自从1896年创设时起到现在(1931年)为止,中东铁路已经成了列强争斗的根源。从1919年2月中旬到1922年10月底,这条铁路处于协约国国际专门技术部的监督之下,其总办事处设在哈尔滨。这个技术部对于这条铁路花了约计美金一千万元,其中日本以货物垫付了约五百万元,美国以现金垫付了类似的一个数目;这一千万元中约有半数可以用进行干涉的年代里因运输捷克斯洛伐克和协约国军队而应由铁路方面收进的费用作抵。1920年10月2日,

中国政府同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一项协定。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后，在彼得格勒的这家银行已被没收，几位董事已经被捕。由于过半数的股票持有者是法国人，这个银行就在巴黎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在1920年这个银行宣称它是中东铁路的唯一股东。按照10月2日的协定，中国政府接收了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一个由十名董事组成的新的董事会设立起来了，其中五名董事是白俄，五名是中国人，由中国人担任督办，俄国人担任会办。那个专门技术部继续行使职权。华盛顿会议时期的局势，阻止了任何问题的解决，列强的代表们则以依据国务卿休斯所拟订的托管俄国利益的理论而通过的两项决议聊以自慰。第一项决议宣称，"为有利益者保存中东铁路，应予该铁路及服役于操作使用铁路者更加良好之保护。"第二项决议坚持要求"中国对于中东铁路股东、公司债券所有者及债权者等之各国人是否履行义务，担负责任"①。

679 华俄道胜银行改组

华盛顿会议与中东铁路的决议

日本军队于1922年秋季从西伯利亚撤退以后，哈尔滨的专门技术部停止了工作。这时恰巧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致送了一份照会，表示承认上述决议，并申述它"对于铁路的有效操作和维护作为一条对所有国家的公民开放而没有优惠或歧视的通商自由大道"感到兴趣。在1924年春季，中国和俄国可以达成协议已越来越明显时，法国和美国就中东铁路问题开始同北京交换函件。法国向北京说明华俄道胜银行的地位已有变动——中国则拒绝承认这种变动。美国似乎只对缔结关于这条铁路的任何有损外国利益的协定向中国提出了警告。

法国和美国在中东铁路方面的利益

这就是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在1924年5月31日签字时的情况。前项协定的第九条首先声明

① 录自《华盛顿会议关于中东铁路之议决案》。——译者

关于中东铁路的加拉罕-顾维钧协定 680

这条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承认了"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及以"中国资本"赎回该路的权利,这就排除了以外债购买的可能性。正如五年以后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下述规定: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以及承认1896年关于铁路修建和经营合同的暂行有效。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设立了一个华、俄各五人的董事会和一个华籍监事二人、俄籍监事三人的监事会。

继之而起的抗议

协定的签字刚刚公布,就有人开始准备提出抗议。6月2日,华俄道胜银行通过它的代表,为在谈判中遭到忽视的这条铁路的债券所有人和股东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四天以后,日本分别向中国外交部和加拉罕大使递交照会,据说就日本的"既得"权利和利益提出保留,其中包括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直达通车的权利,并要求付给一千万日元的材料费,这些材料据说已经供应给中东铁路的管理机构。中国外交部给予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答复的大意是,要言不烦地拒绝承认中东铁路方面的非中国和非俄国的利益为有效。

张作霖的固执

虽然中国在中东铁路方面的政治优越地位已经被加拉罕所承认,俄国对于那条铁路的经济控制却由于条约规定设置一个俄籍局长而在实质上增强了。关于这条铁路,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障碍:满洲的独立统治者张作霖拒绝承认这些协定,而铁路却正是在他的辖区内经过的。

张作霖和吴佩孚在1924年的地位

苏俄大使侥幸的是,开始于1922年而于次年延搁下来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战争,在1924年夏季又有重新爆发之势。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由于浙江督军卢永祥(唯一逃过了1920年难关的安福系高级军官)和吴佩孚的同盟者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的一番争执而战幕再启。战争的原因是齐燮元要想得

到上海的控制权，而上海却是在浙江军阀卢永祥控制之下的。这个大港口的兵工厂和违法的鸦片收入使它成为一个众所艳羡的逐鹿目标。

681
在华东的齐卢之战

事态很快地变得明显起来，张吴这两位太上督军将出面帮助他们各自的同盟者了。这意味着1922年开始的直奉战争的继续和利害关系的北移。吴佩孚于9月17日抵达北京。在同总统、冯玉祥将军和其他领袖会谈后，发出了对张作霖的宣战书。以后的战事突然被冯将军的倒戈所终止，这位将军于10月23日早晨夺取了京城并宣称他本人主张和平。他指控总统进行贿赂，把他幽禁在他的府内，并且下令逮捕选举总统时接受贿赂的议员们。外交总长顾维钧先生逃出京城，王正廷先生成了代理外交总长和冯将军的首席顾问。在不拘死活被悬赏缉拿的情况下，吴佩孚带同数千士兵乘船至扬子江，转往南京，随后抵达武昌。

张吴之间战幕再启

这时行政职务由一个摄政内阁执行了三星期，这个摄政内阁以结束了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的小朝廷而表明了它的权力。11月5日，国民军的官兵在皇宫内出现，要求清帝放弃他的称号。同一天要求他在下午三点钟以前同意一个经过修改的皇室优待条款。他拒绝了，并且退回到他父亲醇亲王的府邸。几个星期后，他逃到日本公使馆，从那里又逃到天津避难。给予"亨利·溥仪先生"(这个退位皇帝现在就被这样地称呼)的这种待遇，在京城内外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英国、日本和荷兰的公使要求外交部保证这个年轻人的安全。

皇帝被驱逐

他逃往天津

在推翻吴佩孚和逼走满清皇帝以后，冯玉祥到天津去同张作霖和那个年老的安福系领袖段祺瑞元帅进行会谈。经过这三位领袖会商了五天以后，段帅同意去北京出任临时执政。他是

682
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

在11月24日就职的。

加拉罕同张作霖的谈判

1924年的直奉战争增强了加拉罕大使的地位，这位大使希望同张作霖元帅就中东铁路问题商定一个办法。直奉战争一开始，俄国以中国的保护者自居而向列强宣布了一个"不要插手中国！"的政策，同时暗中在张作霖元帅后方的满洲北部边界上集结它的军队。张作霖同意对所希冀的协定进行谈判，因而这个文件于9月20日在奉天签字。

中东铁路各协定的不同之点

一般说来，这个新协定与同年5月间在北京签订的协定颇相类似。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点。1896年的条约规定了八十年的期限，过期则将这条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现在这个期限缩短到六十年。北京协定对于修订1896年的协定并无特别规定，而奉天协定却规定在新约签订以后四个月内从事修订。现在中东铁路规章修订的时限缩短了两个月。在铁路的管理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动。通过奉天协定，俄国已经采取了另一步骤在它南进中分离中国的属地。这样，事情变得很清楚，苏俄的对华政策虽然推广到包括利用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基地在内，却在其他方面同帝俄的政策相似，而且尽管时过境迁，尽管沙皇政权已成过去，获得友谊的代价并未减低。

中俄会议的延期

1924年5月31日的中俄协定第二条规定，在签订协定一个月内召开一个会议，商订解决两国间一切悬案的详细办法，予以施行。加拉罕大使把开会的日期延搁到1925年8月26日晚间，并且由于他次日即将动身去莫斯科，开会不过徒具形式而已。会议直到1925年12月方开始工作。同时，关于中东铁路，在北满已经有了值得注意的发展。

683

中俄间的摩擦

1925年5月，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凡诺夫辞退了一大批铁路上雇用的白俄。这是不顾张作霖元帅和中国方面的董事长

的反对而作出的。同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旨在洽商满洲到西伯利亚铁路直达通车事宜的中俄日三边会议,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在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关于铁路政策方面有着越来越显著的意见分歧。其军队在1920年3月接替俄国人担任铁路警卫队的张作霖元帅,要求将这些军队和他的其余的军队由铁路免费运送,或者记在北京政府的帐上。当这笔运输费用的总数达到了一千一百万银元的时候,伊凡诺夫发出命令,着从1925年12月1日起禁止这种运输。中俄两国联合管理这条铁路的原则没有能起作用,因为俄国方面的董事在董事会开会时避不出席,因而使俄籍局长控制了铁路。1926年1月中旬,哈尔滨发生骚动,其原因是铁路局长拒绝允许运送中国军队。1月22日,伊凡诺夫被张作霖的军事人员逮捕。加拉罕大使立即对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并在第二天递送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在三天之内完全恢复中东铁路的秩序,履行协定,并释放伊凡诺夫"。与此同时,也在奉天递送了一份抗议书。不久,伊凡诺夫被张作霖释放,但是中国人把他解职,并且另外派了一位俄国人接替。俄国大使对这次局势的处理使许多中国人认为在沙俄政策和苏俄政策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而1926年正是中国方面对苏俄的怀疑和非难日益滋长的一年。

伊凡诺夫案和俄国的最后通牒

684

7. 苏俄和日本——加拉罕先生

到了1924年,这位苏俄大使在大陆外交方面虽已获得这样的成就,而对日本的统治者,则尚待一试其技。日本帝国方面抱有同俄国解决争端的愿望,因为争端一旦解决,或可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开拓失败以后,为在东北亚洲的经济性质的和平渗透打开道路。没有这种渗透,日本的工业化就不能继续进行。由于

俄日两国互愿建立友好关系

俄国同北京、特别是同奉天交涉成功,它感到最好不要把日本撇开不管。不应允许张作霖同俄国人纠缠而使日本蒙受损失。何况还另有两个同俄日敦睦邦交有关的因素,一是在华盛顿会议上英日联盟的结束,一是美国国会在解决那令人恼怒的日本向美国移民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无情办法。

加利福尼亚的反日立法

1907年君子协定虽然在大体上很有成效,但不幸并没有消除太平洋沿岸的反日运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构内,反日性质的法案一个接着一个地提了出来。1913年,不顾威尔逊政府的警告,一项外国人土地法被通过。根据这项法律,凡是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的外国人一概禁止在加利福尼亚州持有土地,租赁则以三年为限。1920年3月1日,东京政府停止日本妇女——"照片新娘"——向美国移殖,同那里的日本侨民结婚。12月,日本人丧失了迄今为他们所享有的租赁土地权,以及作为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的子女的监护权(这些子女以美国公民的身分可以持有土地)和在美国人控制的地产公司的股票持有权。在1923和1924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两州的某些反日法律是合乎宪法的。在小泽对美国一案中,最高法院于1922年11月裁定日本人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1924年5月,有了限额移民法案,其中包含一个条款,即拒绝给予任何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的人以进入美国国土的权利,并且规定废止1908年的君子协定。这项规定是不顾政府行政部门的反对而列入的。这就意味着明确地把日本人同朝鲜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人一起包括在为美国某些分子看作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之内。这对日本人的自尊心是一个致命的侮辱,因为他们从1873年以来,在同其他东方人和欧洲人交往时,一直顽强地为自己要求一个较其他亚洲人为优越的地位。

685

限额移民法案

当1923年9月1日的大地震毁坏横滨以及包括东京在内的其他许多城镇的部分地区时,美国人民给予日本的同情和物质援助①是空前未有的。日本全国觉得美国国会在后来不到八个月的工夫所采取的行动颇不可解——美国人似乎奉行着一种不让右手知道左手做些什么事的政策。他们一只手给与,而以另一只手打人。

1923年美国人对地震受害者的援助

美国国会所采取的行动的消息一传到日本,接着就有帝国国会两院的抗议,东京美国大使馆门前的一件自杀案,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以及自1910年以来一直被搁置的外国人土地法在1925年3月间的公布。据这项法律规定,凡是不允许日本人在其境内持有土地的国家,其国民也不准在日本领土上持有土地②。

日本对限额移民法案的抗议

日本人之所以注意倾听加拉罕先生的话,就中俄关系的变化情形来看,大部分是由于日本人未能在巴黎和会上使他们的种族平等条款获得通过,以及对1924年的美国移民法取得补救。7月间,加藤子爵的内阁宣布愿意同加拉罕进行谈判。8月7日,谈判在北京开始。1925年1月20日,日本公使芳泽在北京签订了日俄之间的一项协定。

日本转向俄国

686

缔约双方建立了外交和领事的关系。俄国同意朴次茅斯条约应继续生效,这个条约是日本在满洲的地位的根据。在1917年以前两国之间签订的其他条约、协约和协定,俟日后举行会议,予以重新审查。1907年的渔场协约将予修订③。在未修订

1925年1月俄日协定

① 自9月1日迄9月15日,美国人民捐助给日本地震受难者的金钱和供应品价值达七百万美元之数。

② 排日法案的理由之一是对日本双重国籍的指责。为了对付这种指责,在东京通过了一个新的国籍法,根据这项法律,双重国籍的规定经予取消。

③ 1928年1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新的协约。按照这个协约,日本差不多分配到远东俄国海面上的渔场的百分之六十四。

以前,日本人可以继续在西伯利亚海面上捕鱼。关于商业和航行的条约将于短期内缔结。在这个条约缔结以前,两国国民得各自"根据国内法,(1)具有进入、游历和居留在另一国家的领土上的完全自由,以及(2)对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享有经常和完全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从事商业、航行、工业和其他和平职业的自由",保证"根据国内法",给予各该缔约国国民。由于"日本对于天然资源的需要",俄国宣布愿意"给予日本国民、公司和会社以在所有俄国领土上开采矿藏、森林和其他天然资源的让与权"。

相互防止宣传

专制的日本帝国久已表示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的恐惧。在条约第五款内载有防止关于世界革命、俄国人对莫斯科的白色反动行动以及朝鲜对日本叛变等宣传危险的规定。苏俄政府在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中限制第三国际的活动,这还是第一次。

687

与条约同日签订的还有议定书甲和议定书乙。按照前者,

议定书甲

(1)两国政府对各自在对方境内设置大使馆和领事馆事宜作了安排;(2)前俄国历届政府所欠日本债务的问题将留待日后解

日本从北库页岛撤退

决,惟只能依照最惠国协定办理,以保护日本的利益;(3)日本同意自5月15日起把它的军队从北库页岛撤退,俄国将在那里恢复完全的主权;(4)缔约双方声明绝无"对另一方的主权、领土权利或国家安全"构成"侵犯或威胁"的任何协定的存在。

议定书乙

按照议定书乙,日本获得了协定中所规定的第一个让与权。北库页岛的煤和石油的储藏,具有非常大的价值,正如日本、俄国和美国的受让人所已发现的那样。1921年5月14日,远东

辛克莱公司在库页岛上的让与权

共和国政府在莫斯科怂恿下(莫斯科现正设法谋求美国的承认并希望把美国拉进来作为在东方对日本的一个平衡力量)同美

国受让人辛克莱开拓公司签订了一个草约,以便开发那个区域里的石油资源。这个草约是在日本占领北库页岛差不多十个月后签订的。1922年1月7日又签订了一个补充合同。这两个合同都在1923年1月23日为莫斯科政府批准。辛克莱公司派遣到北库页岛去从事开发的工程师为日本军事当局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但是有关政府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纠纷。后来由于美国未能给莫斯科以承认,莫斯科的一个法院取消了这项让与权。

日本获得煤和石油的让与权

688

议定书乙规定"日本政府所推荐的日本公司"将有权在"1924年8月29日由日本代表提交苏联代表的备忘录中所述及的每一处油田的一半地区上进行开发",日本的公司对于苏联今后决定邀请外国开发的"上述备忘录所提及的油田中其余未出租地区这类让与权,应享有均等的机会"。在库页岛的东海岸,日本人得于"五至十年"内在某些地区勘探石油,在"这样勘定的油田中,以面积计,应划百分之五十的地区"给予这些公司。除去石油让与之外,日本人并得在西海岸的某些地区以及和在杜埃地方开采煤矿。所让与的石油和煤矿的开采期间,订明为"四十到五十年"。对于煤和石油的让与,应向俄国缴纳矿税。由于日本已经同意从库页岛撤兵,加拉罕于是在一份附加的照会里,"对1920年的庙街事件"向日本"表示真诚的遗憾"。在1925年12月14日石油和煤矿合同签字,次年日本又获得滨海省的伐木让与权。

俄国和日本的目标互不相容

考虑到1918到1922那些年份里日本军事当局的努力,以及所花的费用,日本在同加拉罕的谈判中似乎所获甚微。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一世代有余。一方的目的是坚定不移地向黄海推进以便求得一个温水海口,以及在亚洲大陆的

北部和东部地区保持并扩展一个根据地。这曾经遭到日本方面的坚决抵制,务使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达成。在1895、1905和1925年,这个斗争先后达到了高潮。在第一次高潮中,日本受到挫折。在第二次,俄国遭到挫败。在第三次,双方都分得了好处,但是俄国分得的还要更多些。俄国在二十世纪前二十五年的末期的地位,比前一世纪的最后十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强大。的确,加拉罕先生曾经在行动上表现了大丈夫的气概;他一直是既坚强而又成功的。

第二十九章　华盛顿会议

689

1. 限制军备和日本在东方的地位

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远没有能够解决加之于它们的远东方面的国际关系问题。日本对山东所要求的一切都已经断给它了。但是，随着这次的胜利，它却遭到终致产生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国人民更深的恶感，以及美国人民对日本在中国的动机和目的益加怀疑。在1920年1月巴黎和会结束以前，中、日两国在东方对山东问题再度发生争执，为求保障和列强有关的中国财政利益而组织新银行团的企图，则又酿成新的争端。

凡尔赛条约后的中日关系

1918年7月，曾经将美国撤出1913年第一次银行团的华盛顿的威尔逊政府，对于旨在供给中国以贷款的一个新银行团已经采取了初步措施。这第二次银行团是以"加强中国并使其能积极参加对中欧国家作战"为宗旨的。日本人从巴黎奏凯而归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就要求"在日本有特殊利益的满蒙地区"，将列强的权利和选择权"排除于所议合同规定的共同贷款办法以外"了。对于这项保留，英美两国均不同意。经过多次公文往还之后，经商定不将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和有关矿山，以及北满的若干铁路[1]包括在合同范围之内，日本方于1920年5月11日参加了这个新银行团。同年10月四国银行团正式成立。其中包括美、英、法、日四国的银行团体。它是"为供给中国政府以复

新银行团

690

---

① 即自吉林至会宁、自郑家屯至洮南、自开源至吉林、自吉林至长春，以及自四平街至郑家屯。

兴经济和改良交通计划所需资金而组织的”。为遣散各省督军的军队和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政府，得优先举债，债款的用途则须以严格的监督和稽核办法予以保障。主要由于中国民众的反对，尤其是愤于他们本身被排斥在外的银行家们的反对，以及外国财政监督的危险，银行团不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所开的条件既杜绝了一切非建设性的贷款，而内战和党争又使建设工作成为不可能。唯一显著的良好结果，就是防止再给那些腐败的、摇摇欲坠的政府以更多的贷款而已。

它的失败

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1月生效。24日，东京政府依照它的代表在巴黎所作的诺言，试图和北京政府进行关于交还山东问题的谈判。这时，以及后来在1921年9月，中国拒绝允从日本的建议。但是，它遇有机会就呼吁世界各国同情它为解决巴黎和会所未能解决的争端而进行的斗争。除去山东问题和限制军备问题而外，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也还是有一些充分的理由的。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美国对于已经在1911年续约十年，而不久即将失效或另须续约的英日同盟的关切。美国虽非同盟的缔约方，可是对续约问题的关切并非无因。不独显而易见，在同盟继续存在期间就日本在大陆上执行侵略政策而言，英国的行动受到束缚，而且似乎英国自己也背弃了门户开放政策，例如，由一批在孙中山第一次被推翻后上台的广州军阀在1920年所签订、而为孙博士于1922年重新当权后声明作废的卡赛尔煤矿合同，就曾经将广东省的煤业独占权给了一家英国辛迪加，以换取一笔一百万美元的借款。

1920年山东问题的交涉

举行华盛顿会议的理由

1911年英日同盟对远东的影响

691

在日本皇太子裕仁访英之后不久，自1921年6月21日至8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那次联合王国、各自治领和印度的总理及代表会议，曾经对英日同盟续约问题进行讨论。因为7月10

1921年的“帝国会议”

日得悉美国总统拟发出召开华盛顿会议的请柬，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定。

东京方面对华盛顿会议的踌躇

所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欣然应邀，唯有日本是例外。在 7 月 27 日复照哈定总统 7 月 27 日的预备邀请时，它建议应"加意回避单独关系某几个特定国家"的问题，或"可视为既定事实的事物"，而不列进议事日程。在这些保留条件之下，它才接受了派遣代表赴华盛顿的邀请。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国家

华盛顿会议的会期是从 1921 年 11 月 12 日到 1922 年 2 月 6 日。英、法、意、日、中国、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和美国都有代表出席。会议成立了两个全体委员会。一个是由五个主要国家的代表组成的，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另一个是由所有与会国代表组成的，处理一切有关太平洋和远东的问题。会议的真正工作是由这两个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中完成，而报告于公开的全体大会(七次)；全体大会只听取正式报告，批准委员会的决议，而不进行辩论。会议本身批准并通过了七项条约和十二项议决案。另有两项条约是会议期间与会国在会外商订的。

692

休斯国务卿的建议

在 11 月 12 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美国国务卿休斯建议："(1) 放弃一切现有和制定的主力舰造舰方案；(2) 废置一定数量的旧船以作进一步的裁军；(3) 一般地照顾到有关各国的现有海军实力；(4) 以主力舰的吨位作为计算海军力量的尺度和按比例容许配备辅助舰的标准"。休斯国务卿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并不要求日本和英国采取他自己的国家所不愿采取的步骤。为求避免竞争，他有意识地、自愿地牺牲他本国的世界海军领导地位。

日本的反对

日本代表对休斯国务卿所概述的方案，接连提出反对达一个多月之久。其所以反对，一部分是由于海军人员

不愿削弱其和陆军相比之下所占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于日本和大陆（中国及西伯利亚）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由于英日同盟续盟与否的问题。

四国太平洋条约

在英日同盟续盟问题和限制军备问题取得协议之前，各国对于各自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所处的地位达成一项谅解是有必要的。这种谅解已经在12月13日由四国太平洋条约达成了，根据该约，英、法、日、美四国同意尊重彼此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四国之间如有争端发生，均交由一专门会议解决，至于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间如发生任何纠纷，则共同商讨并会同决定最妥善的解决办法。经同意，一俟条约批准，英日同盟即行废止。条约有效期十年，期满后于十二个月之内预先通知，得予以废除。其结果是使其他三个国家难以过问远东事务，从而加强了日本的地位。为谋求各国合作以促成军备限制和英日同盟的废除，美国693 政府此后大部分要靠道义上的压力去限制太平洋和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帝国主义了。

四国太平洋条约的谈判成功，使五国海军条约有于1922年2月6日签订的可能。这项条约大体依照休斯国务卿的建议，规定了海军军备的限制，并对太平洋某些地区的防御工事，规定了维持现状的办法。经过多次辩论之后而为英、美、日、法、意分别议定的比率是5—5—3—1.75—1.75。这个比率一直持续到1931年为止①。

五国海军条约

在会议开幕时，美国政府在太平洋上没有一处能容纳一支大舰队的海军基地或加煤站。可供作这种用途的地点很多，但都没有适当的防御工事。如果没有这样的基地，又缺少一支至少一倍于日本海军的舰队，美国海军对日本发动进攻将是绝对

太平洋防御工事方面的限制

① 参阅本书第733页。

不可能的。在同意废止英日同盟和限制其海军时，日本要求对美、英两国在太平洋上的防御工事加以严格限制，虽然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作了若干让步。海军条约第十九条规定：除夏威夷群岛、美国沿海各岛、巴拿马运河区和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不包括在内”——以外，一切防御工事和海军基地的现状应予维持。英国对于“香港和英帝国在太平洋中东经一百一十度子午线以东现所领有和今后可能取得的岛屿，同意照办，唯以(1)加拿大沿岸附近，(2)澳大利亚联邦及其领地，和(3)新西兰为例外”。日本同意将这项规定适用于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岛上的防御工事刚刚竣工)、琉球群岛、澎湖列岛、奄美大岛、台湾“以及日本今后在太平洋中可能取得的一切岛屿”。

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已经由四国太平洋条约予以保障，如果这种保障是有必要的话。海军条约中关于菲律宾防御工事须保持现状的协议，无关紧要。显具重要性的是将阿留申群岛列入禁止设防的地区以内，而将新加坡排除在外。后者是远东潜在的直布罗陀海峡，而且从那里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日本发动进攻。

条约的重要意义 694

2. 华盛顿会议中的中国

在华盛顿会议上重要性仅次于军备问题的，就是中国问题。中国国内状况的混乱和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构成中国代表的软弱和列强莫知所措的根源。在广州的一个同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要求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国的许多公共机关已无工作效能可言，北京政府已被迫延付若干到期的外债。虽然如此，中国代表还是抱着想尽办法以谋求取消他们国家主权上所受的限制的决心，前往华盛顿。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中、美两国有

中国的软弱

力的舆论支持。

在11月16日太平洋和远东问题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博士提出了十大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是过于广泛、过于不着边际而无法详细讨论。11月21日，美国代表团的伊莱休·鲁特先生向委员会提出了后来称作鲁特原则的议案。其中将十大原则所要求的大部分包括在内。这些原则得到了委员会全体一致的赞同，并经该委员会和12月10日华盛顿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先后通过，最后列入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第一条中。鲁特声明如下：

鲁特原则

与会各国的坚定宗旨是……

(1) 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695

(2) 给予中国最充分的不受阻碍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个有效力的和稳固的政府。

(3) 运用各国的影响，以期切实建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的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 不得利用中国现状，乘机谋取特别权利或特惠而减少友邦人民的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的举动。

在委员会通过鲁特原则的两天之前，对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发生了问题。顾维钧先生声明说，这个名称在他本国宪法中早已下了定义，在“中国本土”和边区之间不能作任何区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不容置疑，只不过要再行加以肯定而已”。日本代表团的海军大将加藤宽治男爵承认满洲构成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意义

11月23日，在委员会接受鲁特原则的两天之后，顾维钧概述了中国税则的历史。他说，尽管为给中国政府以切实值百抽

中国要求关税自主

五的税率而有 1902 和 1918 年的税则修改，但当时一般的税率却是值百抽三点五。他希望以"制定税率和采取差别税率"之权交还中国政府，并自 1922 年 1 月 1 日起将税率提高到值百抽十二点五。各国对于这些要求，或设辞规避，或以折衷方案予以应付。这些要求经提交中国财政问题小组委员会，该小组委员会一直讨论到 1 月 5 日向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时为止，报告的内容经列入与会各国在 1922 年 2 月 6 日签订的关税税则条约中作为附件。依照这项条约，经议定应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会议，俾设法使关税的征收得适合切实值百抽五之数。拟定于三个月内在中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便依照中、英、美、日之间在 1902 和 1903 年所订各约规定的条件，为从速废除厘金并提高今后应征的税率铺平道路。在过渡期间，对一般货品得征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对奢侈品得征百分之五的附加税。这就使中国在废除厘金以前对一般货品得征百分之七点五、对奢侈品得征百分之十了。

九国关税税则条约

696

这项条约的第六条载有对中国的一项让步，即承认"中国海陆各边界划一征收关税的原则"。在 1881 年的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中，曾给予陆路通商以减税待遇，以消除这类贸易上因缺乏铁路致加重开支而产生的障碍。凡英、法、日的陆上边界与中国毗连的地方，各该国也曾获得了同样的待遇。

划一关税税则

远比关税税则问题为公众更加关心且酿成更多纠纷的，是山东问题。起初简直看不出双方互相抵触的要求如何可以得到调整，因为华盛顿会议的九个与会国之中有六个是凡尔赛条约的签字国，所以会议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正式加以讨论。为部分地消除中国方面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起见，英国代表团团长阿瑟·白尔福和会议主席休斯国务卿请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中日

山东问题和华盛顿会议

两国代表所举行的一切会议来进行斡旋。11月30日，施肇基在委员会中宣读了一项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决定接受休斯和白尔福两先生的斡旋，但保留于斡旋失败时使用其他解决办法的权利。

中日山东问题谈判

会谈于12月1日开始，断续地举行了差不多十个星期。会谈是以非正式的形式用英语进行的。白尔福先生和休斯国务卿，或他们的代表，出席了所有会议。因为日本先已允许将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移交的详细办法则交由一俟所议条约生效即行召开的中日联合委员会商订；移交应于条约实施后六个月之内办理完竣。日本应允将一切有关前德国租借地的重要档案交付中国，并同意不要求在青岛设立日本租界或公共租界。

697

铁路和公产问题

两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胶济路的管理和青岛公产的处置。由于中、日双方对德国在山东产权移交的权利问题各执一词，并由于赔款委员会为支付日本的要求已将该路折作五千多万金马克(三千二百万银元)列入德国的贷方项下，以及中国曾于1918年的中日密约中承允以该路交由一个中日合办公司经办这两件事实，胶济路问题颇为复杂化。但是，1918年条约并没有经过中国国会的批准，而且中国自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以来也没有承认过允以该路让与日本。日本在华盛顿辩称，1918年的条约必须执行，铁路必须由中日合办。结果日本让步，同意将该路售与中国，但拒绝接受现款的支付，而坚持须由中国向日本银行洽借一笔长期贷款，而以该路的产业和进款作抵，并须委派一名日本车务长。这无异是说由日方管理铁路，对于这项办法，中国拒绝同意。日本终于承允将该路交还，而由中国以三千二百万银元的中国国库券支付日方，该项国库券应于五至十五

年偿清，并以铁路产业及其进款作为抵押。于偿付这项国库券时，中国只能从中国方面的来源筹措款项。在库券未偿清以前，将由一日本人担任车务长，并另由一日本人会同担任会计长，统由中国局长指挥监督，并于有相当理由时，得予撤换。

关于公产和既得权利问题的解决，却不象铁路问题那样旷日费时。经过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日本承允放弃以前德国在山东所有的、或于日本占领期间购置或修建的一切公共工程，惟日本领事馆、公立学校、寺院和墓地之类的财产不在此限，仍交由青岛日本居留民团体执管。中国承允尊重"旧租借地内之既得权……经合法公道取得者"①。日本这样就保留住他们在青岛的商业利益，惟作为中国专卖品的食盐的制造是例外，虽然盐的生产过去一直是日本人经营的。日本人的盐业利益得由中国方面购回，不过应允以山东盐贩往日本。过去有德国股本的矿山，准由中日合办公司经营。青岛的海底电线均归由中国所有，只有青岛和日本海军基地佐世保之间的海底电线不在此例，仍由日本保留。旧租借地将在中国的管理之下开放，准外国人自由居住。日本在青岛和济南的无线电台一并移交中国，由中国给以相当的偿价。1915 年 8 月 6 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合同②作废，经议定，青岛的日本商人得用日本文字与青岛海关接洽事务，并训令海关总税务司"于选用青岛海关适宜职员时，酌加考虑，俾于该海关任用规则范围内，兼顾青岛商务各种之需要"③。

698

日本放弃公产但取得广泛的商业权益

中、日两国代表团会谈的结果，计三十六项，于 2 月 1 日报

① 录自《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 24 条原文。——译者

② 参阅本书第 551 页。

③ 录自前引条约附约第 3 条原文。——译者

山东问题的最后解决

告休斯国务卿和白尔福先生，当由前者于同日报告于华盛顿会议的第五次全体大会。三天之后，中日协议因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字而变成正式文件。规定随即付诸实行，胶州租借地的移交工作于1923年12月5日办理。

虽然各国对于山东问题至为关切，但日本在面积大得多、地方也富得多的满洲方面的地位，却没有怎么引起公众的注意。699 不过，中国代表团却力图将满洲这个迷途的羔羊领回中国的羊栏。

满洲

11月28日，施肇基在太平洋远东全体委员会上发言，要求列强同意非经中国许可并遵照国际法原则或惯例，“不在中国领土上保持电讯设备、军队、路警或警察派出所”①。同一日晚间，他散发了一份关于他在第二天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列举了列强未经中国许可，即设置军队、路警、警察派出所和电讯设备，侵犯中国主权的地点和时间。翌日，埴原先生声称，他愿“最郑重地否认，日本在中国设置或维持这类警卫队，抱有任何侵略的目的，或任何非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愿”。至于南满铁路的护路兵，则是依照1905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驻扎在那里，以保护铁路地带免遭土匪扰害的。四天之后，即12月3日，埴原先生在委员会中就租借地问题发言，更加明白地表示，

① 由于这些要求而产生了关于在中国无线电台议决案和关于在中国之外国军队议决案。前一项议决案中规定：“如有外国政府或人民在中国境内未得中国政府之允而存留之电台”，俟给予公平之偿付即移交中国。这项规定因下述的规定而失去大部分效力：“如在租界地及南满铁路地带暨上海法租界各电台所发生之任何问题，应视为中国政府与有关系政府讨论之事件。”中国代表团正式声明，中国政府不承认外国人未经中国政府明白许可而有安设或办理无线电台的权利。1929年，在中国和香港有无线电台四十六座，其中中国管理的计二十五座，日本十二座，法国三座，英美各两座，蒙古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座，中、日合办一座。

关于在中国的外国军队，各国同意，“于中国请求时，应（训令各该国外交代表）会同中国政府代表三人，共同秉公详细调查”——调查结果和有关建议对任何一国都并无约束力。

日本政府决意不在满洲作任何让步："日本目前无意放弃其〔在关东方面，即旅顺口和大连方面〕以不小牺牲而依法取得的重要权利。"他又复提出了领土毗邻作为论据："讨论中的领土构成满洲的一部分，而满洲这个地区与日本领土贴近，所以它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关系其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 700

这是对于中国方面要求"废除和提早终止"外国租借地并立即实行非武装化所作的答复。所指的领土是山东的胶州湾和关东(日本租借)、广州湾(法国租借)以及威海卫和九龙(英国租借)。关于广州湾，魏旺尼先生声明，法国政府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同各国将所有租借地归还中国"。白尔福声明，关于威海卫，英国方面有同样的准备，因为威海卫一地，依照 1898 年的借约，本来应该在 1905 年俄国被逐出旅顺口时归还的。由于九龙与香港贴近，英国不准备以该地归还中国。

租借地

中国方面在外国租借地问题上之未能如愿以偿，并未妨碍他们回过头去攻击二十一条和 1915 年所强订的条约。在 12 月 7 日的委员会会议中，顾维钧提请注意这样一项事实，即关东的原租约应于 1925 年到期，而日本在 1915 年取得的租约展期九十九年，"乃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取得的，以致关于它的效力问题的争议迄今仍是中、日两国间最重大的悬案之一"。他补充说，"满洲和朝鲜毗邻的这个事实，如果可以作为考虑任何权利主张的理由的话，那么，也只能在相互的条件上引据这项事实方为公允。"一个星期之后，王宠惠指出，1915 年 5 月 25 日的条约及换文"严重影响中国之生存、独立和完整"，并要求"重行讨论并取消该项条约及换文"。

中国抗议二十一条

解决山东争议的宣言是在 2 月 1 日发表的；翌日币原在委

日本对中国和列强的“让步”

员会中宣读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日本代表团不能考虑取消1915年的中日约定:“一旦承认由条约郑重给予的权利,得随时以该项权利的让与有违让与国的自愿为理由,而予以废除,则将树立一非常危险的先例,对亚洲、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现行国际关系的稳定,均将有深远的后果。”但是,由于自1915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日本代表团声明三项让步:(1)“日本准备将日本对于(甲)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借款,与(乙)以该两地各种税课作抵之借款,单独获得之优先权利,公开于近日组织的国际财团的共同活动”,惟须遵守组成财团的中外各团体事先商订的办法;(2)“日本对于根据该约而获得有关中国在南满聘用日籍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各顾问或教官之优先权,无意坚持”;(3)“日本更准备撤回于1915年中日条约和换文签字以前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政府所提原案第五号留待日后协商的保留案”。这些让步都是虚而不实的。第一项事实上在1920年已经提出;至于第二项,则日本人在南满早已有了压倒一切的势力,同时,鉴于日本将成为华盛顿条约缔约之一方,第五号要求本无法再行提出。

701

美国和1915年协定

在2月3日委员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王宠惠对日方所提1915年条约如果取消,则构成一危险的先例云云这项论据,提出了答复①。他所据的理由是,该项条约是单面的,是违

702

① 王氏说:“中国代表团兹谨声明,如果一国能从一个友好相处、但在军事意义上较弱的邻国,在谈判和签订1915年条约时的那种情况下,既非为补偿悬而未决的争论,又无交换条件,就取得种种有价值的让与权而不受其他各国的谴责或抗议,则必将树立一更加危险的先例,其影响于国际关系的安定,实不可胜计。该项条约和换文的确是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一国向当时保持友好关系的另一国,无缘无故、突然之间提出象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那样严重的要求,象这样的事,恐怕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件。不必担心1915年条约的取消会成为取消其他条约的一个先例,因为大家都深盼将来不致再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

反以往的一切中国和各国之间的现存条约的，是和华盛顿会议所制定的原则不相符合的，而且是中日两国经常摩擦的一个根源，所以他主张应以 1915 年条约和换文“作为一秉公调查的问题，以期予以废除”。紧接着这项声明之后，休斯国务卿阐明了美国政府对 1915 年协定所持的立场。在宣读了 1915 年 5 月 13 日致中、日两国政府的同文照会之后，他声称，根据最惠国条款，美国政府将为它的公民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要求和日本人同等的权利。但是生怕这项要求被解释为对该项协定的承认，他补充说，“中日条约的效力问题，和美国根据中美条约而享有的条约权利的问题是截然两事。”尽管中西舆论对二十一条有明白的表示，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却因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反对，在实质上更为加强了①。

领事裁判权

在举行华盛顿会议的这个时候，有十六个国家（比利时、巴西、丹麦、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挪威、秘鲁、葡萄牙、俄国、西班牙、瑞典和美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德国和奥匈由于世界大战的缘故，最近已失去了它们的领事裁判权；俄国不久就将丧失，并且也随即放弃了它的这种权利。在 11 月 25 日的委员会会议上，王宠惠评述了领事裁判权问题，要求各国准备定期逐渐废除领事裁判权。休斯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这项建议得到了同意。白尔福先生在支持这项办法而作简明的发言时，分析了领事裁判权何以经过这样许多年而没有废除的原因。他说他“了解到困难与其说是在

在中国维持领事裁判权的理由

703

① 在 1923 年 3 月，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经济控制，因纽约花旗银行给予那个在帝国政府管理下以在朝鲜和满洲经营为主的东洋拓殖会社一千九百万金元的贷款，而得到了加强。这笔贷款是中外人士以及商会方面物议沸腾的原因，理由是它有助于加强日本在大陆上、特别是在满洲的地位，从而妨害了门户开放和银行团的政策。

于中国法律本身，毋宁说是在于中国法律的执行。如果那些改革法律的能手，能以改革法庭和司法行政的工作自任，那么，司法的改良就多少会有些指望了”。由于王宠惠关于领事裁判权的呼吁，结果产生了12月10日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会议全体大会所通过的一项议决案。除中国外，与会各国政府决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在办法以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续”①。根据另一项决议，中国声明愿指派代表一人列席该委员会。各参与国“可自由取舍该委员会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但无论如何，各该国之任何一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中国给予政治上或经济上任何特别让与、或恩惠、或利益、或免除为条件，而采取该项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②。

在中国的外国邮局

在王宠惠发表关于领事裁判权声明的那同一次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全体委员会的会议上，施肇基提出了一项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邮局的声明。这项声明中包含中国邮政局的一项简单而全面的报告，这个邮局的服务经证明是既价廉而又有效的。自1914年以来，中国已经是万国邮政联盟的一个正式会员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外国邮局尽管没有条约权利或合法权利作为基础，数目却越来越多。1921年，这类邮局共计不下一百五十所。其中有日本的一百二十四所，法国的十三所，英国的十二所，美国的一所。中国官员不得检查由这类邮局经手的邮件；结果是应税品和违禁品（特别是吗啡、科卡因和鸦片）都通过某些邮局而大规模输入中国。中国要求撤除这些邮局。在704 1922年2月1日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议决案，声明在中国

①② 录自华盛顿会议关于取消在中国领事裁判权议决案原文，见《中外条约汇编》，第607页。——译者

保持有效的邮政和外国(即法国)邮务总办的地位不变动的条件下,各国将于1923年1月1日以前撤销这些邮局。

中国代表团谋求排除中国境内的外国军队、无线电台和邮局,并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的举动,是和门户开放这个更广泛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12月12日,王宠惠宣读了一篇关于"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的声明——他把这类空洞的名词解释为含有下述的意义,即:"提出这种主张的各国得在各该'范围'内享有贸易、投资及其他方面的保留的、优先的、专有的或特殊的权利和利益。"中国代表团要求与会各国取消对某范围或"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或在中国领土内任何特殊利益的一切主张。踵随这项一般的要求,在两天之后又有一项具体的要求:即将1915年条约和1896年以来列强间有关中国的一切协定一概取消①。除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中列进下述一条(第四条)之外,对于王宠惠所提出的那一系列限制性规定,并未采取任何行动,那一条规定如下:"缔约各国协定,对于各该国彼此人民间之任何协定,意在中国指定区域内设立势力范围,或设有互相独享之机会者,均不予以赞助。"②这一条对各国人民具有拘束力,但对于政府本身有无拘束力,则并未肯定。

华盛顿会议和门户开放

若就中国初次成为门户开放原则的缔约方以及"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③而言,2月6日签订的九国公约是具有相当意义的。它们协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取:(1)任何办法,为自己

九国公约中门户开放的定义

① 参阅麦克墨莱:《约章汇编》第54、204、268、640、657、769、803、900、1216、1327、1328、1394号。

②③ 录自《中外条约汇编》,第611页。——译者

705 利益起见，欲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有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2) 任何专利或优越权，可剥夺他国人民在华从事正当商务实业之权利，或他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从事于任何公共企业之权利，抑或因其范围之扩张、期限之久长、地域之广阔，致有破坏机会均等原则之实行者"①。中国政府约定"中国全国铁路不施行或许可何种待遇不公之区别"②。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对"运费及各种便利"方面，"不论搭客隶何国籍，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货物出自何国，属诸何人，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船舶或他种载运搭客及货物之方法，在未上中国铁路之先，或已上中国铁路之后，隶何国籍，属诸何人"③。此外，各缔约国协定，"于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④。虽然如此，九国公约毕竟还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切合实用的。它只适用于未来，并不妨害既得利益的现状。

3. 雅浦岛问题的解决。华盛顿会议的评价

除山东条约而外，在华盛顿还有另一项条约是在会外签字，但与会议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处理 1919 年在巴黎发生的雅浦岛问题的那个条约。在关岛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加罗林群岛中的这个小岛，已经在 1919 年 5 月 7 日划为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它的重要性在于集中在这里的三条海底电线构成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两条交通线之一。一条是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再从那里展至关岛、马尼拉和上海；另一条则是从关岛经雅浦展至上海。雅浦也是美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联络点。

雅浦岛的重要性

①②③　录自《中外条约汇编》，第 611 页。——译者

④　关于这些规定的重要意义，参阅本书第 506 页及以下各页。

日本切断了雅浦的海底电线，并将这些电线的上海终点移到琉球群岛中的那坝。尽管威尔逊总统鉴于海底电线联络的重要，曾经提出关于雅浦岛的"具体保留意见"并建议将该岛国际化，国际联盟行政院还是在 1920 年 12 月将它断给日本。美国政府在翌年 4 月声明国联行政院无权拘束美国，并继续要求将该岛国际化。

威尔逊的保留意见

706

经过几个月的文书往来之后，1922 年 2 月 11 日美日两国代表签订了一项关于太平洋中旧德属岛屿、特别是雅浦岛的条约。美国在这些岛屿上的利权得到了保障，美国人民架设和经营雅浦－关岛间海底电线，"或美国及美国人民今后所可能敷设和经营的任何与雅浦岛接联的海底电线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缔约双方之间的一个摩擦根源，就这样消除了。

雅浦条约

企图概述和评价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的尝试已有不少。虽然代表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中国身上，可是中国的问题只是在其和太平洋及远东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个更大的问题有关时，才具有直接的意义。就中国而论，在消极方面，并没有对它加以新的束缚；在积极方面，由于会议中宣布了自制的原则而使门户开放主义增添了新的力量。中国又得到了另一个机会，就日本以前所走的道路和朝鲜所走的道路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华盛顿会议的评价

由于英日同盟和蓝辛－石井协定的废除，英、美两国对日本在华"特殊利益"的承认已经撤销。西方各国已无法在中国进行干涉，日本也没有象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任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为所欲为。如果说英国废除了英日同盟，撤去了抓在军国主义日本肩头上的那一双手，那么，由于英、美之间决无发生战争的可能，前者就无需再作为亚洲大陆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匿名赞助

中国如何得到帮助

707

人，所以英、美两国在远东的影响一时大增。

日美摩擦的消除

最后，由于日美两国之间的许多摩擦根源业已消除，两国之间的战争纵非没有可能，却也无限期地推迟了。日本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敦睦友好的政府，以代替过去无论在中国或在西伯利亚都并没有什么收获的侵略政策。到 1922 年年底，除了库页岛而外，日本已经处于它的 1905 疆界以内了。但是，1917 年以后作为一个远东强国的俄国局势的发展，以及俄国代表的被排斥于会议以外，却削弱了会议，并使那种为东方的广大领土而签订具有拘束力的协定的谈判成为不可能。

4. 华盛顿条约的履行

批准条约的耽延

华盛顿会议于 1922 年 2 月 6 日闭会；与会代表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务使各该国政府批准这些新协定。在法国进行批准手续使其完全生效以前，三年半已经过去了。在这期间，东亚方面已经有了重要的发展，其中有几项已经在前一章中加以论述。

日本的政治局势

在华盛顿会议行将召开的时候，自由主义的平民首相原敬被刺。由于原敬内阁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实行侵略政策，由于它未能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①，并由于它对出版自由加以限制，他

708

的政府曾大遭物议。11 月 12 日，他的藏相高桥（是清）子爵继任首相，并担任了政友会总裁。1922 年 6 月 6 日，高桥内阁辞

① 1890 年的选举法规定众议院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选民资格之一，必须是每年纳税十五日元以上的年满二十五岁的男子。选民原来的人数约为四十五万。1900 年，根据该法的修正案，因将纳税限制降至十日元，选民人数约增加到一百三十五万。原敬内阁在 1920 年完成了第二次的修正案。纳税限制从十日元减到三日元（约合 1900 年的一日元），选民的人数增加到三百万以上。1925 年 3 月，加藤内阁得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普选法案，取消了纳税限制，实行成年男子的普选，年龄的限制为三十岁。选民人数从三百万增到差不多六千万总人口之中的一千四百万。

职，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之一、萨摩人海军大将加藤男爵担任了一个超党派内阁的首揆。加藤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和诚笃的人，他同军国主义者和枢密院的极端保守分子是互相反对的。虽然由于在华盛顿所作的让步而遭到物议，他却得利于1922年8月7日奉敕批准的华盛顿条约和同年10月日本从西伯利亚的撤兵，而使坚持裁减陆海军军费一事得告成功。

裕仁天皇登极

1922年11月，嘉仁天皇(年号大正)失去了履行天皇职务的能力。生于1901年4月29日的裕仁太子奉派为摄政。太子于1926年年底他的父亲逝世后，继任为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他为他的朝代选择了昭和这个年号。

交还山东

1922年6月26日，在加藤男爵就任首相的两个星期之后，交还山东的谈判在北京开始。由中、日双方各派代表三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达成圆满协议以前工作了五个多月。12月5日，山东悬案细目协定经双方议定。规定12月10日为胶州行政权移交的日期，包括日本撤兵在内，限于一个月内办竣①。铁路产业的移交定于1923年1月1日办理，经办淄川、坊子及金岭镇各矿的合股矿务公司由中国政府特许成立。

交还的结果

在紧接着交还胶州之后的几年中，中国民政人员简直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维持德、日所建立的市政标准的才能和意愿。在军事统治之下，贪污腐化已成风气。虽然在道路的修建、治安和造林方面都一时作出了良好的成绩，可是整个说来，当年的一个壮丽的城市和重要的港口却被糟蹋得可观。虽然日本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已经撤出，日本在山东的经济地位依然很牢固。除开日本人参加经营矿业不论，日本今后十五年还保有购买大量青岛盐的权利。它继续控制佐世保那个海军基地和青岛之间

709

① 关于协定的详细情形，请参阅戈德歇尔：《三国旗帜下的青岛》，第11章。

的海底电线的佐世保终点站，而且日本人拥有青岛的地产达五分之四。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继续施行，青岛日本领事的地位在权力上不低于中国督办。

和华盛顿条约的批准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的问题。自 1917 年 12 月 1 日起，各缔约国允准庚子赔款暂停付五年。1921 年 6 月，中法实业银行倒闭，从而不仅是在金融方面削弱了法国在远东的地位。为图恢复起见，法国立法机关在原则上同意将 1922 年 12 月起重新支付的庚子赔款拨供这项用途，俾使该行复业。接着就发生了所谓金法郎案的巴黎和北京间的意见分歧。这个案件关系到中国方面愿按照 1905 年以来的办法，用法郎支付，以符须用债权国通货支付赔款的协定——借以保障债权国在汇率上的损失。战后时期，法郎贬值，颇于中国有利。为了避免损失，法国政府要求将“金法郎”这个名称解释为不仅要象以前那样用以区别中国的银币和法国的金币，而且要强迫中国按“金”法郎战前的汇率付款。在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赞助下，法国坚持要求这种占中国便宜的解决方法，作为批准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条件。美、英、日政府为了合作，并为了保证条约付诸实施起见，终于偏袒法国，但并不热心。中国方面的舆论使北京外交部的声势大壮，所以它一直坚持到 1925 年 4 月达成一项折衷方案时为止。在以金币支付的这一点上，中国答应了法国的要求，但是以金元而不是以法郎支付。开始支付赔款的日期从 1922 年改为 1924 年 12 月 1 日。中法实业银行得利用这项赔款进行复业，如有余额则拨供文化方面之用。

1920年—1924年的中法关系

金法郎案

710

1908 年，美国政府援据它本身在 1885 年所创的先例，批准将庚子赔款浮溢于应行赔偿的实际损失之数，退还中国。这就是说将中国付给美国政府的赔款，以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一千一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

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金元退还中国。1924 年 5 月 21 日，国会根据联合议决案批准以应付赔款的余额（计六百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金元）退还中国，“以期继续发展中国教育及其他文化事业”。9 月 17 日，中国大总统令准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它的宗旨是：“发展科学知识，并……提倡技术训练、科学研究、实验和展览以及科学教育方面的训练，并……促进图书馆之类的永久性文化事业，借以将这类知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日本、英国和苏俄后来也表示愿对它们应得的庚子赔款余额，采取大体相同的措施。

特别关税会议

九国公约于 1925 年 8 月 5 日开始生效。十三天之后，中国向八个缔约国发出了请柬，召开 1922 年 2 月的关税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中规定的特别关税会议。丹麦、瑞典、挪威和西班牙既然表示愿意遵从九国公约的条款，后来也应邀列席会议。在这期间，修改税则委员会已于 1922 年在上海开会，修改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在 1918 年制订的税率表。1922 年修改税则的目的是要取得一个切实值百抽五的关税税则。中国援引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所作将来一遇适当机会，仍欲将关税自主问题提出讨论的宣言，在请柬中声明拟将这个问题列入会议中讨论。

711

中国要求关税自主

特别关税会议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全体会议，于 1925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开幕，以中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为主席。中国人民对于这一次会议的召开寄望甚殷。在这一年夏季，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已高唱入云，政府爰于 6 月 24 日照会各国，要求修改现行条约。中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和会议主席在向与会各代表致欢迎辞时曾提出关税自主的计划。要求在 1929 年 1 月 1 日取消一切关税限制的王正廷，更详细阐明计划，并允由中国于同一日期以前裁废厘金，以为酬答。北京政府早

已将对不适用协定税则的各国人民和货物实施的国定"税则"付诸施行，而现在则希望实施一种普通商品百分之五、烟酒百分之三十和其他某些商品百分之二十的临时附加税。缔约各国和中国达成了一项折衷案，依照该案，双方于11月14日议定，在华盛顿会议中所同意的税率应立即付诸实行。既然先已在会议中"原则上"同意中国自1929年1月1日实行关税自主，缔约各国即于11月19日作为事实予以承认。关税自主是否以同时实行裁厘为条件，则并未肯定。中国主张不以这两项协议互为条件，而这种主张终于占了上风。在这次全体会议之后，特别关税会就通过小组委员会来进行工作了。1926年4月政府的解体和除去两名之外全体中国代表的撤出北京，使本来会正式确认小组委员会的措施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无法召开。结果是各国代表完全不是出于他们本身的过失而未完成他们的工作就被迫退出会议。特别关税会议自1926年7月3日起无限期休会。

712
中国厌恶领事裁判权

同中国要求关税自主的愿望密切相关的，是取消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根据华盛顿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为"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在办法……及辅助并促进中国政府力行编订法律，及改良司法，足使各国逐渐或用他种方法放弃各该国之领事裁判权"所拟设的委员会，应于会议闭会之后三个月之内组织成立。为筹备这样一个委员会，中国政府于1922年4月要求将它展期到下一年举行。当1923年中、美两国已准备派员组织委员会的时候，金法郎案又使它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直到1926年1月12日这个委员会方才开会。出席的国家和关税会议的参与国相同。鉴于有些委员因铁路交通受内战影响陷于断绝而无法到达北京，致不能不改变会期，则中国局势的动荡不安，可见一斑。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中国司法总长王宠惠。主席是美国委员赛拉斯·斯特

委员会延期成立

朗。尽管种种困难曾使关税会议戛然中断，并使有名无实的北京政府寿终正寝，领事裁判权委员会还是举行了二十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1926年9月16日举行的。在委员会开会期间，一个视察委员会在5月10日至6月16日之间遍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广东当局拒绝接待这个委员会，声称领事裁判权应立即取消，无需考察。张家口、宁夏、包头和太原等这类的地方，则以局势紊乱和缺乏交通工具，无法身临其地。

领事裁判权委员会报告书 713

委员们提出了一件报告书，计分四编。第一编缕述在中国领事裁判权的现行办法；第二编，中国法律以及司法和监狱制度；第三编，中国司法行政；第四编则载列建议。报告是一致同意的。但是中国委员王宠惠在签署时，附有一项声明，略称他的签名不应解释为含有赞同报告前三编中所述各节的意思。委员们关于政府行政部门、特别是军事部门干涉司法问题所作的评述和建议，足证白尔福先生在华盛顿所称与其说领事裁判权问题系于法律的编纂工作、毋宁说系于法律的执行云云这项论断的正确无误。

委员会的建议

委员会的第一项建议是，司法必须妥加保护，使不受这类的干涉。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司法为求取消领事裁判权而应有的变更和发展，并建议在作到这一点以前，各缔约国不妨考虑以渐进的方法实行逐步取消。据建议，领事裁判权法庭"应于尽可能范围内"适用中国的法令。在中国人为被告的华洋涉讼案件中，应放弃派员会审的权利，并建议将这类案件归由一个中国新式法庭审理，同时使特别混合法庭逐渐与中国法庭归于划一。其中也提出了如何纠正因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而发生的关于中国人民和财产受外国保护的这种流弊①，以及在享有领事裁判权各国

① 关于这类流弊的讨论，请参阅宓亨利：《海外的中国人》，第4章。

当局本身之间及其与中国当局之间为执行司法和秩序如何进行司法上的协助的建议。最后,据建议,"一俟各关系国承允,各有约国人民在领事裁判权撤销以前应即向中国当局照章纳税。"在这些建议"履行到合理的程度"时,委员会认为各国"一定会放弃他们的领事裁判权"。

中国是唯一还保持全套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国家。日本、暹714罗以至于土耳其之类的其他国家,都已经能够通过内政改革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形成,全部地或大部分地摆脱了加诸它们主权上的这种限制。但是由于内战频仍、盗贼蜂起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布,中国在 1931 年却比 1843 年更加不能保护其境内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对他们进行裁判了。虽然它有比较现代的和近于完善的法典,以及受过现代训练的法律家,但是,它却没有诚实独立的司法行政,正如 1926 年的领事裁判权委员会报告中所明白指出和自该项报告书公布以来的情况所充分证明的那样。

第三十章　现代远东

1. 民族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帝国主义

两大斗争

民族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帝国主义——这些主义及其伴随着的因素，都是极东方人民在最近时期最经常讨论的题目。象在十九世纪末叶那样，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中，中国及其属地成为两大斗争的战场：一个是内部的和国家的战场，另一个是外部的和国际的战场。

世界大战对东方的影响

在世界大战对东方的影响中，日本从 1914 到 1921 年在大陆上奉行的侵略政策，中国学生运动的发展，以及东亚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扩大，都是最重要的。在 1917 到 1919 年，日本和西方各国在中国和巴黎都做得过火了，以致首先在学生当中，然后在商人和银行家当中，最后在工人和农民当中，造成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奋起。这样的一种精神同 1990 年在愚昧而狂热的义和团当中所见到的那种精神，是大不相同的。目前的运动不但蔓延得更广，而且领导得也更为明智。可是，不幸在现代爱国的和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混杂着很多消极的和排外的东西。如果说现在更有希望了，却也更可忧虑了。危险主要在于两个因素：作为世界大战结果的白人威信的破坏；以及 1923 年以来共产主义学说的渗入东方。

共产党在东方的手法

俄国的共产党领袖主张，在亚洲国家中，政治性质的民族革命一般必须先于社会性质的民族革命。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施行，获得不小的成就。1923 年 1 月，孙博士和越飞在上海发表

716 的共同宣言，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①

孙博士转向俄国

在下月，孙博士又回到广州去领导一个华南政府。8月，鲍罗廷同志从俄国来华，充任他的顾问。这时，俄国政府和广州政府方面的一个密切合作时期开始了。由于孙博士扬言要夺取关税而引起的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葡萄牙于12月派炮舰和战船到广州的专横行动，苏联的影响增大了，那些关税的余款根据国际协定，是要送到北京中央政府去的。这一行动促使南方领袖声明他不再指望西方的援助，而只指望俄国的援助了。在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其人数在过去几年日益增加的共产党员，被正式准许参加国民党——基于这样一种谅解，即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主义，而国民党并不接受共产党的主义。在同年6月间，孙博士建立黄埔军校，这是由鲍罗廷同志为训练军官以领导他的军队而筹划的。为了协助这项工作，不久就来了大约三十名俄国军事专家。之后，为了同样的或其他的技术工作，又有别的专家到来。

孙博士与段祺瑞和张作霖通声气

孙博士为了获得援助而转向俄国，并不妨碍他同北京临时政府的执政段祺瑞和满洲的张作霖将军通声气，而他们都反对俄国，并且孙博士也久已是他们的反对者。孙博士被迫不能依靠广东人，而须依靠来自云南、广西和湖南的佣兵，这些人对待

① 转录自何汉文编：《中俄外交史》，第366页。——译者

他们支配下的地区一如对待供其掠夺的征服地区那样。孙博士的政府为了支付这些军队的军饷，从广东省索取大宗款项。被迫铤而走险的广东商人，把他们在全省大约一百四十个城镇中发挥作用的商团组织集中了起来，策划在1924年秋季推翻这个著名的革命领袖。孙博士依靠在国民党左翼成员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工人队，在截获了商团在一只挪威船上从欧洲输入的大宗军火之后，于10月中动手粉碎商团组织。广州大部分最繁华的地区遭到破坏，并有大量的生命损失。

717

孙博士最后退出广州

随着1924年11月段祺端在北京立为临时执政，孙博士被邀北上参加政府的改组工作。他并非不愿离开既有一些忠实信徒而又有许多敌人的南方，但是对于“善后会议”的组成和召开的方式与段的意见不合，他取道上海和日本，迟迟北上。在路上他激烈地批评西方人的短处和他们文明的缺点。他抨击领事裁判权、“不平等条约”以及常常给他和其他战败的军阀以保护的外国租界。患着癌症的孙氏在除夕那天到达北京，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国民党的分裂

在孙氏逝世六个多月以前，国民党右翼或稳健派和左翼或多少拥护共产党的激进派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大。在孙博士弥留之际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他周围的激进派忙于准备把他和俄国的列宁联合起来纪念。据称发自孙氏的电报纷纷寄到俄国，其中包括一封命令他的党继续同苏联合作的电报在内。在北京和莫斯科的电讯往返中，发自中国的电报声称:“我们孙逸仙的继承者，向作为列宁继承者的你们欢呼。”之后不久，那些出席全苏代表大会开幕式的代表，都起立向已故的中国领袖致敬。

与1918和1919年学生运动发展的同时，中国沿海诸省的

工人在中国和日本的奋起

工业和工人运动也发展起来了。日本在这方面的发展，几乎比中国早二十年。随着1900年后日本的大规模工业化，社会主义

718

和工人运动就慢慢发展起来。在1912年那一年中，劳工友爱会(友爱会)组织成立，并且发生了日本的首次大罢工。在1918年的米骚动中，死亡一百人以上，伤约数千人。审讯之后，有几个参加者被处死刑。但是，1918年后，罢工愈益被日本工人用来作为改善条件的手段，于是工会发展起来了。据1925年10月1日的调查，计有工会四百零六个，会员共二十二万七千六百六十七人。

铃木和片山

在日本工人运动的领袖中，铃木文治和片山潜是杰出人物。前者是劳工友爱会的组织者和第一个领袖，后者则是劳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和第一个领袖，劳工联合会使会员的思想转向社会主义。片山比铃木更激进，由于他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而被监禁多年，后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领袖的总部去避难。他多年来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日本和中国劳工的不同发展

由于日本高度集权的政府及其有训练的和忠心的军队，这个国家的劳工分子不曾突然掌权，也不曾为职业鼓动家所利用，而近年来在中国这却是屡见不鲜的。这两个国家的机器和工厂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现象，与大约一百年前西方所发生的那些现象相同。从二十世纪西方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观点看来，外国人和本国人所置厂房中的条件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是，不仅应该同西方产业工人最先进的条件相比，而且也应该同迄今仍普遍存在于本地厂房中的、在近代表明传入远东以前手工工人的那种生活和工作条件作一对照。

中国工会运动的背景

中国的工会运动一直得到旧时行会的帮助，工人也一直受到家长制的家族制度的保护和激励。1922年第一季度中香港

719 的海员罢工就是明证，那时香港的大部分太平洋航运都陷于停顿，而在广州孙博士鼓励之下的海员，都散回他们的广东原籍，等候答应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在这种日益增长的工人力量得到第一次证明之后，接着在8月发生了第二次罢工，这次罢工影响到上海的航运业，并从雇主方面取得了新的让步。

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1922年的航运业罢工尽管重要，却还缺乏1925年纱厂罢工的那种惊人的影响，因为纱厂罢工一开始就既是经济性又是政治性的。纺织是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其中心在上海①。成千上万的男工、女工和童工从远近的乡区来到这个城市。许多人保持着和他们家里的联系，或住在附近农村，或常常回乡。其他人则不惜抛弃老家，成为都市产业无产阶级的成员。这后一类人的人数不断增加。1925年，在这个国家的各工业中心——青岛、广州、汉口、上海，并且也有香港——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罢工。其中最严重的罢工是在上海。1月间，在一家英商工厂中为了赔偿问题发生风潮，但迅即解决了。2月初，在日商工厂中开始了一系列的罢工，并随着发生骚动、威胁和死亡。爆发的原因，是为了开除一批抗命的工人。两三万名罢工者提出了六条要求：(1)停止暴行；(2)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十；(3)被开除的工人复工；(4)每两星期即时发付工资一次；(5)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照付；(6)没有充分理由不得开除工人。在2月中旬同日本工厂工人的一次冲突中，一个日本工厂的经理受了致命伤，还有其他人受重伤。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于2月20日递送了一份关于罢工情况的警告性照会给外交部。

罢工的蔓延

罢工者的要求

720

对罢工的援助

罢工者受到鼓动家的激励，并且得到激进者、爱国者、不满

① 1929年中国的一百一十九家纱厂中，华商有七十三家，日商四十二家，英商四家，参阅《中国年鉴》，1929—1930年，第1073—1078页。

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各种学生团体的援助，他们认为就其含义而论，罢工事件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并且认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改善国家情况的机会。运动历经3月、4月，一直到5月——中国的危机月。在青岛，4月下半月日本工厂中开始了严重的罢工，致使日本政府重新提出抗议。5月，上海的日本工厂中发生了暴动。在某次暴动中有几个中国工人受伤，其中一个姓顾的工人被击毙。

1925年北京的学生示威

在上海发生这些事件时，北京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而这对上海发生的事件并不是没有影响的。由于北京政府担心会发生同1920年安福系的倒台有关的反对政府和反日示威运动，又逢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十周年纪念，所以教育总长下令禁止在5月7日国耻日举行纪念仪式。结果是，因举行纪念仪式的计划受到警察干涉的几百名学生袭击了教育总长的住宅，捣毁了内部，并终于迫使他辞职。5月9日，另一次示威发生了，几千名男女学生为了上次事件中殴打和逮捕他们同学，纷纷参加抗议运动。抨击段祺瑞执政的传单散发了出来。它提醒人民注意他自当政至今所犯的"卖国罪行"，谴责他对金法郎案的一味迁就。他的政府被说成是"唯帝国主义者之命是从并为他们服务的政府"。执政显然记得他在1920年的倒台，他对学生的冒犯耐心地、纵非欣然地忍受下去，尽管有异乎寻常的挑衅，并未采取任何严厉的镇压措施——这个事实对稍后上海方面的发展不是没有重要关系的。

对段政府的攻击

721

企图改进上海的劳工条件

为求改善上海公共租界内工厂的童工条件，一批社会工作者已经拟订了一项租界章程的修正案。这是拟在1925年6月初的一次纳税人特别会议上提请表决的。在这同一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其他三项章程付表决，即增加码头捐案、限制出版自由

案，以及证券交易所和物产交易所注册案。对于这些措施的通过，上海的华商团体方面显然表示反对。从而产生的情绪助长了上海地区因劳工纠纷而引起的紧张局势。由于随即发生的种种事件，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获得通过。

1925年5月30日

工人顾正红的死亡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好象点燃了一列车的易燃物，火光烛天地烧了几个月。顾正红偕同其他约两百名工人袭击工厂的财产，在他被击毙时所造成的好几千元的损失这件事，被认为是无关重要的。学生和罢工同情者决定在公共租界以示威游行和公开演讲的方法来诉诸舆论。他们选定5月30日来进行呼吁，其方式同三周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样。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带着谴责"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和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传单和三角旗，在那天下午很早就出发示威。这是违反工部局章程的，照章非经当局许可，不得进行政治运动和任何游行或街头演讲。当巡捕下令解散时，群众拒不服从。有三个人被押送到一个商业区中心的巡捕房，迅速增加着的人群即随同前往；这三个人被提起诉讼并禁闭起来。接着又有其他的人被捕。之后不久，街上就有几个巡捕遭到了袭击，并且还有人试图夺取他们的手枪。于是巡捕借助于他们的警棍了。群众的愤激之情受到压迫时，其势愈益汹涌，他们呐喊着冲向巡捕房的进口。一个英国捕头带领一群武装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把守着巡捕房的进口，捕房里面存有军火，一旦到了暴民手里，必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当群众将要到达大门时，在警告不得再前进之后十秒钟，捕头下令开枪。四人被击毙，八人随即身死，十七人受伤。在下一周中发生了更多的骚动，随着有四人被击毙、一名外国义勇队队员受伤。伤亡之中，有几名学生。工部局已经表示决心，要保护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以免各

722

南京路枪杀

种分子出于无论何种动机所造成的混乱。关于维持秩序的必要方法意见颇有分歧，但中外负责人士对于必须维持秩序这一点却是一致的。

5月30日的结果

五卅事件立即为学生和一切不安分分子抓住作为激励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着眼点。歪曲事实至惊人程度的最有煽动性的宣传遍及全国。结果西达重庆的长江流域，北至济南、天津和北京，南至福州、汕头和广州，都激发起反日和反英的情绪。自义和团时期以来，在中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不稳定。6月5日，镇江有骚动；11日汉口有更严重的骚动，数人被杀，其中包括一个日本人。

1925年6月23日沙基－沙面的"屠杀"

最严重的暴动于6月23日在广州发生。十天前，俄国人训练的黄埔学生经过一番激战，一举将已故孙博士的云南佣兵驱逐出境。计划在23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排外示威，以抗议上海事件。那天有几千工人、学生、军队和黄埔学生沿着广州沙基的江边马路徐徐地进行示威游行。在他们对面，武装的英、法海军陆战队从沙面监视着他们。当队伍走近沙基的尽头时，枪声大作——从哪一方面开始，人言各异①。到停火时约有五十个中国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有一个外国人——一个法国商人——被击毙，两个外国人受伤。

723

谁放第一枪？

认为绝非沙面方面首先开枪，是言之成理的——从这样一

① 英国总领事声称："我敢以亲眼所见为证，发誓说第一枪是中国人放的。英国海军的高级军官和我自己都徒手站在桥旁，专门为防范防御者方面的任何急躁的或神经质的举动，而我们仅仅是从对我们打来的如注弹雨之中逃出了性命。"丹麦和瑞典领事以及法国和美国公民，都一致同意枪是从隔江的沙基方面打来的(参阅索科尔斯基：《中国年鉴》，1926年，第26章)。据说第一枪是一个俄国人从俯临沙基江边马路和沙面的二层楼窗口发出的。在那天的紧张情况之下，一枪就足以引起一次总爆发。一个俄国人干了这件事是决不会被证实的，但这种说法也许比说中国人或西欧人开第一枪要正确得多。

次事变中,欧洲人是只有吃亏而不会讨便宜的。另一方面,对俄国人言听计从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却有冒险小而收获大的胜算希望。从政治观点来看,在这类事件中中国人的生命损失愈大,人民对享有特殊权利和权益的外国人就怀恨愈深,世界革命的目标就愈接近,民族主义情绪也愈强烈,从而使南方政府声势愈壮。从经济观点来看,反英情绪增强了变广州为主要停泊港并取代香港而成为华南主要港口的可能性。

若干结果

反英的罢工和抵货运动踵随沙基－沙面事件而来,一直持续到1926年10月,历时十五个多月,这使英国遭受数百万镑的损失和很多不便。仆人都被迫参加罢工,香港和广州间的航运受到了罢工纠察员的干涉。买卖英国货以及同南方政府控制地区的英国侨民发生关系是被禁止的。沙面本身处于包围状态达数月之久,食物须从香港运入。罢工蔓延到香港和南方的许多城市。

万县事件

1926年8至9月的万县事件,对反英情绪更是火上加油。由于民船业的反对,摩擦即随长江上游对中外轮船开放通航以俱来,沿江纤夫常常失业,风力推动和人力推动的民船有时被狭窄江面上的轮船所引起的浪涛打沉。1926年8月29日,在四川省靠近云阳的地方,英国武装轮船"万流"号撞沉了两艘民船,船上载有中国士兵和一笔据说总数为八万五千元的现款。当地军阀杨森为报复起见,立即在万县扣留了和"万流"号属于同一家公司的两只轮船。经过无结果的谈判之后,英国炮舰"小金虫"号和"水凫"号以及一艘载着海军陆战队的货船"嘉华"号,奉派开到万县。9月5日,英国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同驻守在被扣的英国船上的中国兵之间,发生了战斗。此外,英国炮舰轰击了万县城市的一部分,击毁了当地的杨森总部。虽然造成了巨大

724

损害，英国军队却未夺回杨森所扣的船只而退去，双方的情绪都很激昂。

排外和反基督教的倾向

南方的工人运动一开始虽大抵是受俄国的鼓动和反英的，却发展成为普遍排外的和反基督教的运动。美国和英国的传教组织，包括医院在内，都被迫关闭，职员往往冒万难而逃逸，财产多被劫掠、充公和捣毁。约开口岸以外的小批外国人，既得不到当地官员和他们本国政府的保护，处境非常困难。就当地官员在保护外侨方面所表现的苟且偷安的常规来说，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他鼓励人民在法律轨道以内的爱国行动，一面提醒大家注意这一事实，即"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①]比在中国的外国人更多"，又说，"即使宣战，根据国际法也应当保护敌侨。"

题外的要求

在上海、广州和香港，节外生枝的要求提了出来。例如，在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工人对立法议会中华籍议员的选举权提出了要求。在广州，要求归还沙面。在上海，则要求将会审公廨归还给中国政府，要求给中国人以公共租界工部局中的代表权，任命只以华人充任部属的中国警官，并且废除领事裁判权。除最后一项要求外，上海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北京政府在1925年6月24日向各国提出的一个照会中予以赞助的。在同天发出的另一个照会中，中国要求各国采取修订条约的步骤。

725

各国的复文

对于这项要求，华盛顿条约的八个签字国以同文照会予以

① 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人数，估计在八、九百万之间；在美国大概有十万人。参阅宓亨利《在海外的中国人》，第32页。在中国的外国人人数，1927年估计为三十万零二千一百五十三人。其中，日本人二十万零一千七百二十一人，俄国人六万八千零九十七人，英国人一万一千七百十四人，美国人六千九百七十人。参阅《中国年鉴》，1929—1930年，第4页。日本人的人数或许估计得太低了；据估计单在满洲就约有二十万零三千人。

照复，对中国的愿望表示同情，并且愿意“衡量中国当局对现在为这些条约的特别条款保障的外国权利和利益所表现的履行义务和承担保护的意愿和能力，来考虑中国政府所提修订现行条约的建议”。并指出，中国所抗议的这些条约，都是为求改善早期中外关系上有所特有的那种不可容忍的情况而缔结的。可是，所有签字国都同意指派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关税会议和领事裁判权委员会。

上海的司法调查

罢工和抵货运动经历 1925 年整个夏季，一直拖到秋季。北京外交团所指派那个调查上海开枪事件的委员会，毫无成就可言。最后，美、英、日的驻北京代表指派了一个国际司法委员会。10 月间，这个由三位法官——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法官——组成的委员会在上海进行了一次司法调查。中国人拒绝参加这次的调查。法官花了几个星期听取和研究证词之后一致同意，就 5 月 30 日下午上海的情况来说，下令开枪的捕头是无可责备的。此外，法官们的意见就不完全一致了，他们的缺乏一致是因为对于要求他们考虑“为防止〔骚乱〕所采取或原应采取的预防措施”的有关条件，解释有所不同。日本法官和英国法官完全认为警政当局无罪。美国人则私下对缺乏预防办法严加批评；而且他责备上海的英国总巡捕怠于职守。总巡捕和有关捕头因此而分别辞职和退职。当时任工部局总董的一位美国人，一接到一份法官的报告摘要，就立刻以辞退总巡捕和捕头一节通知上海首席领事。他附致一张七万五千银元的支票，托转交当地中国交涉使，“分给那些有关的人作为抚恤金”。北京外交部立即宣布，它向外交团提出的要求约达二百万银元，因而拒收“抚恤金”。后来，接受了一笔十五万银元的款子。

726

撇开五卅事件的民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不谈，它颇有

上海问题的局部解决

助于促进上海外国租界中许多国际性问题的解决。踵随事变而来的两项要求，是和中国人在公共租界董事会中的代表权和以所谓会审公廨归还中国政府两事有关的，会审公廨早随着革命期间满清政府的崩溃而于1911年由上海领事团所接管。在1926年纳税人年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董事会“立即建议各国，希早日〔在董事会中〕增加三名华董”。在当年的下半年签订了一项临时协定，由有关各国领事馆官员把国际会审公廨移727 交给江苏省政府。这个协定在1927年1月1日施行，那时公廨改组成为叫作上海临时法院的一个中国法院。在规定的案件中，首席领事仍得派员会同中国法官观审①。

华北的发展

当华中和华南热中于五卅事件的政治经济因果时，华北却从事于军阀之间的金钱和权力之争。段将军的临时政府于1924年12月9日获得各有约国的事实上的承认。不久以后，冯玉祥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也奉派在满洲担任一个同样的位置。冯撤退到蒙古边境上的张家口——在那里他可以控制北京——并且在内蒙和甘肃开始了垦荒和拓殖的非凡工作。张则继续统治满洲。

张和日本对冯和俄国

对国际政治活动来说，这样一种形势倒是理想的。张的后台是日本。张冯两人的地盘的北面是俄国，冯是大半靠俄国支持的。1925年2月，冯将军和俄国派来的代理人取得了初步协议。三个月之后，谈好了一项明确的协议，根据协议，武器和弹药由西伯利亚经蒙古取道库伦运到张家口。张和冯都作好战争

① 1930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和各国代表签订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从4月1日起有效三年。公廨改组为两个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两个法院中，都施行中国规章法令。虽然外国律师得按中国规章法令代表外国诉讼委托人，领事馆代表或官员却不再参加法院的诉讼程序。由于这一协定，以前的会审公廨已变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了。

准备，前者向北京调动军队，他本人则进驻天津。俄国军队在满洲边境上的调动和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桩事件把战争一直推迟到该年年底。

华东的孙传芳

1924年秋季华东的齐卢之战以后，齐在福建的同盟者孙传芳并未予以援助，却向前推进并控制了浙江。奉军则占有从天津到上海的沿铁路区域。1925年秋，冯孙之间订立了联合攻打张作霖的协议。从10月17日到11月16日，孙向北推进，把奉军从江苏和安徽赶到山东。张作霖向天津和热河调动他的主力，从而迫使冯从北京撤退，并同意在天津停战。

728

郭松龄对张作霖倒戈

那样显明地成为民国时代中国军阀斗争之特征的倒戈行为，再度由1925年11月27日郭松龄（张作霖的一位统率最精锐奉军的亲信将领）和冯玉祥将军对张的联合宣战予以证明。随之发生的斗争，是同俄国和日本有重要关系的。既然张没有日本人的撑腰就不能维持他在满洲的地位，他的垮台就意味着日本在满洲的地位的削弱。俄国在满洲的势力必将通过冯的途径而相应地大增。张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有几个月是不太真挚的，结果当郭对张倒戈的时候，日本人的同情并不专一。接连三个星期郭节节胜利，但到了看来张已瓦解而沈阳必然落于他的倒戈将领手里时，东京政府宣布了增援南满铁路守备队和维持铁路地带中立的计划。这表明日本是支持张的。12月23日，郭大败，这位将领和他的妻子被俘处死。

日本和满洲所采取的步骤

不久，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起来对付冯。冯暂时脱离公共生活，把国民军交由他的部属领导。在跟着发生的战役中，发生了带有严重国际性的纠纷。在加拉罕大使的怂恿之下，控制着大沽炮台的国民军轰击日本炮舰和外国商船，并妨碍它们进出天津的航行自由。河道中还布下水雷。据辛丑条约，中国必须

1926年3月16日大沽最后通牒

729 保持从海至北京的交通畅通无阻。于是在 1926 年 3 月 16 日，各缔约国公使向外交部和与争双方领袖提出了最后通牒。这个通牒要求：(1) 停止从天津到大沽口河道内的一切敌对行为；(2) 撤除所有水雷和其他障碍物；(3) 恢复所有航行标志并不再加以妨害；(4) 一切交战船只停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航运；(5) 除海关当局外停止对外国船只的一切搜查。限中国政府在 3 月 18 日午前答复。在限满前十二小时，北京答应了规定的条件，就列强来说，事件已告一结束。

北京学生对最后通牒的抗议

可是，就北京本身而论却并非如此。中国和俄国的激进领袖，号召学生对最后通牒和临时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条件进行抗议。于是有几千学生在外交部门前示威，要求断绝和辛丑条约缔约国的外交关系。然后他们就向执政府和海军部进发。他们行动激烈，致使段的卫兵向他们开枪射击，击毙了三十多人，击伤了更多的人，有几个人因伤致死。

国民军于 3 月 22 日撤离天津，向北京和南口撤退。4 月，

国民军退向西北

他们撤离京城，退向西北，在那里他们从西伯利亚输入供应品并可于必要时商请蒙古方面的增援来增强自己。现在冯将军到莫斯科去旅行了，他在那里受到隆重的款待，并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观察苏维埃统治下的情况。

北京已不是政权的源泉

4 月间奉天、直隶和山东的军队占领了北京，因以严厉方法镇压学生风潮而现在极不得人心的段执政，象他在 1920 年一样地垮台了，他又回到天津去避难。自 1924 年冯玉祥政变以来即被监禁的曹锟，最后被释放出来——并且辞去了总统职务。他 730 和段祺瑞的引退，使北京成了“权力的真空”，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以上，并且标志出政治影响的从北京南移。

从 1913 年夏季“第二次革命”失败时起，孙逸仙博士就念念

不忘北伐，以便征服军阀，把全中国统一在他本人领导之下，并在全国实施他和国民党所主张的那种多少有点在变动中的主义。他从未能克服广东当地的困难。在他逝世以前，据说孙博士曾承认蒋介石(1886年生于浙江)适合于作为他的继承者和完成他一生事业的领袖。孙于1924年任命他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在他的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布莱辙将军(别名加仑)的帮助下，完成了国民党创始人从未能实现的事业，即组织和领导北伐的，也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继承者

几百名军官从军校分别派到广东的各种军事单位。军事教官、顾问、军火和经费，则从俄国取道海参崴而来。当孙在北京奄奄一息的时候，蒋正指挥他的经过改组的军队，在对付东江的陈炯明军队，并把军事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普遍相信反对蒋和国民党的军队是得到了英国利益集团的帮助的。这一信念同6月23日沙基－沙面事件所激起的情绪结合起来，使广州军队在他们的秋季战役中充满了热忱。在1925年的最后四个月中，蒋将军的军队肃清了广东省内的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武力，为期望已久的北伐开辟了道路。

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巩固

象太平军一样，国民党决定以取道湖南至湖北和长江而北进。蒋已将广西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然后把唐生智争取过去，唐是湖南人，一度是直系军阀的一分子，这时是湖南南部衡州的卫戍司令。排外运动于1926年3月在唐生智控制下的区域发展起来，下一个月他就背叛了督军赵恒惕，赵逃往日本。不到6月(1926年)中旬，蒋将军和他的军事总顾问布莱辙，就能够起兵帮助第一次出师失利的唐了。可是，到了7月中旬，唐的军队占领了长沙；因此国民党就推进到长江。汉口于9月6日被攻占；拥有重要兵工厂的汉阳也很快地被占领；但一直到10月10日，

蒋－布莱辙向长江推进
731

经过三十八天的围攻之后，武昌方才陷落。

孙传芳的瓦解

随着广州军队的北进，孙传芳将军妄想动员他的军队来堵住浪潮。到11月中旬，江西已为国民党所有；12月初，把福建转到南方手里的那次斗争的结果，是美国和日本派炮舰到福州去保护外侨的生命和财产。这个省的失陷，为北伐军进入浙江开辟了道路，同时江西的失陷缩短了把供应品从广东运到长江的路程。1927年1月初，国民党军队从福建和江西进入浙江。安徽则在3月初易帜——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宣传征服——口头上的和财政上的宣传。21日，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几乎未经战斗就为国民党军队所占领。三天之后，省会南京也占领了。

国民党控制的区域

随着南京的攻陷，整个大江以南，除表同情的独立的云南外，已归国民党政府所有。大江以北，惟河南的一小部分、直隶、山东和满洲还在张作霖的控制之下，但即使在这些地方，国民党的事业也颇获得同情。在"模范"督军阎锡山控制下的山西，和云南的地位相似——虽保持独立，但同情国民党运动。在冯玉祥控制下的陕西、甘肃和绥远－察哈尔区域，是同南方国民党有密切来往的。1927年3月底，除山东和直隶外，实际上整个中国本部名义上是在国民党及蒋介石将军和冯玉祥将军的联盟军的军事控制之下了。南方领袖是否能够维持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并解决面对着国民党中国的老问题和新问题，尚须拭目以待。

732

2. 1927—1928年的国民党中国和列强

亚洲的不稳定

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实行的这样大规模的革命，只不过是整个亚洲可以看得出来的运动的一部分。土耳其、波斯、印度、菲律宾群岛、法属印度支那、朝鲜和日本，全部表现出这个运动的

不同方面。政治独立、国家统一、经济自由、种族平等和社会平等及生活条件的改善——所有这些,在不同地区都以强弱不同的程度求其解决。

中国的觉醒

中国的中、外有识之士,都认识到1911年的革命不过是一出戏的序幕而已。有两类问题曾提出来要求解决——一类就其根源及关系而论是纯内政问题,另一类则是与外国和外国侨民有关的问题。前一类要根深蒂固得多,也难以解决得多;后一类则比较明显,而且可以归咎于外国人,是易于引起人民注意和激起众怒的。

斯特朗在中国

1925—1926年关税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斯特朗,在内战中来到中国;内战造成了交通的破坏,政府的崩溃,以及最后,关税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的逃之夭夭。对于中国情况作了几个月的研究和观察之后,斯特朗先生说,他发现"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目前的棘手问题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归咎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或外国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从占压倒优势的证据看来,今天中国的棘手问题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而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和帝国主义,都是鼓动家用来激起中国人民,使其陷于批评的狂热和不稳定状态的一些政治口号"。没有一个公正的研究者能够承认斯特朗先生的臆断是完全正确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限制已经产生了弊病,但后者远不能构成对中国进步的根本障碍①。

733

① 例如,在中国进行内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把武器和军需品售给各军事领袖。在1919年,当美国驻华公使于4月8日建议各国对运往中国的武器实行禁运时,这一点是公认的。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巴西、意大利、日本、荷兰、丹麦、比利时和葡萄牙同意了5月5日签订的一项禁运武器的协议。这个协议由于日本公使和意大利公使所作的保留而事实上归于无效。何况,各国还允许它们的侨民在中国建造和装备兵工厂。经过十年的理论上的考验之后,协议于1929年取消。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军火交易基本上是同领事裁判权或对中国主权的其他损害无关的。

但是，对外国特权的攻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极端派和稳健派两方面的集中着目点。单纯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人们，以及信奉莫斯科的主义的人们，已经能够在攻击一个看来比制止黩武主义、海盗、土匪、鸦片的生产、建立有效的地方和全国政府这类内政上的棘手问题要容易解决的这一问题上，暂时取得了协议。这一点在大江南北都表现得很清楚。1926 年 11 月 6 日，在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同比利时政府之间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试图修订 1865 年中比条约中"不平等"的关税和领事裁判权条款之后，中国宣布废除条约，从而把比利时的利益和侨民置于它自己的管辖权之下；后来它又同意承认这个条约为有效期六个月的暂定条约。经过无益的抗议之后，比利时于 1927 年 1 月进行谈判，声明它准备把它在天津的租界归还中国。商订中日新商约的谈判也已经开始，在中国和西班牙的现行条约于 1927 年 5 月满期后另订一个类似条约的计划也已经公布。

对外问题比内政问题易于解决

中比条约的废除

蒋介石和权利收复运动

在北京担任代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在废除中比条约的举动上得到了蒋介石将军的赞同。在 11 月 19 日于江西南昌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中，这个国民党将军说："废除这项条约，只是废除其他条约的先声……我们决不履行以前历届政府所签订的这类条约，国民党政府以前的中国任何政府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承认。"[1]蒋将军接着声明，国民党决心立即废除领事裁判权、外国租界和一切外国的特殊权利与权益。俄国革命的影响，反映在他的结束语中："这个革命并不是结束，而只不过是开始。今天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负荷'帝国主义'的枷锁。诚然，中国目前正在发生这

734

① 参阅《密勒氏评论报》，第 39 卷，第 1 期 (1926 年 12 月 4 日)，第 2、3 页；另参阅《中国在混乱中》(上海，1927 年 4 月)，第 16、17 页。

种革命，但在其他国家也一定会发生。这类革命，即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必将到来。中国不过是一个国家而已。在世界能有和平之前，一定有更多的国家把'帝国主义'打垮。"

这位国民党将军对他的追随者所概述的目的并非空论，这一点已为伴随南军的前进而发生的事件所证明。南军到了哪里，那里的工会、雇工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农民协会就组织起来，或显出恢复活动的迹象。在这些组织中，会员的入会往往是不自觉的。罢工、群众大会和游行一时成为风气。工人对雇主提出了要求，学生则对大中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提出了要求。

国民党激进的和反宗教的倾向

考虑到孙博士和国民党的若干其他领袖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基督徒这一事实，运动的反宗教倾向就具有特殊意义了。教会医院都为军方所劫夺；许多中心城市的学校、教堂和住宅被霸占，并常常受到损失，有时竟被毁坏。在国民党军队前进时，传教士一般都被迫撤退。斥责他们是"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的说法，已经成为公式。

中国教育的崩溃

鉴于中国旧式教育制度随着1905年清廷的下诏废除科举而成为过去，以及现代政治制度因缺乏经费和训练而弄得非驴非马，对于迄今仍强调学问和精神文化的一个民族的贤明领导来说，攻击教会学校却是不祥之兆①。其目的在于教授文盲阅读简单生字的民众教育运动，固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绝不能代替有效的学校制度和大学制度。教育的实际崩溃，似乎达到了十五年来全国社会解体的顶点。除了他们一般的排外和恶毒的反英宣传外，国民党的反宗教倾向构成了他们和俄国布尔什维

735

① 比暴民和士兵对教会学校和大学的有形攻击更重要的，是要求这类学校向政府注册，并以朝令夕改和专断的条例来控制注册的学校。参阅《中国年鉴》，1928年，第12章，以及当时《北华捷报》、《教务杂志》和《密勒氏评论报》合订本。

克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新证明。

英国关于华盛顿附加税的提议

1926年12月，汉口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为了多少满足一点国民党的断然的要求，并继续执行1925年夏以来奉行的敦睦政策，英国政府于1926年12月18日向华盛顿条约签字国提出了一个照会，建议将华盛顿附加税立即付诸实施，而不必由外国监督——从而承认了广东和山东两地的既成事实。附加税应由海关征收，但征收的税款不得用来担保无担保的债务，也不一定要存放在外国银行，而可以存放在负责当局指定的任何地方。关于决定存放地点和附加税用途的负责当局，事实上，英国主张承认地方政府，而不要求各国在各政治党派之间作选择。

照会向各国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欲维持赫德爵士所建立的海关系统的愿望。汉口的国民党领袖立即抨击英国政府所提关于华盛顿附加税的建议，理由是华北的军阀也会和他们自己一样地得到利益的。

对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袭击

736

1927年1月3日至5日，在各国对于附加税备忘录尚未能够复照以前，暴民在鼓动家的煽动之下，对汉口英租界发动了袭击。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和义勇队还是服从命令，没有开火。当不开火就不能再维持秩序时，警察和武装力量遂一起撤退，而把租界置于国民党军队的保护之下。这时法租界和日租界都未遭到袭击。1月6日，九江的英租界遭到类似的突击，国民党士兵还进行了劫掠。同汉口一样，英国守卫者忍受着引起开火的一切挑衅。在这两个城市中，那些怂恿暴动的人的目的，显然是想迫使英国人向暴民开火。既经证明汉口的国民党政府不能或不愿保护英国侨民，全体妇女和儿童以及很多男子都从汉口和九江撤退。

英国政府既决定仍旧推行它的敦睦政策，就从北京使馆派欧

交出汉口与九江的租界

玛利到汉口去同陈友仁先生谈判，陈以前入过英国籍，这时是国民党的外交部长。2月19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英国同意于3月15日解散汉口的市政机关，租界区域由中国人的新市政机关接收，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章程管理，"在汉口五租界合并为一区域之办法未经磋商决定以前，此项章程继续有效"①②。章程规定设立一个七人组成的市政机关——其中中国人四名，包括主席在内，英国人三名。2月20日，通过同样的谈判签订了一项关于九江英租界的类似协定。对于九江英国侨民"若受有直接损失，凡系出自国民政府官吏之行动，或由其重大之疏忽者"③，国民政府同意赔偿。之后不久，付了一笔四万银元的赔款。

1927年3月24日南京暴行 737

踵随着列强一般采取的敦睦态度，特别是随着英国在交出汉口和九江租界所采取的敦睦态度而来的，是空前的暴行，其幕后因素一时不为人所理解。当国民党军队于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所有外国人不分国籍、性别或职业，进行了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袭击。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侨民遭到了杀害或受伤；其他许多外国男女，也受到了袭击和抢劫，并且受到无以复加的侮辱。美国、英国和日本的领事都受到侵犯，所有南京外国侨民的住宅和组织都被劫掠，好几处被烧毁④。死亡的人计有英国人三名，美、法、意侨民各一名；受伤的人中有英国领事；日本和美国的领事也遭到枪击。更多人之所

① 4月3日和9月21日，暴徒袭击了汉口的日租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登陆，使用机关枪，驱散暴徒，继续保住了他们的租界。

② 译文引自《中外条约汇编》，第59页，《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译者。

③ 前引书，《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译者。

④ 参阅《密勒氏评论报》，第40卷，第7期(1927年4月16日)；《字林西报》，1927年4月12日；《中国年鉴》，1928年，第16章。

以未被杀害，以及外国人之所以得撤走，是由于江中的英、美驱逐舰施出最后手段，向城里开了炮。当地中国人对南京外侨的帮助和同情是显而易见的。

五国的要求

美、英、法、意、日各国政府“鉴于对它们的官方代表以及和平地从事于合法职业的侨民施以有计划的袭击”，于4月11日向国民党外交部长和蒋将军提出了同文照会。其要求如下：

1. 适当惩处须对杀害、人身伤害、侮辱和物质损失负责的军队指挥官和一切有关人等。

2. 由国民党军队总司令以书面道歉，包括急速以书面制止对外人生命财产的一切形式的侵犯和捣乱。

3. 全部赔偿人身伤害和物质损失。

外国军队派往上海

738

以袭击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南京事件和国民党军队向上海的推进而臻于最高峰的国民党运动的排外倾向，使各有约国政府决定派遣海陆军来保护上海外国租界和凡可能有危险的地方的外人生命财产。在1月(1927年)底以前，旁遮普部队从香港调到上海，从占西来的一旅人奉命在加尔各答上船。从英国各团中抽调的各营已经派出，同时美、日、法、意、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军陆战队，都于3月从集中于上海港的军舰上登陆。辅助海军陆战队和英国正规军的，是由若干国籍的人组成的上海义勇队。在3月21日国民党占领上海时，防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兵力为数在一万六千人以上，计英国兵七千一百人，印度(英属)兵四千人，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水兵一千六百三十人，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千四百三十四人，上海义勇队约一千二百人，意大利二百人，荷兰一百至一百二十人，西班牙一百人，葡萄牙九十人，以及一支法国的安南兵。一个月之后，已在上海或开往上海的国际军队约有四万人。这些军队防止了在汉口和九江不久以

前发生的以及在南京和镇江行将发生的一些事件在上海的外国管辖地区中发生。上海不但变成从内地来的好几百个外国人——传教士、商人和领事馆官员——的避难所，而且成为来自远近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避难所了，这是自从太平军和义和团以来向未有过的。

外人从中国内地撤退

紧接着南京事件之后，不但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所有外侨继续撤退，就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外侨也开始撤退。香港、上海和天津变成逃难者的集中点和中国沿海的防守根据地。

在1927年1月间，日本、美国和英国宣布了对华政策。所有三国政府都清楚地表明，只要中国履行它的国际义务，它们愿意尽可能满足中国要求的全国统一和国际平等的合法愿望。

蒋和汉口激进派的决裂
739

这时主要由于蒋介石将军和鲍罗廷同志及其各自追随者之间政策的分歧，国民党中普遍产生了情况的混乱。在1926年这整个一年中，每个集团都试图利用对方来实现它自己的目的；作不到这一点时，就各自设法去搞垮对方。这场斗争因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在何地召开会议的问题而发展到最高峰。蒋要求在南昌召开，而不要俄国顾问参加。俄国顾问却终于使这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因为汉口是在国民党激进派和他们的共产党支持者控制之下的。3月中旬的结果是，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落选和军权的险被撤销。蒋对汉口集团进行反抗，并且采取措施来维持他的地位。3月21日取得上海地区控制权的是他的军队。同时，他的军队和汉口的代表程潜将军的军队之间，展开了夺取南京的竞赛。程的军队胜利了，上文所述的事件随即发生。汉口的激进派和共产党指望袭击外国侨民能造成列强对南京的总轰击，从而激怒中国人民，俾使激进派能夺到永久的控制权，但这种指望却未能实现。中国舆论对于激进

派的过火行为感到震动，而并未为南京事件所毁灭的蒋介石发现他自己增强了，并能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政府。之后不久，英国公使撤回了他在汉口的代表，从而同武汉政府断绝了关系。

鲍罗廷和布莱辙的撤退

俄国不顾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关于宣传问题的诺言而在华北和华南所起的作用，经一些有关文件所证实①，这些文件是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北京俄国使馆中 740 的一幢建筑物和附近的几幢建筑物时，以及在5月12日对伦敦亚尔科斯大厦进行查抄时发现的。鲍罗廷同志直接从莫斯科接受命令以及为广州国民党和冯玉祥将军商洽援助的情形已被揭露②。在北京查抄中发现的比较重要的文件就是一份决议的副本，其中载有1927年初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详细计划，这份副本是3月28日在北京收到的。现在莫斯科同北京的外交关系决裂了。6月，在汉口的孙科和汪精卫接获证据，证明鲍罗廷正策划推翻国民党并建立共产党政府。这许多揭露的结果，是鲍罗廷、陈友仁和布莱辙将军于7和8月的撤退；孙中山夫人不久也退至俄国，声明革命已被出卖。

冯和蒋的联合

当这些发展在进行中的时候，军事形势也在不断变化。汉口在和蒋介石最后决裂的前十天，于4月7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3月，张作霖的军队南进至河南。冯将军和唐生智于4和5月前往迎战。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南军战

① 在当年2月28日，苏联商轮"列宁纪念"号曾在南京江面被截获。鲍罗廷夫人、三位外交信使以及其他旅客和水手一起被捕，并解往济南。据称曾发现有苏联宣传文件。

② 参阅《中国年鉴》，1928年，第789—824页；另参阅《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第11卷，第4期，第193—272页。

胜了张作霖的军队，张的军队被迫退出河南。到那时为止仍是安国军同盟者的山西阎锡山，现在加入了国民党。冯将军和蒋将军徐州会议(6月19至21日)的结果，冯同意支持蒋和他的南京政府派军北上，取道安徽、江苏而入山东。

1927年日本在山东的干涉

这时，日本首相、政友会的田中男爵已于5月间认定最近在南京和汉口盛行的这类事态有在山东重演的危险，这已使军事干涉具有正当理由。于是，他的政府不顾南京、北京和汉口政府的抗议，在5和6月间派遣了一支总数四千三百人的军队到山东。其中有二千人驻在济南。这实际上帮助了张作霖，他在6月18至19日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新政府，自称大元帅。由于日本人在济南挡住了南京军队北上的孔道，并由于宁汉之间同时在长江流域进行的搏斗，国民党拟于1927年攻占北京的企图归于失败。

741

蒋的引退和复职

来自国民党内部倾轧的国民党运动的危险，变得愈来愈显著了。为了挽救决裂，蒋将军于8月12日从南京政府引退，之后不久就到日本去了。虽然汉口的政权已经瓦解，内战却仍在继续，且由于共产党影响依然强大，政党领袖之间充满着猜忌，统一南京、汉口和广州的努力还是鲜有成就。11月10日，蒋将军从日本回国，一个月之后他接受了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职位。

同苏联的破裂

12月11日，广州为共产党攻占，遭到劫掠和焚烧。外国人统统撤退，许多中国人也逃走了。三天之后，反共军重行占领了这个城市，并进而肃清这个地区中的中国和俄国的共产党员。包括一个苏联副领事在内的许多人被处死刑。同时在汉口也发生类似的清洗运动，许多中国共产党员被处死，其余的俄国人被驱逐出境。南京政府这时下令将国内所有的苏联领事馆一律封闭。1927年这一年以俄国人的控制开始，而以共产党的官方权

力的全部瓦解而告终，但共产党的影响决没有遭到彻底破坏。

1928年日本在山东的干涉 742

翌年春，征服北京的战役重新开始。冯、阎、蒋依然保持联盟：冯、阎的军队一部分各自沿着京汉铁路和京绥铁路前进，而蒋的军队则沿着津浦线前进。日本又插足进来了。4月19日，五千名日军奉命开赴青岛，“以保护侨居青岛和沿胶济铁路其他地方的日本侨民”。日本政府宣称，它“对中国或中国人民并无恶感或敌意，也无……对北方或南方军队的军事行动进行任何干涉的意图”。保证军队将“于日本政府认为没有再驻留中国必要时，立即撤退”。北京和南京的政府再度提出抗议，但仍无效。

济南事件

日本人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种担心从名义上在蒋将军控制之下但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的国民党军队的态度来看，至少渐渐地明显起来。在山东省济宁，一个主持医院的美国教会医生，于4月16日被杀害；29日，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在泰安遭到枪击——可能是事出偶然的。28日，国民党士兵不顾日本将军福田不得切断该路的警告而破坏了济南以东的一段胶济铁路。4月30日，蒋将军的部分军队进入济南，发现约有两千名日军在守卫着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侨居住的地区。5月2日，在蒋将军的请求下，日本人同意撤除他们的防御工事，容许中国人履行他们的维持秩序的诺言。3日，在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开始进行战斗。在战斗中，中国的山东交涉员象双方的许多军民一样地被杀害了。由于英国和美国领事的调解，在4日签订了一个协定，订明国民党军队撤出城外六哩。到了7日，约有四千中国军队留在城内，同时约有同等人数的日本军队驻在外侨居住区。那天下午四点钟，福田将军发出了限期十二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之一是中国军队须撤至山东铁路两旁二十里——约合七哩之外。中国指挥官要求展延时间，以便向泰安的蒋

将军请示。这个请求被拒绝。8日上午三时五十五分,日本人开始把中国人驱出铁路走廊,济南的战事也重新开始。结果是到11日日本人就控制了全城。双方又有很多军民伤亡,并且发生了抢劫案多起①。日本人为他们侨民所受的待遇,提出了严重的指责。他们在这个省的军队人数增至两万五千人,同时将海军舰只调至华中和华南沿海,保护日本的侨民和利益。

743

中国的抗议

对东京的抗议既已判明是无用的,南京爰于5月10日致电国际联盟呼吁,抗议5月3和7日的事件,据称中国交涉员被杀害,其尸体被割裂,要求"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第二节的规定"召开"一次国际联盟理事会会议",并宣布它准备"同意为国际调查或仲裁作好任何适当的部署"。对南京的请求来说,不幸的是中国在国联的代表是代表北京政府的,这时南京政府尚未为各国所承认。而且,日本是国联的主要会员国。因此,南京的呼吁并未向会员国散发,也未在《国联公报》上刊载,而日本5月27日的备忘录却予以散发,并列入国际联盟议事录②。5月11日,南京请求美国政府调解。由于未能得到外援,中国人还是使用了他们的自卫的老武器——经济绝交。这种办法持续了一年多,造成日本商界数百万日元的损失。

除盘踞山东铁路外,日本人还暂时控制了从黄河到济南以南几哩的津浦线的一段铁路。1928年5月15日,日本政府训令福田将军向南京要求:(1)由蒋将军正式道歉;(2)惩办济南

① 据日本人的非正式报告,中国约伤亡平民二百人,士兵二千人。日本平民死十四人,伤十五人;日本士兵死四十人,伤一百四十三人。日本人住宅遭抢劫的计一百三十一处。

② 自南京政府为国联和各国承认以来,中国不断努力于在理事会中争取一常任理事席位。在大会中,中国每年派有三个代表。据1930年2月3日的规定,国联中国代表得在日内瓦设常川办公处。

744 事件负责人;(3) 在沿山东铁路的济南和青岛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和宣传。这些要求实际上在一个星期内就被接受了,于是日本人允许蒋将军的一部分军队由铁路北上,继续进行攻夺北京的战役。

日本关于满洲的警告

同时,冯将军、阎将军等人则从西面和南面逼近北京。虽然济南事件妨碍了蒋将军占领这个北方京城的第二次企图,显然北京是要落入南方人的手中了。5 月 18 日,日本向北京和南京发出了同文照会,表明它不容许将中国将领之间的战争带到满洲。而且,张作霖得到通知说,除非他立即撤回满洲,否则将在山海关阻断他去满洲的道路。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已大大加强,日本驻军从四百六十二人增至四千五百人,外国租界都准备抵抗入侵。

张作霖被暗杀

在北方就象在南方和中部各省一样,国民党的宣传比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更能削弱敌方的士气。这一点从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使他们陷于混乱就可以看出。所以在 6 月 2 至 3 日晚上,张作霖离京前往奉天。当他的专车在 4 日正进入奉天时,列车在日本军队守卫的地区被炸了;张的毙命到 21 日才公布。他的职务立即由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

夺取北京

随着张作霖的退出,阎、冯的军队立即向前推进;6 月 8 日,山西部队进入北京城,三天之后阎本人也到达。十天后,南京政府宣布把这个城市的名称北京——北方的京城——改为北平——北方的和平,并开始把档案移至南京。长城以南的整个中国终于在名义上置于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

745

3. 国民党中国和收复国权运动 (1928—1931 年)

1928 年夏季和初秋季之间南京政府的改组,以及此后两年

间所被迫面临的包括叛乱叠起和盗匪增加这无数国内性质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所关心的①。只要说这样一句话就够了：蒋将军对于一个名义上统治一个理论上统一的中国的政府，能够维持住一种独裁的控制，甚至于不顾日本方面的反对而将满洲和热河也正式置于麾下。1928年12月31日，青年将军张学良举起了国民党旗帜，正式效忠南京。他以东北边防军司令的名义，统治着热河和满洲。此外，他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的职位。

满洲归附南京

蒋介石和国民党欲使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决心，以及在1927年所采取的步骤，上文已经述及。宁汉之间的争执，以及夺取北京的战役，阻滞了但并未结束为把中国提高到完全主权国地位而作的斗争。在发动1928年战役之前不久，南京外交部长黄郛将军为同英国和美国解决南京事件就开始了谈判。首先取得的解决办法，就是1928年4月2日同美国政府的正式换文所达成的。虽然声明所讨论的事件是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前由共产党造成的，中国外交部长还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表示深切遗憾，声明有关部队已经解散，个别参加者将予以惩处。对于美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士所受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南京答应全部赔偿，并建议指派一个联合委员会来核定损失和估计赔偿数目。关于中国部长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对于它的军舰"诺亚"号"普勒斯登"号所采取的行动表示遗憾一节，美国公使麦克墨莱声称，按照1927年3月24日的一般情况，除发射掩护炮火外别无它法，但美国政府认为遗憾的是，"它所无法控制的情况竟然使其有必要采取这类措施，以保护在南京的美国公民的生命"。

南京事件的解决

746

① 参阅宓亨利：《革命中的中国》；汤因比：《1928和1929年国际事务调查》；《中国年鉴》，1929—1930年。

类似的解决办法也同英国（8月9日）、法国（10月16日）、意大利（10月18日）和日本（1929年5月2日）的外交代表分别达成。

同日本的解决办法

在上面最后提到的那个日期，1927年4月3日汉口的中日事件由中国方面表示遗憾并答应赔偿而获得了解决；1931年3月，有消息说，中国为解决南京事件和汉口事件已经同意分别给付日本以七十万元和三十五万元的赔款。1929年3月28日，继黄将军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对济南事件取得了解决。这两位代表联合声明，这次事变是“最为不幸的”，在中国政府提出了愿保障日本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证之后，同意指派一个联合委员会，以确定双方所受的损失——但是未曾提到赔偿。日本同意从协定签字后起两个月内撤兵。当下月它宣布准备这样做时，它被要求暂缓行动——理由是南京和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已濒于破裂，政府担心山东被冯夺去。所以日本慨然继续把军队留在山东省直至5月20日为止，虽然在前一年就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直到那年仲夏才结束。

国民党中国的目的

717

在达成这些解决办法的同时，南京政府着手解决收复国权这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同1842到1918年间中国所订条约与所负义务有密切关系。推行政策的基调，见之于俄国人授意的1924年1月国民党宣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①具体地说，国民党中国的目标是在于取消：（1）关税管理权；（2）领事裁判权；（3）外国船只

① 译文引自大同学会《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第308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译者。

在内河和沿海的航行权①;(4) 外国租界和租借地;以及 (5) 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驻扎。

在这种政策中,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想摆脱这些可憎的条约规定的愿望,已分别为 1902 年 1903 年英国条约和美国条约所承认。北京方面于 1919 年向巴黎提出的请求,以及于 1921—1922 年向华盛顿提出的请求,主要是重申以前的愿望。新的东西只是凭靠宣传、外交和武力以求问题迅速得到结果的那种决心。鼓励速战速决和使用暴力的刺激,主要是来自俄国方面的,虽然 1914—1918 年的战争和战后情况也颇有助于这项计划。1921 年 5 月 20 日的中德协定,是中国于晚近时期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谈判的第一个条约。接着是 1924 年 5 月 31 日同俄国签订的初步协定,以及 1925 年 10 月 19 日同奥地利订立的商约。这些条约和协定当然都是由北京政府谈判的,北京政府还修订或废除了同西班牙、比利时、日本、葡萄牙和法国的现行条约。在北京政府存在的最后数周内,它完成了在平等基础上同波兰 (1928 年 5 月 19 日) 和希腊 (1928 年 5 月 26 日) 的签约工作。随着北京政府的倒台,国民党政府把北京政府已开始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748

1928 年的条约

在 1928 年下半年,中国代表同下列国家签订了十二项条约:美国 (7 月 25 日于北平),德国 (8 月 17 日),挪威 (11 月 12 日),比利时和卢森堡 (11 月 22 日),意大利 (11 月 27 日),丹麦 (12 月 12 日),葡萄牙 (12 月 19 日),荷兰 (12 月 19 日),英帝国

① 英国于 1858 年取得长江的航行权(天津条约第十条),于 1897—1898 年取得某些其他水道的航行权——此后其他有约国也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这些航行权。在 1925 年,从事于往返外国和通商口岸之间运货的船舶吨位,英国船占 33.5%;日本船占 27.36%,中国船占 25.74%;美国船占 4.57%;德国船占 1.94%;挪威船占 1.89%;其他国家的船只占 5%。大部分由于中国缺乏船运公司,南京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没有什么切实的进展。

(12月20日),瑞典(12月20日),法国(12月22日于上海)①。这些条约凡未注明在何处签订,一概是在南京签订的。美国公使签订上列第一个条约,被他的政府解释为构成对中国新政府的法律上的承认。在英国条约签字的那一天,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将军呈递了国书,这样就给予了英国的承认。

条约的分析

这些条约主要是处理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除日本外,所有各国现在都承认这个问题了。所有这些条约都载有对于缔约双方国民的相互无差别关税待遇的保证和最惠国条款。其中五个国家——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和法国——把这个条款解释为适用于货物和人。在英国条约和法国的条约中,中国答应"尽快"废除厘金和其他内地税。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同意,只要其他有约国侨民同样纳税,它们的侨民就向中国纳税。按照同这五个国家所订的条约第二条,双方同意各该国家的侨民应服从对方领土内的"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按照这五个条约中的后四个条约附件(一)的规定,这一条应在1930年1月1日施行;在这个日期以前,中国政府为了对外国侨民行使管

749

① 法国条约包括一些特别条款:(1)对于列举的中国商品(特别是茶、香料和绸缎)应基于最低税率的互惠关税协定;(2)在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边境维持减税税率直到签订新协定时为止,但至迟不超过1929年3月31日;(3)指拨一部分关税税款为偿付与法国人有关的担保不足的债款本息之用。

1930年5月16日,在南京签订了中法条约,并附有四个附件和两个备忘录,以规定法属印度支那和邻近的中国云南、广西和广东诸省的关系。根据这项条约,1885年6月9日的天津条约第四、五、六条,1886年4月25日的天津条约,1887年6月26日的北京条约,1887年6月3日这一个条约的有关照会,以及1895年6月20日的北京条约,一律作废。在所考虑的区域内,缔约双方国民的贸易地位,予以维持和规定,并且双方都享受最惠国待遇。关于犯人的引渡也作有规定。现所签订的这个条约是不完备的,关于某些货物的税率仍待协议,并须指派代表商讨云南铁路和警察协定,以及电讯交通的问题。

辖权，须同其他各国政府商订详细办法。如到期不能商订这样的办法，中国行使管辖权一节当延期办理，至于日期应由中国在“同华盛顿条约各签字国订立废除领事裁判权后予以确定，这个日期当然适用于一切签约国”。比利时条约除容许中国“一俟现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大多数国家同意废除”，即可对比利时人行使管辖权外，还将凭以达到类似上述谅解的换文一并包括在内。

为了换取五个条约附件中所包括的暂时让步，中国应允除已于1930年1月1日施行的新法规外，当另行颁布民法和商法，凡不享受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的外国侨民，在服从中国法律约束和规定的条件下，享有在内地居住、贸易和购置财产的权利。关于外人在内地拥有财产的协定，立即受到许多中国人的严厉批评。

同日本的条约谈判

关于税则，中国虽然在1929年2月1日施行了新税率表（税率从7.5%到27.5%不等），但是由于日本没有签订条约，所以中国还没有完全自主。中国同日本的谈判比同其他任何国家的谈判都更为错综复杂，更为旷日持久，这主要是由于下列因素：日本在地理上的接近中国，因近五十年来的工业化而引起的对中国原料和成品销售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的依赖，它在满洲的战略地位，以及日本的政治领袖间在对华政策上意见的参差。从1924年6月到1927年4月，币原男爵是加藤和若槻内阁的外相；他的对华政策是友善的。从1927年4月到1929年7月2日，田中男爵是当时的首相兼外相：他的政策是“积极”政策，其同情心大不如币原男爵的政策。随着田中内阁的倒台，币原男爵复任外相，继续奉行自己以往的政策。

750

1926年10月20日，北京方面以其拟请根本修订1896和

1903年的条约以及1896年的议定书之意通知日本。东京虽然对根本修约的建议表示反对，却同意进行谈判。双方政府从1927年1月开始谈判，一直继续到1928年北京落入国民党手中时为止。1928年7月19日，南京以1896年条约业已满期通知日本，并声明日本侨民应即按十一天前颁布的暂行条例处理，这项条例是为了管理在谈判新约之前同中国所订条约已满期的各该国侨民的。条例中订明这类侨民须归由中国管辖，并且缴付中国赋税和关税。日本否认条约业已满期，声称中国企图管理日本侨民的举动是"强暴行为"，并且威胁说，如果中国企图实行这些条例，日本将采取适当行动。南京并未改变它的官方态度，但并不企图采取行动。两国间的谈判，受到了1927—1928年南京、汉口和济南事件的影响，也受到日本想要避免使它的贸易受到高税率损害这一愿望的影响。

1928年中美条约的重要性

中美关税条约在中日关系已临绝境之际于1928年7月25日签订，使中国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正如五十年前日本的地位因华盛顿条约的签订而得到了加强一样①。在先前的一个场合，东京的英国和德国外交家们曾愤于美国片面废除那个正使日本的意愿受到阻挠的合作政策，于是欧洲国家使1878年7月25日的日美条约失其效力。1928年，欧洲追随于美国之后，而现在被触怒的却是日本人了。直到1929年1月30日——在按原定计划实施新税则的两天之前——日本才通知中国说，它决定承认这个税则。同年7月2日，随着田中内阁的倒台和滨口内阁的组成，币原男爵又同中国恢复了谈判。

751

1930年中日关税协定

最后，在1930年3月12日，王正廷和日本代办重光葵缔结了一项关税协定，于5月6日在南京签字，十天后生效。根据这

① 参阅本书第359页。

项协定及其四项附件，日本完全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由一项对于日本主要出口货适用的互惠的协定关税的规定，来保障三年中它的对华贸易。两国陆地边境的进口货减税税率，将在四个月后废除，嗣后，应即适用中国的正常海关税率。中国同意“于最短期内”废除如“厘金、常关税、沿岸贸易税、通过税及其他类似各税等一切税捐”，并声明已发出命令“着自1930年10月10日起废除厘金”；这个日期后来改为1931年1月1日。关于“日本债权人借与中国无担保及担保不足之款，计有多宗，为数甚巨”一节，中国通知日本：政府“现已自海关收入项下，每年提存五百万元，以为整理中国内外债之用，并拟于本年10月1日或于是日前召集一债权人代表会议，于此会议，将关于整理之适当计划(包括增加上述数额之办法)，提付讨论，俾设法实行该项之整理”①。这清楚表明，尽管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以前所借的巨额款项，国民政府却不得不满足日本的要求并设法偿还。协定的缔约双方声明，交换文件内的各项规定，“应载于中日两国间于最短期内即将商订之通商航海条约内，并为其一部分”②。

废除厘金

偿付日本债款

752

在这项对日协定缔结之后，于11月18日又同荷兰交换了规定关税关系的条约批准书，中国已经赢得了争取关税自主的胜利。它对于所征关税不得不作出暂时性的让步，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它是自主的。可是，它还没有完全控制海关的行政。海关收入构成某些外债(包括1896和1898年英国的两笔债款在内)的第一担保③；这些借款合同中规定，只要债务存在一天，

海关关务

① 录自照会原文，《中外条约汇编》，第270页。——译者

② 同上，第268页。——译者

③ 麦克墨莱：《条约汇编》，第1卷，第55—59、107—112页。

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①。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43年。庚子赔款也是同样地以海关收入作担保的,这笔赔款要到1945年才还清。因此看来海关的首脑直到1943年,并且可能直到1945年,将继续由英国人担任,尽管中国实行关税自主,而且存在着过去几年来日本的对华贸易超过英国和香港的对华贸易这一事实②。

中国政府自始就声明它有权随意更换海关总税务司。1927年1月,佛兰西斯·安格联爵士给假一年,据理解,他将不再返任。这一行动的原因是他面对着外交团方面的抗议而以违法为由,拒绝服从北京政府着即开征2.5%和5%华盛顿附加税的命令。另一个英国人爱德华滋奉派为代理总税务司。1928年10月,南京任命爱德华滋执行总税务司职务——这个位置他在年底就辞去了。1929年1月10日,英人梅乐和奉派担任了实缺。

领事裁判权问题

在同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订立的条约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并没有直接的实际效果,但是却因逐渐753 缩小这一运动的范围,并把维持这种制度的责任放在美、英、法、日四大国的肩上,而在这个斗争中给了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对上述国家中的前三个国家的政府,南京于1929年4月27日致送了同文照会。在述及国家的统一和在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后,表示希望对中国司法权的限制应“在最短期内予以

① 录自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第7条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643页。——译者

② 英帝国的对华贸易仍然超过日本帝国的对华贸易。1927年,前者总计六亿二千八百八十八万零七百九十三海关两;后者总计五亿七千八百二十万零五千六百二十六海关两。美国、夏威夷和菲律宾群岛的对华贸易是二亿九千九百十八万二千五百三十海关两。

取消”。也有类似的照会送达荷兰、挪威和巴西各国政府。

各国的态度

美国、英国和法国在8月10日分别复照。美国复照的语调是同情的。它回顾了在中国维持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制度，指出1926年领事裁判权委员会的建议并未实行，同时，它虽对中国现正实行的改进表示重视，却说：“倘若以公认生命财产向凭以得到保护，商业向凭以得到发展与繁荣的一种确实可靠的司法行政制度，来换取因缺乏适当的法律体系和有经验、有独立性的司法人员而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那么，在上述两方面都会是充满危险的。”英国的复照中有下述一段话：“……西方的法律原则必须为一般人民及其统治者同样地理解和满意，执行这些法律的法院不但不应受军事长官的干涉和指挥，而且也不应受那些团体和社团的干涉和指挥，那些团体和社团建立它们自己的专断和非法的法庭，或者企图利用法院来促进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和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执行平等的司法。”法国的复照主张以实行1926年委员会的建议，作为它放弃这种制度的前提条件。

中国的态度

9月初(1929年)中国复照各国说，自领事裁判权委员会作出报告以来，情况已经改变，指出这种制度在土耳其已被放弃，在中国也有以“和实际情势相协调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的需要。与此同时，这个问题受到出席国联第十届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伍朝枢的攻击；他要求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决定应用国联盟约第十九条的方法，这一条涉及大会有权劝告国联会员国重新考虑“已经不适用了条约”。由于这一项要求可能引起困难，伍先生被劝告撤回他的要求。

754

1929年12月28日的宣言

12月2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项命令，宣布“自民国19年1月1日(1930年1月1日)起，凡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依式颁

布的章则法令，一切享有领事裁判权之外国侨民应一律遵行”。两天后，王部长发表了解释性的声明，大意说，政府“准备在适当时间内考虑和讨论关于南京现在筹备中的计划的任何建议”。对于南京政府的宣言和声明，英国的答复是“同意以1930年1月1日为期，从这个日期起即认为逐渐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过程在原则上已经开始”。对于这个方式，东京和华盛顿都表示赞成。

领事裁判权在1930年底

1930年年底，受中国管辖的计有下列各国的侨民：德国、奥地利、俄国、墨西哥、芬兰、波斯、希腊、玻利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据1929年9月18日同波兰订立的条约，波兰侨民应受中国的管辖，但直到1930年年底，这个条约尚未为波兰国会所批准。自1918年以来，瑞士侨民即享受领事裁判权。一俟其他国家放弃这项权利，瑞士即将予以放弃。中国同瑞典、日本和秘鲁已开始谈判新约，俾使各该国侨民受中国的管辖。

1931年的谈判

领事裁判权问题的解决，已获得很大进展，但在四大国同意废除以前，任务尚不能完成。在1931年春间，王部长主要同日本和英国从事于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谈判。日本代办重光葵代表他的政府在3月间规定四个先决条件，即：(1)中国政府同意逐步取消这个制度；(2)给予日本人以最惠国权利；(3)订出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的全部措施；(4)开放中国内地，准日本人居住。这位日本的谈判人员还明确地声明，日本的利益比其他国家的利益要大得多，两者绝不能相提并论——这个声明显然表示东京方面决不为其他三个国家可能被劝诱签订的协定所影响。附带提一句，4月初，东京宣称它并没有把公使馆从北平迁到南京的计划。

英美两国政府虽在友好气氛中继续谈判领事裁判权问题，

却明白表示它仍希望只是逐渐废除这种制度,它们的法庭至少暂时要在它们利益所集中的地点如天津、汉口、南京、尤其是上海等地继续行使职权。法国则未采取任何步骤来满足国民政府的愿望。

1931年各项谈判的特殊理由

为了筹备制订和实施临时宪法,南京决定于5月5日(1931年)在首都召开国民大会,因而外交部长力请各国对完全和立即废除领事裁判权一节签订一项协定,以便政府能够向大会报告这个烦难问题的顺利解决。由于未能获得各国对于它的计划的赞同,南京于5月4日,即大会开幕的前一日,颁布了一项命令和条例,规定中国对全国外侨行使管辖权。但规定在某些特定地区设立特别法院,承审牵涉外国人的事件。这个新条例将自1932年1月1日起生效。这就给予各国以更多的谈判时间,同时政府也可以在开会之前不受指责了。

756

过去十年中,对旅华外侨人身(包括劫夺、绑架、殴打和杀害)以及对财产(包括非法征税、使用或毁坏财产)的无数攻击,证明领事裁判权已不再是象几年前那样很了不起的一层保障了。可是,这并不表明在革命期间废除这个制度就会改善中国和各国的关系。领事裁判权终必消失;这一点是大家所同意的。争论的问题是,究竟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将所有外侨和财产置于中国的管辖之下方为得宜?

租界的归还

在归还租界和租借地[①]方面,近年来中国已有显著的进展。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侨民的权利和利益的影响,上文已经述及。德国和奥匈帝国在1917年,俄国在1920年已先后失去了它们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1927年,英国

① 关于这些名词的解释和讨论,可参阅威洛比:《外人在华特权和权利》(修订版),第1卷,第17、19章。

放弃了它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1929 年 11 月和 1930 年 9 月，又分别放弃了镇江和厦门的租界。比利时在 1927 年声明准备谈判归还天津租界之后，于 1929 年 8 月 31 日同中国签订了一项归还协定，这个协定于 1931 年 1 月 15 日实行。在天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仍然保留着租界。广州沙面这个小岛，仍由英法两国据为租界。在汉口，法国和日本还保持着它们的租界，正如日本在厦门、杭州和苏州以及英国在牛庄的情形一样。在北平（北京），各国仍然象 1900—1901 年以来一样地控制着使馆区域；它们在这里保留着驻扎卫队的权利。在它们的租界里，只要在紧急时期有此需要，各国就派兵登陆驻扎。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存在着革命状态，很多时候又存在着无政府状态，这757 种做法特别显著。

上海的地位

作为外人在华势力堡垒的上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解决。关于前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并入中国法院和工部局增设华人董事的协定，上文已经述及。1930 年，华董从三人扩充到五人。在邻近的法国"租界"，有五个中国人经法国总领事和中国交涉员联合提名为法国工部局的中国居民问题顾问。这个工部局的势力却不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只不过是法国总领事的一个谘询机关而已。关于把法国控制区域的会审公廨并入中国法院的问题，谈判已经开始。为求协助解决这个关系公共租界前途既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了南非最高法院的理查德·费瑟姆法官对这个地区的法律和组织上的地位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费瑟姆法官在 1930 年间从事于这项工作；他的两卷报告是 1931 年在上海和伦敦发表的。

租借地

1930 年 10 月 1 日，即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八年多，英国将威海卫正式交还中国。对于英国租至 1997 年期满的九龙的归还

问题，却并没有考虑采取任何步骤。对于日本按照 1915 年条约在辽东半岛扩大租借地的合法性，中国仍在争议中，但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法国在广州湾仍然保有租借地，它打算在所有其他租借地都放弃之后再行交还。

虽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能按照它的纲领取消中国主权上的一切束缚，显然在过去四年中已有巨大进展。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可望得到更多的成就。

4. 在满洲的三角斗争 (1926—1931 年)

758

满洲的紧张状况

从战略和经济两方面的观点来看，现代远东最紧张的地区是满洲。中国、日本和苏俄的相互抵触的目标继续集中在这里，正如从十六和十七世纪以来、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就已潜在地集中在这里的情形那样。就日本和俄国而言，过去的二十五年表明朴次茅斯条约只是一个休战的标志，而国民党中国的兴起在满洲问题上又构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新因素。

铁路建筑

东三省农矿富源的开发，连同它所引起和造成的铁路建筑，一直有助于加剧这三个国家为控制这个地区而进行的斗争。中东、南满、北宁三条铁路及其支线的重要性，上文已经论及。自从 1926 年以来，铁路建筑已由中国领先——有时是在日本的帮助下，有时是独立进行的。中国人所控制的奉天吉林线和奉天齐齐哈尔线的确有需要，在 1925 年郭松龄背叛张作霖期间已经得到证明。俄籍局长伊凡诺夫封锁了哈尔滨和长春间的中东铁路，迫使黑龙江督军派往支援张作霖的军队不得不由陆路向嫩江边上的一点推进，从那里才可以搭乘日本为中国建筑的昂昂溪—洮南—郑家屯—四平街（有支线到白音泰来〔即通辽〕）的铁路。

从京奉路上的打虎山(又作大虎山)到白音泰来,中国人已经独自建筑了一条铁路线并且现在是自行管理的。北票和营口同样地分别在锦州和沟帮子同京奉线连接起来。中东铁路上从昂昂溪向北至齐齐哈尔、宁年、克山,有另一条中国人建筑和管理的铁路已经通车。因此,中国现在西满的铁路线大致与南满铁路平行,并越过中东铁路进入旧俄在北满的势力范围。在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东面,中国人经由朝阳[①]和抚顺造了一条铁路把吉林和奉天连接起来;从这条线上的梅河口通向四平街的支线,轨道已铺至西安[②]。此外,一条由日本人建筑而由中国人管理的铁路从长春东达永吉和敦化。在这条铁路通至日本人以轻便铁道连接朝鲜东北部的延吉以后,日本人就能够开辟吉林省的资源,而且在需要的时候更加容易地切断中东路并孤立海参崴和哈尔滨了[③]。

759

中国人的目标

中国人的总目标看来是继续铁路的建筑:(1)东北从吉林通向邻近伯力的拉哈苏苏(绥远县)[④];(2)北面从宁年或克山——也可能是从两处——到面对海兰泡的黑龙江右岸的大黑河;(3)用同样的方法开发热河地区和东部内蒙古。如果这个规划实现,中国人将有两条南北向的干线通到贯穿南北的南满铁路的东部和西部,在两处或更多的地方切断中东路,借以开发俄国人和日本人在满洲势力范围内的财富,并且把交通运输从海参崴和大连移转到辽东湾营口对面的葫芦岛港。为了开辟这个港口,在1930年同一家荷兰公司签订了合同,费用由北宁线的

① 系今吉林省辉南县。——编者

② 系今吉林省东辽县。——编者

③ 参阅金尼:《今日满洲》,第7—19页。

④ 拉哈苏苏为吉林省同江县的土名,同江县与绥远县在清朝同属临江府,致作者将拉哈苏苏作为绥远县。——译者

收入项下拨付。

中日两国在满洲的铁路发展，是伴随着一次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的。关于中国的移民，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人口增加一倍以上，是可能的。在1923—1929年期间，进入满洲口岸的中国人有四百七十万零一千六百六十二人；回到中国去的有二百三十六万零一百五十四人。这就有二百三十四万多人留下来作为移民。移民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足证新来者并不是过路客，而是来安家落户的。目前满洲人口约计有二千六百万，其中约95%是汉人，3%是满洲人。在1928年，日本人共计二十万零三千一百六十九人，其中96%住在日本人管辖区内。

向满洲移民

从人口的观点来看，满洲显然是中国人的。但人口并不是考虑的唯一因素。日本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把握得很紧，而且对苏俄也不能比对帝俄估计得低些。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日本在反对俄国方面曾经是合作者。在现时，日本和中国之畏惧俄国，比它们互相之间的畏惧更甚。中国的一部分铁路的扩建实际上是日本人的扩建，因为经费贷自日本，管理也在日本手中。日本人不再要求在满洲获得建造铁路的权利，但是他们愿意把铁路建筑起来，以便他们的成品得以分配，原料得以采集——而在紧急时期军队也得以迅速开进。关于打虎山至白音泰来线和吉林至海龙城线，日本根据1905年的小村条约，曾经向中国提出抗议，认为这些铁路和南满铁路平行。它之所以未曾抗议到底，显然是因为它不过要保障它的抗议权利，如果中国今后会建造它所不赞同的铁路的话。

不属于人口方面的因素

760

关于葫芦岛把大连方面的运输转移过去的可能性，无论国民党中国的希望和计划如何，日本在目前显然并不担心。它的

日本的目标

目标和决心在于保持满洲的和平，维持它的条约权利，并且在尽可能广大的一个区域增强经济控制，这一点从它随时向张少帅和早些时候向少帅的父亲提出“忠告”，它不时调动军队，它奉行自己的铁路政策以及它坚决地拒与中国讨论继二十一条要求之后而订立的1915年条约的合法性等等看来，是昭然若揭的。

俄日之间的对抗

随着满洲的铁路扩建而来的，是两场国际性的斗争：一场是日本同俄国之间的斗争；另一场是中国同俄国之间的斗争。关于第一场斗争，在俄国革命和对西伯利亚干涉时期，我们目击日本势力的增长，有时竟达到控制北满的程度。可是到了1924年，俄国人占了优势，并且想发展经由铁路到达海参崴的运输，761 以及由此而用它们自己船只装载的货运。这同日本想把运输移向南满铁路和大连的目的相冲突，于是重新开始了争取满洲霸权的老斗争。争议的折衷办法是每年重新签订一个运输协定，协定的大意是以经由中东铁路东运的货运的一定百分比拨由日本人的铁路从哈尔滨南运。但是这个争端的解决办法并没有永久地和缓两国之间的关系。同这种抗争不无关联的是有关反日宣传问题，苏联以不顾1925年的条约而指挥满洲、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反日宣传而受到指责。日本人在1928年1929年进行了无数次的与这类指责有关的逮捕和告发。关于日本人在西伯利亚海面捕鱼权的协议，在执行上也不是没有困难的。1928年1月23日的渔业协定才于5月23日互换批准书，就据报日本已向俄国提出侵害渔业权的抗议，正如次年3月所发生的情形那样。接着发生了另一件纠纷，在1930年12月17日，海参崴的苏联当局封闭了日本半官方的朝鲜银行的分行，并且封存了所有帐册、文件和其他贵重物品，据宣布，这样的资本主义机构存在于俄国领土上是违反苏联的政策的。日本人怀疑这是对他们

渔业权的间接打击，于是立即向莫斯科抗议。他们宣称，苏联官员犯了不友好行为，要求改正。诸如此类的事件足可证明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愉快的。

俄国和中国的对抗

虽然苏联同日本至今还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它们的分歧，中苏争端却并非完全如此。在1929年夏季，以南京和奉天为一方、以莫斯科为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了满洲以内及其边境上的军事行动的爆发。1926年1月张作霖与莫斯科之间纷争①的结果是立即恢复原状，这是使中国人非常难堪的。在1925年张将军以夺取俄国人的江防舰队和封锁松花江航运而开始的一系列行动之后，他紧接着在1926年封闭了中东铁路地亩局和训练所。这可算作1926年事件的一部分。次年，张将军要求将中东铁路收入的半数存入中国的银行。另外一个使中国人发生恶感的渊源就是俄国于1924年后所奉行的政策，它以五个俄国董事全体缺席来阻碍中东铁路十个董事所组成的联合董事会发挥作用的方法，使法定人数不足，以便唯有直接接受莫斯科命令的俄籍局长得以实际上控制这条铁路。

762

巴尔虎

1928年夏季，在张作霖被暗杀后不久，另一个事件使满洲同苏联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这就是一群外蒙古的入侵者——“青年蒙古人”——企图使巴尔虎脱离满洲的控制。在西北边境上的这片地区，曾经在1912年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1915年11月6日，中国和俄国同意这个地区应在中国名义上的主权下自治；实际上，这意味着由俄国人控制。自1920年以来，巴尔虎就处于满洲的控制下，而它曾经成为其一部分的外蒙古，则落入俄国人的势力之下。虽然中东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但是由于这个区域的布利亚特族亲王拒绝支持，军事行动似乎已陷于

① 参阅本书第650—651页。

崩溃，于是满洲军队击溃了进犯者。翌年当海拉尔落入俄国人手中，“青年蒙古人”再度企图在巴尔虎实行自治，并为承认他们的自治而同奉天进行谈判时，问题又重新发生①。

中国人对苏联领事馆的袭击

在苏联人和满洲的中国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日益加剧的时候，长城以南的中国曾一直采取措施，想要摆脱俄国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到1929年春季，随着张学良的归顺南京，国民党政府就准备把恢复它认为是自己应有的权利的那种政策应用到长城以北，并打破莫斯科对中东铁路和北满的控制。象前些时候在中国本部有些地方一样，5月27日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和绥芬河的中国警察，对俄国领事馆进行了搜查。

763

在哈尔滨领事馆内发现八十多个苏联侨民正在开会；其中有四十人被控是来自北满和西伯利亚各地，阴谋在满洲鼓动革命的，因而被捕。据称警察曾经搜获了各种犯罪文件。四天后，莫斯科提出抗议，宣布撤销驻俄国的中国代表的外交特权，直到中国纠正其错误时为止。6月2日，有两名苏联领事馆官员和一名中东铁路董事在他们将去俄国时在满洲里被捕。中国随后的步骤就是在7月10到11日的夺取中东铁路电话、电报系统，封闭哈尔滨和中东铁路一带的俄国官方和非官方机关，接管铁路，和逮捕铁路上的二百多名俄籍员工。在这些职工中有六十人被驱逐出境，包括铁路局长和副局长叶姆沙诺夫和艾斯孟德在内。中东铁路的中国督办兼董事长为这些行动提出辩解，指控俄国人破坏了1924年的中华民国东三省与苏联的协定。

夺取中东铁路

中苏间的控诉和反控诉

对于奉天和南京的指控，莫斯科于7月13日作出答复，认为中国人破坏了1924年的协定，未能利用莫斯科提供的机会来解决未了的争端。这时提出了三项要求：(1) 立即召开会议，解

① 参阅《国际事务调查——1930年》，第368页。

决有关中东铁路的争端;(2) 撤销有关铁路的专横命令;(3) 释放被捕人员和停止对苏联公民和机关的迫害。限三天以内答复，否则苏联政府将"被迫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苏联政府的合法权利"。南京于16日答复，否认了莫斯科的指控，并为中国的行动进行辩护，要求释放在俄国领土上被捕和被监禁的约一千名中国商人，以及给这些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和贸易上的便利。在采取这样行动之后，中国将准备在"适当时期对被捕的苏联官员和封闭的办公房屋采取同样措施"，并且下令调查哈尔滨事件，以备和平解决。莫斯科对这一答复认为不满意，宣布决定 (1) 从中国召回它的外交、领事、商务和铁路的代表和职员;(2) 停止同中国的铁路交通;(3) 命令全部中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离开苏联政府的领土。三天后，中国从俄国撤回了它的代表，从1927年底以来两国间不绝如缕的关系正式破裂了。德国政府应争执双方之请，代管各该方在对方领土上的利益。德国政府在7、8月间进行斡旋的尝试归于失败。 764

军事活动

同时，另外两项行动发生了：一项是军事行动，发生于满洲边境;另一项是外交行动，发生于各国首都。军事活动状态从8月13日一直拖到12月，它之不同于战争主要是没有宣战而已。白俄入侵者不时侵犯苏联领土。在布莱辙将军最高指挥权之下的苏联军队——据报约三千人——进入满洲从事"讨伐"。中国的战斗人员则更多——在中东铁路西段上就约有六万人——但装备既差，训练得也不好。

在满洲的国际利益

除直接有关政府外的各国政府之所以关心满洲斗争，是有许多理由的。由于便捷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地球实际上被压缩了，这使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1914年在欧洲开始的那个可怕的战争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大战的结

765 果之一是协约国从1919到1922年受托管理中东铁路。1929年这条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唯一铁路的封锁，是各国直接关切的问题。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关心于门户开放的继续发挥作用，其中四个国家受到1921年12月13日华盛顿条约的约束，如果它们中间任何一国的同"任何太平洋问题"有关的权利受到威胁，应"充分和坦率地相互交换意见"。日本之加意注视满洲方面的发展是有特殊原因的。虽然不能指望它对俄国力量在中国领土上的削弱(即使结果是那样)会感到懊丧，但是它却不愿容许这种力量在实际上增强，也不愿让中国打击它在满洲的地位，如果中国成功地打击了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话。最后，还有适用非战公约、即众所周知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问题。这个公约于1928年8月在巴黎签订，于1929年7月24日施行。中俄争端提供了考验这个文件的价值的第一机会。中国和俄国都在这个公约上签过字。而且，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

华盛顿条约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

7月18日，在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破裂的前两天，也就是军事冲突的前三个半星期，由1921年12月华盛顿条约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双重联系起来的四国政府，对中俄争端提出了劝告。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和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分别请中、俄两国注意非战协定。争执双方同意遵守条约，非受攻击，不从事于战争行为。可是在整个危机时期，俄国却坚持1924年同中国所订两项协定中的声明，即"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最初，中国虽然亟盼赢得各国的同情，却也多少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是，当满洲显然支持不住俄国的压力时，它就象早年多事之秋那样急于想利用各国的利766 害分歧而从中渔利了。这是办不到的，主要因为各国鉴于中国在这时和前几年在企图解决问题方面所用的方法使人不满，因

而采取了中立的立场。11 月 26 日，南京要求各国对俄国进行干涉的呼吁，证明毫无结果。

满洲同苏联的协定

随着 10 月 14 日拉哈苏苏，11 月 17 日满洲里、达来诺尔和十天后海拉尔的失陷，以及约八千到一万名中国军队的被解除武装，张学良将军于 11 月 26 日准备同意俄国所提出的恢复原状的要求，虽然还没有得到南京的批准。南京通过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向莫斯科建议，双方政府各将军队撤离满洲边境三十哩，并以中东铁路问题提付仲裁。莫斯科拒绝了这项建议。同时，中国打算向国联呼吁，但是伦敦则以俄国并非国联会员国为根据而向中国泼了冷水。与此同时，满洲和俄国达成了协议。代表们在双城子经过初步会议 (12 月 1—3 日) 后，于 12 月 22 日在伯力签订了一项议定书。

第二次诉诸公约

当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又第二次诉诸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接到了俄国于 11 月 17 到 27 日顺利地向满洲推进的消息后，国务卿史汀生同英、法、日、德、意各国派驻华盛顿的代表进行了磋商。然后，美国政府直接同中国并通过巴黎而间接同俄国接触，再一次提醒它们对 1928 年公约所负的责任。其他五十五个签字国中的四十一个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内，还进行了个别接触 ——但不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德国初期的行动并未带来有利的结果，而它却是争执双方的代理人。日本始终抱着规避的态度。可能部分是由于它想表示在远东的独特地位和再三暗示过的领导这个地区的外交行动的愿望，部分是由于它相信并无实际爆发战争的危险，他知道中国没有准备，并且相信第三者的干涉会遭到拒绝 ——就这一项假定而论，它倒是正确的。 767

俄国对美国的答复无异是一种斥责，这使人回忆到国务卿

莫斯科的答复

诺克斯在1909—1910年提出满洲中立化计划时所受的斥责。在声明俄国的行动是“为了防御、保护边境与和平人民的利益”而被迫采取的“反措施”，“绝非违背巴黎公约任何义务”后，苏联政府宣称，美国是“在苏联和奉天政府已经同意了若干条件并且正在进行直接谈判时提出它的声明的……鉴于这一事实，只能认为上述声明是对谈判的无理压迫，不能认为是一种友好行为”。为了发泄它对美国不承认苏联的愤懑，苏联政府最后说，它“对于自愿不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政府认为它可以向苏联提出劝告和商榷一点不能不表示惊异”。

相互抵触的动机和猜疑

除莫斯科对不承认问题表示愤懑外，还有美国和日本在1919—1922年期间对中东铁路财务上的利益问题，以及法国对改组后的道胜银行的利益问题，因为该行股份60%已于1929年声明为法国所有。俄国无意承认中东铁路中俄两国以外的利益。可是1929年美国政府的动机看来并不在于这类性质的利益。国务卿史汀生的政策和行动倒显然是以华盛顿对于实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热诚为基础的。如果公约在行将生效时被置诸不顾，其有效性自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伯力议定书

伯力议定书规定以1924年临时协定为依据，恢复在纠纷发生之前就已经在满洲普遍存在的状况。两国的领事馆和商店将重新开设；为双方拘留的侨民应一体释放；白俄军队应解除武装，他们的领袖应予引渡；中东铁路的苏联行政负责人和雇员应予复职，并订于1930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解决一切争端和恢复中苏间的外交关系。按照这一协定，显然俄国对中国已再度赢得了胜利，而中国则又复屈辱于其北方邻国。在关系决裂以前管理中东铁路的局长和副局长，只是在形式上复职，他们立即由莫斯科指定新人接替，然而铁路的中国督办也由新指派

768

的中国人莫德惠继任了。

莫斯科的中苏会议

莫先生不久就奉南京命令，代表他的国家参加直到1930年10月才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这次的延期使人回想起1924年临时协定签字后召开的那次会议。在谈判中，不久就发现，中国代表的目的在于解决他仅仅有权发言的铁路争端，而莫斯科却希望首先讨论恢复苏中间的外交关系，然后才能谈到两国间的其他悬案。12月底，莫先生回到中国。在南京进行了数周的会议后，他于1931年3月动身回到莫斯科。莫先生在离开南京之前声称，南京准备考虑外交问题和商务问题，包括松花江航运问题在内。同时，中国人指控约有二十五万苏联军队集中在东部西伯利亚和满洲边境上；俄国人已在满洲各省边境大片中国领土上攫夺了控制权；他们正在新疆省（东土耳其斯坦）扩展他们的势力。虽然无疑是有些事实根据的，但对于任何这类指控都没有提出确实的证据。可是，1930年大致与新疆西部边界平行的土西铁路的完成，不能不增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

769

满洲斗争的讽刺

1929年的中苏纠纷造成了双方数百万元的损失，并且除了表明满洲所存在的紧张状态外，没有产生任何结果。1928年公约适用于这个问题的成效如何，是大可怀疑的。苏联同世界其余各国的关系特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居然会凭借攻势手段以图解决中东铁路问题。在俄国人鼓励中国采取直接行动以求解决其国内外问题后，中国就转向它的教导者一试其方法的功效如何，其结果只是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位——布莱辙将军——在指挥军队对它进行抗击。这位将军在反对国民党中国以保卫其本国政府的利益方面，正如三年前帮助国民党打击“帝国主义”政府的在华利益一样，都是胜任愉快的。其结果更清楚地表明，苏联的政策多少同帝俄的政策有些相似，目前俄国甚至比

它在十九世纪时更有决心来支配亚洲。这也成为中国企图靠单方面的行动和力量来解决对外问题的一个挫折。

5. 结论：列强在远东的政策

现状的维持

同远东有关的各主要国家的政策、纲领以及实现这些政策和纲领的途径，本书已经广泛而相当详尽地陈述过了。在结论中，对于目前同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的地位和政策，尚待扼要地加以分析。

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各国对太平洋和远东所抱的公开的目的一般是维持现状。这就是说，要在东半球维持各国的地位和权利。华盛顿条约签字国用以实现这一政策的方法，正正式式是一种合作的方法。除偶有例外，这个方法一直是奉行不渝的。

伦敦海军会议

770

为了适应这个目标，在英国政府的动议下，英、美、日、法、意从 1930 年 1 月 21 日至 4 月 22 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海军会议。这次会议是接着上述前三个国家于 1927 年在日内瓦谋求扩大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的某些条款的应用范围失败之后而召开的；具有很大讽刺意义的是，它也是接着签订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而来的。伦敦海军会议有双重目标：重新考虑有关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 1922 年条款，以及把这项限制军备的协议应用于海战的各型舰只。在会议召开以前，已经清楚的是，英国愿同意维持与美国相等的海军。日本表示它意欲保持等于美国实力 70% 的一支舰队；它辩称，这才足以供防卫之需，而并不是供侵略之用的。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在这次会议上的争执，阻碍了它们的代表们充分参加五国公约。

这个会议以签订一项有效期至 1936 年为止的条约而告终。

按照这项条约，五国同意在条约有效期间不建造新的主力舰。英国、美国和日本同意在两年半之内处理它们的九艘主力舰，但容许法国和意大利按照华盛顿条约“建造它们有权于 1927 和 1929 年建造的补充吨位〔各为七万吨〕”。废除潜艇的企图失败了，但是达成了一项人道主义的协议，以国际法中有关水面船只对待商船的规定无限期地适用于潜艇。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把条约所议定的三国舰队力量表提交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舰队比率是 10:10.2(或 10.1，如果美国作出条约第十八条规定的选择的话):6.3。英国和美国同意在原则上保持同等实力。至于美国政府是否不惜花费来实行同等原则虽尚是问题，但是它的这种权利是获得承认的，1936 年以前，三国之间的海军竞争显然受到了遏止。 771

没有一个主要国家是完全如愿以偿的；而尤以日本为然，但协议既已达成，足证已有相当程度的相互信任，而这些国家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关系，在条约有效期间，至少可望在性质上是和平的。

日本的政策

西太平洋的主要国家是日本，它在二十世纪一鸣惊人地跻于强国之列应归功于它的民族和领袖们吸收新思想和新制度的能力，西方强国的角逐，美国所给予的援助，以及特别是从 1900 年以来风靡中国的革命混乱局势。日本的目的不外是保持它已有的一切和进一步加强它的地位，正如大多数国家的目的一样。瞻望前途，自从十九世纪中叶堀田勋爵和谷子爵时代以来的日本政策，看不出有任何根本改变的迹象。尽管日本自从西伯利亚撤兵以来，它的扩张是通过经济的途径而不是通过领土的途径，然而究竟它在太平洋方面或亚洲大陆方面的领土扩张是否已告完成，则尚不得而知。除田中男爵担任首相时期 (1927 年

4月到1929年7月)可能是一个例外,日本对华关系中所采用的方法已一变武力和傲慢而为敦睦和友好了。中国是日本注意的主要目标;如果日本要维持国内繁荣和大国地位,那个广大地区的原料和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大概有十亿金元之数。日本对中国抵货运动的敏感和对关税协定的注意,可作这一点的证明。同中国人的文化血缘关系受到了重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被鼓励去访问日本。日本还讨论了如何在中国为了文化和教育的目的来利用庚子赔款的计划。近年来当日本侨民和财产受到攻击时,虽曾提出赔偿要求,但一般是以温和态度解决的;这在1925年上海纱厂纠纷和1927年的南京屠杀案中,尤属显而易见。为了造成西方人在东方影响的衰落,日本自己在朝鲜和满洲就出力不少,并且在中国眼看着西方人的地位受到打击而无明显的不快。如果中国革命的变化不能使它跃居世界强国之列,如果西方在东方的影响继续衰落下去,日本的地位还会进一步加强。

772

日本的1929年宣言

当代日本的对华政策,在1929年7月9日的日本内阁宣言中可见梗概:"我们的政府不但拒绝对中国任何部分进行侵略政策,而且准备友好的援助中国实现中国的民族愿望,但是政府当然有责任来保护和保持日本的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合法权利与利益。政府相信中国人民能充分理解这一点。"至于在这些权利与利益中什么是"合法"的,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意见相当分歧。这在巴黎和华盛顿会议时已昭然若揭,而且以后也有过多次的证明。

1931年1月的币原声明

1931年1月22日日本帝国议会开幕时,代理首相兼外相币原男爵对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势作了一番评论,特别提到中国、俄国和美国。他反复声明他的政府为解决中国方面的那些

终将导致各国放弃其特殊权利和权益的问题，决以友好和积极的态度同中国合作。同时他向中国发出一个隐约的警告，告诫中国不要企图“使南满铁路沦于毁灭”。关于日俄关系，他谈到两国之间贸易量的增长，并说明他深信渔业问题会达成适当的调整。他把日本同欧美的关系说成是“完全满意的”，但关于美国的移民政策，他却补充说，“不复有任何可疑的是，我们的地位现为大多数美国人民所充分理解和重视”，而日本人将“以冷静而异常关切的态度来注视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发展”。

773

俄国的政策

除了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目标输入远东这个重要的例外而外，难以看出1860年以来俄国的政策有任何变化。它想列为太平洋和远东国家的决心由来已久。日本在多少阻止这种政策方面一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直至1927年年底以前，中国一般是悠然自得的。俄国在中国一般采用的方法一直是敦睦友谊——虽然是要代价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在俄国手里吃的苦头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手里要多得多，但是它丧失给俄国人的东西，比起西欧国家和日本对它的尊严所加的并不重要而被大肆宣传的侵害来，却不大为它自己和别人所清楚了解。苏联领袖们的成就，比帝俄的成就甚至更是惊人，正如蒙古和满洲方面的现代发展所昭示的那样。除向温暖海洋推进和并吞中间地区的悠久的帝俄政策以外，莫斯科还志在以共产主义学说灌输于东方。中国有一个时期几乎不自觉地帮助了苏联的规划，现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在这样做。1925—1927年时期的结果，是对英国利益的一次集中打击，继之以奠定在苏联体制上的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如果莫斯科的目标和方法是一致的话，可以想象，中国早会不顾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反对，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基地了。除非蒋介石将军的政府在扑灭华

中、华南的"共匪"方面能获成功，情况仍然会是如此的。1927和1929年中苏关系的破裂构成了一个挫折，这种挫折的严重性，不但要看在中国本部而且要看在满洲、日本、朝鲜和法属印度支那所继续散布的共产主义宣传的成就如何而定。

在西方各国之中，迄今仍以英帝国在东方和太平洋上的利774益关系为最大。包括各项让与、十亿金元左右的投资和贸易上的领导地位在内的在华利益，是同英国在马来西亚①、大洋洲和印度的地位密切联系着的。一个地方发生挫折，立即就在其他各地得到反应。

中国反英情绪的缘由

大部分由于英国首先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这一事实，英国人在打开中国海禁上面取得了领导地位。经过两个多世纪同中国比较和平的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之后，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进行了两次战争，以期在坚实的基础上发展和维持其同中国的关系。巴麦尊勋爵的政策是一种坚定的政策，而且除对鸦片问题的有争论的关系外，也是正当的政策。英国政府并不为它的公民要求它不愿意他国侨民享受的权利或权益。中国在屈服于英国的要求后，同英国共同议定，准别国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其他各国没有象英国那样激起中国人方面那样大的愤慨，就获得了英国的政策和行动所产生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何以部分中国公众愿意联合俄国人来集中攻击前已述及的英国人的地位。但应该注意的是，许多旅华英侨在社交上对中

① 1930年7月9日，海军大臣亚历山大曾作如下声明："新加坡基地的费用总额……到最近为止是二百五十七万七千镑。估计费用总额是八百七十二万一千镑……主要施工的完工日期是1935年9月，基地的装备还需要两年时间，因待机器装置完备，基地完工的最后日期需延到1937年底。"新加坡将形成一个海空军基地。参阅希尔德：《大不列颠和太平洋》，见《太平洋杂志》，第4卷，第1期（1931年1月），第25—26页。

国人所采取的高傲态度，英国人在东方的一部分有影响的报刊经常所持的吹毛求疵的、冷酷的和反动的论调，以及英国政府直到 1925 年为止对中国的一般保守态度，都在中国反英情绪的滋长中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人对于礼节、秩序和纪律的观念，大为近年来中国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的粗鄙、混乱和缺乏纪律的情形所震撼。英国人因性格爽直，致往往流露出坦率和诚恳的言谈，这就刺伤了把苏联代理人的迷人歌声听得入耳的知识分子的耳朵。

张伯伦的对华政策 775

英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由 1926 年 12 月英国致华盛顿条约各国的照会中表明了出来。次年 1 月，奥斯丁·张伯伦爵士在伯明翰的一篇演讲中宣称："一年前，我在我国出席北京关税会议的代表离英前的演讲中，用这几句话来略述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唯一的愿望是有一个强大、统一、独立、有秩序而又繁荣的中国。在我们这一方面，当尽可能予以协助；我们准备同中国妥协。我们准备比照中国政府所能保证我国侨民适当地享受到的外国人在华的普通权利，而放弃特殊权利。'这一直是，并且现在仍是陛下政府的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在远东，我们是一个商人的国家。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让我们的商店开门，对我们的同胞友善。"这种敦睦政策的诚意是很多中国人所怀疑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为时已晚。直到南京政府建立以及由于南京同俄国的破裂而在形式上削弱了苏联的影响的时候，这种政策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结果。张伯伦的英国政策声明，由于麦唐纳首相的内阁继续奉行而增加了力量。1927 到 1930 年间汉口、九江、镇江和厦门英租界的让出，以及威海卫的归还，充分证明了英国现代对华政策的诚意和现实性。

关于德国在远东的政策，勿庸赘述。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

德国的目标

丧失了在东方的权益和财产,并且在目前已不能再列为大国。它的战后政策已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它不能不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国家看待,并奉行一种以恢复它在中国的贸易地位为主要目标的友好政策。至于中国对德国的友好态度,则从南京在 1929 年的决裂期间选择它作为中国在俄利益的保护者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

法国的政策

法国奉行一种对中国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的政策。它在中776国的利益、不能同日、英、俄、美的利益相比。它往往采取独立行动,正如它往往采取合作行动一样;1849 年在上海设立法国"租界",1916 年在天津为它的租界另外攫取新土地,以及在相当时间内妨碍它履行华盛顿条约的金法郎案,都证明了这一点。它对领事裁判权和租界的态度,是只要行得通,就尽可能维持现状;这多少是因为它同日本的关系。自康斯汤提尼阁下于 1922 年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的驻华代表以来,法国作为在华罗马天主教会保护者的昔日有力的地位,也残余无几了。在印度支那,它的地位依然是强有力的;至于它为巩固那个地区同它在太平洋属地的关系而制订的方案,则上文已经述及。

美国的政策

常常有人这样说,美国在远东有政策而无方案。这种说法对美国和对其他国家是一样不确切的:政策是目的问题;方案则是方法问题。在情况有变化时,政策凭以实施的方法也非改变不可。美国的政策是鼓励东亚国家确保独立,帮助它们加强其地位,并要求给予一切机会,俾美国侨民得享受其他外侨所享受的权利,这种政策在日本、暹罗和中国运用得颇见功效。在朝鲜问题上,由于美国人所无法控制的而且只能间接负责的局势的发展,美国的政策同朝鲜的独立一起葬送了。

美国政府在东方面临着三种可能性,那就是要么同各国合

作，要么完全退出，要么发展它自己的政策并准备不惜最后以外交和武力的手段来保卫或实现这种政策。近年来，它一般是采用合作政策。它带头倡议在中国组织新的国际财团；还带头要求解决临城事件，结果它参加讨论了警卫中国铁路的计划。它也和各国一起阻止了孙中山所策划的夺取广州海关税款的举动，并参加了大沽最后通牒。最后，它会同英、法、意、日各国政府，在1927年3月24日南京暴行之后，递送了同文照会。但是由于拒绝会同各国在内地使用武力以支持这些要求，它妨碍了合作行动。1928年同中国独自谈判关税条约和承认南京政府，它树立了一个为其他各国所追随的先例。因此，显而易见，在合作行动和独立行动之间的取舍，是以时机的迫切需要为根据的。

合作对独立行动

777

由于既过分积极而又不甚积极，美国政府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纵然美国的商业界对于中国某些民族主义的抱负素乏同情，且倾向于要求和支持激烈的行动，以强迫中国履行它的国际义务，可是很多美国传教士却帮助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发扬，并且对于通过一切合法途径来收复权利的运动给以支持。在被中国国民党及其俄国顾问于1925到1927年抨击为“帝国主义的”大国中，唯独美国没有从中国征服或租借过领土，也没有享有过势力范围。可是，美国仍然同其他若干国家一道享受领事裁判权——如果根据它一贯为其侨民要求最惠国待遇这一点而加以考虑，这就很可以答复人们有时提出的那种认为美国政策是以利他主义和感情用事为基础的指责了。美国在东方的政策同其他各国的政策之间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的利益和政策一般是同东方国家的利益和政策一致的，而欧洲各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却向来不是这样。

美国政策不以感情用事而有实际性

美国政府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一般都不是一个容易扮的角

实现美国政策的困难

色。美国同其他各国之间目的的分歧，使美国至少在要求东方各国力图自行振拔而不仰赖外援这方面是应该得到它们的支持的。就日本和暹罗的情形而论，这类行动不久就证明美国政策的正当。在朝鲜则不是如此；在中国从1842到1928年，中国人方面的自助还不足以保证中国必会沿着日本和暹罗所走过的道路前进而不蹈朝鲜的覆辙。在1900年前后的很多年，保全了中国的是美国以外的列强对于分赃方法之未能取得协议，以及为美国政府所坚持而有时为英国所诚意赞助的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政策。

778

美国在华利益

如果美国要顾到自己的利益，它除一向所奉行的政策外简直不可能奉行任何其他政策了。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并不象日本和英国那样对本身的繁荣关系重大。但是，利益却也不小。据估计，美国教会在华财产约有七千八百万金元，而美国商业利益的总额为六千八百万到七千万金元①。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列于第三位，约占中国进口的五分之一和出口的四分之一。丢开两国广泛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谈，一望而知的就是中国人民组织一个能够照料自己利益的国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他们在1928年以前没有能这样做，这至少迫使美国扮演了一个大致保守的角色，同三十年前在日本扮演的角色在精神上初无二致，但只在外表上有所不同而已。美国曾参照日本确切证明它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负责角色的能力，来帮助它解脱外国对它主权所加的束缚。在拒绝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同时而进行的1928年7月关税条约的谈判，足证美国早期的对日政策和现代的对华政策，是同一个政策。国务卿凯洛格在关税条

① 密歇根大学的雷默教授根据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进行调查将近三年的结果，最近将美国在华投资总额估计为二亿金元。

约签字前不久致王正廷部长的下述照会，证明情形确是如此："美国对中国的亲善是人所共知的，美国政府和人民欢迎中国人走向统一、和平和进步的一切进展。我们并不想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所要求于他们的，只不过是我们希望从那些同我们维持友好往来的国家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适当地保护美国公民及他们的财产和合法权利，一般地说，所受的待遇同给予其他任何国家的侨民或利益的待遇相比，无所轩轻。"

国务卿凯洛格的政策
779

自日俄战争以来，在实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华盛顿政府和东京政府之间每每显出冷淡的情形。这构成召开华盛顿会议的理由之一。近年来，正如就伦敦海军会议表明的情况那样，彼此猜疑很多。在那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卡斯尔大使在离开日本时公开地说："在这个会议后的信任和亲善的时代，美国所必须懂得而且能更容易懂得的就是，正因为日本在这里的利益关系重大，正因为日本的对华贸易具有异常的重要性，日本必须是、而且行将是太平洋和平的捍卫者。"日本政治家并不倾向于把这种言论解释为否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地位，这一点日本派赴伦敦的首席代表前首相若槻在返国时似乎已说得很清楚："……固然，美国了解日本在远东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并且了解太平洋的和平是由日本维持的……但若断言美国因此而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优越地位，我却并不认为是恰当的。"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

如二千多年来的情形一样，中国成为远东的核心。实际上自十六世纪以来，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一直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暹罗、印度支那、菲律宾群岛、朝鲜和日本，问题的解决办法已经找到了——虽则并非容易，但比起中国的情形却要容易得多，也有决心

中国问题
780

得多。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洲，拥有发展远东基本文化的一个人民的群体。中国过去的伟大，正如它幅员的广大、人口的众多一样，使得现代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中国能达到一个以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协调为基础的均衡状态之前，它受到了一个新文化发展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影响。从共产主义的宣传中心回国的学生和旅行家，以及外国人，已经在中国的血管中灌输进新的病毒。共产党的组织近年来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已经打下了坚强的基础。原来的国民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当它对共产党员开放党籍的时候，曾有许多党员退党。没有俄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供应，国民党的目的是不会在那个时候用那种方式实现的，后来企图同共产党决裂和扑灭它的意识形态，这些努力正如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长江以南诸省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并不是完全成功的。谁懂得中国谁就掌握了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的锁钥，这是出自海约翰的名言。似乎目前还没有任何个人或任何国家掌握这个锁钥。

索　　引

（译名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

C

D

E

F

G

H

J

K

L

N

O

P

Q

R

T

V

W

X

Y

Z

附录　宓亨利著作目录

一、书　籍

书　名	出版地点、日期
中国学生短篇读物 (Short Stories for Chinese Students)	上　海，1919
西方史导论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History for Chinese Students)	上　海，1922
中国近代史选读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上　海，1923
华侨志 (The Chinese Abroad)	上　海，1925
中国新民族主义论文集 (China's New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上　海，1925
中国国际关系论文集(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Essays)	上　海，1926
远东国际关系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上　海，1928
中国在革命中 (China in Revolution)	芝加哥，1931
中日冲突之真相 (The Re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芝加哥，1938
中国赈灾纪实 (With the White Cross in China)	北　京，1939
中国 (China)	1946
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 (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纽　约，1950

二、论　　文

题　　目	杂　　志	卷　期	日　期
华侨中的宣教工作 (Christian Work among Chinese Abroad)	载 M. T. Stauff编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新教运动与政治事件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Movement and Political Events)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第358—362页	1926
今日中国：民族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帝国主义 (China Today: Nationalism, Bolshevism and Imperialism)	载 C.E.Martin与E.Dobie编“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第35—53页	1928
文明史教程 (Freshman Course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载 Wm. S. Gray编 “Junior College Curriculum”	1 第215—220页	芝加哥 1929
东方之愈益接近 (The Increasing Nearness of the Orient)	载 E. C. Carter编 “China and Japan in our University Cutticula”	pp 11—17	纽约 1929
东西方的文化亲善 (Intellectual Rapprochement of East and West)	St.John's Echo	40 第8—14页	1929.7
中国移民 (Chinese Immigration)	载14版之“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第556页	1929—46
中华民国政治史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under the Republic)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52 第214—228页	1930.11

题　　目	杂　　志	卷　期	日　期
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Surve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30" C.P.Hawland编	第5—64页	1931
满洲：一个三角形 (Manchuria: a Triangle)	"Nineteenth Century"	109 第681—691页	1931.6
美国的远东政策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 Society"	19 第541—563页	1932.10
	曾节录于"China Press"	第161—166页	1936.10
华盛顿会议以来列强在远东的政策 (The Policies of the Powers in the Far East since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World Unity"	10 第5—16页	1932.4
欧洲与远东 (Europe and the Far East: the Drive for Power and Profits in the 19th Century)			1934.7
远东近代史 (Modern Far Eastern History: A Syllabus)			芝加哥 1934
三角形中的中国 (China within the Triangle)	载 H. S. Quigley编 "Peace or War? A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	第129—149页	1937

题　　目	杂　　志	卷　期	日　期
	esota"		1937.4
卡洛林航海日记 (The Log of the Caraline)(按系Richard Jeffry Cleveland船长,MacNair, H.F.编)	"The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29 第61—84页 第167—200页	1938.1-4
中国对外关系某几个方面的长远回顾 (Some Aspect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Long Retrospect)	"China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 第346—362页	1939.1-3
中国与日本的对抗思想 (China and Japan: Their Politics" Antithetical Ideologies) (与Florence Ayscangh MacNair合著)	"The Review of Politics"	3 第306—318页	1941.7
没有判断的回顾 (Retrospection without Prediction)	"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32 第3页 第14—15页	1941.11-12
远东问题 (The Far Eastern Problem)	见"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第14版 第9卷 (1946) 75—75L	
中国与远东 (China and the Far East)	"Review Politics"	6 第110—120页	

题　　目	杂　　志	卷　期	日　期
远东的"神秘" (The "Mystery" of the Far Ea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37 第3—7页	1944.12
来自中国后方的声音 (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	MacNair编 费孝通等撰		芝加哥 1944 (共106页)
友谊通讯 (Correspondence of a Friendship)	MacNair编 Florence Ayscongh与Amy Lowell撰		芝加哥 1945 (共289页)
不可比拟的女士 (The Jucam Parable Lady: Trilrete and other Memobilia Pertaining to Florence Wheelock Ascough MacNair)		私人印刷	芝加哥 1946
军阀混战时期 (The Republic: Phase of Warlordism 1911—1918)	为作者所编"China"一书之第9章		1946
金刚山游记 (A Pilgrimage to Diamond Mountains)		私人印刷	年代不详
戈托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七条 (Shimpei Goto: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7)		第4页	1932
威廉金编：美国人名辞典第十条 (Charles William king: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第383—384页	1933

三、书评和旁人对宓亨利的评论

书名和作家	登载何处	卷期	日期
摩根斯坦：珍珠港秘密战争的故事 (George Morgenstern: Pearl Harbor: The Story of the Secret War)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T. VI. 第430—431页	1945—47
Nancy Lee Swann 评宓亨利所编中国(China)一书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T.VII. 第325—328页	1947—48
Maurice T. Price 所写宓亨利的生平及其著作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T. VIII. 第45-63页	1948—49
Paul H. Clyde评宓亨利与拉齐合编的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 (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T. X. 第378—380页	1950—51

四、广播谈话

日期	题目	争论者	电台
1938.5.22.	远东：谁的胜利？(The Far East: Whose Victory?)	Carroll Binder, E.B.Price	芝加哥大学圆桌(以下简称“芝”)
1940.1.21.	远东：后门还是战争？(The Far East: Backdoor or War?)	Walter Laves, E.B.Price	芝
1940.12.1.	苏联与美国 (The Soviet Union and America)	Samual Harper, Walter Laves	芝

日　期	题　　目	争　论　者	电　台
1941.8.10.	日本：是落日吗？(Japan: Setting Sun?)	Tyler Denhett, Nathaniel Pebber	芝
1941.10.26.	与日本摊牌？(Showdown with Janan?)	Nathaniel Pebber, James Young	芝
1942.6.21.	中国(China)	Eliot Jane Way, Nathaniel Pebber	芝
1943.12.5	太平洋上的目标(Objectives in the Pacific)	H. G. Callis, C.D.Mac Dougall, J.H.Mc Burney	西北大学论坛(以下简称"西")
1943.12.12.	四强会议(The Four Powers Confer.)	Franklin Scott, Quincy Wright	芝
1943.12.26.	小国问题与和平(The Problems of Small Nations and Peace)	William Holperin, Sir Bernard Pares	芝
1944.4.16.	美国远东政策(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	T.A.Bisson, Walter Judd	芝
1944.7.30	日本(Japan)	Thorburn Brown Baugh, Harold Quigley	芝
1944.8.20.	作为一个世界种族问题的和平(Peace as a World Race Problem)	Louis Adamic Ernest Colwell, Robert Reclfield Owen	芝
1945.2.4.	中国是否是联合国中的薄弱环节(China—Weak Link in the United Nations?)	Lattimore, David Roloe	芝
1945.7.1	俄国与远东(Russia and the Far East)	Kenneth Cobgrove, Albert Darry Frank Smothers. J.H.McBurney	西

日 期	题 目	争 论 者	电 台
1945.9.2.	中国问题的解决? (Solution in China?)	J.B.Well. Agnes Smedley	芝
1945.12.2	我们的对华政策将会如何? (What Shall Be Our Policy in China?)	Chen Chi-Mai, Kenneth Colegrove Frank Smothers, J.H.McBurney	芝
1945.12.16.	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如何? (What Should Be American Policy in China?)	Dryden Phelps, Robert Smith	芝
1946.8.4	中国的内战(The Chinese Civil War)	Robert Smith, Gunther Stein	芝
1946.10.27.	美国与中国的战争(America and Chinese War)	Owen Lattimore, Theodore White	芝

宓亨利所编中国新民族主义文集
(China's New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题 目	登载刊物	日 期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China's New Nationalism)	—	—
招聘译员(Wanted: An Interpreter)	—	—
关于排外主义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on Anti-foreignism)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1/XI
关于种族与民族优越性的感觉(On Feelings of Racial and National Superiority)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8/XI
保护传教士(The Protection of Missionaries)	—	—
《某些亚洲人关于白种文化的观点》("Some Asian Views of White Cultur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26/IV

题　　目	登载刊物	日　期
对于留学生的不断的打击(The Perennial Attack on the Returned Student)	—	—
中国政治中的唯心主义(Ide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XIII
中国的贵族制与民主制(Aristocracy and Democracy in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2/VIII
中国和宿命论的人(China, and the Man of Destiny Idea)	China Weekly Rview	1923.8/XII
一个刺激物的类似(An Analogy in Stimulants)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5/XII
打算盘的头脑(The Abacus Mind)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5/V
中国的一个循环(A Cycle of Cathay)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9/II
天空中的麦哲伦(Magellans of the Air)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21/VI
停战日(Armistice Day)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7/XI
一个备受赞扬的议会(Applause Parliament)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27/X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The Basis of An American Policy in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11/X
将赔款还给中国(The Return of the Indemnity Funds to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5/VII
官方义务的现代应用(Official Responsibility Modern Application)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26/VII
盗贼发生的某些原因(Some Causes of Banditry)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6/VI

题　　目	登载刊物	日　期
盾牌的反面(The Reverse of the Shield)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 20/Ⅹ和17/Ⅺ
顾(维钧)博士对于临城照会的回答(Dr.Koo's Reply to the Lincheng Not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3/Ⅹ
中国的牺牲和日本的公道(Chinese Victims and Japanese Justic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14/Ⅵ
瑙鲁岛上的合同劳工(Contract Labor on Nauru Island)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29/Ⅲ
东方闭关政策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Oriental Exclusion)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10/Ⅴ
花烛新娘("The Flower Candle Wif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28/Ⅳ
许可归化的中国人进入美国(Admission of Adopted Chines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eekly Review	1924 28/Ⅵ和25/Ⅹ
现代的中国学者(The Modern Chinese Scholar)	St.John's Echo	1922
作为绅士的学者(The Scholar as a Gentleman)	St.John's Echo	1923
赈灾工作情况(Famine Relief at Work)	—	—
贾尔斯教授论中国的混乱(Professor Giles on Chaos in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11/Ⅲ
中国的各种政治倾向(Political Tendencies in China)	China Missian Year Book.第1章	1923

宓亨利所编中国国际关系论文集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Essays)

题　　目	登载刊物	日　期
中国的国际关系(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5
论美国对于东方事务的不关心(On American Ignorance of Things Oriental)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和日本("Unequal Treaties" in China and Japan)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外人眼中的上海(Shanghai—As Others See It)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土地章程(The Land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hina Press	不　详
关于种族平等的想法(Thoughts on Racial Equality)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Combating Bolshevism in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解放中国问题的途径与方法(Ways and Means of Solving China Problems)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中国基督教史的危机期(Critical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ty in China)	1925年11月3日在上海教会发表的演说，曾译成中文	不　详
几个驻华传教士的文学著作(A Note on the Literary Labors of Some Missionaries to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不　详

题 目	登载刊物	日 期
传教和当前的危机(The Missionary and the Present Crisis)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
关于传教士的修养(A Note on Missionary Ethics)	China Recorder	1926
教会学校和政府的登记(Christian Schools and Government Registration)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巴特勒校长和教会教育(President Butler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26
历史和中国问题(History and the China Problem) (此文在刊物上的原名为: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 第355—369页	1926.10